艾奇逊回忆录

上 海 译 文 出 版 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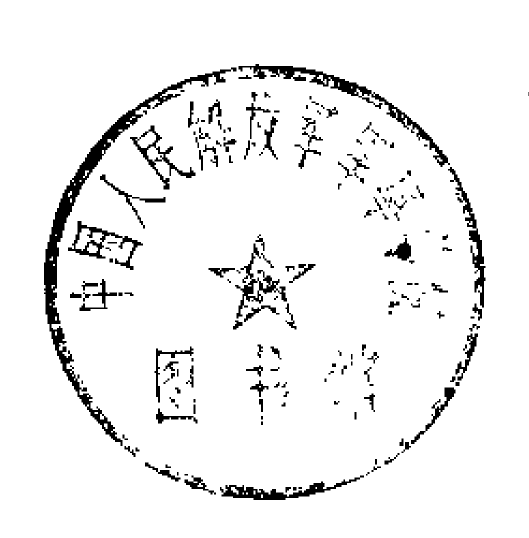


艾奇逊回忆录

上 册

〔美〕迪安·艾奇逊著

上海《国际问题资料》编辑组
伍协力 合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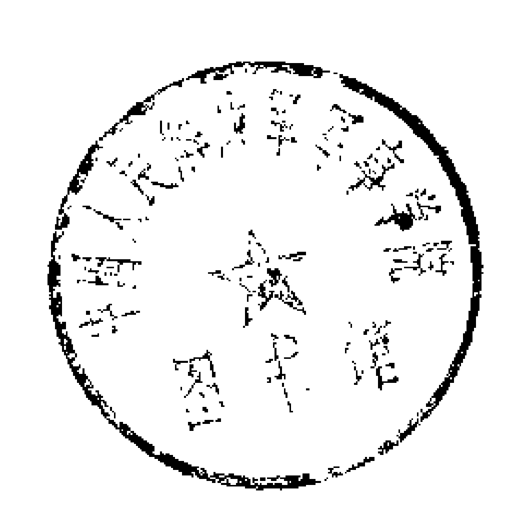
上海译文出版社

艾奇逊回忆录

下册

〔美〕迪安·艾奇逊著

上海《国际问题资料》编辑组
伍协力 合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Dean Acheson

PRESENT AT THE CREATION

My Years in the State Department

W. W. Norton & Company, Inc, New York, 1969

根据美国纽约诺顿出版公司1969年版译出

艾奇逊回忆录

〔美〕迪安·艾奇逊著

上海《国际问题资料》编辑组 合译
伍 协 力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中路967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二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19.5 字数 384,000

1978年4月第1版 1978年4月第1次印刷

定价(上下两册)：1.90 元

内部发行

译 者 的 话

迪安·艾奇逊(1893—1971年)，律师出身，1941年进入美国国务院，任助理国务卿；战后历任副国务卿、国务卿，1953年退职，以后曾充当美国各届总统的对外政策顾问。

艾奇逊是美国总统杜鲁门的亲信，他们两人都先后投靠摩根财团。艾奇逊所推行的“冷战”和侵略扩张政策，反映了战后美国统治集团妄想独霸全球的野心。在对苏关系上，艾奇逊鼓吹从“实力地位”出发，对抗和“遏制”苏联；在欧洲问题上，他主张加强欧洲联合，重新武装西德，建立统一的欧洲军事力量；对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他竭力主张美国向这些地区侵略扩张，控制中间地带，取英、法等老殖民主义者的地位而代之。他极端仇视社会主义的新中国。他参与了杜鲁门政府时期的历次重大外交活动，在制定杜鲁门主义、马歇尔计划和建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本书原名《创世亲历记：我在国务院的年代》，1969年在纽约出版。这里我们摘译了自1945年8月起至1953年作者退职时止的部分，并略加删节。由于书中提供的一些资料均系作者的亲身经历，对于研究杜鲁门政府时期的外交活动和对外关系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但是，作者的观点是极端反动的。书中充满了帝国主义的强盗逻辑和反动的唯心史观。例如，他在叙述美中关系时，蓄意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无耻吹捧独夫民贼蒋介石，为蒋介石集团的反共反人民的滔天罪行和美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的政策辩解。由他经手发布的美中关系白皮书，“**是一部反革命的书，它公开地表示美帝国主义对于中国的干涉**”。他在叙述朝鲜战争经过时，耍弄反革命手腕，隐瞒和捏造事实，反诬中国和朝鲜是“侵略者”。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希望读者阅读时注意批判。

1977 年 8 月

目　录

一　新的职务和职责的扩大

1945 年 8 月 27 日，星期一，我宣誓就任副国务卿——在两届国务卿任内一直留任到 1947 年 7 月 1 日，为期六百七十二天。由于我的上级多次出差而且时常延期返任，为此我大约有三分之一多一点时间担任代理国务卿之职。由于正值国会休会期间，这个任命是一个"休会任命"，这意味着当国会复会时，这个提名将提交参议院批准。这种情况使被任命者有机会为参议员们提供对他批评的根据。我很快就得到了这一机会。

原子能问题的开始

1945 年 9 月 18 日内阁午餐会上，总统简要地谈了需要对原子能的国际谈判确定一个方针。9 月 21 日，星期五，史汀生上校最后一次参加内阁会议。总统建议这次会议专门讨论这个问题，并集中讨论史汀生上校的备忘录。这份备忘录在当时以及后来一直被误解了，部分是因为附件中有一封信提到"与俄国分享原子弹"，这句话引起了内阁中许多人的不安。但是，这份备忘录探讨一个范围小得多的问题，这就是应当研究同俄国人讨论由于我们发明了原子弹所引起的问题。关键性的几句话是：

露给了报界，因而在国会引起轩然大波。总统同参议院的领袖们举行了会见。艾德礼首相极力主张与麦肯齐·金举行一次三方面的会议。提交给国会的咨文正在准备中。

上午，在内阁午餐会之前，我就原子能立法问题同总统举行了商谈。几个星期以来，纽约联邦储备银行总经理乔治·哈里森和在原子能问题上与史汀生上校合作的约翰·麦克洛伊曾力劝贝尔纳斯先生和我——因为我即将在他的暂离期间代行他的职务——同总统一起支持有关国内管制的梅—约翰逊法案。贝尔纳斯先生在启程前已经同意这点。但是，我已意识到，在国际管制方面还没有制定出一个方针以前，假使政府在国内方面的立法走得太远，就会出现一系列复杂情况。我请赫伯特·马克斯就这个问题替我准备一份“谈话要点”，供我与总统会见时用(他在 1944 年我负责与国会的联络工作时起就一直同我在一起)。我们都已看过史汀生上校的备忘录，所以马克斯起草的要点着重放在总统所希望得到的必要情报上，以便他能对这项建议和这项建议同着手国内立法的时间安排问题上，以及同议员们的协商和使国内和国际两个提案的内容协调一致上，都能确定自己的态度。在我们讨论后，总统要求提出一个国际方面的备忘录。

在这期间，参议员范登堡在国会进行工作，试图防止国会两院在原子能立法管辖权方面发生争论。他建议设立一个专门的参众两院原子能联合委员会来做这件事。9 月 20 日总统决定，他对国会提出的咨文既将涉及国内

管制，也涉及国际管制问题。他要我提出的有关国际管制各方面问题的备忘录，在25日递交给了他。这个备忘录深受史汀生上校文件的影响。它的结论是这样：对科学采取保密的政策是无效而危险的；问题的实质在于对交换科学知识的方式和条件实行管理和国际控制，以避免走向一场导致互相毁灭的竞赛。它建议，在与英国协商之后，美国开始与苏联接触，试图制订一个规划，以互相交换科学情报和在发展原子能方面进行协作，此项规划必须逐步实施并在有充分监督的情况下放弃这类武器的研制；以及到适当时刻把这个计划向其他各国公布。国会应充分了解这些会谈的情况，并与此同时考虑总统提出的有关国内管制方面的立法；以后如果这些会谈达成任何协议，国会则应徇总统之请采取国会行动。

总统在基本上同意这些建议后，要我和他的顾问塞缪尔·罗森曼法官会同五角大楼拟订咨文的草稿。我没有忘掉国务卿正在伦敦出差，我请本杰明·科恩通过电传打字机线路（一种可靠而秘密的电报装置）向他说明。10月1日，我奉命通过哈利法克斯爵士也通知了英国政府。总统征求了雷伯恩议长和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巴克利的意见后，确信加上国际管制方面的建议会对于咨文不仅无害而且有益。咨文本身在陈述了备忘录提出的需要国际协作的理由后，建议“首先同我们一起搞发明的伙伴英国和加拿大讨论，然后同其他国家会谈，以便达成一项在原子能领域内用合作代替敌对的协议”。

有了如此细致准备的咨文，我希望在较大范围内举行更正式的会议之前，同英国和苏联会谈的道路已经畅

通无阻。但事实并非如此。国务卿贝尔纳斯从伦敦回来后，满怀着对莫洛托夫阻挠策略的痛苦回忆。他已没有胃口再和俄国人谈另一个棘手问题了；他的同事罗伯特·帕特森和詹姆斯·福雷斯特尔两位部长也完全抱有同样的态度。一个月以后在与艾德礼和麦肯齐·金会谈原子能管制问题时(我没有参加这次会谈)，我们同意采取史汀生上校所明确不赞成的方针——在有较多国家参加的范围内开始进行国际会谈，包括许多没有显示过力量和没有表示过愿意承担责任的小国。但我怀疑如果作出相反的决定是否会改变它的后果。证据现在很明显——包括苏联正在急切搜罗德国的核科学家和导弹专家——即可能在当时，以及肯定在极短时间以后，斯大林已把发展核武器放在首要地位。即使在对方法和手段实行全面管制的条件下，看来史汀生上校也很不可能说服斯大林放弃在苏联建立核武装体系。

和参议员们的小冲突

当我接到副国务卿的任命时，盟国驻东京最高统帅道格拉斯·麦克阿瑟给我一个热情的贺电，并邀请我亲自去观察日本的局势。我答复时表示感谢，希望能够去。但是在那些日子里，副国务卿们忙于内部事务，不能出国，看上去很少有可能这样做。

9月17日，麦克阿瑟将军宣布驻日本的占领军在六个月内将减少到二十万人。18日，新闻记者询问这件事，总统说麦克阿瑟将军没有和他商量过。他很高兴知道这

位将军并不需要象当初他估计那样多的军队。三十天之前驻军数字是五十万人，以后减少到四十万，现在又削减一半。

第二天，9月19日，有人问我是否对将军的声明有所不安以及对于占领一事有何意见。我说，需要多少军队纯粹是一个军事问题，国务院不便过问。然后我又说了一些话，并且同意直接引用这些话：

重要的事情是对日政策同本政府一直在奉行的以及据我所知——而且我认为确实知道——现在仍在奉行的政策相同。在实施这项政策方面，占领军是政策的工具而不是政策的决定者，这项政策现在是，过去也是：日本的投降必须实现；日本将处于不能重新发动侵略战争的地位；造成战争狂的日本的现行经济和社会制度必须改变，使这种战争狂不能继续下去；以及为实现这项政策需要采取什么措施就要采取什么措施。

同一天总统把对我提名的建议送交参议院。内布拉斯加州的参议员肯尼思·惠里和肯塔基州的A·B·钱德勒对这提名案采取拖延行动。惠里坚持说我"损毁"麦克阿瑟将军的名誉，而钱德勒说我侮辱了将军。惠里向我提出有关对日政策和职权的一长串问题，包括我自己对这两者的看法。我以有关文件作了答复。白宫发表了"美国对日本投降后的初步政策"以及说明麦克阿瑟将军的职权的一份声明。

这样，在星期一，即9月24日，参议院准备好了一场辩论，这场辩论表面上是为批准我的任命而安排的，但实

际上是讨论麦克阿瑟将军的地位和职权同美国总统的地位和职权的关系。这场辩论是怒气冲冲和激烈的。参议员塔夫脱说他打算投票反对参议员惠里重新提名的动议，因为他认为我有资格担任副国务卿。由于他认为决定美国政策的是总统而不是副国务卿，因此，他认为“不同意艾奇逊先生在所谓与麦克阿瑟将军的争议中所表现出来的政策，并不构成拒绝批准这项提名的任何理由”——虽然他在这以前说过我在记者招待会所说的那段话是“我所听到过的有关政策问题的最不平凡的声明之一”。参议员巴克利和康纳利坚决为我辩护。在对重行提名的动议中，参议员惠里得到十一位参议员的支持。唱名表决结果，六十九票赞成批准，参议员惠里一票反对。假使我们能够看到将来，我们本来是可以意识到这场小争论是导致 1951 年 4 月 11 日解除麦克阿瑟将军统帅职务斗争的开端。

工作的堆积

尽管有这场既浪费时间又荒唐无稽的风波，我“代理”贝尔纳斯先生的五个星期还是建设性的几周。9 月 13 日同英国的财政谈判开始了，以便寻求一种代替租借法案的办法。我是美国代表团成员之一，在这次谈判中参与了决议的制订工作。就双方代表团的会议来说，我满足于支持威尔·克莱顿，他替国务院挑的工作担子最重。我由于在一年前已代表政府进行过类似的谈判，因此我觉得对于要做的工作是熟悉的。

在这时候，国务院获得了新的机构来履行它扩大了的任务。8月底，总统把军事情报局的外事工作、设备和人员移交给我们；到9月中旬，威廉·本顿前来主持把它们合并到国务院。月底前，战略情报局的研究与分析组和报表组也并给我们。艾尔弗雷德·麦科马克上校被任命为负责研究和情报事务的国务卿特别助理。国务院错过了这几次机会。后者，也就是研究与情报工作，由于十分愚蠢的行动，几乎立即垮台。所以，当1947年建议设立中央情报局时（作为武装部队统一法案的一个部分），国务院不仅在这个领域放弃了领导权，而且也不占有任何重要地位。新闻宣传的运气较好，它由几位具有献身精神的助理国务卿认真地照管。但是，这些工作最后也不得不遭到国务院曾获得成功的许多业务机构的同一命运，包括经济战、租借法案、对外援助以及技术援助。

在所有这些场合，国务院要末是没有足够的远见看到它的机会，或缺乏行政上的能力来抓住这些机会；要末工作陷入文牍主义为庞大臃肿的官僚机构所窒息，要末由于同国会中的反对派冲突而耗尽了整个国务院的精力。当时，新的职能按照证券市场的行话来说好象是"被母公司遗弃的子公司"一样，不得不在没有政策指导的情况下，进行一种没有生气的管理工作，如同从波拿巴到戴高乐时期之间的法国官僚机构一样。大约在同一时刻，我们又接受了清理一个有问题的单位——对外经济管理署一部分财产的任务。谁也没有为它的撤销而悲伤。

9月24日那个星期，国务院和伊克斯部长了结了我在一段时期以来所做的两件事。一件是关于石油方面的

国际协定；另一件是大陆架地下和海床自然资源保护以及邻近我国海岸的渔业资源保护。这些都是相当重要的事情。

国务院和内政部成功地进行合作是个不小的胜利。同英国签订的石油协议为共同发起和准备一个"国际〔石油〕协议奠定了基础，协议将包括所有对石油贸易有兴趣的国家，不论是生产国或消费国"，其目的是为了所有参加国的利益而井然有序地发展这项贸易。中东即将发生麻烦的迹象已很明显。许多互相冲突的利益需要调和，包括产油公司和生产国政府之间；生产地区——象波斯湾，东印度群岛以及南美洲——和美国之间；有秩序地开发（包括资源保护）与无限制的竞争之间；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商业利益和国家安全利益之间。可惜我们所作的工作太少，为时太晚。这些努力一无结果并被淹没在欧洲经济危机、中东的民族主义和国有化的动乱以及冷战的狂热之中。假使这些有限的自然资源要得到合理的利用，达成这类协议是必不可少的。

在保护资源方面，我们是成功的；由于这个问题是我们国家力所能及的，因而能较迅速地采取行动。在一些部呈交给总统的宣言中，总统特别指明上述有关水域的性质是"公海"以及这些公海的自由和无阻碍的航行权不应受任何法规的约束。在开发地下资源以及已经或者可能由美国人单独经营的渔业方面，美国将设立保护区，以管理和控制钻探及捕捞。至于已经或可能同其他国家的商业集团联合经营的渔业，其管理和控制办法将与有关国家协商决定。我感到很荣幸，作为代理国务卿，我副署

了总统签署的这些宣言，这是孜孜不倦工作的成果。

最后，总统在10月3日给国会的咨文中，又开始了另一件需要长期努力的工作，即建成圣劳伦斯河的航道和水力开发，并要求国会制订必要的立法。我进行了几个星期的准备工作，想推动立法的制定，但是毫无效果。有关的势力集团(铁路、劳工、大西洋港口)还非常强大，他们担心来自大湖区港口的竞争。斗争继续了将近十年，一直到1954年5月13日——在我们离职后一年多——才通过了一项法案。

一次最高级的原子能会议

1945年11月10日到16日在华盛顿是繁忙的时刻。英国的艾德礼首相和加拿大的麦肯齐·金已经到达，同杜鲁门总统讨论原子能的国际方面问题。这些讨论是在极小范围内秘密进行的，我没有参加。在国务院担任顾问的我的老友本·科恩和万尼瓦尔·布什同贝尔纳斯先生一起干这件工作。据我回忆，为了保密，决定性的谈判是在海军部长的游艇"塞科雅号"上举行的。即使谈判曾征求过我的意见，我已完全忘掉了。

会议于11月15日结束，三国政府首脑发表了一项联合声明，赞成"科学研究成果"可供利用和自由交换，但不包括"有关原子能在工业上实际应用的详细情报"或者它的"军事上的利用"。他们宣称，这应当有待于"所有国家都能接受的有效的、互惠的、切实可行的安全保证。……应在联合国组织下成立一个委员会，以制订各项

建议并提交给联合国”；它的工作“应分成几个阶段进行，每个阶段工作的胜利完成将增进全世界在下一阶段工作开始前所必需的信心。”这样，一连串的漏洞和压力以及对这些漏洞和压力的反应，使政府处于和史汀生上校对立的地位。但史汀生上校是正确的。虽然我在当时还远远没有认识到这点，命运却注定我将成为证明史汀生上校观点的主要人证之一。

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和英国贷款

那时威尔·克莱顿和我忙于盟军的供应和财政问题。11 月 13 日，总统要求国会提供十三亿三千多万美元作为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第二年度费用中我们应付的份额。克莱顿和我负责代表政府向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作证。国会严格控制行政部门的方法之一，就是对于诸如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援外和租借法案等等活动的拨款，每次只批准一年。由于未经法律批准的拨款不符合议事规则，因此，为了使每项活动得以继续进行，每年必须通过两项法案，这就需要在四个不同委员会里举行四次听证会。两院实质性的委员会，如外交委员会，必须批准每笔拨款；两院的拨款委员会必须建议拨款的数额。对于这种议事程序，要由宾夕法尼亚大街尽头[①]的人们来评论；不外乎是两种意见，一种认为，这是防止政府部门铺张浪费的必要保证，一种认为这是国会滥用职权和故意

① 美国首都华盛顿的一条街，一头为白宫，一头为美国国会。——译者

刁难。可以想见，我极力主张后一种意见，特别是关于每年拨款问题，在我看来这是委员会对极微小的事也怀有嫉妒的结果。

差不多就在那时候，我们的中国科发表了一份声明，说明我们在中国的军队是在帮助中国政府处理驻华日军——近两百万人——的投降、解除武装和遣返回国的工作。声明结束时说："我们在远东的武装部队的活动，包括运送中国军队在内，完全是为了上述目的而进行的。卷入中国内部事务既不是我们的目的，也不是我们的愿望。"不到一个月，我们就莫名其妙地卷入了。

12月初，英美代表团完成了给英国贷款这一件极有价值的工作的庞大计划，清算了租借法案以及根据该法案倒欠的帐目，处理了美国在英国的剩余物资，结算了两国间的财产损失和其他损失赔偿要求，以及达成了一个广泛的协议，建议扩大世界贸易和就业人口，包括建立一个国际贸易组织。无论就范围的广泛或圆满的程度来说，这件事是国际合作中令人难忘的成就。为这件事作出主要贡献的人只要提出三位就够了，他们现在都已去世——梅纳德·凯恩斯，哈里·怀特，和威尔·克莱顿。

可惜！这些年月和这些人的工作虽然不错，但还缺乏为取得成功所必需的更多一点儿的远见、胆量和运气。主要是我们这方面缺乏这些东西。贷款数字——三十七亿五千万美元——太少了；我们大大低估了英国和欧洲经济财政衰竭的程度。我们所展望的能够扩大贸易和就业的美妙的新世界，在共和党占多数的第八十届国会里遇到了阻碍。事实证明，象范登堡那样肯帮忙的人，也只

能在他势力范围以内的一些领域里，而不能扩大到贸易方面。在贸易方面最有势力的共和党参议员，科罗拉多州的米利金和塔夫脱，没有看到这些远景，也没有什么理想。我们为会议的成就所鼓舞，正满怀信心转向新的问题，可是，从明朗的天空中吹来的一场风暴却等待着我们。

中国问题的开始和马歇尔将军

帕特里克·J·赫尔利，过去是俄克拉何马州的骑马牧人并以此发家，在胡佛任内曾任陆军部部长，在同日本人打仗负伤时军衔是陆军少将；此时任美国驻华大使，正回国述职。麻烦围着他就象一群苍蝇叮着一头小牛那样。他漂亮，自负，勇敢，常吹嘘在美国西部开拓时期如何在生死关头迅速拔出手枪。显然，他想在目前的使命中也用这种简单的办法去解决复杂的问题。他滔滔不绝地发了一大通牢骚，但没有讲清楚。这些牢骚从责备驻中国的外交人员削弱了他以及美国对华政策的影响开始，直到抨击国务院——大概是指国务卿——没有向大家交代清楚自己的政策。他的全部指责贯穿着即将到来的那个时代的煽动调子，也就是凡和他意见不一的人都是"对共产主义不坚决"。

国务卿贝尔纳斯同赫尔利打交道时十分得体并给以抚慰，这点只有他能做得到。因此，他以为在11月23日上午已经说服了赫尔利回中国去。午餐时，他在白宫发现这只不过是幻想。在那里有人通知总统和内阁，赫尔利在全国新闻俱乐部里感情冲动地不仅攻击了国务院，

而且攻击政府，责备它们缺乏任何明确的对华政策。他说，他的辞呈已放在贝尔纳斯先生的桌上。这天下午总统打电话给正打算退休静养的马歇尔将军，要求他以大使衔作为总统私人代表到中国去。将军象往常一样地回答说，他将根据总统的愿望到任何地点以任何身份去工作。同一天，白宫同时宣布辞职和任命的消息。

虽然赫尔利的性格不能引起人们的同情，但他的挫折以后却变成我们所有人的挫折。政府有一项已经解释得很清楚的政策。它要求尽我们所能在不干涉中国内战的情况下，通过使交战的各派和解的办法，恢复一个“强大，统一和民主的中国”。在这期间我们继续承认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并“在国际事务方面，尤其是在清除日本在中国的势力方面和它合作。”赫尔利将军经常说这个双重目标是他规定的。实际上，政府、国会和全国都全力支持这个目标。但是，在我们中间，包括赫尔利、我自己、国务卿、马歇尔将军和总统，即使有人的话也是很少人才能理解，这些美妙的目标是互相排斥，无法逐个完成的。至于我们如何以及什么时候才理解这一点，将在以后几章中再谈。

二　马歇尔使团在华盛顿的代理人：第一阶段

我们所了解的形势

赫尔利大使引人注目的离职，使中国事务成为国务院高级领导主要关心的问题。由于这个国家的事态顽强地未能按照任何预先设想的格局发展，它已经成了我主要关心的问题。参谋长联席会议送交国务卿贝尔纳斯的一份文件是其近因。这份文件在1945年11月15日转到我的手里。依我看，这份提出美国海军陆战队应否撤出和什么时候撤出中国的文件，以及国务院对这个文件所作的评语，都不足以作为判断的根据。因此，我要求远东司司长约翰·卡特·文森特准备一份比较全面的分析和可供选择的建议书。19日他给我一份备忘录。备忘录提出了四种可能采取的行动方针：

1．海军陆战队撤出华北（这是驻华总司令魏德迈将军推荐的方针）。

2．海军陆战队留驻中国，任务不变（关于这项任务的性质，魏德迈将军和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之间似乎存在着争论。前者认为其任务是促进国民党部队从日本人手里接管中国长城以南的地区，因为这项接管工作尚未

完成)。

3．海军陆战队留驻中国，并且扩大它们的任务，帮助国民党政府在华北和满洲稳定局势（关于"稳定局势"的含义以及需要使用什么力量则不清楚)。

4．海军陆战队留驻中国，其任务是加速日军的投降和遣返，并提高这方面的效率。

派往华北的海军陆战队的任务是占据某些港口地区和机场，促进日军的投降和遣返，帮助把中国国民党军队运输到关键地区，使他们能够担负起受降的职责。留在华北的日本军队估计有一百万，其中约有三分之一尚未解除武装，有不少日军仍然分布在内地。在华北的国民党部队约有十六万人，共产党部队估计有四十五万人。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认为，没有海军陆战队出场并助以一臂之力，日军就不能得到遣返；如果到海军陆战队撤出的时候，中国两个党派之间未能达成政治协议的话，任何留在中国的日军就会被用于因此爆发的中国内战。或者，苏联可能冒冒失失上场。这并不是一幅令人安心的图景。

赫尔利大使的辞职震动了整个首都。就在此事发生的前夕，国务卿、陆军部长和海军部长在11月27日的一次会议上讨论了这份文件和武装部队提出的一份文件。当我思考着这些文件并倾听着讨论的时候，根据这些事实看来势必要得出某些结论。会议将近结束时，为澄清讨论，我向内阁官员们叙述了这些结论：

1．海军陆战队必须留驻中国。

2．我们必须准备好把其他国民党军队运到北方并

支援他们(虽然没有明说，但可想而知，把部队运往北方不仅包括运往华北，而且还包括运往满洲)。

3．在目前由日军占据、日后可能成为国民党和共产党部队争夺的地区，我们应该设法安排停战。

4．我们必须继续支持国民党人和共产党人断断续续进行的努力——在蒋介石领导下达成一项政治协议，并把共产党地区和部队包括在内，组成一个统一的中国国家和中国军队（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对于蒋介石用军事办法统一中国，特别是统一满洲的能力表示怀疑)。

内阁对于我的概述，反应不错。用武力支持蒋介石反对共产党，同时又倡议试图在它们之间设计出一项政治协议，这种政策本身明显地存在着两重性，虽然我们当时对这一点还不那么清楚认识到。我们将看到，在与马歇尔将军谈话讲到给他的任务时，他不时表示担心，或许需要有魔术师的技巧才能完成这些任务。但只是到了后来，我们才真正理解实际上我们是在不可妥协的党派之间寻求妥协。毛泽东的人民民主不会愿意接受蒋介石的统治，也不会愿意接受一个对美国友好的民主中国，而由于国民党的愚蠢无能，没有美国的军事干涉国民党政府就不可能对共产党人实施统治。现在看来采取这种政策是注定要失败的，但这决不意味着采取任何别的政策将不会遭受同样的命运。事后聪明并不能象圣伯纳德狗[1]那样给予精疲力尽的旅客以慰藉。

---

[1] 圣伯纳德是瑞士阿尔卑斯山上训练的一种狗，用以拯救雪地里受难的旅客。——译者

草拟给将军的指示

当挑选马歇尔将军赴华时，他正在出席参议院珍珠港事件调查委员会。他要求得到明确的书面指示以指导拟议中的赴华的使命。贝尔纳斯把起草指示的任务交给我和已经埋头于对华政策的约翰·卡特·文森特，并且很快就把我们搞的指示提纲备忘录念给马歇尔将军听。马歇尔将军不表赞同。照他看，这一指示容易引起严重误解，无论是把它作为向魏德迈将军发出指令的基础，或是使蒋介石了解有多少军队可供他使用，或是使美国公众了解情况，都是不够明确的。因此，他试图在美国陆军副参谋长托马斯·T·汉迪将军以及约翰·E·赫尔将军和路易斯·A·克雷格将军的协助下自己起草指示。四位将军起草的指示消除了政策中的一个矛盾因素，因而使政策比较清楚明确了。文森特试图恢复政策的平衡，对马歇尔的草案稿提出修正：美国输送国民党政府军队到诸如华北等地区，如果由此将损及军事停战和政治谈判的目标，就排除这种输送。国务卿贝尔纳斯和我支持文森特的观点，把包含着这种观点的四位将军草案修正本送交马歇尔将军。

赫尔将军向马歇尔将军抱怨说，修正本把一种根本矛盾引进政策中去。在这一点上他是错了；这一矛盾是始终存在的。真正的问题在于采取什么行动。赫尔将军倾向于就谈判军事停战和政治解决进行尝试之前把国民党军队运往北方接管日军占领区。国务院官员则认为这

样做势必损害这种尝试，甚至促使内战爆发。

12月9日，星期天，国务卿贝尔纳斯同马歇尔将军在旧国务院大楼会面，讨论将军的草案和国务院的修正意见，赫尔将军、文森特和我出席了会议。贝尔纳斯先生作了一次有力的发言支持草案的修正意见；赫尔将军重申他对政策声明存在着根本矛盾感到担心。在此期间，麦克阿瑟将军、魏德迈将军和雷蒙德·A·斯普鲁恩斯海军上将(太平洋总司令)给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的一份电报，使外交家和军人们在执行政策中的直接对抗得以避免。远东司令官们赞同向华北运输更多的中国军队和遣返日军的基本决定，但他们建议执行的时机可以让马歇尔将军在使主要敌对集团之间达成一项妥协的协议的过程中自己选择，以便建立一个统一的、民主的中国。会议结果对经过修正的马歇尔将军草案取得一致意见，即在不违背他出使的目的的情况下，由他斟酌决定何时把中国军队运到华北去。上述内容包含在国务卿贝尔纳斯1945年12月9日给陆军部的备忘录中，并且得到了总统批准。

在这次会议以及随后与总统举行的两次会议中，马歇尔将军要求就如果关于国家统一的谈判由于蒋介石未能作出合理让步而告破裂时，他如何运用输送国民党部队到华北去的权限一事取得明确的一致意见。12月9日，贝尔纳斯答复说：在这种情况下，马歇尔将军应该通知蒋介石，我们将不会为运送军队提供援助，而且我们将不得不就从华北遣返日军问题上与共产党直接打交道。12月11日在与总统、国务卿贝尔纳斯和海军上将李海举行的

会议上(我没有出席这次会议)，马歇尔将军把这一问题重新提出来，显然对国务卿贝尔纳斯先前的答复不满意。他赞同支持蒋介石和运送军队。总统和国务卿同意了。

总统在这次会议上还审阅和批准了政策声明和给陆军部的备忘录。总统给马歇尔将军的一封附有其他文件的信尚未准备就绪。12 月 14 日，我(国务卿贝尔纳斯已经去莫斯科）和马歇尔将军与总统会面时把信送给他。总统询问放在我们面前的文件是否已经得到所有有关人员的赞同。在得到我的肯定答复后，总统签署了信件，把它和附件一起交给了马歇尔将军。此后，马歇尔将军说他希望再读一遍给他的在谈判失败时适用的指示（可能为了强调，也可能因为我现在作为代理国务卿没有出席 12 月 11 日的会议)。他如上面记录的一样，把指示重复一遍，总统再一次表示同意，并询问为了便利他的出使，还有什么事情要做。

将军提出他需要有一位在军队中称做后方指挥所的人留在后方，具有随时见到总司令(这里指总统)的权利。马歇尔将军将通过他传递信息。此人在将军的要求下应负起个人责任，立即作出答复和采取行动，并有权在必要时晋谒总统本人，为采取行动取得帮助。将军还需要选派一位陆军军官处理通过陆军线路收发来往的电信。由于这些线路在中国是唯一可靠的设施，一切电信往来只使用这种线路。这位军官将不经秘书之手，亲自把电信递送给后方指挥所，并取得回音。将军需要的是个人负责，而不要哪一个机构负责。他对华盛顿的官僚制度并不陌生。

当总统表示同意并询问他愿意挑选谁的时候，将军说他希望我负起这一职责。我提出这件事应得到国务卿贝尔纳斯的同意，还指出我必定不得不越出常轨行事，并在执行这一职务时很可能得罪许多人。我的直觉是完全正确的。在这几分钟里建立起来的关系大大影响了我的生活。这些关系也势将造成关于忠诚问题的非常混乱的和难于对付的冲突。这种冲突不久就开始出现了。

抱有希望的几个月

1946 年，马歇尔将军出使中国的工作继续了整整一年，可以分成三个时期。从年初到 4 月 18 日是抱有希望的几个月（将军在美国作短暂逗留后于 4 月 18 日回到中国）。继之而来的是难以控制和与日俱增的悲观情绪，到 10 月份，中国陷入了一场长期的内战，这场战争最终导致国民党政府的垮台。在最后两个月，马歇尔使团解体并撤出中国。我的目的不是要详述这一过程，我只是想站在充当该使团在华盛顿的代理人的立场上来考察一下这个过程，作为马歇尔使团在华盛顿的代理人，必然要承担它遭受失败的后果。

1 月初，我们把戴维斯上校和少数工作人员安插在国务院，以便在与马歇尔将军通讯方面同五角大楼保持联系。我还把前驻马德里使馆参赞、在伊比利亚半岛经济战时开始结识的老友W·沃尔顿·巴特沃思调去中国主持大使馆的工作。沃尔特·罗勃逊公使担任马歇尔将军在军调部（国民党、共产党和美国监督停战的联合机

构)的助手。巴特沃思在远东的唯一经历是在1929—1931年期间担任驻新加坡的副领事，但他是我们最能干和最机智的官员之一。我指望他能满足将军对其下属也同样提出的要求：在应付完全陌生的局面时精力旺盛和富有想象力。这位朋友和同事从事中国事务的五年紧张经历就这样开始了，这一经历使他蒙受痛苦的、甚至接近灾难性的后果。这些后果所以没有损害我们的友谊只是由于他的宽宏大量。

马歇尔将军抵华最初几周，实现了他个人对局势的控制，出现了一种走向妥协的明显趋势，它燃起了我们的希望。这部分是由于中国人双方在权衡美国派出最有权威性的公民再次进行的干预将达到何种程度和具有多大意义的同时采取审慎策略。哪一方都不想先动手。每一方都从 1945 年 12 月 15 日白宫发表的截头去尾的政策声明中找到(正如将军后来报告的那样)“为自己的态度辩解的理由”。

我们已经叙述过马歇尔将军抵达时华北三方部队(国民党、共产党、日军)的力量。共产党要求停火并停止增援华北国民党部队。国民党提出共产党不再切断国民党的交通线作为先决条件。在政治方面，将军也发现了国民党观点和共产党观点之间的根本分歧。前者坚决主张共产党部队并入国家军队应先于联合政府的建立，而共产党同样坚持建立他们在其中具有重要发言权的联合政府必须先于军队的合并。再者，虽然两党同意把他们之间尚未解决的宪法上的问题提交给政治协商会议，但每一方都想等到它在军事上得势时才召开会议。

马歇尔将军的策略是首先集中抓停战，把它作为解决其他问题的关键和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的心理上的前奏，然后把其他问题的解决汇集在一个内容广泛的一揽子解决办法中，使两党宁可接受这种解决而不重新诉诸战争。这取决于一个前提：制定出一种双方宁可放弃取得全面胜利的机会而愿意接受的妥协方案。事实证明这是一种幻想，虽然开始时并非如此。1月份事情似乎满有希望。一个由马歇尔将军主持，并由张治中将军和周恩来将军（马歇尔将军对他的才能有着深刻的印象）分别代表国民党和共产党参加的三人委员会提出了停火和可容许的军队调动的条件，蒋和毛在1月10日公布了这些条件。成立了一个由三人委员领导的、以沃尔特·罗勃逊担任主席的庞大组织来监督协定的实施，并组成以美国亨利·A·白罗德上校为首的执行小组，其成员包括一百二十五个美国人，中国人双方也各派一百七十人参加。在短时间内，华北的战事停止了。满洲的问题则没有那么顺利。

在政治方面，同样有希望取得进展。从1月10日到31日举行了政治协商会议，对五个方面的指导原则达成协议：政府组织问题，和平建国纲领，军事问题，国民大会问题和修改1936年宪法草案问题。最后一个问题为未来的麻烦播下了种子。马尔歇将军报告说，国民党认为政协各项原则除了反映共产党人的观点外，也反映了中国民主人士的观点，这些原则过于民主化了，并为共产党夺取政权开辟了道路。国民党希望把尽可能多的权力保留在尽可能少的人的手里。将军很受鼓舞，在2月初的

报告中说：

事情进行得比较顺利。政治协商会议干得不错，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我非常机密地交给委员长的临时宪法，它为民主联合政府提供一个相当明确的基础。……

关于军队国家化问题……解决这一最困难问题的前景是良好的。

我正在做好一切准备工作来加速联合政府的组成。……如果〔在这两个问题上达成〕协议，我将乐于提出……在美国讨论财政贷款问题。

1946年2月25日中国人双方签署了“军队改编和共产党部队并入国军的基本原则”。马歇尔将军在谈判这一重要协议中起了主要作用。新的军队将由六十个师组成，其中五十个师是国民党政府的，十个师是共产党的，混合组成几个军。双方其余部队一概应予复员。各军将以一定兵力驻扎在中国各地。满洲将驻十五个师，其中十四个师是国民党的；在西北，所有驻军都是国民党的。当共产党由于(将军是这样想的)他们的部队与美式装备和受美国训练的国民党军队相形之下显得寒伧而拖延执行协议时，将军向共产党提出，一旦他们的十个师军队选定和分派以后，将为其提供类似的装备和训练。可是困难要深刻得多。2月27日达成在军调部监督下执行基本原则的协议于3月16日签字，但共产党拒绝在履行政治协商会议决议方面达成正式和公开协议之前指定哪十个师的军队。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从3月1日到17日举行会

议，准备达成协议；马歇尔将军对临时政府和统一军队将被接受抱有希望，就在3月11日动身去华盛顿安排财政贷款。

可是，天哪！两件事都没有实现。迹象很快表明"保留意见对决议的批准设下了障碍，国民党内的顽固分子正在试图破坏政协纲领"，而共产党和民主同盟则拒绝委派参加(临时政府)国府委员会的成员，共产党人也拒绝批准政协决议。马歇尔将军后来得出结论"在满洲问题未获解决之前中国的政府问题和宪法问题不能取得真正的解决"。今天我们或许可以加上一点：反之亦然。我们先简单叙述一下华盛顿的情况再回到这个问题上来。

当马歇尔将军在中国取得进展时，我们这些后方指挥所的人则为他搜集工具和情报。那时他和我们都认为控制财源对他进行讨价还价将有莫大的帮助。总统在他1945年12月15日给马歇尔将军的信中写道："在你与蒋介石和其他中国领导人交谈时，授权你用最坦率的语言和他们谈话。特别是，有关中国人想得到贷款的愿望，你可以声明……一个被内战搞得四分五裂的中国实际上不可能被视为美国按照所列要求进行援助的一个合适地点。"但是正如不久以后我们在欧洲将看到的情况一样：在租借法案结束、复员工作正在全面展开、国会削减拨款、国内经济需要各种各样货物的时候，答应提供贷款要比找到这笔资金容易得多。甚至在总统的全力支持下，为中国觅取资金和货物，仍然困难重重。首先，国外贷款必须得到根据布雷顿森林立法建立的全国谘询委员会的批准，而这个谘询委员会的主席是财政部长文森，它的工

作班子是财政部的官僚机构，他们都一心要实现预算平衡。进出口银行对国民党政府管理借款的诚实可靠和能力持怀疑态度。国民党可供稳定经济和支出的现有财力并不是一目了然，同样，他们派出的许多代表团、经办人员和院外活动家的活动也不是一清二楚的，这伙人正在为总额达二十亿美元左右的三年建设计划争取五亿六千万美元信贷而努力。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据说已在考虑在1947年3月以前发出五亿美元的物资。在太平洋负责处置物资的人员却几乎不知道他们手头有些什么东西。最后，要弄清处于目前混乱状况下的中国能够吸收什么和吸收多少或许是最为棘手的问题。

怀疑论者可以提出而且的确提出了诘难：在一场争夺主宰中国权力的斗争中，得胜者将囊括一切。谁将会被经济和财政援助这种胡萝卜所吸引而采取某种步骤呢？共产党不大会这样，如果他们获胜，他们很可能怀疑美国还会给他们财政援助。国民党则愈来愈流露这样一种信念：追求统一和民主的中国，意味着他们将丧失一切。即使他们寻求军事解决的政策将会导致同样的结果，也没有削弱他们的这种信念。到了马歇尔将军在1946年3月回到华盛顿时，他能够搜集到一大捆（至少是有相当数量的）胡萝卜，其中包括：恢复租借法案以支付设备和粮食的费用，如果在1946年6月30日前达成协议的话；三千万美元的棉花贷款；用于运输和电讯事业的贷款；进出口银行五亿美元贷款（虽然规定了具体项目必须得到批准以及在国内稳定方面取得进展等限制条件）；关于获得诸如内河轮船等剩余物资和清理战时帐目的协议。最后，

在1947年一年中，运到中国的由美国分担的那一份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物资约达四亿七千五百万美元。在此之前，根据总统的授权下令停止一切民间代理商和陆军部、海军部与中国人做交易，将这方面的权力集中于马歇尔将军。在此期间，与中国驻华盛顿的官员打交道几乎和战时与俄国人打交道一样困难。他们对赠给他们的物资百般挑剔，并且还进行详细的核对。

三　巴勒斯坦难题

杜鲁门先生几乎刚刚就任总统，就怀着最善良的愿望着手解决一个极其棘手的国际难题：即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自己国家的问题。我也无可避免地随之卷入了漩涡。希特勒主义受害者的犹太人的命运，是他"本人深切关注的一个问题"，因此作为总统，他"同意为解决这个问题尽一点力量。"贝尔福宣言曾经给予犹太人在巴勒斯坦重建故国的机会，他把这一宣言一贯看作是"同伍德罗·威尔逊的崇高政策，尤其是同自决原则分不开的"。在我同他多年的谈话中，我了解到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他的一位密友和从前的合伙人、一个狂热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埃迪·雅各布森灌输给他的根深蒂固的信念。

驻德英美军司令虽在暂时维持东欧的大量犹太难民的生活，但是难民的处境凄惨，巴勒斯坦问题究竟应该如何解决，我和总统的看法是有分歧的。我认为阿拉伯的巴勒斯坦在不致造成严重政治问题的情况下所能吸收的犹太移民人数是有限的，要把这个地区变成为能够收容一百万或更多移民的一个犹太国，就会使这个政治问题大大恶化；这不仅会危及美国而且会危及所有西方国家在近东的利益。我所尊敬的布兰代斯法官和我的好友费利克斯·弗兰克福特使我逐渐理解犹太人所以要返回

巴勒斯坦并结束散居各地的生涯的那种神秘感情，虽然我没有这种感情。我认为他们力主以犹太复国主义作为美国政府的政策未免把感情置于美国的全局利益之上。

到了 1945 年 9 月我担任副国务卿时，对巴勒斯坦的政策显然是由总统亲自掌管的。我发觉国务卿贝尔纳斯无意插手这个问题，反而倒有把国务院这方面的管理工作越来越推到我身上的倾向。虽然我对巴勒斯坦的问题有不同的看法，但我仍忠心耿耿地力图使总统的意图能为人们所理解和贯彻执行。当时，我扮演的实际上不是出谋献策的角色，而是执行政策的角色。在罗斯福总统和斯退丁纽斯国务卿指示下对巴勒斯坦问题一直抱中立态度的近东和非洲事务司的官员们，现在忠实地使自己适应杜鲁门总统迥然不同的态度。后来，有几位犹太复国主义的热烈同情者攻击近东司司长洛伊·亨德森，说他阻挠了杜鲁门总统的政策。这是不符合事实的，对这位忠心耿耿、干练称职的官员是太不公平了。

在我笔下所写的这个时期，杜鲁门总统的观点完全集中于两点：第一，立即把十万名犹太难民从东欧移居巴勒斯坦；第二，决心不为这一决定承担任何政治上和军事上的责任。要做到前一点就必需要求委任统治国英国改变它把每月迁入巴勒斯坦的移民限为一千五百人的政策。总统写信给丘吉尔先生，希望在未来的波茨坦会谈时讨论一下这个问题。当会谈的日期到来的时候，艾德礼先生已经继丘吉尔先生任首相，但对如何讨论这个问题毫无准备。在等待他作好准备时，总统答复埃及和其他阿拉伯国家的总理说，他希望“重申贵国政府过去已经

得到的保证。……在未同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充分协商之前，决不作出有关巴勒斯坦基本局势的任何决定”。关于这一点，总统后来解释说，“我向阿拉伯人保证将同他们协商，和我对犹太人的愿望所抱的一般是同情的态度并不矛盾。”阿拉伯人认为这并不能完全说明他们所认为有矛盾之处，他们这种看法是可以谅解的。

8月底，总统通过正要前赴伦敦的国务卿贝尔纳斯向英国首相发出了另一个呼吁，要求为犹太移民开放巴勒斯坦。艾德礼首相的回音迟迟方来，要求假以时日，并请在这段“间歇期间”不要有所行动。与此同时，亨德森先生向贝尔纳斯先生陈述了几点意见，这些意见经后来发生的事情充份证明是明智的。他指出巴勒斯坦问题令人左右为难，因为无论巴勒斯坦成为一个拥有犹太人少数民族的阿拉伯国家，或是成为一个拥有阿拉伯少数民族的犹太国家都免不了产生严重的错综复杂的情况。因此他力主趁这种左右为难的形势尚未变得过于棘手时，我们应先试图取得英国、苏联、美国——以及如果可能——法国等几方面对解决问题的办法的一致意见，再同犹太人和阿拉伯人进行协商，然后把计划付诸实施。否则，一个或则几个大国会把可能采取任何措施的责任加在另外几个大国身上，并怂恿犹太人或阿拉伯人或他们两者闹事，也可能怂恿他们为反对这种措施而斗争。他这项建议是否已转呈总统，以及如予试行是否有效，固然无案可查，但是这一建议对未来的纠葛确有先见之明，而且是值得缜密考虑的。

然而，总统的想法却截然不同。他告诉我们，他把长

期的问题和暂时的问题完全分开。“我的基本方针是:巴勒斯坦的长远命运问题是我们要联合国去考虑的那类问题。可是,在最近的将来,需要给欧洲的犹太人以一定的援助。”他一直有一种莫明其妙的固执的想法,即:认为联合国跟它的会员国有所不同,而且也应该有所不同;它没有权力,然而却能承担责任。

在我担任新的职务和我的上级公出期间, 以及当我发觉自己踩在巴勒斯坦问题的钢丝绳上摇摇晃晃的时候, 情况就象上述的那样。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的领袖相继来访, 向我探询正在发生的情况。当时报刊上的议论和揣测使犹太人领袖比阿拉伯人轻松些,乐观些。我告诉犹太人领袖,这些重大的问题正受到总统的亲自注意,我无权再说什么。总统就协商一事所作的保证已足够了。

阿拉伯集团却要求我说得具体些。1945 年 10 月 3 日,埃及公使说,他们听到总统极力促请英国方面让十万犹太移民进入巴勒斯坦的消息深感不安; 鉴于罗斯福总统对事先协商已做过明确保证, 他认为这简直是难以置信的。他们说, 如果我保证美国对巴勒斯坦的政策没有改变,并保证我国政府将严格遵守关于协商的承诺,他们当不胜感激。对于艾德礼先生和贝尔纳斯先生举行的会谈,我一无所知,我也不愿意详谈总统关于协商二字的范围和意义的看法。因此我对他们说,我到职不久,对巴勒斯坦局势尚不熟悉,国务卿不日即将回国,我将立即把他们的要求转达。贝尔纳斯国务卿回国后, 我把阿拉伯人的要求告诉了他, 他就力请总统把罗斯福总统临终前写给伊本·沙特国王的信件公布, 并把他的前任总统对阿

拉伯人抱中立和友好态度的声明加以重申。1945年10月18日，总统批准了前一点，但是没有批准后一点。叙利亚公使不甘后人，要求我们同意公布罗斯福总统给叙利亚总统的信件。这时我决定，我们公布这类言不由衷的虚伪文件已经够多了，因此指示亨德森以一种比较严肃的态度再次向叙利亚公使作出保证。

英美调查委员会

艾德礼首相反复考虑了总统给他的信之后，决定在巴勒斯坦事务中要我们从幕后策划者的地位变成为公开负责的合伙人，这是不难理解的。因此，他建议组织一个英美调查委员会。11月，在艾德礼为讨论国际管制原子能问题前来访问期间，贝尔纳斯先生和总统同他消除了英国和我国关于巴勒斯坦的调查方法上的某些分歧。这两种讨论都把我摒除在外，我毫无怨言。巴勒斯坦委员会的任务是审查在东欧的犹太难民的需求，以及“根据当前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条件”，巴勒斯坦所能接纳的犹太人人数。委员会还需要提出巴勒斯坦暂时和永久的解决办法。洛伊·亨德森曾经告诫不要给任何一个欧洲国家它梦寐以求的机会，来挑起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对一个并非全体大国所提出的计划的敌对态度。但是，我们不久就要给俄国人这样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了。

我必须提一下这个委员会的成员及其报告，因为从中发生的争执使我处于这场纠纷的风暴中心。美方的主席是美国第五巡回上诉法院法官、总统的朋友、一个性情

暴躁的得克萨斯州人约瑟夫·C·哈奇森；其他成员是前斯瓦斯莫尔学院院长弗兰克·艾德洛特博士；《波士顿先驱报》主编弗兰克·W·巴克斯顿；前副国务卿威廉·菲利普斯；前国联难民委员会高级专员詹姆士·G·麦克唐纳和加利福尼亚州的一位律师班特勒·C·克鲁姆。1946年4月22日，委员会向两国政府提出报告。我当时正负责国务院的工作，收到了我国驻伦敦大使艾夫里尔·哈里曼发来的一份电报，他替英国政府要求我们一次发表完报告的全文，以便可以把它看作一个整体（我们在1946年5月1日已照办了），而不要只发表报告的结论或者全文的片段。

然而，也许正如英国所担忧的那样，总统却抓住了报告所提出建议中的一项，即：应签发十万张护照以便犹太移民早日进入巴勒斯坦。然而这些建议都是相互依存的。巴勒斯坦的政府应以下述原则为基础：(1)犹太人不应控制阿拉伯人，阿拉伯人也不应控制犹太人。(2)这个国家既不是一个犹太人的国家，也不是一个阿拉伯人的国家。(3)这个国家应保护和维护在这个基督教、穆斯林和犹太教三种宗教的圣地上的一切人的利益。委任统治应成为一个托管机构，为实现上述条件而努力。生活水平应该平等，把阿拉伯人的生活水平提高到犹太人的水平。在首批十万移民之后，应继续给移民入境以便利；土地政策的限制应该放宽。经济建设、教育和国内的安宁应予鼓励。

不幸，唯一重大的遗漏却是如何使这些一致渴望达到的目标得以实现。总统立即批准了关于移民入境和放

宽取得土地限制的建议，但对于长期的建议却保留到以后再作决定。同一天，艾德礼先生在下院说，这份报告必须被看作为一个整体，而且必须找到把这份报告作为一个整体来执行的方法。在没有知道在多大程度上美国“准备分担……额外的军事和财政责任”之前，联合王国无法照案执行。在非法的军队尚未解散，犹太人巴勒斯坦开发办事处（1929年在苏黎世举行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大会的产物）尚未继续在镇压恐怖行为方面进行合作以前，这十万移民不能进入巴勒斯坦。美国同联合王国的分歧比过去更大了。

杜鲁门先生择肥而噬的做法使艾德礼先生颇为生气，而总统对他的顾问们所认为的艾德礼先生在让移民入境这一主要问题上支吾拖延的手法也很不高兴。由于贝尔纳斯先生去出席巴黎和会，我再一次从副手的地位被卷入这场争吵的漩涡中去。负责占领区事务助理国务卿约翰·希尔德林对于英国在德国和奥地利局势恶化之际在难民问题上一味拖延，向我大肆攻击。近东司则答称，英国不会为了减轻我们在欧洲的问题而签发十万张护照，除非我们分担他们在巴勒斯坦的责任，该司又提醒我不要忘记我们关于事先同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协商的诺言。报界也紧紧催我发表一项声明。我回答说现在为时尚早。

摆在我面前的问题很清楚，但不简单：要使杜鲁门先生接近于艾德礼先生把报告作为一个整体来看的立场；要使艾德礼先生接近于杜鲁门先生的至少发出十万张护照的一部份这一愿望。但是，由于这两位先生都是生性

不肯让步的，所以这种努力很少有成功之望。看起来最好的办法是建议艾德礼先生在两个星期之内根据英美联合报告同阿拉伯人和犹太人进行协商，并鉴于移民问题的迫切性，"尽早"完成协商的工作。1946年5月6日，我拿着一份根据这一方针拟好的电报晋见总统，他听了我的汇报之后，把电报留下来作进一步的考虑。两天之后，他发出了这份电报，并且立即接到了艾德礼先生的回电，要求我们暂缓进行协商。

虽然我们同意了，但是阿拉伯人不答应。5月10日，埃及、伊拉克、黎巴嫩、沙特阿拉伯和叙利亚五国公使一齐来拜访我，抱怨报告在"阿拉伯世界产生了使人痛苦的印象"，要求我们拒绝承认这份报告以恢复平静。我答应在采取行动之前一定同他们协商。在同总统进行了另一次长谈之后，我们准备了一封关于协商的信件和备忘录，把这些文件连同英国方面的类似文件在5月20日一并递交犹太人办事处、阿拉伯高级委员会和其他官方组织以及阿拉伯各国政府。将近6月底，犹太人办事处作了含糊其词的答复，对十万犹太移民入境问题要在整个巴勒斯坦问题达成协议以后才能解决表示不满。阿拉伯人则一致断然拒绝了整个报告，认为美国人没有干预这一问题的权利。6月12日，贝文先生在工党波茅斯大会上发表的下述一段话引起了普遍的反感，他说，"如果我出于最单纯的动机而说〔美国对犹太人移入巴勒斯坦的政策〕是因为他们不愿意纽约有太多的犹太人，我希望我这句话不致在美国引起误解。"其实美国对贝文本人和他的动机都了解得很清楚。他又补充说，英国政府不愿再

派一师人在巴勒斯坦协助欧洲十万犹太人移入该地。

当我的上级暂回华盛顿的时候，我感到非常高兴又能再回到充当副手的职位上去。亨德森很明智地指出，如果美国政府希望使大量犹太移民进入巴勒斯坦，那么就不光要敦促，还需要有行动；必须同英国人作出下列的一些计划：哪些人应去巴勒斯坦，应该如何挑选，如何运送，到达后如何作暂时的安置和永久的定居，所需款项又从何而来，如何维持治安和秩序等各种问题。贝尔纳斯先生建议派遣财政部和国防部的官员去伦敦，协助哈里曼大使讨论这些迫切的问题。艾德礼先生也希望美国不要一味口若悬河地出谋献策，而要深入到这个难题的细节中去。他送来一份列有四十多个具体问题的清单，要求给予具体答复。总统决定任命一个由国务院、财政部和陆军部派遣代表组成的内阁委员会来协助他制订和执行有关巴勒斯坦的政策，同英国进行谈判，以及与私人组织保持接触。

内阁委员会

6月下半月，在巴勒斯坦爆发了暴力行动。爆炸事件，海法的激战，戒严，"兜捕"和逮捕变成地方上经常发生的事故。6月28日，首相通知总统，已经授权高级专员采取严厉的军事行动以应付局势，高级专员据此逮捕了一些犹太复国主义者的领袖。杜鲁门总统宣称，美国政府准备为输送十万犹太人到巴勒斯坦承担技术上和财政上的责任。首相由于担负着无法推卸的军事责任，又面

临着一触即发的局势，于是便力促迅速重开谈判。总统让内阁委员会的代表乘坐他的专机飞往伦敦。这一行人有前助理国务卿、个性坚强的亨利·格雷迪，暂在陆军部任职的纽约律师戈德思韦特·多尔，前财政部助理部长赫伯特·加斯顿。这三位代表催促英国政府立即允准十万犹太移民进入巴勒斯坦。

他们到后不久，7月22日，委任统治国政府秘书处和英国陆军总司令部的一部分所占用的耶路撒冷的戴维王饭店被炸毁，死四十一人，伤四十三人。犹太人的秘密组织“伊尔贡”(民族军事组织)对这一事件直认不讳。三天以后，英美与会人员的计划被泄露给伦敦报界。这项计划拟在巴勒斯坦设立一个由犹太人的省和一个阿拉伯人的省组成的联邦。两省的权力主要以地方事务为限。在委任统治国控制下的一个强有力的联邦政府将对耶路撒冷、伯利恒和内格夫拥有直接的权力，并且对国防、外交、税收、法院、邮局和非常重要的移民等问题拥有管辖权。十万移民的接纳要取决于这个联邦化计划能否被接受，此外，还建议美国向所有阿拉伯国家提供经济援助，而特别拨给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五千万美元。

再挑重担

在7月底和8月初过后才短短几天，犹太人、阿拉伯人以及瓦格纳和塔夫脱两位参议员（几天之后又有九名参议员和众议员），就拒绝了这项计划(现在通称为莫里森—格雷迪计划)，英国枢密院院长赫伯特·莫里森也在

议会宣读了这个计划，杜鲁门总统亦即命令内阁委员会的代表们束装回国。这时从巴黎一直同格雷迪、贝文和艾德礼保持接触的贝尔纳斯先生在试图顺利推行这个报告而受挫之后，已经饱尝巴勒斯坦问题的滋味了。总统于是又一次召我上战场。

这真是个战场。艾德礼巧妙地让美国顶替英国，成了在中东最不讨人喜欢的国家。而且，利害冲突的中心从英国同以色列在巴勒斯坦的战斗转变为波托马克河沿岸的内战。内阁委员会的成员们攻击他们的主席，而英美调查委员会中的美国委员们则在攻击内阁委员会；总统通知英国方面，他不能支持它的报告。丘吉尔先生向下院建议，如果美国不肯援助，那就放弃这个委任统治地。在这种局势下，召开了一次由两个委员会的美国委员参加的会议，以协调他们的意见，而由我担任这次会议的主席。

我迅速地开完了这个会议。哈奇森法官要求我告诉他，为什么要召集他的委员会开会。我回答说，为了听取他们对莫里森一格雷迪报告的意见。我这样回答是失策的，因为他和他的同事们立即慷慨激昂而又滔滔不绝地发表了意见。照他们的看法，这份报告建议成立一个人口稀少而薄弱的犹太居民区，简直是个大叛卖——“尽管措词非常巧妙，甚至冠冕堂皇——然而毕竟还是个大叛卖”。用比利·菲利普斯比较有分寸的外交词令来说，这个计划是“完全不能接受的”。他说，他没有意识到美国应声附和变成了“英国的尾巴”。哈奇森法官为了彻底证明他们的意见的正确性，要求第二天再继续开会，因此不

能不推迟总统和他们的会见。我告诉他，我努力调解美国人之间的意见就象以前试图调解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一样，劳而无功。巴勒斯坦问题的意见是无法调整的。

这位法官宣称，这份报告在两方面违反了内阁委员会的指示：第一，它没有执行他的委员会先前提出的建议；第二，在巴勒斯坦实行分治和限制移民进入的建议违反了国际联盟的委任统治。他说，何况未经参议院建议和同意，总统无权——根据法律上的理由——同意委任统治的改革。我认为哈奇森这一批人由于以自已的那份报告为得意之作，未免做得太过火了。莫里森一格雷迪报告具有妥协的性质；确实后来犹太人办事处提出了某些有益的修正案，而 1947 年 8 月 31 日联合国特别委员会的报告也起了它的作用。总统一度曾经考虑对这份报告加以修订，但因既已被人骂得一钱不值，暂时只好作为废纸。

赎罪日声明：1946 年 10 月 4 日

这时候，我正在把精力用来应付一次比巴勒斯坦更加紧迫的危机：即南斯拉夫击落美国飞机的事件。而总统正在徒劳无功地把力量用于请求国会放宽我国的移民法律上面，“批准一定数量的难民，其中包括犹太人，进入美国。”但在犹太人赎罪日这一天，在采取一项行动时，我们两人又把精力集中在一起了。

总统对待犹太人赎罪日声明是非常认真的。一年以来，他力主用移民方法来解救流散在欧洲的犹太难民和

满足他们前往巴勒斯坦的渴望，但是，现在看来这种可能性似乎比 1945 年时更为渺茫。这是由于在英美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之间的冲突以及在圣地的恐怖行为等因素上再加上了美国国内意见的分歧；而且，当时由英国人在伦敦召开的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双方温和派的会议亦宣告破裂。因此，这次赎罪日似乎是在犹太人历史上特别黑暗的时刻来临的。而总统却选择了这一天来宣布他将继续努力使十万犹太难民移居巴勒斯坦和放宽美国移民入境的规定。他还说，某种形式的以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分治为基础的巴勒斯坦计划"将得到美国国内舆论的支持"。

有些来访的客人告诉我说，他们认为发表这个声明是失策的。其中有一位美以美教会国外传教组副干事G·E·霍普金也是这样说。当我问他的这种看法是否也指该声明对欧洲犹太难民营产生影响时，他回答说不是。这时，英国人正在筹备召开他们的伦敦会议，国务卿贝尔纳斯又在纽约忙着参加一个外长会议和出席联大会议，而巴勒斯坦问题毫无进展，与此同时，我发觉国外人士正在刺探我们对待这个问题的确切态度，我要设法应付这些人。如果他们认为我们的态度是自相矛盾的，那也情有可原，因为他们不能象我们有些人那样熟知总统的立场。当时杜鲁门总统继续几乎全神贯注于十万犹太人移居的问题；而其他人则认为犹太人移居的问题取决于巴勒斯坦最后的命运，可是总统却把巴勒斯坦的最后命运当作一个各别问题另由联合国这个有点神秘的实体来决定的。因此有关我们态度的种种传说都带点令人困惑不解

和迂回曲折的味道。

这时探询我们立场的几位主要人物是：英国驻美大使和两位由沙特阿拉伯前来我国访问的亲王。这两位亲王虽然在举止和容貌上大不相同，但是在对犹太复国主义和犹太移民的问题上，两人的观点却毫无二致。费萨尔亲王殿下，即现在的国王、当时的外交大臣，是在他哥哥沙特王储的前一个月，即12月中旬到达华盛顿的。这位亲王身穿雪白的阿拉伯式的长袍，头戴金环。这种鲜艳夺目的装束显得他的肤色更加黝黑；他那撮尖而且黑的连腮胡须和唇上的两撇小髭，再配上一个瘦削的鹰钩鼻子和一双目光炯炯的漆黑眼睛，给人一种阴险凶恶的印象，但他那时而露出的羞怯的笑容却又冲淡了这种可怕的印象。好莱坞电影界见到他，肯定会聘请他去扮演一名棕色皮肤而又神秘的阿拉伯酋长的角色。但是他象他哥哥一样，举止沉着而有威仪。他把双手藏在拂垂着的长袖里，说话声音庄严肃穆，从不激动。他谈到他的父亲伊本·沙特国王对故总统罗斯福极为钦佩。伊本国王曾在红海上，在罗斯福从雅尔塔回国时所乘的一艘巡洋舰上会见过这位返国后不久就逝世的故总统。这位国王一如既往，仍然对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巴勒斯坦计划深为关注，并且认为这种计划无助于近东的和平。

当他和杜鲁门总统谈话的时候，在我看来，他们交换了意见，但未能取得一致的看法。亲王所关心的是近东的形势，而总统所关怀的却是在欧洲的犹太难民的境遇。他们彼此都未能真正了解对方所关心的问题的实质。双方反而认为对方言过其实。最后，双方用了一些陈词滥调，

作为达成协议而结束了这次会谈。我觉得这是一次令人不安的谈话。这位亲王给我的印象是他可能成为一个不可调和的敌人，不能掉以轻心。

相反地，那位王储却比较高大和肥胖，身体和头脑长得都不如他弟弟那样精巧，令人捉摸不透地隐藏在一副保护目力的墨精眼镜后面，显得他更是个神秘人物。总统会见他时，国务卿贝尔纳斯和我两人都参加了。他们的谈话大部分与巴勒斯坦问题无关。就巴勒斯坦问题而言，这次会谈是毫无收益的，因为这位王储与总统的看法截然相反；一个要移民完全停止，另一个却要大量增加移民。在会谈中，这位王储在一个半钟头之久的时间内始终端坐不动的本领，使我永世难忘。他把双足并拢放在地板上，双手一动不动地藏在长袖里。我非常佩服他这种本领，后来当我主持公众集会而感到厌烦的时候，我也曾经常练习过这种端坐不动的功夫。它需要极大的自我控制能力，那种不断想用手抓抓耳朵或擦擦鼻子的诱惑是非常难过的，但是总比听演讲好受些。

英国大使英弗查佩尔勋爵是个和蔼可亲的好伴侣，但作为外交界的同僚，却不能令人满意。他的个性本来已够怪僻，而他偏又喜欢显得更加怪僻，结果给人一种怪得有点难以理解的印象。他宣称他对犹太复国主义者也寄予莫大同情，这肯定不是艾德礼和贝文的看法，因此同他谈话时，更难弄清楚他的真正意图和他的话代表谁的观点，以及在他打给伦敦的电报里，他是怎样传达我们答复他时所说的话。我同他的会谈是在11月开始的，一直延续到翌年2月，即英国从希腊撤走而引起的危机暂时

中断了我对处理巴勒斯坦问题所负之责时为止。起初，这位大使提出的都是一些笼统的问题，但后来他逐渐把话题转向打听在马歇尔将军即将接替贝尔纳斯先生的国务卿职务后美国是否会改变政策的问题。

当年11月后旬，这位大使告诉我说，贝文曾向在纽约的犹太领导人清楚表明，如果他在短时期内找不到一个永久性的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办法，英国将放弃这个委任统治地，如把它让与美国而美国拒绝接受的话，就把它交给联合国。犹太领导人听说之后大吃一惊，他们抗议说，英国这一措施将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尽管他们本人并不喜欢分治，但仍建议不如早日实行分治为佳。贝文回答说，艾德礼和丘吉尔都已同意放弃这个委任统治地，因此英国将会作出这一决定。他并且说，无论如何，委任统治国没有得到联合国的批准是无权擅自决定分治的，何况分治的提案将无法在联合国通过。据报道，犹太牧师阿巴·H·西尔弗博士认为，如果英美两国都一致赞成分治的建议，提案会在联合国通过的。同时他又认为，如果英美双方的协议有保证的话，那些在12月参加在巴塞尔召开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大会的犹太组织也会赞同这一提案。贝文也觉得阿巴·H·西尔弗博士的意见颇有道理，因此英弗查佩尔勋爵现在想知道他是否可以鼓励贝文，使他相信美国也会支持分治的建议。

1947年1月21日，也就是马歇尔将军开始担任国务卿的那一天，这位大使又来试探我。他根据一个文件照本宣读说，英国政府即将在伦敦召开一次包括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双方领导人的会议。英国政府预料这次会议不

会达成任何协议。但某一种为双方反对得最少的方案可能会很勉强地被“默认”下来。这就是英国政府所寻求的方案。无疑，英国必将请联合国来解决这个问题，但在具体选定某一种方案之前，它很想知道美国对下列几种方案所持的态度。这几种方案是：(1)彻底的分治；(2)建立行政区—联邦制(即莫里森—格雷迪方案)；(3)将该委任统治地移交给联合国。在与贝文讨论这个问题时，贝尔纳斯曾极力主张第一种方案(即分治方案)，但贝文对我们的态度还是信疑参半。在联合国大会上，我们会不会真的支持分治，或者以多大热情来支持这种方案呢？我们会不会觉得别的方案比这种方案更好呢？

我回答说，我无权代表美国政府发表意见，但愿意向马歇尔将军汇报他所提出的问题，马歇尔将军会很快给予解答的。至于我本人对上述三种方案，并没有什么新的看法。如果根据分治来解决争端，这是最易赢得支持的，因为不但我们国内赞成分治，而且在巴勒斯坦所遇到的反对，很可能多数是口头上的抗议，而不是诉诸武力的。美国政府不能参加一个使用武力解决争端的方案。分治既然可能是最有希望的方案，我们应当尽量加以探索，以消除反对，争取双方接受这一方案。但应由英国政府负责作出决定。据我看，这次召开的伦敦会议似乎是和平解决争端的最后机会。我认为任何解决方案有一个因素是必不可少的：把等候在欧洲各难民营中的十万犹太人移居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反对这一措施的主要原因似乎是，他们认为这样大量的移民会使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变成多数。但是，阿拉伯人现在已居很大的多数，而且他们

的出生率也比较高，采用一种有控制的移民措施，将不会导致这样的后果。我们必须选择一种最切实可行的方案，而不是一种在理论上或逻辑上最为可取的方案。

英弗查佩尔勋爵于是问我对他的另外两个建议即莫里森—格雷迪方案，以及将这个委任统治地移交给联合国，有什么看法。我说，他的第一个建议将会遇到几乎普遍的反对，其难处早已有目共睹。我们也许可以把上述两个建议合并起来作为一个方案加以探讨。这就是一个有限期的、修改过的莫里森—格雷迪方案，由联合国保留作出最后决定的权力。我担心仅仅把这个委任统治地移交给联合国的做法无异是等于承认我们没有能力解决问题，而且会在巴勒斯坦导致内战。

由于这是要向新国务卿汇报的第一个政策问题，我向他呈交了一份有关我和英弗查佩尔勋爵谈话的备忘录，并通知他英国大使希望在一星期内得到答复，建议他同总统商讨这个问题，并请他授权我证实我个人所发表过的意见。不到一星期，英国大使也从我那里接到一份内容大致相同的备忘录。

贝文认输了

英弗查佩尔勋爵接到我这份备忘录的那一天，正值伦敦会议第二阶段开始，而这次会议还是没有犹太人参加。美国并没有参与此中的活动。两星期之后，贝文通知马歇尔将军说，这次会议又告失败了，英国政府将在1947年2月14日把“整个巴勒斯坦问题提交联合国处

理”。国务卿向他保证说:“对于你现在所处理的这个棘手而又艰巨的任务,我十分希望不使你为难。”在这个严肃认真的声明发表后的第二天,我同英国公使约翰·贝尔福爵士商谈(当时总统、国务卿和英国大使都不在华盛顿)并力劝他说,每月犹太人进入巴勒斯坦的数目应增加一倍,而不应按照他的政府所建议的那样,保持现有的每月一千五百人。我是根据“一不做,二不休”的道理作出这一劝告的,我并且辩解说,这种做法不会使阿拉伯人更为激怒,但是可能使他们不那么满意于僵持的现状。在我同西尔弗的一次谈话中,这位犹太领导人曾显露出一种抑制而有点惶恐的心情,这可能对谈判是有益的。

在告诉亨德森这次商谈的情况时,我补充道,如果英国人打算不但放弃他们在巴勒斯坦所承担的责任,而且也在联合国中放弃讨论这个问题的领导地位,我看我们很难避免要承担一些领导责任。不管联合国作出什么建议,人们总是要求我们提供经费的。因此,联合国的建议应尽量合情合理,这才对我们有利。至今我们仍然赞成以分治为基础的解决办法。但是这种政策受到来自国外各方面反对的影响太大,是否能在联合国通过呢?在尽可能使我们自己的打算在我们政府中具体化或被接受之前,我们必须避免对同英国人进行任何磋商承担义务,因为这种磋商肯定要被泄露出去,并在我们国内引起反应。最后我说,“我觉得这种磋商只会提出最关键性的问题,而不能解决问题,可是现在我已经把我今天上午的想法全都讲完了。”

把责任推给联合国

1947年2月21日，马歇尔在离开华盛顿先到普林斯顿大学演讲，然后再到北卡罗来纳州的南松岭度周末之前，给贝文打了个电报，提醒他说，“令人遗憾的是把这个伤脑筋的问题提交联合国，并不能减少它的复杂性或使它易于解决。”当他再次提到杜鲁门总统深切关怀的问题时，他问贝文是否可以在联合国考虑这个问题的期间，在不使当前局势有明显变动的条件下，适当地增加一些犹太移民的人数，他并补充道，“但这必须由英国人来决定。”可是在他离开华盛顿之后，贝文完全倒转过来，把责任推到我们身上，他告诉我们，英国将在一个月之内撤离希腊，摆脱对这个国家的一切义务，让我们去承担恢复这个不幸国家的安全和稳定的艰巨任务。三天之后，贝文在英国下院抨击美国对巴勒斯坦的政策，博得议员们的欢呼。在后来一个月之中，我因忙于处理希腊和土耳其的问题，很少过问巴勒斯坦问题。后来因马歇尔将军动身前往莫斯科，才再一次把巴勒斯坦问题交我处理。

英弗查佩尔勋爵想知道联合国审议这个问题的办法和程序。显而易见，如果没有收集并整理好有关的资料，这个拥有约六十个会员国的联合国大会是无法弄清楚这个问题或作出一些合理结论的。这就产生了两个问题：应由谁来收集，整理资料，以免人们指责联大有某一种偏见并企图从资料中得出一个带有倾向性的结论呢？在开始时，应由谁来鉴定这些资料，然后再向联大提出建议呢？

他请我们把对上述两个问题的意见用书面答复他。总统对这件事情的判断是很英明的。在同他讨论并得到他的指示之后，我们建议成立一个由中立国人员组成的小组，同联合国秘书处配合起来一道工作，来承担解决第一个问题的任务。对第二个问题，我们建议成立一个拥有广大职权范围的特别委员会，由九个或十个对巴勒斯坦问题不抱任何成见的中立国组成。该委员会的成员不包括任何大国。我们并且建议如果联大召开一次特别会议，其议事日程应只限于讨论任命特别委员会；我们这一主张是同阿拉伯人的愿望对立的，因为他们希望议事日程还应讨论结束英国委任统治的问题。

4月2日，英国人请求联合国秘书长“尽快召开一次联大特别会议，以便讨论设立一个特别委员会，并指示该委员会为下届联大例会审议巴勒斯坦和建立它将来的政府的问题做好准备”。这次特别会议从4月28日召开，直至5月15日为止。它按照上述请求和建议设立了一个特别委员会。在马歇尔将军的记载中，他认为这一行动是“令人感到欣慰的，并使人们有理由希望在9月召开的联合国大会上可能会提出一个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

但到了6月中旬，他已改变了自己的看法。他在写给美国驻联合国代表沃伦·奥斯汀的一封信中说，“看来，似乎已无法达成一项一致的和解协议了。”每一个解决方案都遇到强烈的反对。“可能需要使用某种程度的压力才能通过一个解决方案。”必须研究一下整个形势“以便确保任何一个解决方案无论今天还是将来在全世界面前都能站得住脚的”。由于我辞职的申请已被批准，

并将在年中生效，我当副国务卿的日子快要结束了。当时犹太办事处硬要我陈述美国的政策，并强烈要求增加犹太移民人数，我在这种压力之下所发表的最后一次有案可据的意见是与国务卿的看法完全相反的。我认为向联合国特别委员会施加任何压力或损害它处理争端的完全中立性都是不明智的。

现在回顾起来，大概只有在联合国大会讨论争端的时候，人们才重视大公无私的精神。在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眼里，这并不能使联合国特别委员会8月31日所作的报告显得公平合理一些。事实上，到了7月中旬，有四千五百多名被拘留在海法的非法迁人的移民已被遣送回欧洲去了。到年终时，在巴勒斯坦全境到处都爆发了战斗，但是那时我已卸职了。

四　欧洲的麻烦

斯大林的攻势

东地中海

斯大林在1946年2月9日讲话中宣布的对美国和西方的攻势，实际上于1945年已在波兰开始，以后并将在朝鲜和在五十年代初的"仇美"运动中达到顶点。这是"冷战"的开始，也势将决定我今后的宦海生涯。攻势是在据认为对苏联内线的最为有利的地区发动的，因为在那里，苏联的军事力量占优势。攻势也在国际会议讨论政治问题时发动，因为这不需要化费什么代价，只要顽固而巧妙地反对美国的建议就能得手。因此，从地理上说，攻势集中于俄国在东欧的边界一带以及中东地区，因为在那里，苏联的实力地位最强，而美国的实力地位最弱；从政治上说，攻势集中在建立一支联合国军事力量的努力和美国提出把原子能置于有效的国际管制下的计划。苏联拥有否决权，在联合国中采取阻挠策略很方便。苏联卫星国的建立也只有在红军支持下的地方才能成功。当苏联的企图超越了东欧苏占区，向西德、巴尔干和中东推进时，美国政府就给予明确警告：如有必要，美国准备同苏联兵戎相见，而不仅是提出抗议和在联合国通过决议而

已。第一次警告于1946年8月发出，但斯大林继续小心试探，继续得到坚决而又谨慎的回答，直到1950年6月，他才去掉伪装，通过位于世界另一边的一个卫星国在朝鲜发动武力进攻，美国在那里的回答也是不含糊的。

贝尔纳斯先生感到讨论和约的外长会议无甚进展。最困难的障碍就是意大利——南斯拉夫在的里雅斯特地区的边界纠纷。到5月份，它已转为俄国和英美立场之间关系到声誉的较量，前者支持南斯拉夫的要求，要得到亚得里亚海东岸的全部地方，后者支持意大利保留东北沿海一带，包括的里雅斯特城和意大利人居住的邻近郊区。会议在未能断定是非也没有使任何人得到满足的情况下休会了，只是向在一个月后召开的和会提出一项关于建立的里雅斯特自由区的建议。与此同时，在分区占领的摩根线（这条线把意大利的前威尼西亚朱利亚省分成两半）一带，英美军队和南斯拉夫军队对峙着。在摩根线的两边，人们举行示威游行，主张采取敌对态度，这种示威游行危险地煽动起当地居民的激烈情绪。会议在巴黎举行时，会上人们纷纷预言南斯拉夫要对的里雅斯特发动突然袭击。

在这样的形势下，已经不幸的国务卿发觉自己处于三面夹攻之中。8月7日，苏联政府要求土耳其让苏联参加它所谓的海峡防务，意即占领土耳其。8月9日，南斯拉夫人迫降飞越威尼西亚朱利亚上空的美国陆军非武装的运输机，又于8月19日击落这种飞机。与此同时，一贯支持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在边界向希腊施加压力以分离其北方各省的苏联政府，在联合国内全力以赴地对希

腊政府发动进攻，以支持民族解放阵线对雅典进行共产主义接管的企图。

在华盛顿，总统已责成我会同陆、海军部长和参谋长联席会议制订关于采取行动来对付俄国在海峡的推进的意见书。贝尔纳斯国务卿从巴黎来电话，要我同总统与三军制订用战斗机掩护陆军运输机飞越威尼西亚朱利亚的计划。艾森豪威尔和斯帕茨将军拒绝考虑贝尔纳斯用战斗机在亚得里亚海狭长的走廊地带护航速度较慢的C-47运输机的主张，而建议用武装的战斗轰炸机来完成这项运输任务，并命令飞机一旦在途中遇到干扰就进行射击。总统表示同意。

在国务院，我们再一次审查我们对希腊政府颇有保留的态度，因为我们以往一直认为希腊是英国负责的地区里相当薄弱的环节。1月份，在通知给希腊二千五百万美元的贷款时，我已经告诫说，他们必须大大改进他们的经济管理工作，我们才能再提供贷款。看来这是不大可能做到的。

8月15日，我们（海军部长福雷斯特尔、陆军部副部长肯尼恩·罗亚尔和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带着关于海峡问题的报告去白宫。作为发言人，我坐在环绕总统办公桌两边的新月形的一端，陆军参谋长艾森豪威尔将军坐在我旁边。我们的报告说明了俄国怀着控制巴尔干和东地中海的目的向土耳其和希腊推进的严重性。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加以阻止。我们给俄国人的照会应当以故意克制的语气使他们感到每个字都是当真的。他们对蒙特娄条约批评得对的地方，我们应该承认，同时对任何干涉土

耳其单独防御海峡的做法，应该坚决反对。我们建议让俄国人、土耳其人、英国人和法国人都清楚认识到我们在这方面是极其认真的。美国军舰"密苏里号"已在伊斯坦布尔，它是前些日子运送土耳其前大使的骨灰到达那里的。我们极力主张派遣一支强大的海军，包括新服役的超级航空母舰"富兰克林·D·罗斯福号"一起去。总统仔细地听取汇报后，要我们准备好必要的照会和命令。

艾森豪威尔将军小声问我，我是否已把我们所建议的行动方针可能引起战争这一点讲得够清楚了。我还未及回答，总统就问将军有无意见要补充。我重述了他问我的问题。总统从他的办公桌抽屉里取出一幅中东和东地中海大地图，叫我们围在他的身后。他接着就这一地区的战略重要性以及我们为了不让苏联控制这个地区必须准备做到什么地步发表了简要的讲话。他讲完后，每个人都深信不疑他完全理解我们的意见书的全部含意。

第二天，我给总统一封短笺说，按照他的指示，我已将我们的会议和总统的意见告知贝尔纳斯国务卿。国务卿"十分赞同"。因此，我建议立即送出照会。在批复中，总统亲笔批示："照办。哈里·S·杜鲁门"。我把照会的准备经过及其中心内容——维护土耳其主权，维护土耳其单独保卫海峡的责任——通知驻安卡拉大使埃德温·C·威尔逊，并要他力劝土耳其对莫斯科的答复要"适当而坚定"。8月19日，我把我国的照会交给苏联代办费多尔·T·奥列霍夫，同时将副本送往安卡拉、巴黎和伦敦，要求他们同意。两天前，我已向报界扼要介绍了情况，强调说明局势的严重性、我们坚决反对任何外来的军事力量干涉

海峡防务的决心以及不要对局势的可能发展进行揣测。

在我们递交照会的那天，铁托的飞机击落了第二架美国运输机。当时我们还不了解这架飞机上的全体人员已经死了，因而要求在四十八小时内释放两架机上的人员。总统命令增加摩根线一带的我军，增强我们在意大利北部的空军。我们必要的海军集结后，马上开进希腊水域。铁托很快明白了我们的意思，便让步了。对的里雅斯特和海峡的进攻于是就平静下来了。俄国的攻势转向希腊的北部边界、土耳其的东部几个省和北伊朗。到了那年秋天，苏联在那里的火力就将日益集中了。

麻烦东移到伊朗

1946 年，我们花了大部分时间才懂得克里姆林宫的思想方法非常象乔治·F·凯南所预言的那样。对共产党比较露骨的刺探形式，我们的反应是有力的，例如对于在威尼西亚朱利亚打下我们的飞机，但是对莫斯科为扩张其控制——总是在红军的阴影下干的——所施展的隐蔽手法，我们却识破得较慢。亨利·华莱士认为苏联有权获得它的势力范围，他的理论有很多信徒。俄国人自已在教育我们方面起了很大作用。他们选择海峡和伊朗作为施加压力的地点时，他们走的是野蛮人人侵古希腊和罗马以及后来沙皇觅取温水港湾的线路。从温泉关到克里木，这些地方对压力的反应是传统性的。如果有些美国人觉得自己的历史知识荒疏了，英国人和美国总统可不是这样。

1945—1946 年的伊朗危机围绕着两个问题：苏联是

否会履行1942年和1943年的诺言、从伊朗北部撤军;苏联是否能在伊朗北部的阿塞拜疆省建立一个受其控制的自治实体。1942年,苏联和英国的军队各自开进伊朗的北部和南部,以阻止德国侵入和保护伊朗的石油。这些军队应在战争结束六个月后撤走。在1943年12月2日的德黑兰宣言中,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再次确认了伊朗的独立和完整。1945年9月,贝文和莫洛托夫确定撤军日期最迟不超过1946年3月2日。

与此同时,苏联政府在阿塞拜疆武装一个分裂主义运动(伊朗人民党),当这一运动在1945年11月发动反对伊朗国王的叛乱时,苏联不让伊朗国王的军队开到该省进行镇压。在美国和英国支持伊朗的情况下,危机正继续下去。在外长会议和联合国里,危机持续了整整一年,当安理会接受审议该问题时,葛罗米柯退出了会场。双边会谈在相互猜疑的气氛中进行。撤军的日期过去了,但不见行动。春天,由于苏联增强在阿塞拜疆的军队的报告不断传来,紧张局势日趋严重。我们公开质问了莫斯科。

这时候(3月24日),德黑兰和莫斯科达成一项含糊不清的协议。俄国军队要撤走,而伊朗将同意建立一个联合石油公司以及作出可能会使阿塞拜疆自治政权得以巩固的一些安排。可是,在近东,事情并不总是象它的外表那样。俄国军队4月份撤走了,但伊朗的议会却不承认联合石油公司。由于人民党要求在它的控制下举行选举,紧张局势又加剧起来。因为贝尔纳斯先生仍在国外,10月份,我接待了伊朗大使侯赛因·阿拉的多次来访。这位

大使是个好人，他要求美国主动在安理会再次提出伊朗问题，主动要安理会来监督在阿塞拜疆的选举。经总统和国务卿的批准，我对大使说并要我们驻伊朗的大使告诉奎伐姆首相，我们只能支持伊朗政府，不能越俎代庖。伊朗政府要采取主动。而且，看来在伊朗的权力在该省确立之前举行选举是一个错误。只有在伊朗的权力确立以后，联合国的监督才是有益的。没过多久，在类似的授权下，我们对奎伐姆的要求给予同意的答复，奎伐姆的要求是，如果苏联反对伊朗军队开进阿塞拜疆，希望我们坚决支持伊朗。伊朗军队开到时受到狂烈的欢迎。主张分裂的政权垮台了。调动军队开始时只是试探性的，而结果却收复了全省。

危机过去后，乔治·艾伦大使于1946年12月17日的电报中说，伊朗认为，人民党垮得这么快是由于每个人——俄国人、伊朗人和阿塞拜疆人——都确信美国不是虚声恫吓，而是坚决支持伊朗主权的；正如他所说，“伊朗不比联合国强，而联合国归根结蒂也不比美国强。”

麻烦转到希腊和土耳其

直接对伊朗施加压力受挫后，苏联重新鼓起劲头来压希腊和土耳其。这里需要介绍一点背景，因为，在一些事件无情地促使杜鲁门总统于1947年3月作出伟大决定之前，我们的卷入逐月加深。然而在德国军队于1944年10月被逐出希腊时，那里几乎完全是英国负责的地区。1944年10月9日晚至10日，丘吉尔和斯大林作出决定并记录在著名的“半张纸”上，分给英国在希腊的“发

言权”是百分之九十，俄国为百分之十，以此来交换俄国人在巴尔干其他地方的优势。我们对这种做法并不很赞成，但人家在这方面没有征求我们的意见。

根据常驻公使哈罗德·麦克米伦和英国驻希腊大使雷金纳德·利珀为一方，同希腊领导人安德里亚斯·帕潘德里欧(社会民主党)、拿破仑·泽尔瓦斯(国民党)和斯蒂芬斯·萨腊菲斯将军(共产主义民族解放军)在1944年9月26日达成的卡塞塔协议，民族团结政府不到一个月已在雅典建立了。所有的希腊部队，政府的和游击队的部队，都接受民族团结政府在希腊的领导以及以亨利·梅特兰·威尔逊将军为总司令、罗纳德·麦肯齐·斯科比将军为司令的军事指挥。没有斯科比将军的命令，他们不会行动。斯科比将军还指挥六万名在希腊的英国军队。

协议和政府的存在都没有超过一个月。当政府企图对民族人民解放军行使权力时，共产党人就抵抗，总罢工便爆发了。丘吉尔指示斯科比，要他象对付一个作乱的被征服的城市那样来行动。哈罗德·亚历山大将军来调查，他警告说单靠军事手段解决不了希腊问题。丘吉尔和外交大臣艾登飞抵雅典。建立了由大主教达马基诺斯领导的摄政政府和由尼古拉斯·普拉斯提腊斯将军领导的“贤人”政府。1945年又出现了两个政府，危机此伏彼起，越来越混乱。

1946年初，希腊上空出现的一点光亮并不是真正的黎明。一月份，我们同意提供二千五百万美元的进出口银行贷款来支持我的朋友基里亚考斯·瓦尔瓦勒索斯的

经济计划。他是希腊银行总裁和不管部大臣，在希腊政府里是个最杰出的人物，我在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初期谈判时结识了他。3月底，在一个有六百名美国人的国际监察团观察下进行了选举，监察团宣布选举“基本上是自由和公平的”，其结果是康斯坦丁·特萨尔达利斯（保皇党）担任首相。他是一个优柔寡断、外貌悦人但有点傻头傻脑的人，他心里一直念念不忘和不断谈论的是，希腊问题只有通过当时在巴黎举行的和会取得北方领土的割让才能解决，并以此来同维尼齐洛斯相媲美，后者在凡尔赛和会上为希腊取得克里特岛。他还要求我们给予六十亿美元的经济援助。贝尔纳斯先生和我竭力想把他的注意力集中于取得比较可能和必要的成就上，但没有获得成果。9月份，举行公民投票，结果，百分之七十赞成乔治二世国王回来，尽管他并不比特萨尔达利斯起更多的作用。

这时候，以及整个战争时期，我们幸而有林肯·麦克维这么一位第一流的人物担任驻希腊大使。他既有同情心，又明智。他的报告对希腊的困境描绘了一幅日益阴暗而又严重的图景。共产党的队伍正在北方形成，他们能够越过阿尔巴尼亚和南斯拉夫边界来回活动，从而得到这两个国家的人力物力的支援。希腊的经济情况变得愈来愈混乱和不可靠。这时我们开始少谈些我们不愿做的事情，多谈些他们必须做的事情；少谈点我们的援助，多谈点能帮助他们增加收入的积极步骤。10月份，贝尔纳斯国务卿和我提议派遣一个经济使团就他们全面的经济情况提出一个全面性的建议书。前物价管理局局长保

罗·波特任使团的团长。

国务院一陆军部一海军部协调委员会就有关的战略考虑，制订了一个具体而惊人的文件，贝尔纳斯同意了。12月间，麦克维大使拍来的电报说，苏联要完全控制希腊，并将干涉希腊人为拯救自己所采取的各种积极措施。

在这种背景下，波特使团于12月间出发去希腊，而亨德森和我却花了两小时听特萨尔达利斯讲述希腊向贝尔纳斯先生提出的一系列要求。当他滔滔不绝地谈论希腊对北伊皮鲁斯的要求时，我实在忍不住了，便对他说，眼看不仅是希腊北部，而且整个希腊都将很快地走向彻底崩溃时，还在领土要求上浪费时间和精力，这算是什么样的政治家风度呢。且不管这番话是否使他住嘴，这至少使我可以不必再去听他那套长篇大论了。

土耳其和希腊一样，也经受了一个削弱的过程。1945年6月7日，苏联外长莫洛托夫通知土耳其驻苏大使，苏联要求得到土耳其东部卡尔斯一阿尔达汉的一些地区。这些拥有六千五百多平方英里和三十万人口的地区同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两个苏维埃共和国接壤。这两个共和国马上提出比莫洛托夫更大的要求：格鲁吉亚共和国要求在黑海沿岸得到拥有二万五千平方英里和一百二十五万人口的土耳其东北地区；亚美尼亚共和国则要求得到在此以南同样大小并拥有约六十九万人口的一些地区。土耳其政府的回答是，不管有没有联合国的援助，土耳其都要为保持“现有的领土和主权”而战斗。

五　马歇尔使团在华盛顿的代理人：第二阶段

俄国在中国的意图

1945年12月，马歇尔将军到达中国不久，就致电当时离开莫斯科回华盛顿的国务卿贝尔纳斯，询问蒋委员长所说他在满洲同俄国人打交道中遇到的困难，是否同我们自己在欧洲遇到的困难相似，或者说，苏联对中国的政策是否故意要阻挠建立一个有效的、统一的中国。这个似乎两歧的问题，产生了令人误会的答案。贝尔纳斯国务卿听斯大林说过，苏联军队是应中国国民党政府的邀请而进驻满洲的，他相信苏联和中国的关系同我们和欧洲的关系一样性质。他还相信斯大林会履行他同中国的条约，不会阻碍我们为一个统一的中国所作的努力。

一星期后，凯南从莫斯科作出自己的估计，如同他对苏联在欧洲的目标所作的估计那样，他对斯大林在中国的目标的看法深刻得多。苏联谋求在中国占极大的优势。苏联打算用自己"不干涉"、用中国共产党来策划无耻阴谋、以及用提倡成立一个联合政府（通过这个政府使中国共产党可以有希望控制或掌握政府）等办法来达到这一目的。在支持国民党还是共产党人的问题上，苏联

暂时保持外交上的灵活性。

凯南坦率地说，他不了解延安和莫斯科之间的关系到底如何，他颇愿相信中国共产党和其他党一样听命于莫斯科，但是否确实，仍然感到犹豫不决。莫斯科同延安的关系是非常微妙而暧昧的。延安可能享有惊人程度的独立，因为：(1)中国共产党没有什么原因要去感谢苏联——它的存在和发展不是因为有了莫斯科，而是由于无视莫斯科的结果；(2)中共发展了它自己牌号的马克思主义和土生土长的传统；(3)中共不是一帮亡命的阴谋反叛者——它拥有政权、军队和民政已达十年之久；(4)中共具有民族主义色彩。然而，延安在对外关系方面没有多大选择余地。凯南感到，最后的结果是，莫斯科消除了西方对苏联政治威望的相当大的怀疑；使重庆在各种问题面前不知所从；教诲延安不要过于自信；并且使自己处于一种不管中国局势向哪个方面发展都能得利的地位。在关键时刻，莫斯科对延安施加有效影响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这种分析尽管高明，但作为一个预言却没有应验。莫斯科未曾说服或者试图说服延安去参加或夺取一个联合政府，这是国民党很怕的一着。一方面，苏联军队在中国未能起到在东欧那样的作用；另一方面，延安所谋求的是一种居统治地位而不是一个卫星国的角色。蒋介石也要统治全中国，包括满洲在内，而且相信他必须以军事手段来达到目的。然而，正象魏德迈将军反复告诫的那样，蒋是无力以这一手段来达到此目的的。美国不愿意、而且根据国内外的现实情况来看，大概也不可能帮助蒋来达

到这个目的。导致马歇尔使团完全失败的原因，与其说是延安对莫斯科闹独立性或者延安太听从莫斯科，不如说是国民党拼命想对共产党发动军事攻势来控制全中国。

蒋在满洲犯下的大错

麻烦和错误开始在满洲出现。蒋介石在调运军队从俄国人手里接管满洲一事上进行赌博。魏德迈将军劝告国民党人在处理华北和满洲的大问题之前，应先巩固其在华南的地位。对中国分裂的担心，使他们听不进这个明智的劝告。1 月 10 日的停火协定给国民党人以开进满洲的权利。莫洛托夫于 1945 年 12 月在莫斯科外长会议发表的公报中已同意，俄国军队将从 1946 年 2 月 1 日开始撤退。直到 3 月 27 日，委员长一直拒绝执行部联合小组进入满洲监督停火，据马歇尔将军说，这是因为蒋担心苏联要求参加小组以及不想承认在满洲的共产党军队。在中国人之间发生了一些零星战斗。2 月 1 日过去了，俄国人却没有撤走。共产党把军队渗进满洲后，力量增强了，在俄国人的暗中勾结下接收了已投降的日本人的武器。国民党人的交通线拉得过长，显得危险。3 月月中，俄国人突然间从沈阳撤走，这时，国民党人就进去了；但是，过了一个月，在马歇尔将军回到中国的那天，即 4 月 18 日，共产党人夺取了长春（满洲的首都），明目张胆地违反了停战协定。

马歇尔将军回到中国后，忧心忡忡地致电总统说，他

发现不肯妥协的人在掌权，蒋责备他轻信共产党，蒋认为共产党是同俄国人结盟的。在这一点上，蒋至少是部分错了。苏联推迟从满洲撤军主要不是为了中国共产党的利益，而是为了实现他们自己对满洲的工业设备进行系统的掠夺，并作为"战利品"运回苏联。总统给马歇尔将军的回电表面上是安慰，实际上增加了后者的痛苦，他说，蒋一定会很快认识到"他如果同意你的实现和平和统一的建议，这不可能真的被看作是自行放弃国民党政权，而……应被看作保留他自己和国民党开明派在统一的中国政府中的地位和影响的一种手段，否则，只能通过全面内战来取得，而这是否可能是值得怀疑的。"为了各打五十大板，总统接着说："如果……〔共产党〕停止其漠视协定的机会主义的活动，如表现在最近在满洲的行动，统一的可能性就会大大增加。"出于坦率，我在电文里加上最后一行："代理国务卿同意我的上述观点。"

马歇尔以西西弗斯那样辛苦的忍耐精神[①] 又开始滚动那块大石头上山了。他为达成这样的协定而努力工作，即共产党人撤出长春，国民党人停止向长春推进，由执行总部在那里建立一个先遣小组。但是，5月23日，国民党部队占领了长春，严重地损害了马歇尔将军的信誉。然而，他把停战延续到6月底。与此同时，三人小组试图使满洲的战事停下来，就如何统一中国的步骤上重新建立中国各派之间的联系，并贯彻2月25日关于整编军队的协议。

① 出自希腊神话。西西弗斯是希腊古时的暴君，死后堕入地狱，被罚推石上山，但每次推近山顶时又滚下来。——译者

马歇尔将军的影响下降

将近6月底，将军还能报告说，尽管双方的态度似乎比以前任何时候更加对立，但战争已很好地被控制住了，双方又恢复了谈判。华盛顿开始采取援助中国的措施，然而，这一本意良好的工作却引起新的困难。华盛顿的一项措施是建议国会建立一个军事顾问团来帮助实行中国军队的整编计划；另一项是需要在6月底完成的执行租借法案援助的协定。这两项措施在中国引起了双重麻烦。据将军报告，国民党的死硬分子以此来怂恿委员长重新发动打共产党的战争，因为美国人无论如何会提供帮助的。共产党人也得出同样的结论，以此项拟议的法案来证明为促进统一而向国民党人让步是无用的。双方都攻击马歇尔将军，一方说要阻止他们取得胜利，另一方说以旨在削弱他们力量的骗人的建议来出卖他们。苦恼的将军打电报说："如果华盛顿的政府发言人能抓住有利时机把美国对华援助措施的目的和发展情况加以解释，那是很有帮助的。"

经总统批准，我立刻发表声明说，此间正在进行有助于执行协定的各项准备工作，有些协定已在中国达成，另一些正在那里谈判，以便制订一项国家统一的计划和方案。但来自中国的新闻报道表明，那里对此间进行的各项准备工作发生了严重误解。举例说明我们的工作就可以显示出它们在一些方面将是多么适应中国的计划。

将军很感激，但4月份开始的谈判，在出现过一些有

希望的苗子后便枯萎了。7月初，马歇尔将军遇到一个罕见的沮丧时期。他给我的电报说，“如此忙于事务，一叶遮目”，看不到远景。他盼望看到文森特和我对形势作出“坦率而完全非正式的”估计。两天后，我们联名给予回答，可惜不能给他什么安慰。麻烦的根本原因是很清楚的——不仅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就是这两个党同中国老百姓之间都互不信任。只是双方的极端分子要战争，但双方都害怕作出为取得妥协所必需的让步。双方都不愿承担谈判失败和马歇尔使命失败的责任。因此，谈判有某种程度的势头，最好的策略是让谈判继续进行下去。共产党人似乎不大可能想恢复战争，因为军事战线已拉得太长。国民党里的急躁分子具有旧军阀思想，认为扩大控制区比打败敌人的军队更能证明军事上的胜利。然而，这样的政策明显地会使国民党人兵力分散，而使他们的敌人力量集中并造成有利于后者的形势。

据我们看，将军在力求使谈判继续下去的同时，必须认识到陷于僵局的可能性。在陷于僵局而未爆发战争的情况下，将军也许最好还是与双方保持接触，但可以把工作放松一下并减少美国的援助。这样做可能增加中国人自己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如果战争恢复，我们建议保持同政府的关系，并且考虑从中国撤出美军和停止物资支援。如果苏联竟支持中国共产党人，那就有必要对美国的政策作较大范围的重新估计。

马歇尔将军这时交给我的另一项任务，将说明他的后方指挥所多方面的职责。将军尽管被指定为总统在中国的特使，实际上履行的是大使的全部职务。为了减轻

他的责任并采取一种对中国政府比较超然的立场，马歇尔将军要我和总统讨论任命魏德迈将军为大使，魏德迈指挥在中国战区美军的经验使他完全熟悉马歇尔将军所处理的政治和军事问题。总统和魏德迈将军都愿意按照马歇尔将军的意思办事，魏德迈只是要求国会通过特别法案，保持其军人身份以便以后恢复军职。

可是，我们接到的通知说，中国出现了逆转的形势。马歇尔将军已把魏德迈的任命扣压了两个月不予发表，部分是因为中国反马歇尔将军的宣传把魏德迈同他联系起来。7月初，将军给我的电报说，已经变化了的情况使得魏德迈的作用降低了。他已决定推荐燕京大学校长、中国最尊敬的外国人司徒雷登，“在中国生活五十年的整个期间，他的品格和行为标准一直是西方世界中最卓越的典范”。公使衔参赞沃尔顿·巴特沃思将处理大使馆的业务。有司徒雷登博士的崇高地位，将军“能利用他对各界政治领袖的影响，因为这些人多半同他很熟”。谈判正进入最后的关键阶段。“我估计他的工作不会超过九个月。”如果发生公开内战的悲剧事件，他就会奉召回国进行磋商。

另一份电报要我毫不拖延地去见总统，马歇尔将军自己不去的原因是，倘若遭到蒋的反对，不会使总统为难。电报最后说，“请向魏德迈将军解释这些事。”马歇尔将军德高望重，所有有关人员，包括总统、魏德迈将军、后方指挥所和参议院，都热切渴望同他进行充分而愉快的合作来实现他的建议。

希 望 破 灭

在以后三个月里，希望一个接一个破灭了。到10月份，只有文森特还保持百折不挠的乐观情绪。他在给我的一份备忘录中指出："还没有一切完蛋，……将军能摊开蒋的全部牌，这样的机会大于百分之五十对百分之五十。"司徒雷登大使的任命于7月11日得到参议院批准。他趁呈递国书时同蒋介石进行了一次长时间坦率的谈话。他告诉委员长，他正在失去公众的支持；不应再搞暗杀活动，不应再取缔报纸，并且以召开人民协商会议筹备会来结束"训政"。但是蒋已宣布在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贯彻他自己的纲领。马歇尔函告总统说，"局势危急，但是有司徒雷登博士的大力协助，我们也许能够结束这种混乱、悲惨的一团糟的局面……而没有暴力和全面混乱的危险。"蒋劝告要忍耐，并且引用中国谚语"瓜熟蒂落"。总统和我致电表示鼓励和支持。

7月底，战斗再次爆发并迅速扩大，完全超过了军事调处执行部的控制能力。马歇尔将军认为，给国民党人的军事援助，根据一个统一的中国军队的计划，原来是正确的，但现在已同不偏不倚地努力制止刚开始的内战的这种活动完全抵触了。因而，他要求立即实行美国对中国的武器和弹药的禁运。这项措施一直延续到1947年5月。它对缓和双方的敌对行动和内战的结局都没有产生什么效果。

全体内阁研究了局势（从天津到北京去的海军陆战

队护送人员遭到共产党伏击)，接着总统建议由他发表一个公开声明，充实1945年12月15日的政策声明，使之反映最新情况，尽管不背离其基本原则。但是，将军和大使都不同意。他们认为，发表公开声明会使蒋更加对抗他们目前为停止战争以及讨论立即建立一个国府委员会所作的努力。他们正在草拟总统致蒋的一个密电。

由五人小组(以司徒雷登博士为主席，中国双方各有两名成员参加)讨论国府委员会的建议，委员长表示只有在五项条件下才能接受，但是共产党人拒绝接受这些条件。会议没有开成。8月10日，杜鲁门总统发出密电。总统在电文里对马歇尔将军的努力无效和由于双方极端分子阻挠实现中国人民的意愿致使政局急转直下深表遗憾。他写道，当美国人民获悉国民党在昆明暗杀中国著名的民主人士，镇压言论和新闻自由，使用暴力和秘密警察而不是用和平手段来解决重大社会问题时，越来越多的人认为要重新审查我们的政策。如果这种逆转的形势继续下去，他就有必要向美国人民重新表明和解说美国的立场。总统热切希望委员长能给予一个振奋人心的回答。

总统没有得到这样的答复。蒋反而直截了当地把责任全都推给共产党。马歇尔将军作了崇高的努力。委员长是在依靠总统的继续支持来实现他们的共同目的。到这个月底，总统的另一个呼吁也没取得多大成功。

8月底，政府在江苏取得军事上的成功。马歇尔将军得出结论认为，国民党人已决定采用武力政策，于是开始把由美国海军陆战队护送火车、保护桥梁的责任移交

给国民党，拒绝今后继续这种援助。战区在扩大。共产党人拒绝在三人小组开会并实现停火之前，召开五人小组讨论政治问题的会议。委员长坚持以相反的程序来考验共产党的诚意。在这些策略问题之争的背后，存在着由于多年战争而产生的深刻的互不信任，军事上优势在国民党方面，这就加强了国民党极端分子的地位。文森特和我商讨了给马歇尔将军的一个电稿，建议对共产党人发一个"非此即彼"的最后通牒以及为对付可能导致全面内战的各种不测事件时所应采取的行动。

国民党选择此刻向将军的火药桶里掷了一个点燃的爆竹。10 月 2 日，他告诉我说，通过司徒雷登大使从蒋夫人的哥哥宋子文那里获悉，政府在停战前要夺取张家口，尽管蒋以前曾答应他不去触动这个地方。他还收到周恩来的一封信说，如果进攻张家口的军事行动继续下去，共产党将不得不把这视为谈判的最后破裂，视为国民党放弃它已宣布的和平解决方针。马歇尔将军的电报以充分显示他的性格的一个方面的语言，接着说(我全文引用如下)：

我断定我继续参加旷日持久的谈判或者花费大量时间于函电传递，将不可避免地被人们认为是实际上参与了谈判(这种谈判只是一种继续进行军事活动的伪装而已)。因此，我给委员长一份备忘录，最后一段是："我不愿谈同今年 3 月以来的无效谈判有关联的情况。我只是希望声明，除非奠定协议的基础，结束战斗，不再以建议和反建议来继续拖延，否则我将提议总统把我召回，并结束美国政府的调停活动。……"

我意识到我这样通知委员长使美国在其同远东局势的关系

上处于微妙的地位，但我认为我国政府在谈判中不能参与营私作弊的进程，因此，我感到这个事实必须明确无误地对政府讲清楚。

文森特指出，"马歇尔将军显然是生气了。他实际上谴责政府领袖表里不一，特别是在对待进攻张家口问题上。……他确实感到他的信誉濒于危险。"

同总统长时间会谈后，我电告将军，总统坚定不移地相信马歇尔将军在中国完成这项任务的能力，如果那是人力所能办到的话。如果他认为此刻需要总统把他永久地召回或者召回进行磋商的话，总统愿意这样做。当蒋得悉这一消息时，他提出在张家口停战十天，并同意召开三人和五人小组会议，后一会议确定国府委员会和国民大会的人选，前一会议推进军队改编工作。这遭到共产党人的拒绝。10月10日，政府夺得张家口。10月中下旬展开了一场宣传战，各方都提出一连串的"论点"说明自己的立场——政府举出马歇尔将军报告中称之为"似乎合理的"八点；共产党人在军事上提出三点，政治上提出八点，马歇尔将军认为这几点抨击了他们不偏不倚的态度；第三方面的活动找出两大党之间的六个分歧点，并补充了自己的三点。局势陷入极端混乱。马歇尔将军认为进一步调停已经无用。司徒雷登大使同意这个意见。

将军卷起铺盖走路

随着周恩来撤回延安并拒绝回答将军提出的共产党

人是否希望他继续进行调停的问题，马歇尔将军的努力告终了。马歇尔将军下结论说，国民党政府的军事领袖处于掌权地位；他们和国民党极端分子认为，共产党不会履行任何协定，不可能联合。他们相信不管出现什么情况，美国政府必定支持委员长；在俄国人不能干预的情况下，不管有无美国军援，他们都希望尝试一下对共产党的军事进攻。他还说，共产党人由于自身多疑而使自己失败了。司徒雷登大使认为"为了诱导共产党去合作，各种途径都探索了，所有的努力都用尽了……但是，这个二十年的深仇、怀疑和恐惧所形成的反常心理状态，由于中国人传统上一向难以自愿进行大规模合作，以及由于共产党的纪律手法而变得更为严重了。这种复杂的心理自然而然地产生了这种结果。"我自己的看法是每一方虽然都愿意签署纸上的协定，但在认真讨论建立一个暂时的或永久性的中国政府之前，都决意以军事手段来扩大自己的控制区。甚至这样的看法很可能也是太乐观了。

11 月份，马歇尔将军和指挥第七舰队的查尔斯·M·柯克海军上将希望在海军陆战队卷入即将爆发的内战之前，减少并随即撤出在华北的海军陆战队。华盛顿的海军部却拖拖拉拉。最后，我非常生气，去找总统，他对福雷斯特尔部长和李海元帅发出直截了当指示说，要迅速而明确地贯彻马歇尔将军的建议。他们才这样做了。

当这项使命从开始起经过约莫一年，于 12 月间得到泄气和令人沮丧的结局时，在我看来，关于使命的整个概念和马歇尔将军为此所作的英勇努力在国内尚未得到理

解，相反地却被对细节的责难、海军陆战队的存在和任务、出售剩余物资、拟议的贷款、援助国民党企图以武力打败共产党的失败等等弄得模糊不清了。我问他，如果为他准备并向他提出一份内容广泛的文件，让大家都了解过去一年我们曾试图做些什么，已做了哪些，还有哪些没做，以及为什么如此，这对他是否有帮助。他回答说，现在还不是发表这种声明的有利时机。他正在逐渐形成自己的想法。月底他把想法告诉了我们。如今我读起来就象从龙塞斯瓦列斯吹来一阵凄凉孤零的罗兰号角声①一样。他相信他在回国时，"发表一个坦率的声明"就能在很大程度上"摧毁反动势力，使民主人士来控制政府"。他还能"描述共产党歪曲和恶意宣传的情景……来削弱他们的地位，给不明真相的人一点指导。……幸而，各方可以几乎自动地继续找司徒雷登博士，他的重要性与日俱增。……我很清楚，我的作用要马上消失。……现在有必要让中国人自己来做那些我努力促使他们做的事情了，但是我相信，我能运用我所说的方法来加强较善良的人士的地位和影响。"

正象文森特给我的短笺中所评论的那样，不管是关于将军的声明的效果，还是关于司徒雷登大使未来的作用，将军的估计都错了。文森特写道，"我有一点深信不疑，即随着马歇尔将军的回国，我们就应当退出谈判工作，看看中国人是否能在没有'中间人'参与的情况下较融洽地聚集一起……〔他们〕可能会怀着比较认真的目的

① 据传说，罗兰是查理曼大帝(742?—814)手下的大将，战死于龙塞斯瓦列斯。死前曾吹号角求援。——译者

尽力使他们自己聚首一堂，举行谈判。”文森特也错了。我现在相信，中国的各派并不打算或者希望进行谈判。我把电报和评论转请贝尔纳斯国务卿来回答，作为后方指挥所，我的作用变得实在太难以发挥了。

国务卿复电说，他和总统完全赞同将军拟议的方针。至于司徒雷登的调解，要等马歇尔将军回来后再作决定。他最后说，“总统讲自从你上次同他谈话后，已有六个月了，倘若你能尽早回来磋商有关中国和其他事项，他将很感激。”

接替詹姆斯·戴维斯上校工作的联络官马歇尔·卡特上校发出自己的电报，通知将军说，按照总统的意思，国务卿回电中所说的其他事项，指的是“总统先前曾跟你讨论过的计划”。将军回答说，他充分理解。“如果他仍然希望那样办，我的回答是肯定的。至于我个人的反应，那是另一回事。”

最 后 一 幕

当贝尔纳斯国务卿在纽约出席了一系列联合国和外长会议回到华盛顿时，他已经差不多连续在外六个月了。谣传说他已辞职，不久就要离开国务院。自从总统在夏季对我讲到艾森豪威尔将军的使命及其结果以来，我们谁也没对谁提起过这件事，但我从马歇尔将军的电报中得悉他希望在1月份回来，然后接管国务院。在亨利·华莱士9月演讲引起危机后，总统和贝尔纳斯国务卿相互谈了些什么——如果谈过什么的话，我不了解。贝尔纳

斯先生是这样记着的:"在我回到华盛顿几天后(大概在1946年12月12日外长会议在纽约市休会后的几天),我去拜访杜鲁门总统,提醒他,4月份给他的辞呈在这些条约完成后该生效了。任务已完成,我希望他能放我走。他说,他希望我把那件事忘掉吧!在非常友好的交谈中,他说出了他认为我应该留任的一些理由。"

当贝尔纳斯国务卿坚持其辞职要求时,总统建议马歇尔将军作为他的继任者,但要求贝尔纳斯先生推迟几星期宣布此项变动,让马歇尔将军有个安静的短期休息。1946年12月16日和1947年1月7日往来的信件由于1月7日的泄露而公开了。可是国务院里却没有人知道。最后,在1月7日晚上,贝尔纳斯先生和我偕同我们的夫人在白宫出席某次招待会时相见了。当我们从南门走上楼梯时,传闻如燎原烈火一般冲着我们而来:"马歇尔将军要当国务卿了"。贝尔纳斯先生丢开我们,奔跑上楼。当我们一步步上去,看见总统和杜鲁门夫人接待客人时,国务卿已和他们在一起了,他容光焕发,同宾主谈笑风生。此后他从未把谈话内容对我讲过。整个插曲成了颇为不愉快的回忆。

三星期后,马歇尔将军上任了。

六 杜鲁门主义

援助希腊和土耳其的决定

希腊的局势，在1946年12月底已不妙，到1947年1、2月间，就更加迅速恶化了。我们在希腊的三个侦察员——麦克维大使、经济使团负责人保罗·波特以及马克·埃思里奇，后者一直向贝尔纳斯先生报告巴尔干的局势——都发回了日益令人惊慌的报告说，由于在外国支援和指挥下的游击队活动的加剧、经济混乱以及希腊政府在解决危机问题上的无能，崩溃已迫在眉睫。麦克维报告了英国军队即将撤退的传说；驻伦敦公使沃尔德马·高尔曼报告说，英国内阁已开会讨论了希腊问题，并准备要求美国援助。一切迹象都说明，共产党即将采取行动接管这个国家，这一点，洛伊·亨德森在一份题为《危机和日益逼近的崩溃的可能性》的备忘录中论述过，我已把它上报给马歇尔将军。备忘录极力主张，只有一个全国性的联合政府以及大量的援助才能拯救希腊。将军在第二天——1947年2月21日，星期五——动身去普林斯顿大学参加该校二百周年校庆活动发表讲话之前，指示我就提供经济和军事援助作好必要的准备。

将军刚走不久，英国大使的私人秘书就急切地问我，

他的上司能否会见国务卿，以递交"一份蓝皮书"，这是英国政府发来的正式的重要函电的代称。英弗查佩尔勋爵接到指示，必须将此信亲自递交给马歇尔将军。大使和我是密友，他告诉我，信中有关于英国对希腊的援助出现了危机的重要情报。我解释说，除非他到普林斯顿或北卡罗来纳州去，否则他在星期一早晨以前无法找到马歇尔将军；我说，如果真的找到了，将军还是要把这个信件交给我处理的；我还说，如果他能先派他的一等秘书送一份副本来，然后再在星期一向马歇尔将军递交正式信件，那么，他就在形式上和内容上完全准确地执行了上级的命令。他同意了。

亨德森不久就收到了两个而不是一个文件，内容都是令人震惊的：英国对希腊和土耳其的援助将在六星期后结束。亨德森和希克森把这两个文件送到了我这里。文件是简短的，但再清楚不过了。一个文件描述了希腊的经济和军队的情况，这些我们都是知道的。文件估计希腊当前的外汇需要在二亿四千万到二亿八千万美元之间，此外，在今后几年还需要大量的钱。另一个文件报告说，土耳其比较强一些，但是它既要装备和维持一支足以对抗俄国压力的现代化的大型军队，又得注意本国的经济建设，而后者是自凯末尔·阿塔图尔克时代以来一直都予以最优先考虑的，因而在财政上仍然无力兼顾。英国已不再有能力对两国中的任何一国提供大量援助，英国政府衷心希望我们能挑起它在希腊和土耳其的担子。

我指示亨德森和希克森，在当天晚上把欧洲和近东司的人员召集拢来，并布置了在第二天提出初步报告的

任务。报告内容包括：(1)美国代表所目睹的事实；(2)目前可动用的经费和人员；(3)所需的经费和人员；(4)一个独立的希腊和独立的土耳其对西欧所具有的意义。他们两人第二天还应该同海军作战部副部长福雷斯特·谢尔曼海军上将及陆军计划和作战部部长劳里斯·诺斯塔德将军进行讨论，使作战部长们能向海军部长和陆军部长汇报军事援助所需物品和可动用的供应物资情况，为星期一早上两位部长与国务卿的会谈作好准备。然后，我用电话向总统和马歇尔将军解释了所发生的事情和已采取的措施，并请他们作进一步的指示，他们没有作什么指示。

星期六，各个工作小组的报告，不断地送到了我这里。这些报告经过研究和讨论之后，又退回原处作进一步发挥并充实更多的证明材料。星期日，这些报告送到了我在乔治城的寓所，作最后审阅。报告准备得很好。亨德森问我，我们到底是拟定有关作出决定的文件呢，还是拟订有关执行决定的文件。我说是后者，在这种情况下只能有一个决定，于是我们就为我们的敌人的混乱而干了一两杯马提尼鸡尾酒。

马歇尔将军发现，清晨，在环境变得嘈杂之前几小时，是他工作效率最高的时候。然后，他审阅马歇尔(帕特)·卡特上校替他安排好的文件，并给我批注一些简短的指示。2月24日，星期一那天，虽然我来得很早，可是他已经阅毕英国政府的照会以及我们为他在十点钟跟英弗查佩尔勋爵会晤所准备的备忘录。象往常一样，他调查了解了要点，他想知道，我们对希腊和土耳其财政上虚弱的事实是否有把握；能把英国军队挽留在希腊多久；什

么军队会来取代他们；我们是怎样建议在希腊成立一个有效的政府组织的；按照我们的估计，将需要多少开支以及将持续多久？不采取行动的后果是十分清楚的，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我是有把握的，对其他问题，我的回答只能是不肯定的，要看进一步的工作而定。结束时，将军要我继续对这件事负起主要责任。过一个多星期，他就要到莫斯科去出席外长会议，有许多准备工作要做。指挥的连贯性是十分重要的，他将尽他的一切可能使我们的工作开展起来。

与英弗查佩尔勋爵的会谈是简短的，我没有参加。会谈完成了它的主要任务，那就是使大使相信，将军了解局势及其重要意义。后来，将军前往出席白宫的一次内阁午宴，饭后，他留下同总统、陆、海军部长、谢尔曼海军上将和诺斯塔德将军进行讨论。讨论结束后，陆、海军部长和军官们同亨德森、希克森和我在我的办公室里又进行了讨论。我们一致同意：总统和他的主要顾问看来都已经相信，增强希腊和土耳其的力量以达到维护两国民族独立的目的，对于美国的安全来说是十分重要的；只有美国才能做到这一点；国会的拨款和授权是必要的；国务院将会同陆海军草拟向总统提出的具体建议。在马歇尔将军的同意下，亨德森和他的部下就同我一起投入了起草建议的工作。

第二天，在国务卿和陆、海军的两位部长一致赞同下，总统批准了采取行动的文件。这就通过总统的决定改变了我们议而不决的状态。总统在第二天组织了一个会议来开始十分重要的下一步工作，即同现在由反对党

控制的立法机构进行磋商。实际的计划工作仅仅进展到作出一项决议的地步，这项决议规定要尽快地送出由目前的立法当局所准许的款项和设备；在提供军事援助时，优先考虑希腊；以及立即了解我们能指望英国提供哪些军事援助？这种援助能持续多久？艾森豪威尔将军发表了五角大楼的一项建议，希望能够把支援其他需要支援的国家的款项也包括进我们的要求，但这项建议被拒绝了，因为我们所要处理的事情早已多于现有的时间所能允许我们做的事。

第二天早上，当我们在白宫集合，同我们的国会领袖开始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知道我们之间将有一场最后的决战。我们面对的是“国会的领袖们”——多数党和少数党的所有权势人物都来了，唯有塔夫脱参议员没来。这是一个无意的遗漏，范登堡参议员迅速促请总统注意这一点。

我的那位杰出的上司，十分反常和不愉快，他的开场白讲得非常糟糕。我在绝望之中，轻声向他耳语要求发言，这是我的关键时刻。一个星期以来我一直在促进这个时刻的到来。这些议员们对于向他们提出挑战的东西毫无所知，我的任务就是要他们深切感觉到这种挑战。我的两位上司一样心神不宁，他们都答应让我发言。我迫切感到现在这个问题的担子全部落到了我一个人身上，从来也没有在这样一种感觉下讲过话。我没有什么时间来作有分寸的估计了。我说，在过去的十八个月中，苏联对海峡、对伊朗以及希腊北部的压力，使巴尔干诸国到了这样一个地步，即苏联十分可能的突破一旦得逞，三大洲

都将容易遭到苏联的渗透。就象一个烂苹果传布细菌给整桶苹果一样，希腊的变质会感染伊朗及其以东的所有国家。它还会通过小亚细亚和埃及把传染病带给非洲，以及通过早已受到西欧最强大的国内共产党威胁的意大利和法国带到欧洲。苏联正在以最小的代价进行着历史上最大的一次赌博，它不需要盘盘皆赢，甚至赢一、两次就可获得巨大的收益。我们，而且只有我们才有能力去粉碎这个把戏。这些就是英国撤离东地中海所提供给一个又急切、又残忍的对手的赌注。

接下去出现长时间的沉默，然后，阿瑟·范登堡严肃地说道："总统先生，如果你能向国会和全国人民讲一讲这件事，我就支持你。而且，我相信大多数议员也都会这样做。"会上没有人再发言就散会了。一星期之后将继续召开一次扩大会议来讨论一个更为详细的行动计划。

总 统 咨 文

关于我们在东地中海承担责任问题，经总统以及行政和立法方面的领导人原则上同意后，我们即着手制订具体的行动计划，并向国会和全国人民说明。公共事务处处长法朗赛·罗索将负责向公众发布新闻的工作，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其他任务还有待统筹安排。我想，对危机的全部情况及其重要性，凡有关者都应该了解，所以，我把他们召集拢来，谈了我对议员们所说的话以及他们的反应，并传达了总统和国务卿关于采取紧急行动的命令以及马歇尔将军有关他本人的很了不起的指示。3月5

日，马歇尔将赴莫斯科。他到达那里时也将是我们的全部计划公布的时候。他指示我，要我们全力以赴地行动，不要管他，也不要管他在莫斯科的会谈，因为，事态的发展已使这些变得无关紧要了。首要的事情是要保全希腊和土耳其所处的重要地位。

由负责人亨德森（希克森为其助手）任命的若干小组，负责起草法案，组织和招募去希腊进行控制和领导的文职人员小组，同五角大楼一起成立军训和顾问团，订购物资和武器以及安排运输。总统咨文由约瑟夫·琼斯替白宫起草。人人都知道，这是国务院为把事情办好的最后一次充分机会。我本人担负起向报界介绍情况的工作。2月27日晚，我向经常采访国务院的二十名记者作了一次谈话，这次谈话是不供报纸发表的，讲得十分坦率。

次日，当我见到英弗查佩尔勋爵时，我试图使英国的立场变得灵活一点。就我们这么一个大的国家来说，要远离自己的海岸去承担一项新的重任，我们的行动是快得令人难以置信了。英国人限定的日期太仓促，太武断，特别是在撤军期限上。我对他引用了美国海军修建营人员的一句座右铭："困难的事马上办，办不到的事暂缓办。"伦敦同意驻军时间可稍加延长，对希腊军队也可再提供一点现款，如果我们的援助去得及时的话。

在此期间，希腊好象是个危急病例单上的半昏迷病人，他的亲人和大夫们一直在研究能否把他救活。现在，总算可以听到他的音讯了。3月3日，在好友的扶持和引导下，希腊政府用其虚弱无力的手，写出了希望获得财

政、经济、军事和行政援助的要求。这在前面已谈了。所有这些情况，包括约瑟夫·琼斯交给总统顾问克拉克·克利福德的一篇致国会的咨文草稿，我们都告知了在莫斯科的马歇尔。将军对这篇咨文表示赞同。

象所有总统的咨文一样，这篇咨文在政府内部也引起了争论。乔治·凯南认为咨文太强硬，因为文中的调子同我对立法小组所说的一样；他担心会惹起苏联的侵略行动。克拉克·克利福德则觉得太软弱，补充了一些我认为不明智的内容。我利用马歇尔将军的崇高威望，使克拉克收回了他要补充的东西，并推荐这篇已经将军赞同的咨文。总统和墨西哥总统会晤并在得克萨斯州发表了一篇演说之后回来，在3月7日会见了我。由于断定别无他法，只能干下去，并且意识到这还仅是个开端，他批准向希腊援助二亿五千万美元和向土耳其援助一亿五千万美元的请求，并批准致国会的那篇咨文。然后，我们进入密议室，总统摊出了得到内阁一致拥护的整个计划。他吩咐3月10日同国会领袖们会晤，并视会见的结果如何，于3月12日由总统出席国会会议。我回到国务院时气都有点喘不过来了。杜鲁门总统作出决定后，行动得很快。

尽管阿瑟·范登堡先前已作过保证，3月10日在总统办公室参加会晤的大批参众议员们的反应，仍然是冷淡和默不作声的。上三个星期里，国会对欧洲的态度一直是一种简直没有抑制的怀疑。大多数国会议员是在开展了节约计划和反对杜鲁门总统的政策的运动后当选的。2月21日，英国照会交给我的那一天，总统在未得知这

些照会的情况下，已要求国会拨出三亿五千万美元的救济款项，从而引起了共和党和民主党队伍的分裂。更加造成混乱的是，前总统胡佛访欧洲调查粮食状况归来，要国会“停下来、看一看、听一听”以后再提出救济计划。他报告说，欧洲濒临饥饿的边缘。他估计欧洲的需要为十亿美元，并提出了相当不现实的建议，要英国和我们在贷款的基础上平均地提供经费。这时候，报纸报道了关于英国照会的消息。国会于是将此事完全搁下，等了解了更多的情况后再议，但在此之前国会的民主党人会议召集了一次漫长而秘密的会议，(关于这一会议报刊上已有充分报道）告诫政府不要支持英国在地中海的政策或希腊的君主制。3月4日，参议院表决通过，把总统下一个财政年度的预算削减四十五亿美元。众议院先前已投票通过削减六十亿美元。最后参议员塔夫特表示反对总统关于延长战时权力法和选征兵役法的要求。

我们和跟我们共负管理国家大事责任的立法领袖会谈的情况就是如此。会谈并没有使这种情况发生什么重大变化。总统就事论事地讲了采取行动的必要，以及采取行动的方案，不时要我提供具体情况。范登堡坚持己见，要总统向国会介绍危机的全部背景。其他人说话不多，没有作出什么许诺。两天后，内阁全体成员前往众议院会议厅听总统发表咨文。总统谈到了希腊和土耳其遭受的军事压力和政治压力，以及这两个国家的困难状况，谈到了这两个国家如果垮掉，对我们和自由世界将会造成的后果，同时，还谈到缺乏其他任何方面的援助，然后，总统表示：

我认为，美国的政策必须支持那些自由国家人民抵抗武装的少数人或外来压力的奴役阴谋。

我认为，我们必须协助自由国家人民按照他们自己的方式来奋力挽救自己的命运。

我认为，我们的帮助应该主要是通过经济和财政援助来提供，因为这对经济稳定和井然有序的政治进程是必不可少的。

世界既非静止，现状也不是神圣不可改变的。但是，我们不能容许违反联合国宪章，用强制等手段或政治渗透等花招去改变现状。在帮助自由、独立的国家保持自己的自由的进程中，美国将使联合国宪章的原则付诸实现。……

如果我们未能在目前这一关系重大的时刻去援助希腊和土耳其，则不论对西方还是东方说来，影响都将是深远的。

我们必须立即采取坚决行动。

为此，我要求国会在到1948年6月30日止的期间授权以四亿美元支援希腊和土耳其。在请求拨出这些款项时，我还考虑了从我最近要求国会授权作为防止受战争破坏国家发生饥饿和痛苦之用的三亿五千万美元中，向希腊提供最大数额的救济援助。除经费以外，应希腊和土耳其的请求，我还要求国会授权选派文职人员和军事人员前往这两个国家帮助他们建设，并监督那些可能提供的财政和物资援助的使用情况。我建议，还要授权对挑选出来的希腊和土耳其人员进行训练。

最后，我要求国会授权，以使可能批准的援助基金能最迅速和最有效地用于所需的商品、物资和装备方面。

总统讲完后，到会的两党议员一致起立欢呼鼓掌。与其说这是表明对他的政策的一致同意，倒不如说是对他的勇气表示敬意。正如我打电报给在莫斯科的马歇尔将军所说，国会对咨文的反应并不反对，但认为“确实显示

了国会在面临困难局面时不可避免的痛苦和烦恼”。在“援助希腊和土耳其法案”提交总统批准之前，国会还得经过两个多月临产前的阵痛。

范登堡和立法

在这一提案成为法律的过程中，阿瑟·范登堡所起的作用是重要无比的。他生来能够使不情愿的反对派去支持他认为是符合国家利益的政府提案。一位领袖应该走在其追随者的前面，但又不能走得太前，以致脱离同他们的接触。同时，如果他对自己小小的手腕信得过的话，则于事更为有益。范登堡的手腕之一，就是公开提出自己转而支持某一提案，表明自己态度的变化。这是一种政治上的化体。其方法是，先让公众怀疑一个阶段；然后，在提案中找出一个较小的缺陷，进行突然袭击，大做文章，到了适当的时刻，再提议修改，通称范登堡修正案；他的手法历来如此。此时，只有到了这个时候，提案才能当作大家应该接受的正确学说交给追随者。我们看到，他同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打交道时是如此；如今对于希土问题提案也是如此；以后对待马歇尔计划还会这样办。这种手腕的力量在于，他对自己所走的每一步都具有真正的信心。他不是在要花招。相反，他是个先知，向那些庸庸碌碌的统治者指出他们行为上的错误和精神上的缺点。

发表咨文后的几天里，参议员范登堡找到了引起争论的问题，虽然问题不是他发现的。报刊和许多团体指责我们“绕过了联合国”。沃尔特·李普曼那位报界具有

矛盾心理的耶利米[1]虽然也曾鼓吹采取援助希、土的单方面行动，还是令人痛苦地找出了我们的毛病，即：根本没有征求联合国的意见，而这本来是应该做的。我们必须作"充分解释，并表示愿意考虑各种反对意见"，以弥补罪过。这个幸运的过错是我犯的。总统已向联合国表示了起码的敬意，但是因为时间太仓促，没有劝总统诉诸联合国，做那劳而无功的事情，因为苏联会否决这一行动，而且在任何情况下，联合国的援助总是来自美国。所以，总统没有那样去做。如果我们当初这样做了，范登堡的任务就只会更加艰巨。范登堡在其个人记录中写道，我们犯了一个"无视联合国的大错"。他建议改正错误，然后再笨手笨脚地去干。

和杰洛克先生[2]的狐狸一样，我一个劲地呼喊"我有罪！"表示愿意补过。但这位参议员却愿自己来补过并作出修正。办法有两个：第一，由参议员范登堡和康纳利为法案起草几段开场白，说明希腊和土耳其是按照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的建议向美国和联合王国要求援助的，开场白接着说，联合国已看到了希腊北部边界问题的严重性，"如果紧急情况能对付过去"，则可"对这方面的问题负起全部责任"。但是，联合国"目前不可能对希、土提供急需的财政和经济援助，即那种有助于联合国全体成员国的自由和独立的援助。"第二，范登堡对法案的第五节提出了一个奇妙的修正：要总统撤回一切援助，如果

① 《圣经》中人物。公元前六、七世纪时希伯来悲观主义预言者。——译者

② 杰洛克系英国十九世纪小说家罗伯特·史密斯·瑟蒂斯（1805—1864）小说中的主人翁之一，性喜打猎。——译者

“代表大多数人民”的希、土两国中间的任一国政府请求这样做的话，或者如果总统认为援助的任务已由别的任何国际组织完成，或任务无法完成，或者当安理会（美国放弃否决权）或联合国大会认为联合国的行动已使该项援助不再必要的话。

这些修正当然都是装璜门面的。在伦敦、巴黎和莫斯科看来，谅必不是愚蠢也是玩世不恭的，或两者兼而有之。但是，这是博得范登堡帮忙的低廉代价，也得到了我们驻联合国代表沃伦·奥斯汀的热烈欢迎。奥斯汀是斯退丁纽斯的后任，以前当过参议员，在玩立法游戏上可以象范登堡一样地假正经。修正案说服了大多数的怀疑者。但是，还有些人是持反对态度的，参议员塔夫脱、科罗拉多州的民主党参议员埃得温·约翰逊和佛罗里达州的民主党参议员克劳德·佩珀等认为，总统的提议把我们推上通往帝国主义、势力范围和战争的道路，一些人说是“火药味太重了”（这是某些专栏作家和民意测验者爱用的字眼），这些反对意见立即引来了亨利·华莱士及其极左和极右追随者看上去是好意实则具有毁灭性的行动。当华莱士在英国建立了一个攻击政府的海外基地之后，公众对这些观点的不信任感加深了。葛罗米柯在莫斯科也加入了这一攻击行列。我们有这样的敌手真是幸运。3 月 23 日，纽约州州长托马斯·杜威站了出来，我们的朋友队伍大大地加强了。

在支持这一政策的力量日益增长中，参众两院从 3 月中旬起同时开始举行听证会，会议一直进行到参议院委员会在 4 月 23 日一致提出关于议案的报告时为止。众

议院委员会，除了威斯康星州的众议员劳伦斯·史密斯表示不同意见之外，在4月25日也提出了自己议案的报告。这些听证会增加了自2月底以来落在我身上的沉重负担。希腊和土耳其以外的世界不是静止的，马歇尔将军需要我们不断为他参加的莫斯科会谈提供材料，但正如可以预料到的那样，会谈情况不佳。对于民选的小自耕农党政府的被撵下台，我们向莫斯科和布达佩斯的斯维里道夫将军提出了抗议，然而这是白费气力。在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国家审讯正在进行。在美国国内，好心但缺乏判断力的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官员盖尔·沙利文，向对方共和党地位相当的官员建议，国会两院外交委员会的两党领袖们批准政府援助希、土提案的目的和方法。过了很多天，鸽棚经历这一蠢行后总算安静下来。最后，参议院的共和党议员要求我们对提案及其含意所提出的一百一十个问题立即作出答复。我们照办了。

在两个委员会召开的秘密和公开听证会上，都由我打头阵。我是到会的常客。矛头主要指向我的那些问题，都是由总统咨文中的概述部分所引起的。这一部分是应参议员范登堡的多次请求而作的，范登堡认为，这两个小国的问题要放在苏联和我们之间更大的对峙背景下来看待。这些问题被盘问者弄得尖锐起来了，他们往往喜欢把概述部分推论到人们称之为“枯燥的逻辑极端”，使作证者难堪。是否在任何可以设想的情况下，我们会在一切国家提倡采取这种做法吗？显然不是，我们在几乎贴邻的匈牙利做法就不一样，因为情况，特别是对采取有效行动来说，完全不同了。中国问题专家，尤其是出名的明

尼苏达州的众议员周以德，逼着我回答我们在中国该怎么办。在根本不同的情况下，我们正在做大量工作，他认为做得不够。参议员康纳利，这位在一场人人可以发言的辩论中的好朋友出来帮忙，他总结了情况：

参议员康纳利：这又不是成衣店里的一个式样，可以对世界上每一个人和每一个国家都通用，因为没有两个国家的情况是完全相同的，难道不正是这样吗？

艾奇逊先生：对，正是这样。当然啰，是否有请求，得看将来的情况，但正如你所讲的，不论什么样的请求，都得根据具体情况来判断。

令人厌倦的几个星期终于结束了。情况表明，并非没有收获。关于援助希腊和土耳其的这一法案，在众议院以二百八十七票对一百零七票，在参议院以六十七票对二十三票获得通过。5月22日总统签署了这一法案。

国务院随即开始十分有效地执行这一法案。这些事大都由别人去搞了，我对付的却是即将席卷整个欧洲的又一个朦胧可见和更具有威胁性的危机。

七　危机在扩展：马歇尔计划的产生

最初的激动

记得当国务院、陆军部和海军部为总统准备关于希腊和土耳其的材料时，艾森豪威尔将军曾建议在致国会的请求拨款书内应包括支援其他正在抵抗共产主义渗透的国家的经费。我们担心增加申请项目会使请求拨款书遭到麻烦和耽误。其他国家的需要虽然重要，但是希腊如得不到援助，只要几个星期就会崩溃。可是到3月5日事情就很清楚了：我们得在这三个部门中着手研究这项建议，并准备好在知道实际情况后立即提出一个庞大得多的欧洲计划。因此，我写信给陆军部长和海军部长说：国务院、陆军部、海军部协调委员会主席、助理国务卿希尔德林将领导这一委员会，在财政部帮助下研究援助问题；并促请部长们要推动自己部门的人员进行研究。他们这么做了。这三个部门的工作由国务院的情报和研究司司长威廉·A·埃迪上校、陆军部的乔治·A·（阿布）·林肯准将和海军部的E·T·伍尔德里奇海军少将进行汇总。他们工作得很迅速。

我写这两封信的那天，我的同事威尔·克莱顿在去欧洲之前因病飞往土桑作一次短暂休息的途中，写了一

份同样主题的紧急备忘录。他写道，他为世界局势以及这种局势对我国的影响深感不安。只有毫不迟疑地维护美国的领导地位，才能在今后十年里防止战争。在东半球的每一个国家和西半球的有些国家里，各种有组织的运动正在不断地破坏着国家的完整和独立。他写道："在饥饿，经济上的贫困和失望的助虐下，这些袭击已经在一些获得了自由的国家里产生作用。"迅速而有效地援助受到严重威胁的国家，对我们自己的安全来说是必不可少的。总统和国务卿必须把每天通过电报不断传来的事实告诉全国人民，以使全国人民受到震动并意识到自己安全蒙受的危险。他鼓吹建立一个由主要阁员和议员组成的国防会议和一笔五十亿美元的应急基金。

在国会山露面、同总统会面、讨论无数有关组织工作、人事、调动和日常工作问题的间隙中，我鼓励并打扰了那些正在收集各种情况的人。马歇尔将军希望以明白易懂的形式说明这种情况，以便可以详细了解所应根除的祸患的性质、发生场所和规模。他的电报表明莫斯科和欧洲都已充分认识到危险局势，也表明对于莫斯科愿意进行合作来减轻危险局势是不抱什么希望的。

我在密西西比的演说

这时总统的干预使我个人卷入了更大的危机。4月7日，他说要请我帮个忙，他特别希望我能够答应。不久前，他同两位亲密的朋友密西西比州格林维尔的威廉·T·温夫妇约定，他将于五月八日在附近的克利夫兰市

一个镇上的州立德尔塔师范学院内举行的德尔塔市政会议的一次集会上发表演说。在这前一天的下午，他还要出席格林维尔市的一个节日招待会。这是早已约定了的；温夫妇费了不少心血，一心盼着这一天的到来，当他们知道总统打算不出席时，他们受到的打击太大了。可是，密西西比州参议员西奥多·比尔博的不治之症和突然爆发的关于继任问题的激烈斗争，使总统极难到这一州来出席这次活动。如果总统能指定我（在马歇尔将军外出的情况下）作一次"重要的外交政策"演说，那么温夫妇就可以原谅他。

我当然同意，并说：我已考虑好一篇非常需要发表的演说，但是必须经过极为仔细的斟酌。我们不能草率开场。我们随时向总统汇报国务卿所认为的在欧洲和在莫斯科日益阴暗的前景。他知道威尔·克莱顿的意见和我要求国务院、陆军部、海军部委员会着手研究的工作。我们不能再延误对这一形势的注意了。即使国会通过那三亿五千万美元的救济法案，也是少得可怜。到本财政年度结束时，除了希腊和土耳其外，我们已没有可以拨给欧洲的款项。情况发展得太快，我们的准备工作跟不上。我所要做的不是提出一项解决办法或计划，而是说明问题和事实。这样做，正如克莱顿指出的，将会震动全国，包括政府和国会，使他们面对一场正在日益发展的危机。总统同意这么做吗？同意由我来做吗？我自告奋勇，而且时间很短。如果德尔塔市政会议需要"重要的外交政策"演说，我这里就有一篇。

总统对两个问题的回答都是肯定的。但是我记起了

亨利·华莱士，并想，在取得同意到正式发表演说这段时间内，必须同总统和国务卿进行更多的商谈。可是，飞快发展的局势，以及从欧洲回来的马歇尔将军和威尔·克莱顿两人的态度，使人们毋庸置疑：这个令人震惊的问题等我们一准备好就必须立即提出。约瑟夫·琼斯和弗朗西斯·拉塞尔被指定代我准备演说词，大体内容我已对他们谈过，他们有权得到研究这一问题的任何人的帮助。当马歇尔将军4月28日从莫斯科回来时，委员会的工作已经完成得很好了。国务院一摊人和国务院、陆军部、海军部一摊人都提出了充满骇人听闻事实的报告——后者的报告长达九十三页。将军自己也带回一大堆坏消息。他只能报告他同苏联的讨论没有取得任何进展。至于欧洲，他通过广播电台向全国人民报告说：

"……我们面临着一些急待解决的问题，它关系到穷困和受苦的欧洲人民的生存，他们急需得到医疗、煤、食物和大部分生活必需品，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对造成这种悲惨局面的德国抱有强烈的恶感……

……欧洲的恢复比预期的要慢得多。力量的分散已开始明显。病人气息奄奄，而医生们却在慢吞吞地讨论……不能等到经过从长计议而取得妥协后再采取行动。"

他立即要政策计划司人员就处理已掌握的情况提出行动建议。他们差不多只是重复说：危机紧迫而严重，需要火速采取行动。直到一个月后，当克莱顿带着那份在飞机上写的备忘录从欧洲回来时，马歇尔计划的一个具

体轮廓才准备就绪。

与此同时，我自己的演说词，总统准备把它称做“马歇尔计划的序幕”的一篇陈述问题的演说词，也已准备就绪。4月23日写出了初稿。5月1日，我的助手们和我出席了同一群妇女选举人联盟的干事举行的午餐会，会议内容不公开发表，在那里我为发表这篇演说作了一次“预演”，看看它的效果如何。我们认为是妥当的。这篇演说词于6日就完成了。

在维克斯堡以南的密西西比河流域，有一个地区是南部各州中最富饶、最繁荣的农业区之一。驱车穿过这里，呈现在我眼前的是：没膝地站在茂盛牧草丛中的乳牛和适应炎热气候的新种菜牛；为避免种植单一棉花作物而为新的农作物留出的田地；美丽如画但摇摇欲坠的小屋正为整洁的、有着很好篱笆的农场和色彩鲜艳的住宅所代替。这个地区就叫德尔塔。德尔塔市政会议每年一次在克利夫兰师范学院绿树成荫的草坪上召开会议，他们带着家属和亲戚，讨论他们本区关心的事情和问题，听取他们的产品历来所行销的巨大世界的情况。那些最直接有关的人们在学院的大体育馆里听演说。更为众多的人在周围草坪上听转播，一面吃夹肉面包，喝汽水，照看着睡觉的孩子们。这场面又悠闲，又温厚，随随便便，完全是美国式的——这对郑重其事的外交演说所通常要求的环境来说，差距是太大了；但是体育馆里的人们是严肃的。

离开华盛顿之前，我按通常的做法，同三位英国记者共进午餐。他们是英国广播公司的伦纳德·米亚尔，《每

日电讯报》的马尔科姆·马格里奇和《每日快报》的雷内麦科尔。我向他们发表非正式的谈话，说明我将要做什么，为什么我要这么做和有着怎样的权威。欧洲有点怀疑，欧洲东南部斗争的军事和政治方面是否使美国看不到西欧的崩溃已成燃眉之急。最重要的是，被亨利·华莱士的游说弄乱了的欧洲舆论，在这一点上应当得到矫正；而开始矫正的最佳地点莫过于伦敦。而且，我对于一名副国务卿的言论对美国报刊和公众可能产生的影响并不存幻想。不论这篇演说可能产生怎样的直接效果，但如果会由于国外评论的一次回波而有所加强，那也是无害的。

演说的要点可概括如下：

欧洲和亚洲正处在完全精疲力尽和经济混乱的状态，这是由于：(1)“战时双方都进行了有计划的、科学的破坏……”；(2)德国和日本这两个欧洲和亚洲最大的工厂还没有开始进行重建；(3)最近两年的可怕的冬季遇到了空前未有的自然灾害。

计算的结果，全世界在1947年需要并应从唯一的来源美国得到一百六十亿美元的出口物资（四倍于我国战前的出口），而作为偿付，能供美国进口的物资只有这个数额的一半。这笔赤字将以我们给的贷款、赠与以及受灾国剩余的财政储备来弥补。这样一来这些国家仍然要破产和一筹莫展。这些对付赤字的办法过了本年度就不能再采用。因此我们必须尽可能多地增加进口，以弥合这个差距，并找到为该计划提供资金的新方法。

演说继续谈到，在考虑如何着手做这件事时，我们必须强烈地意识到生活中的另外一些事实。我们不可能大

量增加出口，因为国内也迫切需要货物。因此我们的出口必须有选择地供给与我们和我们的目的特别有关的地区。

我们的目标不是救济，而是恢复农业、工业和贸易，使受灾国能够自立。与我们直接有关的国家是自由世界的国家。如果德国和日本不能发挥强大的生产性作用，欧洲和亚洲的自由地区就不可能出现生机勃勃、健康活泼的局面。马歇尔将军在莫斯科待了几个星期以后得出结论：欧洲的恢复不能等待“经过从长计议而取得的妥协”，必须继续前进，无需四国取得一致意见。

我说，最后的结论是不可避免的：国会需要提供新的资金，其金额和提供办法都应大于目前的授权范围，也需要赋与新的权力，以分配货物和提供可能出现供不应求的运输工具。最后时间不多了：

非但是人类和国家，而且连人类的尊严，人类的自由，以及民主制度，都存在于狭窄的经济界限之内。

我们今天的外交政策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运用我们的经济和财政力量来加宽这些界限。如果我们要维护我们自己的自由和我们自己的民主制度，这样做是必要的。为了我们国家的安全，这样做是必要的。这也是我们作为人类的一种义务和特权。

当时我并未想到，我在密西西比州克利夫兰市的号角调子，会是发动美国人民去从事历史上最伟大、最光荣的冒险活动之一的战斗号召。一个月以后，马歇尔将军在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吹起了那个号角。如果说这是唤醒

美国人民去承担作出决定那天的任务的起床号，恐怕也并不过分。无论如何，这号角并不是含糊不清的。它在大西洋两边激起了大量的议论，多数议论是鼓励人们准备投入战斗的。可是也引起一个人的不安。我一直小心翼翼，避免说明涉及的总金额。人们可从我的讲话中自行作出判断，但是我对于金额、持续时间和具体地区故意不说明白。可是别人不这么沉默。亨利·华莱士、哈罗德·史塔生以及本·科恩，在旧金山的一次演说中讲到了庞大的金额。这引起了阿瑟·范登堡的不安。他把自己的担心通知马歇尔将军。将军邀请他和我到宾夕法尼亚大街旧国务院对面布莱尔大厦隐蔽的处所去作一次私下的、非常秘密的谈话。在那里，我们躲开了爱追根究底的记者、电话和干练的秘书，进行了一场长时间的、有益的谈话。

范登堡象他对待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以及援助希腊、土耳其的建议一样，一开始就大惊小怪。我们要做什么？连艾尔本·巴克利也谈论起给世界上每个国家以财政援助来了，这一切准备怎样收场？马歇尔将军让他连珠炮似地说了几分钟，发泄一下他的气，然后告诉这一位参议员：政府无意在本届国会要求更多的经费。如果他必须改变主意，那也只是到下届国会才会要求很小一笔金额。范登堡明显地缓和下来了。将军继续说：与此同时，我们还要同国会领袖们、随后同一些公共团体交谈我们调查的情况和问题。形势要求在我国人民所曾经对付的最大问题之一面前，全国取得广泛的一致意见。现在与以往任何时候都不同，全国的团结在这总统选举年有

赖于实行一项真正的非党派性的政策。没有人敢预言，谁来实行一种商定的政策——范登堡仍然希望他也许就是其人。国家本身的安全是最高的考虑。在会见的最后，意见是消除了，于是着手寻求范登堡式的方案。这个方案在约莫一个月以后提出。

我不想详细探索哈佛大学演说的由来。这件事已由约瑟夫·琼斯很好地完成了，在福雷斯特·波格所作的令人钦佩的马歇尔将军传中还将作进一步的研究。这里稍提几件往事，就已足够了。

克莱顿的第二份备忘录

第一件事是谈谈我的同事威尔·克莱顿的第二份备忘录，这份备忘录是在他从日内瓦乘飞机回来时写的，内容对马歇尔将军的思想和他草拟的建议起了重大的影响。我收到第二份备忘录是在5月27日，并立即送给将军。克莱顿一开始先讲："现在已很明显：我们大大地低估了战争给欧洲经济造成的破坏"，这是本书的主题之一。我们能看到物质的破坏，但是希特勒在五年中把欧洲改造成一架战争机器所引起的经济上的大崩溃以及政治、社会和心理上的破坏的后果，我们却完全视而不见。

备忘录继续写道：欧洲每况愈下。"政治形势反映着经济形势。……千百万城市人民正在逐渐挨饿。"法国粮食播种面积比战前减少百分之二十五，而且粮食还在喂牲口。货币贬值，农民无物可买。为了维持这种还够不上最低的生活水平，光是联合王国、法国、意大利以及德

国的美英区这四处，本年度国际收支赤字就达五十亿美元。

克莱顿写道：在欧洲恢复自己的海运和生产以前，欧洲要活下去，必须每年获得二十五亿美元的煤、麦子和船只运输。更多的研究已无必要。事实已为人所共知。问题是调整我们的财政工作和我们自己的消费，以使我们可以从自己巨大的生产中调拨出足够的物资。这件事必须用税收来支付，“而不能用增加债务的办法”。

据备忘录说，欧洲要从我国得到“每年六十亿到七十亿美元的赠与物资和劳务，为期三年，……主要是煤、食品、棉花、烟叶、海运”，这些大部分是剩余物资。有了这项援助，世界银行就能使欧洲的重建得以进行。（这样估计这家银行和基金的作用以及援助的内容，结果证明是不现实和错误的。）

这三年物资的提供应根据“一项由联合王国、法国和意大利为首的一些主要欧洲国家制订的欧洲计划”。（克莱顿也建议成立一个欧洲经济同盟，他在这方面比罗马条约早了几乎十年。）

其他国家可以援助一些剩余食品和原料，克莱顿最后说，“但是我们必须避免成为另一个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美国必须主持这一业务。”

当克莱顿把这份备忘录送到我处时，他要求安排一次同将军的会见来讨论一下。我安排在第二天，并把这份备忘录给将军过目。这时，马歇尔将军要凯南写的一份研究报告送到了。这份材料比克莱顿的一份写得更为谨慎，论述得更多的是困难和危险——这是确实存在

的——而不是采取行动的迫切性。研究报告同意欧洲各国必须提出一项复兴计划；但是指出：根据苏联目前的心情，这将是一项十分困难的工作。5月28日我们会面时，这两份文件都放在我们面前。

威尔·克莱顿是我所听到过的最有影响、最有说服力的鼓动家之一。他所以具备这两种品质是由于他对问题的深入了解和他对自己论点的深信不疑。他在会面时所说的内容，对他的文件主要补充了一些具体的材料，说明由于欧洲工业城市和生产粮食的农村之间相互关系的破坏，使欧洲非常复杂的工业城市急速瓦解。千百万人民很快就会死亡。要组织为防止这场灾难所需要的巨大努力固然需要时日，但是必须在此时此地就开始。当然，计划应该是欧洲的计划，并且来自——或者无论如何表面上应该是来自——欧洲。但是美国必须主持这项业务。而且必须现在就开始主持。

在这主要的一点上没有争论。将军说，"袖手旁观"是愚蠢的。他主要关心的是：我们可能作出的任何建议是向全欧洲，还是只向西欧提出。我们——克莱顿、科恩、凯南、波伦和我自己——一致认为美国不应承担分裂欧洲的责任。我指出，为避免俄国从中作梗，我们在制定欧洲计划时根本毋需征得它的同意；对取得国会支持来说最要命的倒可能是俄国的支持以及如亨利·华莱士所一直鼓吹的俄国必须获得百分之五十的好处的要求。凯南建议说，我们不妨彬彬有礼地把苏联当作象我们自己一样的原料捐赠国来对待。这个问题没有结论。将军严厉地告诫不要把谈话情况泄露出去。只要一暗示又需要

请求巨大的经费，就会立即引起有害的行动；最初如何提出这个问题的方式必须仔细斟酌。今天回过头来看，他当初使我们也没有什么机密可以泄漏的。

几小时以后，他对国会反应的担心得到了证实。少数党的秘书莱斯利·比弗尔邀请我到他的办公室去同大约十二位参议员共进午餐。就如我在给马歇尔将军的备忘录中所报告的，在那里的一场谈话使我确信：在最近将来同国会进行一些讨论是必要的。在康涅狄格州的布里恩·麦克马洪带头下，他们坚决认为，他们应该知道政府考虑的是什么，或者至少我们观察到的问题是什么。如果我们企图把一件既成事实放在他们面前，他们就将拒绝就无偿援助或信贷进行表决。他们催促我去同少数党民主党的政策委员会谈——如果这么做了，那会是一个致命的错误。我确信，将军很快就会开始谈论这些问题的极端严重性，并且随后，在提出任何解决办法以前，将发表一篇有关这些问题的演说。

马歇尔将军在哈佛大学的演说

第二天，他对我讲到哈佛大学邀请他去接受名誉学位，这件事已拖了很久了，他说他大概会被要求作一次简短的演说，并且问我，如果谈一下欧洲的事，这个时机是否合适。我劝他不要利用这个机会，因为学位授与仪式上的演说是例行的事情，人们不会认真对待。他不顾劝阻，接受了邀请，并同意发表演说。请波伦根据凯南和克莱顿写的备忘录起草。几天以后，克莱顿和我看到草稿，

提出了我们自己的意见，以后的事就没听说了。显然，这篇演说最困难的部分是将向谁提出建议和内容是什么。将军是否同总统讨论过这篇演说，如果讨论过，他们谈了些什么，我都不知道。很难相信他们没有讨论过。国务卿出去发表一篇如此重要的演说，只根据一份不完全的讲稿，而且始终不把定稿告诉国务院，这也会使许多人感到惊奇。我到了几乎最后一刻才通过电话从马歇尔·卡特上校处打听到。在马歇尔将军于6月5日下午开始演说以前不太久，我们才把供发表的新闻稿准备就绪，但是他知道：人们对他那天讲演的注意，并不会由于宣传方法的不同而受影响。

演说很简短，在申述符合于他的地位的目标和建议时，完全是才气横溢。演说的一半多一点，略多于一印刷页，是说明欧洲的状况及其起因。这些内容直接来自克莱顿的两份备忘录。

演说中说明目的的部分，是企图说服国内外批评杜鲁门主义的人士，这些人不赞成杜鲁门主义，强调在战略上和意识形态上同苏联对抗。他在这样讲的时候使人毫不怀疑，他除了真正理解问题之所在以外还有坚毅的决心去解决问题。这一个和音由三个音符组成：

(1) 我们的政策不是针对任何国家和主义，而是把矛头指向饥饿、贫困、绝望和混乱。其宗旨应当是恢复世界上有效的经济工作，以造成使自由制度得以存在的政治和社会条件。

(2) 我确信，这样的援助不应该随种种危机的发展零敲碎打地进行。本政府将来可能提供的任何援助，与其说是治标的，

不如说是治本的。

(3) 凡是乐意帮助复兴工作的政府，我深信，必将得到美国政府方面的充分合作。凡是图谋阻碍其他国家复兴的政府，不可能指望得到我们的帮助。而且，企图使人类永久受苦难以便从中得到政治或其他方面好处的政府、政党或团体，将会遭到美国的反对。

如果马歇尔将军相信——我断定他是不相信的——美国人民会被同"饥饿、贫困、绝望和混乱"作斗争这样一个柏拉图式的目的所打动，而去从事象他预期的那种巨大的事业，那他就想错了。但是，他把这说成美国政府的目的，却是完全正确的。关于马歇尔计划，我所发表过的演说和回答过的问题，也许比任何人都不会少，可能唯一的例外是保罗·霍夫曼；市民也好，国会议员也好，归根到底总是希望弄清楚，马歇尔援助是如何发挥作用，以遏制苏联势力扩张和阻止接受共产主义经济和政治的组织和联盟的。报纸的专栏作家和电台时事评论员可以象无声电影放映机一般玩弄无生气的字眼和概念，但是他们的大多数同胞是不会被打动的。

马歇尔将军讲话的天才突出地表现在对这一"建议"的提法。它包括六个句子，其中只有一句是关于我国可以做些什么的：

已经很明显，在美国政府能够继续做更多工作来改善局势和帮助欧洲世界走上复兴之路以前，欧洲国家之间必须就形势的需要和那些国家自己能担当的任务达成某种协议，以便使本政府所可能采取的任何行动产生适当的效果。

由本政府单方面着手起草一份旨在使欧洲经济上自立的计划，是既不妥当，也不会有效的。

这是欧洲人的事。

我认为，第一步必须来自欧洲。

这一计划应该是一些欧洲国家，如果不是全部国家，所同意的共同计划。

我国的任务应该是作为朋友帮助拟订一项欧洲计划，以及以后在对我们来说是切实可行的范围内支持这样一个计划。

确实，没有一个通情达理的人会反对这样一个建议：如果欧洲人，全体或者部分，能够就他们应采取什么措施来摆脱上述的可怕局势以及打算如何行动的计划取得一致意见，那么我们就会研究他们的计划，考虑我们在实际上可以提供哪些援助。然而很有可能的是，一个富于想像力的欧洲人，有了这样的开头，就能大有可为。我确信，至少应该让人家有一个机会。我抓住我的三位英国朋友米亚尔、麦科尔和马格里奇（一个月以前我曾经同他们一起讨论过我在德尔塔市政会议上演说的目的），向他们解释了哈佛大学演说的全部含意，并请他们用电报或电话发回这篇演说的全文，让他们的编辑送一份抄本给欧内斯特·贝文，同时附去我对这篇演说的重要性的估价。他们这么做了，而米亚尔则从华盛顿向英国广播这则消息。

贝文敏捷地抓住了马歇尔将军提供给他的机会。几年以后，贝文告诉我：当时的英国外交部常务次官威廉·斯特兰读到这篇演说后，曾建议通过英国驻华盛顿大使馆探询国务卿究竟是什么意思。贝文先生否决了这个建议。他说他不想打听马歇尔将军的想法，他讲的话对贝

文来说完全足够了。他立刻同法国外交部长乔治·皮杜尔联系。两星期后，他们在巴黎会见莫洛托夫，讨论欧洲人怎样才能拟出一个欧洲复兴计划、计划所需要的帮助，以及欧洲人在这项计划里可以起的作用。三方面的谈判很快就告吹了。我曾描写过当时的场面，那是贝文告诉我的："莫洛托夫的前额上好象有一个肿块，在情绪紧张时，会变得高起来。在争论中，莫洛托夫逐点提出的一些疑问和异议是比较小的，这时递给了他一份电报。他的脸色发青了，前额上的肿块就高了起来。随后，他的态度变了，他变得更加生硬得多。……我猜想，莫洛托夫当时必然认为发给他的指示是愚蠢的；无论如何，俄国人的退出使工作简单多了。"

第二天，7月3日，贝文和皮杜尔发出一份联合公报，邀请另外二十二个欧洲国家派代表到巴黎去商量一项复兴计划。（捷克斯洛伐克最初同意出席，在哥特瓦尔德总理和可怜的外交部长简·马萨里克访问莫斯科以后，又撤回了他们的承诺。）马歇尔将军的判断又一次走运了，从面产生了预期的结果。

我在这个新国务院大楼中充当副国务卿的任期届满以前，还得对马歇尔计划再作出一个正式的贡献。虽然国会议员们当时已得到保证，不会向他们提出某种突如其来和意想不到的重大要求，他们仍然越来越确信：到时候就会向他们提出一项很可观的要求，如果欧洲人完成自身方面的工作的话。他们怎样才能参与准备一些预防措施呢？阿瑟·范登堡开始摸索一个方法。马歇尔将军在哈佛大学演说中曾提出，我国的部分任务可以是"作为

朋友帮助拟订一项欧洲计划”。6 月 14 日，威廉·怀特在《纽约时报》上报道了范登堡的主意：在最高一级建立一个非党派的委员会，就如何协调我国的资源和国外的需要提出谘询意见。我担心会出现一个象当时由参众两院以及总统任命、负责行政改革的胡佛委员会那样的三方畸形组织。我以为最要紧的是总统同国会领袖们协商以后先下手为强，尽快地由他自己挑选成员任命一个委员会。我请马歇尔将军竭力劝说总统这样去做。总统照办了。在一小时内我会得到一份代表美国社会各阶层的委员会委员初步名单。

在同克莱顿、哈里曼——当时的商务部长，我们的委员会的未来主席——和国务院的一些人协商以后，我们很快就商量出一个由杰出的、知识渊博的人组成而又有代表性的委员会。6 月 22 日下午，包括新闻发布在内的一切工作都为总统准备就绪，我们在白宫二楼总统的书房里会见了一个非党派小组，他们包括参议员范登堡、康纳利、怀特和巴克利、国务卿马歇尔，副国务卿斯奈德，农业部长克林顿·安德森和内政部长朱利叶斯·克鲁格。我担任会议记录。

总统把这个建议完全归功于范登堡，然后宣读了委员会成员名单和他们的资格（都是给人以深刻印象的），征求在座人员的意见。范登堡提出威斯康星州的前参议员小罗伯特·拉福莱特，总统就把他添在名单上。停了一回以后，总统吩咐我出去，向新闻记者们发布委员会和全体委员的任命。这个小组随后继续讨论成立第二个小组来帮助克鲁格部长研究象煤和钢这种国内外都生产的

原料的可获得量以及基本生产潜力，以及成立以经济顾问委员会的埃德温·诺斯担任主席的第三个小组来研究这一援外数量对美国经济所产生的影响。到会议结束时，哈里曼委员会已经成立了。

八 摆在我们面前的世界

1949年1月21日，即杜鲁门总统就职的第二天，我宣誓就任美国的第五十二个国务卿。首席法官文森在总统办公室主持这个宣誓仪式。和总统及文生一起致我以两党支持的祝福的有参、众两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和少数党领袖，参议员康纳利和范登堡以及众议员布卢姆和伊顿。总统还体贴地邀请他和我两家人，以及最高法院、内阁、国会和国务院大批友人。一想到当时仍在医院的马歇尔将军，不禁使我想起另一位伟大的前任史汀生上校经常引用的《列王纪上》的一句话："才顶盔贯甲的，休要象摘盔卸甲的那样夸口。"[①] 我怀着这种思想来到国务院，坐在马歇尔将军坐过的那张椅子里。

世界的状况

我虽然从来没有同世界事务完全脱离接触，但是，在我又重新同它密切接触时，我却惊奇地发现1949年的世界同我在1945年大战结束后两年内和它打交道的那个世界已经发生了许多变化，有少数几个地方变化很大，许多地方变化不多。那时随便你看什么地方，都可以看到，

① 《旧约·列王纪上》第二十章第十一节。——译者

社会、经济和政治所遗留下来的仅有的一点稳定性也似乎都要消失了。另一个世界超级大国，似乎显然认为混乱是走向共产主义的准备阶段，而决心要把这一进程向前推进。当我回到国务院的时候，大部分地区的环境已是显得更加阴郁，或者是阴郁得依然如故，但是，至少有一个地区即西欧，马歇尔计划已经带来了现代史上无与伦比的一线复兴的曙光。经过全面考察之后，我们将回到这个或那个已经发生很大变化的地区。

在亚洲，要在蒋介石的国民党和毛泽东的共产党合并的基础上恢复中国的社会和国家的努力已告失败，蒋正处于垮台的最后阶段。我刚好就职时他就垮在我的头上。在朝鲜，我们对于联合国可能促使苏美两国的军队从那个分裂的国家撤出并随后实现朝鲜的统一，也是前途无望的。华盛顿和麦克阿瑟将军一致认为，占领日本的价值正在急剧减低，但是，还没有一个人敢去抓缔结和约这项艰巨的工作——缔结什么样的和约以及怎样才能缔结。在印度支那和印度尼西亚，无论是法国或荷兰都无力进行它们的殖民统治了。两国都抵制我们为推动它们走向独立所作出的种种努力。法国人打到最后；荷兰人在压力下投降了。在这两种情况下，独立都将带来接近于灾难的后果。我们曾以相当良好的准备和健全的财政来促使菲律宾进入独立的国家生活，但是，管理不当和贪污腐化，却很可能正在使我们的努力成为泡影。英国在印度和巴基斯坦结束统治，固然消除了一个问题，但是，却在极度贫困中的印度人与穆斯林之间留下了久远的敌对状态。

英国人正处于麻烦中，而且看来还要在伊朗和埃及更惹到麻烦；法国人则已在印度支那和北非切断静脉，正在流血而死。至于非洲其它地方的前途，仍是模糊不清。

在美国人特别感到烦恼的那个地区，即我们的"睦邻政策"，也存在着一大堆伤脑筋的问题。在这里，西班牙—印第安文化——或者缺少这种文化——多少世纪以来积下了很多问题。激增的人口、停滞的经济、古老的社会、原始的政治、普遍的愚昧、文盲和贫穷——所有这些，大大促成了许多地方性的危机，而且往往会汇合成为全洲性危机。除此以外，还有一个因素。整个大陆正象需要控制人口一样，也需要外国投资，这在拉丁美洲引起了一种互相矛盾的反应。一方面，它有希望摆脱许多世纪以来的劳役偿债制；另一方面，它威胁着美国的开采事业（特别在采掘工业方面）并巩固自哥伦布和征服者时代起就统治拉丁美洲的一小撮反动统治阶级的国内统治。

阿拉伯—以色列僵局

我在1947年到1948年不在政府供职期间，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在中东发生过多次的对抗。我们在1947年6月中旬把这个问题搁下了，因为我的副国务卿任期就要届满，而贝文则要求联合国大会召开一次特别会议，接受英国放弃对巴勒斯坦的委任统治，并为那个地区的未来政府作准备。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之间的战斗变得遍及巴勒斯坦全境了。当委员会在进行讨论、表决、报告的时候，混乱益发增长。大家一致同意，委任统治应于两年内结

束，在此期间，英国应当维持秩序。多数赞成分治；少数赞成建立联邦国家。阿拉伯的代表退出了联合国会场。1947年12月3日，英国人宣布他们将负责到下年5月15日为止。5月14日，以色列共和国在巴勒斯坦宣告成立；同一天，杜鲁门总统根据事实予以承认，同时，他在联合国的代表菲利普·杰塞普博士奉命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言支持临时托管制度。

1948年5月20日，瑞典的福克·伯纳多特伯爵被任命为联合国调停人。他维持了一种令人担忧的休战状态，直至他在9月间被暗杀为止。几天之后，公布了他的报告，这个报告建议修改1947年11月29日的联合国决议。1948年12月，战争再次爆发。在此期间，以色列军队一举进入埃及的领土，直到代理调停人拉尔夫·本奇在1月初获致停火，并在罗得岛召集各方谈判。以色列人坚持强硬的立场，他们的对手已遭到军事上失败和政治上分裂的打击。

在这种形势下，在我就职的十天前，贝文通过英国大使奥利弗·弗兰克斯同代理国务卿洛维特接触，谋求英美在巴勒斯坦问题上采取共同立场，或者，说得比较现实一点，通过美国的协助，使他得以摆脱因英国同埃及和约旦所订的条约所加的束缚。由于以色列人一直打到内格夫，阿拉伯人紧急请求会见贝文，要求英国军队守住亚喀巴，并用英国军火加强约旦的阿拉伯军团。我就在这个时候，参加进来了。我同贝文一起力图协调巴勒斯坦问题所带来的种种痛苦，至今记忆犹新。这一次，他甚至比过去更为激动。后来多次不断地涉及这样一些问

题，如确定边界，承认以色列，以色列撤出军事占领地区，以及难民问题。

洛维特对英国人的立场作了精辟的分析，这个分析说服了总统。实际上，英国人曾经提出撤销以色列占领区，使以色列被一连串通过外援（也给以色列这种外援）而联合起来的阿拉伯弱小国家所包围，而其全部后果将由英美协定加以节制和约束。洛维特坚称这不是一个解决办法，因为中东和美国都不会接受这个办法，而且等于不断招致苏联在这一地区进行阴谋活动和干涉。虽然美国强烈支持任何切实可行的步骤，把争端限制在以前的委任统治地区范围内，但是，无论是英美的联合倡议，还是由联合国发起、在不受大国干预的情况下经中立国家集团提出的解决办法，都可悲地失败了。现在，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也许已经从战斗中取得教训而清醒过来，从而试图在拉尔夫·本奇的老练指导下取得一项通过谈判的解决办法。洛维特的看法是，这不应当受到英美干涉的损害。

在洛维特—弗兰克斯会谈后几天，我从洛维特那里接过了国务院的指挥大权，也接过了他对以色列—阿拉伯局势的估计。当本奇博士的谈判露出一线希望时，我们给予他们以相机行事的权力和衷心的支持。他们失败后，我在下一个场合即联合国巴勒斯坦调停委员会中推行了同样的政策，作出了同样的努力。这也失败了。以后将要提到，在整个 1949 年和 1950 年，国务院为改善这一问题而在各方面所作出的种种努力，要求我花费时间和注意力。不幸的是，我们的努力没有取得任何成果或

带来任何希望。在我的任期内，冲突虽然平息下来了，但是，后来又重新爆发。我不想回顾，也不想将冗长的失败记录来打扰读者。因此，对于在阿以冲突方面所花费的时间和努力，这一问题固有的种种困难(诸如在这些荒漠的土地上为大量日益增长的人口供应必需品)，以及难以处理的敌对态度和情绪等等，本书均不予以详述。

美国对德国的政策

欧洲的情况可以说是很独特的，那里的前景并不是全面的恶化和黯淡，而是希望与担忧的因素都在增长。经过四年的意义愈来愈深长的努力，已使西欧开始出现复兴的端倪；但是，与此同时，苏联对东欧加强了控制，产生了进一步西进的危险行动，其中最为不祥的就是封锁柏林。

自从1945年4月参谋长联席会议给艾森豪威尔将军和他在美国占领区军政府的代表卢修斯·克莱少将的指令（参长联第一〇六七号）规定了严厉的占领政策以来，美国的设想在这四年中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这个三位一体的文件是把国务院、国防部和财政部(摩根索计划）三方面的设想勉强凑合起来的产物。它的基本目标是：(1)使德国人认识到他们不能逃避他们自己所造成的苦难；(2)必须坚定地、断然地阻止同占领区人民的一切往来；(3)通过肃清纳粹主义和军国主义，逮捕和惩办战争罪犯，控制德国发动战争的能力，以及准备最终建立民主政府等措施，使德国永远不能成为和平的威胁；(4)强迫赔款和赔偿，遣返战俘；(5)管制德国经济，以实现这些

目标，并防止任何超过邻国的较高生活水平。从一开始，克莱将军和他的组织就认为参长联第一〇六七号指令是行不通的。

斯大林对西方采取攻势—表明波茨坦计划的失败，贝尔纳斯国务卿也就有了这种看法。贝尔纳斯国务卿1946年9月6日在斯图加特的演说，标志着早期政策的重大转变。他说，不应当让德国变成经济上的贫民收容所，我们宁愿支持经济上的统一，并在适当的防卫措施下，给予整个德国的德国人以“处理他们自己事务的主要责任。”后来，在贝尔纳斯和贝文于12月间宣布英美两个占领区在经济上合并时，又把这些设想再推动了一下。“两区合并”在1947年5月29日实施，当时，在波恩也建立了新的行政机构，让德国人在双占区的管制机构下处理他们自己的经济问题。法国人出于一种不合作的情绪，暂时拒不将他们的占领区同别的占领区合并。

在美国，我在1947年5月8日发表了我在密西西比州克利夫兰的演说，指出那年全世界需要美国的商品将达一百六十亿美元，其中半数还看不到任何的支付手段，我还说：“在当前形势下，我们必须做的第四件事是推进欧洲和亚洲两大工场——德国和日本——的重建工作，这两个洲的最后复兴基本上将有赖于此。”6月5日，马歇尔将军在哈佛大学发表演说。在一个月内，华盛顿发出了一个更为宽大的新指令（1947年7月11日，参长联第一七七九号），旨在使德国在尽可能早的时间内在经济上达到自给自足。8月间英美签订一项两区合并的协定，准许德国的工业生产按1936年的速率，比现在增长三分之

一。法国看到了我们对从前的敌人采取了新政策，便在8月末审慎地表示愿意把它的占领区并入其他两个占领区。到了11月，在外长理事会的伦敦会议上，三个盟国终于能够结成一条坚强的阵线来对付俄国人了。

德国的危机

从那时起，事态向着危机迅速发展。当国会辩论欧洲复兴计划的时候，苏联加快了它把欧洲分裂成为敌对阵营的行动。由于1948年2月的共产党政变，捷克斯洛伐克加入了苏联卫星国的行列。3月17日，西欧盟国签订了布鲁塞尔防务公约。三天后，苏联代表退出了柏林的盟国管制委员会。4月1日，苏联当局对西方占领区与柏林之间盟国的(但不是德国的)铁路和公路交通施加限制。盟国以实行"有限空运"作为回答，这项空运此时只限于供应它们在柏林的军队。

与此同时，六国谈判集团(三个占领西德国家的政府和比、荷、卢三个国家的政府)共同起草计划，以加强德国对抗俄国日益增长的压力。3月末，在1948年援外法案成为法律时，为了将三个占领区的经济协作，同欧洲复兴计划联系起来，并为最适合于最后德国统一的联邦形式的政府的原则性协议，提出了初步建议。6月，伦敦宣布了一些最后建议，包括关于西德的政治机构，这种机构体现了对"占领和管制的最低要求。"为了使法国人放心，还规定了管制鲁尔和继续保存盟国的最高占领权力。

封锁柏林

这些建议和急需对西德进行币制改革（虽然当时还不是对柏林，因为柏林仍然被认为是受四国管制的），触发了同苏联在德国问题上的最后破裂。1948年6月的日程表显示了这一急转直下的进程。

6月7日	公布伦敦建议。
6月11日	苏联断绝柏林与西方之间的铁路交通两天。
6月12日	苏联以需要"修理"为由，断绝一座公路桥梁的交通。
6月16日	苏联代表退出四国在柏林的军事管制机构。
6月18日	西方国家宣布西德币制改革。
6月23日	苏联下令在东德和整个柏林实施自己的货币制度。 西方国家把西德的币制改革扩大到西柏林。
6月24日	苏联对柏林进行全面封锁。 西方国家断绝从联合占领区到苏占区的货运。

在经过了一段困难和紧张的时期后（克莱将军的沉着的决定使我们自己的政府坚定起来，并团结了我们的盟国），西方国家着手加强空运，加强它们对苏联的反措施，并在联合国的巴黎会议上展开宣传战，这些都证明不能改善局势。与此同时，苏联当局虽然在言词上咄咄逼人，

却小心翼翼地避免具体地干扰空运。联合空运从 1948 年 6月和 7 月的七万吨，增加到 1949 年 5 月的二十五万吨。

克莱将军和他的政治顾问罗伯特·墨菲大使当时认为并且建议，我们应该通知苏联当局，我们将在某一特定日期"开进一支武装护运队，配备有工程器材，以克服苏联代表似乎无法解决的技术困难。……在我〔克莱〕看来，这样一支护运队遇到武力干预继而发展成为战争的可能性是很小的。我深信它能进入柏林，公路封锁也将告终。……我始终认为护运队是能够到达柏林的"。据说总统曾经讲过，如果参谋长联席会议书面批准这一建议的话，他也将批准。但是，无论参谋长联席会议、国务卿或者英国和法国的政府都不会批准这一建议。克莱将军对陆上武装护运队不致受到阻拦的信念，不是基于俄国人不能阻拦它，而是基于他们不会阻拦它。墨菲写道，"但是，国家安全委员会不象我们那样相信俄国人是在虚张声势。"虽然克莱并没有说俄国人是在虚张声势，但是，他相信"这样一支护运队遇到武力干预，继而发展成为战争的可能性是很小的。"据说，杜鲁门总统问过他，如果我们试图使用公路武装护运队，"将会冒"怎样的"风险"，得到的答复是："他认为俄国人的最初反应将是设置路障。如果没有俄国人的干涉，我们的工程人员是能够清除这些障碍的。但是，克莱将军认为，俄国人可能采取的下一个步骤，将是用军队来对付护运队。"的确，1948 年 4 月，克莱将军对俄国人禁止盟国军用火车在未经俄国人检查的情况下驶入柏林的那个命令进行试验时，他得到了一次很有启发的经验。他告诉我们，"火车驶进了苏占区一段

路后，终于被电动转辙器从主线转到了支线，在那里停了几天，最后有点不光彩地撤出了。俄国人显然是认真的。”（着重点是原有的）“如果没有俄国人的干涉”，火车司机是能够用转辙器排除障碍的。但是，由于俄国人是“认真的”，就发生了干涉。于是，问题将是谁会打第一枪和如果开枪了应该做出什么反应来。4月间，克莱将军并不想找出问题的答案，我认为这是明智的。

由于有同不止一位总统商讨过进出柏林问题的经验，我觉得，把我们的行动立足于虚张声势，或者认为俄国人是在虚张声势，决不是明智的。哪一方都不希望被错误的估计驱向全面的战争或屈辱。因此，如果有可能避免的话，最初的行动都不应该是含糊的，或者是轻率的，无论采取一场小规模的地面试探，或是一场大规模的地面试探，都不应该这样。因此，虽然我在1948年只是一个观察家，但是，我觉得，空运的选择是正确的。它明白无误地表明了我们坚持权利的毫不动摇的意向，同时给予俄国人在要么不加干涉要么发动一场空中袭击两者间进行选择的机会，而后者可能给他们带来一种毁灭性的反应。象墨菲所说的使用空运的决定“是放弃我们在柏林辛苦争得的权利”，我认为这种说法是愚蠢的。这不啻是说，听到一个武装匪盗的命令而举起手来，是放弃你辛苦争得的放下手来的权利。人们重新获得这种权利，正如我们重新获得了并且现在正享有进入柏林的辛苦争得的权利一样。

九 一个多事的春天

期 望

杜鲁门总统第一届任期的最后一年和他在第二届任期开始时的就职演说，对我着手要做的工作似乎提供了非常清楚的线索。洛维特先生和参议员范登堡一起对美国外交政策的重大改革已经作出了一个极好的开端。但是，比范登堡决议案所引起的改革甚至更为重要的是1948年2月的布拉格共产党政变。这一事件使欧洲日益紧张的局势达到了顶点，突出了欧洲的不安全。在前一时期由于修复了物质上的损坏和补充存货而带来第一次经济高涨之后，没有比在恢复经济中稍为停顿一下更能清楚地显示这一事件的影响了。要到安全感有可能使资本回流时，才能指望经济获得真正的发展。这就是推动范登堡决议案的一种动力，它在1948年6月11日以六十四票对四票得到通过。决议案通知总统说，参议院意识到美国政府应当从事于：

按照〔联合国〕宪章的目的、原则和规定，为了单独的和集体的自卫，逐步缔结地区性和其他集体性的协定。

美国根据宪法程序参加的这种地区性和其他集体性的协

定，这种协定是以持续而有效的自助和互相支援为基础，而且也关系到美国国家的安全的。

总统在就职演说中对他的外交政策规定了四点主要指导方针。他认为头两点——支持联合国和继续实行恢复经济的政策——是他第一届任期主要政绩的延续。第三点——加强自由国家的力量以抵抗侵略——则是根据范登堡决议案所作出的政治革新。他说，这一点可以明白解释为“旨在加强北大西洋地区安全的联合协定”和“明白无误地证明自由国家决定联合抵抗来自任何方面的武装进攻”。

就职演说中提出的第四点是“着手推行一项大胆的新计划，利用我们的科学发展和工业的进展来改进和发展不发达地区。”后面两点虽然不是什么新东西，却需要开辟许多新事业。我满怀希望地着手进行这两点计划。1月21日，我要求助理国务卿威拉德·索普对这个“大胆的新计划”负责主要的指导和组织工作，同时要求约翰·希克森和罗伯特·洛维特向我汇报有关条约的进行情况。新条约将比新计划进行得快得多。

第四点计划

国务院在领会第四点的重要意义和使这一计划见诸行动上是相当缓慢的。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技术援助，有一个时期是西半球睦邻政策的一个特征。把它解释为全球范围的概念，是由当时的总统顾问克拉克·克利福德

首创的。他把这一点包含在他所起草的总统就职演说中，并交给代理国务卿罗伯特·洛维特和政策设计办公室的保罗·尼采。他们对他这点建议的功用既不热心，也没有什么感受。尽管如此，它仍被放进了就职演说中，后来成为议论纷纷的话题。

总统在提出他的第四点时所用的语言，往往把它同救济和长期开发的想法结合在一起。他谈到全世界有半数以上的人遭受着食不果腹，疾病缠身，过着原始落后和停滞不前的经济生活，同时"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拥有解除这些人所受的痛苦的知识和技术。"美国在工业和科学技术方面的成就远远超过其他各国。虽然我们能够提供的援外物质是有限的，但是，我们的技术知识资源却是用之不尽的。他说，我们应当把我们的技术知识提供给其他国家使用。在需要开发的地区，我们也应鼓励投资。

我们的目的是帮助世界各国的自由人民通过自己的努力生产更多的粮食、衣服、住房和动力，以减轻他们的负担；方法是"邀请其他国家……通过联合国……取得工商业、私人资本、农业和劳工的合作，把他们的技术资源一起投入……这种合作的事业。"但是，"为在国外追求利润而进行剥削的……老帝国主义——与民主的公平交易的概念毫无共同之处。"在这一事业中，我们的同盟者将是"千百万如饥如渴地寻求正义的人"。

不幸的是，就职演说中的这种夸张说法超过了预算的规定。报纸上的推测助长了不发达国家的期望。贬低这项计划这个不愉快的任务落到了助理国务卿索普的身上。1949年2月25日，他在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上说明了我们准备资助的计划方案。听众对他的发言普遍感到的失望和抱怨，都由黎巴嫩的查尔斯·马利克博士表达出来了。他说，穷国所缺少的不是技术而是资金。他要求发达国家组织大规模的政府间的“马歇尔计划”。在这一点上，马利克博士错了。马歇尔计划之所以取得成功，是因为它应用于世界上最发达的社会，它们能够充分利用所得到的资金，而且也确实这样做了。

在二十年后的今天，从许多国家对不发达国家花了总额达数十亿美元的直接和间接援助所获得的经验来看，这样的评价是正确的：即在具备技术能力和管理能力之前先给予资本贷款，不但是一种浪费，而且对借款国家也是不利的，因为它欠下了外汇债务。即使是剩余粮食的赠予，也只会减少而不是发展国内的粮食生产，并且会造成资源的滥用。正如一位作者所说：“我们所获得的不管是什么成就，都表现在能使穷国增加生产方面。因此，检验我们对穷国的援助有无功效，就要看是否能使它们增加生产。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从长远看来（不是很长），可能会使它们甚至变得更穷。”

我们的技术援助计划在迟迟开始之后终于付诸实施了。1950年，在俄克拉何马农业机械学院的亨利·贝内特博士的干练指导下，有希望在更大范围内取得接近于农业技术推广局所给予美国农业的那样巨大的利益。下一年，他在伊朗因飞机失事而过早地死亡，使这种前景变得黯淡了。虽然这个计划继续做了值得赞扬的工作，但在对外援助这个家庭里，它仍然是个灰姑娘。①

加强自由国家

参议员范登堡、范登堡—洛维特—马歇尔的合作、以及这个合作的产物——范登堡决议案，使北大西洋公约的实现成为可能。常常有这样的情况：行政部门花了九牛二虎之力使一项困难的谈判取得了妥协并将达成的条约提交非常超然、对情况隔阂而又反应迟缓的参议院时，只要少数人反对就可以把行政部门达成的协定驳回。这一次，参议员范登堡对宪法条文关于“经参议院建议和同意”授予总统以缔结条约之权这一规定中的“建议”二字，采取了严肃认真的态度。由于他在谈判之前使参议院提出建议，就使参议院事先承担了同意批准条约的责任。同样重要的，他还使参议院提出了有益的建议。参议员们是提建议的丰富源泉，但是，大部分建议是没有什么价值的。要取得这样重大的成就，需要外交委员会主席认真负责的领导。一个只有小聪明，不求甚解的人是不能胜任的。这个人也许是个名角，但是，他还需要有扎实的能力、拥有实权和坚强的性格。

1948年夏天，洛维特先生会见了加拿大和布鲁塞尔条约国家的大使。他们一致认为必须把事情向前推进，并对需要承担的责任的一般性质取得一致看法。后来由于起草工作以及美国大选，讨论暂告中断。

国务院在进行条约工作的同时，还同我们的盟国对

① 西方童话中一个久受蔑视、忽逢幸运而成为王子的爱人的姑娘。——译者

加强欧洲取得了一些其他进展。一个军事援助计划将有助于增强他们的军事力量。汉弗莱委员会关于减少为赔款而拆除德国工厂(大部分拆往苏联)的报告(委员会的主席是乔治·汉弗莱，他后来担任艾森豪威尔将军的财政部长)，建议这一惩罚性的计划应同欧洲复兴计划更加协调起来。三个占领区的联合和币制改革，随着在西方占领区成立德国新政府，以及它和盟国当局之间的新关系，使德国和盟国的关系处于接近完成的一个新时代。最后，国防部门要求把处理这些关系的责任从他们自己的肩上移转给国务院。所有这些似乎都是属于我要做的工作范围。

出乎意料的封锁结束

在我们还没有开始一个有秩序的工作计划时，我们周围那个混乱和无法控制的世界，出乎意料地一下子把我们推了进去。1月间，国际新闻社(赫斯特系的一个机构)的欧洲总经理金斯伯里·史密斯给苏联外交部发送一个电报，向斯大林提出了四个问题。这是一种很平常的做法。有时候所提问题可以得到答复，如果斯大林认为这样做有好处的话；但是，更多的情况是被置之不理。但是，这次史密斯先生提出的问题，几天之内就得到答复了，于是这些答复引起了新闻界一阵哄动。这些答复发表的那一天，有一小群人在国务院同我一起对此进行了讨论，我把我们的结论向总统作了汇报。

我们认为这个插曲是莫斯科发出的一个小心谨慎的

信号。值得注意的是，在答复关于结束封锁的问题时，斯大林没有提到过去俄国人所说的封锁的理由，即西德的新币制问题。我们认为这个信号告诉我们，莫斯科愿意解除封锁，但是要有代价。如果要求我们放弃三国在德国成立联合占领区的计划，那么，代价就未免太高了。在那种情况下，他们的策略就会变成一种宣传攻势，来反对盟国在对德政策上辛苦得来的团结一致。我请求允许由我通过一次温和而轻松的记者招待会来发回信号，表示我们已经得到信息，然后用秘密探询的方式来探明莫斯科准备怎么办。总统表示同意，还同意我们的目的和行动应当严守秘密，就象他过去打算提名我担任国务卿时那样。

为了排除任何引人注目的不寻常气氛，记者招待会仍按常例在2月2日星期三举行。我讲的话虽然经过缜密考虑，却是对人为地哄抬得与其本身的重要性完全不相称的新闻噱头的一种"即席的"、耐心的分析。我说，每个有良心的人都不应当以增加或减少对和平的希望作为一种策略，来玩弄全世界渴望和平的希望。我们要抱着这样一种态度，来检查一下他所讲过的话。

对于金斯伯里·史密斯向斯大林提出的第一个问题——苏联政府是否考虑同美国政府联合声明，任何一方都无意向对方发动战争——以及斯大林答复说"苏联政府准备考虑发表这样一项声明"，我承认我感到迷惑不解。因为两国政府早已受联合国条约中相互"避免……威胁或使用武力"这一十分明白的条款所约束。斯大林肯定愿意考虑重申这一点并不是什么新闻。

史密斯问斯大林，苏联是否愿意同我们一起采取逐

步裁军的措施来贯彻这一声明时，他回答说，“当然”愿意。我说，“‘当然’”的意思是“在事物的本性上讲”，而在过去三年中，在事物的本性上讲并不是鼓励对合作抱有颇大希望的。于是我回顾了战后俄国在欧洲的阻挠行动。

史密斯先生接着问斯大林是否愿意就发表声明问题同杜鲁门总统磋商？他的答复是“……并不反对举行这样一次会见。”事实分明不是这样。我指出，总统曾经一再邀请斯大林元帅到华盛顿来，但他总不愿意来。罗斯福总统和杜鲁门总统却三次跑了半个地球去会见他。为了这样一个有限的目的值得再跑一次吗？我们已经一再说，我们不能在别人不在场的情况下，讨论他们的事情。

最后，我们谈到史密斯先生所问的唯一涉及到苏联与盟国之间的争端问题：如果在举行一次外长会议讨论整个德国问题之前，美、英、法同意不建立一个分立的西德国家，苏联愿意撤销对柏林的交通限制吗？斯大林答复说，只要盟国接受苏联对这个问题所提出的条件，并撤销它们对苏占区交通的反限制，苏联愿意这样做。

我说，斯大林所说的第二点是不成问题的，因为盟国“一直说如果苏联政府容许柏林市内外之间保持正常交通，他们的反措施当然将予撤销”。但是，重要之点是问题的提法使作出的答复不能反映事实的真相。封锁的理由是运输上的技术困难和币制改革。苏联一度提出过把推迟筹设德国政府作为解除封锁的一个条件，但是它后来又放弃这一条件了。我说，西方政府“曾经一再向苏联强

调指出，它们同西德所达成的种种协议毫不妨碍对有关整个德国的协议……〔而且〕这些纯粹是在对整个德国达成的那种协议之前的一种临时性措施。”我接着说，几个月以来“西方国家一直试图耐心地、坚持不懈地解决……苏联所提出的……作为封锁理由的各种困难，”但是苏联当局就是不愿意讨论这些问题。

随后我发出我们的信息：“苏联政府可以用各种方法来提出认真的建议……我希望你们〔新闻界〕不要见怪，如果我指出，要是我这方面企图保证要认真讨论问题的话，我宁愿选择其他渠道而不愿通过会见记者的渠道。”

这次记者招待会充分说明，一个开放社会通过新闻界来同一个封闭社会进行外交对话是有种种困难的。斯大林只消对他愿意答复的书面问题作出答复。他是不容许人家盘问的。凡是记者发回来的电讯都要经过检查。可是国务卿就得口头回答问题，还要受到口头盘问。这次的记者招待会我有双重目的：贬低斯大林的倡议，免得俄国人的态度过早地强硬起来；向俄国人发出信号，如果他想进行认真谈判，就应当利用较为私下的渠道。继续利用公开渠道将被人们解释为只不过是为了宣传的目的。当我讲完了我所要讲的话以后，精明的记者企图逼我按照他们的目的（不幸这同我的目的是不相容的）讲一讲他们想要我讲的话。他们固然可以这样做，但是，并没有成功。

他们希望知道，斯大林在答复中没有提到德国币制问题具有什么重要意义？我们当时的看法如果说出来的话，那就是认为，这件事可能具有很多的重要意义，虽然

也可能是个圈套。对这个问题，报纸可以而且也会发表他们自己的想法，但是对我来说，泄露我自己的任何想法只会有害无益。因此，我退而采取拒不作出任何猜测的做法总是对的。他们提出的第二个问题的题目带有同国务卿开玩笑的味道，他们打算哄我上当。他们问我：你对第一个问题和答复所作的评论是完全坦率的吗？美苏发表一项相互之间不打仗的联合声明不是同联合国条约有所不同吗？假定金斯伯里·史密斯向我提出这个问题，我怎么回答呢？这倒是一个很好的，但是无关紧要的试验。几年以后，我在回答一个类似问题时，我想起马里兰州东岸一位政客，他在我的伙伴的餐室里把一只烧得滚烫的烤牡蛎丢开时突然喊道："只有傻瓜才会把它吞下去！"这一次我不过是拒绝为我自己所说的话的价值作辩解而已。

杰塞普—马立克会谈

这次记者招待会后的几天，我们就接着采取行动。杰塞普大使不打电话，不打电报，也不写信，就从纽约来到华盛顿同国务院顾问查尔斯（奇普）·波伦和我当面商谈。我们得出的结论是，同俄国接触的最保密和非正式的办法最好是由驻联合国的杰塞普出面，而不必通过驻莫斯科大使馆或通过国务院同俄国大使馆联系。涉及的人数较少，而这些人——菲利普·杰塞普和苏联驻联合国大使雅科勃·马立克——可以纯粹用个人的和非官方的身份行事。所以我们大家一致认为，杰塞普下次遇见马立克时，可以作为个人好奇的问题，问他斯大林在答复

中完全没有提到币制改革是否含有重要意义。这样做的机会是在2月15日，当时他们一起进去参加安全理事会会议。马立克不知道斯大林是怎么回答的。杰塞普提出，如果马立克对这个问题有所了解的话，杰塞普倒很想知道一点。

一个月后，马立克请杰塞普到他的组约办公室去，告诉他不提币制改革并非出于偶然。他说，币制问题是重要的，但是，它可以在外长理事会上讨论。杰塞普问道，这是否意味着要在解除封锁以后呢？马立克说，过去并没有人要他问过这个问题。杰塞普对此回答说，"那么你现在为什么不就去问一问呢？"过了不到一个星期，3月21日，答复来了，说是如果能够确定外长会议的日期，封锁就可以在会议举行之前解除。现在轮到马立克来提问题了。我们会把西德政府的筹建工作推迟到会议以后吗？杰塞普根据所得的指示回答说，我们希望继续进行筹备工作，但是，既然筹备工作不可能在短期内完成，筹备工作就不是顶重要的了——也就是说，如果俄国人确实希望就举行外长会议的话。这件事又引起了一场争辩，但是，杰塞普对我们这一简单逻辑毫不动摇。

已经是到了应该把我们的进行情况通知英法两国的时候了。欧内斯特·贝文和罗贝尔·舒曼将在两星期内到华盛顿来签订北大西洋公约，并就德国问题进行重要会谈。总统一直同我们保持密切联系并对他的政府在处理专门外交策略上所显示的能力感到高兴，并授权杰塞普把他同马立克的私人秘密探索通知驻联合国的英、法同事——埃里克·贾德干爵士和让·米歇尔·亨利·肖

韦尔这两个富有经验的外交家。虽然法国外交部的不可靠一向是众所周知的，它泄密的对象总是俄国人。这一次的泄密只会使莫斯科更加相信我们是态度认真的，这已为我们的保守秘密所证明了。总统还授权我把我们试探所得的一切情况继续保持在少数人的范围内。保密是至关重要的。

同贝文和舒曼的会见

贝文和舒曼两人我过去都没有会过面，他们于3月31日到达华盛顿，待了一个星期。在这一星期中，我们开始建立了热情的友谊，这种友谊在他们两人留下的不多几年的任期里一直得到发展，而且我相信，得益于这种友谊的，远远不止是我们三个人。从来没有两个人在外貌、性情和出身方面比他们的差别更大的了。贝文矮小而结实，宽鼻子，厚嘴唇，看起来他更适合于他早年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而不适合于外交工作。他是英格兰西部一个女仆的儿子，父亲是个姓氏不详的人。他念了几年书以后，就去做卡车司机。他逐渐以劳工领袖作为生涯，后来成为劳工运动的最高领导人，在此期间，他组织了庞大的运输工人和杂务工人工会，还和其他一些人一起领导过1926年的总罢工。当丘吉尔出任任务紧迫的战时首相时，他选拔贝文参加战时内阁，担任劳工大臣的重任，因为在总罢工时期，丘吉尔从政府方面感到他具有坚韧不拔的意志。贝文从来不象他的两位后任赫伯特·莫里森和安东尼·艾登那样，成为“一个下院的人”，他在职工代表大会那种较为粗犷的气氛中更感到自在些。1945年工党执政时，

贝文希望担任财政大臣，但是，艾德礼为了合理安排人事，挑选了休·道尔顿，而把贝文安排在外交部。

从来没有一个外交大臣比他更受到经常是为数很多的下属的爱戴。贝文颇有自知之明。他能够边领导，边学习。这是训练有素的职业外交人员所最需要的品德。他很快就专心致志于自己的工作，而且看来他时常以一种使他那些前任感到惊奇的不拘形式的态度，同他们在精神上有所沟通。有一天他对我说："昨晚我读了老索尔兹伯里[1]的几篇文章。他颇有道理。"他对"老帕默斯顿[2]也经常笑嘻嘻地表示钦佩之情。从贝文写字台后面镶板上向下凝视的一张肖像，即被很多人描绘过的英王乔治三世，[3]可能并不欣赏这位外交大臣的下述见解，即如果这位国王不是那么愚蠢，美国也许不会如此强大，而且此后也不会如此有能耐，不但在大战中还在战后拯救了英国。

舒曼瘦长、曲背、秃顶、长鼻子、两眼露出受惊和胆怯的神情，常带笑容，与其说他是律师，议会议员，曾把共产党人从政府赶走的前法国总理，倒不如说他也许是个画家，音乐家或学者。他在德军占领下的梅斯长大并学习法律，是一个知识分子，对法国和德国的文学涉猎颇广。他的脾气是活泼、温和和喜欢挖苦别人；而贝文则豁达和亲切。法国外交部没有象英国外交部对贝文那样，给予舒曼以多大的支持。它被几个有力人物——埃尔韦·阿

① 罗伯特·索尔兹伯里(1830—1903)，曾任英国首相。——译者
② 亨利·帕默斯顿(1784—1865)，曾任英国首相。——译者
③ 乔治三世(1738—1820)，美国独立战争时的英国国王。——译者

尔方、莫里斯·顾夫·德姆维尔、亚历山大·帕罗迪、莫里斯·舒曼——搞得有点无所适从，同时成为战争期间和抵抗运动所遗留下来的密谋活动的习惯的牺牲者。这就使得同舒曼进行谈判要拖延时日，因为他得不断地左顾右盼，瞻前顾后，他得不断同巴黎进行联系。

在我们的会谈中，舒曼的英语知识时常使我发笑，也往往使他感到狼狈。他的英语讲得断断续续，因此他宁可讲法语而由译员翻译。但是，如果讲话的发音清楚，他是能听懂英语的。贝文的西部地方口音、莫里森的伦敦口音和安东尼·艾登的伊顿-牛津腔简直把他难倒了。可是使我发窘的是，他不但听得懂我的话，而且解释说，这是因为我讲得又慢又清楚的缘故。有一天晚上，在纽约，我们要他去看科尔·波特编写的《吻我吧，凯特》，来考验他的英语。他听得出剧情是按照《驯悍记》改编的，也很欣赏音乐，但是，当演到强盗闯入这段主旋律时，就把他弄糊涂了，这也是在意料之中的。

贝文和舒曼都持有从本世纪欧洲的悲惨经历中产生出来的坚强政治信念；他们两人都看到苏联这个国家的共产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威胁；他们两人都坚决地认为只有西欧和北美基本上联结在一起才能维持均势，从而维持和平。舒曼走得更远，由于他是法国靠近德国边界地方的人，他象林肯一样，认为在斗争之后需要和解和团结。

我对他们两人的感情都很深厚，但是，我同他们各人的关系的发展情况并不相同。不久我称贝文为“欧尼，”他则称我做“我的小伙子。”同欧尼一起生活是愉快而不

宁静的，因为他的脾气可以突然变得象夏天的一阵暴风雨，顷刻雷电交加，随后又云开日出。我对舒曼却一直称他“舒曼先生”或“主席先生”——因为总理是内阁会议的主席——同时，他对我也一直用正式的称呼。我们的任期几乎是相同的，他的任期从1948年7月开始，到1953年1月届满。贝文担任外交大臣的时间较早，但他辞职了，后来在1951年逝世。

在我任职期间，能够同引起我尊敬和倾慕的其他各国同事一起工作，这是我的幸运。他们是：英国的温斯顿·丘吉尔爵士、后来成为阿冯勋爵的安东尼·艾登，和后来成为弗兰克斯勋爵的奥利弗·弗兰克斯；法国的让·莫内；意大利的阿耳契德·德加斯佩里；荷兰的德克·斯蒂克；挪威的哈尔瓦德·兰基；德国的康拉德·阿登纳；加拿大的莱斯特·皮尔逊和休姆·朗；澳大利亚的欧文·狄克逊爵士和理查德·凯西；墨西哥的安东尼奥·埃斯皮诺萨·德洛斯·蒙特罗；巴西的瓦尔特·莫雷拉·萨莱斯；日本的吉田茂。因为进行外交工作的最好环境在于政府之间存在相互信任，所以各国政府的代表之间彼此互相尊重和友好关系对此是有重大帮助的。

1949年4月我同贝文和舒曼第一周的会谈，取得了难以比拟的成就。这次会谈公开宣布的目标是最后批准和签署北大西洋公约。我们三人还就我们政府关于结束柏林封锁的立场、就军事援助计划的实施、以及就后面将要谈到的在西方占领区建立一个德国政府和它与盟国占领当局之间关系的计划等方面取得了一致的看法。我们先同贝文和舒曼详细研究了杰塞普和马立克谈话的内

容，并且讨论了是否要把俄国人推开得更远一些，如果要这样做的话，又该怎样推开他们。我们三个人都看到这样的危险，即如果让斯大林逐渐挤了进来参加我们自己之间以及我们同占领区德国人之间关系那种尚未完成而微妙的谈判，可能会使得我们之间不和，也不能使解除封锁问题取得进展。造成不和的最大危险在于我们三国和德国人一起进行的筹备工作拖延下去。如果封锁解除，外长会议很快召开，就立刻可以看清楚俄国人是否认真在谋求一个能为三国所接受的任何关于整个德国的计划。我的看法是，即使外长会议失败，也不会再施加封锁。斯大林之所以要解除封锁，是因为他把封锁作为达到他的目的——盟国撤出柏林——的手段。这一目的已告失败，而且刺痛了他。他决不会再踏进这个陷阱。

我们一致认为杰塞普和马立克之间的探索是一种值得继续采用的最好办法，现在就应以三国外长的支持来加强杰塞普的立场。我们把一个简短的声明交给杰塞普，由他在4月5日向马立克宣读，大意是三国外长获悉，讨论的问题只有两个——同时解除封锁与反封锁，确定外长会议的日期。他们希望弄清楚这两个问题是不附带任何其他条件的。杰塞普指出，如果这一点弄清楚了，就不会产生在西方占领区筹设德国政府要“延期”的问题。马立克坚持必须把币制问题列入议程。由于这已是磋商将近一年的一个问题，杰塞普认为没有什么困难。

在马立克等候莫斯科训令的时候，我同舒曼和贝文在一起的这个星期中，出现了在对德问题上达成协议（我在后面将再谈这个问题）和签署北大西洋公约的奇迹。这

些事件给莫斯科的印象是，俄国人退出以后的西欧，在没有他们参加之下，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在法、英两国外长离开华盛顿之前，我们商定在有关封锁问题上，可以通过我们驻联合国的代表继续保持联系。

这里我要谈一个新出现的问题，这个问题最初不过巴掌一样大小，但却注定要发展的：这就是我们美、法、英三个占领国之间的会议引起了我们其他一些盟国的不安甚至妒忌。我们有他们所没有的，而且必须去对付的问题。为了避免不必要的跋涉，我们打算在北大西洋公约大会之前举行会议。这就引起了人们窃窃私议，认为我们是在操纵议程。等到我们把三国会议推迟到大会以后举行时，我们又被描绘为是一些受到偏爱的客人，宴会散席以后，为了议论其他一些客人还留连不走。在联合国举行大会，北大西洋公约的部长们在同时同地会晤时，也有过类似的批评。我们不禁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在这个属于“普通人”的以及会议繁忙的外交时代，总是无法避免这样那样的“排他性”的批评的。我们的座右铭成了法拉格特海军上将[①]在莫比尔湾所说的那样，“管他什么该死的鱼雷！前进！”

解除封锁的协议

4月10日，俄国人还在试图策动阻止西德政府的筹建工作。马立克对杰塞普说，维辛斯基的理解是在外长会议开会以前或开会期间，不会成立这样的政府。杰塞

① 达维特·法拉格特（1801—1870年），美国南北战争时海军上将，1864年攻占了莫比尔湾。——译者

普当然说他绝没有说过这样的话,并对此作了澄清。

多国外交的困难现在出现了。总统批准向马立克发出一封措词强硬的电报，表示三国外长支持杰塞普的立场,但是,我们得不到伦敦方面的澄清。我竭力向贝文申说必须对俄国人施加压力的重要性,如果有必要,在他们采取行动之前我们应当采取某种公开行动。我们得到的却是从伦敦泄漏出来的有关谈话的内容。这就需要我们自己来作说明了，这个说明最后有这么一段话:“如果苏联政府目前的立场恰如美国报纸上转载的塔斯社所发表的声明那样，看来解除封锁和举行一次外长会议已没有什么困难了。”还得在华盛顿、伦敦和莫斯科之间再周旋几个星期,才能使俄国人相信再拖下去是无益的。

在我们等待维辛斯基表示无条件同意时，我们和我们的盟国拟定了程序方面的几个要点。外长们将于5月23日在巴黎开会;封锁至少应在十天之前解除。同英、法代表讨论共同立场的预备性会谈，将由三国外长在5月9日开始，并于5月21日和22日在巴黎完成。在安排议程时，不应确定必须讨论哪个项目以及必须处理哪个项目的次序；个别项目只有在所有项目都讨论后才能达成协议。关于解除封锁的细节应在同克莱将军磋商后就地解决。封锁解除后，我们将申请联合国从安全理事会议程中撤销这一项目。

5月4日达成了不附带任何条件的协议，并于第二天以四国联合公报公布这一协议。1948年3月1日以来所强加的一切限制将于1949年5月12日撤销。十一天以后,即1949年5月23日，将在巴黎召开外长会议，考

虑有关德国的问题，以及由柏林局势所引起的种种问题，包括柏林的币制问题在内。将宣布这一天为法定假日和柏林的欢庆日。我向所有参加空运的人员致敬，由于他们的有始有终的工作才有可能取得这一成就。虽然这是一个伟大的成就，但是，它并没有解决德国的问题。我提出警告说，这使我们"又回到强加封锁以前的情况"。能否在巴黎达成一项解决办法，取决于俄国人是否甘心情愿让西方国家做出种种努力使西德成为欧洲自由国家大家庭中一个爱好和平和富有建设性的成员，而不阻挠这一工作的进展。

我个人则认为，空运是成功的，但是，并没有终止俄国的活动。这种活动还将继续在外长会议上进行下去。由于封锁已经明显地遭到失败，斯大林就解除封锁，以政治手段继续进行反对设立一个西德政府的斗争。在外长会议结束之前，我们无法判断他们想使用武力或扬言要使用更多的武力的强迫做法会有什么实际的效果。除了同俄国人达成一个不很容易的"暂时解决办法"之外，我并不指望外长会议能有多大成就。

对苏联外交的看法

柏林封锁的历史是苏联的政治价值和外交方法的一个十分典型的表现，格外值得加以更详细的注意。这表明苏联当局对德国的一切发展情况是非常敏感的，而且对这些发展的反应几乎同样缺乏判断力。当1952年西方采取进一步行动，准备结束占领状态并使德国参加北

约组织时，当1955年建议德国正式参加北约组织时，当1963年考虑在制订核计划时进行更密切联合时，都一再看到这种表现。

所有这些场合都产生了同样笨拙的外交：要求以盟国放弃它建议的改革为条件，来换取苏联放弃它长期以来苦苦地坚持的主张。当这一点遭到坚决拒绝时，苏联便放弃它自己长期坚持的主张，指望以此来分裂盟国或者引诱德国人。1952年，苏联对波恩是，如果波恩签订1952年协定，就对它施加威胁；如果它不签订，就给它好处。1955年，则将签订旷日持久的奥地利国家条约和让奥地利重新统一，以此预示德国如果拒绝参加北约组织就可以得到一些什么利益。1963年，又把禁止核试验作为防止多边核力量的手段。人们从这些经验中所能得到的教训是，无法推动苏联当局通过谈判达成协议——这就是说，通过一系列互相让步，设法使愿意达成协议的各方比较容易取得一个可以接受的协议。他们使用的是政治方法中一种较为原始的方式。他们顽固地坚持一种主张，指望强迫对方接受这种主张。如果一旦苏联的主张被对方的行动证明是站不住脚的话，他们就急忙放弃这种主张——在提出一种难以接受的代价而遭到拒绝以后——然后又急忙提出新主张来，而这种新主张可能是，也可能不是争取更进一步的共同安定的行动。

威廉·海特爵士把俄国人进行谈判的概念，作了一个极妙的概括：

时时会发生要同俄国人进行谈判的情况，但是，这种谈判并

不需要什么特殊的技巧。能言善辩或理由充分的论据都是说服不了俄国人的。他们是依靠斯大林所惯称的国际政策固有基础，即实力的估计的。因此，不管你部署得怎样老练，不管你怎样清楚地表明是无可反驳的，都不能使他们放弃他们事先决定要做的事情；唯一可以改变他们意图的办法是向他们表明他们已别无其他有利的选择了，他们想做的事是办不到的。所以，同俄国人谈判是非常机械的；用书面也许比用口头更好。

十　北大西洋公约：一项公开达成的公开盟约

1949年1月24日，总统第一次接见我，在以后四年中，我们通常每星期有两三次单独会见。当时讨论的两个问题是就北大西洋公约文本所进行的大使级谈判，以及他对第四点(技术援助)计划的意见。根据他的指示，我最初举行的两次记者招待会都谈这两个问题。

谈判的种种问题

1．报界

我打算在记者招待会上做的事情是让采访国务院新闻的人对这些重大决策的目的和意义，能比大部分记者多得到一点比较广泛的看法。除了诸如《巴尔的摩太阳报》的保罗·沃德和美联社的约翰·海托华这些杰出的记者外，他们往往要用他们在市政厅和违警罪法庭这些常去地方寻找新闻的同样嗅觉，来采访外交方面引起争论的现场消息。这种做法对国家和他们的读者都是不利的。在报导关于北大西洋公约的新闻时，他们往往要猜测会邀请哪些国家或不会邀请哪些国家签署这项条约，条约将包括哪些地区，以及会承担什么义务等等。所有

这些问题一个都也没有到了可以作出决定的阶段。我希望设法使他们讨论的是，条约所要对付的危险、如何对付或避免这些危险，以及这项条约和拟议中的其他一些措施之间的关系——换句话说，就是条约在西方国家战略发展中所处的地位。我在启发他们报道第四点计划方面也作了同样的努力。但是，我的那些听众，大多比较喜欢听的却是我对反对派攻击这些措施所作的批评。那才是新闻！

2. 参加会议成员

关于我过去在讨论条约文本时所得的经验教训，已由参加过讨论的洛维特先生的那些助手——查尔斯·波伦、约翰·希克森、西奥多·艾基利斯、迪安·腊斯克和欧内斯特·格罗斯——接手过去了。2月间会议复会时，我发现同我一起工作的一批大使都是我早就熟悉的，我们彼此之间真的——而不是假的——熟悉到彼此直呼名字的程度。这批人原来人数不多——有英国的奥利弗·弗兰克、加拿大的休姆·朗、法国的亨利·庞内、荷兰的埃尔科·樊·克勒芬斯、比利时的罗伯特·希尔佛克鲁和卢森堡的于格·勒加莱公使。挪威的威廉·莫根斯梯勒是在3月4日才来开会的。朗和艾奇逊两家的友谊已有两代之久了。他的父亲同我的父亲是多伦多大学的同学，朗夫人的父亲赫顿教授曾教过他们两人。威廉·莫根斯梯勒和我第一次共事是在二十八年之前。所有其他人都是我多年的同事。我们的谈话是轻松和坦率的。为了保密和保持通讯系统的完整，会议的报告都是通过我

们国外的大使馆转达各国外交部的。

3. 国会

我在2月8日举行的第一次会议上指出，我们讨论条约文本试图进行得比我同参议员康纳利和范登堡的磋商更快是不明智的，因为如果不吸收参议院的意见，协定将没有多大意义。事实上，我在2月3日就已经开始同参议员进行讨论了，在这个月里还要同他们开三次会，以及同众议院外交委员会的一批人开一次会。大使们和议员们要进行讨论的有三个问题：条约是否应涉及军事安全以外的问题？哪些国家应当是条约的签字国？条约应当包含哪些应承担的义务？一般说来，大使们希望走得超过议员们所愿接受的限度。因此，最重要的是使这两种人的会谈步调一致。我就象马戏团里一个骑着双马的演员那样——一匹马跑到另一匹马前面就会摔得很惨。要安全，就得让大使们去推动参议员们，又让参议员们去拖住大使们。

参议员们认为草约的初稿在所有三个问题上都走得太远了。第一个问题是加拿大提出的第二条，要我们进行文化、经济、社会方面的合作。参议员们坚决反对。我们大家都刚刚有过辛苦的经验。2月2日，我在参议院委员会上竭力支持马歇尔将军参加的波哥大会议所达成的协议。参议院却要把它全部推翻。这些协议宣称要把所谓人权扩展到教育、美好的生活、福利等方面，这不免令人想起联合国的许多决议来。但是参议员乔治和其他一些人都认为，这会在联邦和州的关系方面造成宪法上的严

重混乱。参议员们觉得第二条可能会以同样的危险威胁着我们的条约，而不会有很大的好处。我同意这一看法，并着手重新起草这一条，使能表达所要求的目的，那怕这样修改后，第二条还是继续使北约组织受到干扰。莱斯特·皮尔逊不断要求理事会建立一个"智囊"委员会来设法利用这一条，但这些"智囊"还是一直未能做到这一点。

4. 新会员国

关于会员国问题，谈判各方(比利时，加拿大，法国，卢森堡，荷兰，英国和美国)原来想先拟出一个文本后，再考虑要邀请哪些国家来同我们一起在文本上签字。但是，文本还没有拟成，其他国家就很关切并来打听了。其中第一个是挪威，紧接而来的是两个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丹麦和冰岛，随后是地处地中海的意大利。2月7日，挪威外交大臣哈尔瓦德·兰基为摸情况而来到华盛顿。他既不是来申请为会员国，也不是来要求其他的帮助，而是想了解我们在打算作些什么，并讨论有关挪威的问题。他的来访引起了莫斯科的一阵咆哮和恫吓，但他丝毫不为所动。在我们初次见面时，我就发现他是一个非常可爱而给人深刻印象的人。他是战时挪威抵抗运动的成员，曾经被捕——他告诉我是由于自己的疏忽大意——并被判处死刑，关在牢里。有好几个月，他不知道走近他牢房来的脚步声是看守每日照例给他端来菜汤和面包，还是召唤他去面对行刑队。最后他被转移到达乔。他说，从肯定要死亡转为有死亡的严重危险，简直是一种从地狱到天堂的变化。他出来的时候身体被搞垮了，但是他的

勇气、高度的才智和天赋的幽默仍然不减当年。

在兰基看来，挪威已从经验中得到教训，认为中立只是一种幻想。它必须同其他国家联合起来才能找到安全。对于参加联合国，一度抱有很大希望，但是，近几年来已对联合国失却指望了。瑞典提出搞一个斯堪的纳维亚安全条约的建议本来是颇堪称道的，但是，瑞典坚持会员国一定不能谋求同其他国家联合，这就使这个集团力量非常虚弱，不能给它的会员国以很多的保障。他为了在回国后可以向他的政府提出意见，对我们拟订中的条约提出了一些一般性和特殊的问题。签字国的领土完整能得到保证吗？它们在军事援助方面是否比非签字国更能享有优先权？对这两点的答复都是否定的。条约的目的是要建立一种单独的和集体的自卫体系以对付进攻。因此不能提供任何保证，也不能确定什么优先权。挪威愿意怎样做只能由挪威自己决定。我们不极力主张它的人民应采取什么方针。如果它的政府愿意同我们一起参加，美国将予以支持。我所得到的清楚印象是，兰基和挪威驻华盛顿大使威廉·莫根斯梯勒都赞成这一方针，而且由于没有任何压力，更使他们愿意这样做。

2月底，挪威政府申请参加。法国立即企图以同时接纳意大利作为接纳挪威为会员国的条件，庞内提出“法国舆论”不理解为什么接纳挪威要先于意大利。同时，据说那时在退休中的戴高乐将军既反对北大西洋公约，因为它是为美国的——而不是为欧洲的——安全设计出来的；也反对布鲁塞尔公约，因为它意味着保证英国的安全，而不是保证欧洲的安全。总统和两位参议员对这种

争论感到不耐烦了。在3月1日的会议上我对大使们说，我们政府对意大利虽然毫无成见，但一致要求我们在这次会议上接纳挪威。我们还会同意把这项条约扩大到把阿尔及利亚也包括在内。挪威终于被接纳了。几天后，威廉·莫根斯梯勒参加了我们的集团。他是一个严肃的人，完全缺乏幽默感，他的表情似有脱离不了易卜生的熏陶的味道。在欢迎他的时候，我想起我家乡的一位牧师在欢迎他的新教友时说，“欢迎你们来和我们同欢乐共苦难；”接着还说，“迄今为止，还没有很多使我们欢乐的事情。”我提醒大家，我们指望威廉会给我们带来欢乐的事情。

我们的第二位来访者是丹麦外交大臣古斯塔夫·拉斯摩森。他不禁使人想起在第二次十字军远征时伯尔拿神甫写给法国路易七世信中的一句话："象只小心翼翼的麻雀那样，躲避捕鸟者所撒下的罗网。”拉斯摩森的行动就“象一只小心翼翼的麻雀”；他不得不小心翼翼，因为他在国内依靠的是个联合政府，而在国外则是一种动荡不安的环境。最后，他可能要做挪威人做过的事；他也确实这样做了。冰岛的外交部长比约尼·本尼迪克松也是这样。

5. 意大利问题

意大利引起了一个麻烦问题。它在地理上决不是一个北大西洋国家。欧洲和美国的军界舆论都认为意大利在西欧对付进攻方面，很少能作出什么军事贡献来保卫西欧的安全，倒可能成为军事资源一个相当大的消耗。然

而从政治观点来看，一个无所依附的意大利却是危险的源泉。这个过去的敌国，不象希腊和土耳其那样，从1947年以来就通过我们的经济和军事计划同美国发生联系，同西欧除了墨索里尼同佛朗哥之间先前那种无人惋惜的关系外也没有什么联系，意大利可能患有一种孤立感，并且由于它那个庞大的共产党，有可能成为东方诱惑的受骗者。1月底，我们把这些想法告诉了贝文，强调指出加强意大利以抵抗俄国的控制的重要意义，以及不管意大利是否参加这个条约，我们将继续向它供应武器。虽然参议员们不很愿意接纳它，亨利·庞内的笨拙的辩护又几乎使他不能达到目的，最后我们还是一起邀请意大利参加，成为一个创始的签字国。拥有亚速尔群岛的葡萄牙对西欧防务的重要性是十分明显的。要使萨拉查博士参加一个由于许多会员国的强烈反对而把西班牙排斥在外的联盟而不感到有点矛盾，这又是另一种困难。最后，我的密友葡萄牙驻华盛顿大使佩德罗·佩雷拉终于能够这样告诉我说，通过葡萄牙和西班牙之间的协商，已使他们相信北大西洋公约与他们之间的互不侵犯和友好条约并不是不相容的。

3月17日，在华盛顿商谈的八个国家邀请了意大利、丹麦、冰岛和葡萄牙参加，作为条约的创始签字国。在发出这些邀请之前和之后，土耳其代表因为我们没有邀请他们而来找我谈话，情绪非常激动，认为这个联盟一度具有的大西洋特征已因邀请了意大利而被破坏了。任何保证、解释或其他言辞都不能减轻他们那种被抛弃的痛苦感觉，而且希腊很快也有这种感觉。他们这种共通的怨

叹一直延续到两年后这两个国家都被接纳为会员国为止。

6. 自动卷入问题

我们同大使和参议员之间最难解决的问题发生于起草公约第五条的措词上。范登堡决议案从广义说来是支持“为单独和集体自卫而采取的地区性和其他集体的安排”，也赞成我们“参与”可能“影响〔我们〕国家安全”的上述各项安排。由于预计可能在欧洲发生抵抗苏联的进攻（也可能象亨利·庞内经常提醒我们的是德国的进攻）的单独和集体自卫行动，因此，欧洲人当然最强烈地主张在遭到进攻时给予有力和毫不含糊的援助承诺。英国人特别希望在介入之前有一个估量事变的机会，而美国人和加拿大人则对于众所周知的所谓自动卷入最为小心翼翼。大家都抱有这种可疑的信条，即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德国逐个吃掉了它的牺牲品，而如果它的统治者一开始就知道这种行动会引起英国和美国的介入（假定在开始时），那么，两次大战就都不会发生了。因此，一个集体安全协定应该清楚地向潜在的侵略者表明，进攻这个集团的一个成员国，就是进攻所有的成员国。这听起来是很响亮和引起共鸣的，但是，当你拿起铅笔来起草的时候，人们马上就会提醒你说，这“象白天一样清楚”，决不能等于“自动卷入”。

德托克维尔曾对我们说，在美国，每一个政治问题都会很快就变成一个法律问题。没有比拟订条约更是如此的了。按照宪法，条约是“国家的最高法”，在起草条文时，

就象是为了在法院作出解释似的，不但要记住我们宪法的条款，而且象这回一样，要经常明确保持宪法的条款。因此，当第十一条声称“本条约将由有关各国按照它们各自的宪法程序予以批准，并将其所有条款付诸实施”时，参议员们坚称，这些话，照他们的理解说来，是总统虽然根据宪法规定是美国海陆军总司令，但宣战的权力却是属于国会的。针对这种背景，第五条的谈判便成为我们盟国之间的一种争论，他们打算把参议院束缚在具体的条文上，而参议员们却企图摆脱条文的束缚。这场斗争使范登堡痛苦地知道他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地位。他很懂得，把承担的义务规定得越明确，反对派就会越接近于参议员出席人数三分之一以上，从而可以否决这个提案；而承担的义务规定得越含糊，他的目的也就越难达到。这种两难的情况似乎是宪法本身所固有的：这个最高权力——美利坚合众国——是指的什么，它怎样才能保证信守其所承诺的未来行动呢？实际上，这个问题之所以带有普遍性而又难以解决，是在于情况和国家领导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变化和更替，在于条约中那些有约束性的文字的软弱无力，特别是在于这些文字所要达到的长远目标的精髓已被抽去，而人们却还在对剩下的空壳进行干巴巴的纯逻辑分析。

我们在开始起草时，抱有参议员们所熟悉的，也是事先得到他们批准的两种想法。认为进攻一个国家就是进攻所有国家的这个想法，来源于里约热内卢条约；盟国联合起来或者各自采取措施去恢复和平与安全的这个想法，来源于联合国宪章第五十一条，这两种想法，范登堡

和康纳利都曾参予其事。把这些想法应用于欧洲是新鲜的，但是这个障碍已在范登堡决议案中得到通过了。后来又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我们是否应当说，为恢复和平和维持安全而采取的行动就是所谓“每个国家认为必要的那种行动。”在我看来，显然没有权力可以强制任何签字国采取任何其他行动，如果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就只会引起象戴高乐将军一直用来反对把主权国家的宣战权转让给某个超国家组织的那种呼声。参议员们当然同意我这一看法。大使们却认为这将削弱这一条的条文。

但是，他们还是一致认为，如果再加上一个短语——每个国家认为必要的行动“包括使用武力在内”——那么就可以增强这一条文的实际效果。从逻辑上讲，第一分句已包含了第二分句的意义在内，但是，为了不使人们发生疑虑，加上考虑使用武力的字句，是大有助益的。

一只在鸽子群里捣乱的猫

在我同参议员康纳利的私下谈话中，他对“自动卷入”仍然感到担心，但是，范登堡则为“我们的主张清清楚楚是一种预防性措施的概念”极力争辩。就在这时，密苏里州共和党参议员福雷斯特·唐奈在我们的讨论中爆炸了一颗地雷。事情全由于一位不负责任的参议员读了一位不负责任的新闻记者所报道的流言蜚语而产生的。参议员唐奈不是我所喜爱的参议员。他兼有匹克威克先生[1]的谦恭、一位熟练侍者的和蔼和电影里的检察官那样的

[1] 英国小说家狄更斯作品中的一个人物。——译者

架势——锋利的目光和尖锐的质问。他在使出那致命的最后一击时，他会把餐巾往臂上一搭，耳朵象只机警的大象那样竖得笔直。他向参议院读了《堪萨斯城时报》上一篇有关挪威的兰基和我秘密会见的报道，据说我曾讲过，条约将包括“如果任何一个盟国遭到进攻，可能作出的最有力的承诺是给予迅速和有效的援助，但是，只有国会才能宣战。因此，不能事先承担军事行动的义务。但是，美国政府参加了联盟后，就会同意进攻一个会员国等于进攻所有会员国这个原则，而这条原则将被解释为在道义上有参加战争的义务。”唐奈反对承担参加战争的任何道义上的义务，实际上就是攻击在条约中“包括有使用武装力量在内”这样的文字。

范登堡跳了起来，他谈到了里约热内卢条约和这样一些想法，即每个签字国必须决定需要采取什么行动；他说整个问题正在解决之中，并且认为如果美国事先表明态度，两次世界大战本来是可以防止的。康纳利接着发言，硬说道义上的义务和法律上的义务并无区别，两者都不宜包括在这项条约之内。加利福尼亚州的威廉·诺兰相当通情达理地说，我们的目的是要事先讲清楚我们为反对侵略而承担的全部义务，任何条约不这样做就是毫无用处的。马萨诸塞州的卡伯特·洛奇说，签字国将来的行动要比他们口头上所用的字眼更为重要；如果他们联合起来使他们强大到足以抵抗侵略并确实抵抗了侵略，那么他们就可以取得一些成就。康纳利又吵了起来，把整个局面都搅乱了。他声称参议院完全有象国务院那样保护美国的爱国心和能力，还说：“但是，我们不能象加

拉哈兹爵士[1]那样，每次一听到枪响就投入战争，站在战争的一方，既不知道我们在干什么，也不知道争端之所在。这就是我的态度。”参议员唐奈坚称他还是不满意，并且不想在条约中有“〔象〕艾奇逊国务卿所说的、那篇文章作者所提到的、构成参战的道义上义务”的那种东西。第二天，康纳利力求“澄清他的立场”，声称“我们不能合法地去签署一项规定自动卷入战争的条约，”并对第五条提出了他认为满意的自己的文本。

报界在参议院获得了意外成功之后，又到国务院和白宫来继续寻找乐趣了。我在2月16日的记者招待会上，为了避免可能引用失实，一开始就分发了一份答复提问者的油印声明。声明指出：条约仍在谈判中；在美国政府内部，范登堡决议案，总统的就职演说、以及第八十届国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一致通过的关于众院第六千八百零二号议案的报告所申述的目的，都没有什么分歧；我正在同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前辈参议员进行密切磋商；我们希望不久将提出一份条约草案供各国讨论。在这段期间，再作公开讨论是没有助益的。所有想套我的话的努力都失败了。第二天，他们对总统作了同样的努力也没有成功。总统采用了我们日后在类似情况下常用的办法。我的声明起了带头作用。在他们提出同一个问题时，总统只要说我的声明是同他商量后作出的，他没有什么话可以补充了。这就把一场风波平息下去了。

① 加拉哈兹爵士：英王阿瑟传奇中的武士。——译者

条约终于出笼了

我之所以把这段可笑的插曲用了比它本身重要性所应占的远为冗长的篇幅加以叙述，是为了表明人们在通过行政和立法的代表机构进行谈判时是如何困难。这阵暴风雨起了有益的作用，使谈判各方认识到在他们的工作通过布鲁克斯·亚当斯所谓的"民主信条的堕落"制度下无法办到之前，终于到了结束他们工作的时刻了。经过在各国代表们和参议员内部的多次辩论之后，我们在3月18日终于发表了条约全文，在各国政府最后接受(实际上是在推动这个公约）之前，交给公众讨论。从来没有一个初次登台的演员，具有这么大的声势，同时在十二个国家的首都上演。我在华盛顿清晨的记者招待会上发表了这个条约，对每一节都作了详细说明。同一天晚上，又向全国作了广播讲话。

在这两个场合上，我特别对一般认为我们作为一个国家向盟国作出的以及他们向我们作出的政治承诺，说明其现实意义。一位记者要求解释"在使用武装部队方面，道义上的义务与书面上明确规定的义务之间有什么区别"，这就反映了人们的心理多么混乱。

我说，正派人是恪守他们的契约义务的。如果他们不能这样做，或者他们彼此对契约有不同的理解，那时——也只在那时——他们可以诉诸法院。我们是正派人，我们能够恪守我们的诺言，我们的诺言写得很明白。这些诺言就是把对我们的任何一个盟国的进攻看作是对

我们自己的进攻，我们自己或和其他国家一起去帮助受害的国家，并在必要时使用武力，以恢复和维持和平与安全。就在这个条约所涉及的地区，二十五年中已经发生过两次大战；事情十分清楚，必须采取什么措施来恢复和平与安全。这并不等于说如果我们的一个盟国受到进攻，我们就会自动参战。我们应当并且决心作为一个国家，按照我们的诺言——而不是抛弃我们的诺言——采取行动；同时，作为一个国家，“将由宪法规定的部门来作出决定”。

我在记者招待会上，在讲话中，在向总统作有关条约的汇报中，以及在参议院委员会作证时，都反复强调这一要点，就是作为一个国家必须按照宪法规定来采取行动，既不意味着国家可以按照某种没有明确规定的方法“自动地”采取行动，也不意味着立法者可以根据“本国的法律”——在这里是指条约——采取违反它的规定的行动。没有其他力量，只有他们自己的正义感能够迫使他们尽其本份，以使国家遵守它的具有法律依据的诺言，但这并不影响诺言的合法性和它的意义。

在参议院委员会的意见听取会上，我把这种推理应用到条约第三条上，使参议员感到恼火。这一条约束有关各方要采取自助和互助，来发展他们单独和集体抵抗武装进攻的能力。我说，条约如果得到批准，美国就有义务尽自己的职责去帮助别国发展抵抗武装进攻的能力。一位反对以任何方式进行军事援助的参议员（正如塔夫脱参议员所做的那样）就是以美国政府一部分的名义拒绝承担这种义务。如果我能加以制止的话，我将反对用

玷污条约所承担的义务的办法来试图为条约赢得赞成的票数。

4月2日，所有参加北大西洋公约国家的部长们都聚集在华盛顿来批准这个条约草案，并商定在4月4日举行签字仪式。在这件事情上，杜鲁门总统再次对我表示他的关怀。我曾对他说，由他代表美国签署这个条约最为合适，但是，他拒绝这样做。他将参加这个仪式，在我签署时站在我身旁，但是，这个条约将签上我的名字。会议决定每个外长在签署之前都要发表声明。当我问到他们将用哪种语言以便准备适当译员时，加拿大的莱斯特·皮尔逊答复说，他将用“带有法国口音的北美英语。”

签字仪式既隆重而又丰富多采，我在条约上签字时，美国总统和副总统站在我左右两边。当我们等候仪式开始的时候，海军乐队奏了当时流行歌剧《波杰和佩斯》中的两首乐曲——《我一无所得》和《不一定是这样吧》——平添了一种具有意想不到的现实感。

十一　盟国的对德政策

三国对德协定

正式签订北大西洋公约后，我们就可以从容地同贝文和舒曼进行会谈，来开始进行另一个对欧洲具有同样深远影响的行动。甚至在斯大林答复金斯伯里·史密斯的问题之前，德国的事态发展就已使西方占领国家有必要举行一次会谈了。而外长会议可能即将举行，更增加了会谈的迫切性。我们国务院的看法是，俄国行动的目的是要阻止或拖延西德政府的成立，以此作为解除封锁的交换条件，或作为在外长会议开会讨论德国问题时分化西方国家的一种手段。因此，在举行四国会谈之前，三国有必要在计划方面取得一致意见。在我们首次会谈中，我发现贝文和舒曼完全同意这项计划。他们两人的确都认为莫斯科的行动极可能是个圈套，贝文甚至提出，在我们制定对德国的协议和批准北大西洋公约的时候，最好让柏林保持现状。助长这一意见的是认为仅仅暂时解除封锁可能严重地破坏空运。我认为推动召开四国会议是导致达成协议的最好办法。

我最初同贝文和舒曼进行的几次会谈，由于他们对欧洲和对德国问题具有开朗的态度使我很为高兴。贝文

对我说，他希望根据布鲁塞尔公约所作的安排，可以为西欧设置一个内阁。他说，这个内阁必须习惯于处理共同关心的问题，并得出共同的看法。他希望能让德国参加进来，并认为北大西洋公约采取这种行动是能够给予人们以必要的信心的。我同意根据条约建议所设立的理事会和防务委员会不应“损害西欧联盟的效能”。可是，一年以后，当舒曼提议成立欧洲煤钢联营而使贝文曾向我提到过的那种模糊见解具有真正实质性的内容时，贝文却后退了。不幸的是那时他的健康日益衰退，他的见解也随之而衰退。1949 年 4 月，舒曼看到时机业已成熟，可以让德国从由盟国直接负责转到在盟国控制下由德国最大限度地负起责任来，并且可以从军事关系转到一般的政治关系。这种态度表示通过协商达成一个对德计划具有很大的希望，虽然在我们达成风平浪静的协定之前，尚得穿过一些急流险滩。

我们这些会谈在二十年之后之所以仍然令人感到兴趣，并不在于我们取得了哪些协议，而在于我们怎样通过一切复杂和混乱，找到了一种达成协议的途径。我们的工作是确定一条作为我们行动指南的概括方针，然后在越来越具体的发展中找出哪些是共同点，哪些不是共同点。各种分歧可以放在最后解决，这样就会显得这些分歧不是孤立的原则性问题，而是另外一种可以接受和可行方案中的项目。我们并不是从写成书面的文件开始，因为这样常常会把读者引向咬文嚼字的琐屑细节中去，而是从对话开始的。和我们共事的都是一些才华卓越的人士，对谈判很有帮助。同我一起的有菲利普·杰塞普和罗伯

特·墨菲，他们从德国回来主持我们的德国科。贝文则有曾和我一起工作过的富有创见的奥利弗·弗兰克斯爵士，以及贝文的秘书罗德里克·巴克利(即后来的罗德里克爵士)。同舒曼一起的则有法国外交部的顾夫·德姆维尔和亨利·庞内大使。

我一开始就说，我们的初步会谈使我有着这样一个印象，即我们所有的人都希望减轻我们占领当局所负的治理德国的责任，而增加德国人的责任。舒曼在他早先同凯南的谈话中，曾指出我们在奥地利的经验可以作为借镜。这个计划可以减轻我们现在的工作，因为我们可以把注意力集中于我们想要保留的那些权力以及如何行使我们所保留的权力，而让德国人去运用所有移交给他们的那些权力。他们已经在从事制定联邦基本法和州的宪法的工作。概括地说，我们所希望保留的，是万一有必要的话能重新行使一切权力的最高权力；说得更明确点，就是在某些特定范围内保留直接行动的权力，诸如裁军、安全、消灭纳粹主义、解散卡特尔组织、外交、赔款、等等。至于其他方面，则应放手让德国人自己管理，如果他们的行动越出基本法或与占领政策发生抵触时，占领国可以加以检查和否决。所有这些都得到赞同，于是，我们着手起草一个概括的草案以供讨论。

消除法国的焦虑

在谈到我们如何掌握保留的权力时，我建议我们可以制订一个处理整个德国问题的原则，尽管看上去这种前景可能是暗淡的。我们应当把一个占领政府的权力缩

小到最低限度，这样不至于使其他占领政府或德国人动弹不得，并设计出一种我们愿意接纳苏联占领区和占领区政府的体制。这证明是一种深思熟虑和有益的想法。

我们让这些想法在周末酝酿几天，在星期一签订了条约后再回过头来讨论，内容从对话进入对最后起草人作出概括的指示，同时仍然试图回避那些被菲奥雷洛·拉瓜迪亚市长称为“寻章摘句之徒”的咬文嚼字的书呆子。不出所料，制定占领法规的工作并没有碰到多大困难，但在讨论三国管制时却引起了一些实际问题，主要是法国提出来的。贝文一开始就斥责美国在三国占领区联合协定中对于财政问题所要求的权力太大，美国军事长官有权否决国家立法，使他成为凌驾于他的同僚之上的暴君。由于提出了授权德国政府参加欧洲经济复兴活动并直接同美国打交道，才使这一问题大大缓和下来。但是，舒曼对于法国单独用各种方式抵制德、英、美当局所同意的行动能达到何种程度，仍深感不安。

我们早先在原则上达成的一项协议，对于这次微妙而重要的谈判具有重大关系。我们已经决定在各方面，甚至在给占领国“保留”的那些权力方面，德国的管理机构所作的决定，都不必取得明确的同意后才算有效。如果没有明确的不同意，这些决定就都是有效的。这就发生了一个问题——是谁来加以否定呢？如果三个占领国都不同意，德国的行动显然就将无效。如果两国不同意，仍然可以持这种看法，但如容许一国不同意另两国的反对意见，这就需要作出特殊的规定。从谈判的地位来看，舒曼发现自己处境不利。这不会使维辛斯基感到烦恼，但

舒曼在理智上是一个诚实的人和很公正的人。如果我们放弃抽象概念，而着手按照法国的特殊地位和经验的观点来分析可能引起的具体问题，还是可以获得解决办法的。

我们在讨论时，就开始考虑一些想像的和有益的设想。一个设想是把占领国的概念分为两个实体：在场的谈判代表和国内的政府。每个国家卷入某一个问题的程度与最后导致相持不下的顽固态度是完全两码事。所以最后的决定应由在前方的混战移到由外交部进行比较平心静气和广泛的考虑。后来又有一个设想，即暂时不要要求作出决定，可以采取分期分段解决的办法。不同的问题在劳资争议中，往往有一段“冷却时期”，使有时间重新考虑和谋求妥协。而且，有些可以当场不采取少数服从多数原则解决的问题，应当通过盟国之间的互相信任和互相尊重的精神严格地加以缩减，我对此曾作过有力的辩解。最后，我根据美国宪法的惯例，出了一个主意，后来证明这个主意很有益处。这就是如果决定要废除或修改三国协定必须得到三国的同意；但是，如果有一个反对者提出一项违反这种协定的行动，就只能暂时停止这种行动。

最初舒曼提出了过多的要求，但是，我已说过，他是十分通情达理和公正的。他也非常密切地注意讨论情况，他总是讲法语后由顾夫·德姆维尔翻译，但是，他对英语大都能听得懂。在我们第一次会谈的一周内所达成的最后协议，是完全切实可行的。盟国的管制将掌握在由三位高级专员组成的盟国高级委员会手中。批准德国

联邦宪法的修正案必须由三国采取一致行动，要求美国财政援助则需通过更加郑重的表决加以批准，这实际上是交由美国控制。批准所有其他事项只需过半数的表决，但附有各种重要的限制条件。凡是所建议的行动将在对法国具有重大关系的特殊事项上改变三国协定时，可以要求在三国取得一致意见前无限期地停止这项行动。这就给予法国以小范围内的否决权，并把讨论提到政府一级之间——由三国谋求折衷解决。如有其他要求暂停采取行动则按照问题的性质得持续二十一天至三十天，除非经过过半数表决予以延长，则另作别论。

在这一周内，商订了有关德国的各项重要协定：除了占领事项，还有鲁尔、赔偿、国界、联邦宪法等问题，以及我们将来在欧洲联合体制的范围内，在民主联邦国家的领导下使德国人民最紧密地一体化的政策等。1949 年 4 月的第一周，是我们每个人都感到问心无愧的一周。在我们的代表会集在巴黎着手准备定于 5 月 23 日举行外长会议之前，所有基本协定都在一个月内全部公布了。

向全国广播取得进展的报告

在我自己投入这些准备工作之前，我利用 4 月 28 日美国报纸发行人协会开会的机会，向全国广播一个报告，不仅涉及我们刚刚完成的工作，而且涉及我们对予即将同俄国谈判德国问题的态度。我说，我们最近所达成的有关西德的协定，并不意味着我们已经放弃寻求一个能适用于解决整个德国问题办法的希望，而确实意味着我

们在德国那些有可能的地区开始创造一些健康的和有希望的条件之前，不准备无限期地等待四国协定。我们将在四国开会讨论时竭尽全力协助解决那个显然是国际事务中关系最为重大的问题。但是，对于某些原则，我们是不会妥协的：

西德人民尽可以放心，本政府不会同意一种全面解决德国问题的办法而漠视目前西德的种种安排中的基本安全和利益。他们尽可以放心，在达成这样一种解决办法之前，本政府将继续大力支持西德的发展计划。

欧洲人民亦尽可以放心，本政府将不会同意订立任何不能保护欧洲社会安全利益的有关德国的协议。

美国人民尽可以放心，在讨论任何有关德国前途的问题时，本政府必将首先考虑他们的深切愿望，即采用和平而有秩序的办法来解决这些重大问题的愿望，因为这些问题已成为战后时期我们许许多多困难的中心问题了。

十二　在巴黎举行外长会议

在4月份所作的一切努力——缔结北大西洋公约和建立西德政府的协定——一直在为2月间斯大林答复金斯伯里·史密斯所提问题中明显地预示的那个会议作准备。甚至在4月之前，这项工作已经在国务院内以及在国务院与五角大楼之间进行了。我一直在同总统讨论，以接受他对这一工作的思想指导。

我们的目标得到了澄清

随着我们对德国问题的分析的深化，我们对主要目标的概念也有了改变。最初，我们讨论了要把重点放在整个德国的重新统一还是放在西德的统一和加强上的利弊得失。可是，不久我们终于认为我们主要关心的事项应当是欧洲的前途，不应当把德国的重新统一问题本身作为主要的目的。这显然就需要取得苏联的合作，因为它占领了三分之一的德国领土。如果把重新统一置于首要地位，那么争取苏联合作所应该付出的代价的确可能是很高的。可是，如果把欧洲的前途放在首要地位，而如果苏联对德国重新统一所索取的代价危及或破坏欧洲未来的前景时，那么，这个代价就不应当付出。

外长会议的召开，可能会发现俄国到底要求什么样的代价。欧洲的复兴还刚刚开始。如果没有安全感和整个德国的参加，欧洲的经济复兴将不会取得多大成就。一个重新统一的德国要以欧洲在军事上的不安全为代价，或遭受赔款的压榨，或因苏联行使否决权而造成政治上和经济上的瘫痪，或使苏联荒谬地控制了东德的经济，都将致命地损害欧洲的前途。这些想法都体现在一份题为《对外长会议的探讨》的文件中，这一文件经过总统批准，并且电告贝文和舒曼，表明了我们的想法。

政策设计办公室在开始工作时，对苏联和盟国的部队可能从各自占领区撤退到德国东、西边境地区的各种计划很感兴趣。但是，当时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歇尔将军的一位杰出门生、布雷德利将军指出，这样一种努力的结果，将使英国和美国的部队退到无法防御的口岸地区，而俄国的部队将不会向东移动多远，与未移动前没有多大区别。因此对这种探讨的兴趣消失了。我们的预备性探讨以及我同总统谈话所得出的其他结论都认为，外长会议也许只能产生一个有关柏林的暂行办法，并使由封锁和我们反应的公开敌对态度所引起的危险的紧张状态缓和下来。我们可以安然接受这种结果，但是我们希望有更多的收获。不应拒绝可以取得更多收获的良好机会，因为从理论上说，较好的机会肯定是会到来的。但按照我们对将来的看法却不一定有这种机会。

我们所要求的"良好机会"的条件是严格的，但也并非不可能的：

关于四国管制全德政府的任何计划，必须尽可能使

其自动地付诸实施，不让俄国有反对和使机构陷于停顿的余地。俄国所作的善意和合作的保证都是毫无价值的。因此，象我们的三国协定那样，原则应当是符合少数服从多数的惯例，行使否决权只能作为上述原则的一种例外，只适用于那些真正涉及一个监督国的安全至为重要的问题。

建立一个全德政府，应当以接纳东部占领区加入已在建立过程中的三国占领区政府为基础。我们不能向后倒退。

关于联合条件的讨论和解决，可以由东德和西德政权的代表进行，但是必须经过在正当监督下的选举，所有德国党派都可以参加，东德代表要象西德那样具有人民代表的一些真正的基础，而不只是共产党的傀儡，因而也就是莫斯科的傀儡。不能指望西德政府会同莫斯科进行谈判。

另一项规定是俄国不对东部占领区提出赔偿要求，凡是部分地或全部地被苏联政府机构占有的工厂企业都应发还给德国的私人业主。我们不打算让马歇尔计划给与西德的援助通过东德流入俄国。

我们还把取得明确属于盟国从西部占领区至柏林高速公路的若干管辖权和专管权作为在外长会议上争取的一项目标；并要求对于一条铁路线也有比我们已经享有的更明确的权利。封锁和空运给我们在柏林留下一个政治上的风险，也使我们对柏林人民负有道义上的责任。对此二者，我们在现时准备不足的情况下都是经受不起的。

外长会议的仪式和战术

我们从广泛的战略转到了战术方面。几年来，外长会议已有了它自己的一套仪式和传统。外长们围坐在一张铺着绿色台面呢的圆桌旁。每一位外长有三位助手和他一起坐在桌旁，其他的人则坐在他的后面。十六个人坐满了一张桌子，并不显得拥挤。座位是严格拘泥形式的。法国人的左面坐着英国人，然后是俄国人，他们的左面是美国人。讲话也按照顺时针顺序依次发言。第一次会议由东道国的外长担任主席。随后每天轮流由左面的一位外长担任主席。这种安排不管是否出于有意，却使美国国务卿既挑起重担，又充当领导，因为他总是挨在俄国人之后面给下一轮定下调子的。由于每次发言都要译成两种语言，一共包括三种语言，因此会议拖得过分长。这是一桩令人厌烦得难以忍受的事情，只有在维辛斯基施展新的花招而使我们有充份时间——通常是太长了——准备我们答复的那些场合才是例外。

按照这种程序，开始时的战术看来是很清楚的。我们显然希望维辛斯基尽可能充分地和尽可能早点亮出他的牌来。做到这一点的最好办法是由舒曼在会议开始时先致欢迎词，然后评论一下已往的不愉快事件，并祝愿一个比较光明的未来。然后贝文就可以接着向俄国人进逼。苏联破坏了四国的对德管制，使我们危险地接近于巨大的纠纷，现在又坚持要开这次会。维辛斯基打算叫我们从这里走向哪里去呢？

杰塞普、墨菲和波伦就是带着这些战略和战术思想到巴黎来同英、法两国的同事协调对策的。

我们前往巴黎

1949年5月19日是我在华盛顿的最后一天，在参加了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一次秘密会议后，我强调谁也不要对我们的会议抱有奢望。

每当我到国外参加会议时，总统总是要我乘坐他自己的“独立号”座机，这是当时一架最豪华的DC—6型螺旋桨飞机。只有两次当“独立号”不在或修理时，我们才改乘其它飞机。我的妻子、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夫妇和一大批工作人员都经历了一次舒适的夜航，这在今天看来飞行时间似乎长了一些。布鲁斯大使夫妇在巴黎十分殷勤地接待我们夫妇和卢修斯·巴特尔。现在，我们同布鲁斯夫妇难分难舍了。在以后三年中，在戴维·布鲁斯回到华盛顿担任副国务卿之前，我们总是过分受布鲁斯夫妇的热情招待。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自从本杰明·富兰克林以来，没有人比戴维·布鲁斯对法国情况更有密切关系或更透彻了解的了。1953年后，他继续过着外交生涯，除了在华盛顿和巴黎供职之外，还在波恩和伦敦充任国家的代表，这在美国历史上可能是独一无二的。

每天早晨，这一小伙人从位于迪纳大道的大使馆住处步行半小时到位于协和广场的大使馆办公处。在这一小伙人中，除了我本人，有布鲁斯大使(大部分时间都参

加)、卢克·巴特尔,一位法国巴黎警察厅官员,以及我的两位忠实而可爱的警卫员中之一,不是弗兰克·马登,就是保罗·卡西迪(当我指给保罗看皇家广场附近亨利四世被刺的地点时,他说"啊,国务卿先生,这里倒有不少历史古迹哪!")。卢克在散步时很紧张。有人告诉他,如果我遇刺身死他就最好不要活下来告诉别人事情是怎样发生的。一天早晨他慢慢走过来对我说,"我不是要吓你,但是,有一辆汽车正跟着我们。"

巴黎警察厅官员插嘴说,"不错,那是我的汽车。"

我们的先遣人员做了很好的工作,同法国和英国外交部的官员把协定草拟完成,但是,在舒曼、贝文和我看了两天之后,我不相信这项协定能够经得起维辛斯基的沉重的压力,如果莫斯科给予他侵入我们阵线的广泛行动自由的话。舒曼对于四国对德管制采取过半数表决的支持将是脆弱的。贝文对于把西德工业交还德国管理的支持也将如此。两人对于由武装的德国宪兵来维持国内治安的倡议也都神经过敏;但是,如果我们希望在所有占领区内尽快让占领军不起管制作用的话,这还是必要的。

巴黎会议使我认识了苏联外交部长安德鲁·维辛斯基。他身材短小,举止急燥而粗暴,说话很快,给我的印象是易于激动和紧张。他的修得短短的灰白八字胡子、冷酷无情的蓝色眼睛,瘦削而并不清秀的面貌,同矮胖的、农民面孔的一般苏联官员和他周围的特工人员很不相同。维辛斯基原来是波兰人,学过法律,他是作为一个孟什维克而不是作为一个布尔什维克接受共产主义信仰的。在三十年代斯大林对党、政、军进行血腥清洗时,他

作为检察官曾经迫害过他以前的朋友和同事，使他们身心衰竭和死亡。然而，维辛斯基从来没有被吸收到特权阶层中。他是一个工具，而不是权力的源泉。这个险恶而老练的敌手虽然使我感到紧张，但是，无论当时或后来，我发现他并不是这样。他倒是象许多俄国人一样是一个噜哩噜苏而令人厌烦的演说家。他的辩论既不惊人，也不机智；他所得到的指示显然使他没有多大的行动自由权。

会 议 的 布 置

外长会议都在玫瑰宫举行，它所以有这个名称，是因为这里有象《纽约时报》所描绘的"烈日晒成深红"色的嵌在墙内的大理石壁柱。这座玫瑰宫是博尼·德·卡斯特拉纳伯爵为他的美国新娘安娜·古尔德建造的。会议开幕那天，法兰西共和国的警卫军站在进门大厅和两条大理石楼梯上，以轻轻的擂鼓和响亮的喇叭声向外长们致敬，体现了爱德华时代的典雅遗风。我的办公室是一组有卧室的套房，套房中原有的家俱换上了旅馆起居室和办公室的陈设，所缺少的只是文件柜。一只附有象是镀金装置的浴盆就权充文件柜，不过，机密文件每晚必须送回大使馆办公处。外长会议都在大客厅举行，在有壁画的天花板上画着森林之神穿过云雾追逐一群仙女，即使经过了维辛斯基冗长演说的双重翻译时间，仍然没有追上她们。从落地长窗往外望去是一座花园。有一天，我递给维辛斯基一张纸条，要他注意一对鸽子正在筑巢，并说这是

毕卡索的和平鸽前来鼓励他，从而使他露了一下笑容。

会 议 开 始 了

在5月23日第一天会议的最初几分钟内，冷不防维辛斯基就提出了这样一个建议：我们现在就应当决定一下，我们要在什么时候在中国的参加下开始讨论对日和约。他宣称四国政府首脑在波茨坦已经决定，应使外长会议在中国参加下成为制订对日和约的场合，这个决定对我们是有约束力的。他要我们在当时当地做的，就是要我们承认这项具有约束力的决定，并确定一个为这个条约开始工作的日期。这是一个吓唬人和无法接受的意见。由于苏联的否决权，已使对德和约在外长会议里陷于绝望的纠缠之中。维辛斯基现在又想以同样方法用之于对日和约。我不清楚在波茨坦对这个问题是否作出过什么决定，但是，维辛斯基现在提出的建议绝对不能让它实现。如果让它实现，我们今天就仍然不会有什么对日和约了。

那种令人厌倦的双重翻译程序现在倒是很有用处。通过迅速的工作，到了翻译完毕的时候，我们不但掌握了波茨坦宣言的内容，还得出了一种看法。我说，波茨坦宣言只授权外长会议解决欧洲问题，并没有授权解决亚洲问题。该宣言确实提到了四国将考虑如何着手对日和约的工作，所以四国不是要在外长会议上，也不是在现在，而是要等到同远东外长会议的其他成员国协商后才能进行。舒曼和贝文两人领会了我的意图，贝文强调指出，他

特别有必要先与英联邦国家进行协商。此后我们就干脆拒绝讨论这个问题。尽管维辛斯基着实作了一番努力，还是失败了。

这一天，似乎很使他泄气，因为他对舒曼提出的议程只作了一下象征性的抵制。过去俄国人之看重议程几乎达到神秘的程度，他们一直坚持在进行讨论的项目尚未获得一致意见之前，外长会议就不能从这一个项目进入下一个项目，这是一种明显地只适用于讹诈的做法，同时把那些看起来只不过是对某些议程项目的笨拙英文译法曲解为我们对他们意见已予以接受和让步。维辛斯基的副手葛罗米柯对于制订议程是那样重视，以致他同杰塞普和波伦在这个玫瑰宫里为召开1951年外长会议而举行的筹备会上，经过了十五个星期仍未能对议程取得协议，使得外长会议没有开成。1949年，我们毫不客气地处理了这个问题。舒曼所提出的议程，也就是我们打算要讨论的议程，而当我们发现(至少暂时是如此)某一个项目已到了再讨论下去只是枉费唇舌的时候，我们就转到下一个项目。即使抱着这种坚定的主张，1949年春的外长会议还是开了四个星期，除了继续维持柏林“暂行办法”之外，没有达成任何其他协议。

有关德国问题的一次令人沮丧的交谈

这次会议的真正工作开始于5月24日，维辛斯基在会上陈述了苏联关于德国问题的立场。第一周虽然讨论进行得很有礼貌，也没有什么争论，但是，却表明俄国对

整个德国问题提不出什么建议，只是谋求重获阻止西德发展的权力。人们可以从我每天发给总统的电报中查阅这方面的讨论。维辛斯基一开始就要求西方国家让苏联(它曾经退出)重新参加盟国的全德管制委员会。他说波茨坦会议曾作出过这样的规定，这是签订了三国协定之后的一个合乎逻辑的步骤。第二天，我们问他苏联愿付出什么代价作为报酬。西德的经济并没有什么盈余可以拿出来作为赔偿。东德的经济则出现赤字。东德已是一点自由政治制度的痕迹也没有了。在这种情况下，西德同东德进行经济合作又能得到什么好处呢？我向他提出反建议，要求讨论赔偿和苏联在东德占有的产业问题。我说，他的建议就象要求一个已经恢复了四分之三的瘫痪病人重新全部瘫痪似的。我致电总统说，"今天的会议毫无结果。"维辛斯基继续要求按照旧制度进行四国管制，使一个分裂的德国永久化，以便东、西德可以进行对苏联有最大利益的贸易。我们认为苏联的意图已很明显，因此，我们能够有把握在外长会议上积极地采取主动。

我们在28日这样做了，贝文充当了我们的发言人。我们要把波恩宪法扩展到整个德国，使它成为一个政治和经济的统一体，具有全国通用的货币和自由贸易。应即结束赔偿，苏联控制的股份公司也应予以结束。接着整个德国在四国监督下和在所有德国政党(纳粹党除外)自由参加下进行选举，组成一个全德联邦政府。关于四国监督的问题，除另有特殊协议外，均须按照过半数以上的表决才能执行。维辛斯基拒绝接受这一方案。后来，他建议我们接见当时正在柏林开会的第三届德国人民代

表大会的一个代表团。我们表示拒绝，并建议继续讨论柏林问题。

5月30日，在我们第一周讨论结束时，舒曼和我在布鲁斯夫妇处共进晚餐后，我们回顾了一下会议的情况。在我们看来，事情很明显，维辛斯基既提不出我们所能接受的建议，也没有授权接受或甚至考虑我们可能提出的、符合西欧国家利益的任何建议。已经是到了应该抓紧议事日程的时刻了，以便希望能在我们讨论柏林和奥地利问题时找到一些即使是细小的成果，有助于缓和我们在上述两地的双方关系的。也许我应该同维辛斯基作一次简短的谈话，强调我们应该把会议工作继续进行下去，把宣传战减至最低限度，并设法开完本届外长会议而不使局势恶化。我们决定先听听贝文的意见。我们这样做了，得到了贝文的同意和宝贵的意见。他建议我们向维辛斯基提出举行小型会议，初步探讨一下每个问题，事后向报界发表的报道愈简短愈好。如果仍然存在取得一致意见的方面，那么我们就可以在双方各自试图把失败责任归咎于对方之前，找出这些一致的方面来。

我们试图召开秘密外长会议

我在玫瑰宫维辛斯基的房间里会见了他，并征得他的同意。6月3日，在经过最后一次宣传战相互表明在四国管制下统一德国问题的各自建议之后，我们平静地转到了柏林问题。我在一次秘密会议上概述了我们的建议，并在致总统的电报中把这次秘密会议描绘为“到目前

为止我们所经历的第一个认真的会议"，试图把一些缓和的理智气氛灌输到讨论中去。一个城市并不是一个国家，应当可以由一个统一的市政当局来管理，无需由四国对每一件事情直至街道清洁工作都进行监督。城市的宪章以及其修正案固然需经由四国批准，但是，市政方面的其他决定自应生效，除非这些决定在二十一天内被盟军最高司令部(四国监督柏林四个占领区的机构)过半数所否决。我们在几天内进行了详尽的讨论，包括货币问题在内。随后我们听了维辛斯基的建议，我后来在发给总统的电报中说，他建议的控制权比 1948 年前所提出的范围更为广泛。按照苏联的计划，"除了死亡之外，柏林居民事事都要得到四国一致的批准"。苏联顾问向我们代表团中一些人说得很明白，俄国人决不愿意冒在柏林有一个采取"反苏态度"的德国行政当局的风险。6 月 4 日，维辛斯基和我们一同进餐时，我们作了各种尝试，想套出他的话来，得到的答复却是，"饭菜太好了，不应让谈论业务工作给糟蹋了。"

讨论的调子和内容是低沉的。我们都感到厌倦和恼火。贝文建议外长会议每天开会两次，早晨一次和下午一次。维辛斯基表示同意，但是坚持在下午和晚上开会。贝文说，维辛斯基冗长的演说在晚间会使他昏昏入睡。维辛斯基对此答复说，有些事情就是在下午也会使贝文入睡。贝文建议就这样办；可以有充分的休息，并使人们能够开完这些会议。晚上开会，结果是把一天的工作拖得很长。早晨我们每人都要同自己的代表团一起开会，然后再参加三国会议研究下午和晚上的程序。到了会议开

完，我们发出电报时，通常已经是凌晨二时了。我们一位同事说："一定要有比这更轻松点的谋生之道。"

会议面临危机

到了第二周末，柏林局势变得尖锐了。按照杰塞普和马立克的协议，外长会议是在相互撤消通向柏林和东方占领区的交通限制的条件下召开的。但是，由于柏林铁路工人罢工，交通并没有畅通。铁路的车场在东柏林，而工人却住在西柏林。东德铁路公司付给工人东德马克，而这些马克在西德是不值什么钱的。铁路工人在西方司令官的支持下举行罢工；俄国人拒绝再参加什么会议来解决这场纠纷。我们已是在封锁我们自己了。当俄国人找到借口设置障碍干扰交通时，局势变得严重起来了。我向我们的代表团建议，在谋求法、英两国同意下，要求维辛斯基让四国司令官在不迟于6月13日（星期一）时找出一项解决所有阻碍柏林交通的办法，并作出报告。我们讨论了这一建议，并讨论了如果一旦遭到苏联拒绝应采取何种制裁方式（要是需要进行任何制裁的话）之后，我们一致同意不进行任何威胁——但事实上也许是就此结束这次外长会议了。我说，我不要求提付表决，但是，我决定亲自去找贝文和舒曼。福斯特·杜勒斯表示反对，并要求把他的反对意见记录下来。

其他外长都表示同意，于是我们一起私下向维辛斯基提出了上述那项要求。他愿意当晚考虑这个问题（显然是要请示）。第二天，外长会议一开始，他就拒绝这项

建议。鉴于纽约协定和外长会议已经失败，是否还有必要使会议继续开下去，就成为一场激烈的争论了。在我们快要休会时，维辛斯基说，他接到了莫斯科的新训令，现在可以接受我们的建议。因为他懂得，每个政府都会给自己的司令官发出训令。这种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引起了很多有趣的评论。在开会时谁也看不到有人送给他任何电报。法国报纸尽是刊登关于一只看不见的和平鸽给他带来了橄榄枝的双关语。这一事件还有有趣的余波。我们会后回到大使馆时，福斯特·杜勒斯正等着要见我。他认为，他因太性急，曾要求过把他不同意我们所采取步骤的意见记录下来，现在能否把它从记录上删去？结果就删掉了。

10日，贝文报告说，《真理报》记者向路透社的人员暗示，在能够认真讨论任何调停办法之前，必须接受在柏林建立一种单一管理的币制。他问，能不能安排一次真正的秘密会议，而不在巴黎报上披露呢？那天晚上，维辛斯基宴请贝文，贝文急想试一试看。我们表示赞成。他试了一下，失败了。所以，第二天晚上，轮到我去苏联大使馆赴宴时，我稍微试探了一下，有一点不大的收获。饭后，我问维辛斯基，讨论一下工作问题，是否算是滥用一位客人的特权。他敏捷地把他的坐椅拉过来，使我们得以避开我们的同事进行谈话。我说，贝文汇报了他昨晚的谈话，根据昨晚谈话以及我们会议的一般趋势，我断定，在一些基本问题上，不可能达成协议。但是，人人都希望外长会议能够取得一些成果；我们不妨试试一些小问题。维辛斯基表示同意，他也很清楚，我们不准备解决

主要问题。

我概述了四个“小问题”和一个较大的问题。这些问题也许结果可能改善东西占领区之间的贸易。改善贸易也可以进一步扩展到东欧。维辛斯基要求我把我的意思说清楚。我说明放宽一般贸易限制的意见之后，又提到他关于东、西德开会讨论改善贸易的意见。第二，我们可以随便拣几件柏林市政管理方面的问题，授权我们在柏林的代表搞好市区的合作。第三，法国人、英国人和我们自己都想改善进入柏林的办法。纽约协定规定得还不够，留下了过多的余地，使当地下级官员把我们全部卷入较大的摩擦。第四，我们双方都需要通过一个不必象外长会议那么麻烦的机构，继续保持有关德国问题的接触。最后，还有奥地利问题。这一问题拖得太久了。按常理讲，所有这些问题都应当在休会前予以解决。

我最后说，四国外长所能做的最有益的事情，也许是在明天预定的会议之后，在只有一位译员参加下举行完全单独的会谈来讨论我的建议。维辛斯基即时的反应表明这涉及到他个人的问题。他问，每一位外长不是可以带一位顾问吗？我同意了，并且说明我们的目的是进行十分坦率的谈话，不做记录，无需表示接受或拒绝，也不登报。如果我们能够取得一致意见，我们可以草拟一个联合文件。如果不能，我们就回到全体会议上来，通过激烈的斗争，辨个明白。

维辛斯基要求在我们的议程上加上对德和约的项目。我拒绝了。我说，这个题目我没有准备好，我还是新近才接任的，我们政府也从未讨论过这个问题。我个人

认为，把我们卷入到讨论一个在实质上我们观点不同并相隔有十万八千里的问题是愚蠢的。外长会议还得再开十天。到休会时，我们所达成的协议就只有我开给维辛斯基单子上的寥寥几项。

会议拖拖拉拉地开完了

在这十天中，我们交替地开了一些秘密会议——或者更正确地说，开些小型会议——讨论我们那张单子上的"小问题"。同时还开了我们进行宣传的全体会议。维辛斯基喜欢引用"俄国"谚语，如"把马放在马车后面"等来阐明他的论点。在提到我们自己过去的民族时，我编造了一些美国印第安人的谚语。有一天，他表示西方盟国在欧洲的兵力远远超过俄国时，我说这使我忽然想到要引用一句印第安人的老古话：宣传多得就象狗身上尽是跳蚤一样，不过这回全是跳蚤，而没有狗。这一次他向我让步了。很明显，对于唯一具有重要性的"小问题"，即改善我们进入柏林的办法，俄国人是寸步不让的。但是关于对奥条约中若干细小而困难之处，却取得了一致意见，并送回给各副手写进条约中。其他一些"小问题"都塞进了公报，在这里不值得一提。最后，6月20日，我们精疲力竭地签署和发表了公报，外长会议无限期休会，喝了最后一杯香槟酒，到六时左右便分手了，希望不会很快就见面。

这时发生了一个奇特的情况。八时左右，正当舒曼在主持记者招待会的时候，维辛斯基打电话给他，要求重

开外长会议。我们从法国朋友处获悉，维辛斯基的副手葛罗米柯从莫斯科打明码电话来，用粗暴的语言告诉他，莫斯科对于奥地利协议不满，会议必须重开。贝文和我同时到了法国外交部。当我们从吱吱嘎嘎的电梯出来时，吃得饱饱的贝文问我：

你知道我们工人唱的《红旗》歌吗？”我只得承认不知道。他说：“调子和《马里兰，我的马里兰》完全一样。你知道，那只歌就是从那里来的，让我们一起来唱，就象我们那些当工人的说的那样，作为一种团结的象征。”

随后我们就手挽着手用气力唱起来，走过肃静的法兰西第二帝国时期建造的接待室，在会议室的门口唱着最后几节。作为团结的象征，这是很动人的。

维辛斯基要求修改对奥协议中关于财务条款的措词，至于为什么要修改他却说不上来。我已经写过：“贝文祝贺他创造了一个新记录。苏联的协定都是靠不住的东西，而今天的更是靠不住了。不到一天，又要推翻不认账了。可是，他感到没有理由重新考虑我们休会的决定，或者修改我们的措词。舒曼和我作了简短发言，表示同意。会议就此宣告休会。到了午夜，当“独立号”座机升高向北飞返华盛顿时，巴黎，随后是伦敦的灯火逐渐在我们后面消失了。”

第二天，当我们走下飞机时，总统在机旁迎接我们。他说，“干得好。”在听了我的报告后，他发表了他个人对会议的评价，首先他再次肯定我们的通讯工作做得很好。

"国务卿逐日送给我报告，现在又送给我关于最近结束的外长会议的最后一个报告。" 随后，我在6月23日和24日分别和参、众两院外交委员会进行了会见。

我通过一个既有录音播送又散发书面文件的记者招待会，试图把外长会议的重大意义向全国说明，认为它是标志着美国和苏联两年来在欧洲的地位的一种变化。马歇尔将军在1947年说过，西欧的重大问题是能否恢复和重新获得它的力量，他预言西欧能够恢复它的力量，而苏联则说不能。经过两年的紧张努力，现在表明马歇尔将军的预言已经应验。外长会议就是一个鲜明的征象；表明苏联已从1947年的攻势态度转变为1949年的守势态度。他们不敢丝毫放松他们在德国任何地方或柏林的控制。因为西方政策的实质是在建立一个能够保证基本自由并使欧洲和世界的安全得到必要保障的制度下，把对德国所负的责任归还给德国人。正因为这样，而目前要在这两种不同态度之间取得协议已是不可能的了。我们希望使德国作为一个平等的国家，重新参加到自由和强大欧洲中来。我们不会从我们的目标后退。这项目标日益取得的明显成就是欧洲最令人瞩目的事实，而俄国人却硬是不愿承认这一事实。

十三　夏季带来了困难的决策

1949年夏季带来了困难的决策，或者可以说，这些决策带来了困难。一个困难是发表我国与中国的关系的白皮书；另一个则是要求国会批准为一个广泛的军事援助计划提供资金。这两者都是非常不得人心的。

中国白皮书

我们刚参加外长会议回来，我就做了一项有决定性的事情，这立即给我带来一个出乎意料的、尖锐而又极其麻烦的问题。起因是发表中国白皮书。正式名称是《美国同中国，特别是1944—1949年期间的关系》。费利克斯·弗兰克福特法官常说在知识上说来，我是一个失败的小学教师，因为我坚信事实和理性可以改变人的思想，尽管有大量材料证明并不是这样。他把这种特性归因于我在性格形成时期受到布兰代斯法官的影响。事实上，倒是弗兰克福特本人对我有很大的影响。

那年年初，当我同总统谈到国会和新闻界批评我们的对华政策时，我说这些批评大多是出于不明事实真相。马歇尔将军一直不肯把事实和盘托出，因为他担心会进一步损害委员长的日渐衰退的命运。现在已经很清楚大

陆上的国民党政权已接近垮台了，今后美国必将不再支持大陆上的政权。我极力主张编写一份以最近五年为中心的我国同中国关系的详尽报告，在它垮台时予以发表。总统表示同意，于是，成立了一个由富有学识和专长的人员组成的小组，在沃尔顿·巴特沃思的领导下开始工作，后来由无任所大使菲利普·杰塞普博士担任主编。1949年7月29日，中国白皮书连同我的一封信一起送交总统，并在几天之后发表。因为这是一份长达四百零九页连同附件共有一千零五十四页的文件，我递呈白皮书的信以《美中关系概要》为题单独发表。总统写了一个简短声明，强调指出他在“此时发表这份坦率和翔实的报告，其主要目的是为了保证我们对中国和整个远东的政策将以有情报根据和明智的舆论为基础。”二十年后，这本中国白皮书依然以其对事实作了公正、精确和博学的叙述与分析而屹立着。对于这本书的攻击虽然很多，但是都没能持久。这两者都不是我在准备白皮书时的希望。我作为一个阐明事实的教师，还是注定要失败的，这很象是十四世纪后期曾巴赫战役中的阿诺德·冯·温克尔里德，把奥地利人的矛都拿来刺进自己的胸膛一样。①

对那些相信美国万能的人来说，《概要》的结论是不合他们口味的。他们认为，每一个未能达到的目标，都只能用无能或不忠来解释。

不幸的但亦无法逃避的事实，是中国内战的不祥结果，为美

① 瑞士人在1386年的曾巴赫战役中打败了奥地利人。阿诺德·冯·温克尔里德是这一战役中传说的英雄人物。——译者

国政府控制所不及。美国在它能力的合理限度以内，所曾经做过的或能够做到的种种措施，都不能改变这个结果。美国所没有做的种种措施，也不会影响和改变内战的结果，这是中国内部势力的产品，这些势力，美国也曾试图加以影响，但不能有效。中国国内已经达到了一种定局，纵使这个定局只是因为未尽职责的结果。

现在已经非常清楚，就是我们应当面对一个事实上已存在的局势。如果把我们的政策建基于所愿望的想法，我们将不能帮助中国或我们自己。

与此同时，我宣布任命洛克菲勒基金会前主席雷蒙德·福斯迪克和科尔盖特大学校长埃弗雷特·凯斯同杰塞普大使一起参加国务院的顾问工作。我们对中国的目的依旧不变，但是，我们所面临的形势，使我们的选择余地已是极其有限了。

白皮书和声明的发表，受到国会各种集团和新闻界的一阵暴风雨似的辱骂。为了说明对华政策所以会激起这种情绪，我们必须回顾马歇尔将军任国务卿时代所发生的一些事件，其中大都是发生在我离职到我回任这个期间。

在中国问题上的感情用事

在这个时期中，有两个基本而对立的政治活动在积极开展着。通过马歇尔将军和参议员范登堡，有一个超党派的外交政策在指引着美国同欧洲建立一种新关系。这势必使美国放弃了一百五十年来的传统方针承担了巨大的负担和风险，它的影响至今尚难估计。与此同时，共

和党在1946年夺得了立法部门之后，正在谋求打破民主党对政府连续十六年的控制，因为这种控制已使人们极其反感。共和党的领导人毫不怀疑地认为，这将是1948年大选的结果。虽然这种说法一点也没有什么根据，我却认为马歇尔将军很可能也有这种看法。

党派的批评必然要在对外政策上找寻发泄的机会。中国问题正好适合这个目的并且日益成为集中攻击的目标。有人指责政府在对华政策上没有同共和党人商量，这种说法好象有理。其实在这方面一直是进行过充分的商量的，虽然在程度上不及欧洲政策；但是商量毫无结果。我们看不出有什么其他较有希望的政策可供选择。范登堡本人就坦率地承认这一点。他在参议院说，“一个人要否认同一项政策有过关系是一件很容易而又简单的事情。但是要提出本来应该采取另一种什么样的政策，就不那么容易了。我承认提出批评比提出正确的意见容易得多。”援华集团有一个可供选择的政策：企图用大规模的军事援助但不参与作战来打败中国共产党，这是他们那些考虑比较周详的同事和绝大部分美国舆论所不赞成的。国会和大部分新闻界都认为这个政策的实质是发动一场政治攻势，并企图阻挠为超党派的欧洲政策提供经费。在这种情况下，范登堡就不热中于讨论这个问题了。

可是，马歇尔将军为了改善范登堡的处境和欧洲复兴计划的进展，对共和党的要求和攻击都作了让步。1947年5月26日，解除了对中国的军火禁运。从4月到9月，当美国海军陆战队从华北撤退时，他们把六千五百吨军火“丢给”国民党军队。7月，魏德迈将军受命率领一个

调查事实的代表团去中国。9月，约翰·卡特·文森特被解除远东司司长职务——由沃尔顿·巴特沃思继任——并被派往瑞士担任公使，以平息共和党的批评和使他免遭共和党的直接报复。1948年，政府同意了一项援华法案，其数字甚至比国会最后通过的还要大。在这一法案中，国会拨给两亿七千五百万美元作为经济援助，一亿二千五百万美元作为特别赠款(军援)，归中国政府自由使用，不受美国政府支配。

在魏德迈将军于1947年9月19日给总统的报告中，最突出的建议是："中国要求联合国立即采取行动，实现在满洲停战，并要求把满洲置于五大国〔包括苏联在内〕监护之下，如果办不到，就根据联合国宪章实行托管。"理由是满洲快要落入共产党手中了。总统和马歇尔将军立即得出结论，认为如把这份机密报告发表，将在中国造成灾难性的后果。他们把这种看法通知了委员长，后者没有表示意见。政府发现它因为没有发表这份报告而受到一些人的激烈攻击，但是如果发表的话，这些人的攻击甚至会更加激烈。报告还建议在严格的条件下继续给中国经济和军事援助，并极力主张中国实行彻底改革。

同时，在整个1947年和1948年间，国民党中国的经济和军事形势继续向着全面崩溃的道路加速发展。在这个时期开始的时候，政府有二百六十万武装部队；共产党有一百一十万。政府在枪枝方面的优势估计是三比一到四比一。除了美军在中国战区协助重新部署中国军队和遣返日本军队，华北有美国海军陆战队以及美国军事顾问团所提供的援助外，从日本投降到1948年年底，美国

共向中国提供了十亿美元军事援助和相同数目的经济援助。

我不想在这里谈论内战的军事战役。关于国民党惨败的原因，派驻中国政府的美国军事顾问团团长戴维·巴尔少将的报告说得最清楚。这位将军报告说，国民党在政治军事上所犯的第一个大错误，是在日本投降后集中力量于军事上占领过去的日本占领区，而忽视有效的行政管理工作。而且军事上无知的最高军事统帅部的错误战略，加重了中国军队的负担。它不以巩固华北为满足，还给军队加上接管满洲的重担，这是一个超过其后勤供应能力的任务。企图以过小的力量担当过大的任务，把军队分散在几千英里长的铁路线上，而这些铁路以及它们所经过的城市必须一一加以防守，军队则都要从华中运来。军队从有进攻精神的野战部队，退化为防守交通线和卫戍部队，滋长了撤退到有城墙的城市的"城墙心理"，单纯采取守势，坐等始终不会到来的援军。主动权转到共产党手中。他们切断交通线，使国民党军队饿死。国民党军队常常一枪不放就带着全副装备跑到胜利者那边去。随着共产党的日益壮大，在1948年取得了明显的优势时，他们采取了一种更富有进攻性的战略。到1948年年底，他们已经控制了满洲和长江以北的中国大部分地区。

11月16日，巴尔将军在报告中说明了他的信念：

军事形势已恶化到如此地步，只有美国军队积极参战才能挽救……自从我到职以来，没有一仗是因为缺乏弹药或装备而失败的。在我看来，他们的军事崩溃完全可以归因于世界上最无

能的领导，以及使军队完全丧失战斗意志的其他许多败坏士气的因素。

“委员长的政治威信大大下降，并且大失民心。谁也不知道这个国家对他企图维持现政府而采取的新措施会支持到何等程度。因此，除非美国对迁都以后的政府给以包括使用美国军队——这我决不建议——在内的全面援助，我建议应该按照现在的计划撤退美国联合军事顾问团。

我就职的那一天，委员长辞职了，把那个共和国的总统职位交给副总统李宗仁将军。但是，他在辞职以前，已把中国的外汇和货币储备全部搬往福摩萨，并要求美国把预定运往中国的军事装备改运福摩萨。这就使李将军既无经费又没有军事装备的来源了。

遵照总统的指示，国务院征询了巴尔少将关于在1948年援华法案下美国陆军为中国政府采购的枪枝弹药的处理意见。巴尔将军主张把它们留在华盛顿州的班戈，等待中国形势比较明朗时再说。国家安全委员会担心军火可能落入共产党手中，建议总统同国会领袖磋商，主张在局势未澄清前暂停启运。总统和我在2月5日同国会领袖会晤，他们反对这种做法。白宫送来一份备忘录，指示我不应当停止对中国的军事援助，以免挫伤中国人抵抗共产党人进攻的士气，但也不必加速起运，并授权我可以对这一指示作出“协调的解释”，这是一个不值得羡慕的职权。

两天后，五十一名共和党众议员要求总统指派一个委员会调查中国问题并提出报告。我自告奋勇去会见他

们，并同他们讲道理。约有半数的人出席了会议，我在会上给他们提供了一件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的武器。当他们要我预测时局发展时，我回答说，如果森林里有一棵大树倒下来，在飞扬的尘土降落以前，人们是无法看清它的损害程度的。第二天报上就把我们的对华政策写成是“等待尘土降落”。尽管我试图解释说，这句话不是用来描述一个政策，而只是说明我对形势没有能力看得很远，但这种解释都没有用。要打狗的话，自然是随便拿一根棍子都顶用的，这个例子说明我编造比喻字眼的能力很拙劣——如果说是我可以滥用一个比喻的话。最好的还在后面呐。

第二天，内华达州参议员帕特·麦卡伦提出，援华集团建议贷给国民政府十五亿美元。有五十位参议员，其中半数是民主党人，写信给外交委员会主席参议员康纳利，支持这个离奇的意见。白皮书中最后一个文件，就是我于3月15日在总统的全力支持下写给他的备忘录，我完全拒绝这一建议。外交委员会也坚决支持政府。

4月中旬，共产党把等于是要他投降的条件交给李将军，并且扬言，如果到4月20日还不接受共产党的和平条件，就要渡过长江——魏德迈将军曾说过，一支有战斗意志的军队，就是拿着笤帚柄也能保卫长江。渡江是在半夜开始的。我们驻南京的大使馆报告说，“由于要害地点守军的叛变、最高统帅部意见分歧和空军未能给以有效支持，共产党简直是可笑地一下子就渡过了长江。”

作为对美国支援大陆上中国政府的最后评价，我们可以引用1949年5月5日李代总统写给杜鲁门总统的

一封信。他在提到美国在抗日战争时期给予中国的援助后，接着写道：

> 在若干年以前，马歇尔将军奉阁下的命令，调处我们和中国共产党的纠纷时，这种友好的援助政策尚继续不已。马歇尔将军曾为调处而尽了辛劳的努力。不幸这项工作，因当时的政府与中国共产党双方均缺乏诚意，致无结果。
>
> 虽然如此，你们的国家仍旧继续给我们的政府以援助。可惜由于我们当时的政府没有能够对这项援助作正当的使用，未能做到政治、经济与军事上适当的改革，致使你们的援助并没有产生预期的效果，我们的国家目前所处的窘境应归咎于当时的贻误。

回顾起来，白皮书对本章及本书前面有关各章所概述的事实作了耐心的全面的辑录，并在结尾引用中国代总统的来信，因而引起院内院外援华集团的痛苦和愤怒的咆哮，他们并且全力开动了所有的宣传机器，这是毫不足怪的。可是，既然这些活动并没有影响到政府政策方针，也没有影响到在忠诚不渝的汤姆·康纳利领导下的外交委员会对政府的有力支持，我们就进面谈谈这一多事之年的其他许多问题吧。

军事援助计划

政治问题的性质

在1949年首先得到立法部门批准的军事援助计划所引起的愤激情绪，来自人们心底里潜伏的比法案本身

所包含的任何问题要深刻得多的怒火——如要求实行节约和一个低水平的平衡的预算，不愿意面对和承担大国的责任，援华集团认为我们的兴趣和资金过于集中在欧洲方面，也许最重要的还是共和党人对1948年大选时总统得到完全出乎意外的胜利感到非常愤恨。这些都表现在1949年关于军事援助的争论中。这些因素在以后三年中都有所发展，到后来共和党人终于有了一种近乎虚无主义的愿望，竟然要摧毁他们想夺取的那个政府。由此而出现了对总统和国务院不信任的种种言论，对政府、教育界和宗教界中藏有共产党人的歇斯底里叫嚣，甚至出现了一点儿新的仇视外人的孤立主义味道。

讨论军事援助计划同讨论北大西洋公约一样，是从1948年初开始的，其动机是欧洲对斯大林的日益咄咄逼人的态度感到担心。1948年3月17日，西欧的英、法、比、荷及卢森堡五个国家在美国的同意和支持下，签订了布鲁塞尔公约。7月，华盛顿决定同这些国家会谈，有些会谈导致产生了北大西洋公约，有些则导致产生了共同防御援助计划。这两个组织虽然是分别形成的，但是，根源却是相同的。美国一些军官包括后来任盟军最高司令的莱曼·兰尼兹尔将军在内，被派到陆军元帅蒙哥马利勋爵设在枫丹白露的西欧联盟参谋总部，在那里，考虑了西欧防务计划和准备所需要的军事装备与物资清单。正当这些工作在进行的时候，捷克斯洛伐克的政变和柏林的封锁，暴露了西欧军事上的惊人虚弱和美国的毫无准备（当时我们在本国的地面后备部队只有两又三分之一个师）。

从最初讨论欧洲防务计划和军事援助计划开始，我们就为愿望的和可获得的东西之间的矛盾——换句话说，企图用适当的战略理论来为可获得的东西作根据——所苦恼。三年之后，矛盾依然存在(今天也是这样)。当时我们还没有大量战略家——军事的、半军事的和新闻界的——他们后来做了许多把他们自己和我们都弄糊涂的事情。

军事问题的性质

枫丹白露的军人所面临的问题是艰巨的。苏联在东欧约有三十个师。面对它们的是分散在整个德国的三个半师美国军队和两个半师英国军队，执行占领和警察任务。在欧洲的全部法国军队不足六个师，而且装备很差。比、荷、卢三国也可能调集到同样数量的部队。1948年初，集体安全条约的概念是在政治上有义务参战，以援助任何受到进攻的签字国。可能还包括所有签字国家都有义务准备必要的军队和计划。在华盛顿和欧洲，美国对核武器的垄断鼓舞着人们，希望美国在政治上承担参战的义务就足以制止敌人进攻或颠覆一个盟国，但是，在面对俄国操纵的共产党接管捷克斯洛伐克和柏林封锁时盟国所暴露出来的弱点，严重地损害了对这个理论的信心。1949年，俄国的核爆炸和1950年6月对南朝鲜的进攻，粉碎了“把我们的意图说清楚”就会提供安全的这种神话。

军人正确地开始考虑在尚未能使美国各种力量发挥全力以赴的作用之前，如何制止俄国侵占欧洲的进攻。他们的结论是开始时需要投资三百亿到四百亿美元，这是

不可能办到的。而且以后每年的经常负担也远远超过实际的能力。政策设计办公室的保罗·尼采在外出调查访问之后，建议将工作程序颠倒过来，以能够得到的资金数字来倒推它们可能产生的军事效果。接受欧洲经济的首要任务是恢复元气这个原则以后，就能够相当正确地估计防务可以使用的金额。当时假定美援的数字每年在十亿到二十亿美元之间，其结果就可以使得欧洲拥有一支能够阻止敌人用突然袭击来取得速胜的军事力量，并有一支能对侵略者本国领土进行惩罚性打击的美国力量的支持。这是把重点放在威慑力量方面。在该年下半年以后，我把这种努力称为是在痛苦地面对着掠夺者的软弱的欧洲共同体身上加上一层硬壳。甚至这还是一种夸大的说法，事情还刚刚开始哩。

到 1949 年 4 月各国总理在华盛顿会谈时，我们已能得到盟国提出比较接近实际的军事援助要求了。布鲁塞尔公约国提出一个联合要求；丹麦、挪威和意大利则分别提出要求。原来的原则是简单和切合实际的。共同防御援助计划不应妨害欧洲复兴计划。各国的需要应当统一考虑，军事装备应当统一分配。各国的军队应在协调的和一体化的基础上按照共同的战略计划来发展。应当尽量减少不必要的重复，并使可用的人力、财力和物力发挥最大限度的防御作用。在我们看来，只要各国在这些简单原则上达成协议，就可以开始建立欧洲军队，这一任务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为军队的最后部署和组织制订战略计划。

范登堡带头反抗

1949年7月25日，在北大西洋公约签署批准以后的几小时内，总统就要求国会授权拨款十四亿美元军事援助，并且要求政府在使用方面有广泛的自由。国会特别是参议院对此很不同意。参议员康纳利后来说，军事援助计划是租借法案以后在国会中最难制定的重大外交政策立法。当我在4月间到参议院委员会为北大西洋公约作证时，确实预见到军事援助计划通过的困难，当时参议员塔夫脱投票反对，因为他预见到军备竞赛必将随之而来。现在军援法案提出来了，他又一次跳出来吵闹，他有一批强有力的共和党同伙。难以对付的民主党参议员伯德、乔治和拉塞尔也以节约为理由参加了反对的行列。参议员范登堡也和他们一起反对我们。他的一贯策略是开始时加以反对，然后在修正案被提出后，才表示支持。范登堡夸张地指出，总统谋求独揽大权是可怕的错误。他写信给他的夫人说："这一法案授予总统的无限权力简直是难以相信的。它将容许总统把我们的任何东西在任何时候按照他的愿望任意出售、出租或赠送给任何国家。这实际上将使他成为世界上头号军阀。在今天的……委员会会议上，沃尔特·乔治、卡伯特·洛奇、比尔·富布赖特和亚历克斯·威利都百分之百支持我。……原来的两党合作这次确实已彻底破产了。……因此这是艾奇逊和我的一场紧张的'扑克游戏'。"

参议员康纳利、犹他州的托马斯、卢卡斯（多数党领袖）、泰丁斯、格林和麦克马洪等联合提出了这个法案。由

于范登堡现在是少数派，而委员会主席康纳利很能意识到这一点并对范登堡最近获得“国际主义者”的声望很有反感，这就使得“原来的两党合作”有点难以恢复了。

7月28日，我在众议院外交委员会的意见听取会上首先发言，在以后几天里得到国防部长路易斯·约翰逊、布雷德利将军、马歇尔将军和艾夫里尔·哈里曼大使的支持。我们预料到所提出的反对意见大都是已经公开讨论过的，因此回答了共和党议员提出的一连串新意见，大都是集中在把军事援助推迟到战略和组织计划制订出来，并得到所有北大西洋公约盟国同意之后是否可取这个问题上。这些建议将使最基本的军事组织工作无从开始，并且永远不能开始。民主党方面的背叛行为是不明显的。

可是，路易斯·约翰逊和我在8月2日出席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的联席行政会议时，我们发现范登堡已经发动一次反抗，在重要的民主党背叛分子的支持下，此刻他已取得了两个委员会的过半数支持。这位参议员以他平素惊人的能力记述了他在所谓“我们对军备计划的暴露内幕的摊牌中”所起的作用。他说，“我直率地把‘生活的现实’摆在艾奇逊国务卿和约翰逊国防部长面前。我给了他们一个最后通牒——要么提出一个新的合理的法案，否则你们的法案就通不过，而这是你们的过错！两个委员会都支持我——在这次颇有戏剧性的会议结束后，他们就到市区去草拟新法案了。”

我们试用新诱饵

其实，我们是到市区去见总统的，他采取了典型的明智的立场，因为他对法案授予他权力的那部分并不在乎；法案上规定这条是为了应付诸如对奥和约这类无法预见的事件，而这是不大可能发生的。他所迅速要的是经费。8月5日，我们向参议院提出一项新法案。范登堡得意地搓搓手。他写道："国务院于今天提出一项重整军备的新法案。他们已经向我的批评的百分之八十屈服了。新法案确实很好。但它要的钱仍然太多。"事实上，它批准的拨款只减少了九十美元，不过全部拨款被分成三类：北大西洋公约国家；希腊和土耳其；以及伊朗、朝鲜和菲律宾。范登堡担心总统拥有广泛的调动权力，因草案上规定了如国防部长在和参谋长联席会议磋商后认为动用美国的库存军火有损美国利益时即不得这样做而使他松了一口气。关于各类拨款之间的调拨问题，调拨的数额合计不得超过该类总额的百分之五。一般说来，新法案比较简短，它的目的同国会已经批准的北大西洋公约与其他军事目标有更密切的联系。

参议员康纳利不辞辛劳担任使法案在参议院得到通过的最繁重的工作，并对他的同事范登堡批评该法案的突出态度感到不太高兴，他于8月8日主持听证会议时企图支持我的新草案。他说，众所周知，这是原法案的新版本，它谋求消除某些有争论之点。他说："国务卿重写了这个法案，我要高度赞扬他这项宏伟的重写工作。这个法案博得了一些反对原提案的人的赞赏。"

在我的声明中，除说明法案的有限目的外，我遵照康纳利的暗示，还指出了它是怎样消除所提出的主要反对意见的。法案打算实施的并不是保卫欧洲抵抗主要进攻的确切计划。大西洋安全和世界和平的迫切需要，是要使人们清楚地认识到，快速进攻不能轻易取胜，并且这是不容再拖延了。可是，范登堡现在和由纽约州前来填补未满任期的参议员约翰·福斯特·杜勒斯联合一起，重新要求在北大西洋公约理事会制订能得到国会审定的战略计划之前，先作出一个只是作为过渡的办法。我反对这种犹豫不决以及可能是一拖再拖的作法，因而使得新闻界称这次意见听取会为一场"激烈的交锋"，虽然这种激烈大部分是表现在辩论性质上。

从那时以后一个月来，华盛顿发生了一场旗鼓相当的斗争，每个人包括总统在内都参加了这场战斗，双方互有胜负，犹如当年葛底斯堡战役一样引人注目[①]，并且证明政府和总统是能够并且愿意战斗的。虽然并没有放弃两党政治的精神，但是，却被小小的政治流血冲淡了。

捕到了一条鱼

主要的争论集中在批准拨款的条文方面。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有两个反对派：以参议员伯德、乔治、拉塞尔和众议员理查兹和沃里斯为首的一派，从经济理由出发想要削减拨款；以范登堡和杜勒斯为首的另一派，则从意识形态和经济理由出发，想要拖延拨款。另一派这两个人

① 指美国南北战争在 1863 年 7 月葛底斯堡的战役，这次战役通常被认为是南北战争的转折点。——译者

在8月15日公开提出他们的建议，要把条约援助拨款削减到十亿美元(削减了将近一亿六千一百万美元)，并且要求保证这笔款项只能用于援助北大西洋公约理事会所作出的共同防御计划。为了贯彻这一要求，他们主张立即核准一笔小额拨款，等到总统批准条约的防御计划时再拨付较多款项，并核准在1951年6月30日为止的财政年度拨付五亿美元。照他们的说法，这样可使国会在下届开会期间有“复审”的机会。这种意见是毫无价值的，因为它没有象提议人所说的那样，强调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理事会的最高权力及其共同防御计划，这个计划在没有司令官和参谋部的情况下，只能由华盛顿制定才能成立。可是，斗争的浪潮朝着突然的和意想不到的方向发展，以致政府只能超越意识形态，谋求一项尽可能完善的妥协办法。这就是以范登堡的办法来分化反对派和恢复超党派的精神。

8月16日，众议院委员会打退了理查兹和沃里斯先后提出大量削减这个法案所需款项的尝试，把法案提交众议院讨论。这个法案在众议院中遇到了灾难。理查兹和沃里斯联合提出修正案要求削减一半拨款。众议院处于一种狂热的情绪中。尽管议长雷伯恩离开了讲坛，站在众议院大厅中间为这个法案作了热情激动的呼吁，修正案终于以二百三十八票对一百二十二票通过了。这一打击既是出人意料的，也是令人震惊的。22日，总统在迈阿密对参加过国外战争的退伍军人演讲中重新集结我们的力量；两党在议会里的领导人开始做工作；众议院才从狂欢吵闹之中清醒过来，对于这种公然的不负责任态

度感到有些惭愧。

参议院的两个委员会，除对拨款数目这个重大问题没有讨论外，同意了参议院法案的其余部分。8月份是在谣言、建议和反建议的一片慌乱之中度过的。在此期间，华盛顿也为空军对B-36型飞机的辩论、英国货币危机、南斯拉夫和俄国的紧张关系、舒曼和贝文的即将来访以及佛罗里达州的飓风侵袭等问题所困扰。国会的风暴减弱到真正是茶壶里的微波。幸而风暴很快就过去了。在康纳利和诺兰两位参议员就蒋介石中国挪用货币储备问题激烈争吵之后，我们表示如果国会决定为了在中国"全部地区"所采取的行动的目标和政策而对军事援助计划增拨七千五百万美元的话，我们可以接受，但不一定动用这笔金额。大家同意这个办法。参议院的两个委员会先是否决了参议员乔治提出把拨款削减三分之二以上的修正案，接着又通过了大体上是范登堡提出的修正案。原来预期参议院会出现一场激烈论战，但并没有出现。康纳利在会上首先发言。范登堡声称这个法案是"对和平的廉价保险"。杜勒斯表示支持。所有削减拨款的企图都被推翻，9月22日，军事援助计划在参议院以五十五票对二十四票通过了。

逆风吹来了一些喜讯

这时我正在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的年会。副国务卿詹姆斯·韦布打电话告诉我说，现在发生了一件非常重大的事情，需要采取紧急行动，总统要征求我的意见。空

军将送行政秘书处处长卡莱尔·休姆尔辛带着文件飞来纽约，并说明一些不便在电话中讨论的事情。我们安排在我们所住的沃尔多夫旅馆套房里和卡莱尔会谈一小时。卡莱尔很快就来到了，他告诉我俄国已经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要讨论美国政府应当采取什么行动。他首先说明我们是怎样知道的和了解的内容，然后告诉我总统对这件事情的看法，总统准备发表一个简短而冷静的声明，草稿已由卡莱尔带来，要我也起草一份声明，同时发表，说明美国政府对这次爆炸，当前要采取什么行动。我和卡莱尔于9月23日在纽约一起拟出了这篇声明。

即使我和总统不在一起，总统还是不断使我充分了解情况并同我磋商的这一行动，是他作为政府首脑尊重下属和他一贯有秩序地进行工作的典型表现。这种做法使我在同联合国大会其他国家代表讨论俄国的原子弹爆炸时所说的话增添了无限的力量；它保证我们这些在纽约的人可以同我们自己的政府取得密切的联系；也使我能够指出军事援助法案具有迫切的重要性。

俄国又一次来帮助我们陷于困境的超党派外交政策，使它的创口凝结，并使分裂的国会团结起来接受参议院关于共同防御援助计划的意见。1949年10月6日，总统签署了这个法案并成为法律。

十四　国内外更多的会议

更多的会谈

同贝文和舒曼的会谈

从1949年9月13日开始，我同贝文和舒曼进行了会谈，有时是分别进行，有时是在一起进行，悉听他们的方便。所谈问题包括欧洲、地中海和远东。欧洲的情况变化得很快。9月7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联邦议院（下议院）在波恩开始举行会议。12日，一位白发苍苍、和蔼可亲的大学教授特奥多尔·豪斯当选为总统，15日，基督教民主联盟的康拉德·阿登纳博士被任命为联邦共和国总理。21日，德国的文官政府开始成立，同时公布了占领法规并设立了盟国高级委员会。联邦议院在第一天的会议上就要求各占领国重新审查它们拆迁德国工业作为赔款的政策。作为欧洲复兴的物资供应者，我们对要求重新审查极表赞同；法国是反对的；英国则处于无可无不可中，因为英国国内赞成拆迁，但他们在德国的占领区是一个高度工业化的地区，拆除工作已经达到需要在军队保护之下才能继续进行的地步。

因此，我们在9月15日把这个问题作为同新的德国打交道的第一件事进行会谈，这个问题很可能使我们发

生分裂。我们每一方都采取了可以预料得到的立场。贝文公开地表示忧虑。他说，美国人很幸运而迅速地完成了他们的拆迁工作。英国人还没有完成，目前正受国内和德国两种对立的舆论的夹攻。舒曼则力劝我们不要为联邦议院的行动而激动起来，从而让"德国人拆除西方的团结。"贝文同意有必要向德国人显示这种分裂盟国的把戏是不能得逞的。我争辩说，它可能得逞，拆迁的办法和马歇尔援助计划显然是不一致的，而且最后我们将会，也必然会放弃拆迁的计划。但是，如果我们听从他和舒曼的意见，那只能产生最大限度的恶感，而最后还得放弃拆迁。这极不利于长期消除法德两国的敌对情绪，而法国的领导人肯定是抱有这个目标的。贝文要求有宽裕的考虑时间。在反复几次陈述了这些意见之后，大家同意到11月份在巴黎举行会谈时再来处理这个问题。

奥地利是议程上的第二项问题。预料到法英两国将会强调要几乎不惜付出任何代价使俄国把军队撤出奥地利，我们已经准备好了一些经济数字，用来表示如果我们放弃任何重要立场的话，那么奥地利就难以生存下去。我们让萨姆·雷伯(我们对奥和约的代表)把代表们所听到的俄国的立场告诉我们。他还表示了他自己的意见，认为在当前的情况下，即便作出过分的让步，也无法达成一项和约。在巴黎的春季会议期间，短暂地出现过的一线希望现在已消逝了。不过，我们为了不听其自然发展，同意邀请维辛斯基在纽约进行一次非正式的会谈，以探索各种可能性。

9 月 22 日他同我们会晤时，证实了我们原先的担

心。他的态度极坏，指责我们想要诱骗他参加一次非法的外长会议。我回溯了业已在巴黎取得原则协议以便由各代表制订细则的一系列要点，指出俄国代表要么是拒绝讨论某一要点，要么是干脆否定这个协议。在若干问题上，他采取了极不合理的态度，以致使人怀疑他是否有诚意。从9月26日到29日举行了三次毫无结果的会议。后来，维辛斯基借口他在联合国工作太忙，要求暂时停止会谈，到10月6日再说。国务院向我和我的同事们提出了他们的看法，认为苏联现在之所以要把军队继续留在奥地利，是由于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的局面不宁，它的态度趋于强硬则是由于爆炸了原子弹、西方经济上有困难、以及共产党人在中国取得胜利。在同贝文的一次私下谈话中，以及10月6日同我们大家举行的另一次会谈中，维辛斯基在实质性问题上寸步不让。我向总统汇报了这个情况，建议国家安全委员会应就当前出现的严重问题进行审查，并尽早与国会领袖们进行协商，使他们得以参予作出任何必要的决定，但是在时间上应当注意不因公开讨论这个问题而影响到即将举行的奥地利选举。他同意了。于是对奥和约的讨论就一直“冬眠”到1955年，那时苏联突然签订了这个条约，作为防止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参加北大西洋同盟的一个步骤。

同贝文和舒曼的会谈，从奥地利又简略地谈到南斯拉夫，大家一致认为，在支持铁托与斯大林决裂的问题上，三国的利害是一致的。贝文说：“铁托也许是一个恶棍，但他是我们的恶棍。”——对这两种意见，铁托当然都是不会同意的。然后我们转到远东，在这方面，贝文的主

要兴趣是在中国，舒曼的主要兴趣则在印度支那。各人分别同我讨论了他们特别关心的问题之后，大家又一道研究了中国问题。

在讨论东南亚问题时，舒曼处处谨慎小心，对美国关心的问题毫无欢迎的反应。他说，法国不惜巨资，在印度支那为一切爱好民主的人们进行战斗。美国可以通过经济援助来帮助三个“新生的政府”(越南、老挝、柬埔寨)。它们自己是解决不了困难的。法国正在支持它们取得更多的独立自主。法国的军队和技术顾问是当地真正独立自主的政府在行使职能方面所不可或缺的。我说，我很高兴听到这一点。我们认为法国通过迅速行动以满足民族主义的愿望，将会更有助于防止共产党的统治。根据3月8日的协定，使这三个国家在外交上有更多的自主权力(当时三国的外交是由法国的海外部处理的)，将会鼓励亚洲各国政府承认它们并同它们打交道。但是，法国的议会首先必须批准这些协定。舒曼承认这几点都是言之成理的，不过，并没有什么明显的热情。

他对于中国没有什么意见，贝文却不是这样。他在某次会议中，当我详细说明我们从最近的痛苦经验里所得出的相当消极的结论时，他听得很不耐烦。简单地说，这些结论就是蒋介石和国民党在大陆上已不再起作用了，李宗仁的国民政府即将垮台。一时又看不出有什么可当领导的人物。虽然毛与斯大林还没有发生什么摩擦，可是总会发生摩擦。对于我们来说，承认是一个徒劳无益的姿态，它对中国共产党人和我们肯定都没有多大意义，只能使别的亚洲国家感到不安。结论是，等待适当的

时机，到中国内部发生动乱或中俄之间发生麻烦时才能采取行动。与此同时，我希望北约组织国家在政策上协调一致，我们都会对共产党中国施加贸易控制。

贝文要把这个问题带回国内去研究。他认为，我们在中国的利害有所不同；任务是要尽可能地协调我们的政策。美国正在从中国撤退；英国却想继续留在那儿，"把一只脚留在门内，看看局势发展。"英国不急于要承认共产党中国（这种态度不久就改变了），但是，他们在中国确实有巨大的商业和贸易利益，他们打算"抓住香港不放，留在那里。"他深怕美国的态度如果过分倔强，那就会把中国赶到俄国人的怀抱中去。我对此补充说，俄国人已经在那里了。我们同意不断进行磋商。

北大西洋公约理事会举行会议

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理事会9月17日的第一次会议上，我们没有重复在缔约时发表的感情丰富的长篇讲话。我当选为理事会的第一任主席。以后每年年初，主席的职位将依照国名的英文字母顺序由缔约国轮流担任。接着我们通过了理事会的组织系统表：一个防务委员会；一个常设在华盛顿的军事委员会，其执行机关（常设委员会）由英国、法国和美国军事代表组成；以及北大西洋地区五个区域的区域设计小组，并规定了这些委员会和小组的权力范围。理事会也预见到必须采取办法来对付有关本地区防务的其他两组问题：军事生产和供应的问题，以及经济和财政方面的问题。它指示各工作小

组准备意见，以供第二届理事会讨论。

耐人寻味的是，当时采用的组织形式几乎恰好是戴高乐将军今天会赞同的用以执行条约的那种组织形式——如果说当时有人竟然胆敢预测这位难以捉摸的人的看法的话。它是一体化的前期组织，旨在为缺乏协调和单独的行动规定一个总的计划，以便在一旦出现麻烦时能有一个计划和一支军队以资应付，并且使这项计划和军队能自动地发挥作用。在不到一年的时间，法国政府就带头宣称这个组织极不完善，要求建立一个统一的指挥部，拥有部署就绪的部队以及一个能使用盟国一切武器的战略计划。就此产生了北约组织的一体化防务，而戴高乐将军竭尽全力要加以破坏的就是这样一种尽善尽美的威慑力量。

同南斯拉夫的关系

在我担任国务卿的整个任期内，同南斯拉夫的关系由于铁托和我们双方关系既微妙又棘手，一直是我亲自指导的。斯大林和铁托决裂时我不在政府供职。1948 年 6 月 28 日，贝尔格莱德对莫斯科独裁统治的反抗日益增长，造成南斯拉夫被开除出共产党及工人党情报局这一共产党国家的组织，苏联并对铁托的背离行径发动了猛烈攻击。这事情发生在封锁柏林期间和空运开始四天之后，当时凡是莫斯科遭到的麻烦都是西方盟国的幸事。乔治·凯南的政策设计办公室立即看出在苏联铁板一块上出现这种破裂的重要性，认为这是民族独立和自身利益

的觉醒。凯南建议谨慎从事并暗中予以支持。斯大林显然决心要用政治、经济并在有机会的时候采取军事手段来粉碎这次背叛行为。我们的政策应该是挫败他，而又不在这一过程中惹怒他。

要贯彻这个政策，意味着要排除或避免在贝尔格莱德和华盛顿出现什么困难。虽然铁托对斯大林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领导地位进行的挑战是对苏联的国际活动提供了一种强有力的遏制因素，因此应该保持下去，但是，如果把铁托看成是西方的盟友，那却是错误的政策和错误的教训。他过去是而且今后长时期内还将是坚定的共产党人和警察国家的独裁者。把他看做是另外一种人，对他和我们都是有害无益的。可是，这种老老实实的态度却在国会里引起了许多困难，国会把共产党人看作一模一样的人。我在其他方面都毫无嫌隙的两个老友和支持者就抱有这种看法，并给我们带来一些麻烦，这两个人是众议院外交委员会的女委员埃德娜·凯利（布鲁克林民主党人，她自己就有南斯拉夫血统），和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汤姆·康纳利。可是，在行政部门中，国务院和白宫都一致认为支持铁托具有重大意义。

经济援助从 1949 年夏季开始，我们给了南斯拉夫一座轧钢厂设备的出口许可证和进出口银行的二千万美元贷款。秋季，我们在政治上成功地支持了南斯拉夫在联合国获得安全理事会理事国的席位，又支持它向世界银行和向德国人商借开发贷款。当年年底，总统任命了一位老练的职业外交家乔治·艾伦为驻南斯拉夫大使，并且授权他转达总统的话：我们对独立国家的主权完整的

支持象适用于其他任何国家一样，完全适用于南斯拉夫。我们还同伦敦采取一致行动，即一旦斯大林的咆哮发展成为更明显的威胁的话，就向南斯拉夫提供政治和武器援助。

大自然也插手这出戏了。1950年夏，南斯拉夫发生严重旱灾。他们的很干练的外交部长爱德华·卡德尔来到华盛顿，要求大量的贷款和赠款。旱灾不仅造成了国内的粮食短缺，而且使出口枯竭，以致不能为各项发展计划提供资金。在我们进行会谈时——1950年10月19日——我们正在国会中在军事援助、对华政策和麦卡锡主义等问题上都碰到实际的困难。我请卡德尔注意，由于他和我们都会遇到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我们不可能对南斯拉夫承担重大的财政援助计划，暂时只有以零敲碎打的办法以及从对欧洲的援助中打些主意，来渡过难关。结果并不太坏。我们从马歇尔计划的执行机构（经济合作署）和进出口银行方面，一共筹集了三千多万美元来购买小麦，并说服国会把原先拨给经济合作署的五千万美元转供救济南斯拉夫之用。

这样七拼八凑，直到1951年8月我们才能给予一亿五千万美元的经济援助。由于苏联进行军事干涉的传说日盛和局势更趋紧张，波波维奇大使接着要求供给武器。鉴于国会已在发表民主信念和说明需要的声明方面布下层层障碍，要取得军援是很不容易的。波波维奇一直是铁托打游击时的一员干将，身材魁梧，夜间最好不要在山中小道同他相遇。他的声音低如耳语，说的不知是何种语言，他的译员照本宣读据说是他讲的话，我往往不知道

他是否要讲这些话。提出来的都是他要求得到的军事装备的项目和数量，他又很不愿意详细说明现有物资存量这种问题，也不谈战争将采取什么形式和可能在什么地方作战。这类事情都是五角大楼官僚们切身相关的事情。我认为南斯拉夫人的沉默寡言倒是个聪明办法，他们最懂得他们需要些什么，也会很好地使用它们，如果我们能给的话——最后这个问题才是唯一实际的问题。我们终于在 1951 年给了他们大约六千万美元的军事物资，以后几年还要多一些。这使铁托度过了他的难关。

这种援助一个共产党国家的偏离正道的做法，几乎使国会中支持我们外交政策的一位好朋友受到致命的影响，他是外交委员会主席、南卡罗来纳州的詹姆斯·理查兹。他同许多南方的众议员一样，稳扎稳打地逐步建立他的资历，跻身于委员会中民主党人的前列，担任了主席。在这个过程中，他培养了搞外交的兴趣和才干，却忽视了为他的选区争取政治分肥。在 1950 年的预选中，一个年轻的竞选对手把理查兹为本选区争取联邦建筑和工程的成绩和对一些所谓南斯拉夫人的热心帮助作了一个不利的比较，他向理查兹提出挑战，要求理查兹确定南斯拉夫人和南卡罗来纳州的关系。不仅如此，理查兹先生也许还要进一步说明一下这些人是谁和是什么样的人。这次预选对这位主席说来，真是好容易才幸免于难，而且对他在外交方面的热诚也是一次挫折。

潘迪特·尼赫鲁的一次访问

在我践约前往巴黎同舒曼和贝文讨论拆除德国设备问题之前，我们在华盛顿又有另一个政治性和社交性的约会，印度总理尼赫鲁要来进行一次国事访问。他是怀着易怒的心情前来的，为所谓"美国干预"克什米尔争端而十分恼火。这是由于联合国的印度和巴基斯坦委员会(美国是委员之一)力图为两国在克什米尔安排停火而引起的。过去的种种建议既然都未能奏效，委员会便建议由切斯特·尼米兹海军上将对某些问题进行仲裁，他已被指派为公民投票的行政官。杜鲁门总统致函两国总理，敦促他们同意委员会的建议。尼赫鲁拒绝了这个建议。

这位大人物于10月11日到达。国事访问的社交礼节过去和现在都是一场最折磨人的考验。要举行三次大型的宴会(除了献花圈，对国会发表演说等等)，一次由总统在白宫为这位国宾举行；一次由国务卿为这位国宾举行，当时通常是在马萨诸塞大街的安德森大厦举行的；最后一次则由这位国宾在他本国大使馆设宴招待总统。所有宴会的宾客名单大致都没有什么变化；食物、饮料乃至演奏的音乐也如此；演讲也是如此。不仅这连续三次宴会是如此，而且所有这类的宴会都是如此。

我决定采取两项办法改变一下晚上的单调情况，这对于尼赫鲁来说没有一项是成功的。第一项是我在宴会上的讲话。这些讲话照例应该谈到整个历史上"我们两国之间的亲密而富有成果的关系"。这种题目一次宴会

就可以讲得一清二楚，而且我并不觉得我有能力来探讨“哈穆拉比法典”[①]对于英、美、印三国法学的影响。所以我试了一项新玩意儿，即席编出好象是美国历来的伟人同我们这位国宾在进行谈话，从而显出这位国宾具有多方面的本领。他作为他本国的国父，同我们的国父乔治·华盛顿将军谈话；作为民主政治的伟大政治思想家，同托马斯·杰斐逊[②]谈话；作为顽强的政治组织者和战略家，同老希科里[③]谈话；也作为在自相残杀的斗争中受过折磨的精神领袖，同“伟大的解放者”[④]谈话。其结果肯定同通常的做法有所不同，使我们的贵宾猝不及防，有如一个学生没有做好本当算为“容易课程”的课外作业那样。他并不很高兴。

另一项革新也未能达到目的。在欢迎晚宴之后，他和我去我家作纯粹私下的会谈，留下我的妻子和他的女儿英迪拉·甘地夫人（后来的印度总理）在安德森大厦。我本来希望，在无人干扰的情况下，我们可能建立起个人关系来。但他还是很矜持。他同我谈话，就象维多利亚女王所说的格莱斯顿[⑤]那样，好象把我当作一个群众大会。他从想要储备一百万吨小麦谈起，告诉我他打算减低印度小麦价格同其他物价的比价。他希望得到我们的帮助，以低于国际市场的价格售给他们小麦。我们已

---

① 即巴比仑国王哈穆拉比的法典，是西方最古老的法典。——译者

② 美国第三任总统。——译者

③ 美国第七任总统安德鲁·杰克逊的浑号。——译者

④ 美国第十六任总统亚伯拉罕·林肯的称号。——译者

⑤ 威廉·尤尔特·格莱斯顿（1809—1898），英国政治家，四度出任首相。——译者

在研究这个问题，我告诉他这需要经过立法手续，希望不久即可通过。

尼赫鲁议论别人的过失

他说，他收到印度尼西亚领导人哈达的一封电报，抱怨荷兰人想要他们负担过多的荷属东印度政府的债务，这些债务大都是在同独立运动作战时欠下的。荷兰人不应当"拖拖拉拉，直到丢尽了面子再作让步"。我引了埃德蒙·伯克[①]的话来表示同意："外交艺术方面很重要的一条是在无力拒绝的时候就大大方方答应好了"。由于我们的默尔·柯契兰大使的正确和善意的劝告，荷兰人已有所后退，但是我们打算再作努力。

潘迪特·尼赫鲁还觉得法国在印度支那利用保大是毫无希望的，并且注定要失败的，因为这位"皇帝"缺乏取得成功所必要的品质、才干和威望，并且法国人也没有给他有所作为的适当机会。我倒是同意这种意见，但对还有什么其它显而易见的取代办法表示怀疑。尼赫鲁认为民族主义运动就是一种取代办法，虽然他确信胡志明是个共产党人。可是他认为，要是以为共产党人会利用人民阵线政府来消灭反对者的话，那是把东欧的经验乱套到亚洲国家了。在印度和缅甸，共产党人是以民族主义运动的左翼而开始的，后来企图接管这个运动，但是失败了。他认为这种情况将在印度支那重演。在我看来，这显然是一种似是而非的想法，因为法国和意大利的经验

① 埃德蒙·伯克（1729—1797），生于爱尔兰的英国政治家和演说家。——译者

都证明，企图接管是不可避免的，结果如何将取决于对方的力量。由于民族主义运动的领导权已经掌握在胡志明手中，印度支那的结局似已相当清楚。

到这时为止，尼赫鲁一直在谈论荷兰人和法国人的缺点。我想尽可能在无意之中引他谈谈他自己的毛病。可是，他首先冲口而出的是关于承认中国共产党政权的问题，他在这个问题上的意见是值得注意的，因为这些意见对贝文的看法显然有促进作用。贝文大概不会让印度在英联邦内带头实施承认政策。尼赫鲁在第二天同总统会谈时也表达了他这个意见，他认为，现在除了中国共产党人别无其他选择，因为国民党在处理农业革命方而已经完全失败。但是，共产主义作为一种学说是同中国人的思想格格不入的，而且莫斯科在共产党国家中那种固有的外国统治作用，将在中国引起强烈的不满。印度同中国近在咫尺，"表明有早日承认的倾向"。总统和我一样，希望同亚洲事务有密切关系的那些国家在承认之前能进行磋商。虽然总理表示同意，我却觉得我们已经磋商过了。

尼赫鲁谈克什米尔问题

最后，当我敦促尼赫鲁通过坦率的讨论来帮助我就解决克什米尔纠纷取得一种切实可行的办法时，我得到的是既有公开演讲，又有怒气冲冲的发泄以及对他的对方深表不满的奇妙杂烩。他谈话的第一部分，是从法律上阐明最初的敌对行为和随后的侵略都是来自巴基斯坦。由此得出，印度不可能而联合国也不应当继续评论这个

问题的是非曲直，直到巴基斯坦人和部族人全部撤出克什米尔，结束侵略行动为止。他在谈话中间还穿插了对巴基斯坦的欺骗和阴谋诡计的强烈谴责。尼赫鲁对程序问题的想法似乎把谈判排除在外，他对争端本身的见解，也使得任何解决问题的可能性十分暗淡。他说，摆在面前的是一个深刻的意识形态问题。巴基斯坦认为它的国家的基础是宗教，它之所以对克什米尔提出所有权要求，是因为那里的居民大部分是穆斯林。尼赫鲁坚称，这种想法破坏了印度次大陆稳定的真正基础。印度这个国家完全是非宗教的。宗教既不是取得也不是丧失公民资格的条件；它是与此无关的。印度大约有三千五百万穆斯林，许多人都身居高位。承认以宗教为依据来决定各省归属哪一个国家，会在各地引起严重的动荡不安，而在此基础上举行公民投票，将有极大的煽动性和灾难性。

在这位总理看来，问题的结论是巴基斯坦这个国家无权要求克什米尔或其任何部分为它所有，必须迫使它的军队（而不是印度的军队）撤走。如果克什米尔人民想对他们的土邦主和事实上的总理阿卜杜拉教长作出的归附印度的决议提出疑问——尼赫鲁不相信会提出来——确定他们意志的最可取的办法，是通过“人民选出的天然领袖组成的制宪议会来讨论他们的前途”。这样可以导致一项全国性的决定，或是分裂。

到了这时，我们在劳碌了一天之后，又从十点半谈到凌晨一点钟，我的客人显然应该休息了。我则有点被弄得糊里糊涂了。因此，我们暂停这场有意思的谈话。它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我深信尼赫鲁和我不是注定要有

愉快的个人关系的。他对于印度是如此之重要，而印度的生存对我们大家又是如此之重要，要是他不存在——正如伏尔泰所说的上帝那样——也会有人把他创造出来。尽管如此，他是我打过交道的最难对付的人物之一。

巴 黎 会 议

11 月 9 日，贝文和我同我们的同事罗贝尔·舒曼在巴黎会合。总统再次来为我们送行。这一次，肯塔基州的约翰·谢尔曼·库珀作为我的共和党顾问和我同行。

我们的会议于 11 月 9 日的早晨开始，那天雷雨交加。同我一起参加会议的有我们的驻德高级专员约翰·麦克洛伊、负责欧洲事务的助理国务卿乔治·珀金斯、德国事务科科长亨利·拜罗德上校、政策设计办公室的保罗·尼采。三十年来，麦克洛伊在政府机关中进进出出，一直是这个国家的一位十分忠心耿耿和得力的公职人员。他生性梗直而坦率，对待新闻界也往往如此。他从波恩来到巴黎时，以率直和严谨的态度答复人们探询我们会议的目的，指出这次会议是要为拆除德国军事工厂计划找出一些补救办法，并且讲了为什么要这样做的理由。如我已经指出，因为法国人不愿意讨论这个问题，而英国人又对这个问题感到为难，因此会议之前发表这样的谈话不免惹起一场风波，特别是贝文的相当容易恼火的脾气。

会议开始时，贝文发动了一次猛烈的抨击，因为他的心脏不好，使我们颇为担心。幸而他虽然很快就上气不

接下气，却没有产生什么不良后果。舒曼转而向我求助。问题是得在请求宽恕之前设法使宽恕成为可能。关键则要看厄尼[1]的情绪了。这时我青年时代在教区牧师家里和教会学校的经历帮我解了围。我对舒曼说，"主席先生，我所能答复贝文先生的都写在一本英国书上了，《公祷书》写道：'想起我们的罪过对我们来说是痛苦的；罪过的重担是不堪忍受的'"。

舒曼不用翻译就急于插话说，"在天主教的书里也有同样的说法"。

厄尼不禁笑了起来，举起双臂装做失望的样子。他说，"我不懂，我不过是一个乡下的浸礼会教徒"。

我问道，"究竟什么是乡下的浸礼会教徒？"

他回答说，"我也不知道，他们就是这样称呼我们的。你为什么不问你们的总统呢？他很可能也是一个乡下的浸礼会教徒"。

我说我会去问的，后来我果然问了。我找到了我在返国后于 11 月 21 日写给贝文的信里有一段附笔："浸礼会教徒问题的权威杜鲁门先生说，早年山区的人很相信浸礼会的道理，认为这是对城市里伤风败俗的一种抗议。一个'乡下的浸礼会教徒'就是一个来自山区的浸礼会教徒"。

对德政策问题

争吵平息时，舒曼就问，在继续占领期间，盟国究应如何对待德国——是把它看作一个获得假释的敌人，一

① 欧内斯特的爱称，这里指贝文。——译者

个安全问题，还是用什么别的对待办法？贝文说，在英国，人们对德国有严重的敌对情绪。

在我看来，有一个结论似乎是明白无疑的。西欧和美国不可能在遏制苏联的同时，又压制德国和日本。我们最多只能希望这些旧日的敌人都是一个自由世界的结构的自愿而大力的支持者。我们应当欢迎德国回到西欧来，不要把它丢在外面，象1914—1918年大战以后那样，任凭它在苏联和盟国之间耍弄花招。如果要做到前一种情况，"西欧"就必须有名有实。美国的政策一直是通过欧洲复兴计划、北大西洋公约和军事援助努力朝着这个目标前进的。贝文和舒曼在欧洲委员会、西方联盟和支持马歇尔计划等方面也是这样干的。

我继续说，为了着手这一任务，高级专员们在同德国政府打交道时应该说话口径一致。因此，我们在考虑我们要德国政府做些什么和我们愿意作出哪些让步的时候，我们应当让高级专员们利用在拆除问题上以及对于限制和禁止发展的工业的问题上所作出的让步，以换取德国同意参加国际鲁尔管理委员会、同军事安全委员会合作以及贯彻执行非纳粹化和非卡特尔化的计划。其余的人都表示同意后，我们就转入具体问题。

在头一天晚上稍事休息后，我们几乎是继续不断地开会，一直开到11月11日凌晨两点钟。我们的会议有许多地方很象工厂在罢工最后限期以前常开的那种会议。我们在休息室里安置有软榻，以供精神不济的人休息之用——贝文认为这个设备大有好处。大会议室旁边的桌上不断供应茶、咖啡和三明治。负责专门问题的助

手分成几个小组出去研究方案。我们有一次中断了会议，以便法国内阁能够向舒曼发出新的指示；另一次中断是为了同特地来到巴黎的比、荷、卢外交部长商讨同他们有重大关系的问题。从广泛的政策问题转到个别工厂或产品的处理，又转到应该如何重视产品的竞争能力而不是光考虑安全问题等等。会议的成就在于它作出了许多具体而明确的决定。在这一过程中，时间、耐性和极大的善意是必不可少的。

贝文的坦率和明确的看法对会议帮助很大。拆除问题必须立即进行研究。凡专门生产军需物资的工厂必须赶快拆除，其余的工厂则保留下来，即便仅仅是为了将来扩大贸易和为了同德国人谈判时备用也是如此。他已经在考虑要让钢的年产能力从一千一百万吨增加到一千六百万或一千七百万吨，即使这会引起某些国家的“嫉妒”(人们已经可以看出舒曼开始感到苦恼)也在所不顾。贝文对于德国钢产能力问题感到腻烦了，这个问题拖延时间之长已远远超过波茨坦会议的设想。

舒曼的态度表现了新的一着。他说，以拆除作为目的本身不如把它作为一种赔偿手段更有意义，但是这牵涉到要以新的认识来考虑安全问题。德国的钢产能力过大将会妨碍欧洲的一体化。必须从整个欧洲的角度来看待钢产能力，要把安全利益、贸易情况和尊重国际协议以及我们不要使新的德国政府过分紧张的共同利益协调起来。在我看来，这种说法未免过于含糊，也过于圆滑。我相当直率地说，除了我们大家已经同意的十五个到二十个纯属军用的工厂外，其余工厂我们只能在毁掉和保留

之间作出抉择。我认为保留它们似乎较为明智，也较少危险。我又说，美国是不会提供设备来替换这些被拆除的工厂的。容许的钢产水平在当前无需提高，因为增加生产能力是一个理论上的而不是实际上可行的问题。英占区司令官布赖恩·罗伯逊爵士将军已经预见到如果继续在汉博恩和萨尔茨吉特拆除工厂，那里将会发生骚乱。经过许多小时的会谈，我们要求高级专员们对各种工厂中的每一个工厂给我们提出具体意见来。在我们最后一次会议中，法国内阁如贝文和我所建议的那样，批准了限制拆除的范围，只要目前容许的钢产量不再增加，而德国人又能接受我们指示高级专员所采取的立场。在这个极其困难的问题上所达成的协议标志着向前跨出了一大步。

在我们休会以前解决了另一个有些重大意义的问题，即准许通过总理领导下的领事处来开始筹组德国外交部的工作，并通过领事工作来照管正在恢复中的德国对外贸易。

最后，简短地讨论了承认中国共产党政权的问题，但是，这并没有使我们的意见有所接近。舒曼认为，如果中国共产党人同胡志明建立了关系，那就会给法国带来严重的麻烦。他希望我国和英国能对保大皇帝和法国现行的印度支那政策表示支持。我认为，中国共产党人对待我们驻沈阳总领事安格斯·沃德以及他们对待我们的权利和中国的义务所抱的态度，使我们无法予以承认。在我们能够支持法国的印度支那政策之前，法国必须采取行动而不仅仅是发表声明。贝文对此表示同意，并接下

去说，在12月中旬以前，英国人大概不会承认共产党政权。为了避免抗议，他最后又讲了几句对我而发的话。他说，国民党人在福摩萨有许多武器，英国人不把这些武器看作是对付共产党人的潜在力量，而看作是对英国和法国的潜在危险，因为在国民党人投降之后，这些武器可能被用来对付香港和印度支那。

我们实在不耐烦上这个圈套，于是通过了公报后就休会。

第一次会见阿登纳

11月11日，美国代表团从巴黎飞往法兰克福，住在巴特霍姆堡麦克洛伊高级专员夫妇的寓所，四周仍然戒备森严。德国是一个最近刚被打败的敌人。我从周围景象，从人民、军队、弹痕到德国和盟国的高级人物等方面所得到的印象，至今犹历历在目。到达后的第一天，我们驱车前往海德尔贝格我国驻欧部队总司令托马斯·汉迪的司令部所在地，同他和他的幕僚共进午餐，听取他们的意见。这座古老的大学城，同我在四十年前随我父亲来时的情景差不多。当晚，法国高级专员安德烈·弗朗索瓦—庞赛和英国高级专员伊冯·柯克帕特里克爵士在麦克洛伊家中同我们共进晚餐，饭后接见了高级专员公署的高级职员。然后在星期日，我们乘坐麦克洛伊的柴油火车沿来因河来到波恩，向这个新共和国的总统特奥多尔·豪斯致敬，并且和联邦总理康拉德·阿登纳博士进行多次会谈中的第一次会谈，这是我们亲密友谊的开始。

当时阿登纳还根本不是一个象他后来那样的家长似的知名人物。他当时七十三岁，大部分成年时期是在科隆担任市长这样一个文官职位中度过的，1917 年当了该市的大市长。他一直领导市政工作到 1933 年纳粹党人把他撤职为止，在以后的十年中，他曾两次被捕入狱。希特勒垮台以后，他成为基督教民主联盟的创始人之一，由于英占区内允许德国人进行政治活动，他积极参与了州和占领区的活动。可是，英国人对于阿登纳那种保守而强烈的天主教倾向抱有怀疑，直到他积极参加各占领区间的工作之后，美国人才开始赏识他的非凡才能。

人们对于这位总理的第一个印象是在他身上体现了能量不灭定律。他的举止和谈吐是慢吞吞的，难得做手势，笑的时间很短，往往是嘻嘻地笑而不是放声大笑，爱讲讽刺话。柯克帕特里克爵士记得他讲过，上帝犯了一个大错误，限制人的智力而没有限制人的愚蠢。阿登纳的宽阔的眉心和使他看起来象东方人的平坦的鼻梁，更增加了他的神秘感，他的平坦鼻梁是因为——爱说笑打趣的人坚持这样说——在儿童时代被马踢了一脚。

他的内阁成员和联邦议院议长同我们一起去赴午宴，总理在席间熟练而亲切地谈论他准备的名贵的德国白酒。然后他和他的助手布兰肯霍恩博士把麦克洛伊、珀金斯和我带到他的办公室。他开始慢慢地并且每隔几分钟就停下来等待翻译，谈到他对德国的远大希望和政策，又讲到已经有人告诉他，我们最近巴黎会议的结果将由高级专员同他商谈。

他观察问题的想象力和智慧给我以深刻的印象。他

非常关心要把德国和西欧完全结成一体。的确，他把这个目标看得比重新统一不幸被分裂了的德国更重要，并且能够懂得为什么德国的邻国可能把这看作几乎是重新统一的先决条件。他认为在一定程度上所有的人，尤其是德国人，都受到他们所处的环境的影响。纯粹的德国人和不纯粹的德国人不同；例如在圣路易斯的德国人就同在柏林特别在战前柏林的德国人不同。他希望德国人成为欧洲的公民，并特别要同法国合作，以发展共同的利益和前途，结束几个世纪来的敌对状态。当德国东部尚用活人献祭之时，查理大帝捍卫了欧洲的文明。[①]而作为查理大帝的继承者，他们的共同传统是沿着来因河传给他们的。他们必须领导欧洲的再生。阿登纳最后表明，他对重新武装德国不感兴趣。血已经流得太多了；在这个时候把武器给德国是太危险了，正如最近任命罗科索夫斯基元帅来指挥改组的波兰军队一样危险。即使麦克洛伊事先曾对阿登纳高度赞扬，这位德国政府首脑的见解仍出乎我的意料，它为欧洲的新时代带来了希望。他的言论由于他给人以家长似的印象而增加了威信。虽然他比我现在还年轻几岁，当时人家已经称他为“老人家”，可能是由于如我前面所说的，是他善于保持和慎于使用精力的缘故。

我不久就知道并不是所有的德国人都同意他的见解和保持他那种镇静态度的。他的主要对手社会民主党领

① 查理大帝或称查理曼，公元 768—814 年法兰克人的国王。查理曼帝国在查理死后分成三块，一部分即今法兰西，一部分即今德意志，一部分即今意大利以及越过阿尔卑斯山脉直趋来因河流域的楔形地带。——译者

导人库特·舒马赫就是严酷暴戾的性格和民族主义的、咄咄逼人的思想兼而有之。在我同阿登纳谈话后不久，我会见了他的这位对手和两个比较很有吸引力的助手埃里希·奥伦豪尔和卡洛·施密特博士。据说由于纳粹的拷打，舒马赫的一只手臂和一条腿已经残废。他走路时由一位壮健的金发妇人扶着。我们刚刚相互问候致意，他就大肆攻击阿登纳同占领当局合作。他认为德国应该采取的正确政策是在东西方之间保持中立，并从德国土地上撤走一切外国军队，从而取得苏联同意重新统一德国。当我指出俄国在5月的巴黎外长会议上的态度很难使人相信在这种政策下可以取得这种结果时，他就把矛头转向了我。我坦率地告诉他说，社会民主党企图以诽谤中伤占领当局的办法来讨好选民或俄国人，只会很快地受到打击。为了消除希特勒和纳粹主义并使德国得以进入欧洲社会，我们大家都作出了很大的牺牲。他要是认为占领当局会容忍在西方盟国和苏联之间进行挑拨离间以从中取利的话，他就错了。在这次会谈之后不久，舒马赫在联邦议会中谴责阿登纳不是德国的总理而是占领区的总理，为此他受到停职三周的处分。当舒马赫去世，社会民主党的领导易人之后，该党在德国政治生活中很快地就起了建设性的作用。

在一次大规模群众欢迎大会后，总理驱车送我们到波恩车站以便乘火车回去。当我们驶过车站广场时，天色已黑，广场上人山人海，我们穿过车站直达火车旁边的站台。这对在外面等候人们来说，一定是很失望的。看来这也不是聪明的办法。当时的阿登纳还不是后来那样

的有名人物，他有必要树立威望。使他的保卫人员感到吃惊的是，我劝他单身同我走到广场中央去，同大家握手。结果立刻就有大量的人冲过警卫线，欢声雷动地把我们拥上火车。阿登纳和德国人在1949年所需要的是某种善意的无秩序。

第一次访问柏林

第二天，我们从巴特霍姆堡飞往柏林。我们在那里的访问自始至终是一次令人兴奋的经历。这个暴露的前哨阵地的精神状态很好，从美国占区司令官马克斯韦尔·泰勒将军和迎候在那里的仪仗队，直到埃内斯特·罗伊特市长和柏林市民都是如此。当时的西柏林并不是后来那样繁华的城市，仍然是瓦砾成堆，断垣残壁，一副严酷的破坏景象。当人们通过勃兰登堡大门（这是在有了柏林墙的十多年以前）进入东柏林的时候，人们就从熙熙攘攘，很有生气的地方，到了一个冷冷清清、静止、但并不沉默的境界。

在高级专员的柏林寓所午宴上讨论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我应否到东柏林去。有人认为这会是挑衅性的，会在苏占区引起事故，甚至是危险的事故。泰勒将军对这种谈论感到不耐烦了。

他说，"跟我来，你有权利到那里去。我们就来行使这个权利。"我们两人就坐上他的车子出发了，车右边挡泥板上飘扬着一面小小的国旗，左边是一面代表他的军阶的三星红旗。这些并非不引人注目。到了勃兰登堡大

门，护送我们的军警退往路旁，我们就开过去了，我感到非常孤单。在第一个交叉路口，我们遇到红灯停下来，有许多车辆逼近我们的周围。这位将军高兴地对我说，"如果现在不发生什么事情，我想我们就用不着担心了"。

我们倒是用不着担心。可是，尽管有了旗子，我注意到没有人停下来看我们的车子开过去。将军解释说，任何人这样做就会引起对他不利的注意。在沿着有象样的店铺的斯大林大街行驶了一小段路程之后，我们转到大街两边后面的街道去察看。这就暴露了这条大街是为这个单调而破败的城市粉饰门面的波将金外壳①。

回到西区以后，罗伊特市长在市政厅迎接我们，并将市政委员会的成员介绍给我们。他是一位颇有胆略、给人以极深印象的人，代表着柏林精神的真正实质。他对我们说，任何以为可以说服苏联从东德撤军的想法全然是无稽之谈。他们一旦撤退，同他们合作的当地共产党人就会在一次血腥清洗中被清除掉。当市长和我走到台阶上时，群众给我们的欢迎是激昂动人的。俄国人占领这个城市、封锁和空运都是最近的经历。西伯利亚军队使他们看到的苏联力量的性质，同报上比较脱离实际的夸夸其谈和舒马赫的脱离接触学派的分析相比，就逼真得多了。他们对我的欢迎，显示了柏林人寄希望于美国的信心。

在泰勒将军为我会见英、法、苏三国司令官和他们的僚属举行了招待会之后，我们难忘的柏林之行随之结束

---

① 格里戈里·亚历克桑德罗维奇·波将金(1739—1791)，俄国的亲王和陆军元帅，以善于弄虚作假著称。——译者

了。访问结束之前还有一个小小的插曲。苏占区军事长官和柏林苏区司令员朱可夫将军来参加了招待会，使我赢得了一次打赌。泰勒告诉我说，自从一年多以前开始封锁柏林以来，还没有一个俄国人参加过社交集会。然而，六个月前在苏联驻巴黎大使馆举行的一次相当沉闷的宴会上，朱可夫将军和我曾使气氛活跃起来，因此我打赌说他是会来的。

当晚九时半，我们离柏林飞往华盛顿，第二天午后到达。在飞机的舷梯下面站着总统，一群朋友聚集在他的周围。“工作做得好极了”，他说，“跟我一道回去谈谈吧”。

十天后，彼得斯堡议定书于11月24日公布了。这是高级专员们和总理共同制订的一个范围很广和非常令人满意的协议（以波恩市外山顶他们的总部的所在地命名）。它包括了并且大体上解决了我们在巴黎详细讨论过的许多麻烦问题。1949年，我们已沿着德国复兴的道路前进了一大步。

十五　对政策的重新估计

中国问题再度突出

1949年12月初，代总统李宗仁引退，蒋介石逐步重新控制了国民党政府。12月8日把首都迁往福摩萨岛，这样，中国政府和它的货币储备在流亡中又结合在一起了。在贝文的指示下，弗兰克斯大使12月16日告诉我说，英国政府不久将撤销对蒋政权的承认，转而承认毛政权（他们分别于1950年1月5日和6日这样做了）。我答复说，我们不会这样做，参议员康纳利于12月29日也发表了他自己的大致相同的意见。与此同时，国防部长再次提出了美国关于保卫福摩萨的政策。

从1948年10月到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这个政策——即不使用美国军队来保卫福摩萨——从来没有动摇过。国务院接到指示，要尽最大努力用外交和经济手段来防止这个岛屿落入敌视美国的人的手里。在国务院、国防部包括参谋长联席会议的经常审查和一致支持下，这些原则一直得到总统的同意。1949年8月，我向国家安全委员会报告，不能再依靠外交和经济的措施来使福摩萨不致落入敌手，并要求再作审查。再次肯定了不把军事力量卷入的意见。

新泽西州的共和党参议员亚历山大·史密斯于11月写信给我，建议在对日和约签订以前，如果我们认为福摩萨依然是日本的领土，美国作为占领国就可以对它承担某种保护的义务。后来他暗示说，麦克阿瑟将军支持这种看法。于是，约翰逊国防部长要求参谋长联席会议再加审查并提出建议，这次是要从单纯的军事观点出发，而不必着眼于政治上的考虑——不论这些话究竟是什么意思。各军种参谋长再次反对美国军队的卷入，但建议拨些经费来提供军事物资，并成立一个调查团。我反对这种玩弄圈套的办法；国家安全委员会支持我的意见；总统也同意我的意见。几天后，诺兰和塔夫脱两位参议员同前总统胡佛公开鼓吹用美国海军保护福摩萨。几个月前据说中国驻华盛顿公使向蒋介石提出的劝告："如果我们在程序上严格遵守美国的法律"，前任大使胡适反对同立法部门保持密切联系的做法是"不对头"的，人们可以看出，这一劝告不无道理。

尽管看来也许不可能，但是，在讨论对福摩萨的政策时，仍然引起了进一步的混乱。夏天，魏德迈将军建议要给新闻界和新闻发布官员准备一份指导性的文件，其用意是在福摩萨很有可能陷落到中国共产党人手里时尽量缩小其意义和不良影响。12月23日，就送给麦克阿瑟将军在东京的总部(同时也分发给许多别的人)这样一份文件。那里有人——至今没有查出是谁——把它放到发布新闻的文件箱里。报馆收到后真是喜出望外，文件的大段引文迅即传遍了全世界。国会群情哗然。参议员诺兰等人要求把全文和草拟这份文件的人员的全部名单公布

出来。我拒绝了这两项要求，对文件承担全部责任，等待这场风波平息，后来果然平息下去了。人们至今还不明白，诺兰和史密斯的这个意外收获，是否仅仅由于事有凑巧再加上麻痹愚蠢促成的。

也许是我自己对新闻界态度不严肃而受到应得的报应吧。圣诞节前，我对他们祝愿说，“圣诞老人将在你们每人的袜子里放上一条抢先获得的新闻，这条新闻有这样两个特点：第一，它将使你们每人大大增加工资；第二，它不会使我难堪。”他们至少已得到了有关他们那一部分的祝愿。

当我把圣诞节这一周的大部分时间浪费在设法同休会期间的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安排一次会议来澄清我们对福摩萨的意图之时，中国共产党人却指责说美国即将占领这个岛屿，并引证了塔夫脱—诺兰—史密斯—胡佛的建议。总统决定他必须立即发表讲话，而且要讲得十分干脆和坦率，以制止进一步的宣传和揣测。1月5日，在他向国会发表国情咨文的次日，他发表了一份有四节的新闻公报。在这份新闻公报里，他在宣告美国无条件地认为福摩萨是中国的领土之后，接下去说：

美国对福摩萨或任何其他中国领土都没有野心。在目前，美国不想在福摩萨取得特别权利或特殊利益或建立军事基地。它也无意使用它的武装部队来干预当前的局势。美国政府不会采取导致卷入中国内战的方针。

同样地，美国政府将不向在福摩萨的中国军队提供军事援助或军事顾问。在美国政府看来，福摩萨的资源足以使他们能够

得到他们认为保卫该岛所必需的东西。美国政府建议，根据现行的立法授权继续执行经济合作署目前的经济援助计划。

当天下午，我奉总统指示会见报界，向存心捣蛋的新闻界澄清政策。我扮演了一个灰心丧气的小学教师的角色，我说，美国向全世界讲话不仅是通过国务院，甚至也不仅是通过总统和国会，而是通过全体美国人民的全部言论和行动。两周以来，我们大部分时间是以这种方式向全世界谈论福摩萨问题的。华盛顿生活的通常过程发挥了为人们所熟知的作用。泄密继之以反泄密，流言继之以反流言。显要的政治家也起了作用。谣言变成了事实的报道。我接着说，换句话说，美国的民主政治虽然是在正常地运转，结果却弄得我们自己的人民和外国人完全晕头转向。总统希望对此加以澄清，而不是发表任何新的声明。

首先，总统已经指出，我国政府认为福摩萨是中国的领土。四年之前，我们把它夺了回来，并且按照公开作出的诺言，把它交还给中国政府，从那以后一直归它治理。不论别人可能会提出什么样的政治上或法律上的诡辩，就美国政府来说，福摩萨是中国的：

其次，总统已经说过，在中国内部就福摩萨所引起的争论中，美国政府决不使用它的军事力量。它不会夺取这个岛屿；它决不会在军事上卷人。政府中没有一个负责的文武官员认为，我们的军队应当卷入该岛。

第三，总统还接着说，美国政府不会向岛上的中国军队提供军事物资或军事顾问。在岛上的那些人自有丰富的资源可以购买他们可能需要的任何东西。过去已经给

了他们大量补给品。他们在保持该岛中可能面临的任何困难，不在于补给不足，困难是在其他方面。“提供抵抗的意志和抵抗的目标，既不是美国的职责，也不是它愿意或能够提供的，这些必须由他们自己提供。”

我的声明最后对总统讲的“在目前，美国不想在福摩萨取得特别权利或特殊利益或建立军事基地”那句话中“在目前”这几个字作了说明：

> 这几个字并没有在任何方面限制、修改或削弱总统声明中所申述的基本政策。它只是认为，在发生我们在远东的军队可能受到攻击这种不大可能和不幸的事件时，美国必须有完全的自由在任何地区采取保卫其自身安全所必需的任何行动。

这两项声明至少在一段时期内结束了在福摩萨问题上所引起的公开辩论。

在中国失败的问题

1950年1月12日的演讲，即《中国的危机——对于美国政策的审查》，曾被称为“艾奇逊国务卿历来所发表的一篇最卓越而又最引起争论的讲话”。这两个形容词很有意思。第一个形容词之所以有意思，是因为恭维的程度显然取决于作者对我其他一些讲话的未知的评价。第二个形容词之所以有意思，则是因为虽然我的讲话立刻激起了争论，主要的争论却是后来才引起的，而且所牵涉到的不是我关于中国的讲话，而是另一个完全不同的

问题即朝鲜问题所作出的推论。我这次演讲还另有一个用意，即力图奉劝那些自封为表达民意的人，在动笔之前先想一想，不要把政治辩士们感情用事的或有政治意图的言论当作新闻加以报道。在我演讲的前一天，这种政治辩士之一就广泛引用了参议员塔夫脱的话，因为他在参议院指责国务院已“受一个左翼集团的支配，这个集团显然要把蒋一脚踢开，至少是愿意为此目的而把中国交给共产党人。”参议员范登堡曾因此而斥责过他。当时，毛泽东正在莫斯科同斯大林谈判，结果签订了 1950 年 2 月 14 日的中苏条约。这正是谈亚洲问题的一个火上添油的时刻。

我在讲话中，首先说明我对于良好而有效的政策的形成是怎样看的。我说，人民之间的关系，取决于那些国家的人民的根本态度、利益和目的。从这些态度、利益和目的中形成了日常的行动，并发展成为政策。政策必须在双方都这样产生，才能成为良好的政策。政策必须通过国民生活的一切机构和团体如报刊、电台、教会、工会、工商业团体讲得明明白白，才能成为有效的政策。在亚洲，人口众多，种族、思想、语言、宗教、文化差异很大，发展也大不相同。但是，普遍存在着两种共同的根深蒂固的态度，就是对于千百年来的贫穷和悲惨生活以及对于近代外国的统治十分反感。两者合在一起，就在亚洲各地激起了民族主义的革命力量。希望和愤怒取代了逆来顺受。

我继续说，有许多人被中国发生的事件弄得迷惑不解，未能了解这种背景，探索奥秘的原因，而责怪美国把

事情搞糟了。任何神志正常的人，都不会相信国民党政权是被优势的武力所推翻的。蒋介石是经过战争冒出来的中国人民领袖，反对他的只是一派人，即衣服褴褛、装备不佳、人数不多的山沟里的共产党军队。蒋拥有中国历史上任何统治者都未曾有过的最大的军事力量，得到了美国的支持和经济援助。四年之后，他的军队和在国内外所得到的支持都消失了。他成了沿海小岛上的一个逃亡者。

我说，把这归咎于外援不足，完全是错估了中国事态的发展和有关的各种力量的性质。中国人民那种可说是无穷的耐心已经到头了。他们并没有推翻政府。并没有什么可以推翻的东西。他们只是不理睬政府而已。共产党并不是这种局面、这种革命精神的创造者，而是驾驭这种形势和精神，趁此取得胜利和权力。

我说，这就是对亚洲事态的发展和亚洲人民态度的现实的解释。在我国的整个历史中，美国人对亚洲各国人民的态度，并不是把他们当作强权战略的马前卒，也不是当作经济剥削的对象，而只是作为人民而对他们感兴趣。一百年来，有些美国人到亚洲去，想把他自己认为最宝贵的东西即信仰提供给亚洲人。他们想把自己关于人对上帝的性质和关系的想法告诉亚洲人。其他一些人是去提供他们的学识，或为亚洲人治病。还有一些可能为数不多的人则是去学习深奥和优美的亚洲文化；也有人是去从事贸易的。这种贸易占美国在远东的利益的极小一部分，在美国的贸易利益中也是极小的一部分。

在亚洲的城市、乡村、教会和社会团体中的美国人，

他们的利益的突出因素是，它多年来同亚洲人民的利益并行不悖。在中国、菲律宾、印度、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和朝鲜，它一直是强有力地甚至感情用事地支持当地人民掌握自己的命运，不受外国的控制。如果说我们的主要兴趣是要阻止共产主义的传播，那就完全本末倒置了。我们当然反对共产主义的传播；它是俄国帝国主义的阴险而有力的工具，一直是旨在使我们和亚洲人民的共同利益，即他们在没有外力控制下自主地发展的利益化为乌有。

我指出，早在共产主义以前，俄国世世代代就以统治亚洲各国人民为目的，其统治中国北部人民的企图最为坚持不懈。苏联继续实行这种政策，企图扩展它的势力，甚至想使外蒙、内蒙、新疆和满洲脱离中国。不应该看不清这一最为意味深长、最重要的事实。我们不应当把中国人对俄国人的义愤和仇恨转到我们自己身上。我们现在同过去都赞同中国人的观点，认为谁破坏中国的领土完整，谁就是他们的敌人。凡是宣称忠于莫斯科的人，就是宣称忠于中国的敌人。

我的讲话从政治主题转到了"军事安全问题"。其目的是要讲清楚美国政府在保卫太平洋的重大利益上已作的事情，而不是去推测万一在亚洲发生各种紧急事件时美国政府会作些什么。我们在西半球和岛屿属地以外的防御岗位是菲律宾以及被解除武装和被占领的战败的日本。这些是我们无可逃避的责任。我们已经把我们的防线，即一条设防的并配备着我们陆海空军的防线，推移到西太平洋的边缘。在不满一年以前，即在1949年3月1日，麦克阿瑟将军在东京接见记者时曾谈过这一问题：

我们为了对付亚洲侵略的防御部署，通常是以美洲西海岸为基础的。

太平洋被认为是敌人可能进犯的通路。如今太平洋已成为盎格鲁—撒克逊的内湖，我们的防线贯穿了亚洲海岸边缘的一连串海岛。

这条防线从菲律宾开始，延伸到包括它的主要堡垒冲绳岛在内的琉球群岛。然后折向日本，经阿留申群岛直到阿拉斯加。

我的防线，称为我们的环形防线，是与麦克阿瑟的防线一致的。但却是从东北到西南的："这个环形防线经阿留申群岛到日本，然后到琉球。我们在琉球群岛上设有重要的防御阵地，这些阵地我们将继续保持下去。……这个环形防线从琉球伸到菲律宾群岛。"

由于有参谋长联席会议和麦克阿瑟将军的权威支持我，我没有想到竟会被指责为政策上别出心裁或政治上标新立异。不过为了保证我不致被误会或歪曲，我又加上了两段说明，以便照顾到我们自己防线以外的利益：

就太平洋其他地区的军事安全而言，必须讲明，谁也不能担保这些地区不受军事进攻……

如果发生这种进攻……开始一定要依靠受到进攻的人民起来抵抗，然后依靠整个文明世界根据联合国宪章所承担的义务。到目前为止，决心保护自己独立、抵抗外来侵略的人民所依赖的联合国，一直表明它并不是一根脆弱的芦苇。

对几个特定的地区作了简短的说明以后，我得出结论说，东西方之间在亚洲的老关系已经完结。如果要以

有效的新关系来代替它，这种关系必需建立在互相尊重和互相帮助的基础上。我们是准备帮助人家的，但只能在人家需要我们的地方，在帮助的条件合乎情理和可能的情况下，我们才能进行帮助。因此，刚刚破晓的新的一天，接着可能丽日当空，也可能天色阴暗和细雨蒙蒙。到底怎样，将取决于亚洲人民的决定，外国人，不论是友是敌，都不能越俎代庖。

报上对我这篇讲话的评论，有的平平，有的赞许，却被一件更为重大的事件压倒了。1月13日，联合国安理会的苏联代表雅各布·马立克在宣告在中国国民党代表被驱逐出去以前，苏联将不参加安理会也不承认它的行动的合法性之后，退出了会场。俄国这一关键性的错误，为五个月后联合国一致反对向南朝鲜发动的进攻创造了条件。

但是，国会中的援华集团立即向我开火。斯泰尔斯·布里奇斯参议员要求通过对政府的不信任案，并停拨经费，直到政府改变政策为止。第二天，中国共产党没收了我们在北京的领事馆房屋和财产，从而否定了1901年和1943年条约，这个消息一宣布，就掀起了一场新的争吵。参议员诺兰要求我辞职。维辛斯基先生也从莫斯科向我攻击。可是民主党参议员都投票支持我们的远东政策。

1月19日，来了一个意外的猛烈打击。我写信给女儿说，“这是一个难以应付的日子，不是就工作而言，而是就麻烦来说。在朝鲜问题上，我们在众议院吃了败仗，我看这是我们自己的过错。我们不应该只差一票而被打败〔票数是一百九十三票对一百九十二票〕。我们只会说好

话而毫无作为。我们现在落后一大段了。”

麻烦的起因并不是一个重要的或有争论的议案，而是 1950 年对援助朝鲜追加一笔较小拨款的问题。我们应五角大楼从朝鲜撤出余下的几师军队的要求向联合国提出了一个决议案。按照这个决议案，所有外国军队(即苏联的和我们的)应撤出朝鲜，并在 1949 年年中确实撤出了。我们这方面，只留下了一个约五百名官兵的顾问团，以完成南朝鲜军队的装备工作。我们希望采取某些经济措施，来提高南朝鲜的士气。因而提出了上述的议案。因为这看来是一件很小而并无害处的事情，我们放松了通常的警惕，被援华集团的共和党人和精打细算的南方民主党人联合起来，乘我们不备，来了个突然投票，把我们打败了。

总统和我对发生的事情都表示了我们的“关切和惊愕”，要求及早补救。于是把“援助中国法”延长几个月，和对朝鲜追加拨款的议案一并提出，给国会中的蒋介石支持者一些甜头。这个新议案于 1950 年 2 月 14 日完成了法律手续。但是损害已经造成了。后来有人争论说，我的讲话不把朝鲜列人“环形防线”之内，是为进攻南朝鲜“开了绿灯”。这是似是而非的说法，因为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也都未列入防线，尤其我们已同朝鲜订了共同防御协定。如果俄国人是在注视美国在远东意图的迹象，那么，两年来，我们鼓动从朝鲜撤出作战部队，一个小小的对朝鲜的援助议案在国会中遭到失败，以及对日和约的讨论日益增多，本来就会使他们更有深刻的印象。

十六　欧洲和舒曼计划

5月6日，参加巴基斯坦总理利亚奎特·阿里·汗和夫人沙希巴对华盛顿的三天国事访问后，我们疲倦地登上总统座机"独立号"，经巴黎去伦敦参加北大西洋公约理事会的一次部长级会议。总统又到机场送行。我们已经度过了一个漫长、紧张和疲劳的冬天和春天。国务院的同事们认为，我早日启程，取道巴黎，在投入北大西洋理事会经常要开的一连串会议之前，同法国人作一些友好谈话，可以得到几天休息，并使舒曼感到高兴。结果却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在巴黎逗留的几天，从5月7日星期日早晨到达之时起，我一点也得不到休息；从以后发生的事情看来，我到了巴黎，倒使贝文认为，法、美在搞反对他的阴谋。

第一幕：巴　　黎

我到达当天，在美国大使馆的大客厅里，舒曼通过译员把他的西欧煤钢计划透露给布鲁斯大使和我，这个计划由他和让·莫内秘密拟议，甚至还没有同法国内阁讨论过。诚如布鲁斯一星期以后在电报中所说的，这是"长期以来为解决法德两国之间基本分歧的最富于想象力和

影响深远的一种办法”。法、德两国的全部煤钢生产将置于一个高级联合机构管理之下，并有容许其他欧洲国家参加的一个组织。

舒曼强调我们要严守秘密。如果在同内阁取得一致之前泄漏出去，就会把这个计划和法国政府都毁了，所以他要求我们在两天内不告知我们在巴黎的同事，不发出电报，也不记备忘录。由于当时总统在国内的极西部，至少在一天之内不发生通知他的问题。同时我们一致同意，应把莫内和麦克洛伊请来同布鲁斯和我进一步讨论这个计划。这对我们尤其对我是很大的帮助。经过不成文法的训练，往往使人的注意力集中于具体问题。民法法律家则从原则考虑问题。那些确实具有伟大的建设性思想的人，对于他们的这些思想具体意味着什么往往模糊不清。要牢牢扣住他们就要使他们失败。在这种困难之外，舒曼和我是通过一位译员进行谈话的，而这位译员对我们所谈的问题又不熟悉。双方交换意见困难很大。

让·莫内立即被发现是这个计划的创始人。在他身上，对超国家的观点和组织的狂热，与精明的业务判断和经验兼而有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通过“协约国海运理事会”的工作，对于一个国际组织的工作人员管理运用所有协约国的商船队，通过商定的手续来达到商定的共同目标，可以超越国家的考虑甚至压力到什么程度，获有深刻印象。他坚信，集团的思想，即使象商业团体这样经过严格思想灌输的集团的思想，也是受到它所由产生的体制的制约和局限的。一旦冲破了有约束性的小小体制，思想就会很快发展，适应于较广阔的范围。此后，这

种效果将会保持下去。我所赞同的这种信念，有助于我们两人比戴高乐将军更能经受时间的考验。

这个煤钢计划，是莫内对皮杜尔总理于4月16日在里昂要求建立“大西洋高级和平理事会”的演说中有些夸张的思想的反应。皮杜尔的要求似乎一方面是（用和平这个字眼）进行宣传，一方面力促以重叠的机构建立一个控股公司，来“协调”北大西洋公约、西方联盟、欧洲经济合作组织和欧洲委员会等组织。不论这个建议暗藏有什么想法，它已夭折了。莫内这个表面看来比较局限和较为适中的计划，实际上更具有想象力和深远意义，因为这个计划挑出欧洲工业经济的基本原料煤和钢，置于有欧洲国家参加、具有政府权力和明确目标的超国家组织的管理之下。这个高级管理机构的眼前的权力和作用将是巨大的；它的潜在的权力和作用还要大。只是在莫内和麦克洛伊的耐心解释和回答了我们所提出的问题后，我们才有所理解。

于是，立刻发生了各种问题。首先，这项计划是为一个巨大的欧洲卡特尔打掩护吗？我们逐渐相信这不是它几位创建人的本意，而认为应将防止造成这种结果的条款写进章程中去。我们越是研究这个计划，越是对这个计划获得深刻印象。5月9日法国政府声明中的头两段最能表达这个建议的宗旨和方法了。伦敦《泰晤士报》第二天早上登载了这个声明：

不做出相应的努力来防止威胁世界和平的危险，和平就不能得到保障。一个有组织而有生气的欧洲能对文明作出的贡献，

是维持和平的关系所不可缺少的。二十余年来一直以鼓吹统一欧洲为己任的法国，始终把为和平服务作为它的主要目的。一个统一的欧洲没有实现；我们就发生了战争。这样的欧洲不能一蹴而就，或按照一个笼统的计划来实现。他的缔造将通过具体的成就，首先要造成实际上的团结。把欧洲各国集结起来，需要消除由来已久的法德对立。这两个国家必然对所采取的任何行动最为关注。

考虑到这种目的，法国政府建议在一个有限的然而是决定性的一点上立即采取行动；法国政府建议把法德两国的全部煤钢生产，在其他欧洲国家都可以参加的一个组织的体制内，置于一个高级共同机构的管理之下。这种煤钢生产的联营，应立即为建立经济发展提供共同基础，作为建立欧洲联邦的第一步，并将改变长期致力于制造军火和一直是最经常受战争之害的那些地区的命运。

这个舒曼—莫内计划的特征，在于它采取了讲求实际和适合常情的做法，避免显得束缚主权和避开棘手的政治问题。还有什么比煤钢更现实，或者比法德两国煤钢工业的联营和采取共同方针更可取的呢？这将结束由来已久的冲突。这不是排他性的，而是所有欧洲国家都可以参加的，只要它们愿意参加这个为特定目标而建立并具有达到这个目标的足够权力的煤钢机构。

《泰晤士报》——而且的确不只它一家——对舒曼在其他国家首都试探官方反应之前就宣布的方法，感到困惑不解。这家报纸报道说，他讲“这个问题在他昨天〔5月8日〕同艾奇逊先生的谈话中没有提出过，即使在那天一开始的‘私下’谈话中也没有提到过”，《泰晤士报》和舒曼

都没有说错。这个问题是在5月7日星期日提出来的。当时所有善良的人包括记者在内，是会在教堂里做礼拜的。

在总统已经回到华盛顿时，我给他一封"亲阅"的简短电报，要求他如果听到来自欧洲的谣传，说即将有重大事态发展时，要在我进一步向他报告以后再发表意见。他同意了。第二天，法国内阁批准把舒曼计划提交国民议会后，我就把一份计划大纲送给了总统，请他在舒曼发表讲话之前保守秘密，并要求在他讲话之后，授权我在巴黎进一步阐明之前对这个计划表示同情的关切。总统再次同意了。这就使我解除了对司法部的反托拉斯司在得到部分情报的时候可能发表一些批评性评论的顾虑，那种评论在那个时候准是有害无益的。

第二幕：伦　　敦

我在5月9日，星期二，抵达伦敦，这天舒曼要发表声明，提出这个计划。我在上午同贝文和他的工作人员会见时，发现贝文精神苦恼。最近他动过一次痛苦的手术，正在服镇静剂，使得他在讨论时要打瞌睡，有时甚至鼾声大作。他的工作人员看来已是习以为常，虽然我对此感到有点窘。总之，我们的会谈毫无结果，由于不知道在巴黎还发生了什么事情，我觉得不能把舒曼此刻可能在做什么的情况告知我们的英国朋友。在与贝文和艾德礼共进午餐时，有人分别通知贝文和我，法国大使勒内·马西格里要求午后与贝文会晤，传达一个重要消息，一小时

后再与我会晤。当在座的人在猜测这个秘密时，我感到更窘了。由于我并不知道已经发生了什么以及马西格里谈话时将要谈些什么，我仍保持沉默。等到他下午来访时，他告知舒曼计划的建议已提交议会，这是按原来的安排行事的，而关于这个计划我显然比马西格里知道得更多。

在外交部等候我们的贝文，情绪极为冲动，对我很愤怒，更糟的是他很快就发展到激烈反对舒曼和舒曼计划。他立即指责舒曼和我炮制了这整个计划，故意把他蒙在鼓里，说我是去巴黎为这个计划作最后润色，在他什么也不知道之前，就把它公开出来。支持他设想这种罪状的间接证据确实是很有力的。我们显然是把事情弄糟了。可以理解，舒曼全神贯注于使这个计划在他的政府和议会获得通过，在计划被接受之前，他把我的到来看作是意外得到的鼓励，在接受之后又看作是意外得到的帮助。但是，我却十分愚蠢，竟然没有预料到贝文将因他自己被明显地排斥于磋商圈子之外而会大恼其火，也没有预料到他因为是一个老社会主义者，难以把舒曼计划提给英国的社会主义政府。如果英国政府参加了煤钢这些基本商品的自由竞争制度，它作为一个福利国家怎样把英国其余的经济隔离开来并进行管理呢？如果它不参加，英国又怎能维持其大陆上的基本市场呢？

这就是贝文的困境。在他最初的一阵愤怒消失后，我想他确是承认我去巴黎的动机是无辜的。但是，损害已经铸成了。尽管我作了极其认真的劝说工作，几天后，英国还是拒绝参加舒曼计划的谈判，从而犯了战后时期的大错误。英国和欧洲由于这个错误所造成的严重后果，

至今仍在遭难。如果我不去巴黎，舒曼是会遇到究竟是采取单方面行动还是在把计划提交他的议会之前到伦敦来同我们两人磋商这么一个微妙问题。但是，他本来可以采取较好的办法，由他授权我去冒风险设法说服贝文和艾德礼支持这个计划。这个办法也许是行不通的，但是事实上，拙劣的判断加上愤怒，却使拙劣的判断得逞了。

第二天，贝文和我两人都发表了简短声明。他的声明并没有表示什么明确的态度，也不象原来扬言的那样显示敌意。我则表示欢迎为促进"德法两国和解和向西欧经济一体化前进"的愿望所推动的"一个最重要的事态发展"，这些目标是美国政府所赞同的。具体评论还得等待这个建议的发展再说；同时，我们"以同情和赞赏的心情来认识法国这个创议的重大和深远的意图。"一星期后，总统称这个建议是"一种有积极意义的政治家风度的行动"，也"显示法国按伟大的法国传统解决欧洲问题的领导能力。"他"对于这个建议把重点放在所有西欧国家都能平等获得煤钢产品……并从竞争中得到充分利益表示满意。"

我们两人就这样尽最大努力来支持推动这个计划的顺利进行。但是，贝文还是怒气未消。

第三幕：兰开斯特大厦

5月11日，舒曼来到伦敦参加北大西洋理事会之前举行的三国会议，两次会议地点都在兰开斯特大厦。贝

文通知我们，要求在正式开会前半小时，到我的办公室来作一次私人会晤。这是一个使人惬意的房间，就在兰开斯特大厦的南角，从窗口可以看到一片可爱的草地，边上栽着花和盛开的金链花树。但是我却觉得，贝文在我的办公室里开会很不舒服；舒曼可能还更感到不舒服。贝文可能认为他多少是受了舒曼的利用。贝文在激烈攻击事前没有得到西德占领国的同意，甚至没有磋商就宣布煤钢计划时，这种怀疑就越来越明显了。贝文讲得缓慢而有力，贝文一面讲，舒曼的译员一面翻译。他是有理由的，但讲得过分了。我知道舒曼是能够当心他自己的，但我不希望因会议是在我的办公室举行的而使他产生一种印象，认为是贝文和我串通才出现这种情况。我们之间的误解即使不再增加，也已经是够多的了。

贝文讲完后，我要求讲几句，说明一下我的立场，因为贝文并不是在代表我讲话。我说，在马西格里带来消息，解除了我的约束以前，我遵照舒曼的请求，并没有把这个计划告知贝文或任何人。接着我解释一下我们在巴黎的谈话情况。这些都使贝文生气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贝文夸大了它们的意义。我们作为盟国，都理解彼此之间的义务。有时国内和国外问题缠绕在一起，很不容易理清，有时候则因国内政治的紧急情况，我们每人就不得不在未经磋商的情况下，采取各自的方针。这一次舒曼就是这样做了。我恰巧认为他采取的是卓越的方针，因而我赞成了。但是，除此之外，我理解舒曼之所以认为保守秘密比磋商更为重要的道理。我说，“同样地，去年秋天在华盛顿召开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会议时，贝

文先生和英国政府认为把英镑贬值是可取的。这也是一个非常需要保守秘密的重大问题。这影响到了法国。那时舒曼先生和法国财政部长莫里斯·比许都在华盛顿。迫在眉睫的贬值问题虽然曾同美国财政部长斯奈德和我讨论过，但没有同舒曼和比许商谈过。他们并没有抱怨，因为他们理解必须保密。"贝文不想再听下去了。他站起来说："我们还是去同其他一些人一起开会吧。"我们离开那房间时，舒曼挽着我的手臂说："你帮了我一个大忙。"

5 月 25 日，法国政府邀请六国政府一道来商讨煤钢计划，同时要求参加国政府接受这个计划的主要原则，包括最高机构的决议的约束作用。五个国家按这些条件接受了邀请——比利时、荷兰、卢森堡、德国和意大利。英国政府"认为对于作为法国建议基础的原则既不能预先接受，也不能预先反对。"他们要求先详细讨论，以"阐明这个计划的性质及其整个政治和经济后果"。如果法国人能改变态度，他们将乐于参加程序的讨论。法国人不愿意这样做，因此，没有英国参加的六国会议于 6 月 20 日开始举行。

有些决议是关系重大的。1950 年 5 月的决议就是其中之一。这不是英国进入欧洲的最后的明显机会，而是第一个错误的选择——同戴高乐将军于 1963 年悲剧性地拒绝这个悔改者一样错误。

6 月中旬，英国工党的全国执行委员会明确表示，英国政府作出这一决定的原因不是程序性的。一本工党出版的名叫《欧洲的统一》的小册子表明，教条主义的社会

主义者对这个计划感到为难之处，正象舒曼所怀疑的那样，在于最高机构决议的约束作用。问题是工党政府还有没有主权来推行社会民主主义。同英联邦和美国保持特殊关系的国策尽管是重要的，但居于第二位。

我一到伦敦，英美特殊关系几乎立即就给我造成一个难题。这是关于英美关系特殊性质的一个文件，是我在巴黎的时候，我的一些同事和英国外交部官员进行工作会谈后写成的。我对这个文件立即表示出来的强烈不快，使人们对文件的由来模糊起来了。使我烦恼的不是文件的由来，而是有了这个恶劣的文件。这个文件落在麻烦制造者的手里，就可以在联盟内部引起国内和国际上的无休止的吵吵嚷嚷。当然，在英、美之间是存在着一种独特关系的——我们的共同的语言和历史保证了这种关系。但是独特不等于亲切。我们曾屡次把英国当作敌人来战斗，正如我们屡次把它当作一个盟国而并肩战斗一样。容易沟通思想所引起的争吵，不亚于所增进的谅解。芝加哥市长汤普森发现，他宣称渴望"打英王乔治的大鼻子"是他争取选票成功的关键。在珍珠港事件以前，共产党人和"美国第一主义者"曾联合谴责英国的"帝国主义"战争。感情是留给我们"最老的盟国"法国的。

我自己的态度长期以来是亲英的，并以此著称。在罗斯福政府初期，我曾怂恿罗斯福解除英国归还1914—1918年战债那个不堪忍受和力不胜任的负担。1939—1940年，我宣传一旦欧洲重新开始进行内战，将把我们也卷了进去。在敦刻尔克撤退后，我在以驱逐舰交换基

地的交易中起过了作用。我对工作人员在伦敦起草的文件感到烦恼，不是因为怀疑特殊关系的真实性，或怀疑英美两国在欧洲和其他地方利益的真正一致，尽管此刻在个别的人或政府看来两国的利益是多么不同。自坎宁[①]支持门罗主义来反对神圣同盟以来是这样，而当拿破仑三世占领了墨西哥，英国在我国南北战争中经过犹豫之后转向北方时也是这样。我的烦恼是由于起草特殊关系文件一事做得太愚蠢。这只会使我们的盟邦对于秘密计划和目的增加疑惧，而这些计划和目的他们没有参与，也不会同意，这将使汤普森市长、麦卡锡、麦卡伦和詹纳斯之流得到国务院是外国工具的证据。所以，凡是能找得到的这个文件副本全都给收集起来加以焚毁了。

幕　　后

我们的主要盟国在舒曼计划上所出现的分裂，使即将召开的讨论这个计划的会议更其需要成为一次没有美国干预的纯粹欧洲国家的会议了。因此，6月2日，国务院和经济合作署给我国驻英国和有关六个国家的使团发出了一个联合指示，表明“今后除了重申我们总的立场，不再发表公开声明。……美国不准备充当谈判的一方，因此不准备有正式关系，也不派观察员。……我们对于英法在这个计划上的争执不打算表态。”英国拒绝参加会议后，驻巴黎的布鲁斯建议发表一个声明来抚慰法国，我们立即执行上述指示而不接受布鲁斯的建议。指

① 乔治·坎宁(1770—1827)，英国政治家，曾任首相。——译者

示继续指出，往后可能有必要对舒曼进行审慎的支援，以免冲淡他所建议的这个计划，或保持“在杜鲁门5月18日声明中已经强调过的有利的经济要素……”，但是，国务院和经济合作署届时将另发具体指示。

国务院主要通过麦克洛伊和布鲁斯以及他们的使团，同谈判保持密切联系。这两位外交艺术大师做得很审慎和巧妙。7月25日，舒曼宣布已在这个计划的所有主要方面达成了协议。也许这与其说有助于传播实际情况，不如说有助于增加谈判的信心。许多障碍依然存在，而我们对这些障碍悄悄地施加影响是有帮助的。在夏天，这些问题主要是“冲淡”的问题。一个问题是关于对最高机构的决议提出申诉的权利从“直接有关的”国家扩大到“受影响的”国家。我们支持比较狭隘的权利。另一个问题是关于为保护外边的生产者对付一个单一的欧洲市场的冲击而付给津贴的期限。我们又赞成较短的期限。也许最重大的争论问题是发生在秋天，那时预期美国建议德国参加欧洲防务，将使波恩取得比过去作为一个被占领国家所具有的更强有力的讨价还价地位。德国人感觉到这一点后，就开始拖延舒曼计划的谈判，试图达到两个重要目的：即放宽德国钢产量的最高限额，和收回鲁尔的德国销售卡特尔“德国煤炭销售公司”，使它不受1949年占领法规条款的制约。在这方面美国是有直接关系的，因此采取明确的行动，支持莫内受命制定的法国立场。他们采取的立场是：关于第一个目的，德国人的立场不仅是与舒曼计划一致的，并且是这个计划所要求的，但第二个目的是同舒曼计划全然不合的。我们则认为，这

第二个目的也是与占领法规和健全的经济政策不合的。这番争论就在这个基础上解决了。1951年4月18日，六国签订了欧洲煤钢联营条约。

十七　为欧洲建立均衡的集体部队

贝文对舒曼计划的怒气逐渐消失后，我们在英国外交部的会谈，就转入正题，把同舒曼和随后同北大西洋理事会讨论的题目，以及对待这些题目的态度一致起来。贝文很坦率地承认，他怀疑自己承认共产党中国是否明智。他看不到这里面有什么利益，并劝告不要因为我们采取不同方针而使得我们之间发生裂痕。我认为没有什么理由会产生这种情况。据我看，有三件事情最为重要：欧洲的防务和经济；对日和约；以及虽然居于次要地位但仍然很重要的东南亚的动乱的形势。

欧洲搞威慑性防务的需要，超过了欧洲经济的力量，所以欧洲的经济需要从根本上予以加强。这里我们接触到的问题是有危险性的，贝文同意这种观点。当时的条约结构令人失望，缺少作出改进的魄力。工作没有在各委员会中落实；人们认为困难和弱点是不可克服的。法国以为德国决不可能对共同防务作出贡献的看法是完全错误的。德国的经济、德国参加贸易、参加援助不发达国家，以及在不重新武装的情况下参加共同防务安排，都是必要的。对于同我们一起讨论的朋友们来说，这是一个可观的计划，贝文也没有表示异议。

三 方 会 议

我们在伦敦的后三天里，贝文、舒曼和我会谈了六次。我已经提到，这些会谈后来表明是我们的北约组织盟国日益感到烦恼的由来，他们怀疑我们在策划理事会会议。这些会谈并没有取得什么结果。我们仍是在消化过去一年囫囵吞枣地处理事情而遗留下的战后问题。舒曼计划的阴影笼罩着我们。显然我们必须立即再着手处理问题，幸而那时还不知道这个问题是何等的难啃。舒曼先谈我们对形势的全面考察，他强调了欧洲对和平的巨大渴望，对东西方之间当前的紧张关系表示担忧，以及苏联主动进行和平宣传的成效。我对于外交部长要花费超过常情的时间去做新闻发布官的工作，坦白表示了一定程度的恼火。我认为，对于解释和敦促支持为和平奠定持久基础的政策，没有人比我花的精力更多了。我同任何人一样，懂得我们所从事的是争取"人心"的斗争，并且同意关于言语就是武器的种种陈词滥调，等等。但是，我一向认为，旨在进行宣传的政策——旨在描述自己比拒绝这些建议的对手更加热爱和平的愚蠢建议——在美国外交中是不足称道和危险的策略。舒曼基本上同意我的意见，不过，他更担心俄国的宣传。我经常设法把我担心的问题限制在重要问题上，并从马克·吐温的告诫中寻求安慰，他说："始终做正确的事情。这样做就会使一些人感到满意，而使其余的人感到惊讶。"

在讨论宣传问题以后，我提出我们要共同努力优先

考虑的事项：(1)充分认识当前形势的危险和对和平的威胁，并把它们有效地公诸于众；(2)立即着手增强军事力量；(3)为欧洲的军事计划建立经济基础，维持欧洲的生活标准；(4)使德国的生产能力参加进来；(5)防止共产党在远东的进一步侵蚀；(6)发展组织机构，以协助完成这些目标。

对于这些事项，贝文又加上了我们必须"争取中间地带"，并提出中国共产党"在道义上和法律上有理由加入联合国"的想法。我们同意他的第一个建议，虽然怎样做还不清楚。对于他的第二个建议，我争辩说，问题不在有没有理由给予中国共产党以席位，而在于这样做对我们至关重要的局势将会产生什么影响。我认为这样将大大增加共产党在印度支那、马来亚、菲律宾群岛和印度尼西亚制造麻烦的能力。再者，安全理事会的表决不大可能会有什么变化，除非美国改变它的立场，而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要这样做。鉴于毛在印度支那承认和支持胡志明，看来法国人也不大会改变他们的立场，舒曼同意这一看法。如果人们比较一下这两种方针所造成的坏处，苏联因国民党代表在场而退出会议，对美国的损害比我所列举的共产党取得席位所造成的危险显然要小些。而且，除非联合国对福摩萨的国民党政权采取敌对行动，国民党代表一被逐出联合国，是否就会由共产党取而代之，也是不能完全肯定的。如果我们接受贝文的建议，结果联合国就会没有中国的代表，中国的战争就会扩大到福摩萨，整个东南亚将会发生更大的麻烦。贝文没有再坚持这一点。当我们回到欧洲问题的讨论时，我按照上述先

后缓急程序提出一个工作计划。

我说，马歇尔计划已经取得巨大进展，确实有希望在1952年后，可能除奥地利以外，其他西欧国家都不需要在经济发展方面得到援助了。但是，在今后时期内，欧洲内部和欧洲与北美之间仍是必须进行同样的或更大的合作。其余的目标将是提高生产和生产率、货币的自由兑换、关税的减低、扩大原料的供应和制成品的市场、人民的较自由的流动、对德国的同等待遇、以及开放投资场所等。所有这些都要有新的观点和方法，以及更大的能动性。在提到不宜提的问题时，我说，华盛顿是赞成舒曼计划的，并赞成美国和加拿大同欧洲经济合作组织取得联系。

转到德国问题时，我劝我的同事们要记住，占领当局可以在改造德国上施加有用和有益影响的时间正在逐渐消逝。战胜国和战败国之间的关系基本上是不愉快的，不管怎样善于处理，等到德国从战争中恢复过来，无罪的一代成长起来，目前对俄国威胁的恐惧有所消除时，总是要招怨的。一个政治上民主、经济上健全的德国，应当行动迅速，在欧洲社会中取得自己的地位。不能指望过两三年以后，盟国高级专员公署在德国的影响仍然很大。德国的真正利益是在西欧。我们必须立即开始引导德国“卷入和结合”进去。我们越早开始把占领军改变成一种新概念和新组织，即变成一支保护西欧的部队就越好。

由于这种形势，高级专员公署正在进入一个新阶段，在这一阶段，为了在保持对德国人的尊重和信任与在事态发展之前作出适当的调整，就必须要有速度、克制的方

法和基本的明智。这里法国煤钢计划的含意特别有关和重要。这些都是冷静的想法。

在随后的讨论中不久就变得明显起来的是，即使舒曼本人也没有充分意识到，在这个计划付诸实施时，它将对占领当局的地位和鲁尔管理机构产生深远的影响。我的劝告虽然没有立即产生取得一致意见的结果，但是，对于即将认真开始的行动却起了有益的推动作用。舒曼计划的批准比我预料的时间为长，但是，我对占领当局和高级专员公署的有效寿命的估计却是准确的。恰好两年以后，我们在波恩缔结并在巴黎签署了结束这两者的协议。同样地，虽然没有什么奇怪，通过在同年夏天批准对日和约，而结束了对日本的占领。

我们关于德国问题的会谈产生了另外两个有益的结果。在回答阿登纳总理的正式询问时，我们同意并答复他说，对我们在德国的驻军的进攻，将构成北大西洋公约第五条所指的武装进攻。当然，读一下公约的条文，这点是非常清楚的，但是，读过的人不多，因此，三位外长的声明在德国起了安定人心的作用。我们的公报也鼓舞了德国的希望和信心。它概述了过去十二个月中德国取得的令人印象深刻的进展，并申明我们的希望：在保持自由发展的速度的同时，一年前向苏联提出的一起签订一项建立一个全德政府的条约的建议仍然有效。

对中东的宣言

在三方会议的过程中，我们的注意力转到了中东日益增长的纠纷。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在巴勒斯坦的战事

已经平静下来了，但是留下来的问题并没有解决，其中以阿拉伯难民问题显得最为紧迫和严峻。每一方都武装起来对付另一方。联合国调解委员会，在没有力量、没有主意、也不提希望的情况下，把它受委托的权力退回给联合国大会。在伊朗和埃及，革命的动乱表现为反英情绪，这种情绪继续高涨，到 1951 年爆发了。1950 年 5 月，一个酝酿新纠纷的平静笼罩着这个地区。

为了指望引进一种克制的和稳定的影响，三位部长在伦敦就不易说清的阿拉伯和以色列的对抗问题发表了一项宣言。可以得到的记载并没有什么用处。宣言声称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都需要维持"一定水平"的武装力量来保护它们各自的安全；其中向三国政府购买军火的国家，全都保证不打算对其它任一国家采取侵略行动；三国政府如果发现"这些国家中有谁准备侵犯别国边境或停战线，〔它们〕将立即在联合国内或联合国外采取行动加以制止"。这是大话。杜鲁门总统同意这个宣言，表示深信这将"鼓舞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对今后的安全增强信心"。

不幸的是，这种信心是没有多少根据的。这样宏大的保证作得如此不合时宜，效果又如此短命，这的确是罕有的。不久，三个发表宣言的国家都全神贯注于别处了。不到一个月，美国就被危急的朝鲜战争拖住，不能脱身；几个月后，三国政府全都对欧洲的防务深为担心，并且意见分歧。到了年底，苏联大力利用欧洲、中东和远东在其宣传下所可能出现的分裂。1956 年秋天，当 1950 年 5 月宣言所提到的一个国家确实侵犯了边境线和停战线时，

三国政府的分歧更深刻了。英、法在联合国外面采取军事行动，要求以色列和埃及停止一切敌对行动；美国和苏联则在联合国内采取行动，以制止英、法当时正在进行的唯一军事干涉，苏联还大肆扬言，要在联合国外进行军事干预。还有，当两年后黎巴嫩在向联合国申诉要求保护，免遭外国（埃及）干预的威胁而不得要领、又诉诸美国时，美国军队于1958年7月单独登陆了。1950年5月的三国宣言如果说曾经存在过的话，此时已经死亡了。

理事会的第四次会议

一个星期天，使我们在两个星期的紧张工作的间隙获得必需的休息。艾德礼首相夫妇邀请我们去契克斯的首相乡间官邸午宴，这个地方位于白金汉郡，在伦敦西面，约一小时可达。由于法里汉的李勋爵和夫人的慷慨，和周到的考虑，这座十二世纪的房产就赠送给首相，作为避开唐宁街喧嚣的休憩之所。传说这座别墅早期的业主是财政部的一个职员，契克斯的名字即由此而来。

我们在一个寒冷、“潮湿”、号称春季的一天，驱车从伦敦出发，经过到处是苹果花、风信子和健壮的郊游者的农村。我们到达时快冻僵了，发现室内比室外冷得多，以致贝文索性拿了一张凳子退到大壁炉旁，他企图在小炉格上暖暖手而未能如愿。我采取更可靠的办法，喝纯净的杜松子酒来解寒。

这是个愉快、轻松和友好的家庭宴会，但只在殷勤的款待上使人感到温暖。我们进入餐厅时，艾德礼夫人认

为室内闷气，要侍候宴会的英国皇家海军妇女服务团团员把窗门打开。她们照办后，就只有窗帘了。体质比较单薄的美国女客人很聪明，她们不脱掉皮大衣。我体内倒仍是热烘烘的。

基本问题冒出来了

在我最后一次担任主席的理事会会议上，北约组织一直未能解决的基本问题开始冒出来了。我们的第三次会议和共同防御援助计划都已认清两个目标——经济复兴和军事防御——其中第一个目标并已受到优先考虑。与此同时，我们深信，大西洋两岸做出比任何一方面以前考虑过的更大的防务努力将是必要的。怎样在欧洲进行这种防务努力而不危及经济复兴，或不使欧洲人认为经济复兴将会受到危害呢？有一件事情是清楚的。美国国会决不会负担经济复兴费用，又负担欧洲和美国的重整军备费用，也不应当要求国会这样做。但是，苏联军事力量的威胁已经大大超过西欧单独能够提供的军事力量，这是使得欧洲人需要北大西洋公约的明显威胁。

变得日益明显并同样难于解决的不只是这个问题。北大西洋联盟是个组织——或更准确地说是十二个组织——却没有一个头。大会要求建立"一体化防御"，从而设立了一系列的委员会。它们虽然开了会，但是未能作出连续的和具有权威性的指导。美国的军需品已在横渡大西洋，但是，理事会遇到的象是美国在1776年没有任命华盛顿将军以前大陆会议所经历的挫折。理事会清楚认识到需要一般的和适当配置的部队，但是看到在没

有组织、没有指挥部和没有战略的情况下，这二者中的任何一种都是很少可能获得的。首先最迫切的需要似乎是以一个全神贯注的常设机构来代替一些抓一阵丢一阵的委员会。

当会议在兰开斯特大厦大厅围着一张大圆桌进行时，参加者往往扯到当时头条新闻的国际问题上——苏联抵制联合国以及东南亚日益增长的麻烦。后来，他们开始相信，我们对这些问题不大能或完全不能解决的，不如集中精力于我们地区内较近的但同样是麻烦的问题为好。我们已接到防务委员会和经济委员会的报告。它们都指出了令人苦恼的差距。前者是我们拥有的防御部队和我们需要的防御部队之间的差距；后者是需要和满足需要的能力之间的差距。防务委员会主张在建立均衡的集体部队而不是均衡的国家部队的基础上，逐步增加防御部队。这就是说要有一支保卫欧洲的力量，作为一个集体看时，其组成部分是完整和均衡的，而不是各自配齐了全部必要兵种的一批国家部队。后者超出了欧洲的经济能力，即使美国予以大量军事援助的补充，也是负担不了的。

这个建议引起了热烈的争论。挪威的兰基提出，委员会的建议将使一个国家陷于危险的境地，如果这支集体力量竟然不去援助的话，这个意见后来成为戴高乐将军的信条的中心。这样讲当然是正确的，但不完整。无论这种国家的单独防御力量如何建立，如果侵略者是共产主义集团这个唯一可能的侵略者的话，这一国家总将陷于危险的境地。在这种情况下，只有通过包括美国的全部力量在内的集体力量，才能提供威慑和有效的防御。

舒曼倾向于掩盖这一论点，认为这两种概念是互为补充而不是不能共存的。采取这种态度看来是不明智的。这是一个应该面对的现实问题——究竟何等现实，几年之后就清楚了，几年之后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关于“大规模报复”的错误理论使这样一种意见颇为流行，即欧洲的安全在于以使用核武器相威胁，常规武器已经过时了。于是，法国脱离北约组织，赞成发展它自己的均衡的国家部队，包括“打击力量”在内，而不从属于集体力量。

我介入了这场辩论，力主不应掩盖这个最重要的问题，而必须使人理解。这个地区的暴露部分需要足以应付危险的适当配置的部队。在这个地区以外承担责任的国家，将需要用于这些目的的部队。所有的国家都需要满足和平时期的安全和秩序的要求，这是毫无疑义的。唯一引起争论之点是，在建立防卫这个地区的部队时，出于节约的需要，必须消除一切工作上的重复。不应当容许威望的考虑，或企图建立比邻邦更强大的防卫地位的考虑损害共同的计划、共同的努力和共同的战略。对于具有这种企图的国家和整体的努力来说，任何这类企图都将证明是自己害自己。

最后，我同意，均衡的集体力量和一批均衡的国家部队是无法并存的。这是因为我们的财力有限。我宁愿看到在理事会里有明显的分歧，觉得自己处于支持这个建议的少数派地位，直到把我的同事们都争取过来时为止，而不愿意带着一些掩盖分歧的模棱两可的话回去。到了5月17日，均衡的集体部队虽然在概念上仍是有点模糊，但是，一致投票通过向各国政府提出成立这支部队的

建议。

理事会接着成立了一个由理事会的副代表组成的、把工作继续下去的机构，在伦敦继续开会，以推动集体防务的发展。我国代表是纽约的查尔斯·斯波福德。副代表们得到指示，把部队是否足够以及是否有财力供应部队，当作一个问题来研究。每个成员要“以种种切实可行的方式互相帮助，作出自己的充分贡献。”

在伦敦的成就

理事会的第四次会议是一次有益的会议。它采取了迄今曾经采取过的最重要的步骤，从一旦出现麻烦，仅仅同意采取一些措施前进到在国际关系中创造新因素来防止发生麻烦。这次会议首先是一个打破幻想的重要场合，它揭示了想法和现实之间的差距。在这种坦率的气氛中，“战略概念”不过是被看作职能的分工，除了我们的战略轰炸和海军能力所能做到的以外，这种分工能否实行，希望不大。军人“从严格的军事观点”估计的需要很大，使得我们的盟国，尤其是已经在东南亚显得力不从心的法国人感到沮丧。虽然我们美国人也谈论均衡的集体部队，我们自己的军事计划和预算却是把欧洲问题置之度外的。我们和英国人都没有对欧洲承担任何提供部队的义务。最后，德国虽然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是保卫欧洲的中心，既是我国军队驻扎的所在地，又是可能发生麻烦的地方，但是，在这种背景下，它却是一个难以提出的问题。

所有这些难以提出的问题，都在伦敦提出来了。种种禁忌都打消了。我们既然都已一无掩蔽了，我们就开始承认它。舒曼正是在伦敦忽然发议论说，作为打算“解放欧洲”的一个条约来说，北大西洋公约并没有什么用处。出席这次会议的欧洲人，没有一个会活到目睹这件事的出现。几年后谈到这次伦敦会议时，艾夫里尔·哈里曼说，它为北约组织奠定了基础；实际上，它使北约组织有了“组织”。

哈里曼的意思是，伦敦的商谈开始创立了一个组织，得出了指导这个组织的宪章的轮廓。也许我们大家在伦敦所感到的是一种更基本的什么东西——意志的行动、做点事情的决心。我们制订计划和通过决议所化的时间已经够长的了。即使最有节制，计划似乎也没有实现的希望，但是，开始尝试的时机已经到来。我们在伦敦制作了第一批粗糙的工具。

理事会的常设会议始终有点使人失望。同欧洲一些组织的高级机构不一样，它缺乏权力。但它并不缺乏毅力。虽然订立的指导常设会议的原则没有为其他组织规定的原则所具有的明确性和权威，这些原则同样是可以发展的。他们考虑了经过共同管理和领导走向共同目标的共同努力。等到走向一体化的下一步到来时——它来得比我们任何人猜想的还要早——伦敦会议已经提供了基本的组织和意见。这些抵得上好多个师的军队，并使我们不久得到的那些师的军队成为体现共同意志的证明而给人以更深刻的印象。

十八　朝鲜战争爆发

六月里的七天

1950年6月20日，星期二，开了州长会议，星期四在哈佛大学作了一次开学典礼演讲，出席了一次内阁会议，一次记者招待会，星期五为出席国会山军援会议作准备，然后在第二天，6月24日，我们离开华盛顿到哈伍德农场去过一个安静的周末。那儿象是个避难港似的，非常安静。体贴的助手们尽量少用联系白宫的白色电话，不过究竟还是用了。傍晚来临，忙碌的世界沉寂下来，一天的忙碌也过去了，但是还有从外边传来的保安人员在夜里换岗的声音在这所小屋里回荡着。由于参议员麦卡锡的注意寄给我的怪信增加了，因而在我身边安排有日夜交替的讨厌的守卫，这是一种令人不得安宁的措施。不过，周末还是很好地开始了。做了几小时的园艺劳动之后，吃了一顿很好的晚饭，我回到屋里去看书，直到睡觉。

星期六，6月24日

大约10点钟，白宫的电话又把我吵醒。联合国事务助理国务卿约翰·希克森、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迪安·腊斯克、无所任大使菲利普·C·杰塞普，被我们在朝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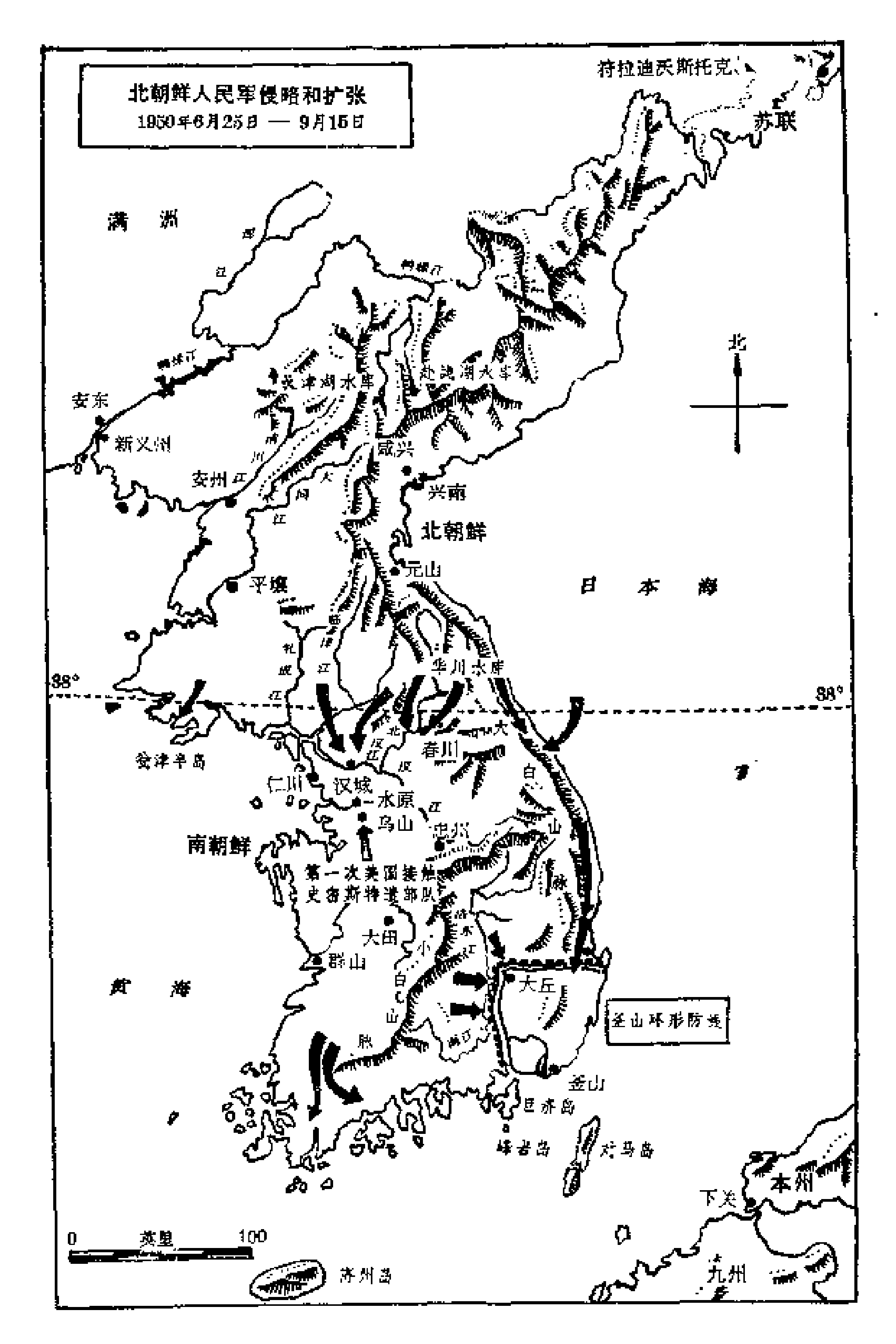

北朝鲜人民军侵略和扩张
1950年6月25日 — 9月15日
符拉迪沃斯托克
苏联
满洲
北
安东
新义州
安州
咸兴
兴南
北朝鲜
元山
平壤
日本海
38°
华川水库
春川
瓮津半岛
仁川
汉城
水原
乌山
南朝鲜
第一次美国接触
史密斯特遣部队
大田
群山
黄海
大丘
釜山环形防线
釜山
对马岛
本州
下关
九州
济州岛
英里

图 1 （按原图译制）

汉城的大使约翰·穆西奥的一份电报召唤到国务院。穆西奥是一个富有经验的头脑清晰的人，他的电报报告北方越过三八线向南朝鲜部队发动进攻。它说这是一次同过去那种边界巡逻冲突不同的猛烈袭击。穆西奥的意见认为这是对大韩民国的全面进攻。

这个电报同国务院发出的一个询问互相交叉。国务院是听到从汉城来的令人不安的新闻谣言后发出这个询问的。希克森等人同陆军部长弗兰克·佩斯进行了联系。国防部长路易斯·约翰逊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雷德利将军在东京。别的参谋长们还未联系到。前参议员，我们驻联合国大使沃伦·奥斯汀则在佛蒙特州伯林顿自己家里。我问希克森有什么建议，他建议第二天上午（星期日）召开一次联合国安理会号召停火，并催促我们在朝鲜的非军事和军事代表团继续提供情况。

我批准他的建议，并授权奥斯汀大使的副手欧内斯特·格罗斯去找联合国秘书长赖伊召开安理会。希克森、腊斯克和杰塞普将连夜通过弗兰克·佩斯去同五角大楼一起工作，以便为总统起草命令，如果他想决定作进一步的军事的或其他行动的话。同时，我将给总统通电话，当时他正在密苏里州独立城度周末。如果他想对我所发出的指示作任何更改的话，是很容易追回的。

独立城的时间比我们这里早两小时。总统来听电话时他刚和家人在一起吃完晚饭。他听取了情况报告和我发出的指示。他批准了，并提出他自己立刻回到华盛顿。我劝阻他，不要匆忙夜航以增加不必要的风险。并劝他等我第二天早上进一步的报告，那时我们的消息会更全面

一些，而他可以在白天迟一些时候回华盛顿。他同意了，并问当夜他能帮助我们做些什么。我想起今春路易斯·约翰逊对两部之间的联系所作的荒谬的限制，我请总统通知弗兰克·佩斯说他需要各部之间充分合作。两部之间打交道没有发生什么困难。同希克森通一次电话再作一次证实，我这夜的工作便完成了，可是他的工作还未完成。

星期天，6月25日

第二天早上国务院收到的消息是坏的。以一个坦克纵队为核心的大规模进攻正指向汉城和金浦机场。南朝鲜的武器装备显然远远不能抗衡。根据现有情况，两部作了一个行动计划，并草拟了一个向安理会提出的决议案。同总统进行了一次会谈，告诉他事实情况，取得他对决议案的批准。他指示我通知国务院和国防部有关人员晚上到布莱尔大厦同他一起开会。后来，飞机带来的信通知大家七点半到布莱尔大厦吃晚饭。我给国防部长和布雷德利将军留了话，他将于下午回来，还有各军种部长和参谋长。我自己则带了副国务卿韦布、助理国务卿希克森和腊斯克，以及杰塞普大使同去赴会。

我们早先起草的决议说"北朝鲜对大韩民国的武装进攻'构成'无端的侵略行为"。当这个草案给几个安理会成员看时，他们对目前掌握的情况能否作出这个结论表示怀疑。不过，他们准备说这是"构成对和平的破坏"。当他们知道我们还未指示我们的代表在如果北朝鲜不理睬我们的决议案所规定的立刻停止敌对行动并将军队撤回三八线的呼吁时将采取什么行动，他们更是坚持他们的

意见了。为了和他们的意见取得一致，我们作了修改。

当安理会在星期天下午开会时，还不知道苏联代表马立克会不会出席。他是由于安理会中有国民党中国的人参加而抵制会议回莫斯科去的。他没有出席。没有反对票，决议以九对零票通过，南斯拉夫弃权。我在机场迎接总统时告诉他这个消息，并和他一起乘车到布莱尔大厦。

下午，我叫所有的人离开我的房间，也不接受任何函电，对形势独自思考了一两个钟点。"思索"只会得出一个顺序性、目的性过分强的过程。不如说它是要让各种各样可能性象万花筒中的碎玻璃那样形成一系列的行动图案，然后从中得出结论。我们只能根据我们在那个时候看到的情况，给总统提供有关今后的廿四小时的建议。但除此以外我们应该估计些什么呢？一个可能性是进攻被取消，另一个可能性是不会。在柏林封锁过后，几个月来形势又变得紧张起来，我们在一些危险地区进行军事演习以对付苏联对我们的决心进行的新试探。朝鲜是在名单上的，但不是最中意的。柏林、土耳其、希腊、伊朗——看来所有这些地区在作战方便的天平上是向苏联那边倾斜的。朝鲜离我们在日本的基地和主要武装力量太近，而离他们的太远，因而不构成有吸引力的目标。也许他们估计我们对朝鲜的兴趣不如别的地方大。但是现在进攻是从那里来了。再下去可能发生什么？我们应如何作出反应呢？几乎可以确定，进攻是由苏联发动、支援和怂恿的。非用武力不能加以制止。如果朝鲜军队担当不了这个任务——这点看来十分可能——只有美国军事干预才能做到。其他国家的军队在政治上和心理上有点用处，但在

军事上并不重要。我在欧洲两个星期使我毫不怀疑这一点。

很显然，这次进攻并不造成对苏宣战的理由。同样显然，这是一次公开的、赤裸裸的对我们国际公认的南朝鲜保护者的地位的挑战。南朝鲜是对美国占领下的日本的安全重要的地区。鉴于我们的应战能力，回避这个挑战将使美国的权力和威信受到极大损失。我认为威信的意义是权力投下的影子，那是具有巨大的威慑上的重要性的。因此，我们不能让一个苏联傀儡就在我们的防线火力圈内征服这个重要地区，不能仅仅在安理会中说几句话，表一下态而不作更多的反击。看来我们必须下定决心使用武力。这不是象马克·克拉克将军后来所说的我们必须准备"为了胜利大干一场"，我们只是要使他们的进攻失败而已。

当我出发去看总统时，我还心中无数。但我却很清楚知道我们要建议的方案将导向那里，并且为什么我们需要遵循这个方案。

所有被邀的人都聚集在布莱尔大厦。在等吃饭的时候，约翰逊部长请布雷德利将军读一份他从麦克阿瑟将军那里拿来的关于福摩萨战略重要性的备忘录。我意识到这是约翰逊想同我就分歧的意见进行辩论开的第一枪。显然另一个人也有同感，因为当布雷德利将军读完后，总统宣布，关于远东形势的讨论最好推迟到晚饭之后，那时可以没有其他人员在场。于是这个题目便不谈了。在布莱尔-李大厦的晚餐席上，只限于一般性的谈话。这顿晚餐极其丰盛，是白宫工作人员在一个星期日

下午接到极为局促的通知后准备好的。晚餐之后我们继续坐在桌旁，白宫工作人员收拾完桌子后便退出了。

然后总统叫我报告最近的事态发展情况，以及两个部准备向他提出的建议。关于巨大混乱情况，我作了一个令人忧郁的报告，并念了三项建议：

1. 除了已经由军事援助计划分配的之外，授权和指示麦克阿瑟将军对朝鲜提供武器和其他装备。

2. 命令美国空军在美国从属人员撤退时轰炸任何向金浦机场方向前进的北朝鲜地面和空中部队，以保护金浦机场。

3. 命令第七舰队从菲律宾向北开行，以防止中国向福摩萨进攻，或相反的情况。

我也敦促要加快对印度支那的军事援助。

然后，总统请所有在座的人发表看法。各人谈了些不同的具体细节来支持这些建议。比较一致的意见认为，当情况发展得比较明朗时，应采取迅速和强有力的行动。总统同军人们研究苏联会不会将危机推向全面战争，一致的看法认为不会。因为目前军事力量的对比对美国有利而对苏联不利，长期看来可能不一定如此。在目前情况下，他们不主张使用地面部队。约瑟夫·柯林斯将军说服了总统授权麦克阿瑟将军向朝鲜派出一个调查团，作出第一手估价，并提出报告。

最后，在十一点钟左右，总统接受了我的建议，但暂时保留对第七舰队发布具体命令的决定。等到它在三十六小时后到达福摩萨海峡能够执行命令时再行发布。他个人又对我作了两点指示——对可能遭受苏联进攻的其

他地区作一下调查，并为他星期二(也许是向国会)报告已经采取了什么措施准备一个发言稿。他说他要国务院最好的智囊们埋头搞这几项任务，并说，“在那里这种人有的是。”这话是多年来出自一个总统之口对国务院所作的最大的夸奖。在我们分手前，他强调在他星期二发言之前，任何人不得作任何评述，一定不可以有任何泄露，甚至连背景材料也不能向报界披露。我提醒他，我和路易斯·约翰逊在星期一要出席拨款委员会。他说，无论如何，我们两人对朝鲜问题不得说任何话。

会议结束时我给总统看一封福斯特·杜勒斯从东京打来的电报。他刚刚访问了朝鲜回到那里。电报说，“南朝鲜可能自己有力量抵住并击退进攻。假如是这样，那是最好了。但是，如果出现了他们力不胜任的情况，我们认为应该使用美国军队，那怕这样做会冒引起苏联的对应行动的风险。坐视朝鲜遭受无端进犯会灾难性地引起一连串极易导致世界大战的事件。我们建议要求安理会采取行动。”

6月26日，星期一

这一天，从朝鲜来的消息越来越坏，但工作还在进行着。把总统昨晚的指示的任务安排下去了。我把我将在拨款委员会作证的证词仔细看了一遍，然后，花了半小时给汤姆·康纳利和亚力山大·威利两位参议员和众议院委员会的基法官打电话，把报上登的重复了一遍；向他们报告我们对联合国的支持，它的代表们正在朝鲜忙着；并向他们要求，如国会各委员会有什么会议要开的话，都推

迟一天，"等我们拿出过硬的消息来报告"。拨款听证会开得还算顺利。

我回来的时候，消息更坏了。国会大厦来往的电话更多了；后来，助理国务卿杰克·麦克福尔跑到国会去通知各主席，使他们对越来越乱的消息有个思想准备。午饭之后，心烦意乱的朝鲜大使哭着来找总统和我，递交了李总统的呼救书。总统安慰了他。他临走时，我给他看了一份我们保证坚定不移地支持联合国的声明。

回到国务院，我同那些正在执行总统交办任务的人员商议。随后，在场者之一作了这样一条记录："国务卿中止了同我们一直在进行的讨论。他说他要一个人留下来并进行口授。大约在下午六点半我们被叫进去。他向我们读了一份他准备的文件。这是总统将要发表的声明的初稿。这件稿子同第二天正式发表的文件相比，没有多少重大的改动。"

在市区吃了晚饭，同国务院和国防部的官员们又开了几次会，然后我给总统打电话，告诉他朝鲜情况变得如此险恶，也许他愿意听取第一手的报告并给我们进一步指示。他便把星期日在布莱尔大厦开会的那一群人召集来了。

我们在九点钟碰头，副国务卿帮办H·弗里曼·马修斯代替韦布。范登堡将军报告，我们打下了一架俄国飞机。南朝鲜在一次猛烈的进攻下全线垮了下来。在答复总统要求提供建议时，我提议：

1. 空军和海军应向朝鲜军队提供全面支援。在目前可将活动限制在三八线以南。

2．命令第七舰队阻止对福摩萨的进攻，告诉国民党人也不要进攻大陆，告诉第七舰队，如有必要，可阻止他们这样做。

3．加强美国在菲律宾的军队，并加速援助菲律宾军队。

4．增加对印度支那的援助，并告诉法国人我们要派一个强大的军事使团去。

5．如总统同意以上各点，请他发表我按他指示所准备的声明，其中包括建议所采取的行动。

6．在明天上午召开的安理会会议上，我们应该提出一个新的决议案(希克森宣读了)，号召联合国会员国给朝鲜援助，以回击武装进攻和恢复这地区的和平。如果马立克回来否决这个决议，那么我们就按日前通过的决议行事。如果他不回来，那么新决议会不被反对而通过。

我们花了很多时间估计苏联可能有什么行动。由于我们对此不能肯定，在我们面临的困恼面前又增多了一个偶然性的因素。查尔斯·波伦和乔治·凯南根据他们在这方面丰富的经验，认为苏联的笨重的官僚机器简直使它不可能作出迅速的决策。他们认为，莫斯科要花相当多的时间来计算出有关力量的相互关系。大家猜想在明天不会有俄国人出席会议。

这些建议得到一致的赞同，路易斯·约翰逊也赞成，并得到总统的批准。在场的陆军官员们怀疑海军和空军的支持能否挽救朝鲜军队，但海空军的看法是比较乐观的。如果有必要在朝鲜投入地面部队，他们认为有必要作某种程度的动员。总统命令对此立刻进行研究。

他然后提出如何同国会领袖们商议的问题。讨论之后，约翰逊和我被派在明天上午在白宫同他一起与下列人士谈话，即：众议院议长（副总统在外地[①]）；多数党领袖参议员斯科特·卢卡斯和众议员约翰·麦科马克；外交委员会的参议员汤姆·康纳利和沃尔特·乔治（以上民主党）和亚力山大·威利及亚历山大·史密斯（以上共和党）；军事委员会的参议员米勒德·泰丁斯和斯泰尔斯·布里奇斯；外交委员会的众议员约翰·基、迈克·曼斯菲尔德和查尔斯·伊顿；军事委员会的众议员卡尔·文森和杜威·肖特。

执行星期一晚上决定的命令立刻发了出去，并立刻遵行了。预定在星期二上午开的联合国安理会会议推迟到下午，以便印度代表接受指示。因此，所谓美国为了支持安理会6月27日决议案所采取的行动，事实上在决议案通过之前已经发布命令并可能已经行动了。后来，俄国企图就此大做文章，但其宣传引不起多少注意。

6月27日，星期二

在总统同国会领袖会谈时，助理国务卿马修斯、腊斯克、希克森和杰塞普大使陪同我，参谋长们和三军部长们陪同约翰逊部长一起来。会议在内阁大厅举行。约翰逊和我坐在总统左右，国会领袖们围着桌子坐，其他人坐在他们后面。总统叫我扼要介绍情况，强调安理会必须采取迅速行动，并读了以后将发表的声明（事实上命令已经发下去了），并报告我们如何努力同苏联政府取得联系。

① 美国副总统兼任参议院议长。——译者

然后请大家发表意见。他们提了各种有关军事布局的问题，由参谋长们答复。问题包括为什么没有投入地面部队。参议员威利似乎是代表多数人的意见。他说，他只要知道我们有军事力量在那里，并且总统认为这些力量够用，便行了。参议员泰丁斯报告说，他的委员会今天上午建议延长兵役法并建议使用总统权力召集国民警卫队。

问题转向政治范围。总统说我们采取行动，是为了支持联合国为恢复该地区和平所作的努力。关于福摩萨，他的命令是辅助性的，目的是防止爆发任何新的战斗。我讨论了即将提交安理会的决议案，并且推测也许马立克不会来开会。并指出，既然苏联还未公开卷入，我们现在应谨慎从事，不要去触犯苏联的威信。众议员伊顿询问美国现在是否承担保卫南朝鲜的义务。总统回答说，作为联合国的一个会员国和响应安全理事会的决议，美国是承担这项义务的。问到其他国家有什么帮助，我回答说，对别国不能有太多希望，他们要么是手头上事情太多，如法国，要么是拿不出什么东西。我们保证经常给国会了解情况发展。大家一致同意，既然总统发表声明，就不需要别人评论了。然后散会。

在我们会谈的同时，安理会开了会。马立克没有出席。通过了美国的决议案。南斯拉夫反对，埃及和印度弃权。

杜鲁门总统的声明指出，尽管联合国号召停火，北朝鲜继续进攻，“在这些情况下，我已命令美国的海空部队给予朝鲜政府部队以掩护和支持”。并说，在这样的情况下，对福摩萨的进攻将直接威胁太平洋地区的安全以及在该地区执行合法而必要职务的美国部队。“因此”，声明

继续说，“我已命令第七舰队阻止对福摩萨的任何进攻。由于这一行动的必然结果，我已要求在福摩萨的中国政府停止对大陆的一切空海攻击。第七舰队将监督此事的实行。”声明还叙述了所采取的其他行动。

当天晚一点时候，我们把我们给苏联的照会告诉了报界。我们说，鉴于他们的代表拒绝出席安理会，又由于他们同北朝鲜当局的密切关系，我们正同他们直接接触，要求他们表示对发动进攻没有任何干系，并向北朝鲜施加影响，叫他们“撤退入侵部队和停止战争。”29日，他们答复说，是南朝鲜进攻，是南朝鲜和“在他们背后的人”应对一切后果负责。

星期二，纽约州的杜威州长在电话里向我读了他的声明，支持政府在朝鲜的行动，并问我有什么意见。我欢迎这个声明并表示最热情的欣赏和感谢。他立即发表了这个声明。

6月28日，星期三

紧接在杜威州长的支持之后，参议员塔夫脱就在参议院里展开了活动。他的讲话是典型的——带有十足的党派色彩和不客气，不过基本上是诚实的。他说，政府应对所碰到的麻烦负责。朝鲜的分裂，没有有效地武装南朝鲜，把“中国丢给了”共产党人，我在1月12日讲话中“所招引的进攻”，所有这一切都使进攻成为不可避免。甚至现在，总统还是用错误的方法做正确的事。这位参议员表示，可以同意国会批准干涉的决议，但对总统这一行政措施是否合乎宪法，抱有怀疑。塔夫脱所采取的立场是典型

的从参议院立法观角度考虑问题，以示和总统意见不同，正如以前参议员范登堡所做的那样。结果，国会在讨论到这些不同意见时，简直就缺乏对问题实质的理解。当人们摆脱掉分权制的束缚时，又易被那些美国与之合作的外国政府的缺乏道义拖住手脚。人们通常认为它们不是对共同事业缺乏干劲，就是对推护民主原则缺乏热情。

对我来说，比参议员塔夫脱的反对更重要的是艾夫里尔·哈里曼回到华盛顿来。一些时候以来他就想回华盛顿。他认为他在巴黎为马歇尔计划所进行的工作已大部分完成。华盛顿是世界的中心；他觉得他在欧洲是与世隔绝了。我曾为促成艾夫里尔回国向总统做过工作。为他找一个职位不是件容易的事。艾夫里尔具有极大威望，他自己也知道这一点。许多人嫉妒他。谁也不肯站开来让他。华盛顿好象一个军用飞机上的自动封闭油箱：一有子弹穿过，立刻封闭起来。总统同意，艾夫里尔在外交事务方面调和政府各部门之间的关系很有用，特别是同国防部的关系；自从春季事件以来这种关系一直没有缓和下来。不过，总统提醒我注意，如果哈里曼回来干这个工作，报界会说他是内定来接替我的，并且，他们将竭尽全力来促使这种预言的加快实现。我同意，将出现流言蜚语，当然会这样。但是，总统、艾夫里尔和我都知道，这是毫无根据的。四十五年来，我相信艾夫里尔的正直和信誉。这一信念不会被林肯称之为"雇佣文人"们所破坏。

因此，6月16日我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表示"热烈欢迎"白宫传来的消息，即将委派艾夫里尔出任总统特别助理。这个需要早就有了。至少对我说来，没有比这更

为恰当的人选。总统是同哈里曼先生和我商量后作这决定的。我说，自从1905年以来，“也许你们有些人不记得……我同哈里曼就是亲密朋友，并在各种事务上一起工作过。”

6月27日星期二早晨，艾夫里尔从巴黎打电话给我，他对总统在朝鲜所采取的行动感到极度兴奋。当华盛顿正在震撼整个世界的时刻，他再也不能多待一个小时，他要立刻回来。并指望我去“同总统打交道”。从那时起，整个时期我们在政府里都站在一起，他差不多每天都参加我们国务院九点半的会议，并出席他想参加的任何会议，过目全部重要电讯，接触全部情报。那些危言耸听，说会发生麻烦，并努力制造这种麻烦的人，都没达到目的。艾夫里尔的忠诚帮助和聪明建议，对总统和我以及整个政府，都有不可估量的价值。

28日下午，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会议上，我指出，我们对朝鲜的坚决态度在国内和全世界得到了热情支持，但不能指望这种热情会长久持续下去。如果事态发展将造成伤亡和增加税收的话，那么坚强的领导可能会不太得人心。我的意思是要准备挨批评和遭到困难，但总统误会了我的意思，他坚持说，我们不能从自己开始的路程上倒退回来。这个回答是他令人尊敬的性格的一个典型。当他认为他所做的事是正确的并在广义上对国家是最有利时，对他本人和他的党的政治前途所发生的影响他是既不动摇，也不考虑的。后来的总统们有一个时髦原则，叫“自由选择”(显然是回避作出决定)。这对哈里·杜鲁门是没有吸引力的。

6月29日，星期四

在一连串决策之中，星期三有一天间歇。星期四又忙碌起来。麦克阿瑟派到朝鲜去报告情况的约翰·丘奇准将已发出信号，如果美国军队不投入战斗，战前原状不可能恢复。到星期四早晨，消息更糟了。一切不让南朝鲜从汉城以南的汉江退却的尝试都失败了。到中午，阴云更加浓厚。总统在五点钟召集“布莱尔大厦小组”开了个会。

这次会议决定增加投入我们的海空力量，把北朝鲜的军事目标也包括进去，但不要越过北朝鲜。并决定授权使用地面部队以保障釜山的港口、飞机场和交通设备，这些都在远离战区的南边。同时，麦克阿瑟将军从东京乘飞机去过一次，亲自对战斗现场作一番侦察。他获悉，如果苏联军队干涉，他需为自己部队的安全作好准备，并立即报告华盛顿。不过，正如我已经提到过那样，国务院的看法认为，中国人可能干涉，俄国人则不至于。

会议后不久，我带着蒋委员长的提议回到白宫。他表示愿在南朝鲜投入三万三千人的军队，由美国运送和提供后勤支持。总统看来赞同此意，我则反对，理由是这些军队对保卫福摩萨比保卫南朝鲜更有用。他指示我明天在小组全体会议上提出来，届时他可以听取各方面的意见。

6月30日，星期五

麦克阿瑟将军到朝鲜前线作了一次冒险视察后回到

东京。他打电报给陆军参谋长柯林斯将军说，朝鲜人的退却是一场溃败，必须由美国作战部队来制止它。他请求授权给他立刻从日本调派一团人的兵力作为先头部队，随后尽快派去一个两师人的军团。柯林斯在星期五早晨三点钟收到此信，立刻在五角大楼与陆军部长佩斯和助理国务卿腊斯克一起，通过电传机同东京的麦克阿瑟将军进行讨论。（电传机是一种可靠的装置，当一架打字机在一端工作时，通过在另一端的相同装置，在两端同时记录下来。）麦克阿瑟将军又对自己的电报作了发挥，强调前线迫切需要美国军事援助。

佩斯部长五点钟打电话给总统。总统已起床，正在穿衣服准备作清晨散步。总统立刻授权调动那个加强团，并答应在几小时后作进一步回复；接着，他下令召集布莱尔大厦小组于当天早上八点半钟在白宫开会。腊斯克在去开会的路上向我汇报了详情。从前线来的要求和总统的反应并不使我感到惊奇。

在白宫，总统告诉我们他已经做了的事，并征询下一步应如何办。他说话间很赞成蒋介石的建议，由蒋立刻提供部队。我反对此议，理由是效果可能适得其反，——招来中国共产党在朝鲜或福摩萨的干预，甚至两面都来。参谋长们同意我的意见，认为运输工具还是用来运我们自己的军队和供应为好，因为蒋介石最好的军队对于抗击北朝鲜的装甲部队没有多大用处。小组一致的意见是，除已授权派出的兵力外，再从日本增派两师去。总统就这样决定了，并批准了必要发布的命令。

由于决定不接受蒋介石的建议，麦克阿瑟将军提出

由他到福摩萨去作解释。我们本能地感到，害怕由麦克阿瑟将军去进行解释是有道理的，后来经验也证明是如此。而且，在这关键时刻，应更好使用这位战区司令。因此，从东京派了一位国务院官员去福摩萨进行解释。

十一点钟我回到白宫参加一个国会领袖们的会议。我带了刚从东京回来的福斯特·杜勒斯一同去。参加这个会的人大约比星期二的会议多一倍。总统报告了朝鲜的形势，回顾了联合国安理会和美国政府已经采取的行动，和他当天早晨所发出的各项命令。参议员肯尼思·惠里打乱了大家普遍赞同的意见。他质问政府采取这些行动有何法律根据。参议员亚历山大·史密斯建议国会作出决议批准总统的行动。总统表示他愿意考虑史密斯的建议，并叫我准备一个方案。会议在众议员杜威·肖特发言后结束。他宣称，国会实际上一致赞赏总统的领导。肖特是来自总统家乡密苏里州的共和党人，在三军委员会中属少数派。

星期五的各项决定是在这紧要关头的一周中所作的达到顶点的决定。至此我们便全面介入朝鲜了。

十九　朝鲜战争：第一次危机

对一个授权决议案的想法

在以后的几天，我研究了参议员亚历山大·史密斯的建议。7月3日，总统召集了一个小组到布莱尔大厦听取和讨论我的方案。杰塞普和腊斯克同我一道去。约翰逊部长带了三军部长和布雷德利将军一起去。总统带了财政部长约翰·斯奈德，农业部长查尔斯·布兰南、邮政部长杰西·唐纳森、多数党领袖斯科特·卢卡斯参议员，和艾夫里尔·哈里曼。

我的建议是：总统向两院联席会议作一个关于朝鲜形势的全面报告。这样做，当然大体上是形式的，不过这样做可以在一次正式报告中把这个事件的整个过程叙述一遍，借以反驳有些议员的反对，因为他们说只有通过他们的领袖和看报纸才能得知情况。我又建议总统不要要求国会作批准的决议，而应根据宪法授与他作为武装部队最高统帅的权力来行事。但是，我们已拟定了一个赞扬美国采取行动的决议案，这个决议案如由议员们提出，是可以被接受的。

接下去是讨论，国会两院才开始休会一个星期，而总统不愿意把他们找回来。卢卡斯参议员，布雷德利将军和

约翰逊部长都反对上述这两个建议。关于作报告，他们认为离事件发生的时间已经太久，最好是附带要求拨款和要求授予必要的权力；关于决议案的问题，他们认为大多数议员是已经满意了，而那些少数无法调和的反对派反正是争取不过来的。他们会辩论不休，拖延作出决议，从而冲淡了它在公众中的影响。其他人则意见分歧。我同情卢卡斯—布雷德利的观点。总统显然也是如此。他推迟作出决定，等"四巨头"(即两院的主席和多数党领袖)休假回来后再说。到那个时候也许卢卡斯观点会赢得多数的支持。

我相信，人们对总统的所作所为是否合乎宪法，从来没有任何严重的怀疑——指不是由于党派斗争所引起的怀疑。这个结论在法律理论和历史先例上的根据在国务院1950年7月3日广为印发的备忘录中作了充分的说明。但是，有人怀疑不要求国会批准的做法是否明智。有人争辩说，如得到国会批准，可以免受后人批评说这是一次"杜鲁门的战争"。我的看法是，这只能改掉些贬义的句子，其他改变不了什么。国会的批准并没有使反战的人缓和或改变对林肯、威尔逊和罗斯福总统的批评。长期的困难的斗争、伤亡、昂贵费用、有限的和显然毫无结果的战争挫折，特别是反对党决定要终止民主党的似乎无限期的统治，这些才引起后来对朝鲜战争的批评。虽然如此，有人说国会批准没有害处。的确，得到批准没有什么害处，但在争取它批准的过程中却要花很大的气力。7月——特别是上半个月——是一个焦虑不安的时期。当时美国军队投入了战斗。他们和他们的朝鲜同盟者受到野蛮的惩罚，在半岛上向后节节败退，直到他们只能在釜山周围

沿海地区勉强站住脚。美国全国以及全世界的人抱着怀疑的眼光，屏住了气阅读这些英勇士兵的与日俱增的伤亡数字，他们大多数是没有战斗经验的。在败退的混乱中，甚至他们的师长威廉·F·迪安少将也被俘。在这个时候，如果通过一系列的听证会来批准一个决议案，国会势必引起无休止的批评，估计对当时在国内所呈现的人心动摇和军队中不振的士气，并无任何鼓舞作用。在我看来，这样做法的害处大大超过在最后可能获得的一点点好处。

总统同意了，并且我想，他也为一种他一向热烈坚持的信念所感动。他的伟大的职位对他说来既是一个神圣的也是一个暂时的职责。他决心在移交时不要使这个职责的权力和威信受到丝毫损失。这个态度使他强烈反对企图采取任何行动以避免对他的批评，从而开创削弱总统调遣军队作战权力的先例。我们准备了一个备忘录，并开列了上世纪中八十七起他的前任者们这样做法的先例。因此又作出了另一个决定。

在我上述的6月里的七天之后不久，白宫给我送来一张条子。我以此来结束我的叙述。部分原因无疑是由于我感到自豪，但这封短笺也很好说明总统具有一种能团结部属、使他们能为他忠心耿耿服务的优良品质。这条子是手写的。

给迪安·艾奇逊的备忘录(1950年7月19日)

关于6月24日至25日——

你在星期六夜里（主动地建议）立刻召开联合国安理会并立

刻通知了我的这种做法是此后事态发展的关键。如果不是你朝着这个方向采取了迅速的行动，我们也许要单独地干预朝鲜问题了。

星期天夜里在布莱尔大厦的会议是你星期六夜里行动的结果。后来的结果表明你是一个伟大的国务卿和政治家。

从那时候起你处理形势的策略是卓越的。

送上此笺，作为你的经历。

哈里·S·杜鲁门

一个焦虑不安的夏天

在那决定性的七天之后，我的工作比较轻松了些，不再全部集中在朝鲜问题上了，虽然还是继续被它纠缠着。这次北朝鲜的进攻也促使这些繁忙焦急日子里的其他问题活跃起来——同共和党的“不可调和分子”的斗争（用一个三十年前的普通词来说），还有我们的欧洲盟国担心我们被朝鲜的拚死的战争吸住，以致我们对他们的安全照顾不够。

朝鲜战争一开始，杜鲁门总统便打算在那里打一场有限的战争。他这种决心得到了国务院和国防部以及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坚定而有力的支持。这样的战争政策需要跟别种战争政策一样，要下很大决心。它还要求我们有克制和很好的判断力，能有把握知道该走得多远。它还会遇到许多挫折，而在朝鲜的确遇到了许多挫折。在执行这个政策时，会遇到从两个方面来的反对和批评，即来自那些害怕双方的均势失掉了平衡，无法打一个有限战争的人，和那些害怕有限战争可能妨碍取得胜利的人，

他们认为“只有胜利，别无抉择”。前者现在称为“鸽派”，他们利用我们每次的挫折来减少我们国家的目标，并希望及早撤手不干。而“鹰派”则夸大任何一点成就并要求取得对方无条件的投降。甚至在这样初期就显然看出，前者是英国人和印度人，后来有加拿大人加入这一派。后者是麦克阿瑟将军和“对华强硬政策”派人，特别是不可调和的共和党人。

英国—印度和平倡议

英国外交部长期以来相信——但是似乎并无任何证据，——它了解俄国人，可以通过谈判和他们议订一个解决难局的妥协方案。但对另一些人来说，要求妥协常常很象投降。7月，正当我们为在朝鲜保持一个立锥之地而在极不利的条件下进行战斗时，我们竟花了一个月的时间来讨论由他们自动地向我们提出的一个“和平解决”方案。印度还不让英国人知道，单独地进行活动。我那种有关英国对苏联外交策略的评论是不适合用来描绘印度人那种策略的。

紧接在安理会6月27日决议之后，英国政府忠诚协力地把英国军舰开到日本海供麦克阿瑟将军使用，作为他们帮助朝鲜的最快方法。后来他们派来“格洛斯特”英雄旅，他们英勇地投入战斗而遭受伤亡。同时，英王陛下的政府几乎立刻开始寻求和平解决。在7月初期，英国驻苏大使戴维·凯利爵士便设法同外交部副部长葛罗米柯接触，艾德礼首相向总统提议，在华盛顿由总统提名的人同英国空军元帅阿瑟·特德勋爵和奥利弗·弗兰克斯

大使进行商谈。总统从三军中挑选了奥马尔·布雷德利将军，我提议菲利普·杰塞普大使一同参加。

同时，艾伦·G·柯克从莫斯科报告说，葛罗米柯问凯利有没有关于和平解决的具体建议，凯利的回答是"恢复原状"。柯克大使坚持说，我们必须向英国人讲清楚，和平解决的先决条件是北朝鲜必须完全遵守安理会的停火呼吁并将入侵部队撤回三八线以北(英国人告诉我们，只有先同我们充分讨论之后，他们再同莫斯科作进一步谈话)。

我们几乎很快便同伦敦和新德里发生了严重分歧。7月6日，和奥利弗·弗兰克斯爵士一起吃饭时，我向他说明，我们对贝文催促我们作出停火让步感到不愉快，因此第二天指示我们驻伦敦大使刘易斯·道格拉斯表态，说我们拒绝这样办。他可以说，凯利—葛罗米柯会谈最多不过对了解莫斯科心里的打算，有点用处(如果莫斯科确有什么想法的话)。大使的访问使我们得到更多情报，即有一群所谓"有权势"的英国外交部人员，热衷于及早把共产党中国弄进联合国，以挫败俄国把中国和西方隔绝的企图。

大使这次的访问还带来了贝文写的一封信。他写道，克里姆林宫其实是希望恢复原状的，但他认为，他们要我们改变在福摩萨的立场作为交换条件。他说，那些支持联合国关于朝鲜决议的国家，并不支持我们对福摩萨的立场。在总统6月27日的声明中，有些部分并不是直接针对朝鲜问题的，我们不应对这些部分加以轻描淡写，以免危害西方国家之间的团结。

可以想象，这样一封信不会使总统和我高兴的。于是，在1950年7月7日，由我起草并经他批准了一个坦率的答复。提出了我们两人一致的四点意见：

1. 我们不同意强迫我们把福摩萨交给共产党来换取他们从朝鲜的撤退。

2. 我们的政策是尽可能在军事上迅速消除对朝鲜的侵略，不作任何足以促进共产党贪欲的让步，以免他们在别的地方进行侵略。

3. 我们的政策的另一个目标是通过对日和约或通过联合国用和平的方式来解决福摩萨问题。

4. 如果要在联合国审议福摩萨问题或中国代表权问题，应以是非曲直为依据，而不应在对方施加压力或采用恫吓手段的情况下进行。

我们还指示大使发表口头谈话，表示不欢迎共产党政权在安理会代表中国，不欢迎马立克回到安理会，因为这会使目前形势激化。他还应说，总统和我很严重地看待贝文先生的照会，它的内容可能影响今后的英美合作关系。

大使在7月11日在医院里把信交给贝文。他发现贝文对这封信的强硬语气感到惊愕，并为自己的处境辩解。贝文的书面答复警告我们说，不要迫使中国投入苏联怀抱里去。他又说，虽然必需打退侵略，而他也不会被恫吓所屈服，但是他要苏联和共产党中国参加安理会。这种书信往来显然是枉费唇舌，毫无结果的，所以我们放弃了。

特德—布雷德利会谈也没有什么进展。布雷德利将

军解释说，我们需要几星期时间来建立我们的力量，才能发生决定性的作用。他认为俄国人不会公然来干涉，因为那样一来就是大战了。而且，这样的战争是不会在朝鲜打的。

同时，印度人为和平解决而进行外交活动的劲头越来越大，但是花样繁多而又混乱。在莫斯科，印度大使拉达克利希南去找外交部副部长佐林；在华盛顿，印度大使、尼赫鲁的妹妹潘迪特夫人找我谈话；在印度，外交部秘书长吉查·巴佩爵士同美国大使洛伊·亨德森谈话；在联合国，克里希纳·梅农则向我们的人挑战。他们每人推荐的方案都不是完全一样的，并且还要坚持必需向英国人保密，当然事实上并没有这样做。他们总的看法是，要我们支持把共产党中国搞进安理会，然后，由俄国人和中国共产党人在安理会上支持停火，使北朝鲜军队撤至三八线，再建立一个统一的和独立的朝鲜。

11日，柯克通过拉达克利希南知道，葛罗米柯当场拒绝了方案的第二部分。在总统的批准下，柯克受权告诉他的印度同僚，我们决不会同意奖励侵略者，降低安理会6月25日和27日决议中的要求，或使战后的朝鲜处在无法防御境地这样的方案。

然后，在13日，尼赫鲁总理以私人的名义写信给斯大林和我两人，提出了一个比莫斯科拒绝了的建议更令人不满意的建议。他写道，印度的目的是把战争限制在局部的地区上，并且，为了促使早日和平解决争端和打开在安理会中的僵局，使共产党中国的代表能坐在安理会席位上，使俄国人也能回到安理会上来，这样，不管在安理

会里面或外面，美国、苏联、中国、再加上其他爱好和平国家的帮助和合作，可以找到一个结束争端和永久解决朝鲜问题的共同基础。在这个愿望下，总理希望，我能运用我的权力和威望给予大力协助。

虽然这个建议的逻辑含混难解（把共产党搞进安理会以便在安理会之外同他们接触），但其意图是非常清楚的。这样将可以把人们讨论侵略朝鲜这个问题的注意力转移到谁应在安理会上代表中国的问题上去。把国民党赶出安理会（这是事情的实质）将作为换取北朝鲜军队撤退所付的代价。巴佩曾清楚地预先告知亨德森下一步便是把国民党赶出福摩萨。而当共产党想把我们的军队赶出朝鲜半岛时，我们在朝鲜的军队要打一场后卫战斗。我觉得对这样一个建议不需要任何人给我出主意就可以下定决心。但是，我还要受到精神上的劝勉。

潘迪特夫人——一个风度优雅的妇女——17日来找我，带来她哥哥的呼吁。她承认北京进入和莫斯科回到安理会可能会妨碍争端的解决，但这不应作为拖延安理会恢复全面代表性的理由。坚持我们提出的先决条件——例如要北朝鲜回到三八线——就会被人认为我们缺乏和平解决的诚意〔原文如此！〕。如果中国人得到席位后表现不讲道理，世界舆论将要他们负责。她的哥哥认为，莫斯科正在寻找一条出路，这就是寻致和平解决争端的真正途径。她说"这也许是靠信心，但是没有其他选择比这更好"。我从小有一个幻觉，至今还未完全忘掉，即，如果地球是圆的，印度人一定是头朝下倒立的——或者，是颠倒过来。

在总统批准下，我在7月18日作了答复，试图把首要的事情放在首位。我在关键的一段写道："一个破坏和平或侵略行为是联合国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我们不相信，要解决北朝鲜的侵略问题必须要看联合国如何解决其他目前所遇到的问题而定。"

据说这封信使尼赫鲁先生感到恼火。但是，双方还是继续交换过一次信件。这次通信使得巴佩——一个很风趣的矮子——向亨德森严肃提出，尼赫鲁先生希望美国不要偏爱一个没有苏联集团的联合国。两天之后，莫斯科宣布马立克回到安理会，幸而这样就结束了印度的倡议。因为，俄国人事实上已经回来了，很难再强辩说，由于中国共产党没有列席而他们就不愿回到安理会来了。

其他国家也响应联合国决议，他们的贡献比那种想入非非的和平倡议要有用。到年底，有十五个会员国派了或正在派遣武装部队到朝鲜去，有三十个国家提供了民用救济和建设物资。在这个月中，当战争对我们不利，我们正向釜山溃退时，政府重新催促把在冬春之间开始的对我们自己和盟国的军事形势的检查进行下去。

武器和兵力

向朝鲜派出两师人的事使国家安全委员会-68号决议不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立刻成为一个预算问题。国务院对经济顾问委员会在半年报告中所采取的松劲态度感到担忧，因为他们以为战事已经局部化了，因而不再需要紧急的经济控制权限。我们在讨论时一致认为，不但这

个国家在当时所采取的或显然准备在必要时所要采取的行动，都对将来可能需要它必须采取的行动有莫大的影响。我们认为这些决议完全不够，并且，国内的舆论是准备赞成采取有力行动的。我们指示威拉德·索普在白宫召开的一些关于经济事务的会议上发表这些意见，并为我出席这些会议作安排。

总统曾要国务院和国防部就苏联今后可能采取的行动提出报告，在7月14日的一次内阁会议上所作的一个报告使我们有机会提出这个问题。我们的结论是：苏联有军事能力，直接地或通过它的卫星国，在它周围的一个或几个点采取行动或打更全面的战争。在估计了一些可能出事的地点和原因后，我报告说，关于在哪些地点最可能出事的问题并未达成一致意见，但是大家一致认为苏联的侵略野心或局势的急剧变化所引起的某些行动可能带来极度的危险。如果在一个或几个地方爆发，我们将需要用比当时所能调度的更多的兵力。我敦促总统要求立即增加所有军种的定员，增加拨款，——宁多勿少——增加军工生产以及授予分配和限制使用原料的权力。我并敦促总统声明，这种做法不仅增加我们自己的军事力量，也是增加我们盟国的军事力量。在我看来，增加军工生产特别重要，因为它能使我们拥有最大的战斗力。

总统全部同意，五天之后，他在参议院作了一个报告，把这些意见都包括进去了：

在所有情况下，很显然，美国需要增加军事力量和准备，不仅为了对付在朝鲜的侵略，也是为了和其他国家一起，增加共同

麦克阿瑟捅了漏子

1950年以前麦克阿瑟将军对福摩萨既未流露过也未表示过兴趣。这将使人回想到1949年3月1日他同新闻界的谈话，当他谈到"在对抗亚洲侵略中……我们的防御线"时，他没有把该岛包括在内。但是，这位将军对于从美国传到他那里的关于两党政治斗争的报道并不是充耳不闻的。特别是由共和党右翼散发出来的那些话，他们认为我们的远东政策是可憎的，并且不时提到这位将军，把他说成好象是一位神通广大的领袖，足以结束民主党在白宫的讨厌的统治。参议员亚历山大·史密斯暗示，当这个集团象蒋介石移居到福摩萨那样把他们的注意力也转移到了福摩萨时，麦克阿瑟将军就改变并提高了他对福摩萨军事重要性的估价；他这种看法可以由麦克阿瑟的备忘录加以证实，这一备忘录是布雷德利将军从麦克阿瑟那里带来的，并向第一次布莱尔大厦会议宣读了。今年早些时候，从这位将军的司令部莫名其妙地透露了我们的一份宣传文件，涉及万一福摩萨落入中国共产党人手中时我国政府所要执行的政策方针，这种行为简直比笨拙地犯错误更为严重。最后，麦克阿瑟将军急切地要亲自去向蒋委员长解释为什么我们没有接受他提供部队的建议，他这种愿望应该使我们提高警惕，但事实上却没有。

7月底，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成员们把杜鲁门总统关于既不容许对福摩萨发动进攻也不容许福摩萨向大陆发动进攻的命令解释成对它的战略重要性看法上的改变（其实根本不是这个意思），为此，联席会议建议派遣一个

军事考察团就福摩萨的防御情况提出报告。

上述这些事实看来已经够奇怪的了，8月1日华盛顿官方惊异地在报上看到，麦克阿瑟将军到达了福摩萨，吻了蒋夫人的手，并同她的丈夫进入了会谈。为查明是怎么回事，我打了个电报给威廉·西博尔德，他是国务院派任的驻东京政治顾问。杜鲁门总统的评论引起我们大家的仰慕和钦佩。麦克阿瑟的说法是，“使我惊奇的是，对福摩萨的访问以及我同蒋介石的会见受到热烈的赞扬”。蒋委员长从福摩萨高兴地欢呼说，“现在我们又可以同我们的老战友亲密地一同工作”，胜利是肯定的了。麦克阿瑟也对蒋报以赞颂和保证“中美两国部队间的有效军事协作”。他未告知五角大楼就调派了三个喷气战斗机中队去福摩萨。随即有明确的命令传给了他，强调了我们关于福摩萨政策的限度，接着，哈里曼又去对这些原则作了补充说明。一个星期以后，8月10日，这位将军发表了一个声明，声称他的福摩萨之行曾经“事前与美中两国政府的各部门进行了正式的安排和协作。”他作出结论说，“对于这次访问，那些过去一向宣传太平洋绥靖政策和失败主义的人们向公众作了恶意的歪曲报导。”

哈里曼带回来一个矛盾的报告。一方面，他告诉总统和我说，麦克阿瑟虽然不同意我们对中国和福摩萨的政策，但却说，他是一个优秀的军人，懂得服从命令。然而，在哈里曼的脑子里却一直盘旋着怀疑：他是否已经同麦克阿瑟“在我们认为应采取什么方法来处理福摩萨和蒋委员长的问题上获得一致的意见”。他们的意见当然并没有一致。

8月25日，晚间，迈克·麦克德莫特从桑迪斯普林打电话给我，读一段美联社的记录新闻稿给我听，那是麦克阿瑟写给国外战争退伍军人协会年会的祝贺词。虽然电讯已送达各报社，但要在两天之后才发表。信的内容是以大段篇幅描绘福摩萨对美国的重要战略意义，包括下面这一段话：

如果福摩萨落在这样一个敌国的手里，就可以当作一个不会沉没的航空母舰和潜水艇供应船，座落在一个非常理想的位置上，它既能完成进攻战略，同时又能挫败驻在冲绳和菲律宾的我们友军的防御或反攻的军事行动。……

有些人主张在太平洋方面采取绥靖政策和失败主义，他们说，如果我们保卫福摩萨，就会同亚洲大陆相疏远；没有什么比这种陈词滥调的辩解更为荒谬的了。那些说这种话的人根本不了解东方。他们不承认，东方式的心理状态是尊重和听从有进取性的、果断的和有力的领导——坚决反对怯懦和优柔寡断的领导——他们过低估计了东方的心理状态。

我说，我明天一早就到国务院来，并请腊斯克、杰塞普、马修斯、韦布和哈里曼到那里同我会面。麦克阿瑟这种轻率鲁莽的行动和他那篇贺词在国内外所造成的不良影响，引起我们全体的无比愤慨。7月19日，总统着重指出，我们对福摩萨所采取的行动的目的是有限的，而仅仅在前一天，奥斯汀大使也曾向联合国秘书长赖伊重申我们这一政策。麦克阿瑟将军是在7月8日被任命为联合国驻朝鲜部队司令员的。我们一致认为，对这种不服从指挥的行为是绝对不能容忍的。必须强制麦克阿瑟公

开收回他的声明。艾夫里尔把这份记录新闻稿送到白宫去。

不久之前，总统曾约定要在这天早晨九点半找国务院、财政部、国防部、哈里曼以及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开会。当我们鱼贯进入椭圆形办公室时，总统紧闭着泛白的嘴唇，也不象早日那样和我们寒暄问好。他随后问在座的每一个人是否事先收到过任何通知或有所知悉。谁都不曾有过。路易斯·约翰逊受命下达总统命令给麦克阿瑟，收回那篇贺词，随即向总统汇报他(麦克阿瑟)已照办。总统本人还把一份奥斯汀大使致赖伊信函的抄件直接寄给麦克阿瑟，使他知道为什么命令他收回那篇贺词是必要的。会议所要办的事情就这样迅速地办理好了。

我们离开白宫时，我觉得，总统已下令麦克阿瑟收回他那篇贺词，这件事应该是毫无疑问的了。但是，约翰逊部长不久打电话给我说，这样做会搞得很窘，为此，他(约翰逊)想，最好是告诉麦克阿瑟说，如果他已发表了那份声明，"我们"回答说，那只是"一个人的个人意见，而不是政府的政策"。我说，看来问题在于，究竟谁是美利坚合众国的总统。约翰逊接着向我提出一个令人感到惊奇的问题——他提出是否"我们敢于给〔麦克阿瑟〕打一个电报，告诉他总统指令他收回他的声明?"鉴于这是总统的命令，我看不出还有什么别的办法。

按照约翰逊的要求，我问了艾夫里尔·哈里曼，他是否明确，总统已发出了一道命令。结果，不一会儿约翰逊给我打了个电话说，总统逐字逐句地向他口授了如下指示送给麦克阿瑟:"美利坚合众国总统指令你收回你写给

国外战争退伍军人协会全国野营年会的贺词，因为其中涉及福摩萨问题的许多独特的提法，与美国政策以及美国在联合国中所持立场是相抵触的。”

约翰逊仍旧怀疑发出这道命令是否明智，他继续提出他先前的那种变通办法。他的副手斯蒂芬·厄尔利也加入电话谈话来支持他，并提出麦克阿瑟将军有言论自由权利的问题，并建议总统同麦克阿瑟将军商谈，这时，我借口中止了对话。我及时向哈里曼汇报，我说，如果约翰逊想要重新讨论总统的决定，他应向总统提出申请。总统指示哈里曼说，他已口授他的命令，并指示必须发出这道命令。事情就这样办了。结果，麦克阿瑟的贺词既被收回，又被非正式地发表了。

总统这样写过，这时他曾考虑免去麦克阿瑟将军朝鲜司令员的职务，而保留他在日本的职务，但最后决定没有这样做。后来曾有人引述他的话说他后悔当时没有把他这两个职务全部免掉。如果后来发生的事情在当时已暴露出来，我就应建议总统不惜任何代价，采取这一措施，可是，我当时并未想到这种处罚对麦克阿瑟来说是恰如其分的。麦克阿瑟将军的弱点在于他那种狂妄自大和爱好虚荣的个性，这种弱点使他被一些拍马奉迎的人所包围，即使其中也有几个有能力的人。马歇尔将军告诉我说，战争年间，在一次他同麦克阿瑟的会谈中，后者以这样的语句开头说，“我的参谋人员告诉我……”马歇尔将军打断他说，“将军，你并没有参谋人员；你有的是一朝臣子。”

危机得到缓和

当美国军事力量大量投入釜山之后，整个半岛上的长途退却停了下来，一种不很稳固的局面由第八军在釜山周边建立了起来。到7月20日，总是乐观的麦克阿瑟将军能够电告总统说，敌人“曾有过很大的机会，不过未能加以利用”。但是还要经过几个星期顽强的防御战之后，我们在华盛顿的人们才能相信，形势的确象这位司令官将军那样乐观。

有个机会可以让我躲开华盛顿几天去看看我的女儿，我差不多整整一年没有见到她了。我们住在萨兰纳克附近的上圣里吉斯湖边一个野营里，在那里我的妻子、女儿、外孙可以团聚在一起。我飞往那里快乐地度过了一周，通过海军提供的复杂电子设备同国务院保持着一般的联系。幸而这套设备供我使用时没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结果，我在那场因我们轰炸罗津而在国务院同国防部之间引起的争论卷入不深；这是一场和在十七年以后因轰炸北越所引起相类似的争论。

罗津位于离苏联和朝鲜东北边界十七英里地方，被认为有军事重要性，因为有一个化工厂和铁路调度场，据说苏联支援北朝鲜的军火供应在这里集结分发。8月12日，在我离开后的第二天，国务院得悉罗津在恶劣的气候条件下被炸了，轰炸的结果未能确定。国务院抗议说，这种轰炸违反总统指示美国军用飞机“明确远离”边界的命令，并要求在今后派遣这类会产生疑难问题的出击之前要事先同国务院进行磋商。约翰逊部长否认曾侵犯过边

境(这并非问题之所在)并拒绝磋商。我回来时，就不再提这个问题了，不过，以后所有这类事件都是总统亲自把我们双方面找到一起来进行磋商的。

带着阿地罗达克的新鲜空气和快乐的回忆归来后，我发觉国务院的同事们正在轻声细语地议论着有关世界上欧亚两洲的各种政策。这次在朝鲜所发生的事件打破了我们在许多危机性问题上的思想停滞状态——对日本的和约、德国参与它自身和欧洲的防务以及在击退侵略之后将如何处理朝鲜的问题。所有这些问题都急需同时处理。当时，政府能够也的确每一次应付了好几个危机。

二十　九月的意外事件

仁川："常识作战计划"

我们到达纽约三天之后，海军陆战队第一师开始于9月15日在朝鲜的西岸仁川登陆，仁川在大约三八线之南三十五英里，地处被占领的首都汉城之西同样距离。9月27日汉城被夺回，并在争夺战中受到极大的破坏。沃克将军的第八军在南方同时进攻，从釜山防线出兵，追击溃退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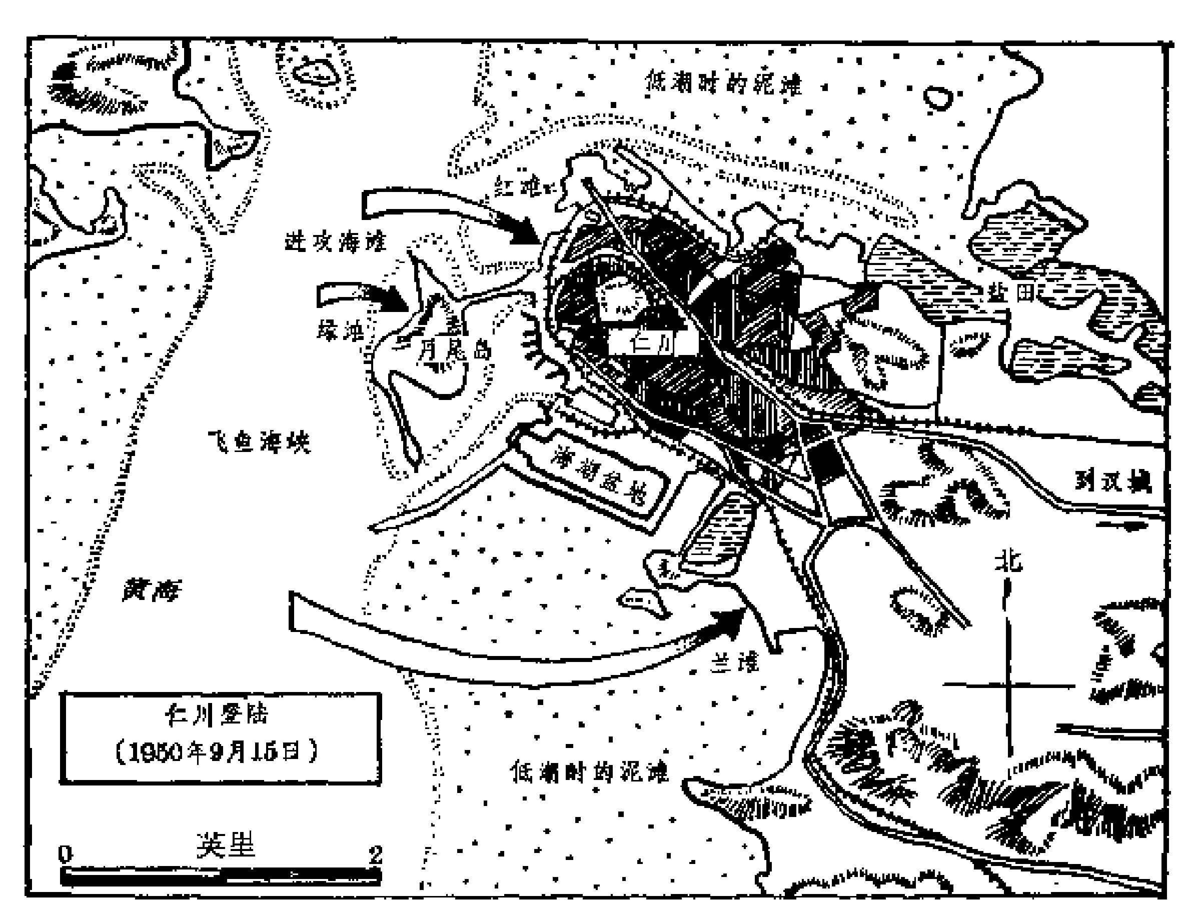


图 2 (按原图译制)

北朝鲜军队。后来这支军队又被汉城以西麦克阿瑟的部队所截击，完全被这两支美国军队击溃了。四十万军队中大概有三万人没有携带装备零星逃过三八线。麦克阿瑟的司令部于这个月底在没有抵抗的情况下进抵三八线。

“冒险行动呢还是值得仿效的勇敢”

仁川的反击取得光辉的成功。这可能视为历史上不朽的军事胜利之一，倘使这不是从马纳塞斯战争以来美国军队遭到最大的惨败和一个很不光彩的国际灾难的前奏。为了理解为什么如此，必须深入研究仁川之战的性质。在这样做的时候，不能说麦克阿瑟将军应对朝鲜的不幸负完全责任，这是不真实而且也不公正的，虽然他应负最大的责任。事后可以看出也犯了其它的错误，其中我亦有份。

在 8 月 23 日之前，只有麦克阿瑟将军一人赞成这个冒险的仁川作战计划。这不但是一个包围战，而且是向敌军后方迂回，截断他们的交通线，把他们消灭在两大钳子的嘴里。对此参谋长联席会议表示反对，尤其是在东京的陆军和海军首脑；同样将执行这个计划的陆军、海军和海军陆战队的司令官也表示反对。持反对意见的还有指挥釜山第八军的沃克将军，因为要增加北部的登陆部队，他的部队将因此削弱。假使在仁川一旦失足，他知道他将被北朝鲜的部队所压倒。并且，失败的可能性很大。麦克阿瑟自己估计在仁川成功和失败的可能性是五千对一，他并且认为，正因为不大可能登陆，这一点反而保证了成功的必要因素，即进行出其不意的袭击。

仁川港的入口处很狭窄，乱石、浅滩和平均二十三英尺到三十三英尺高的大潮汐给航行者带来危险。只有在涨潮时能使登陆艇驶到防波堤。即使这时，潮水也只高出海面十四英尺。最高的海潮只有在9月15日与10月11日之间到来。在低潮时港口是一个泥浆平滩，搁浅的登陆艇可能被炮火打得粉碎。一位海军参谋军官说，他们曾罗列了一连串能够想象得到的自然障碍，而仁川全部具备。人们对于这个说法一点也不奇怪。这些情况都于8月23日在麦克阿瑟将军东京总部会议上陈述过，但他置之不理，并对自己的计划作了出色的辩护，会议最后在异常的沉默中停止下来。他说："我几乎能听到命运的秒针的滴嗒声。……我们将在仁川登陆，而且我将击溃他们。"

这样，由于麦克阿瑟将军的威望，最后勉强地使参谋长联席会议以及总统同意仁川作战计划。正如海军上将谢尔曼所说："我希望我能有这个人的自信力。"麦克阿瑟的运气高潮到来，并顺着这个潮流获得胜利。他的运气是这样地好，以致台风"凯谢亚"正以每小时一百二十五英里的风力吹向入侵的舰队时，忽然转而东移。共产党侦察人员由于我们安全方面的缺点而获悉了这个计划，但未能把情报通知北朝鲜人。仁川计划在日本的绰号是"常识作战计划"。

人们应该理解麦克阿瑟将军在仁川所冒的巨大的风险，和帮他渡过难关的同样巨大的运气使他达到了目的，来理解那种促使他凭着不可能的偶然性向鸭绿江进军的傲慢。但是在进军鸭绿江时他的运气——并很不幸的是美国的运气已经完蛋了。

为和平而联合行动。

7月29日,苏联外交部声称将停止对联合国安全理事会长期和有用的抵制。它的代表马立克将回来担任8月份的主席。他回来以后在那里的表现甚至超过了人们对他的热烈期望。在国务院,希克森所领导的司被指令就进攻被击退后在联合国应采取怎样的政策这一明显问题上着手工作。6月27日的决议的第一个目的是击退进攻,这个目的已于九月底达到。第二个目的是,“恢复这地区的国际和平和安全”。这些词句本身没有包含任何特殊意义。它们是从联合国宪章第四十二条摘录下来。这条授权给安全理事会,倘使认为……“和平遭到破坏或有侵略行动的存在”——象此次这样——“采取可能需要的海陆空军事行动来维持或恢复国际和平和安全”。对这决议一个通情达理的解释本来应该是,在击退军事进攻后,安全理事会要合理地确信,在和平的守护者撤退后,武装进攻不会重演以前的事情。马立克在安全理事会使用苏联的否决权,显然将阻止在这里作出不为北朝鲜所欢迎的任何保证和平的计划的决议。

但是,根据历史的形势来看,决议的第二条款可能解释为比防止新攻击具有更多的意义。它可能包含1947年联合国决议的目标,“一个独立、联合的朝鲜政府”,那时被认为这是走向这地区的和平和安全的一个基础,假如不是一个前提的话。在这口号后面隐藏着一种现实。以三八线为界把朝鲜分为两部分,北半部属于苏联的势力范围,南半部则属于美国的势力范围,实际上,是这地区

和平和安全的主要障碍。另一方面，美国政府不愿让它的军队不顾一切反对来承担创建一个独立和统一的朝鲜的义务。

美军占领南朝鲜是日本投降中的一个偶然事件。在1910年日本并吞这国家之前，它曾被中国和俄国所剧烈争夺。在与日本战争期间，四个主要参战列强曾含糊地同意一个自由和独立的朝鲜，先经过初步的和希望为期极短的四强托管。日本的突然垮台，促使为那里大量日本部队的投降作出安排。参谋长联席会议建议美国在最邻近日本的朝鲜南部、俄国在最邻近西伯利亚的北部接受投降。从中国战场上最近返回五角大楼的年轻军官、陆军上校迪安·腊斯克认为三八线是便于管理的分界线。这样将使美国拥有一个北部载运港口仁川，和一个南部载运港口釜山，以便把投降的军队遣返。这个计划被总统和斯大林大元帅所接受，由麦克阿瑟将军于1945年9月2日用第一号通令颁布了。但是正如驻朝鲜司令约翰·R·霍奇将军所报告的那样，对这国家的分割表示的不满差不多立即开始了。我们不久就知道苏联并不把三八线作为军事管理方便的界线，而作为保护他们占区的一堵城墙。这是我们从德国、柏林和伊朗得到的惨痛教训，而我们坚决不让同样的情况在日本和奥地利发生。

国务卿贝尔纳斯和莫洛托夫于1945年9月在莫斯科处理这个问题，为朝鲜统一和独立联合委员会筹划一个协议。近两年的时间，委员会的每种努力都遭到失败。正当我辞去助理国务卿之前，国防部长帕特森建议从朝鲜撤军，以便将我们有限的军事力量适应其他地方的需

要。其他的需要和有限的力量是很明显的，而且好似有足够根据可以希望——在那些希望的日子里——伊朗通过联合国而统一的成功同样可以在朝鲜实现。经过总统同意之后，美国在联合国大会上为解决朝鲜独立问题和撤退外国军队提出一个决议案，要求撤军并选出南北两方地方代表来做好统一工作，把朝鲜独立和撤退外国军队问题提到联合国大会。俄国人把这个倡议解释为我们想从朝鲜解除责任的企图，但他们接受撤军，而反对联合国监督下的选举。他们建议让南北朝鲜人在没有外来的干涉下，于外国军队撤出后，双方协议国家的统一。这样明显地将引起内战的建议被否决了，而美国的建议被接受了。联合选举委员会遭到北朝鲜的拒绝，在南朝鲜举行了选举。一个大韩民国政府被联合国大会承认为朝鲜的唯一合法政府。俄国人立刻相应地在北方建立一个朝鲜人民共和国。它也声称有权管辖整个国家。

当这个政权进攻南方并在这过程中丧失了大部分的军事力量时，不用更多武力或冒险来完成一个独立和统一的朝鲜的可能性对联合国是有诱惑力的。但要作这种努力，或即使退一步要防止进攻的重起，需要一个在安全理事会里不致被苏联否决权所阻挠的联合国决议。我在9月20日"为和平而联合行动"的发言，用意在于用联合国大会的活动，让联合国作进一步的决议。以前我们询问过英国外交部关于发生侵略而安全理事会由于否决权而处于瘫痪状态时，拟转请全体大会处理的意见。英国的回复是冷淡的。英国外交部明智地预见到今后这种想法的危险，如果联合国当时的大多数成员国竟然向持相反意

见的国家让步的话。但是当前的困难胜过今后可能发生的困难，因而我们坚持自己的意见。

我的发言建议在现存宪章范围内加强集体安全制度。第一条款把维持和平和反对侵略的目标归属于联合国全体及其成员。安全理事会是执行这个目标的主要机构，但是，倘使这个机构被否决权所瘫痪，责任仍然存在；十、十一、和十四条款把责任和权力给予联合国大会来维持国际和平。我们准备提供一个方案来增加大会的效力：(1)倘使安全理事会被阻碍行使职权时，经过二十四小时的通知，准备一次大会紧急会议；(2)为大会建立一支安全巡逻队——一支和平巡逻队——在任何发生国际冲突威胁的地方用以实行立刻和独立的观察；(3)每个成员国在它们联合国的军队中指定部队继续为联合国服务；及(4)建立一个特别委员会来进一步发挥集体行动的方法。

这个方案，由加拿大、法国、菲律宾、土耳其、英国、美国和乌拉圭倡议作为一个议案于 1950 年 11 月 3 日被大会通过，五十二票赞成，五票反对，印度和阿根廷弃权。当时的用意是要对朝鲜形势为大会发表一个政策声明树立一个基础。这个声明的最后通过比"为和平而联合行动"议案的通过超前约一个月。

从进攻开始起，这个重要的政策问题已在美国政府中一直进行讨论。在地面部队执行任务以前，于6月29日，我向报业公会发表演讲说，我们响应联合国的决议的行动，是"完全为了恢复韩国在北方入侵以前的地位和重新建立被侵略所破坏的和平的目的"，并于7月10日写信给保罗·尼采说，在最近的将来，如果俄国或中国的干预引

起新问题,“我们不得不投入必要的军队来重占三八线”。从较长的时间来看,倘使我们成功地重占南部,如何保卫和支持这地区的问题将接着发生。对于我们这将是一个艰巨的任务,但是,击退进攻以后就放弃这个地区,似乎很不合理。我不能“看到它的结局。换一句话说,正如弗吉尼亚人所说的,我们买进了一匹小马”。在我的备忘录内,没有任何地方把独立和统一朝鲜的想法作为美国或联合国作战的目标。同样地,在政府内部进行的一连串的讨论——总统与国务院之间,在国务院内部,在国防部内部,在中央情报部门内部——好似通过一个更为直接的战术问题,即跨过三八线以后怎么办,去考虑那个长远的问题。

长期政策和跨过三八线

总统同意,在战争过程比7月中期大为明朗以前,对侵略后的政策应保持沉默。但是他于17日要求国家安全委员会为他准备一项实质性的建议。

在国务院内部发生了意见分歧,这种情况阻止了清楚的思路,并导致产生一种等着瞧的态度。迪安·腊斯克和约翰·艾利森管辖下的远东司,强有力地主张不应排除跨过三八线。是否应该跨过,只有看发生的情况再说。但是他们认为,在朝鲜被分割期间,不会存在和平和安定。保罗·尼采的政策设计办公室受到乔治·凯南观点的影响,采取相反的态度,并争论说,应该命令麦克阿瑟将军以联合国军司令官的名义宣布,倘使北朝鲜军队撤到三八线以北,他的军队将不跨过这条线追击。7月13日李承晚总统宣称韩国军队将不停止在三八线上,而美国军

事发言人却答复说美军将停止在那里，并将强制南朝鲜军队也这样做。这样使这个问题更加复杂化了。我急忙打电报给穆西奥大使，叫他尽最大努力去停止这种公开宣言和讨论，因为这将不利于美国的地位。这个电报也解决了在国务院内部的自相争论。

这时，在国务院对岸的五角大楼计划者于7月31日作出了性质深刻的建议。我长期以来已注意到，军事建议常常以精细假定的说明为基础。这些假定经常与事实不符，可是却控制了结论。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这项建议说应该命令联合国最高统帅跨过三八线，打败敌人的军队并占领这国家，倘使下列假定成立的话：

1．美国将动员足够的力量来达到这个目的，并增强在所有战略重要地区的军事地位。

2．苏联将不在朝鲜或其他地区进行干涉。

3．将由总统宣告，国会同意，并由联合国采纳一个统一、自由和独立的朝鲜为我们作战的目标。美国和其他国家将在朝鲜在联合国军的指挥下保留其军队，时间长短视需要而定。

这个出奇的智力运用不无可笑的方面是，既没有命令，也没有近乎这些假定的存在，麦克阿瑟将军后来将依照这些建议的路线办事。

9月1日各部通过国家安全委员会就一项政策建议取得一致意见，这个政策建议只涉及军事行动，以贯彻6月27日决议的狭义解释。这建议认为6月27日的决议已充分授权在分界线南北两方面实行军事行动来反击入侵和打败入侵者，并且，如果俄国或共产党人没有参加战

争或者宣布要这样做，麦克阿瑟将军将受权进行军事行动。得到总统的同意后，参谋长联席会议着手草拟对麦克阿瑟将军的训令——一个细致的工作，在该月中旬曾征询他对问题分析的意见。

在9月中，通过印度政府，我们继续探寻中国对朝鲜的意图。在这以前，中国军队进驻满洲已造成一种干预的手段。但起初K·M·潘尼迦大使汇报说，周恩来着重指出中国的和平意愿，对此这个印度人是同意的。但是，在仁川之后，在北京的另一些人采取了另一种方针。10月3日清晨，周召请潘尼迦到外交部，告诉他，如果美军跨过分界线，中国将参战。由于同日维辛斯基在联合国号召停火，撤退所有外国军队，和建立一个统治整个朝鲜的联合政府，以等待进行全国选举，这表明中苏正在为拯救北朝鲜政权而共同努力。周的讲话是一种不可忽视的警告，但是，另一方面来看，这不是一个官方政策的声明。

给麦克阿瑟将军的训令

关于在三八线以北军事行动，参谋长联席会议对麦克阿瑟将军的训令在9月底前完成，经国务院同意，并被总统核准，于27日下达给他。其中包括一条："你应把在三八线以北的作战计划呈请参谋长联席会议批准。"麦克阿瑟将军一方面抗议这个训令，因为参谋长们企图用来保持军事行动的最后批准权，但他仍于28日呈送了一个作战计划。

在这几天内，我在纽约，向大会提出我们的"为和平而联合行动"的建议，并向北大西洋外长们提出我们的

“一揽子计划”。9月28日总统召我到华盛顿与他和马歇尔将军讨论朝鲜的局势发展。29日在布莱尔大厦午餐之后，一个军官，用一幅巨大的朝鲜地图，其上表明所有美国、南朝鲜、北朝鲜部队的位置，解释了麦克阿瑟将军所提出的行动。

首先，9月27日参谋长联席会议的训令：

“你的军事目标是粉碎北朝鲜的武装部队。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授权你于三八线以北的朝鲜境内采取军事行动，包括两栖和空降或地面作战，只要在采取这种行动时没有主要的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军队进入北朝鲜，没有准备进入的声明，也没有在北朝鲜在军事上对抗我们行动的威胁。但是，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你的军队不得跨进满洲或苏联与朝鲜交界地域，并且为了政策的缘故，在与苏联接壤的东北各省或在沿满洲边境的地区，不得使用非朝鲜人的地面部队。再者，对于你们在三八线南北作战的支持将不包括对满洲或对苏联领土的空军或海军行动。

如果在三八线之南公开或隐蔽地使用大量苏联军队时，你应采取守势，不采取任何扩大局势的行动，并向华盛顿汇报。如果你的军队在三八线以北作战而他们使用了大量的苏联军队，你应该采取同样行动。你不应仅仅因为在目标地区发现存在苏联或中国共产党军队而停止在三八线以北的空军和海军的行动。但是，假使苏联或中国共产党事前声明他们要重占北朝鲜的意图并公开地或含蓄地发出他们的军队不应受到攻击的警告，你应把这事提交给华盛顿。

麦克阿瑟将军建议派遣第八军在西岸经过开城和沙里院跨过分界线夺取北方首都平壤，而第十兵团将从海

路于东岸的元山登陆。这将与西部部队沿着元山—平壤公路联接起来。(不幸，在元山的扫雷工作把登陆推迟到10月26日，使北朝鲜军队得以逃出这个缺口。韩国军队于10月11日从陆路赶到元山。)麦克阿瑟将军注意到训令中的警告，建议在忠州—宁越—兴南一线之北地区，约离平壤—元山线以北五十英里，鸭绿江口之南六十英里，只使用南朝鲜军队。以后他将提供详细计划，末了说，并无迹象表明有“大量苏联或中国共产党军队现时进入北朝鲜。”

这似乎是一个设计得很好的计划，用来建立一个坚强的军事地位并以此利用一切机会打败北朝鲜——或用来保证南方具有一条坚强的防线，来对付进攻的重起，或者，假定南朝鲜已足够强大而中国又来不及干预，向联合国的目标，即一个联合、自由和独立的朝鲜进展。因为有了这种想法，马歇尔将军和我推荐并经总统核准了这个行动计划。

同一天马歇尔将军打了一个密电给麦克阿瑟将军说，“我们希望你在战术上和战略上感到可以向三八线以北推进，不受阻碍”，对此麦克阿瑟回电说，“在敌人投降前，我认为全朝鲜都向我们的军事行动开门。”后来这次电报的往来产生了麻烦。麦克阿瑟引用这份电报以及其他难信的证据作为解除他在北方边境各省不得使用南朝鲜以外的军队的限制的理由。虽然在这个时候我不知道有这种电报来往；但是马歇尔将军竟会僭用职权使麦克阿瑟将军可以违反经总统核准的参谋长联席会议的训令，和麦克阿瑟自己制订并被总统和他自己当日核准的

计划，这令人难以置信。我想，这份电报似乎旨在平息麦克阿瑟被迫呈送行动计划的怒火。人家是要他确信，华盛顿希望他认识在他的职权范围内他可以向北推进，不受阻碍。他的计划表示他完全理解这点。

“一个统一、独立和民主的朝鲜”

我们共同草拟了一个重申联合国对朝鲜政策的决议案，并于9月30日与澳大利亚、巴西、古巴、荷兰、挪威、巴基斯坦和菲律宾共同提出，由英国国务大臣肯尼思·扬格作了介绍说明。这个决议案代表了于8月中正在国务院远东司和联合国司形成的意见，并因仁川的成功发展了一大步。格罗斯大使于8月中曾与印度的贝内加尔·劳爵士讨论过这个意见，并由奥斯汀大使于8月17日在安全理事会作了试探性发言。两者似乎都很受欢迎。这个决议案本身存在的问题，以及它鼓励麦克阿瑟将军进一步采取冒险主义所引起的问题，都是因为没有经过透彻的考虑，而且这个决议案的模棱两可的语言把已在前文谈到过的凯南备忘录所提醒的困难与危险掩盖起来了。

实际上，这个决议复活了1947年联合国要求成立一个统一、独立和民主的朝鲜政府的那个未起作用的计划。为了实现这个长期目标需要(1)保证朝鲜全国具有安定的局面，(2)在联合国主持下进行选举并采取其他为建立这个政府所需要的制宪工作，(3)邀请全国各界和代表性团体在这方面与联合国合作，(4)联合国军留驻朝鲜之期，完全由达到这些目标所需的时间决定之，(5)为朝鲜

的经济复兴作准备。这决议于10月7日通过。

在这个决议的后面，有人认为苏联军事力量阻止了实施这个决议的努力。但是苏联军队已经撤退，接替的北朝鲜军队已被击溃。在北朝鲜不存在反对的军事力量来阻碍联合国的努力。人们认为在这块即使日本人过去也只享有名义上主权的最北部的崎岖土地上，只要韩国军队只是企图建立尽可能的秩序，俄国和中国军队不致于干预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倘使韩国人遇到强烈的抵抗，他们可以经过一个狭长地带回到坚强的阵地上。回顾起来，这似乎是对可能性的一种天真的想法，但是这个回顾在某种程度上被麦克阿瑟后来的行为所歪曲了。举例来说，如果马修·李奇微将军被授予执行9月30日训令的任务，以及华盛顿本来会向他发布的各项命令以协助负责实施10月7日决议的行动的联合国委员会，结果很肯定将完全不一样。但是由于角色的分配既是这样，10月7日的决议就增加了危险，对此我应负一部分责任。

麦克阿瑟将军立刻剥去了10月7日决议的矛盾的外衣，并给它一种为大会制订这个决议的多数所不能接受的解释。这个决议从来没有宣称第八军将强加于全朝鲜以一个统一和平民主的政府。它的任务是“保证全朝鲜的稳定局面”。10月9日麦克阿瑟将军广播了第二个投降要求，引用7日的决议，声称：“为了执行联合国的决议……我……最后一次要求你和你指挥下的军队……立刻放下武器并停止作战……除非你立刻作出响应……我将即时采取一切需要的措施来执行联合国的命令。”倘使以前有过这样的疑问：“这个统一、独立和民主的朝鲜政

府"从最高统帅来讲，是由他的"可怕和快速的军刀建成的"，现在已毫无疑问了。

在10月初，杜鲁门总统打算与麦克阿瑟将军在威克岛相会来进行知心的谈话以建立彼此之间的彻底谅解。两人都会以为谅解已经建成，但是两人对这个谅解究竟是什么都会有不同的理解。

二十一　十月的冒险行程

麦克阿瑟的北进

10月中旬，麦克阿瑟将军的部队，已经前进到按照9月29日批准的他的行动计划所建立的那条线。超过这条线的北面，这个计划只准使用朝鲜部队。

24日麦克阿瑟没有预告或通知华盛顿，就自行命令他的指挥官们"以最快的速度前进，并全部使用他们的军队"。这样、北面的限制线被冲破了，因而也违反了超过这条线和在边境省份除南朝鲜军队外不准使用其他部队的规定。部队进展迅速。10月26日，第八军的一部分，南朝鲜第六师第七团，没有遇到阻力，到了鸭绿江附近的楚山，就退了回来。于是就出事了。五角大楼是如此的目瞪口呆，参谋长联席会议给麦克阿瑟打了一个措词审慎的电报说：虽然他无疑有充足的理由发出这样的命令，但他们愿意知道经过，"因为此间很关心你的行动"。这是一个口气非常婉转的电报。打回来的是一份词藻华丽的电报，这是11月中当北进行动失败时我们要常常见到的那种华而不实的电报。麦克阿瑟将军取消限制线的理由是："军事的需要"，而南朝鲜部队既不够强大，也没有良好的领导来应付这样的局势。（在这样的情况下，原

来设想他们要退到后备线的。)至于9月27日的命令,他说这不是"最后的命令",因为说明以后可以修改的(这个说法对美国宪法也可适用)。他还说,参谋长联席会议并没有禁止在最北面使用南朝鲜部队以外的部队,仅仅说"从政策考虑,是不应当做的"。他继续说,无论如何,马歇尔将军9月29日的电报,已修改了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指示。麦克阿瑟将军懂得"你们的命令的基本目的和意图,在先决条件方面是采取了每一个可能的预防措施的。倘不按照我的指示行动,可能得到相反的结果并造成战术上的危险。"最后的结论是:"全部议题都已在我的威克岛会议中讨论过。"10月26日总统声称,他的理解是只有朝鲜部队可以接近北部省份。但是,麦克阿瑟通过新闻界回答说:"联合国部队的任务是在朝鲜进行一次扫除。"

紧接着遇到的"战术危险",其性质与麦克阿瑟将军所预言的有所不同。据报道,10月26日南朝鲜第六师第七团从鸭绿江退回,慌慌张张地撞入已过江的一支中国大军中,全部被歼。第二天,南朝鲜第二军在朝鲜西北部云山的北面,和在云山西面的美国第五和第八骑兵团,受到压倒优势的敌军的猛攻。经过四天四夜的连续战斗,有时是白刃战,第二军被击溃了,第八骑兵团损失了一半的兵力和大部分的装备。在敌人脱离了接触之后,沃尔登·沃克将军重行整顿了第二军,退到清川江,向麦克阿瑟将军报告说,遇到了"组织良好和训练有素的部队"的伏击。

总司令部的混乱

10月25日至11月1日的情况报告，由北朝鲜经过东京辗转送到华盛顿，很费时间，如果说实在的，经过辗转传送，这种报告还不是面目全非的话。例如在11月1日记者招待会上，我说，联合国军司令部正在审阅中国共产党军队进入朝鲜的报告。第八骑兵团的残余部队可能已认为这是一件已经成立的事实。同时，苏联米格-15喷气式飞机于10月30日第一次在朝鲜上空出现。麦克阿瑟将军的报告是混乱的。11月4日，他对总统所要求的更全面的情报作了回答。他作出了冷静的估计，警告不要作"匆忙的结论，结论现在尚未成熟"，要求耐心等待"正在收集更完整的战报"。

但是，在二十四小时内他否认了自己的意见。10月25日对于美国第五航空队的限制放宽了，"在战术空军或蚊式侦察机的控制下，如果需要，可以接近边界，准许作密切配合的支援。"但在边界五英里的范围内，不准轰炸。虽然有了10月9日的指示，美国飞机由于自己承认的"航行错误和不正确的判断"，深入苏联境内一百公里轰炸了一个飞机场，对此我们表示道歉并愿意赔偿损失。而11月5日，麦克阿瑟将军命令斯特拉特迈耶将军动用全部空军力量将北朝鲜军队及其盟

村。他又通知联合国安全理事会说:联合国军队“现在正同中国共产党部队接战”,并列举了十二次遭遇战。

斯特拉特迈耶将军在他将出发执行轰炸新义州到安东间桥梁的任务三个小时以前，将他的命令报告了五角大楼。那天早晨十时许，罗伯特·洛维特带了命令到国务院来对我说,他不相信轰炸能严重地破坏江上的运输,而轰炸满洲城市安东的危险是巨大的。腊斯克先生和我们在一起,他建议说,我们曾保证不同英国磋商就不去侵犯满洲，而英国内阁那天早晨正在开会重新考虑他们对中国共产党政府的态度。我们也已请求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召集紧急会议讨论麦克阿瑟关于中国对朝鲜干预的报告。在这个时刻,没有经过郑重考虑的行动会是不幸的。我们同意,并和马歇尔将军通电话,他主张应该请求参谋长联席会议推迟麦克阿瑟的行动,以等待总统的指示。这照办了。

幸运的是,同总统通到了电话，他在堪萨斯城，准备回家乡投票。我报告了情况并补充说,麦克阿瑟的最近报告直到昨天为止,没有谈到鸭绿江那边的行动。总统说,为了部队的安全,他将授权采取一切必要的行动。他问,我能不能找麦克阿瑟,搞清楚实际的情况?我回答说,与麦克阿瑟有关军事方面的事情应通过军事渠道，他同意了。总统叫我按照洛维特和我认为最妥善的方式处理这件事,并补充说,如需要的话,可以同他取得电话联系,但不应使部队的安全受到危害。在这样的条件下，他同意推迟行动,直到有了确实的报告再说。

洛维特带了总统的意见摘要，在那天早晨十一时十

五分去参加参谋长联席会议，离斯特拉特迈耶的飞机预定要出发轰炸只差一小时三刻钟，如果不是已有停止出发的命令的话。参谋长联席会议重申他们的命令，不准轰炸边界五英里内的地区，并说政府保证不同英国磋商，就不对满洲采取行动，要求麦克阿瑟对轰炸桥梁说明理由。所收到的是另一个词藻华丽的电报：

从满洲有大量的部队和物资涌过鸭绿江所有的桥梁。这个行动不仅危及我军，且有最后歼灭我军的危险。……唯一可以阻止敌军增援的办法，就是炸毁桥梁并用我空军最大的力量炸毁北部所有支持敌军的设施。……在我所能提出的最严重的抗议下，我现在暂停轰炸〔新义州〕，并执行你们的指示。……我信任你们会立刻把这个问题提请总统注意，因为我相信你们的指示很可能会造成重大的灾难。

由于麦克阿瑟担负着指挥的职责，并把这一突然事件说得如此的紧急，总统——如他的原话那样——“关照布雷德利，准许他‘干下去’”。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的怀疑态度表达在他们的措词正确的复文中：

你11月6日的报告中所描述的情况，与我们最近收到的你于11月4日发出的报告中最后一句相比较，有相当大的变化。我们同意，炸毁鸭绿江桥梁对你指挥的部队的安全，会有重大的贡献，除非这个行动引起中国共产党投入更多的力量，甚至引起苏联的参预，因为他们很可能把这看作是对满洲的进攻。

但是，鉴于你11月6日电报的第一句，现授权你继续执行对接近边境的目标，包括新义州在内和鸭绿江朝鲜一边的桥梁的轰炸计划，倘你收到此电的时候，你仍认为这个行动对你部

队的安全有需要的话。上述授权，不包括轰炸鸭绿江水坝和发电站。

11月6日及7日麦克阿瑟发来的电报，使我们在华盛顿的人对情况的了解比从前更为混乱了。

第一个是公报，说明对北朝鲜战争的“实际目的”是占领他们的首都，消灭他们的军队。此后开始了一场完全新的战争，与一个新的敌人——中国共产党作战，他们“无视国际法，进行了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侵犯行动”，——就是说，渡过鸭绿江。敌军新的支援部队集结在江后面“特设的避难所”内。只是由于“及时的发觉和灵巧的调度”，才避免了“一个可能的陷阱”并使损失减少到了最低限度，——这是中了伏击的委婉说法。他认为他的任务是，击败在北朝鲜对他作战的部队（大概是新的敌人）并达到联合国使朝鲜人民得到统一与和平的目标。

第二天，11月7日，他在对政府的政策有着含蓄批评的公报上加了两个个人的判断。在第一个判断中，他作结论说，他11月4日所作的估计是正确的，中国没有全面干预，尽管他们能使他作出“退却的行动”。但是，他准备前进，以便“正确衡量……敌人的实力”。11月7日第二份电报强烈抗议“现有的限制”，就是说，不准飞机在满洲上空飞行，“这样就为刚越过满洲—北朝鲜边境后的敌人，提供完全的空间避难”。这势将引起了几天后爆发的“紧追”争论。11月9日他电告了他的意见，他的“空军力量在朝鲜境内现在已不受限制，……我能阻止敌人从鸭绿江过来的相当数量的支援部队，他们想用这些援军

挽救他们在北朝鲜同我作战的那些部队的覆灭（原文如此）”。

自11月4日至9日的五天，是说明麦克阿瑟多变的性格的最好的例子。在这几天内，他开始时比较冷静，警告在事实没有弄清楚以前不要过急地作出结论，6日又大拉警报说，大量敌军进入朝鲜，严重地威胁他的部队，而9日又恢复了信心，说他能阻止敌人的支援部队并歼灭之。事实上，他的部队已暗中被强大的中国部队包围了。

华盛顿不能跟着他的情绪一起变。在11月6至8日的情绪低落期间，参谋长联席会议告诉他，他在9月27日命令中所说的“目的”，（消灭北朝鲜部队）似应重新考虑，因为命令中所说的不测事故，即中国参战，看来已发生了。这个建议使麦克阿瑟作出了疯狂的反应，并卷入联合国政治政策的领域里去。他说，削弱联合国要消灭反抗力量、完成朝鲜统一和自由的政策将是不幸的。如果不这样做，将会破坏“我们部队的士气，而其心理上的后果将是无法估计的”。向侵略者让出朝鲜的任何部分，将是不道德的，将是我们领导地位的破产，将不能保住我们的政治和军事地位。他反对英国的“慕尼黑态度”。他主张要在11月15日左右发动进攻，一直打到边境。

参谋长联席会议被这样的大言唬住了，但并没有被说服。他们相信，正如他们过去一直相信的那样，如果中国决定使用自己的力量，只有更大的和更有决心的美国力量才能在北朝鲜击败他们。而美国部队在其他地区有更为紧要的任务。朝鲜的统一，即使可能的话，也属于外

交努力的范围。因此，他们建议——通过国家安全委员会得到总统的批准——授与麦克阿瑟将军的任务应加以审查，但当时不作变更。

最后的机会

我相信这下子政府失去了制止在朝鲜走向灾难的最后机会。所有有关的总统顾问，不论文的还是武的，都知道出了毛病。但是什么毛病，怎样找出来，怎样来处理，大家都没有主意。会议的频繁是没有先例的，可见大家感到十分困惑，感到有共同讨论的需要。在11月10日至12月4日的三个星期和三天的时期内，当全部灾难压在我们头上时，国务卿和国防部长和他们的主要助手同参谋长们聚集在作战室内为这个问题争论三次，两位部长会见了总统五次，而我另外还同总统交谈五次。我有这样一种不愉快的感受，就是我们之中没有一个人，特别是我，对总统尽到应尽的职责。

我们的困惑集中在两个主要的问题上：中国军事力量在北朝鲜的实际情况究竟是怎样，以及他们的企图是什么？（解决了第一个问题，可以帮助解答第二个问题。）麦克阿瑟将军面对使人眼花缭乱和神出鬼没的军事行动怎样办？对于第一个问题，在10月的最后几天和11月初，攻击第八集团军的中国军队是强大、装备精良、有战斗力的，但他们似乎从地面上消失了。最起码的警惕，似乎预告他们可能会重来，会和从前一样的突然和厉害。

但是，麦克阿瑟将军没有采取防范措施。他象在仁

川一样，在敌人面前分散了自己的兵力。沃克将军的第八集团军在西面，爱德华·M·阿尔蒙德将军的第十兵团在东面，两军相距甚远，暴露出两翼。他们唯一的协调行动，是根据东京来的、收到时已过了三十小时的情报作出的。不仅如此，兵力的分散还有所发展。第十兵团分成彼此不能呼应的三个纵队，通过崎岖山路向北前进。第八军同样分成四个或更多的纵队，分布在广阔的战线上，很少或没有侧面的联络。冬天很快到来，冰封的鸭绿江就是没有桥梁，过江也是方便的。这对军人来说，肯定是一个可怕的恶梦，要"正确衡量……敌人的实力"（11月7日宣布的目的）和在冬天进军到边境并守住它，同样是难于办到的。

在11月21日，我同马歇尔将军及参谋长们开第一次会议，在李奇微将军指出了令人惊愕的部署后，我表示了我们的不安。看来麦克阿瑟将军把他的军事命令（追击并消灭北朝鲜军队的残部，除非中国的武力干预表明他不能完成这个任务），同军事胜利后的民政任务（帮助联合国委员会为朝鲜建立一个统一的政府）混淆了。当前我们的目的不是"地产"，而是一支军队。面对中国的坚决抵抗，企图以武力建立一个统一的朝鲜，很容易引起全面战争，因为中国和苏联，包括日本，都曾认为朝鲜本身不是目的，而是通向别处去的道路。非常明确，我们政府的政策是避免在亚洲发生全面战争。很明显，如果麦克阿瑟将军不用他的方法来进行一些军事上的"试探"，就不能判断中国干预的程度，因此我们并不反对这样做。我私下向马歇尔和布雷德利将军对麦克阿瑟分散兵力的做法，表示一个外行人的担心。他们指出，参谋长联席会议

远在前线七千英里之外，不能指导战区司令官的部署。但是在这不言而喻的真理之下，我感到隐藏着对麦克阿瑟的那套妙技的忧心忡忡的尊重。这些军事调度是如此奇特，那位仁川的魔术师竟会重演五千对一射击的把戏。虽然没有人能对此作出解释，麦克阿瑟将军当然不会，却也没有人会限制这些调度。

至于用外交方法缓和危险的摊牌，例如贝文所喜欢的方法——停火并在边境建立非军事区——或如有人主张的，退到朝鲜的颈部，集中我们的兵力，以朝鲜部队作试探(人们认为这是政府在9月底的政策)；我深信，麦克阿瑟将军在探悉中国的实力以前，将会反对诸如此类的努力。因此我劝说英国不要在联合国提出什么新倡议。最后我说，很清楚没有什么军队可以在圣诞节或以后很长一段时期从远东撤退，虽然国家安全委员会68号文件指出，别处都十分需要军事力量。因此，我们必须增加军队来满足它。没有人反对这个结论，也没有人反对必须让麦克阿瑟将军去尝试一下。其余的讨论都是老话重谈，没有新的意见。

一星期后，当我们再次召开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时，所有的情况都变了。11月17日麦克阿瑟报告参谋长联席会议，他将于24日发动总攻以攻占鸭绿江一线。他的空军轰炸已迫使敌人的支援部队不能进入战场。虽然后勤供应是不满意的，但他建议为了阻止大量敌军过江，在鸭绿江冰封以前肃清敌军。这就是他的想法。参谋长联席会议发了一个警告的电报，希望他到了鸭绿江河谷的高地上就停下来。他置之不理，认为“完全不可能”。在疯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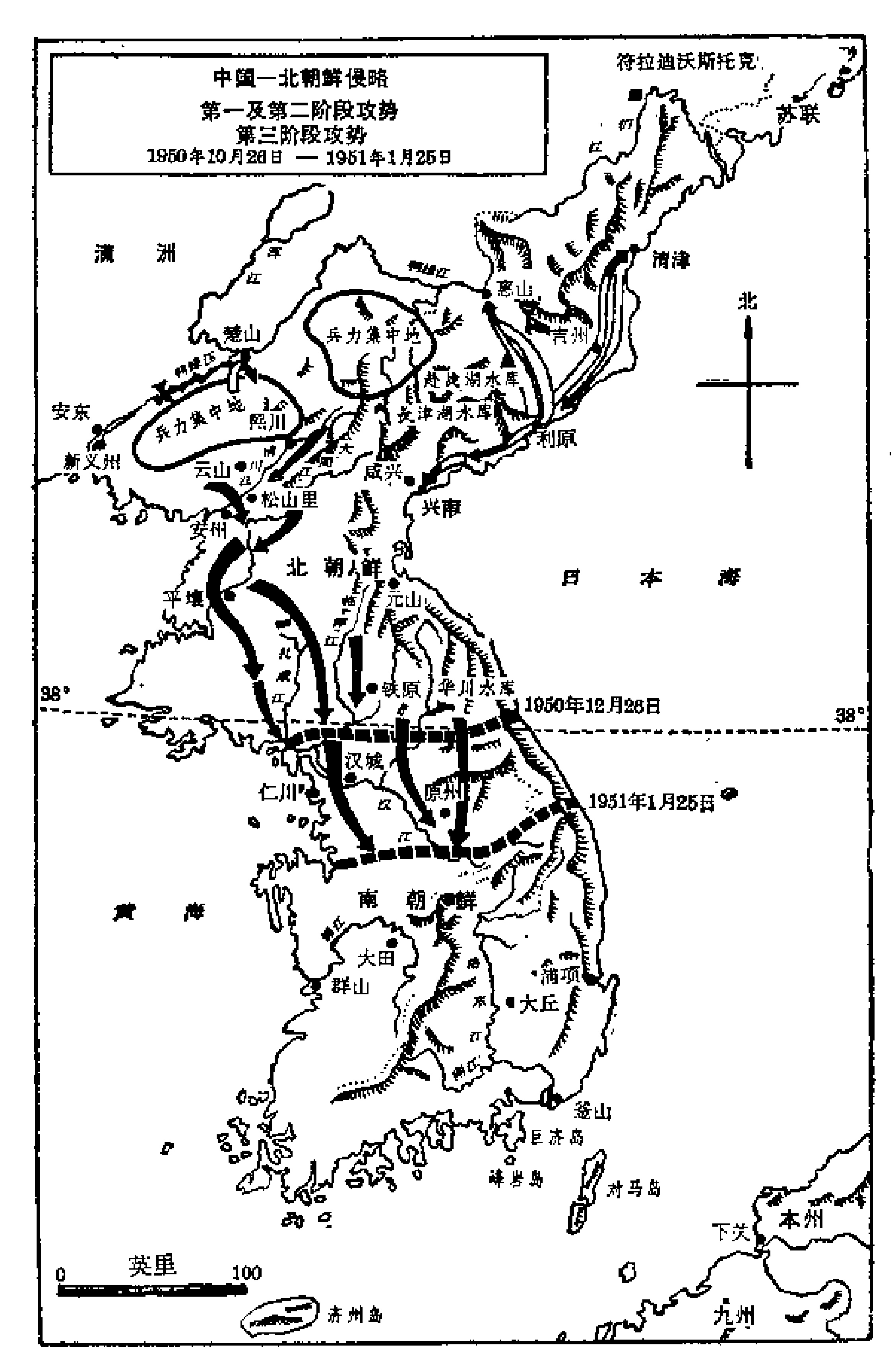
的乐观热潮中，他飞到清川江的第八集团军司令部，宣布在西北面发动总攻，并宣称："倘能成功，这实际上将结束战争，恢复朝鲜的和平和统一，联合国部队将迅速撤退，并使朝鲜人民和国家得以享有全部主权和国际的平等。"

据我回顾，紧张阶段是从 10 月 26 日至 11 月 17 日的三个星期。在这个时期里我军的分散和中国的干预所产生的危险是明显的。我们都感到十分不安。我们相互之间是坦率的，但还坦率得不彻底。我不愿意建议总统采取他的军事顾问不愿提出的军事路线。他们所以不提出，因为这是违反美国军事传统的，涉及 1864 年以来对于战区司令官的正式职权问题。林肯总统曾停止华盛顿对于军事行动的干预，任命格兰特为中将，全权负责美国的军队。倘使马歇尔将军和参谋长们建议退到平壤一元山线，在联合司令部的指挥下采取持续的守势——倘若总统赞同这个建议，毫无疑问，他会赞同的——那么，灾难本来很可能会避免的。但这意味着同麦克阿瑟的斗争，他会指控说，他们不让他取得胜利——而他们也许会不安地感到确是如此——也会意味着他的解职将是有争论的。所以他们犹豫不决，而机会失去了。虽然每一个人的行动举止都没有错，但我怀疑，没有一个人会在事后对自己感到相当满意。毫无疑问，倘使我们采取了相反的做法，结果还是一样。我有把握，倘使我们这样办了，今天麦克阿瑟的声望会更高些。

二十二 “一次全新的战争”

美国部队不顾沃克将军深谋远虑的警告，向前推进到朝鲜西北部寂静可怕和貌似无人的山区。四天之后，大量的中国部队突然向美军各路纵队的正面、侧翼、后方等四面八方发起大规模反攻。发生了一系列激烈的、大部分是互不相连的战斗。麦克阿瑟将军一下子从乐观的顶点堕入沮丧的深渊。11月28日他在报告中说，“我们又面临一次全新的战争”，“这粉碎了我们所抱的乐观希望……本来认为……只要我们推进到国际分界线，然后，立即撤退联合国部队便可迅速结束朝鲜战争”。他致电参谋长联席会议说，使朝鲜战斗局部化的一切希望都不存在了。中国人简直要把他的部队“全部歼灭”。麦克阿瑟狂妄自大的美梦被打破了。不幸的是第八集团军已近乎全部被击溃。

在这种气氛下国家安全委员会于同一天开了会。布雷德利将军就已知的情况先作了军事形势的汇报。麦克阿瑟将军在敌人的猛烈攻击下转而采取守势。以前采取攻势是为了试探中国进行干涉的规模；现在我们已经知晓。至于我们所处的困境达到什么程度以及新的指示性质则还有待于了解。停在中国东北飞机场内的三百架飞机，其中二百架是轰炸机，对我们部队和我们那些拥塞在



中国—北朝鲜侵略
第一及第二阶段攻势
第三阶段攻势
1950年10月26日 — 1951年1月25日
符拉迪沃斯托克
苏联
满 洲
清津
惠山
吉州
兵力集中地
楚山
兵力集中地
熙川
安东
新义州
云山
松山里
安州
长津湖水库
咸兴
利原
兴南
北
北 朝 鲜
日 本 海
平壤
元山
铁原
华川水库
1950年12月26日
38°
38°
汉城
仁川
原州
1951年1月25日
黄 海
南 朝 鲜
大田
群山
浦项
大丘
釜山
巨济岛
对马岛
下关
本州
九州
英里
0
100
济州岛

图 3 （按原图译制）

朝鲜战场上的飞机造成了严重的威胁。如果去轰炸中国的飞机，势必惹起中国和俄国飞机对我们进行报复。迄今为止它们还未曾有什么活动。范登堡将军同意不首先去轰炸，在我们的部分飞机还未转移到日本之前，当然我们不会先动手的。

马歇尔将军提出一份由三军部长起草并经他本人和参谋长联席会议同意的报告，建议我们应继续执行联合国的命令，并且在联合国的支持下采取行动，而不要被拖入一场单独对共产党中国的战斗。因此，我们必须采用一切办法来保持战争的局部性，不要攻击中国领土，不使用中国国民党的部队（参谋长联席会议指出这可能促使英国撤回它的战斗力较高的部队）。他们还竭力主张迅速增加美国的军事力量，以应付与日俱增的战争需要。

马歇尔、布雷德利和柯林斯等将军指出，麦克阿瑟将军在朝鲜必须依靠他现有的部队维持下去。补充损失的部队要到新的一年才能准备妥当，新的师要到 1951 年 3 月 1 日以后才能成立。到那时大家将会竞相要求得到这些新成立的师。所有的军人都为麦克阿瑟将军在战术上所处的暴露和分散的状况而担忧。他们都想促使他注意这件事；但是这应由他自己来解决；在现场干涉他的作战计划是毫无裨益的。

副总统显然真的感到迷惑不解；他很想知道麦克阿瑟将军凭什么会在他的声明中提到圣诞节时可以把军队撤出朝鲜。他这个问题使到会的人有点发窘。麦克阿瑟的声明会不会是哄骗中国人的策略呢？总统无法回答，只好请他自己作出结论。布雷德利将军认为麦克阿瑟将军

确信他的进攻会成功，却丝毫不晓得敌人在他的右侧高山上集中强大兵力。他的声明决不是什么疑兵之计。马歇尔将军则认为这是一件使人感到为难的事情，我们必须采取某种方式予以解决。

我认为，我们比以往更接近于一场日益扩大的战争，中国人一向是插手朝鲜的。这种情况逐渐暴露出来，而我们现在正面临着一次规模宏大的进攻。苏联可能在幕后暗中给予某种形式的援助。我们不应孤立地考虑朝鲜问题，而应以我们同我们的敌手苏联在全世界对抗的背景来考虑这个问题。我们有我们应达到的目标和应避开的危险。国务院将承担起与联合国一起共同进行反对共产党中国侵略的工作，并且不顾苏联在安全理事会使用否决权，我们也要指责中国为侵略者。三位部长所拟订的备忘录和意见是非常明智的。麦克阿瑟将军面临一个新局面。这次我们必须设法使他领会给予他的指示。看来他以前错误地认为他的使命是去占领朝鲜的北部和东北部。我们应当明白地告诉他，这并不是他的使命。我们要结束这场被卷入的战争，我们不能在朝鲜打败中国人，因为他们比我们能投入更多的人在那里作战。

我们应采取紧急措施去寻找一条我们能固守的防线并把它守住。在北朝鲜实行停火或成立非军事区的建议是可以考虑的，但是现在并无任何可以达成这种安排的迹象。在这一阶段从朝鲜撤出对我们来说将会是一个重大的灾难。我们应在朝鲜以外迅速建立我们自己的以及我们盟国的军事力量。

会议并没有提出任何由总统作出决定的建议，即告

结束。

将军大难临头，惊慌失措

由于在朝鲜溃败的加剧以及麦克阿瑟将军从沮丧转而变得几乎惊慌失措，随后的几天可以说是一段担忧和混乱的日子。当11月29日参谋长联席会议敦促他把第八集团军和第十兵团的行动加以协调，以"阻止敌军从这两支部队之间穿越或者包围这两支部队时"，他拒绝了劝告，但要求增援和新的指示。28日他致电《三星号外》新闻广播电台的雷·亨利，解释他的处境；30日又致电《纽约时报》的阿瑟·克罗克，证明他的北进是正确的；12月1日他在接见《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记者时说，他一再接到禁止他跨过满洲边境打击共产党兵力的命令，以致联合国部队"处于极其不利的地位，这是战史上从无前例的事"。随后他还向合众社、国际新闻社、伦敦《每日邮报》以及东京新闻界等阐明他本人的观点。

最后（12月5日）总统忍无可忍，命令政府暂停发表一切有关外交或军事方面的演说，并以总统名义授权马歇尔部长和我命令驻国外的军事长官和外交代表必须停止"将军事或外交政策直接透露给在美国的报章杂志或其他宣传机构"。这是针对麦克阿瑟的。总统后来写道："我应该当时当地罢免他的职位就好了"。

11月30日，麦克阿瑟对报界所提的关于在朝鲜是否会使用原子武器这个别有用心的问题所作的不适当的回答，把事情弄得更加混乱。艾德礼首相为此特地横渡

大西洋。我们随后即将述及此事。

12月1日，国务院与国防部联合会议又在五角大楼开会。我指出在上次会议中提及但并未讨论的意外事件——麦克阿瑟将军进攻的失败——使我们十分难堪。在联合国中似乎出现了一片惊慌失措的情况；传出了美国领导地位破产的怨声；可以看出在亚洲和欧洲的不团结。我们必须采取行动，使我们的朋友对我们恢复信任并加强团结，这需要军事和政治两种措施的互相配合。在美国还没有一个意见一致的计划之前，我去参加联合国大会是毫无用处的。首要的一些问题是，我们是否能够或在哪里守住一条防线；哪些政治措施可以有助于把局势稳定下来，以及是否在现阶段即应采用这些措施。如果不能守住一条防线，则将产生一系列新的问题，以致我们必须开始考虑或者扩大冲突，或者找寻一个结束这场冲突的方法。在这点上，军事和政治两种措施必须互相配合一起进行。

这次详尽而直率讨论的结果还不可能回答我的问题。的确，来自司令部的报告是如此混乱和使人迷惑不解，以致马歇尔将军要求柯林斯将军立即亲自前往朝鲜，查明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援军很明显地正从满洲源源进入朝鲜支援中国部队；我们的部队仍然过份地分散。如果第八集团军和第十兵团不能联合起来并重行整编，我们可能要后退得更远，我们可能根本没有办法守住防线而要被迫退到仁川、元山和釜山等的滩头堡。在可能发生的这种情况下，我们能否顶住中、俄两国飞机可能的轰炸而守住滩头堡，这是很成问题的。如果我们使用核武

器，这将会导致一种难以估计的后果。至于现在（除非为了保全我们部队的需要）是否轰炸中国东北地区——包括空军和其它基地——权衡两种意见仍以不轰炸为妙。对于这一点，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和文职部长们的意见都是一致的。

麦克阿瑟将军另一些灵丹妙药——封锁中国海岸和起用福摩萨的国民党军队——又一次经过审查，人们认为从战术和战略角度来说，这些方案都无法予以考虑。这些方案充其量只不过有一点表面上的价值。还有，在我们还不知道我们的部队是否要撤出朝鲜或者是否由水路调动之前，不应派遣海军舰只和运输舰去承担次要任务。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从这些措施所能获得表面的利益，结果却会使我们陷于孤立并丧失我们在联合国中所拥有的在地位、领导和支持等方面的巨大好处。

华盛顿策划下几步的行动

第二天（星期六）是忙碌的一天，我们自己先拟好计划，随后便和马歇尔并连同总统一起再进行讨论，共同筹划我们在联合国所应采取的立场。沃伦·奥斯汀和欧内斯特·格罗斯两位大使从纽约赶来和我们一起工作。有人建议通过印度的贝尼盖尔·劳爵士或者格尔杰·巴杰佩爵士向俄国人和中国人提出停火的建议，或者由我们的大使直接向俄国人提出停火建议，这些建议都被否决了。直到傍晚，这班人才替我准备好了一篇同总统进行讨论的备忘录。我自己只好离开他们去准备接待即将来

访的艾德礼首相。

晚上，我带了一份令人满意的汇报备忘录和有关中、俄两国意图的情报资料，到国防部长马歇尔的寓所去和他商量建议的问题。随后到八时左右，我和布雷德利将军一同到总统处接受指示，并把他的指示带回给在国务院等候我的那一班人。这漫长的一天终于在10时左右结束了，我疲乏地回到家里与我那位饿慌了的妻子共进晚餐，补添一点精神上和物质上的食粮。

情报资料提供了这几点：中国军队在满洲和在朝鲜的部署和行动，其目的是使美国—联合国军无法防守在朝鲜的阵地。中国政府的态度和军事准备的规模，显示了他们已意识到这些努力有着同美国进行全面战争的风险。看来如果苏联没有保证给予某种支持的话，中国并不象会冒这种风险。这种支持按递升的次序可能包括如下几项：继续提供物资装备，技术人员，必要时也许再提供"志愿军"；如果美国—联合国军对满洲的目标进行空袭的话，就提供空军和高射炮兵连来进行防卫。假使美国—联合国军对中国其他地区采取军事行动时，根据中苏条约则将给予适当的军事支援。此外，苏联一定意识到并决定要冒美中全面战争和世界大战的极大风险，这种风险是中国当时干涉的规模有可能引起的。

最后，克里姆林宫很可能看到从美中战争中所得到的利益，例如，在牵制战、消耗战中把美国军队牵制在一个非决定性的战场上；引起美国和它的欧洲盟国之间的矛盾并且阻碍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某些计划；使联合国中原来反对侵略朝鲜的集团趋于分裂，从而也有助于共产

党对东南亚所抱的目的。然而，如果美国放弃对华战争的赌博并退出朝鲜，苏联可能指望拿到在朝鲜和印度支那所下的赌注。无论如何，美国政府应料想得到侵略成性的苏联对美国政府在世界所占的地位势将继续进行攻击。同时也不能排除苏联在亚洲和欧洲会从事其他侵略行动。

第二天早晨有报告说，麦克阿瑟意志消沉，垂头丧气。他抱怨限制他扩大战争，并把洛维特称之为“可以传诸后代的文件”分发给新闻界和五角大楼。12月3日他拍电报给五角大楼说，“我这个小小的部队”现正面对整个中国的战争并要求派遣增援部队。三天之后，他用统计数字写出他的苦境：“据估计，中共〔在北朝鲜同我们对抗的〕兵力现在总数达二十六万八千人……。在他们的后方，在延伸到鸭绿江和鸭绿江那边……至少有五十五万人……。此外，共产党中国还有大约四百万配备武装的后备部队。”各军种参谋长立即回答说：“我们认为现在保存你的部队是首要的任务，并同意你将部队聚集到滩头阵地。”

12月3日，在五角大楼的会议和在白宫的汇报都是在日益阴郁的气氛中进行的。将军们告诉我们，两三天内局势将达到紧急关头，也许将呈现崩溃状态。第十兵团能够并且也应该撤退；如果不能安排停火，也许将遭受严重损失。该军可以同第八集团军重新会合，除非后者也不得不撤退的话。在艾德礼还未来到并和他商妥之前，以及在非常明显不得不停止战斗之前，我反对为实现停火而进行活动。共产党所提出的停火的代价可能是很高的——也许高得使我们仅能保全我们自己的部队。他们

最低的条件可能是要求我们撤退到三八线，但更可能的是要我们撤出整个朝鲜，在这些条件之外可能再加上要求我们放弃福摩萨，以及要求召开一个有共产党中国参加的各国外长会议来接管美国对日和约的谈判，以便减小我们在日本的影响。

马歇尔将军在前晚说，如果从朝鲜撤退，就会使我们面临究竟是保全我们的部队还是维护国家荣誉这样一个两难局面。我们再次一致同意，不能心安理得地放弃南朝鲜，使它落到它的敌人即中国和北朝鲜的手里。因此，撤退只能成为最后才能采用的一种手段。马歇尔将军认识到，甚至象敦刻尔克式的行动也难以办到，如果中苏空军投入战斗的话。我极力主张，只有在保全我们部队的必要情况下才能把轰炸满洲的飞机场和东北地区作为最后所应采取的措施。而采取这项行动的决定权不应授与麦克阿瑟，而应操在总统和马歇尔将军的手里，还应使柯林斯将军待在前线以便汇报情况。我对麦克阿瑟的判断能力完全失去了信心。

我们在五角大楼开会时，李奇微将军在地图上指出了战斗经过并听了对有关华盛顿是否适宜干涉战场活动所进行的通常讨论之后，要求允许他陈述自己的意见。正如他在书上所写的那样，"我脱口说出…我觉得我们已经花了太多时间来辩论，而我们所需要的是立即采取行动。我坚持为了对那些在战场上的人负责，为了战场上的人的生命，我们要向上帝负责，必须停止再说空话而应采取行动了"。这是第一次有人把每个人的心里话直言不讳地说出来。

最后转向国内局势问题，我要求总统宣布国内处于紧急状态。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能使公众意识到局势的严重以及政府对此的关注。此外，总统可能不久还需要有宣布紧急状态以后所应有的权力，以便控制物价和工资，并建立有重要意义的生产统制。他表示同意。

稳 步 前 进

次日清晨，我代表总统迎候艾德礼先生的飞机，回来后立即到国务院参加一个小型的高级参谋人员的会议。在那里我看见来自乔治·凯南的一封非常明智和令人鼓舞的短笺，我认为有必要把全文转录于下：

敬爱的国务卿先生：

在继续我们昨晚的讨论时，我想说一件事。国际生活也就象个人生活一样，最重要的实际上并非是某人所遭遇的事故，而是他怎样承受这种遭遇。因此，可以说一切都取决于我们美国人今后用什么态度来承受这个无疑地已成为我们国家命运的重大失败和灾难。如果我们坦率和庄严地承认我们的失败，决心吸取它的教训并以加倍和坚决的努力弥补这一损失——如有必要，按照珍珠港事件的榜样，一切从头做起——我们毋须丧失自己的信心和失去我们的盟国，并且也不致于丧失我们最后同俄国谈判的力量。但是如果我们企图向自己的人民或盟国尽量隐瞒我们所遭受的灾难，或者我们采取恫吓、狂妄急躁或歇斯底里等反击行动来解救困境，我们就会很容易发现这次危机将使我们在世界上的地位一落千丈，局势将会恶化到不可收拾的地步，而且将使我们完全丧失了自己的信心。

乔治·凯南

我满腔热诚地同意他的看法，并把他的信读给到会的人听，其中包括凯南本人。我说我们正受到东京司令部所散播的失败主义的影响。我们应该怎样激发一种坦率的而又倍加坚决努力的精神呢？他们都提出了良好的建议。腊斯克说，军人太萎靡不振了。他们需要象英国在两次大战时在几乎陷于绝望和极其不利的条件下仍坚持抗战到底的那种“不奋斗毋宁死”的精神。我们仍有兵力，把分散的队伍重新集中起来重创中国人，这是保全我们部队（阻止敌人或迫使他们接受一种差强人意的停火）和保全我们在亚、欧两洲地位的最好办法。他用一项激进的建议来结束他的谈话，这是对将来发生的事的第一次预兆。他说也许总统愿意考虑让柯林斯将军担任朝鲜的最高统帅，而让麦克阿瑟将军集中他在日本的职务，包括签订和约在内。

凯南又说，在我们处于失败地位时是最不利于同共产党谈判的，他们会正确地把这看作是软弱的表示；威吓只有使他们完全拒绝谈判。韦布建议说，在五角大楼发动一场重振精神运动的最好办法是由我去和马歇尔将军商谈。

我立即去见马歇尔，请他同腊斯克和凯南讨论我们所谈的那些意见。我说朝鲜战役是在过份乐观与极端沮丧和绝望两种意见之间猛烈摇摆而被搞糟的。我认为这两种意见都是错误的。我们已作了够多的说理和分析了；我们现在需要的是顽强的决心来寻觅一个能够坚守的地方并同中国人战斗，打成一个僵持的局面。对美国来说，这远比谈论什么从朝鲜撤退或对中国进行轰炸和

封锁政策要好得多。马歇尔将军回答说，他同意这个意见，但有两个先决条件：第一，他必须看一看麦克阿瑟用什么方法能把第十兵团成功地撤出东海岸；第二，我们自己决不能钻进一个没有出口的洞里。我接受这项修正意见，并派腊斯克和凯南去见他。

柯林斯将军从东京发来的关于麦克阿瑟将军意见的第一个报告说，麦克阿瑟认为如果不实行停火，或者不采取一项轰炸和封锁中国的新政策，而又不从美国和福摩萨派遣增援部队以及不能对北朝鲜使用原子弹，他就不得不撤退他的部队。柯林斯的这个报告并未使五角大楼的士气有所改善。

我自己于 11 月 29 日晚向全国广播，呼吁处此逆境的我们应采取沉着镇定的态度。我叙述了我们在战场上所遭受的极端猛烈的打击，就象在釜山作最后的拚死争夺战最恶劣时期那般严重。没有一个人可以担保战争不会更进一步扩大。危机是极端严重的。理智能否战胜，只部份地可由我们决定。我们应当希望并努力争取最好的结局，但同时又要作好最坏的打算。每人必须了解我们现时正在与之打交道的那种力量和我们所应承担的任务。没有一个人可以逃避这种责任。

当我广播结束时，总统在电话中向我欢呼并感谢我。

二十三 令人沮丧的十二月

艾德礼的访问

1950年12月初，英国工党首相克莱门特·艾德礼作为一位约伯的安慰者[①]来到了我国。他比温斯顿·丘吉尔将其描绘为"一只披着羊皮的羊"所暗示的要能干得多，但只是一贯显得落落寡欢。他说起话来象约翰·杰伊·查普曼谈到的哈佛大学校长查尔斯·埃利奥特，具有"一只土拨鼠啃胡萝卜的全部激情。"他的思想给我的印象，就象是一声缩回去的忧郁的长叹息。他之所以远渡重洋，是由于英国报纸误解和夸大了1950年11月30日杜鲁门总统在记者招待会上对记者提问时所作的不幸的答复在伦敦引起了惊慌。这个事件是紧接着前两个事件而来的。8月，海军部长弗朗西斯·P·马修斯在波士顿的一次讲话中号召进行预防性战争。他旋即被任命为驻爱尔兰大使。后来，空军作战学院的司令官奥维尔·安德森将军宣布，空军已作好准备，只等一声令下就去轰炸莫斯科。接着他就退役了。

就在上面所提到的记者招待会上，总统说"联合国军

---

① 约伯是《圣经》中人物，约伯的安慰者指表面上给人安慰、实际上给人增加痛苦的人。典出《旧约·约伯记》。——译者

无意放弃他们在朝鲜的使命。”接着记者开始提问，而这情形就生动地说明，在美国记者招待会上强调对看来没有恶意的提问作坦白的答复是多么危险。对有一个这样的提问，总统回答说，我们将“采取一切必要的步骤来应付军事局势，正如我们一直在做的那样”。那“包括原子弹吗?”那包括“我们所有的每一种武器”。曾经“积极考虑过使用〔它〕吗?”“一直在积极考虑使用它。”至于其他与原子弹无关的问题则得到了显然是正确的答复，那就是：用适当的武器对付适当的目标是属于战区司令官职权内的事情。在伦敦，下议院在进行两天外交政策辩论时，接到了一个错误的报告，说麦克阿瑟将军可能被给予使用原子武器的行动自由。下议院普遍地发出了惊呼声，同时要求，英国人必须在事情还没有到无可挽回以前参与对他们命运的决定。辩论终结时，首相在欢呼声中宣布，他已电告总统，为了“广泛探讨今天我们面临的问题”，他希望飞往华盛顿。

与此同时，白宫内成立了一个消除不良反响的小组，共同草拟一项“澄清声明”，以便立即将其发表：

总统希望肯定使人们对他在今天记者招待会上关于使用原子弹的答记者问没有任何误解。当然，从朝鲜战争爆发以来，也曾经考虑过这个问题，这正如任何时候我们的军队在作战时都会考虑使用一切武器那样。拥有某种武器这本身，就含有考虑使用那种武器的意思。

但是应当强调指出，根据法律，只有总统能授权使用原子弹，而总统迄今并未授权。即便是作出这种授权后，也将由战场上的军事指挥官负责这一武器的战术上的投掷。

总之，今天在记者招待会上这样答复问题，并不表示这种情况有所改变。

英国大使奥利弗·弗兰克斯爵士一清早收到了我们消除疑虑的通知，他傍晚送来了艾德礼的电报。首相希望，如果方便的话，尽快地同总统讨论三个项目：远东方面战争的可能扩大；原料供应及其对我们共同发挥各自作用的影响；以及西欧防务问题。当问到首相是否谋求对局势和我们的意向获得更多的了解或订立某种形式的协定（这需要在这里进行更细致得多的参谋工作）时，奥利弗爵士回答说，主要压力来自国内的政治局势和公众对当前事态发展日益增长的焦虑。他答应对我提出的问题给予更为明确的答复，并对访问日期提出一些建议。

首相来到美国，并没有免去发生警报和意外的事情。12月6日，在他访问的第三天早晨，我到达国务院后不久，国防部副部长洛维特在电话里告诉我一条消息和一项总统的指示。我们设在加拿大的预警雷达系统发现有未经辨明是什么物体的队形，据推测是飞机，航向东南，可能在两三小时内飞到华盛顿上空。所有截击和防御机队都已进入戒备状态。他要我只是通知首相，但不要对他提出任何劝告。五角大楼的电话是专为紧急防御目的使用的，所以他不能再用电话谈话了。在他挂上电话之前，我问他是否相信发现的物体是苏联的轰炸机。他说他不相信。

我同弗兰克斯接通了电话后，又把这个消息讲了一遍。他问总统是否已取消十一点半同艾德礼的会晤，我

告诉他没有取消。我们同意仍在那里会晤。在通话结束前，他很想知道我告诉他这个消息的目的何在。我说这可能是及时发出警告，让我们有机会作祷告。当我们通话结束时，我们的一位高级官员闯进屋来。我不知道他是从哪里听到这个谣传的，也许是从五角大楼听到的。他想打电话叫他的妻子离开城里，并把重要档案移到地下室去。我不准他那样做，要他在保证不对任何人讲起这件事和情愿受保护性拘留这两者之间作出抉择。他聪明地冷静下来，选择了前者。当我们到达白宫时，洛维特告诉我们那些未经辨明的物体已经消失。据他猜想，它们是一群飞雁。

英国代表团的首要目的是，弄清楚在北朝鲜正在发生着什么和为什么会发生那些事情。我们委托布雷德利将军对此作出解释，陆军元帅威廉·斯利姆爵士对此进行反复诘问，这占去了我们第一天的大部分时间。要说明真相已很困难，而要令人信服则更是困难。但布雷德利那种坦白和公正的态度是适合于完成第一项任务的，他没有试图加以掩饰。在会议结束前，柯林斯将军已从前线回来，向双方作了汇报。长途的退却几乎已经达到了三八线。从东海岸抽出第十兵团的前景看来是良好的。沃克将军、麦克阿瑟将军和柯林斯将军都相信，汉城以南一线是可以守得住的。有关撤退的歇斯底里，至少是暂时平息了下来。

当首相再次获得保证，确知我军不会因为安全受到威胁就轻率使用原子武器时，他来访的目的便显得更清楚了。他希望我们结束同中国人的冲突，以便重又积极

参加欧洲防务；他还希望我们恢复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那样同英国联合控制原料的分配和定价，因为，不可避免的，重整军备的发展将造成原料的缺乏和涨价。最后，他希望容许英国在一定程度上参加我们有关将来使用核武器的任何决定。国会和我们一样，也意识到，艾德礼先生到这里来不是为了作一次时事演讲。的确，在会议进行期间，二十四位共和党参议员提出了一项决议案，要求总统和首相缔结的任何协定或条约必须经参议院批准。但是，经过热烈辩论，它没有获得通过。同时在纽约，通过美国报刊，我国的公众也饱受了苏联大使马立克和中国共产党特使伍修权将军对美国的攻击。伍将军的出席，是经安理会邀请，前来讨论被有礼貌地称为朝鲜"事件的新转变"的。但是他却支持马立克提出的决议案，谴责美国对福摩萨和朝鲜的"侵略。"虽然我们的盟国投票否决这些决议案，但它们在秋季的那种高度热情消失了。所有的盟国，包括英国在内，都不愿意在联合国内一同对中国的干涉进行反击。在华盛顿和纽约所进行的活动，并不能激励我国应付军事上的重大挫折，和忍受一位难以驾驭的将军的狂妄行为。我那时象往常和以后一样，但愿联合国总部设在任何地方，而不要设在我国。

艾德礼先生使用的讨论方法是措辞婉转的，而不是咄咄逼人的反复盘问。他早就注意到总统习惯于在会谈时对他的对话者的每一申述都要表示同意或反对。由于艾德礼试行使他的说明博得总统的同意，他很快就把总统引上了钩。在第二次会议上又再施展这种手法时，我踩了踩总统的脚，提醒他让首相讲完自己的全部意见而

不要加以打断，这可能对首相有利。然而首相对我瞥了一眼说明，这对他完全无利，获得好处的倒是我们。

艾德礼先生的论据是，我军在朝鲜的处境十分脆弱和危险，因此我们必须不惜付出停火的代价去解救他们。他认为，从朝鲜和福摩萨撤退并把联合国的中国席位给共产党人，这并不能算是过高的代价。他警告我们，没有什么比保持亚洲对我们的好感更为重要的了。我尖刻地说，美国的安全更为重要。杜鲁门总统和马歇尔将军补充说，必须保持我们在西太平洋的防御以及亚洲人对我们战斗力量的信赖，这样才能获得他们的好感。

我按照总统的要求进行调停，给予英国人以看来他们应当得到的安慰。我说，主要的对手不是中国而是苏联。一直有一种遭到政府摒弃的愚蠢而不负责任的说法，它主张对中国进行全面战争。在总统的顾问中，很少人会怂恿他采取卷入的方针。另一方面，据我看来，现在同俄国人谈判是 1917 年以来最不利的时候。他们看到自己手里有牌，丝毫不会让步。

在下一次会议上，我提醒艾德礼先生，如果他认为美国人民会追随这样的领导，任其在一条海洋战线上对侵略提出强硬的行动政策，而在另一条海洋战线上却接受失败，那将是严重的错误。公众的心理很难理解那样相互矛盾的政策，而这样难于理解却是幸运的，因为这种政策是错误的。讨论两条战线的孰先孰后是一回事；在世界的两个阵营对同样的问题采取截然不同的态度是另一回事。在盟国几乎一致的赞同下，我们在朝鲜追逐一个小侵略者。现在一个大侵略者跟着来了，而且给了我们很

大的打击。避开、逃跑和放弃整个事业，这种行动是不能接受的。中国人也许能够迫使我们这样做，但是我很怀疑。被赶走和自动撤出是大不相同的。在这个问题上，总统、马歇尔将军和布雷德利将军都提出了他们的重要意见。关于中国是不是苏联的卫星国，以及开罗宣言是否必然导致福摩萨归属中国共产党等问题，经过几次交换意见后，结果我们并没有取得一致的看法。

由于会谈进行得不好，弗兰克斯爵士与英国外交部两位高级官员梅金斯和斯科特以及我、马修斯、杰塞普、尼采和腊斯克试着每天举行非正式会议，以商定下次会议议程应如何安排。但是这一尝试没有成功。每次旧调重弹，耳朵都听厌了。

谈到原料的情况时，我们完全同意英国人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也认为有必要进行分配和控制价格，但是我们没有能使他们懂得，1950年已非1941—1945年可比。那时候只有我们两国是能够实行世界范围控制的盟国。到了1950年，无论生产国或消费国，都不会容忍英美的控制，但也想不出别的办法。我们成立了研究小组，希望能设计出一些其他国家自愿进行安排的办法，但是最后也没有取得多大成果。

艾德礼非但不愿讨论欧洲防务，甚至对于引导他到这方面来的尝试也积极加以回避，他把这个问题留给他的陆军元帅斯利姆和空军元帅特德去讨论。但是这个问题迫切要求我们双方持一致的态度。从10月国防部长会谈以来，苏联发动了强大的宣传攻势，恐吓德国人和西欧人不得把德国包括在防务安排之内。首先，它向英

国人、法国人和我们发出照会，通知我们，苏联政府“不会容忍这种旨在西德复活德国正规军的措施〔如我们在9月间一起讨论过的〕……，”抨击我们把东德的警察部队硬说成是实际上的武装部队，而且把辩论的矛头转向我们。其次，由莫洛托夫主持在布拉格开了一次东欧外长会议，要求签订一项防止德国重新武装的四国协定、一项对德和约，并通过由东西德等额代表组成的全德委员会实现德国的统一。接着，在1950年11月3日，苏联对三个西方占领国发出了另一份照会，要求毫不迟延地召开一次外长会议，以履行波茨坦宣言中关于解除德国武装的保证。部长会议副主席尼古拉·布尔加宁在庆祝十月革命时作了一次煽动性的讲话，号召苏联人民“用手中武器”维护他们的权利。

为了再一次使英国人和法国人感到俄国人强烈反对把德国纳入防务措施，俄国人发给他们的照会，坚持认为美国倡议的把德国纳入防务措施是直接违反法苏条约和英苏条约的。因此，到12月间，我们的建议不但在盟国内部造成了分裂，而且引起了反对派的大肆攻击。在布鲁塞尔，我们既需要帮助说服法国，又需要给我们所有的盟国打气。

12月6日，在英国大使馆举行宴会后，陆军元帅斯利姆和空军元帅特德勋爵遗憾地对我说，他们的首相没有接住我在欧洲防务会谈中传给他的球。他们希望在当天晚上再作一次尝试，并把总统、首相、马歇尔将军、布雷德利将军、我们宴会的主人以及他们自己聚集在一起。我们从九点半一直谈到午夜以后。大家要我提出一项议

程，我认为主要有两点。第一，总统和马歇尔将军必须确信，英国人对欧洲防务正在竭尽全力，或者将尽力而为。不管正确与否，美国人民和国会都不相信这一点，而这样要加强美国的贡献就变得十分困难。第二，促使北约组织获得进展的唯一途径是我们两国必须走在前头，然后通过软硬兼施的适当方法，使其他国家跟上来。我们是无法单独做到这一点的，但那天我们的大部分谈话都离开了这个主题。

显然喜欢在烟幕后面活动的艾德礼，继续避开这个主题谈下去。他提出了麦克阿瑟将军对朝鲜战争的指挥以及盟国对发生的事情都没有发言权这种"困难而微妙的问题。"我们的两位将军为麦克阿瑟将军辩护，说一场战争不可能由一个委员会来指挥。在导致战争扩大的问题上，诸如"紧追"敌机进入满洲境内以及轰炸那里的机场等，都曾同英国人进行磋商，而且他们的意见都已反映在所采取的行动中。总统补充说，既然有关方面都委托美国统一指挥，那么只要这种局面存在一天，只要我们继续供应更多的人力和物力，我们就要继续负责把这场战争打下去。在支持总统的这一意见时，我申明自己没有资格议论麦克阿瑟将军的军事才能或判断能力，但是我也指出，就战争的战略处理而言，首相和他的顾问同我们的最高级顾问，包括总司令本人在内，已经把这个问题讨论了三天。根据我的记忆，除了尽快结束战争的政治目的外，首相对我们概括地向他介绍的作战计划并没有提出批评。总统最后却相当直率地申明，我们将待在朝鲜和继续打下去。如果我们得到别人的支持，那很好；如果

得不到，我们也无论如何要待下去。在这一点上，斯利姆和特德的第二次尝试又告吹了。可是他们对公报还是作了出色的工作。

会谈的最后一天，我们又一次经历了最高级会议中常常出现的危险。柯林斯将军已从朝鲜发来了报告。我们正在白宫内阁会议室里等待公报起草者送来草案。总统把首相带到他的书房内进行密谈。当秘书们分发草案副本时，我们的两位首脑回来了。总统高兴地说，他们讨论了原子武器问题，并一致同意在没有与对方事先磋商之前时我们任何一方都不会使用这种武器。没有人讲话。总统请主要起草人宣读公报，以便提出修改意见。起草人刚开始宣读时，洛维特靠在我肩膀上说，我们的处境很麻烦，我必须把球带过去。我和总统悄悄谈了几句，并把一张纸条递给桌子对面的弗兰克斯，接着我们三人就和首相一起走进了总统办公室，而其余的人则继续修改草案。

我指出，总统曾一再坚持，对任何人作任何性质的承诺都限制不了他根据法律授权使用原子武器的责任和权力，如果他认为，为了保卫这个国家有此必要的话。同时他历来声明不会改变这一立场。即使他企图改变，他也不会成功，因为国会是不会同意的。二十四位共和党参议员的决议案，已就国会的情绪发出了明显的警告。他在内阁会议室里所作的建议将引起一场对总统和英国人的最恶毒的攻击，而这样的计划则将获得普遍的赞同，即对于一切会导致暴行和战争的国际局势都将同首相保持密切的接触。

大家对此都表示同意，虽然艾德礼先生显得有点难

受。我们着手起草一段合适的文字，由奥利弗·弗兰克斯执笔。总统从他的办公桌左边拉出了一块滑板。奥利弗离开了他的座位，跪在我和艾德礼两人之间在滑板上写着。总统说："我想，这是第一次一位英国大使跪倒在美国总统的面前。"奥利弗爵士顺利地起草，拿出了一个解决办法。当我们回到内阁会议室时，他起草的以下一段文字未经评论就写进了公报："总统声明，他希望国际形势永不需要使用原子弹。总统告诉首相，他也愿意把可能引起形势变化的事态发展随时通知首相。"

公报结束了我第一次参加的最高级会议，这时我作了一个徒劳的祈求，即下一次再也不要参加这种会议，同时我很欣赏艾德礼先生的"辩护"和他签署的"同意判决"(借用律师术语)二者之间的差距。

国会和公众对公报的反映，总的来说是好的。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中，两位老资格的参议员康纳利和威利都是意志坚定的军人和通情达理的人士，他们和我会晤之后，同委员会的其他成员发表了一项声明，终于很好地结束了这场无谓的纷扰。他们说，对这样一份面面俱到的公报，他们没有什么可以补充的。在他们看来，有一件事情是清楚的，即英国和美国的立场"比一星期前大大接近了。"如果曾说过什么真话，这就是真话。当然，参议员诺兰感到"震惊"；他看到"公报的字里行间含有制造一次远东慕尼黑事件的意味"。李承晚总统有这样奇怪的想法："我们与其是现在被抛弃了，那倒不如联合国当初没有帮助我们的好。"不管怎样，艾德礼访问的公告所引起的轰动悄悄地消失，很快就被人们遗忘了。

布鲁塞尔会议

12月中旬，政府将注意力从朝鲜转到了自从10月以来已在暗地里酝酿成熟的欧洲防务发展方面。正如我在前面讲过的，马歇尔将军已经缓和了军方的僵硬观点，只要是接受了德国参加这一原则，并着手采取步骤付之实施，就可以同意任命一个美国人担任最高统帅以指挥联合部队。法国人也接受了"斯波福德计划"。按照这个建议，德国军队加入联合指挥的部队单位，必须是团一级的战斗部队，即一支大约拥有六千人的配备齐全的部队，并且这一联合必须符合欧洲军更长远的目标，这是对普利文计划的修正和改进。当艾德礼访问华盛顿时，他勉强同意了这一折衷方案。

虽然任盟军最高统帅在两次世界大战中都有先例，如在法国的福煦元帅和在意大利的陆军元帅亨利·梅特兰·威尔逊爵士，但是我们现在必须面对吹毛求疵的反对派，它是对任何方案都要从宪法上去找碴儿的。考虑到这一点，我们就必须注意到从宪法上规定的总司令即总统，通过在欧洲的盟军最高统帅，一直到现场的我们军队之间那条指挥锁链中的每一个细节。盛传最高统帅将由艾森豪威尔将军充任，是不能保证在讨论指挥系统时一定得到同意的，因为他的共和党立场当时还不为公众所知，甚至连总统也不知道。正如杜鲁门先生告诉我们的，他在1948年把这位将军看做是民主党自由派可能提名的总统候选人，而将军则向他保证自己没有这个抱

负，但这并不是基于党派的原由。我们的每一个盟国也都有它自己的政治上的技术问题。

我们的困难用"两顶帽子"的理论解决了。艾森豪威尔将军作为欧洲盟军最高统帅，将同时直接由总统授权被任命为驻欧美军司令。我们和盟国作了这样的安排：北约组织的理事会应要求美国总统选派一位美国军官担任最高统帅，因为艾森豪威尔将军很受尊重和信任，如果总统选择到他，理事会将感到高兴。总统对此将予默认。理事会将任命艾森豪威尔将军为联合部队的最高统帅，各国政府都将把其分派给联合部队的军队置于他的指挥之下。

我和作为我的伙伴和同事的陆军部长弗兰克·佩斯，一起乘坐总统的"独立号"座机飞往欧洲，开始为期五天的紧张工作。我们于十二点半到达布鲁塞尔，就开始积极活动，先驱车到外交部访问齐兰部长，后来到大使馆换衣和进午餐，接着就去参加北约组织的理事会会议。佩斯感到很高兴，因为，从预备阶段到第二天的最后行动，一切进行得十分顺利。他说，这使他想起了阿肯色州的州议会，那里的政党指导机关开始时只拥有简单多数，后来发展到获得一致的拥护。我们的目的是收受理事会发给总统和总统不加修正径行交回来的公文，这就势必引起双方的混乱。很确当，从理事会发出的拟议的公文用"勇敢"作为代号，而总统的复文则用"统一"作为代号。

由于俄国人的第一着棋已起了作用，会议就带有一种恐惧的气氛。负责欧洲事务的助理国务卿乔治·珀金

斯汇报说，舒曼的助手埃尔韦·阿尔方曾把他带到一旁，问道，“你当真相信三个月内我们会打仗吗？”珀金斯还猜想：总统给共和党参议员的答复已使大家消除对我的地位和前途所抱疑虑，但是参加会议的人对我们国内的心理状态却感到迷惑和焦虑。会议准时结束，以便让部长们换穿礼服后去参加齐兰的宴会以及宴会后举行的欢迎会。其后，我们回到大使馆，举行了一个午夜会议。

19 日，我为布鲁塞尔的美国文武官员就过去两三星期中纷至沓来的事件作了一次回顾。北约组织的会议于十时开始，进行得十分顺利，我们在中午后不久就发出了“勇敢”的密电，然后去王宫接受年轻王子博杜安殿下的接见，他是最近才继承利奥波尔国王的王位的。我发现他很会伤感。他年方二十岁，戴着一副深度眼镜，看来既严肃又虚弱，他的父亲是比利时风暴的中心，他的母亲死于车祸，他担负的责任是重大的。他把我拉到一边，羞怯地问我阿尔方向珀金斯提出的那个问题：我是否认为战争即将到来？而这时我就想起了我自己比他大十岁的儿子。我并不认为会这样，我甚至用比我自己具有的更大信心向他保证，他是不会遭到这种命运的。

一时十五分，理事会再次集会，收受了总统代号为“统一”的复文。到四点钟，我们已建立了联合部队，分派部队去充实它的内容，并任命艾森豪威尔将军指挥这支部队。我们还设立了一个军事生产供应局，但后来事实证明这是一个失败。五点钟，我匆匆地进了午餐，会晤了舒曼、贝文和我们驻波恩的三位高级专员，花了四个小时讨

论德国参加的问题。在这方面，俄国人的闪电式宣传攻势的后果也是很明显的。贝文要求放慢德国人参加防务安排的步伐。(天晓得，我们早已这样做了，并且将继续这样做下去，用不着告诫我们啦！)舒曼继续在四国协议中找难题。我对这种态度失去了耐心，坚持我们必须提防在俄国人的迷惑下接受了他们的主张，即我们是受这些协议约束的，而他们并不受这些协议的约束。我们必须把我们计划中的其余部分继续进行下去，不要受雅尔塔或波茨坦的束缚——这两个文件已经过时和成为具文了。另一方面，我们必须不再对德国人让步，一定要他们履行了纽约决议，承认了他们的债务，并负起他们自己应负的责任，而也只有到了那个时候，我们方才可以给予他们平等待遇，并改变占领状态。

对于德国参加的问题，我们授权从两个方面同时进行：一方面，由高级专员通知阿登纳，应根据斯波福特计划建立德国军队(这方面的讨论于12月21日开始)；另一方面，为将来前途无限但目前命运多乖的欧洲防务集团作好体制上的准备。从那里我们回到了鲍勃·墨菲的大使馆官邸，喝了正好十分需要的鸡尾酒，十点钟吃了一顿丰富的晚餐。在途中，我提请他注意护卫队的那种奇怪的做法，并恳求他转请比利时军部予以改正。原来我们不但有通常的摩托车警察，而且前后都有一辆载运武器的军车(除非是我的眼睛看岔了)，每一辆车都把它上面装的旋转机枪对准了我。鲍勃说，可能我是车子里最安全的人。

回想起可爱的“独立号”的几次起飞，我最不欢喜的

就是第二天12月20日早晨的那一次。当时阴霾四合，凝结的雾气甚至掩蔽了跑道旁边两个灯标以外的灯光；即使我们能够起飞的话，冻结得高低不平的冰雪也将使飞机剧烈震荡。我们在飞机附近等待雾气暂时消散，机务人员给"独立号"喷射甘油以防止外壳结冰，一个多小时就这样过去了。最后我们得到了起飞的信号，紧紧系上了座位上的安全带，象坐在一辆弹簧板四轮马车上一样在跑道上滑行过去。幸喜起飞后很平稳，几分钟内灿烂的阳光就出现在五百英尺高空的雾障之上。飞机向亚速尔群岛前进，整个西欧和冰岛越来越近了。当我们越过法国海岸时，雾层在我们下面构成了一幅完整的欧洲海岸线地图。四十年前我曾随我父亲来过亚速尔群岛，这次短暂停留所受到的款待解除我们的旅途劳顿，同时加拿大东部风和日暖，气候是非常宜人的。然后我们取道斯蒂芬斯维尔继续航行，于12月21日凌晨三时抵达华盛顿，随即就寝。第二天上午总统接见了我，我的使命完成了。他对我的大力支持，使我十分感激。他告诉我，继塔夫脱重新审查我们对外政策案后，胡佛先生在三十六小时前发表了他的演说。

展开大辩论

12月22日，国会山上两个外交委员会等待我出席报告布鲁塞尔会议的经过，这纯粹是礼仪和形式。一切都是彬彬有礼的。国务卿同作为他的监护者的两个委员会之间的关系，只要取得一点成就立刻就亲密起来了。前

一阵他们要求把我撤职，这件不愉快的事情已经被淡忘了；所以产生了这种政治上的把戏，是由于麦克阿瑟在朝鲜一意孤行，犯了错误，而我们和盟国之间又发生了纠纷。国会里的表情是舞台上的一套，愤怒也罢，亲切也罢，那都是假的。

但是，这次大辩论比历次更严肃认真——虽然，如结果表明的那样，吹毛求疵更有甚于严肃认真。12月12日，我们那位不甚可靠的前驻伦敦大使约瑟夫·肯尼迪——那时他还没有因为他儿子的关系而出名——把美国的政策描绘成为“自杀性的”和“政治上和道义上破产的”，抨击联合国软弱无能，批评盟国忘恩负义，要求从朝鲜、柏林以及西欧防务中撤退，而这种论调在十七年后也不是陌生的。可是这些指责的主要声明却是由前总统霍伯特·胡佛作出的。简单地说，胡佛先生先规定了某些假设，然后从这些假设中引伸出若干指导原则。这些假设是：

1. 以少数非共产党军队对大量共产党地面部队进行的地面战争，将是一场无法取胜的战争——我们永远不能打到莫斯科。

2. 单独靠美国海空军力量，就能够制止共产党对西半球的入侵。

3. 原子武器远不象一度设想的那样厉害。

4. 联合国军已在朝鲜被共产党中国所击败。

根据这些假设，胡佛先生提出了“某些原则和行动”：

首先，也是最根本的一点，“应保持这个西方文明的

西半球的直布罗陀”。[1]

第二，用海空军控制两洋，一面以英国为边疆，另一面以日本、福摩萨和菲律宾为边疆。

第三，把我们的海空军武装到牙齿。

第四，一经花了这笔创办费用后，随即减少开支，平衡预算，以避免通货膨胀。

第五，援助世界上的饥饿者。

第六，决不搞绥靖，不再搞德黑兰和雅尔塔。

第七，应由欧洲国家负担防卫欧洲的主要责任——美国不能为它们创造或购买精神力量。

我最近在访问期间看到，欧洲人惶惶不安和惊慌失措，但在作好领导和采取行动方面还是作出了反应。这些声明中反映了萎靡不振的失败情绪，崇高的希望和远大的目标似乎消失了，这使我大为震惊。为了要充分了解这种局势，我同我的同事们谈了整整一天。那天下午即将迎来圣诞节的周末，没有时间起草讲稿，因此我只写了几条提纲，就去出席12月22日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人们怎样才能使他的听众明白，“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2]——也就是说，要对这个世界怀抱信心。使用强制执行国家决定的办法是没有用的，因为一个国家无非是一股不断变化着的人流，一些人积累了经验，作出了决定，然后又让位给那些缺乏经验和不曾作过决定的新人。坚定是不断重新学习和具有信心的结果。

---

① 美国孤立主义者主张退守美国本土，称它为西半球的直布罗陀。——译者

② 引自《新约·路加福音》第九章第六十二节。——译者

我在记者招待会上说，要说明布鲁塞尔会议的成就，最好的方法就是把它看作是一本书里一章的结束，这本书的前面几章都已成了历史，而此后的几章则要根据未来的行动写出来。这本书所讲的，就是我们和别人如何谋求和平和安全的手段和方法。每一章都记录了两种人之间的斗争：一种人对这种谋求和努力抱有信心；另一种人则认为这样做是徒劳的，竭力主张退却到我们自己的大陆上，把我们自己孤立于世界问题之外，以免遭到来自世界上的危险。作出的决定从来不是一致同意的，辩论无疑会继续进行下去，正如在那个时刻还在进行一样。这些辩论使我们的政府，并且迄今为止还使我们大多数人得出若干条似乎是具有支配性的结论：

第一，美国人撤退到这个半球上，就会使苏联对其余辽阔的地区、广大的人口以及无限的军事和经济资源处于支配的地位，从而使我们的问题棘手难办。

第二，如果苏联处于这样一种地位，它就会有能力和欲望，要把我们可能具有的阻碍苏联计划的力量化为泡影。

第三，这样的发展，会使我们极少有可能通过演变或谈判，或通过演变与谈判，在不是苏联所想望的基础上进行和平调整利害关系。

第四，除了接受苏联的意志以外，似乎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诉诸核武器的最后暴力。

第五，与此同时，孤立于美国要塞或“西半球的直布罗陀”以内，可能使美国生活的广阔自由发生变化，从而破坏了它的文化、道德、政治和宪法的基础。

这些结论，将导致政府和人民反对"我们采取那种坐在避风窟里哆嗦着听候别人摆布的政策"。我们决心要同我们的盟国一起建立我们的力量，同时要号召整个自由世界维护它的自由。

换句话说，我们既已手扶着犁，就不能向后看，我们要记住，"耕种的当存着指望去耕种"。[1]因此，原被告双方的诉状已经提出，下次开庭时将准备为这一案件展开辩论。

---

① 引自《新约·哥林多前书》第九章第十节。——译者

二十四　伊朗的双重骚乱

1951 年上半年特别引人注意的是，出现了许多任务，它们分散了我们的注意力，使我们不能专心从事主要建设性工作，在十九世纪欧洲帝国制度的废墟上重建一个自由世界，以对付那些区域性的骚乱，这些骚乱的产生确有其固有的原因，但由于我们的共产党敌手有意增加我方困难的活动而变得越益严重了。

伊朗的危机

近东(以区别于远东)是欧洲人给从东地中海到包括印度次大陆在内的那一大片地区的称呼。这一地区对他们一直具有特殊的魅力。伊斯兰教国家接替了东罗马帝国后，十字军愤恨异教徒的亵渎神圣而要夺回圣地，曾经费了很大力量，但是毫无结果。在那里威尼斯

一度……使豪华的东方绝对臣服；

而自己则充当了西方的卫士。①

更近一些时期，拿破仑在那里做醒了他建立东方帝国的美梦，而在一个世纪以后，德皇威廉二世穿着灿烂的铠甲

① 引自英国诗人威廉·华滋华斯(1770—1850)所作：《威尼斯共和政体的灭亡》。——译者

进入耶路撒冷，也落得了同样的下场。在那里，英国人和法国人建立了用武力支持的势力范围，俄国则进犯过伊朗（温斯顿·丘吉尔爵士一直称之为“波斯”）的北部边疆。但是，在这个曾一度被认为是人类发源地地区的漫长历史中，产生冲突、争端和不安的最多的原因也许是因为在波斯湾区域发现和开发了大量石油矿藏，以及用贝尔福宣言的话来说，“在巴勒斯坦为犹太人建立了一个民族的家园”。在本世纪初，英国人对于促成这两种局面起了很大的作用。当时海军大臣温斯顿·丘吉尔和海军第一副大臣费希尔勋爵所作的让英国海军用石油作燃料的决定，导致英国政府购进英波石油公司，并使阿巴丹油田和炼油厂以及英国在波斯的势力获得了迅速的发展。其他波斯湾国家石油的发展，使法国、荷兰和美国势力很快地跟着参与进来。英国政府在1914年至1918年同奥托曼帝国作战时所发布的贝尔福宣言，被称为是“政治估量与慷慨的理想主义的产物”。而英国作为巴勒斯坦的委任统治国是能够使其贯彻的。

整个近东到处都埋藏着反西方宣传的导火线：穆斯林的文化和历史、在英国保护和大量美国财政支持下的犹太人移民所激起的强烈的阿拉伯民族主义、殖民地地位的残余以及那些居住在地面上的人由于地下广大自然资源被外国人榨取而产生的不满情绪。这导火线能够并且已经到处点燃；它首先在伊朗烧了起来。

十九世纪初，美国传教团体在波斯所做的拯救灵魂的工作，既没有遇到许多麻烦，也没有获得巨大成功，是以引起本地人的反感和立即招惹英国人或俄国人的猜

疑。但是在二十世纪初期，当1911年摩根·舒斯特被波斯政府聘为财政部长，去改组和清理该国的财政制度，官方表现了更大兴趣时，那情形就与此不同了。各方面的厌恶是那么明显，以致第二年在俄国进行武装干涉之后，他就被迫辞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由阿瑟·米尔斯波组织的一个经济代表团在那里待了稍长一段时间，从1922年一直到1927年。二十年后，我在伊朗卷入了一个大得多的活动，这我在前面已简单提到了。通过伊朗运送物资去苏联的一条通道打开了，我国政府派遣了由诺曼·施瓦茨科夫上校率领的代表团去训练一支伊朗宪兵和警察部队，还派遣了在康诺利少将指挥下有三万军队的波斯湾供应司令部，把租借物资运往俄国，并将其中一部分分给伊朗。米尔斯波仍回来任财政部长，但他的第二次尝试并没有比第一次获得更大的成就。最后的两个代表团在战争结束时也都撤退了。

当时伊朗已感觉到苏联在北方的压力，因为苏联拒绝撤军，反而利用军队去支持当地共产党领袖，以分离北阿塞拜疆省。正如前面讲到的，美国在阻止这一企图中起过有益的作用。苏联撤兵后，由于它的压力转向希腊、土耳其然后又转向西欧，我们的注意力也就被引向西面，但是到了1949年，苏联的压力又移回到伊朗。战争期间的外国干涉加强了地主、教长和政客的仇外情绪，他们希望把外国势力赶出去，并强烈反对国王所支持的国内改革。日益增长的这种情绪集中在一场争论上，一方面是以穆罕默德·摩萨台这位非常机灵而能干的政治煽动家领导下的石油专门委员会为代表的议会，另一方面是英伊石

油公司。这家公司和美国政府在处理问题上的顽固异常的愚蠢做法给摩萨台帮了忙。伊朗将谋求稳定和进步的希望寄托在年轻的国王身上，虽然美国的自由主义者抱有这样的幻想，认为在杜德党的共产党人与封建反动分子和教长之间还存在着其他温和派的领导。在随之而来的议会极端分子同英伊公司和英国政府之间的斗争中，美国政府试图进行调解而告失败，结果首相被暗杀，国王逃亡，国家完全毁了，英国人也丧失了他们在伊朗的石油开采权和财产达四年之久，而且几乎永远丧失了这一切。

我卷入这一悲惨事件的故事，贯穿在若干阶段中，现将其中四个阶段简述如下，另外两个阶段则将在本书后面几章加以追叙。

第一阶段：国王的尝试

国王制订了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在各个方面都得到了美国的援助。于是这件事就加强了苏联反对国王的宣传和杜德党反对国王的活动。在战后留下的美国警察和军事顾问团继续待在那里，并做了很好的工作。军队进行了改编，并开始用美国武器重新武装。米尔斯波负着进行政府改革的使命回来了，但是干得很不聪明，很快发觉他自己和所有集团的伊朗人相处得非常不好，于是在互相责难和怨恨的情况下引退了。由前国务院石油顾问马克斯·索恩伯格为首的美国顾问团拟订的七年国内发展计划，是一个超出伊朗政府能力的庞大计划，也开始陷入了困境。1949 年 2 月，由于有人企图谋害国王，他不

得不取缔杜德党，并设法通过修改宪法限制议会阻挠的权力。随着岁月的推移，他的困难和挫折继续增加，迫使他对要求美援的观念达到了不现实的程度。

在这种情况下，国务院的近东和非洲司说服了我，我转而说服了总统，邀请伊朗国王到华盛顿进行一次国事访问。看来这是一个好方法，它可以使这位年轻统治者在国内的威望有所增加，并让他直接了解美援的现实性和它的限度。我对“最高级会议”曾经表示过强烈的厌恶，现在对“国事访问”也怀有同样的心情。我认为，所有的总统都抱有同样的见解，但那些国务院地区司的人则不是这样的，他们对此评价很高，顽固地不愿从过去的经验中吸取教训。而且，当邀请发出后，来自可能被邀请的客人的压力增加了。我这样说，并不是由于厌恶伊朗国王的访问，而是由于来访问的是这样一些截然不同的人，如意大利总理德加斯贝里、菲律宾总统艾皮迪奥·季里诺、厄瓜多尔总统加洛·普拉萨和智利总统冈萨雷斯·魏地拉。每一位客人，如果不是在他到来之前，就是在他到来后不久，总要告诉我们说，“送他空着手回国”将在政治上毁灭了他。他必须拿到一笔贷款，或者签订一项条约，或者获得其他一些国务院特别难以提供的东西。我们最后提出的援助往往是国务院几乎难以提供而我们的客人却认为简直难于接受的，而这样就往往引起了双方的不快。在我的记忆中，唯一成功的是澳大利亚总理罗伯特·孟席斯进行的访问，他在简直没有人注意的情况下悄悄地来到这里，过了一天半又悄悄地离开了，走时却从世界银行拿到了一笔二亿五千万美元供澳大利亚建设大型水力发电

工程的贷款。但这是因为孟席斯和我们一样，或者比我们更懂得个中的诀窍。

二十年前，伊朗国王不象今天那样聪明和富有经验。我的妻子和我在安德森大厦为他举行了一次相当豪华的国宴。国王摊出来的军事和经济计划，从可以运用的资力来看，不论是在财政方面或他的政府能力方面都是太雄心勃勃了。在狭窄得多的国家基地上，他想要拥有一支人数相当于土耳其军队一半的军队，并且要它起到象威尼斯作为"西方的卫士"那样的作用。海外顾问公司所拟的工业发展计划规模太大了，它既不能得到受忽视的伊朗农业和那部分可供工业雇用的人口的支援，也不能付托给官僚政治中那些在廉洁方面可疑的人去执行。

大家都对这次访问的结果感到失望。但是在第二年春天，我们又作了一次尝试，把在雅典卓有成就的大使亨利·格雷迪调往德黑兰，并派了一个相当大和子练称职的经济代表团去加强他的力量。阿里·拉兹马拉将军被任命为首相，他是一位精力充沛的军人，并由于镇压阿塞拜疆的分离主义而成为一位民族英雄。但是我们又一次遭到了失败，因为有一年时间国务院和当地的美国官员之间互相在财政问题上踢皮球。我们缺乏果断和魄力；他们却吃亏在从雅典养成了一心指望大笔财政资源的习惯。结果是代表团和伊朗国王双方都不把可以利用的资金放在眼里，弄得一事无成，从而各方面的信心都受到损害。1950 年秋，双方都动了气。伊朗政府愤怒地拒绝了世界银行代表团的一笔四百万美元贷款的建议。美国进出口银行提供的一笔二千五百万美元贷款也始终没有被

伊朗议会接受。第四点计划的资金运用受到了阻碍。格雷迪大使和伊朗国王都批评国务院（大使为了取得心理上的效果，要求一笔一亿美元的贷款）；而国务院自己没有资金，只能不断地催促贷款机关，但是也很难责怪它们，因为它们认为，如果伊朗不能和英伊石油公司达成某种协议，看来就不值得去冒险。11 月 4 日，伊朗和苏联的易货协定公布了。14 日，伊朗政府停止了“美国之音”的波斯语广播和其他外语节目。1951 年 1 月 8 日，伊朗政府取消了和海外顾问公司所订的合同。当 3 月 7 日拉兹马拉走进清真寺被一个宗教狂热分子所枪杀时，风暴即将来临的信号已经发出了。

第二阶段：摩萨台革命

伊朗政府同英伊石油公司的争端开始于 1947 年伊朗议会的一次反俄行动，这次行动当时受到了西方的广泛欢迎。在议会拒绝签订要在北方取得石油开采权的苏伊石油合同（在谈判俄国军队撤出阿塞拜疆中把在北方取得开采权作为解决办法的一部分）的法案中包含一项规定，要求政府为保障人民对这个国家的经济财富的权利去检查 1933 年英伊石油公司的开采权。这一点是做到了。1949 年 7 月 17 日，草签了一项石油补充协定，使伊朗享有比这一地区其他任何石油生产国所享有的更有利的安排。一年以后，伊朗议会的石油委员会建议否决这一协定。

拉兹马拉将军为了缓和石油委员会对补充协定的批

评，吁请石油公司在某几点上作出让步，而这样做并不需付出什么代价，诸如：赋予查阅公司账册的权利（伊朗政府是握有百分之二十股权的股东），增加伊朗籍工作人员，按照伊朗的成本而不是按照世界市价规定伊朗的石油售价，以及有权了解出口石油销往地点。尽管负责近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乔治·麦吉向英国外交部和英伊石油公司提出了请求，但是英伊石油公司拒绝作任何让步。1951年1月，伊朗议会指示石油委员会提出新的法案。当然，除了国有化之外，很难再有别的办法。就在这个时候，阿美石油公司公布了它和沙特阿拉伯的一个新合同，规定和这个政府平分利润。这样，补充协定和拉兹马拉的建议都成为陈迹了。直到1951年2月底，英伊石油公司才表示愿意按照阿美石油公司的条件重开谈判。拉兹马拉不让别人知道这个消息，只是吁请议会和石油委员会支持他在最优惠的条件下商得一个解决办法。他争辩说，伊朗在技术方面和销售方面缺乏能力的情况下，实现国有化是徒劳无益的。

三天之后他死了。议会和参议院分别于1951年3月15日和20日一致通过了摩萨台建议的国有化法案。他于4月28日当了首相，于5月2日宣布国有化成为法律。从来没有这么少的人这么愚蠢而又这么迅速地造成了这么大的损失。

摩萨台画像

几个月之后，我第一次看到摩萨台，就留下了这样一个印象：他很象詹姆斯·巴里的剧本《亲爱的布鲁特斯》

里那个名叫洛布的角色。他身材矮小瘦弱，弹子般的头上没有一根头发，瘦削的脸上突出了一个长长的鹰爪鼻子，两边是一双象皮鞋揿纽般明亮的眼睛。他的整个举止和外表象鸟一样，有着迅速而神经质的动作，好象是在栖木上跳来跳去。他的顽皮的特性显出瞬息万变的动作。我在华盛顿联合车站迎候他的时候，看到一位曲背老人，一手拄着拐杖，一手勾着他儿子的手臂，在站台上蹒跚地走过来。当他在大门口认出了我的时候，就丢了拐杖，离开他的随行人员，走在别人前面一路蹦跳着过来招呼我们。

我后来还发现他有一个有趣的习惯，那就是象孩子般盘着双腿坐在椅子上，再加上他那善变多样的情绪，这就使他更象洛布这个角色了。我记得，他同总统和我共进午餐后，盘着双腿和我们一起坐在布莱尔大厦里，当他的欢乐兴奋情绪低落下去，他突然显得年老而忧郁了，他把身体靠向总统。

"总统先生"，他说，"我在为一个很穷的国家，为一个全部是沙漠的国家讲话，这个国家只有一片流沙，少数的骆驼，少数的羊群……"

"是呀，"我打断他的话，"还有你们的石油，倒象是得克萨斯州！"他迸发出欢乐的笑声。整个一幕戏被破坏了，演不下去了。这个花招没有发生作用。除了他自己以外，并没有人觉得有什么好笑。于是他向总统做工作，要求给予财政援助，以便同英帝国主义进行斗争。但是总统并不为这话所打动。他说，我们的援助不是为了那个目的。伊朗有丰富的资源，我们准备提供切合实际的

设备，帮助他们去开发。

摩萨台的另一个明显的特点，是他不信任他本国人；他从来不当着他们讲话。在这同一次午餐会上有很多客人，其中包括伊朗大使。摩萨台一直等到他们都走了，门关上了，只剩下我们三个人和我们的译员沃尔特斯上校时，才开始和我们私下交谈。我看见大使被关在门外，便插手纠正这个错误，但是发现这全然不是出于什么错误。艾夫里尔·哈里曼在伊朗也发现摩萨台只有他一个人在座，并通过一位美国译员（他从来不用伊朗译员）时，才会无拘束地谈话。尼采和麦吉在纽约也知道这样的情形。当他们要召集石油委员会全体成员开会时，摩萨台就犹豫不决。“那没用，”他说。“你们不能说服他们。”在担任常常是令人为难的职务时，我在亲密的同事、在敌对的战士、有时在象摩萨台那样从事掠夺的中间人物身上找到了补偿，确实也找到了乐趣。只有那些讨嫌的家伙才是令人难以忍受的。

摩萨台之所以会自取失败，是因为他从不平心静气想一想，他所鼓动起来支持自己的那股热情限制了他选择的自由，结果他只能采取极端办法去解决问题。也许我们是迟迟才看出他基本上是一个富有的、反动的、满脑子封建思想的波斯人，他被对英国人的狂热仇恨所鼓舞，因此要不惜一切代价把英国人连同他们所有的事业从自己国土上赶出去。他既是一个大演员，又是一个大赌徒。在议会中讲话时，他会大声叫嚷，真的流下泪来，当达到高潮时甚至会昏倒。有一次，他告诉我们，国有化将使伊朗不必付出任何代价，因为英伊石油公司所能提出的任

何损失都将为伊朗的反要求所超过。这一独特的性格，确实应验了这句话，即作恶的人必将得到更坏的报应。

形势危急的春天

当摩萨台上台时，我所信赖和钦佩的朋友欧内斯特·贝文却下台了。1951年3月9日，贝文辞去外交大臣职务，4月14日去世，由赫伯特·莫里森继任。莫里森先生长期来是下议院议员，也是伦敦市政府和伦敦郡议会的一位大专家，因为他是郡议会早期的缔造者。但是他对外交事务一点不懂，而且除了教堂的钟声外对任何情况都无感觉。也许是为了要补救内心的不安，他更加强了他那生来就爱和人发生摩擦的脾气。在这样紧张的时期，这一变动是不幸的。

在3月份——至迟肯定是4月份——过去之前，在对待伊朗石油工业国有化的威胁问题上，英美两国政府之间出现了明显的裂痕。要了解这件事，我们必须先了解：英伊石油公司掌握着什么；伊朗打算取得什么；法定权利和要求与实施这一切的权力之间有什么差别。英国政府在英伊石油公司中只拥有股权。公司拥有阿巴丹的炼油厂，但是并不拥有油田，伊朗政府声称油田是属于它的。英伊石油公司于1933年与政府订有合同，有效期一直到1993年为止，在此期间公司可以开采石油，用油管将油输送到阿巴丹，并在那里进行提炼和出口外销——所有这一切都将给伊朗某种报酬。直到拉兹马拉去世为止，双方一直在就修订这一合同进行谈判。国有化意味着伊朗打算没收炼油厂、输油管和其他有形财产，并取消

开采权的合同。伊朗承认对其打算收回的一切承担若干补偿责任，但是，至于打算补偿多少，或甚至应当根据什么基础计算，则仍然是含糊不清的。

在情形更简单的时代和更简单的地方，本来可以用武装干涉，即所谓"炮舰外交"来解决这个问题，使之有利于强国，但是联合国宪章至少可以说是阻碍了那样的解决办法。在墨西哥没收美国石油权益的过程中，我们对这个问题逐渐形成了这样的看法，即一个主权国家收回这种财产是无可非议的，但是我们也提出了按照相等于所收回财产的公平市价迅速地和公正地补偿的责任问题。我们根据自己的经验知道，这些令人安慰的话只是漫长谈判的开场白，因为没有国际法官或国际法院，能把被告强行拉去受审。而且被告通常是既没有现款又没有可以转让的财产足资扣押的。即使他能完全付款的话，那也只能从油田和其他有关财产的收入中支付。

英国人否认伊朗有权对油田和其他有关财产实行国有化，理由是伊朗已经通过合同放弃了这一权利，但是他们表示愿意就修订合同的主要条款，诸如合同的期限以及英国人的控制问题进行谈判。由于解决这两个问题的途径最后还是要通过谈判，分歧本来只是词义学的问题，但是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这种词义上的分歧却是问题的核心所在，因此任何一方对此都不肯让步。伊朗人坚持双方同意的条款必须建立在承认伊朗有权实现国有化的基础上；而英国人则不管条款怎样，坚决反对这一点，因为他们确信，如果不那样反对的话，所有他们在国外的投资和他们的命脉都将受到危害。

我们的看法是，英国人自己的愚蠢行为把他们引导到目前的困境，而阿美石油公司却由于（引用伯克的话）大方地放弃了其无力保持的东西，从而避免了这一困境。他们既然已经失去了合适的谈判机会，现在他们就不得不用伊朗的词汇了；他们把时间拖得越长，伊朗人就会越发难以对付。我们所关心的是，这一争端对每一个国家在近东的利益都造成了威胁，因为它打乱了各国同石油生产国的关系，并为共产党的宣传大开方便之门，同时英国可能在伊朗导致共产党政变，或者伊朗可能把英国人赶出本土。任何一种后果都将是一场大灾难。我们对此深为关切。

暴乱迫在眉睫

春季里，华盛顿和伦敦之间不断来往的电报以及在两地举行的多次会议，只是使双方的分歧进一步扩大了。布雷德利将军和我在国会委员会以及记者招待会上都已清楚地说明，我们的行动只能限于从中调解。我发表了一系列声明，呼吁保持克制，但这种呼吁却被描绘成为重温“希腊合唱队那种无补于事的瞎操心”。在伊朗，我们可能做的事情也减少了，因为银行越来越不肯保证贷款，而且越来越遭到“资助国有化”的责难。罢工和通向油田的交通定期中断，妨碍了炼油厂的运转。英国军队调到了近东的基地，军舰出现在阿巴丹海面上。根据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项决议我于5月17日向英国大使弗兰克斯提出警告说，在是否允许在伊朗使用武力这一点上，我

们的观点与在伦敦的某些人的观点之间有着实质性的分歧，除非是伊朗政府提出请求，或苏联进行武装干涉，或在德黑兰发生共产党政变，或在遭到进攻危险撤退英国侨民时，我们才能支持使用武力。

6 月里，紧张气氛加剧了。摩萨台所作的贡献是典型的。极端分子领袖萨法维发表声明，说他已下令处死拉兹马拉，还将下令处死其他人员，摩萨台对此作出了反应，他告诉议会说，他的生命处于危险中，要求准许他住到议会大厦里，直到国有化实现为止。显然当时他是愿意为他的国家献出生命的，不过并不是渴望那样做罢了。1951 年 6 月 1 日，总统写信给摩萨台和艾德礼，主张重开谈判。到了 20 日，英伊石油公司的一个代表团带了一个合理的建议(以公司的意见为基础)前往德黑兰，但是结果失败了。随着日益增长的威胁而来的是一系列反威胁。莫里森要求国际法院发出强制执行的命令，并声明，如果英国侨民的生命受到危害，英国不会袖手旁观。伊朗不承认国际法院的权限，并限令阿巴丹的经理德雷克和英伊石油公司的英籍雇员于一星期内作出决定：或者为新的国营伊朗石油公司工作，或者离开伊朗。英伊石油公司以关门相威胁。我电告伦敦，这将引起一场灾难。我们将面对这样的可能性：在伊朗发生经济崩溃，发动共产党的政变，以及西方失掉伊朗的石油，同时也有这种可能，即一旦英籍人员撤退，他们将永远不再被允许回去。

这时英国的压力又上升了一级。德雷克从伊朗撤退到巴斯拉，并通知其他人员跟着撤退，因为议会提出了一项新的反怠工法。接着议会通过了这项法令。在阿巴丹

等待许可从储油池里装油的所有油船都撤走了。（储油池装满后，炼油厂将不得不停工。）英国军舰"莫里蒂斯号"开赴阿巴丹附近。摩萨台的民族阵线党作出的答复是，第一枪打响将是"第三次世界大战开始的信号"。我敦促双方悬崖勒马，考虑一个不损害任何一方地位的临时性工作协定，但是莫里森认为摩萨台的力量正在削弱，打算再等待一个时期。我确信双方正在这场俄国的轮盘赌中把自己的命运推到自杀的地步，于是要求哈里曼在他那俯瞰波托马克河的山顶阳台上和刚从伦敦回来的弗兰克斯大使举行一次会议。

第三阶段：哈里曼代表团

7月4日下午在哈里曼的阳台上开小组会考虑好象是一份英国独立宣言的人有：弗兰克斯大使、保罗·尼采、马修斯博士、乔治·麦吉、我们的主人以及我本人。我们花了两个小时审查由伦敦政府的威胁所造成的后果；我们不是对此展开争论，而是坦率地进行分析。奥利弗爵士毫不怀疑，英国政府和英国公众把这看作是一群伊朗狂人蓄意掠夺英国，是对体面、合法性和理智的横蛮挑衅，认为这是事态严重的，是令人气忿的。但是他怀疑，政府是否应当或能够顶住国内的普遍要求，即应当用更大的力量去对付摩萨台的强力掠夺。

经过下午冷静的讨论，我们作出了某些一致同意的结论。英国在阿巴丹从南部进行武装干涉，很可能导致苏联在阿塞拜疆进行武装干涉，以支持他们对石油开采

权的要求，因为那是伊朗政府曾经谈判过，但被议会所否决了的。即使伦敦有些人可能对于在伊朗划分势力范围并不感到震惊，但是这样做法既不能使英国获得对油田的控制(这是比夺取炼油厂更为困难的一项任务)，而且将在联合国内引起一场争吵。在这场斗争中，华盛顿鉴于它在 1946 年把苏联军队赶出伊朗的斗争中的领导作用，看来不可避免地将以同伦敦的失和而告终。最后，如果摩萨台或者比他更为极端的政府邀请俄国出面干预，希望迫使双方外国军队都撤出时，结果可能是英国人离去和俄国人进来。总而言之，武装干涉只会造成极大的麻烦。

在会议结束之前，我提议，为了制止干涉和可能引起的灾难，应由哈里曼前往德黑兰，作一次恢复谈判的尝试。除了哈里曼显得象一个很不好意思的新娘以外，其余的人都认为这是一个好主意。第二天，当我们向总统汇报我们的会议时，他热情地表示欢迎，并立即打了一个电报给摩萨台，随后从他那里收到了一封未予答复的信，信中摩萨台列举他对英国人的不满，要求我们给予援助。总统说，哈里曼先生去伊朗，将不是作为一个调解人，而是为了和平和稳定敦促伊朗人和英国人恢复直接谈判，以便共同寻求一项解决办法。与此同时，奥利弗爵士把我们的会议电告了英国外交部，而我则要求沃尔特·吉福德大使向艾德礼首相重加申述我们对干涉后果的分析。这一巨大功绩应当归于工党政府，它顶住了主张武力外交政策者的压力。这一点，连同哈里曼访问德黑兰所起的镇定作用，制止了进行干涉的趋势。

伦敦和德黑兰对哈里曼打算进行的访问，最初的反应都是冷淡的。驻德黑兰英国大使公开声明，哈里曼的到来“并没有多大意义”，这一声明后来被撤回了。但是摩萨台经过再次考虑后对这一访问表示欢迎，而莫里森也觉得这件事并不是那么不合需要的了。当哈里曼在7月14日动身时，总统、马歇尔将军和我同他一起照相留念，并祝愿他一切顺利。他第二天到达时，正碰上由杜德党发动的一次大规模示威游行，伤了几百人，死了二十人。这位我们共和国的忠诚干练的仆人，就这样开始了往往是既辛苦又危险的又一次旅行，他为了国家的利益挑起担子，并且以坚贞不拔和恪遵纪律的精神完成了任务。他在履行自己的职责时是从不感情用事的。

这个代表团在把英国和伊朗从战争边缘上拉回来这个眼前目的方面取得了成功。但是它在为石油争端谋求一项解决办法的更为远大的目的方面却失败了，虽然有好几次看来已经接近于突破。我认为，它之所以会失败，其原因是同1946年马歇尔代表团去中国的失败一样的，因为争议双方都不希望有一个解决办法，双方都想在一个不容谈判的中心问题上击败对方。但是奥利弗·弗兰克斯爵士迫切希望得到一项解决办法。他在8月2日对我说，要我把他的个人意见转告哈里曼，说他的访问已经成为一个“天赐良机”，只是由于他“非常干练地处理了德黑兰和伦敦的局势”，才使谈判得以重新开始。

奥利弗爵士提到了哈里曼两星期工作——起先是在德黑兰，随后是在伦敦——的成就。经过他的劝告，国王克服了不愿介入国有化争端的情绪，他并且谋取国王的

帮助去迫使摩萨台当哈里曼还在的时候解决这个问题。摩萨台和他的石油委员会同事还被说服同“代表前英伊石油公司”的英国政府在承认“伊朗石油工业国有化原则”的基础上重开谈判。获得摩萨台同意进行外交谈判是一个重大成就，因为他正在向国际法院提出申辩，认为英国政府作为仅仅是一个英伊石油公司的股东没有资格提出国有化问题。哈里曼聪明地不把这些协议写成书面，因为他注意到，在德黑兰任何书面的东西都会立刻泄露，并遭到否认。

为了使英国同意在这些条件下进行谈判，哈里曼决定亲自去伦敦，并且带了英国大使弗朗西斯·谢泼德一起去，这样他就可以注意这位“几发葡萄弹”①外交学派的缺乏想象力的门徒的言行。在伦敦，他觉察到一种专横的、顽强的态度，他认为这是根据对伊朗形势的错误估计形成的，并且毫无疑问这是谢泼德大使所作的估计。我9月里在华盛顿同莫里森和他的随行人员会谈时，也遇到同样的态度和估计。当我向莫里森建议作出一个联合的情报估计（我得到的情报是，英国军方与文职人员有不同的看法），以期根据事实设法取得一致看法时，他表示拒绝。

尽管这样，哈里曼终于使英国政府同意派出一位部长级官员根据当时还保密的“哈里曼公式”重开谈判。他希望财政大臣休·盖茨克尔能够担负谈判的责任，相信

① 指武装镇压群众。萧伯纳著《巴巴拉少校》序言：“1795年年轻的波拿巴将军一再用大炮猛轰巴黎民众，当时我们那些体面的上层阶级对此很赞赏，戏称其为‘几发葡萄弹’。”——译者

他一旦到了现场就会掌握局势并了解由于摩萨台的个性而形成的独特问题。但是盖茨克尔无法离开伦敦，因为那里的事态发展正在迅速地转向一次大选，因此谈判人选就落到了掌玺大臣兼原料大臣理查德·拉皮尔·斯托克斯身上。奥利弗爵士和我谈话时把他描写为一位“坦率、和蔼和热心的人”，只是在对付近东的心理状态方面没有经验。这证明完全是过奖之词。在他任命发表的那一天，——1951 年 7 月 30 日——哈里曼首途返回德黑兰，而英伊石油公司则关闭了阿巴丹的炼油厂。

谈判几乎立即陷入困境。斯托克斯提出了哈里曼认为是合理并且是在公式范围之内的若干建议，但是他违背了哈里曼的劝告，把这些建议公布了。于是这些建议就成为一般辩论的题目，并且按照惯例被摩萨台在 8 月 15 日拒绝了。斯托克斯笨拙地疏远了前驻华盛顿大使和当时正担任宫廷大臣并且是国王主要亲信的侯赛因·艾拉。在哈里曼看来——斯托克斯也是这样看法——会谈已注定失败，所以应当休会，以便让它过渡到一个冷却时期，这样可以期待更为合适的时间和也许更为合适的谈判者。派往德黑兰的代表团在 8 月底回到了国内。

第四阶段：希望消失了

回到华盛顿后，我们认为，由于不幸任命了斯托克斯，哈里曼解决问题的卓越尝试已告失败；同时我们相信，双方在解决这个问题上所涉及的重大国家利益终究会克服他们的顽固态度。但是他们却不遗余力地排除这

种信念。9月5日摩萨台发表声明，如果英国在两星期内不安排恢复谈判，他将撤销英国专家的居住证。英国人立即完全中止谈判，派了四艘驱逐舰加入原在波斯湾游弋的十艘军舰，撤销伊朗在英格兰银行存款的兑换优惠，并在安理会中提出谴责决议案。专家们当即被驱逐出境，他们安全地撤退了。

在这一时期内，有一天莫里森在华盛顿告诉我现在已听惯了的如何对付伊朗的顽固路线，他在谈话中还告诉我一种看来是奇怪的异端社会主义理论，即由于伊朗创造了用不正当手段接管财产的骇人听闻的先例，这样对它采取强硬行动就成为必不可少的。对此，我的笔记本上记载着我是这样答复的：保持冷静也许对解决问题更为有益。我们还劝告不要搞安理会的决议案，因为它不但要遭到苏联的否决，而且无论如何不可能得到多数票，这就不会加强英国的立场。摩萨台亲自来到了纽约，在安理会中为伊朗的立场辩护。在这一点上，他运用了非凡的技巧和在伊朗议会中人所共知的全套戏剧性表演。一夜之间他变成了一个电视明星，简直使一年前曾由于在朝鲜问题上同马立克进行辩论而名噪一时的英国代表格拉德温·杰布黯然失色。摩萨台感到这是他的好机会，就充分利用它来增进他在国内的威望。

摩萨台在纽约时，精通石油业务的乔治·麦吉花了很多时间同他进行讨论，还拉进了保罗·尼采和负责经济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帮办哈罗德·林德，因为这两人都有广泛的企业经验。在这些谈话中，摩萨台作了惊人的声明，说阿巴丹的炼油厂还没有国有化。如果此话属实，

那么不论根据什么理论，它仍属英伊石油公司所有。摩萨台还显得愿意让炼油厂由一家"中立的"公司——比如一家荷兰公司——经营。有时他似乎同意让少数英国人参加，有时又不同意这种做法。从这些前提出发，他们三个人想出了一个巧妙的计划，即让英伊石油公司能够在公司和政府对半分红的基础上获得伊朗石油的出口，就象波斯湾其他地方所实行的那样。

英国的决议案在安理会被击败之后，摩萨台来到华盛顿检查身体和进行一些可能的治疗，并就地看望总统。他进了陆军医疗中心的沃尔特·里德医院，愉快地占用了总统的一套房间。每个人都关心和照顾他。他穿着睡衣裤和浴衣见客，在一间阳光照耀的宽大会客室里接见了我和我的三位谈判者。我们用了四个小时反复讨论了他们和他会谈的问题。谈话的人象在迷宫里走路那样，常常发现自己又回到了起点上。特别是谈到价格方面，他装得十分含糊而愚蠢，尽管事实上我们只有每桶几分钱的上下。我记得麦吉和我就石油经济学问题向他进行解释时举了这样一个例子：我们从农场买活的菜牛所付的价钱和我们向牛肉铺里买上等烤牛肉所付的价钱有很大差别。他向我们解释说，农民总是被剥削的。

想到我们手中有这笔交易，我在出发去参加一系列会议，包括外长会议、北约组织会议和在欧洲举行的联大会议时，就带了林德同行，让他向英国人汇报。英国的大选使保守党重新执政，外交部由安东尼·艾登接替了赫伯特·莫里森。这是一个重大和显著的改进，只不过在伊朗问题方面却是一个例外。在这一地区，艾登继续听

取同一来源的意见，而我认为这些意见毒害了工党的判断——因为这一来源就是英伊石油公司，燃料和动力部，以及财政部等官僚机构，而财政部的莱斯利·罗恩爵士扮演了复仇天使圣迈克尔的角色。罗恩宣告，由于摩萨台带头进行对英国海外投资的袭击，他必然要失败，并必须被打倒和受到惩罚。英国这一顽固态度排除了进一步的谈判，也排除了谋求使摩萨台体面地退却的方案。因此林德也就中止活动而回国了。

尼采和麦吉结束了谈判，理由是摩萨台从来没有明确表示过让英国人从事开发的要价，但是他们告诉我，摩萨台始终不相信英国人。他知道英国人要斗争到底，于是也庄严地宣布他要斗争到底。

他对尼采和麦吉说："你们从来不懂，这基本上是一个政治问题。"11月13日，美国政府"遗憾地得出结论：〔在关于伊朗石油争端的谈判中〕虽然有所进展，但没有出现能够达成实际可行的解决办法的新基础"。摩萨台收拾行李回国了。

如果认为，英国人更迁就一些，可能这笔交易已经做成功，这是过分乐观的想法。也许摩萨台又会蹦蹦跳跳地回去了，但是我一直感到遗憾的是，没有让我们有机会对他施加压力。

二十五　为稳定朝鲜战争作出的努力

要稳定朝鲜战争，几乎需要同时在这三条战线上作出努力：朝鲜战线，联合国战线和东京战线。最难处理的是最后一条战线。

在朝鲜战线上

1950年12月23日发生了一件重要无比的事件，但是在华盛顿的我们(指我们这些文官而言)当时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指挥第八军的沃克将军，由于所乘的吉普车在冰冻的朝鲜公路上撞毁而身亡，陆军少将马修·李奇微将军奉命接替他。两天以后(根据朝鲜时间)，李奇微将军向麦克阿瑟将军报到，接任了第八集团军军长，不久第十兵团也合并了进去。后来李奇微将军告诉我们，麦克阿瑟在会见结束时对他说："马特[1]，第八集团军是你的啦。你看怎么办好就怎么办吧。"

他从来没有说过比这更聪明的话。不到一个月，美国历史上路程最长的退却终止了，第八集团军的士气恢复了，并且，用它的司令官的话来说，"开始向前转动了"。2月中旬，中国方面的一次大反攻暂时阻止了我们，但3月

① 马修的爱称。——译者

7日发动"杀伤作战行动"后我们又继续前进，这一作战行动正如它的命名所表示的，主要是为了要大量杀伤中国人，而这一点是做到了。3月15日收复汉城，以后没有再失守。4月9日，第八集团军已在三八线以北的"堪萨斯线"巩固下来。李奇微将军在那里把军队集中和调整，并紧张地准备对付另一次中国人的进攻，因为这一进攻看来已在酝酿之中。他和华盛顿都相信，第八集团军能够全部吃掉向我们投入战斗的中国人；同时大家也明白，此后不会再谈什么从朝鲜撤退的话了，除非是苏联进行军事干涉，而这一点我们认为是不大可能的。

在联合国战线上

纽约的情景在我们的最后一瞥中，显得有些混乱。当时马立克和伍将军正在攻击美国，因为美国站在朝鲜和福摩萨一边；我们在设法集合我们的朋友投票谴责中国对朝鲜的侵略；而印度和其他国家则在争取一项停火决议。由于联合国是交战国的一方，停火决议显然是较弱的一方向较强的一方提出的呼吁。由于这个原因，处于目前军事形势下的美国政府对此既不参加，也不反对。但是中国人则表示反对。伍将军宣称要求大会主席伊朗的纳斯罗拉·安迪让和他的两位助手去确定可以安排停火的基础的那个决议是非法的，而周恩来声明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唯一可以接受的谈判基础"是，一切外国军队必须撤退，朝鲜内政必须由朝鲜人民自己解决；美国军队必须"退出"福摩萨；中国共产党政府必须取得联合国

的席位。1月2日，安迪让先生报告使命失败。

英国、加拿大、印度和其他国家不甘心于这次挫折，对中国人提出了另一个方案——一个建议以五项原则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决议案，包括：(1)停火；(2)举行一次恢复和平的政治会议；(3)分阶段撤退一切外国军队；(4)立即就一个全朝鲜政府进行安排；(5)停火后，举行一次由英国、美国、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参加的会议，讨论远东问题，包括福摩萨的前途和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

要在支持或反对这个计划之间作出选择是十分棘手的，任何一种选择都具有危险性：一方面是失去朝鲜人的信心，并引起国会和舆论界的愤怒；另一方面是失去我们在联合国中的多数和支持。经过国务院煞费苦心的考虑，——同时我向总统建议了很可能是错误的选择，这种选择的错误用不着等到事后才能知道——我们终于支持了这个决议案。在这样做的时候，我们热切地希望并相信，中国人会拒绝这个决议（他们果然是这样的），从而我们的盟国会回到比较清醒的立场（他们也果然是这样的），并追随我们把中国人作为侵略者进行谴责。感谢总统，即使对这样使人为难的决定，他也支持了我。这立刻在政界中掀起了轩然大波，已经热烈展开大辩论的参议院又多了一个新的题目，参议员塔夫脱对我们进行了十分猛烈的攻击。值得庆幸的是，这场风暴很快就自己吹过去了。1月11日提出、13日通过的决议案，在四天之后被中国人拒绝了。我们的盟国认为，在国务院支持五项原则和全国反对它们的情况下美国在东西两个世界中都得到了好处，于是有点勉强地于2月1日和我们一起

通过了对中国侵略的谴责，但是一直拖延到5月才对侵略者采取惩罚的行动。

由于受到了华盛顿和东京之间无法控制的冲突的干扰，联合国战线就被固定在一种纷扰不安的状态中。

在东京战线上

11月下旬，北朝鲜的中国军队在所有战场上发动了进攻，麦克阿瑟将军打电报给参谋长联席会议说，把朝鲜冲突局部化的一切希望已经消失。他说，中国人要完全消灭他的军队，只有把战争打到中国去，才能保住这些军队。在东京的柯林斯将军面前，他把拒绝授权空袭中国、并用海军封锁中国海岸、从福摩萨增派援军或考虑用原子弹轰炸北朝鲜描绘成为实质上是一种投降政策。前面已经提到，同时他还向新闻界抱怨，"这是军事历史上没有先例的一次巨大的牵制"，因为既不准"紧追"飞入满洲的敌机，又不准轰炸满洲的机场和军事目标，这就给中国人提供了"特别庇护所"。但是他没有注意到，我们自己在南朝鲜也有对等的庇护所。

圣诞节的第二天，总统召集财政部长斯奈德、马歇尔将军、布雷德利将军和我到布莱尔大厦举行战略会议。这是一次历时很长的会议。我建议改写并澄清对麦克阿瑟将军的指令。我们在朝鲜下的赌注太大了，因此，在我们尚不曾充分考验中国的实力，发现军事上有迫切的需要以前，联合国不应撤退。我们不应当要求麦克阿瑟将军守住任何一条特定的防线，但是应当要求他使用海陆空

军力量，包括朝鲜军队，给敌人以最大限度的杀伤（后来李奇微将军采用了这个战略）。他不应当使他的军队冒覆灭的危险，因为这些军队负有保卫日本的重大责任。两位将军看到了全面战争更大的威胁，了解到不应当在朝鲜进行这种战争。他们同意改写指令，总统对此也批准了。

第二天，两位将军同总统和我讨论了草拟的指令，并于12月29日将它发出。它简单地阐述了以下几点：

1. 如果我们能够用目前的联合国兵力在朝鲜的某一点进行抵抗而不致蒙受严重的损失，如果中国共产党在军事上和政治上的表面威望能够减弱，这将对我们国家的利益起重大作用。

2. "面对全面战争更大的威胁"，参谋长联席会议不会同意增派美国地面部队去朝鲜。主要战争不应当在朝鲜进行。

3. "因此……你现受命采取步步为营的防守方式，首先要考虑你的军队的安全，尽可能多地给朝鲜的敌军以杀伤。"

4. 有关最后有秩序地撤退的适当时机，将由参谋长联席会议在事前作出决定。至于决定撤退的条件当征求麦克阿瑟将军的意见。

麦克阿瑟将军接到这个通知后，曾记下了如下的看法：他认为这"表示已失去了在朝鲜'取胜的意志'"；它是"不现实的"，因为它不再提供增援部队，而指望第八集团军负责防卫日本"尤其是荒谬的"。在同一天（12月30日），他提出了四点建议，即：封锁中国海岸；用轰炸摧毁

中国的工业能力；在朝鲜使用国民党中国军队；鼓励福摩萨反攻中国大陆。如果排除这些行动，又不增援，那么要从朝鲜撤军就只有撤退到釜山了——他这是把责任推给各军种参谋长联席会议。1951年1月9日，各军种参谋长重申了他们的命令，要麦克阿瑟步步为营，守住阵地，并给敌军以最大限度的杀伤，他应首先考虑他军队的安全和保卫日本。为了达到这两个目的中的任何一个目的，必要时将授权他撤退到日本。参谋长们说正在研究他的建议，但是指出了反对采纳他的建议的一些主要论点。后来麦克阿瑟将军和他的辩护人利用答复的这一部分来证明他的建议已经获得各军种参谋长的同意（事实上他们并没有同意），而只是被我和其他一些人所破坏了。

这时候麦克阿瑟试图对各军种参谋长将上一军。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马上来了一个反质问"。他在电报中说，既要守住朝鲜的阵地，同时又要保卫日本免受外来的进犯，对此他所指挥的部队，显然是无能为力的。他谈到他的部队士气低落。（马歇尔将军看到这里时，对迪安·腊斯克说，当一个将军开始抱怨他军队的士气时，他就应该考虑一下他自己的斗志了。）政府必须决定它要执行的重大政策的依据是什么。"正如我已经指出的，在把反常的限制和条件强加于在朝鲜的部队的情况下，他们的军事阵地是守不住的，但是，如果压倒一切的政治考虑决定一切的话，这些阵地也能坚守到任何长久的时间，直到全军覆没为止。请你们加以澄清。"

如果说有一份文件可以供后代人参考，那么以上的电报就是这样一份文件。它的用意是：如果事情弄糟了，

它可以推卸麦克阿瑟的责任，而且它还对华盛顿施加最大限度的压力，要它转而采纳他的建议，把战争扩大到中国。仅仅是这一点就可以使我确信，这位将军已经难以驾驭到了不可救药的程度，他根本违抗总司令的意图。我那时深感不安，因为还没有想到李奇微将军能使局势转危为安。经过一系列匆忙的会议，包括一次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总统以极大的耐心，决定写三封信给这位最高统帅，再次试图阐明美国政府的目的和问题。他还派了约瑟夫·柯林斯将军和霍伊特·范登堡将军去朝鲜，回来时汇报那边的实际情况，不要麦克阿瑟那套花言巧语。为了明了起见，每封信只谈了朝鲜问题的一个单独的方面，希望麦克阿瑟也能把这些问题分开来——但是这个希望落了空。

在第一封信里，各军种参谋长重申（这是第三次了）他们对当前军事行动的指令。“根据我们所了解的一切因素，包括特别是你这次来电中所提到的因素”，各军种参谋长认为，要持久地守住朝鲜的阵地“在目前情况下是不可能的”。但是，如果在开始撤退之前，能为军事上和外交上的磋商赢得更多一些时间，那对美国和联合国都将是有利的。因此，各军种参谋长强调这两点的重要性，即：应予敌人“最大限度切实的惩罚”；“除非实际迫于军事上的考虑”，否则就不要撤出朝鲜。

在1951年1月12日由柯林斯将军亲自带去的第二封信里（为了保证麦克阿瑟直接了解这封信的内容，信是由柯林斯读给他听的，而不是通过他的下属转述的），参谋长们谈到，如果事态恶化，联合国军司令部被迫从朝鲜

撤走时，可能做些什么。包括麦克阿瑟提出的四个行动在内，一共有十六个可能采取的行动，它们全部或部分可能在撤退后采用，都被提出来准备为军事上和外交上的磋商研究之用。为了这个目的，各军种参谋长对这些行动都已“暂时地”予以同意。马歇尔将军没有同意；我也没有同意。我们准备在1月17日国家安全委员会上同总统一起进行讨论。但是到了那一天，范登堡和柯林斯两位将军已从朝鲜回来，汇报了完全不同的形势。第八集团军的士气很旺，李奇微正在准备采取主动。他并不曾因为战争行动被限制在朝鲜之内而认为受到了妨碍。这是他的意见，也是他们的意见，并且，说也奇怪，麦克阿瑟现在也同意这意见了（他宣称：“谁也不会把我们赶下海去。”）只要苏联不进行积极干涉，国家的利益需要战争持续多久，第八集团军就可以在朝鲜继续作战多久，而不致危及它的安全。中国人现在自己也有困难。

这十六个为研究用的可能采取的行动，从此没有再进一步研究。尽管这样，据麦克阿瑟将军的参谋长说，麦克阿瑟“感到满意”，因为“了解到……参谋长联席会议终于不再幻想到对中国进行反击会引起世界大战”，并提出要把他的建议付诸实行。

马歇尔将军和布雷德利将军同我一起要求总统，应由总统而不是由参谋长联席会议（因为麦克阿瑟将军会同后者争执的）给麦克阿瑟发出第三封信，权威性地阐明在朝鲜“我们国家的和国际的基本目的”。这是一封国家元首写给战区司令官的亲切周至和体贴入微的信，推心置腹地对他说出了自己的想法。总统在我们为他准备好

的一份草稿上，进行了长时间字斟句酌的修改。他在信的开头，向这位将军保证，他“十分注意”朝鲜的局势，然后列举了继续抵抗侵略时所要达到的十个明确的目的；强调了在联合国内加强和保持对我们的支持的必要性，因为这是对苏联干涉的坚强的障碍，并且，基于同样的理由，强调避免扩大战争的必要性；还提到了可能出现的险恶情况，为此他急于增加我们的军事力量；最后竭力赞扬了麦克阿瑟将军对他军队的“卓越的指挥”和他的军队的“出色的表现”。如果一封信可以打动一位司令官的效忠之心的话，照说这封信是应当可以做到这一点的。

但是，不出一个月，辩解和诉苦又开始了。2月13日，这位将军诉苦说，朝鲜的未来取决于“国际上的考虑和决定，而这里对这一切还被蒙在鼓里。”他自己对中国干涉所作的战略部署进行得很顺利，包括迅速撤退，拉长敌人的供应线，以及用“近乎天文数字的更多的”空中轰炸来“不断增加其后勤的困难”，但是他的军队仍然受到损失，因为敌人“享有军事上没有先例的便利，我们不能向中国领土反攻，于是他们的军事潜力就得到了庇护所的保护”。范登堡将军和柯林斯将军报告说，情况并非如此。麦克阿瑟要求授权进攻中国领土，但又一次遭到拒绝。

又一次迫近三八线

当麦克阿瑟将军向五角大楼开火时，李奇微将军正在向敌人开火。有了第十兵团加入后，第八集团军的斗

志恢复了，火力也集中和大大增强，它已采取了攻势。用骑马的术语来说，李奇微将军已经紧紧地驾驭了它。它的任务已经不是收复失地，而是摧毁敌军。他正以惊人的效率执行这一任务，甚至不惜在敌军进攻时后撤，以诱使他们进入事先准备好的火力网。第八集团军无情地向北推进，又一次迫近三八线，这就重新引起了国务院和穆西奥大使之间以及波托马克河对岸国务院和国防部之间的政策讨论。

国务院和国防部的高级官员的两次会议和两份备忘录所透露的情况，完全不同于当时和后来一些政治党派以及学者们所作的批评。人们曾经指责国务院在战争中支配或者企图支配军事行动，同时指责参谋长联席会议支配或者企图支配外交和政治活动。事实上，真相恰恰与此相反，这两种指责都是不对的。在 1951 年 2 月 13 日和 23 日国务院的备忘录中，以及在同一日期举行的两次会议中，很清楚地表示了两个部的态度，即：要在自己的领域中作出决定性的建议，就必须考虑到另一方的结论。它们确实彼此都力求取得对方的指导，以致为了设法回避责任而引起了某些尖锐的措辞。后一份备忘录是我为马歇尔将军提出的试验性方案，它被参谋长们辛辣地称之为“不切实际的建议”，因为国务院应当首先提出政治目标，然后参谋长们才能为实现那些目标制订出军事计划。联系到通常认为两个部经常在争夺支配权这样一种看法，以上情况是值得注意的。并不是没有矛盾，它们可以在本书中充分看到；但当情况变得棘手时，每一方都对另一方在承担责任方面表示了很大的尊重。

最后我们对一些相当简单而明智的结论都取得了一致意见。首先，即使存有某些与此相反的幻想，联合国和美国在战争中并没有想到要用武力抗击一切外来者以统一朝鲜；中国的干涉现在已排除了这种实际上的可能性。我们的目的是要击退侵略和达到一个稳定的局面，使庞大的联合国军队能够分阶段撤退，由重新武装后具有战斗力的朝鲜军队守住一条抵御北朝鲜人的防线。最终的政治目的，即通过和平方法统一朝鲜，虽然这明明是遥远的将来才能实现的，但是应当始终加以保持。要寻求和守住的一条防线应当是在三八线以北，并且应当既是在战术上可资防守的，又是实际上能够得到的。4月初，李奇微将军进入了那个地区，他将在那里作战两年，要继续削弱和杀伤敌军，但又不致危及他的军队，而对于这一任务，他和他的政府之间是完全协调一致的。在这个地区里，他找到了而且守住了一条防线，那条防线后来就成为最后的停火线。

最 后 的 摊 牌

欧里庇得斯[①]写过这样一句话："神要使人灭亡，首先使他疯狂。"

1951年3月初，麦克阿瑟将军在他的信件中，对李奇微将军为执行政府的目的和战略使用了全部兵力取得的胜利表示了惊奇和不快。麦克阿瑟轻蔑地称它为"手风琴"战争。据他的参谋长说，他认为中国的侵略"不可能

① 欧里庇得斯(公元前480—前406)，雅典悲剧作家。——译者

单用杀伤中国人的办法制止”,——然而，事实说明是可以这样制止的。他在1951年3月7日公开宣称,除非是对敌人的战争潜力展开反攻,不然战线迟早是要“达到一个理论上的军事僵持点的”。看来他不能够也不愿意理解，李奇微将军正谋求在既占优势又可防守的地点建立这样一条战线，作为制止侵略和结束战争的第一步。他要求由“最高的国际一级”作出决定，以便解释清楚那些由于红色中国对朝鲜的不宣而战所引起的不曾解决的问题”。

3月15日，这位将军采取了一个不仅限于私下与政府为难的步骤。他公然反抗总统12月6日向司令官发布的禁止向新闻界擅自发表谈话的命令,向合众社社长休·贝利发表了一篇谈话。他在谈话中批评,不应阻止第八集团军越过三八线,说这样就不能“贯彻我们统一朝鲜的任务”。我们已经向他反复讲过,这不是他的任务。

九天以后,他严重地破坏了政府的行动计划。有一段时间内，我们政府内部以及我们盟国之间已在讨论联合国大会内坚持的一项意见，即在主力部队向三八线以北挺进之前,应进一步作外交上的努力,以取得和解。这项意见已被具体化，赞成由总统代表联合司令部发表一项声明,阐述在朝鲜已经具备和平的基础,联合国司令部准备就停火进行安排,为更广泛的和平解决开辟道路。3月21日，由总统批准的草案已发给凡派有军队去朝鲜的各国政府。他们都表示赞同。3月20日，参谋长联席会议把当时的情况通知了麦克阿瑟将军,并问他“在以后几个星期内”是否有“充分的行动自由”，可以在与敌军保持接

触时保证他部队的安全。他的回答是肯定的。

3月23日晚上11时，国防部副部长罗伯特·洛维特同国务院的亚历克西斯·约翰逊、迪安·腊斯克和卢修斯·巴特尔一起来看我，带来了一份那天早晨（东京时间3月24日）麦克阿瑟将军发表的声明。鲍勃[1]平时一向冷静，即使在着急时也只说几句含蓄的讽刺话，他当时那样生气是我以前从来没有见过的。他说，必须把这位将军撤职，而且要立刻撤职。我读了声明之后，也和他同样感到恼火。这声明只能说是对参谋长联席会议发出挑战，对已经通知他的作战行动进行破坏，对他的总司令最粗暴地违抗。我们讨论了这篇声明以及它的后果一直谈到一点钟。

麦克阿瑟的声明开头的一段，对他在失败中取得的辉煌战绩大肆自我吹嘘，接下去就竭力贬低敌人。他说：中国"被渲染夸大的军事力量"，缺乏进行现代战争所必需的工业基础；它的军事上的弱点，即使在他这支受到牵制的军队面前也已暴露无遗。他说，中国人永远不能征服朝鲜；如果撤消了对他的限制，而他们沿海地区和内陆的基地可以受到攻击的话，他们在军事上是注定了要崩溃的。一旦承认了这些基本事实，朝鲜问题就不再会"被那些与本题无关的事情……例如福摩萨问题和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问题所累"，从而也就不难获得解决。作为联合国军司令的麦克阿瑟，愿意在战场上与敌军司令进行磋商，借此实现联合国的政治目的。

第二天早晨总统召集洛维特、腊斯克和我去白宫，这

① 罗伯特的爱称。——译者

时洛维特的怒火已经平息。总统虽然非常镇定，但看来他既怀有疑虑又抑制着愤怒。他首先问我们是否了解他12月6日的命令；在得到了我们的肯定答复之后，他口授了一封给麦克阿瑟的信，信中清楚地为军事审判作了伏笔，这样甚至可以使麦克阿瑟将军有所顾虑。

总统指示你注意他1950年12月6日发出的命令。鉴于1951年3月20日给你的通知，你以后的任何声明都必须符合12月 6日的命令的规定。

总统还指示，如有共产党军事领导人在战场上提出停火要求，你应立即向参谋长联席会议就这一件事请示报告。

麦克阿瑟作为一个对公众或敌人的独立发言人的经历，显然到此结束。杜鲁门总统在他的回忆录里说：麦克阿瑟的这一举动使他别无选择的余地；他不能再容忍麦克阿瑟那样违抗命令；他在忍无可忍之前已经下定决心。我对这一点毫不怀疑，但是可以补充一句，即他既没有把他的决定对我讲过，并且，就我所知，也没有对任何人讲过。 4月5日发生了另一件事情，那就是发表了一封写于3月24日的命令之前、表示断然违抗上级长官的直接命令的信件。

麦克阿瑟将军在3月20日写给马萨诸塞州的众议院少数派领袖约瑟夫·W·马丁的信里，违反他上级的决定，同意马丁先生的意见，认为联合国军司令部应当在朝鲜战争中使用中国国民党的军队。

在给反对党领袖的信里，这位将军接着直接攻击了

总统在一星期前给他的信里阐明的政策:“看来要某些人理解以下这些情况是异常困难的,即:共产党阴谋家已经选定了亚洲这个地方玩弄他们征服全球的把戏,而我们已介入了在战场上引起的争端;我们在这里是用武器打一场欧洲的战争,而外交家却仍在那里进行舌战;如果我们在亚洲的这场战争中输给了共产主义,那么欧洲的陷落将是不可避免的;如果我们打胜了这一仗,那么欧洲就很有可能避免战争,同时也能保存自由。正如你指出的,我们必须打胜。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代替胜利。”

4月5日,马丁先生发表了这封信,在众议院里宣读了它,这是对政府政策的公开宣战。在4月5日的同一天,伦敦《每日电讯报》发表了一条香港传来的电讯,报道了据说是麦克阿瑟将军和英国陆军中将H·G·马丁的会见。电讯引述了麦克阿瑟将军的话:“联合国军被一个人为条件的蛛网围困住。……他发现自己在进行一场没有明确目标的战争……这不是军人侵犯了政治家的领域〔而情况是恰恰相反的〕……在战争中,一个司令官的真正目的是要消灭敌军。但在朝鲜并不是这么一回事。如果不牵涉到人的生命,那情况将是可笑的。”

密执安州的共和党参议员霍默·弗格森提议,应当派遣一个国会委员会前往东京,直接从这位将军那里探明他认为应如何进行战争。第二天,4月6日上午,总统在举行内阁会议后立即约我去会见他和马歇尔将军,当时我对我们将要讨论的问题已经心中有数了。

二十六　麦克阿瑟将军的解职

作出决定的日子

4月6日，星期五上午开过内阁会议以后，前来参加会议、报告战况的布雷德利将军和艾夫里尔·哈里曼，以及马歇尔将军和我，随着总统走进他的办公室。总统提出对麦克阿瑟将军公开违抗总统应该采取什么措施，我们为此讨论了大约一个小时。从宣读给众议员马丁的电报那一时刻起，我对问题的性质已经非常清楚了。这与其说是做什么的问题，不如说是怎么做的问题。只有解除这个将军的一切指挥职务并把他从远东撤回，才能解决这个局面。这可能引起严重的困难，但是，只要总统根据他所有的文武顾问经过周密考虑作出的建议，并在他们的坚决支持下采取行动，困难是可以克服的。只怕他自以为比他们高明，或者只表面上接受他们的意见，或者感情冲动，那就会贻害无穷了。

当我们商量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很清楚看出，马歇尔将军和布雷德利将军大概还需要花些时间同参谋长们开联席会议进行从容的讨论，这种讨论应当完全不受总司令先前作出的结论的任何拘束，哪怕是假定性的结论。但是，参谋长们都不在市内，要到周末才能重新集会，进行

讨论，并作出建议。因此，我竭力使讨论继续进行下去，而不作出结论，直到所有观点都能摆出来，所有的人都表明了态度为止。麦克阿瑟将军应受处分已是没有什么疑问了；唯一的问题是，如何处理这件事才是最为明智的。

同一天下午，马歇尔将军、艾夫里尔·哈里曼和布雷德利将军在我的办公室里开会，作进一步讨论。当时以及那天上午，马歇尔将军曾先后征求我们的意见，问这样做法有何利弊，即先把麦克阿瑟将军召回国来征询意见，然后作出最后决定，我们都坚决表示反对。在我看来，这似乎是一条通向灾难的道路。共和党极右派的所作所为（得到某些民主党人的支持），正如他们利用麦卡锡以及政策委员会工作人员提出弹劾总统的建议所证明的，已使我确信，他们之拥护宪法程序，至多也不过是装饰门面而已。而且，麦克阿瑟对文官的那套演戏本领和他在武官中的威信所产生的影响，已经不止一次地表演过了。让他摆着司令官的全部威风和使他的未来成为当前的争论问题而回到华盛顿来不但会严重损害总统作出决定的自由，而且说不定会危及总统自己的前途。马歇尔将军本来没有坚持这个意见，对我甚为信服。

星期六上午，我们四个人又同总统作了一次短暂的会晤，布雷德利将军汇报说，参谋长们正在陆续返回市里，并准备连续把会议开到星期天为止。总统随即打发我们走了，要我们在星期一上午带着成熟的、最后的建议再次碰头。但是，星期日早晨，总统又再次召见我，这次只单独召见我一人。总统告诉我，他已把财政部长约翰·斯奈德吸收进讨论这件事情的顾问团，但是，他没有告诉我

斯奈德有什么意见。我力劝他继续采取他目前极其明智的做法，先不透露他的想法，等到所有的建议都已提出而他已准备作出决定和采取行动的时候再说。无论他采取什么行动，我们所有的人都将受到谘询。有一件事我们全都应该明白而且没有必要乞求特殊权利，那就是总统从来没有向我们中的任何人暗示过他的意见和准备采取的行动，他要到听取了所有负责的文武官员的建议以后，他才宣布他的决定。

4月9日星期一上午，我们这群人再次汇集在总统的书房里。马歇尔将军对我们宣布说，在布雷德利将军主持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上，全体一致建议解除麦克阿瑟将军的一切指挥大权；他和布雷德利将军同意这个建议。当征求哈里曼和我的意见时，我们也表示同意。总统说他的意见也一样。他问两位将军是否建议谁接替麦克阿瑟将军。他们提出了陆军中将马修·李奇微，总统接受了这个建议，这使哈里曼和我都感到高兴。总统要我们第二天再来，并把实施这些决定的命令草案带来。

电讯造成的混乱

星期二下午，总统把命令和其他必要文件都交给我，以便用我们的密码发给釜山的穆西奥大使转交在前线的陆军部长佩斯。我们指示佩斯立即飞赴东京，把命令等亲自交给麦克阿瑟将军。我们已讨论过递送的方法，结论就是上述的方法还可以使这位将军不致因通过军用电讯的直接传递而感到难堪，因为这种有趣的消息必然会泄

漏出去。麻烦的是国务院用来传递信息的那条商用线路出了故障。午夜时分，虽然电报公司坚称电报已送达釜山，我们却没有得到穆西奥的回电，因为我们指示他在收到电报后要用明码“电悉”两字作复。这时，总统和布雷德利将军已经获悉新闻界在纷纷打听的谣言，便把这项命令直接通过陆军自己的电讯系统拍发了。在东京，这件事被认为是一种不必要的侮辱，这完全是一种误会。

与此同时，釜山已经收到我们的电报，译了出来，并用电话通知了佩斯；他当时正同李奇微一起在司令部的营帐里。佩斯事后告诉我，他接到这个电报时，刚巧在下大冰雹，营帐里的声音就象在一个猛烈敲击着的鼓里听到的一样。他和李奇微把电话机移到外边，以便尽可能听清这一惊人的信息。为了弄清电文，他们匆匆赶到釜山，然后动身去东京。这位将军则立刻从东京回来，等候他的接替者詹姆斯·范佛里特将军。

这一天，我在华盛顿也过得并不特别轻松。星期二下午，我把命令送到译电室以后，便上国会山去与参议员麦卡伦和布里奇斯进行一次古怪的约会。这可以说是一次外交谈判的产物。我们之间的关系一直非常紧张，他们摸不准如果他们要求约会，我是否会见他们。因此请副国务卿帮办卡莱尔·休梅尔辛来试探我的意思。出于他们意料之外，我说，我很乐意去拜访他们，而且真的这样做了。双方互相表示了完全不真诚的热情以后，他们就说出了自己的意图。他们担心总统未经慎重考虑就准备同麦克阿瑟将军吵架，那样的话，总统肯定要失败。这位将军的观点将会获得国会的大力支持，而总统的观点

则不然了。他们逼着我去劝总统重新考虑他的态度，同这位将军达成和解。我告诉他们，总统对两位如此杰出而有影响的参议员的意见一定会深感兴趣，我将忠实地向他汇报——我确实这样做了。当然，第二天解职的新闻一传出来，他们指责我不该守口如瓶，哄骗了他们，——这倒不是完全没有理由的指责，但是，我除此之外，别无他法——我们的关系就此更恶化了。

由于改变了通讯渠道，使我们整夜忙个不停。午夜过后不久，我的两位秘书卢克·巴特尔和巴巴拉·埃文斯来到我家里，于是开始了电话通话。我同得克萨斯州参议员汤姆·康纳利和俄克拉何马州参议员罗伯特·克尔通话，他们两人都是具有很大影响的人物；又同参议院秘书莱斯利·比弗尔和众议院外交委员会秘书博伊德·克劳福德通话，要求他们代表我分别通知他们认为适当的参议员和众议员，但是，把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基伊老法官除外，因为他有心脏病，应等到早上再通知他。随后我们又通知了所有在朝鲜派有军队受麦克阿瑟指挥的各国大使。

我又把福斯特·杜勒斯从床上叫了起来，请他来见我。他被这个消息弄得目瞪口呆，而更使他目瞪口呆的是他得悉总统要他立即去东京向吉田茂首相保证：对日政策不变，和约还是要签订的。他说，他得花些时间同塔夫脱参议员和其他一些人商量一下。我对他说，赶紧去商量，要准备在一两天内出发，并且要他第二天同我一起去白宫，因为总统有一封信要他交给吉田先生。（他在三十六小时之内就坐飞机走了）。直到早上四点钟的时候，

我们这一天才算结束。不到五个小时以后，又一天开始了。这天是我的五十八岁生日，参议院的秘书在国会大厦他的餐室里为我举行了一次庆祝午宴。在座的大多是我的一些忠实的朋友，还有其他几位参议员。

我们定下心来准备忍受新闻界和国会的猛烈攻击，这是解职案必然会带来的后果，而且确实也发生了。这位将军回到美国，受到了对英雄那样的欢迎。他对国会，并通过电视也对全国作了一次煽动性的演说，又于1951年5月3日，作为第一个证人，出席了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与外交委员会联合举行的"关于远东军事局势以及有关陆军总司令道格拉斯·麦克阿瑟被从上述地区岗位上解职的真相的质询会"。这次质询会，在主席理查德·拉塞尔参议员十分干练的主持下，开了八个星期，把两个委员会都弄得精疲力尽，把新闻界和公众也搞得厌烦了，发表了大量的机密材料，成功地使爆炸性的"麦克阿瑟事件"失去了爆炸性。结论中也有这样公正的意见，认为这位英雄一直是个麻烦人物，受到折磨的总统已经做了他必须做的事情。

回　顾

现在平心静气地回顾一下，麦克阿瑟将军那种一意孤行的违抗行为和难以置信的错误判断，给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和杜鲁门政府在美国的地位所带来的危害，看来不能说是估计过高的。在参议院的听证会期间，很大一部分讨论都围绕着这样一个问题，即这位将军那样违

抗命令，是否意味着可交军事法庭审判。我认为他大概还不至于如此，因此那些辩论都是离题太远了。这位将军肯定并不笨，完全明白政府要他做些什么。接替他的李奇微将军就了解得很清楚，并且实现了预期的目的。麦克阿瑟不同意那些预期的目的，却想用武力统一朝鲜，即使这个计划会卷入对中国的全面战争，而且很可能也会卷入对苏联的战争，也在所不顾。确实，他远远没有被这种前景所吓倒，而是象他给马丁众议员的信里所大力建议的那样，欢迎扩大战争，因为他觉得，在亚洲，“那些共产党阴谋家〔指苏联和中国〕已经决定要玩弄他们征服全球的把戏，而我们〔指他〕也已经参加了在战场上所引起的这个争端了”。既然已经参加了在亚洲战场上所引起的这个争端，即使不说他急于要，也很愿意在那里打个水落石出。面从9月27日指令起一直到他被解职时止，他的政府所告诉他的恰恰是不能这样做，即使弄得要从朝鲜撤退也必须避免这样做。尽管这样，他仍把自己的意志和命运推向彻底的失败。

在评价这件事的后果时，可以得出两点明显的结论：如果他照着大家同意的作战计划去做，失败以及由失败带来的军队伤亡和国家威信的损失是完全可以避免的；失败和麦克阿瑟在失败中的所作所为，深刻地改变了全国人民对战争的态度，同时也深刻地改变了我们盟国对美国政府在判断和领导能力方面，特别是在节制麦克阿瑟将军方面的信任。关于第一个结论，我们已经看到，当李奇微将军接受了第八集团军军长以后又接受了最高统帅职务的时候，他能够在吃了一次败仗后，面对着一个强

大的敌人，从更远的南方开始，把战线稳定下来(而这就是原来要求麦克阿瑟做的)，并且守住了这条战线。当麦克阿瑟将军在仁川登陆，北朝鲜人败退，没有遭到任何抵抗的时候，如果他能够在朝鲜中部占领一个坚固阵地、构筑防御工事，并把他的军队稳定下来的话，他本来也可以象李奇微那样，粉碎中国人的进攻的。

失败的影响是清楚的，这位将军对国内外的信任抱有毫不隐蔽的不满情绪也同样是清楚的。我国人民和盟国在接受杜鲁门总统对联合国在武力抵抗侵略方面的大胆领导所表示的热忱，甚至在撤退到釜山周围的艰苦战斗中和意外地发现北朝鲜的军队的勇敢顽强时，也一直没有消失。这种热忱，由于9月胜利和入侵南朝鲜的彻底崩溃而更加增强了。如果第八集团军按照9月27日计划和指令把朝鲜南方封闭起来，使它不再遭到攻击直至战争停止(正如后来终于发生的那样)，即使这样做还需要打几次硬仗来考验这条战线的力量(后来也这样做了)，那么国内外的舆论仍然是会稳定和团结的。

使我们盟国丧失信心的是，麦克阿瑟遭到了代价高昂的失败；他公开鼓吹扩大战争，而盟国对此都正确地认为是不能接受的冒险行动；政府在对他进行坚决控制方面犹豫不定。使我们国内人民感到不安和发生分裂的则是，从东京涌来的宣传浪潮说，造成麦克阿瑟的灾难的不是他本人的顽固和愚蠢，而是华盛顿的阴谋，而且这种阴谋可能不是从关心我们自己国家的利益出发的。这种宣传的方法和来源，从麦克阿瑟的参谋长考特尼·惠特尼将军后来吐露出来的这几句话里得到了很好的证明："那

个赢得了杜鲁门总统的信任，破坏了他的理智，以致使他对自己最优秀的军事专家的有经验的意见不理睬的人究竟是谁呢？这始终是华盛顿严格保守的一个秘密。国防部长路易斯·约翰逊肯定不赞成这种绥靖政策。因此，应当承担这一无法估量的错误责任的可能人物看来就是当时的国务卿迪安·艾奇逊了，他可能是在英国外交部的压力之下这样干的。”

这个麦卡锡的能干的学生也没有放过总统。惠特尼说，麦克阿瑟在威克岛向总统提出的“有保留的推测”，认为中国人不可能进行干涉，是根据这样一种假设得出来的，即干涉将招致有力的报复，中国不会继续成为避难所。一定有人告诉了中国人，说他们可以进行干涉而不会受到惩罚。他最后说，威克岛会议是总统为这位将军所设置的“一个狡猾的政治埋伏”。

惠特尼将军把所有高级官员都包括在反对他所崇拜的英雄的阴谋圈子里。这从他为这位将军破坏总统在我们军队第二次越过三八线前有意识地发出的声明所作的辩解，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他说：“事情的发生纯粹出于偶然，在他〔1951年3月24日的〕声明里以及在他声明中提到不要把解决战争牵涉到福摩萨问题和联合国席位问题的那些话里，麦克阿瑟单刀直人地戳穿了美国历史上的最卑鄙的阴谋之一。这也许不是偶然的，而是出于直觉吗？有一点我是清楚的，如果麦克阿瑟完全知道他要捅的是一个黄蜂窝，他还是不会罢手的。”这最后一句话我倒是相信的。这股毒汁的不断渗出，象麦卡锡过去搞的那样，对美国公众具有极大的毒化作用。也象麦卡锡的

毒汁一样，被共和党右派巧妙地利用了，产生了败坏这个政府机关信用的后果，其影响所及，远比那些把这种污蔑谰言信以为真的人多得多。象空气污染一样，一个人不一定相信它就已经中毒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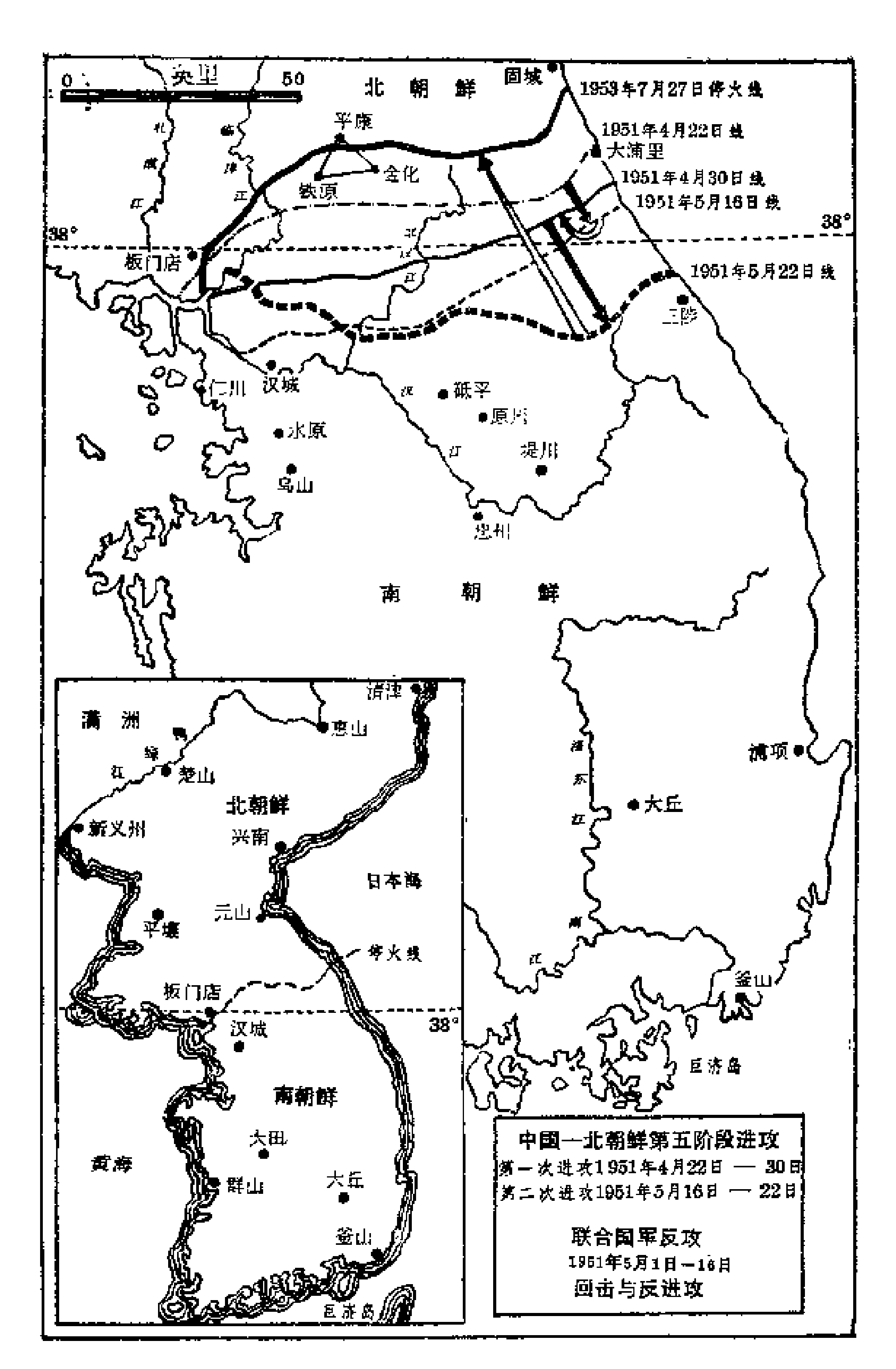
国内外对我国外交事务方面的行动丧失信心，并不是我们外交政策改变的近因，但它增加了我们的困难，并从而减低了我们的工作效能。我们将会看到由此而产生的一种表现是，我们在联合国失去了支持，并在反对不明智的提案时要付出更大的精力。另一种表现是世界其他地区日益反对美国的政策和利益。这种反对的火焰是由苏联在1951年巧妙而又有力地煽动起来的。

二十七　走向朝鲜停战的一步

在麦克阿瑟将军被解职和李奇微将军继任盟军最高统帅的时候，联合国军正在“堪萨斯线”掘壕固守，中国人的攻势则预示有加强的迹象。李奇微将军为了应付这一进攻，在他战线的中部先向“犹他线”，然后向“怀俄明线”作了向前突出的推进。麦克阿瑟将军被解职十天后，进攻以极大的火力爆发了，并且持续达一个月，中间由于范佛里特将军的反攻而受到阻遏。

由于南朝鲜军队在压力之下连续溃败，战线被打开了缺口，第八集团军有两个星期一直后撤。尽管这样，他们并不让任何一个缺口形成一种突破。第八集团军退过三八线后，它就用阵地去换取敌军的沉重损失。在中国人的第一次攻击已告衰疲时，李奇微将军重新开始进攻，在他作好坚强准备的阵地上，整顿了他的战线，并严禁他的军队采取分散或向外伸展的追击。5月中旬，中国人又开始进攻了，但是，到了月底，在遭到重大损失后，都逃往三八线以北去了。第八集团军沉着地进行了追击，很快就在南朝鲜肃清了敌军，恢复了“堪萨斯线”的阵地，探明了敌军已在更北的地方构筑坚强阵地。

6月初，白宫、国务院、五角大楼和在东京的最高统帅部发现，自从战争开始以来，他们第一次在政治目标、



北朝鲜
固城
1953年7月27日停火线
1951年4月22日线
大浦里
1951年4月30日线
1951年5月16日线
1951年5月22日线
平康
金化
铁原
板门店
汉城
仁川
水原
乌山
砥平
原州
堤川
忠州
南朝鲜
大丘
浦项
釜山
巨济岛
满洲
清津
惠山
楚山
新义州
兴南
日本海
元山
平壤
停火线
黄海
大田
群山
中国—北朝鲜第五阶段进攻
第一次进攻1951年4月22日 — 30日
第二次进攻1951年5月16日 — 22日
联合国军反攻
1951年5月1日—16日
回击与反进攻

图 4 （按原图详制）

战略和战术方面有了统一的看法。政治目标是要制止侵略，把朝鲜的统一留待将来通过种种政治措施解决。战略是要在"堪萨斯-怀俄明"一线和它北面的"钵形盆地"打出一个结果来，哪怕是需要打整个夏季，或者两个夏季以上的时间都在所不顾。我们的战术是诱敌进犯坚强设防的战线，而通过事先准备好和校准了的射界予以痛击。经验已给我们上了代价高昂的一课：把中国人赶回到他们的边境（他们获得增援和供应的来源地），只会增加他们的力量，——正如赫尔克里士把安泰斯摔在他的大地母亲身上就会增强安泰斯的力量一样[①]——而减弱我们自己的力量，因为我们的军队向北推进，就会削弱我们的供应线，分散我们的兵力，同空军的支援失却联络。有些将军，包括范佛里特和马克·克拉克在内，后来宣称他们一直没有捞到获得全胜的机会，这是在平静的日子里放马后炮。

在李奇微将军把共产党往北推的时候，我有机会向国会和公众阐明联合国军司令部的战争目的与联合国长远的政治目的二者之间的区别，这些长远政治目的已在1947年第一次声明过，后来又分别在1950年10月7日和1951年5月18日的决议案中重申过。但是，在1950年10月到1951年4月这段期间里，都被麦克阿瑟将军的能言善辩搞得含混不清了；当时，这位将军置杜鲁门总统的命令于不顾，一再发表言论和采取行动。在1951年6月1日和2日的麦克阿瑟事件听证会上，我两次利用

① 据希腊神话，赫尔克里士是一个巨人，安泰斯是土地之神的儿子，安泰斯只要一接触到土地，就有无穷的力量。——译者

机会毫不含糊地阐明了这一区别。

艾奇逊国务卿：我们的目的是要制止进攻，结束对那个〔朝鲜〕政府的侵略，恢复和平，防止再度发生侵略。据我们了解，这些就是联合国军为之而战的军事目的。

联合国从1947年以来，美国从1943年或1944年以来〔1943年12月1日发表开罗宣言〕，一贯主张建立一个统一、自由和民主的朝鲜。这至今仍然是我们的目的，也仍然是联合国的目的。

我并不把它理解为一个战争的目的。换句话说，这个目的不是谋求通过战争来达到，而是谋求通过和平手段来达到，正如我们在这次侵略以前试图做的那样。

主席康纳利：是说在战争以后——在战争结束以后通过和平手段。

艾奇逊国务卿：是的，先生。

第二天上午，新泽西州参议员史密斯又就这个问题质询我，并特别问我，我的答复是否暗示“有可能在三八线或者接近三八线实行停火”？我答复说：“如果能够有一个真正的解决办法，那就完成了在朝鲜的军事目的。这就是说，如果侵略得以制止，可以得到不会再度发生侵略的可靠保证，就能回到和平时期的状态，我们就可以希望逐步从朝鲜撤军，包括中国的军队和联合国的军队在内。”

虽然在联合国和我们盟国之间的外交战线上比较平静，但我们不能指望它一直会这样平静。经过几个月的努力，联合国终于在5月18日通过了一项对中国和北朝鲜禁运重要战略物资的决议。但是，一项决议和实际上

的禁运并不是一回事；大会仍常常需要对那些继续出口的国家实行制裁。我们还记得联合国第一委员会的五项讨论原则所造成的痛苦，当时我们国务院的人都认为最好接受这些原则，而我们的同胞却毫不含糊地拒不接受。我们不再迫切希望联合国进一步采取主动，而是要靠我们自己想出办法来了。唯一有希望的途径就是停战，因为停战也许可以逐步达到结束交战状态。看来一个双方同意的和平解决办法是不可能实现的，即使实现也是不可靠的。我们一致同意的结论是：通过联合国的公开程序或者通过象印度这类容易泄密的外交部去进行试探，都是注定要失败的。

和平试探

于是我们就象一群猎狗那样到处寻找线索。第一次是由当时在巴黎玫瑰宫的查尔斯·波伦向驻德国的苏联管制委员会主席的政治顾问弗拉基米尔·西蒙诺夫进行试探，结果一无所获。随后在联合国的欧内斯特·格罗斯和托马斯·科里从马立克，也可能从苏联驻联合国副代表西门·查拉普金的非正式谈话里（也可能是两个人都谈过的）隐约地找到了一点线索。类似的谣传顿即出现在《纽约时报》上，它引起了俄国人的抗议和否认，而这样一来线索又消失了。这种渠道证明是太不正规化了。这时，我们得到可靠方面的信件提出的建议，说我们同北京进行接触也许更为有效。我们通过美国和瑞典通向莫斯科的渠道秘密试探了一下，还是没有结果。政策设计办

公室的查尔斯·伯顿·马歇尔前往香港，并表示准备进行接触，仍然没有成功。但是，在总统批准下作出的最后一次努力却产生了效果，其中有些是事先没有预料到的。

凯南和马立克的会谈

我们的同事乔治·凯南在国务院的休假期间，正在普林斯顿大学的研究所里工作。马修斯博士想起了1949年杰塞普在柏林封锁问题上同马立克会谈的成功经验，要求凯南在1951年5月中旬前来华盛顿同他和我晤谈。我们要求他去会见马立克。凯南那时虽然不是政府机关的一员，但是，同政府机关很接近，而且对美苏关系深感兴趣(事实上他那时正在写一本关于这方面的历史)。他们可以进行认真的交谈而不必作出任何承诺。我们两个国家在朝鲜问题上似乎正在走向一场可能是最危险的冲突。这肯定不是美国的行动和政策的目的。我们也很难相信这会是苏联所希望的。不管北京是否希望这样，看来中国人所导引的航向不可避免地会招致这样的结果。要制止这个引向严重麻烦的趋势，看来唯一的办法是使在朝鲜的双方军队就地停战和停火。我们很想知道莫斯科对这一形势的看法，也想知道，如果有什么建议的话，那将是什么样的建议。同时我们希望莫斯科能够真正了解我们的愿望和意图。如果要结束战争的话，这正是着手结束战争的良好时机。

我们并不要乔治去进行谈判，只是要他弄清楚我们的目的和意图是否已为俄国人所完全了解，弄清楚他们

是否已如实地意识到一切正处于动荡不定的局面以及十分可能导致的结局。他同意接受这个使命，并按照他自己的方式单独去完成。我们还通过参谋长联席会议让李奇微也知道正在进行的这一活动，他应该作好准备，对一切有关军事问题提供意见，并在战场上根据需要配合行动。他对这一新情况表示欢迎。

乔治写了一封亲笔信，由我们驻联合国代表团的一个年轻助理人员送到纽约马立克的公寓，信中要求去看他，并要他打电话到普林斯顿大学给他一个答复。回音很快就来了，请他到长岛马立克的避暑别墅去。凯南从普林斯顿驱车前往。他们在5月31日单独会见，并用俄语交谈。初见面时，马立克把一盘水果和酒打翻在自己身上，他克服了窘态之后，他们便转弯抹角地接触到了这个问题。早就估计到马立克是不可能对这个问题作出答复的，于是他们又转弯抹角地离开了这个问题。马立克同意让他对这一问题加以考虑后再次会面，这是向莫斯科请示的一种委婉说法。下一个星期，6月5日，他们再次会晤了，这时，马立克已能够告诉他，苏联政府希望和平，并且希望尽快和平解决朝鲜问题。但是，他们不便参加停火讨论。马立克个人建议去找北朝鲜人和中国人谈。我们大家谁也不怀疑这个信息的真实性，但这仍然带有一种巫婆讲话的味道，教我们捉摸不定究竟预示着什么，我们下一步又该做些什么。

后来，很快就得到了澄清。6月23日，马立克在联合国的广播节目中发表了一篇演说。他说，苏联人民认为，朝鲜的冲突是能够解决的："作为第一步，交战双方应

该开始就停火与休战进行讨论，规定双方都把军队撤离三八线。”他问：能够采取这种步骤吗？他自己回答说：能够，只要双方都有结束战争的真诚愿望。这听起来很象是代表官方的，但是，在国内外，在公私场合上，人们都对此表示怀疑。通过驻莫斯科的柯克大使的探询，证实了马立克表达的观点正是苏联政府的观点，至于中国方面的观点，葛罗米柯还不知悉。

决定通过李奇微进行谈判

派有军队参加联合国军司令部的各国大使会面后，同意开始谈判。问题是如何开始谈判。多数都坚决主张应由战场上的双方司令官举行军事会谈，理由如下：

第一，因为无论中国当局或北朝鲜当局都不是美国所承认的正式实体。

第二，因为最好是把共产党方面早些时候试图提出的一些政治性问题，诸如福摩萨问题、承认共产党中国和它在联合国的席位问题，以及印度支那问题排除在谈判之外。

第三，因为伍修权将军代表中国参加纽约联合国大会一事，已令人确信联合国是最不适宜进行讨论的场所。

第四，因为有希望进行谈判的这一事实是受战场上双方力量对比所支配的。

第五，因为无论中国共产党或苏联政府，都对在朝鲜的中国军队不承担任何责任。他们被认为是“志愿军”，一切行动由他们自己负责。但是，葛罗米柯向柯克大使

打算发表的同类性质声明的信口开河的狂妄言语相比之下，两者真有天渊之别。再说总统三个月前的那项拟议中的声明——不是更早的一个声明——如果是发出了的话，本可能会产生有利的反应。李奇微将军六个月的艰苦战斗以及他给予敌军的沉重打击，已急剧地扭转了局势。此外，他的行动还使人们对美国政府的光明正大的态度恢复了尊重。

谈判开始时的混乱

7月2日，共产党司令官对李奇微将军的通知作了赞同的答复。李奇微将军原来建议会议在元山港的一艘丹麦伤兵船上举行，但是他们提出在开城，它是当时处于双方战线之间的一个小镇。李奇微将军接受了这个变动，代表团就在7月10日会晤了。我们几乎立刻就体会到一个世纪前布雷特·哈特[①]观察的正确性：

至于那些阴险的手法，
至于那些枉费心机的花招，
信异教的中国人是特有的。

当李奇微将军同意把开城作为谈判地点时，它是处在双方战线之间的，但是，到了谈判开始时，共产党已把它包围起来，并举行了一次傲慢无礼的宣传示威，以他们惯用的粗鲁无礼的手段排斥所有盟国的新闻记者。于是我们中断了接触，直到他们使会议地点恢复了中立状态为止。

随后我们就陷于现在大家都很熟悉的对议程项目的

① 布雷特·哈特(1836—1902)，美国小说家。——译者

争论中。争论是由中国人提出的议程上前面两个带有实质性的项目引起的。第一项是“确定三八线为双方的军事分界线和建立非军事地区，作为在朝鲜停战的基本条件”；第二项是“从朝鲜撤出一切外国军队”。对这两项我们一项也不能接受。三八线已被充分证明是无法防守的，同时，对我们来说，它没有任何政治上或历史上的意义。我们无意放弃“堪萨斯线”上的坚固阵地；实际上我们还希望加强这些阵地。第二项是人所共知的共产党宣传，这在亚洲和欧洲已宣传了好几个月了。他们的目的当然是要把美国军队赶回北美去。

由于预料到在这些项目上的口头争吵可能会象在玫瑰宫里那样花上几个月时间，马歇尔将军和我就分别发表了公开声明。我在前面已经说过，李承晚总统对停战谈判感到极为不安。我们怀疑他的精神状态能否经得住在开城所进行的一场长期的宣传战。这场宣传战的目的是想在停战后让南朝鲜军队在没有盟国支持的情况下留在一条无法防守的战线上。我的声明发表于7月19日，马歇尔将军的声明则发表于24日。我们都有力地断言，撤退外国军队是一个政治问题，不宜由商议停战的司令官们进行讨论。我们说，联合国军必须而且将继续留在朝鲜，直到和平牢固地建立为止。这使李承晚总统得到很大的安慰。据穆西奥说，他认为这个“信息很好，令人感到很放心，也正是我们所想望的”。朝鲜国民议会还通过了一封感谢信。杜鲁门总统指示我们要坚持这个方针，并同他保持密切联系。

但是，大出我们意料的是，共产党突然放弃了对议程

的咬文嚼字的论战。他们修改了关于军事分界线和非军事地区这一项目的文字，使其不再涉及任何一条特定的战线，同时还放弃了关于撤军的项目。尽管这样，当会议进入到讨论议程的议题时，他们又明白表示，至少在三八线问题上他们一点也没有改变自己的实质性立场。分界线仍旧必须是三八线。经过了两个星期才对议程达成了协议，这是一种惊人的成绩。于是我们定下心来进行讨论了；幸而我们当时没有意识到，要两年以后才能达成最后的协议，就是对第一个项目达成协议也要花上六个月时间。

这种情况是怎样发生的？为什么会发生的？是我们受了骗，被引进了一个无休无止的宣传泥坑了吗？在一定程度上是这样。是由于放松了对敌人施加军事压力吗？在1951年肯定不是这样。是由于俄国人改变了主意，或者俄国人同中国人发生了意见分歧吗？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后者。我认为，原因要比这些年来所作的许多简单化的解释复杂得多。我认为，其中有一个原因（当时我没有觉察到）是我们自己造成的，并且是在一开始就发生的。

在这些事情过了三年之后，我们中间一些深深卷进旋涡的人，象老兵那样，不时集合在一起，总要讨论过去的战役，而且比之当年事态紧迫的处境，我们可以用更多的时间和更加客观的态度来分析过去我们和其他人为什么要那样做的原因。有一次在我们会见时，我的同事中有些人提到，当我们在开城表示坚决要把不接受三八线为停战线作为一项主要原则时，俄国人和中国人很可能

感到惊讶和懊恼，并且觉得是受了骗。他们之所以可能有这种感觉，有几个原因。第一，凯南同马立克谈话时，第八集团军还只是刚刚越过三八线，它的西翼确实在三八线以南。虽然凯南只是含糊地提到了一条停战线，但马立克却在他的广播演说中十分明确地提到“双方把军队撤离三八线”。而且我们最初提出的议程规定“讨论仅限于有关朝鲜的纯军事问题”，同时，从日本投降以来，我们一直坚持三八线完全是一条军事线，别无政治上的意义。因此，现在要变更它，在共产党看来，就很可能具有政治意义了。甚至更加重要的是(这是我们在1945年选定这条线时，以及迟至1951年都不知道的)，原来在日俄战争和朝鲜被日本并吞之前，三八线对俄罗斯帝国和日本帝国来说都是一条最重要的线，因为这条线是日本提出而遭到俄国拒绝的一条线，俄国人当时认为这样划分会使他们在朝鲜的势力范围受到太大的限制。

所以，据我看来，事情很可能是这样：他们代表俄国人和中国人出席会议时，原来认为谈判是为了要恢复“以前的状态”，而在一开始他们就发现我们提出的是一条有利于我们势力范围的新界线，它不仅具有更重要的军事意义，而且势将使他们大大丧失威望，这就使他们大为震惊。他们决不会想到，这经过看来好象是在玩弄诡计，实际上却完全是由于我们方面的粗心大意。这恰恰是他们喜欢玩弄的一种策略。

将近1951年7月底时，我在答复赫伯特·莫里森寄来的那封很有见解的信里，在推测这些谈判将会产生一些什么以及它们可能造成什么后果时，顺便设想到未来

的情况。我认为，中国人的目标也许比俄国人的更狭小而更注意眼前，前者更专注于控制朝鲜半岛，而后者则着眼于一个更为远大的目标，要使西方放慢或停止它们的军事防务。但是，我们很难从这一分歧中得到好处。我认为“朝鲜问题总解决”的前景并不是美好的，而这也是莫里森的看法。共产党希望全部排除我们在朝鲜的势力；而麦克阿瑟那个以武力统一朝鲜的目的却使我们付出的代价大大超过我们准备付出的代价。因此，我把停战看作是我们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必须接受的一个现实，并且必须适应这个目标。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必须提防李承晚由于他的“重新统一狂”而带来麻烦。他对任何不能满足他愿望的东西都会反对，还可能试图加以阻挠。所以我认为，最好是不要去寻求一个空中楼阁的总解决，而是要坚持达到停战的目的，使能在一个有利于我们防守的条件下结束战争，同时使联合国军队能留驻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从而可能逐步巩固成为一次可以维持下去的和平。莫里森对我们抱有相同的见解而感到高兴。他说，我们现在必须等着看它的发展。我们也正是这样等待着。

谈判中断，战争继续进行

在开城，时间全部消磨在反复讨论分界线问题上。从8月4日到10日，由于中国部队破坏会议区的中立化，讨论中断了一星期。我方谈判者，由于跋涉在没有尽头的迂回曲折的路上而弄得灰心丧气（这是完全可以理解

的)，因而要求我们给共产党一个时限，要他们在两者之间作出抉择，如果他们不这样做，我们就终止谈判。但是，我们在华盛顿的人感到，事情已经发展到这种地步，我们必须把破坏谈判的责任完全推到对方身上。8月20日，又露出了一线希望的曙光，当时，共产党似乎愿意考虑以定局那一天的“接触线”作为停战分界线，而不愿考虑以我们所说的“作战线的一般区域”作为停战分界线。但是，我们还没有来得及探索这个说法的含义，对方就中断了谈判，指控有一架美国飞机轰炸并扫射了开城。联合国军司令部调查了这一指控后加以否认。9月6日，李奇微将军建议在一个新地点恢复谈判。但是，四天之后，我们的一架飞机真的扫射了开城会址。在我们采取了适当的纪律措施后，共产党由于他们的自尊心得到了满足，建议恢复谈判，但仍应在开城而不是在新地点。这又引起一场关于会议程序的新论战。

自从进入战争的第二年以来，谈判和战争一直在同时进行，从我们的角度来看，后者进行得更为顺利。战地司令官们作了一次战略检查后，反对向平壤—元山一线的朝鲜瓶颈部分推进，而赞成夺取“钵形盆地”周围的敌军阵地，从而加强并缩短“堪萨斯线”。这些都是共产党人可以向“堪萨斯线”进行纵射的坚固阵地。初秋时光，经过激烈战斗，双方都遭到重大伤亡，第八集团军拿下了“鲜血岭”后又进行了另一次攻击，夺到了威胁着它右翼的另一个敌人的坚强据点。被很恰当地称为“伤心岭”的阵地，在10月中旬落到我们手中。

在板门店恢复谈判

大约一个星期以后，可能是在我们军队这些胜利的促动下，中国人接受了李奇微将军的建议，同意在中立的非占领区的板门店恢复谈判。这年夏天，我安排国务院拟订了应当遵循的各种行动计划，或者是谈判成功，战争结束；或者是谈判失败，敌人加强进攻。据我看来，我们不可避免地而且不用很久就会面临这两种可能发生的情况中的一种。但是，我们虽然又继续任职了一年半，却并没有遇到以上两种情况中的任何一种。在此期间，战争既没有停止，也没有再加剧。它象一条具有不祥之兆和无限危险的龙安睡在那里，左近又没有可以杀死它的圣乔治①在。

事后，职业战士和坐在办公室里的战士都批评政府没有对敌军继续加强攻势的压力，从而加速缔结停战协定。我可以高兴地说，最高统帅对他士兵的生命没有采取这种冷酷无情的态度，正如李奇微将军本人告诉我们的，他尽了他最大努力把我们的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一经把他的战线部署完善以后就没有再采取大规模的进攻。

国务院的研究工作产生了两部作品，那就是所谓“乐观的文件”和“悲观的文件”。它们的主要价值在于向我们肯定地指出，自从麦克阿瑟危机那些日子以来，再没有产生什么新想法了。它们确认了我们大家（不论是军人还是文官）的见解，即我们所坚持的是唯一正确的方针，

① 中世纪欧洲神话中的骑士，传说他曾杀死一条大毒龙。——译者

我们必须同心协力使其实现。如果说我们还需要进一步的确认，那么，我们也可以从9月间莫里森和舒曼的访问以及我们同他们的会谈中得到。

他们对朝鲜战争的热情已经达到了无可再低的最低点。正如我们一样，他们也认为那份指望通过谈判解决朝鲜问题的“乐观的文件”是超越了可能性的范围的。而那份“悲观的文件”又使他们感到害怕。可能轰炸中国基地，封锁中国，贸易禁运，以及俄国可能对远东或中东进行干涉，加速重新武装日本的建议，所有这些，在他们看来，正如在我们看来一样似乎都是危险的，不可取的。但是，我们都越来越是需要寻找新的行动场所了。英国人方面又传来害怕香港遭殃，害怕可能会把中国人推向俄国人怀抱或者把俄国人推向中国人怀抱这些熟悉的解说。我常常遗憾地认为，如果美国被逼得太厉害，看来是不会有人乐意伸出双臂来拥抱我们的。

二十八　缔结对日和约

去旧金山之路

对日和约本身将是一纸重建和平的简短文件，没有写下惩罚性的条款，也没有要日本承担赔款、由外国占领或限制军备。如果双方同意，将由一项双边的美日防御条约规定如何由美国对日本实行军事保护，以及在日本建立军事设施。如有必要，美国还可以同那些担心日本进行侵略的远东国家分别签订安全协定。所有这些条约，都将由美国通过外交途径进行谈判。如果大家同意的话，所有合作的国家将举行一次会议，而不必再就条约作进一步的谈判。

此外，我们有约翰·福斯特·杜勒斯这样一位在国内为政府和反对党都可以接受的谈判者。他同国务院的工作紧密配合，手下有远东司的主要成员，又同总统和我都保持密切联系，我们和他在政府的内部斗争中始终是站在一起的。他在国会中，特别是在参议院中，应付他的共和党同事时，自有他的一套办法，他在同世界各国进行的许多谈判中也是如此。国务院与白宫在这些场合经常把重炮搬出来帮助他。

一旦政府内部对应该采取的方针取得了一致的意

见（这一点自从1951年初就已如此）后，这些复杂的条约的准备工作，以及对那些真正愿意参加签约国家提出的可能解决的问题所进行的谈判工作，在短短八个月期间就完成了。这是多么紧张动人的八个月啊！这段期间，经历了大辩论，麦克阿瑟将军的被解职和参议院对此事的质询，朝鲜战场的稳定，以及开始停战谈判。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完成条约的谈判，就需要在明智的指导下，不断在紧张中作出精力集中的努力。这些都是杜勒斯先生和他那些能干的助手所具备的。在应付反对者的时候，还需要一种有时达到残酷无情程度的决心。不论苏联和印度反对我们的计划是出于什么意图，但是，如果我们受它们所支配，其结果一定会造成拖延或分裂。因此我们一直把情况通知这两个政府，并给予磋商的充分机会。但是，我们自己很早就认识到，这两个政府谁都不愿意签署任何条约，因此我们表明，即使没有他们（最后还包括缅甸和南斯拉夫），我们还是愿意进行这件事，不作任何让步。尽管苏联不断提出进行公开辩论的要求，我们也不退缩，反而热情地接受了。我们把1951年5月19日致莫斯科的照会呈报了白宫，发回时它上面附有这样一句话："迪安：这份文件是一件珍宝。杜鲁门。"同样，我们也对那些以要求赔偿作为同意签约的条件的国家说明，日本无力支付货币赔偿，我们也不会要它这样做。日本人是愿意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同他们进行谈判的。

1951年1月至2月间，杜勒斯先生第一次正式谈判的远征，使我们同吉田茂首相的政府以及日本的大部分舆论对条约的主要方针和形式取得了相当牢靠的一致意

见，让菲律宾人继续在做他们八十亿美元赔款的迷梦，而使澳大利亚人和新西兰人讲求现实地认识到赔款是不可能的；与其在对日条约中订上惩罚性或限制性的条款，还不如同我们建立安全关系。当时以及后来，在有关安全安排的各种互相对抗的意见提出来时，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出，以美国在这个地区的关系为核心而订立一系列彼此连结的协定将是最能被接受的。英国人愿意勉强接受这个解决办法，认为这对他们的总的利益，特别是对他们在马来亚和香港的地位不相矛盾。他们自己也在草拟一份条约。到3月底，我们已把条约写成文字，分送给各主要有关方面，还把一份初步草案的纲要交给公众讨论并征求意见。接着就发生了麦克阿瑟被撤职和杜勒斯访问日本去稳住日本人的事件。

杜勒斯回国时，条约的竞赛已进入半决赛阶段。由于大多数申请缔结安全条约的国家只希望同我国单独签订而不愿同其他国家一起签订条约，因此，我们同意同日本和菲律宾分别订约，同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一起订约，因为这两个国家彼此之间的容忍已达到如此程度。英国人已从原来暧昧的态度，发展到同我们合作的阶段，4月初他们把自己的条约草案送来华盛顿；该月月底，一个起草小组来到华盛顿，共同进行把两个文本合并成一份英美联合建议的工作。我们虽然更喜欢自己那个文本的简短的形式，但是，如果在内容上能够取得一致意见，我们并没有因文章是自己的好而不采用一些冗长的词句。杜勒斯先生访问欧洲时在伦敦逗留期间，通过去芜存菁的方法，解决了两个以前未曾解决的重要问题。在关于日本

人应当把福摩萨、千岛群岛和库页岛南部的主权移交给谁接管这个分岐问题上，以不说明由谁接管，只简单规定日本放弃主权而解决了。在解决应当邀请国民党中国抑或共产党中国（或者双方一起邀请，或者一个也不邀请）参加的问题上，则决定双方都不邀请，同时规定日本应于和约生效后的最初三年期间，同所有曾对日本交战并遵守1942年1月1日联合国宣言的国家签订类似的双边和约。关于日本将来对中国的态度，他们同意"必须由日本依据本条约赋予的主权和独立地位自行作出决定"。

杜勒斯先生去巴黎的时候，他面对着下述三个要求：第一，要求日本赔款二十亿美元；第二，要求与日本签订一项贸易协定，以保障法国在印度支那的利益；第三，要求印度支那三个有联系的国家参加条约签字。第一个要求被丢开不提了，第二个要求留待双边谈判，第三个要求最后被接受了。有不少国家，包括荷兰、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都由于得不到赔款而一直感到不快，对签署条约一事，十分勉强。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届时自会解决的问题。

现在我们进入条约准备工作的最后阶段了。在这一阶段中，最后文本已经拟妥，出席会议的邀请书已经发出，两个有争论的问题已经解决，或者一般认为已经解决了。其中一个问题是关于五角大楼的最后立场；另一个问题是关于澳大利亚人和各军种参谋长之间的争论。有关第一个问题，这是通过一种迂回曲折或者旁敲侧击的方式最后一次提出来的，参谋长们一再坚持要把条约的

生效期推迟到朝鲜战争结束以后。由于国务院拒不让步，我们就把这个问题提给总统。洛维特在马歇尔将军的同意下放弃了原来的立场，参谋长们在陷于孤立和被多数压倒的情况下也准备同意使和约立即生效。可是我们给了他们一个安慰奖，就是在有关澳大利亚一新西兰一美国（美澳新）安全条约的争论中，我们支持他们反对澳大利亚人企图与我们的各军种参谋长建立某种联合计划关系。我们担心，在条约中订入这种关系会引起仿效，因而把它取消了。但是，澳大利亚外长珀西·斯彭德（后来被封为珀西爵士）在表示同意时，认为他从杜勒斯先生那里得到的印象是仍然存在着一种非正式的关系，虽然实际上并不曾有过这种意图。一年后，我们第一次在夏威夷开会时，就在这一点上引起了麻烦。

7月20日，我们把一份尚未最后定稿的英美对日和约草案正式分发给所有对日交战的国家（更早的一稿它们都已经看过），征求它们的意见。随该件一同发出的有一份美国政府的邀请书，邀请各国参加对日和约的缔结和签订会议，这是根据英国和美国提出的要在8月13日分发的文本的条款进行的。会议将于1951年9月4日在旧金山开幕。在签字前的几个星期里，从来不曾有过象那么好的和约会被那么多的参加签署者那么不欢喜。条约的联合发起人英国政府（通过国务大臣肯尼思·扬格）认为，它是必要的，“尽管人们对它毫不感到热情”。澳大利亚政府表示勉强支持，但是反对党则表示强烈反时。法国国民议会的外交委员会对没有法国参加条约起草工作一事表示遗憾。荷兰政府虽然接受了邀请，却保留对

签字的行动自由。缅甸、印度和南斯拉夫则拒绝参加。日本的中立分子也吹毛求疵。大大出人意料的是，苏联接受邀请前来参加，由外交部副部长安德烈·葛罗米柯率领代表团来“提出苏联政府的建议”。这引起了杜勒斯发表一篇近乎惊慌失措的声明。他说，“凡是有责任感的国家”都不应让俄国人成为一支“营救队”①。但是，国务院却比较沉着地认为，这是根据一个特定文本的条款“邀请前来参加‘一次缔结和签订条约的会议’”，而不是“就和约条款重新开始谈判”。我们立刻着手进行工作，以保证会议确实是按照这一性质进行的。

议 事 规 则

当俄国人通知我们说，他们将来参加会议，并提出他们自己的对日议和的建议时，我毫不怀疑认为，一次防止“营救”行动的任务将落到我的肩上了。对于象我这样一个曾在众议院议长兼参议院规则委员会主席萨姆·雷伯恩下面受过长期训练的人来说，这并不是一个棘手的问题。但是，这的确需要经验和一定程度的办事手腕，对此我认为我还得弥补自己的不足。在这方面福斯特·杜勒斯对我作出了贡献。他同我商量了我们两人在即将召开的会议中应该分别充当的角色。他建议，应该由他担任主要发言人，并充当使会议通过这个条约的向导，因为他更熟悉谈判情况；而我则应该担任主席这个尊敬的职位。我

① 在英语中，“营救”和“破坏”都是“wrecking”，杜勒斯的话在这里含有双关意义。——译者

原来设想的议事程序里，既不用主要发言人也不用向导，但是看来还是接受他的建议为好。

按照众议院的议事程序，议案通过规则委员会的报告提出来时，还附有如何讨论这一议案的规则。一种是“开放性规则”，它可以容许对议案提出修正，并规定对每一修正案的辩论时间以及对修正后的议案的辩论时间。一种是“封闭性规则”，它通常不允许修正，但也规定辩论的时间，此后“不经修正也不再有拖延时间的程序”就将议案付诸表决。只要议事规则是按照这一方式草拟出来的，并且参加会议的大多数国家都支持我，我就可以有信心地认为我们能够阻止“营救”行动。于是我着手准备创造这两个条件。

议事规则本身非常简单明了。它们规定会议将按照美国发出的邀请书进行。临时主席将由美国代表团团长担任，也就是由我担任；常务主席和其他工作人员将由参加国通过多数票选出。对其他一般规定，如大会所用的正式语言、席位座次以及代表资格审查等也都作了安排。然后轮到了具有关键性的条款，这里还是引用它的原文：

第十七条　　鉴于这次会议职权范围的特定性和限制性，在通过会议规则后，会议应将其工作限于以下几项：

1．选举工作人员。

2．代表资格审查报告。

3．联合负责条约文本的两国政府代表发言。

4．参加国代表团发言。

5．秘书长就条约的不同语言文本的一致性提出报告。

6．对日和约签署仪式。

规则还限定每一个代表团的发言不得超过一小时。如果所有代表团发言后还有人要求发言，将由会议决定在何种情况下可以作何种发言。凡未事先得到会议主席认可者均不得发言。会议主席可以要求发言人停止发言，并有权撤消他的认可。任何代表都可以提出维持会场秩序的要求。对会议主席的裁决有异议时，应当不经辩论径付表决。关于延会、休会以及结束辩论的动议，应在所有其他动议中占优先地位，并不得对此进行辩论。

这些都是严格的规则。加拿大人和澳大利亚人认为，这些规则不但同他们本国议会的习惯不一样，也与联合国大会的规定不相同；他们可能感到难以公开支持这些规则。但是，我并不为他们所动，坚决表示我们决心要获得一个结果，而俄国人所能同意的那种规则只会使我们得不到任何结果。最后我们对那些墨守议会习惯者作了一些让步，准许在获得多数同意的情形下可以作“第二轮”发言。

我计划中的会议关键时刻，是在规则获得通过前的最初片刻，因为那时可能有一个老练的反对者获得发言权并开个玩笑，那就会使会场难以控制。但是，只要规则一经通过而我仍是担任主席，掌握着多数代表团，就可以完全控制住俄国人了。因此，议程第一项必须是一项提出通过这个规则的动议。为此临时主席就得象霍雷修斯一样，要有两个勇敢而可靠的伙伴，[①]一个提出动议，一个予以附议。我们找到了新西兰驻华盛顿大使卡尔·贝

① 引古罗马勇士霍雷修斯的故事，他去台伯河桥上拒敌时，曾要求有两位壮士协助他。见麦考利《古罗马之歌》。——译者

伦特森爵士充当前者，而由古巴的国务部长奥斯卡·甘斯充当后者。

我在准备旧金山战役的同时，并没有忽视我们的后方。8月30日，经过总统批准后，我把迪安·腊斯克起草的一份备忘录提请国家安全委员会予以正式批准。备忘录指出，这次会议可能会加剧国际紧张局势。苏联在发现它不可能通过议会手段来阻止条约的签订时，可能采取“突击战术”来减少签字国的数目，降低条约在亚洲的影响，把它拖延下去，对它进行修改，或者引起日本人的恐惧。苏联也可能提出一项与此相对抗的条约，攻击我们的安全协定，或者在朝鲜发动一次大规模攻势，或者提出一份类似最后通牒的东西。我们代表团必须准备好，对各种行动立刻作出反应，并要求授权在现有指示范围内这样去做——那就是，使条约尽快地签订和执行，拒绝重新进行谈判，决不对远东以及其他地区的事端作出妥协。我们将同华盛顿经常保持接触，但我要求在必要时授权作出决定和采取行动。由于有巴克利副总统的坚决支持，并得到其他一些人的同意，总统立即批准了我的要求，并把备忘录和他的批示都记录在卷。

会　议

8月30日，在离开华盛顿之前，卡洛斯·罗慕洛外交部长和我在杜鲁门总统和季里诺总统参加下签订了菲律宾一美国共同防御条约，随后我们到布莱尔大厦参加正式宴会并发表演说，这些演说并没有留下什么反响。

同样地，新西兰驻美大使贝伦特森爵士和澳大利亚驻美大使斯彭德抵达旧金山后，他们于9月1日星期六在美丽的要塞区金门古堡同我一起签订了美澳新条约，接着在费尔蒙特举行了招待会和三方面的宴会。

第二天就开始了一系列紧张活动，以对付抱有不同意见的人，团结我们的大多数。日本的吉田茂首相率领他的代表团来看我，其中有我的一位老朋友武内龙次，他是当时驻华盛顿的日本政府海外办事处主任，十年后他成为日本驻华盛顿大使。我和首相在那里建立的亲密友谊，一直持续到他去世为止。他那敏捷的机智、悦人的幽默和无比正直的态度，使他在我们共同关心的利益和日美友好合作方面，成为我们一个无与伦比的伙伴。首相一下就理解到议事规则的用意和目的，并体会到，一开始就定出建设性努力的调子和避免无谓的争吵是何等重要。他同意不顾外交礼节，应同其他代表团进行接触，特别是同那些对我们处理赔偿问题方式感到不快的人进行接触。

在这一问题上，福斯特·杜勒斯还进一步着重指出，必须设法使这些人确信，日本在会议结束后将尽快地抱着诚意同他们进行谈判，同时他对吉田茂强调，通过对外国原料的加工，赔偿这一条款将非常有利于在日本创造就业机会。他还明智地劝告吉田茂，目前应完全避免讨论数额问题。我强调，在会议期间必须对安全条约严格保密，否则俄国人就会乘机把讨论和约岔到讨论安全条约上去，从而可能给两者都带来严重损害。在答复关于日本将来对中国的关系这一问题时，我劝告首相应在会议结束和和约缔结后将这样重要的问题交给日本去仔细研

究，作出审慎的决定。他对此表示同意。总的来说，我们劝告首相要采取一种友好沉着和充满自信的态度。有些代表团现在还不准备签字，也许还有些代表团根本就不打算签字。谨慎而机智的讨论无疑会减少上述代表团的数字，即使有少数坚持不签字，事情也不会成为灾难性的。以后，他们总会签署类似的条约。我们不应由于他们的固执态度而产生恶感或陷入惊慌。听了这些忠告，我们这位聪明的好朋友就开始在许多代表团中间造成了极好的印象，取得了美满的成果。

由于吉田茂表示乐于合作，我便于9月3日，星期一同荷兰的德克·斯蒂克以及印尼的艾哈默德·苏巴佐和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作了谈话。第二天我又同查弗鲁拉·汗以及柬埔寨、老挝和南越三国外长作了谈话。星期一我还去机场欢迎杜鲁门总统。

我在星期一晚上同巴西、智利、古巴和墨西哥各国的代表举行了一次预备会后，星期二同所有拉丁美洲国家的代表举行会议，讨论了会议的战略和战术、议事规则以及何时需要他们作出宝贵的合作。我们也同远东委员会的非共产党国家举行了会议。做好了所有这些工作以后，我象当年的奥利弗·克伦威尔一样愿意把一切都交给战争之神，特别是因为全靠总统随从医生华莱士·格雷厄姆少将负责而熟练地治好了我的急性食物中毒，我才能够在那天晚上主持会议的开幕式。我从来不曾象这次那样感到身体不舒服。旧金山市长、沃伦州长和总统向代表们致了欢迎词。由于开幕式是通过电视向美国全国播送的，而且整个会议期间一直是用电视播送的，所以全国

人民都以极大的兴趣注视着我们有时颇具戏剧性的会议进程。我陪同总统参加美国代表团举行的招待会后，就让我妻子细心照料他，自己悄悄地回去睡觉了。

第二天上午，随同第一次意志考验而来的工作和雄辩表演马上开始了。在旧金山歌剧院里举行的第一次全体会议由我宣布开会。我提醒代表们，大会的目的是要缔结和签订一项已经通过外交途径谈判就绪的条约。然后我让卡尔·贝伦特森爵士发言，他提出了要求通过议事规则的动议。当奥斯卡·甘斯附议这个动议，会上开始对它进行讨论时，葛罗米柯先生起立发言，认为会上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提议应当邀请他们出席。我裁决这一动议越出了程序范围；如果对这一裁决持有异议，可以允许支持或者反对异议的作一次五分钟的发言。

波兰代表斯蒂芬·维尔布洛斯基支持他的俄国朋友，但是，等到五分钟时间已到，主席敲起了小槌子时，他却拒不停止发言。我准许肯尼思·扬格发言，但扬格被这个大叫大嚷的波兰人拦住，无法登上讲坛。我几次要这个波兰人回到席位上去都无效。原来他虽然戴着同声传译的耳机，但并没有插好插头。由于这个波兰人公然蔑视我，于是局面便很快从可笑变得紧张了。事前没有想到要为大会配备一名武装卫士，现在看来显然得由我来承担这个任务了。于是，我站起来，宣布我将护送我们这位波兰朋友回到他的席位上去后，我就走向发言人的讲坛。

这时，远在三千英里之外，我的内阁同事鲍勃·洛维特正驱车经过长岛的洛卡斯特峡谷村，当地的一个汽车

库工人扬旗招呼他停下。他说："洛维特先生，进来看看电视吧。你的朋友艾奇逊要挥拳打一个波兰人啦！"鲍勃走进了围观的人群，一起看旧金山的场面，这时正好维尔布洛斯基从讲坛走回去，他的声音也在广播中逐渐消失了。扬格冲向空着的讲坛，我为了防止反击，在旁边守卫着。后来洛维特告诉我，洛卡斯特峡谷村的观众都大声喝彩，一位国务卿有史以来第一次成为当地的英雄。詹姆斯·赖斯顿在9月6日的《纽约时报》上报道说，维尔布洛斯基先生向其他每一个代表团"大声叫喊，大加指责，大肆挑衅，大发雷霆"。

我的裁决得到确认后，会上重新对通过议事规则的动议进行辩论。那个不甘屈服的波兰人又要求大会制订自己的规则而不要驯顺地接受强加给大会的规则。苏联、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纷纷提出了一连串修正案后，进入辩论。我们故意让这种情况继续一段时间，索性让苏联集团和其他代表发泄一下，但是没有让我们那些拉丁美洲的朋友在会上抒发他们的热情。我阻止了奥斯卡·甘斯最初提出的结束对规则辩论的动议，但这只是暂时的。后来甘斯鼓励多米尼加共和国的路易斯·弗朗西斯科·托曼提出这个动议，而由他自己附议。我指出这是一项不必经过辩论自有优先表决的动议。结果它以二十五票对八票获得通过，有很多票弃权。于是修正案被否决，而议事规则以四十八票对三票的多数获得通过。

从此以后，苏联集团的斗争看来已经失败了。我们在去旧金山之前曾经估计到，他们可能会采取破坏行动。出于我们意料的是，他们只使用了我们所估计的三分之

一左右的手法。事后在讨论他们这种意外的举动时，土耳其大使认为，这是因为他们决没有充分了解到议事规则具有压倒一切的重要性——一旦议事规则被通过了，会议斗争也就输定了。

规则通过之后，只有再发生会议之外的危机，才会使会议越出轨道。在议程上每走一步，都使我们更加接近可以签字。第二项是选举工作人员。葛罗米柯又一次企图转移目标，重新提出他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的建议。我再次裁决他越出了程序范围。我的裁决再次遭到异议，也再次获得确认。选举只花了几分钟——我当选为本届大会主席，珀西·斯彭德当选为副主席。那天下午就要开始进入发言阶段，几乎比原来的日程表提前了两天。午饭后，斯彭德担任主席，我同代表团坐在一起听取杜勒斯和扬格提出条约文本的发言。

第二天，我们上午、下午和晚上都有会议。当轮到苏联代表发言时，葛罗米柯开始猛烈攻击条约，并违反议事规则，提出修正的建议。当斯彭德插话询问葛罗米柯的意图时，他就掉转话头，把他发表的修正意见说成是一项“声明”。总统很高兴，一直注视着会议的高潮，我向他汇报说，我们正以绰绰有余的差距领先。甚至连条约也越来越得人心了。

9月7日，星期五，晚上会议开始时我宣布，所有代表团都已发言，根据议事规则的工作程序应由日本代表团发言。吉田茂先生的讲话简单、诚恳而扼要。按照规则，如果会议允许，其他代表团可以继续发言。锡兰代表贾雅瓦德尼提议，每次不超过三十分钟的发言可以继续

到十一时为止，过后将不再听取发言。葛罗米柯先生起立质问，苏联对条约提出的修正案将在什么时候进行辩论。这是他的最后机会了。我温和地答复说，按照议事规则，条约是不容修正的。他对这个裁决表示异议，但又是遭到失败。葛罗米柯、扬格和杜勒斯的发言，结束了会议程序的这一阶段。

在扬格发言时，葛罗米柯站起来向四周看了一眼，活象是在集合他的羊群，然后缓步沿着会议大厅的中间走道退出会场，其他共产党的代表团，其中包括一位捷克斯洛伐克女代表，稍微踌躇了一下，便一个接着一个跟在他后面退出去。这时，新闻记者已看出这是一次大规模的退出会场。摄影记者边挤边喊，一起奔向大厅后面，而楼厅上的电视摄影机终于拍不到这个逐渐消失的示威队伍了。代表们都站起来观看这个场面。可怜的肯尼思·扬格还在奋勇继续发言，但是，他的话已经完全听不清楚了。葛罗米柯走到走道尽头，向左转，走进了男子休息室，后面跟着他的一群支持者，但是那位捷克斯洛伐克女代表却孤零零地不知所措。喧嚣声越来越大；记者们奔向电话间；连扬格也不得不暂停发言。过了相当的时候，葛罗米柯又走了出来，后面跟着他的队伍；他们沿着走道，又回到自己的席位上，那位女代表显得局促不安而又忠心耿耿，听到楼厅里发出的喝彩声（斯彭德也不设法加以阻止）不禁脸上通红。扬格又继续发言。大会秘书长沃伦·凯尔希纳报告说，条约的各种译文即将准备就绪，定于明天上午十时签署条约。我随即宣布休会。

美国代表团的全体成员和顾问，都到我房间里来相

互祝贺和彼此闲谈，主要的话题自然是有关整个过程中俄国人的奇特举动。(第二天上午，共产党集团一个也没有出席，他们索性都不见了。)我们得出的结论是，土耳其人的解释无疑是正确的：他们一定是完全没有了解议事规则的重要性，虽然这些规则早在大会开会以前就发表在《纽约时报》上了。葛罗米柯飞返本国时，神经肯定非常紧张。

由于过去一周中电视使大会变成了一种可以说是现代的奇迹剧，从而使会议受到如此重视，因此原来打算在华盛顿同我和舒曼会见的赫伯特·莫里森也决定飞来参加闭幕会议了。他以条约联合发起人身分主持这次会议，我以大会主席身分致闭幕词。迪安·腊斯克和我的妻子对我应如何写这篇闭幕词都有他们坚强的观点，但是，他们的看法是殊途同归的。他们说，这一次不能用秘书起草的发言稿。我的妻子更进一步说，我根本就不要用讲稿。他们一致认为，我应当把自己心里所想的说出来，因为我曾看到也许是历史上最可怕的一次战争是怎样正式结束的。因此，当代表们一批接着一批走上台来签字的时候，我就坐在那里记下几点提纲。

在日本代表团签完字后，我首先表示感谢大会的同事们所给予我的信任，感谢加利福尼亚州和旧金山市的主人给予我们全体以无限盛情和慷慨的接待，然后接着说：

我知道，当你们今天上午坐在这里，注视着这一十分动人的仪式时，你们一定会回忆起许多往事来——不仅是这座大厅里

的代表们和大厅里的观众们会回忆起，而且还有美国全国各地观看这一仪式的广大观众也会回忆起——回忆起过去那些洪流一般的往事，那些焦虑的日子，那些充满忧愁的日子，那些充满严酷决定的日子。同时我知道，今天有许多家庭都意识到缺少了亲人。许多人也意识到，正是这些不在人世的人献出了他们的生命，才换来了今天这个日子。

所有在座的人的回忆，全国人的回忆，全世界人的回忆，都应当在今天这个和解行动中达到了高峰，这是适当的，是非常适当的；因为你们今天上午所看到的是历史上独一无二的。你们看到了一个精神上的伟大行动，一个真正的和解行动。正因为如此，所以，象贾雅瓦德尼先生所指出的，象查弗鲁拉·汗先生所指出的，象杜勒斯先生所指出的，这一行动是同一切国家和一切宗教的伟大精神导师和领袖的基本道德准则一致的，也正是由于这一原因，我认为，又象杜勒斯先生昨天晚上向我们提到的，我们之所以能够在这里完成我们已经完成的事情，是因为所有我们这些人，正如本杰明·富兰克林所说的，“不相信我们自己是绝对正确的”，所有我们这些人之所以同心协力地工作，放弃了我们所关心的许多东西，放弃了许多有关我们经济利益的东西，其目的就是为了达成这一个和解的和平条约。而我们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因为我们做的是我们精神得到鼓舞的事情，是值得我们引以自豪的事情。

在这个条约的字里行间，没有留下任何卑鄙的东西，没有留下任何肮脏的东西。没有任何隐蔽的东西，没有任何见不得阳光的东西。我们之所以能够那样同心协力地工作，我们之所以能够解决我们之间的分歧，是因为我们是在作出伟大努力中前进，是在历史上迈出新的伟大的一步，并且希望从今天起在世界历史上揭开新的篇章。

正如莫里森先生今天上午对你们所说的，这不是一个结束，

这是一个开端。我们今天上午签署了这个伟大的条约，我们从今天起必须实践这个条约。履行这个条约的责任将落在这里有代表的每个国家的肩上，落在每个国家的每一个人的肩上；要使这个条约按照其文字所阐明的付诸实施。

同样重要的是，这要靠我们的日本朋友尽力使这个条约结出真正的果实来。我对他们说：在你们面前是一条通向世界上平等、光荣、友好地位的康庄大道。在这条大道上，凡是各国政府所能够扫清的障碍都已经消除净尽了。留下来的障碍是只有你们才能清除的，如果你们是以谅解、豁达和善意对待其他国家的人民的话，你们就能够清除这些障碍。所有这些品质，都是你们人民的天性中所固有的；我们鼓励你们做的是，要使日本人民所固有的这些品质构成日本政府的政策。

我们感到遗憾的是，有些国家没有能够或者不愿意参加我们的会议；我们同样感到遗憾的是，另外一些国家虽然来到了这里，却没有能够或者不愿意参加这个伟大的建设性的努力。然而，我们今天在这里所做的事情既是为我们自己，也是为那些没有到这里来的人，因为我们已为全人类缔造了伟大的和平——不仅是为在座的，而且是为全世界所有的人民。至于那些不愿意同我们一起工作的人，那些对我们的努力提出批评的人，我们对他们不怀愤懑；我们只要求他们现在来参加摆在我们大家面前的这个伟大努力。

请容许我用这样的话来结束这次大会，这样的话已经在多种语言里，在多种形式里，在多种宗教里带来了安慰和力量："愿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和平降临到我们当中，并永远与我们同在。①

缔结和签订对日和约的大会到此结束。

---

① 这里套用《新约·腓立比书》第四章第七节"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的词句。——译者

二十九　北约组织停滞不前

三心二意的法国

追述了1950年9月至1951年9月期间同日本签订和约这一段愉快而成功的经历后，我们必须重温在差不多同一时间内同欧洲盟国——特别是法国——就德国问题打交道那番远不是那么愉快的经过情况。1950年12月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北约组织会议，包扎了法美关系在德国参加西方防务问题上留下的创伤，两国政府大大地努力达成较好的谅解。当新的一年开始时，一些最卓越的法国政治家——总理勒内·普利文、外长罗贝尔·舒曼以及共和国总统樊尚·奥里奥尔，都来同杜鲁门总统商谈。排在这几次和其他几次讨论的议程上的首要项目，是法国一直十分关心的三个议题。一个是关于他们在1951年1月26日召开的会议，会议考虑成立一个欧洲防务集团，当时我表示热诚欢迎，接受了他们的邀请，同加拿大各派了一位观察员去参加；另一个议题是关于法国在印度支那越陷越深的困难；第三个议题是关于苏联在上一年秋天发出的照会，抗议盟国的对德政策，并提出就“德国问题”上举行一次四大国会议。照1951年1月底的情况来看，三国复文已经声明，单单为这个问题而开

会讨论是“不适当的也是不现实的”。

在每一次法美会议上，法国人都提出了种种观点：有的对德国深怀疑忌，有的对苏联那种温顺态度满怀希望。奥里奥尔总统兼持这两种观点。舒曼先生却抱着向前看的态度，从法德和解中看到欧洲的统一，又从统一中看到对苏联紧张关系的缓和。议题中有两个是有矛盾的，法国人虽然完全能够看到这些矛盾，却不大能够解决这些矛盾。俄国人施加压力，要举行一次讨论“德国问题”的四国会议，其目的肯定是为了挫败德国参加防务的意图。每个法国客人都愿意与德国人讨论欧洲防务问题，与俄国人讨论德国问题。虽然“不把任何门户堵死”是一句口头禅，但是各个客人都对每种讨论抱有不同的积极态度。我们的总统，以及马歇尔将军和我，都对四大国讨论德国问题不感兴趣。我们认为，那样只会把事情弄糟。由于认清了这样的会议是为了要在我们和我们欧洲朋友之间制造麻烦，并且，更一般地说，是为了要向全世界把我们描绘成战争贩子，所以我们必须小心行事。单是反对准会助长俄国人的宣传。

我们同法国人的会谈（后来英国人也被拉了进来）以及三国同莫斯科的谈判从冬末一直延续到春天，其结果为我们提供了进行评价的基础。苏联提出照会和要求讨论德国问题后，在德国引起了意料中的反应。阿登纳总理于 2 月 10 日拒绝德国的任何“中立化”，认为这是“对欧洲的一种灾难……也是对德国人民的一种灾难”。他坚决要求建立十个到十五个师，作为德国对参加防务的贡献。我立刻否认已在考虑“中立化”，并在我们的会谈中竭

力敦促法国尽早使盟国最高委员会与阿登纳在放宽占领状态问题上取得协议。1951年3月6日，宣布了一个重要的协定——包括建立德国外交部以及外交和领事团，取消或减少许多保留着的权力，并为清偿德国国际债务问题举行谈判。

根据"斯波福德计划"，一个团一级的作战部队已被接受，作为德国提供给北约组织盟军司令部的"国家部队"。从3月25日到30日，当奥里奥尔和舒曼和我们在一起时，我们那位从陆军中抽调去领导我们德国办事处的亨利·拜罗德上校告诉我说，这样一支只有六千人的团一级部队是不起作用的，人数应当增加。我要求舒曼去征询军方意见，发觉他与其说是要一支政治上中意的部队，毋宁说是完全愿意接受一支军事上起作用的部队。6月里，法国人同德国人就一支一万人的师一级部队取得了一致意见。我正在和舒曼设法解决这个问题时，奥里奥尔却对哈里曼说，德国人是复仇心重的，是民族主义的，而且是不可信任的；这是一年之后他对我强烈地坚持的一种观点。法国在对德政策上不是一心一意的，这一点从三年后欧洲防务集团的失败上就可以看得一清二楚了。

普利文则两次显示出了将来会发生纠纷的信号，当时我还不够敏锐，没有认识到。那是关于成立三大国（和英国）在世界范围内协调政策的协商机构的建议。这建议虽然当时未被接受，后来却成为戴高乐将军所致力的目标之一，也成为他对"那些盎格鲁—撒克逊人"的主要不满之一。1951年，我的困难在于如何从普利文那里

了解他要这样一个新机构干什么。他究竟需要协调一些什么？在欧洲，由于我们三国对德国负有的责任，并为了履行这责任而经常举行会议，以及我们三国在北约组织常设理事会中所占的地位，这一切已经使我们三国在盟国中显得十分突出，引起恼人的猜忌了。在远东，法国拒不(同时也不能)在印度支那以外承担责任，并且深深疑惧其他国家会在那里插手。他们不免使我觉得，我们这些客人与其说是关心这个机构所能起到的作用，毋宁说是关心一个世界范围的三国协商机构所能给予法国的面子。然而，总的说来，我们在讨论德国问题和防务问题方面还是取得了一些有益的结果。

但是，我们在讨论法国在印度支那的处境时，情况就不是这样了。看来问题的症结在于法国既缺少任何切实可行的政策，又不肯老老实实面对现实，制订出一项政策来。他们在采取种种最危险的行动，即自已欺骗自己。阿尔方斯·皮埃尔·朱安将军说，印度支那的军事费用十分庞大，以致威胁到法国在欧洲和非洲的地位。他谈到，如果必须在那里作紧急撤退的话，可能需要援助。这是麦克阿瑟将军已经使我们听熟了的使人惊慌的话题。他们迫切需要军事物资，特别是飞机，还要再借用一艘航空母舰，以及供地方部队发饷用的现金援助。我们对最后一点不可能办到，而我们所能办得到的又远远不能满足他们的需要。

这时候，我们开始作出努力——一次徒劳无功的努力——要使我们的朋友看清和面对印度支那的现实。法国所从事的任务不是它的实力所能胜任的，并且确实也

不是任何外部势力所能胜任的，除非是这种力量被用来支持当地占统治地位的意志和目的。据我们看来，这就需要以远比法国人的打算为快的速度把责任和权力交给本地的组织机构，而这又需要采取适用于当地的要求和能力的行政的和军事的训练，而不是采取法国的办法。我们劝他们注意我们在朝鲜行之有效的方法，并采用那些方法。这样的会谈虽然进行了三年，但并没有什么效果，法国巨额的消耗一直继续到1954年他们的努力完全失败为止。

前面已经指出，莫斯科在1951年的整个上半年中，一直坚决要求举行讨论“德国问题”的四国会议。等到法国人开始考虑这个问题时，他们的两个主要成见又冒了出来。第一个是与法国的政局有关的。普利文说，必须让公众确信我们已经对俄国人作了妥协，谋求解决我们同俄国人在德国问题上的分歧。只有在法国公众已经相信苏联仍旧顽固不化时，他们才会支持重新武装德国这样危险的行动。第二个成见是与法国人持久不变的希望有关的，他们认为，俄国的政策由于面临着这样的抉择会有所转变，从而有可能再审查德国重新武装的问题，这恰恰是苏联千方百计企图灌输进欧洲人头脑里的一种想法。我指出了这一点，又加上了另外一点：如果俄国的政策当真象出于天意似的变得竟使重新武装不必要了，那么，这种情况不仅会影响德国的局势，也会影响到其他国家。的确，这也许是战时那种认为裁军是切实可行的、昙花一现的希望的死灰复燃。看来这是不大可能的，但是我们也不能完全排除这种可能性。马歇尔将军则倾向于

相信可以排除这种可能性，坚决支持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反对采取一味迎合俄国人的情绪和宣传的那种忽冷忽热的做法。

但是，当我们都特别注意于四国会议的议程应该包括一些什么内容时，真正的困难就开始出现了。我在前面已经谈到俄国人很重视会议的议程，也谈到他们要利用议程来达到他们的有倾向性的目的。他们会拒绝讨论那些没有明确列进议程的问题，会争辩说那些说明讨论项目的用语在许多方面限制了讨论，或者在会议上利用那些用语进行宣传，引起大家担心会议的前途。他们非常重视讨论项目的次序，有时在一个项目结束以前拒绝从这个项目转到下一个项目，在结束以后又拒绝回过头来再讨论它。通过菲利普·杰塞普以及邦尼特和弗莱克两位大使，我们同法国人和英国人对议程问题讨论了整整一个月，最后他们才想出了一个好主意。为什么不在举行四国部长级会议之前，先举行一次四国外长代表会议，拟出他们的部长以后开会时可以讨论的问题呢？这样，西方盟国就不会处于拒绝开会的境地，同时又有一个极好的机会来了解清楚，俄国人究竟是在认真考虑一些建议，还是只不过是一种宣传而已。

玫瑰宫里的宣传

1951年3月5日，外长代表会议在巴黎玫瑰宫开幕。无任所大使菲利普·杰塞普代表我国；外交部秘书长亚历山大·帕罗迪代表法国；外交副大臣欧内斯特·

戴维斯代表英国；外交部副部长安德烈·葛罗米柯代表苏联。会议一共开了七十四次，并没有达到预定目的——为外长会议准备一个议程——而于6月21日休会。

在这一期间，杰塞普以高明的手腕和不屈的精神赢得了两个同时进行的战役：一个是对苏联的宣传战；另一个是为我们盟国壮声势的更困难的战役。同时进行的这两局错综复杂的外交棋赛，就不必在这里详述了。但是，略谈几件大事，说明棋手们的目的、手腕和成就也许是饶有趣味的。俄国人试图阻止北约组织执行布鲁塞尔决议，不但要分裂我们同盟国之间的关系，并且要分裂我们和盟国同德国之间的关系；法国人由于将在年中举行选举，英国人由于不久也要举行选举，都不愿疏远他们那些容易受到俄国和平宣传影响的左翼选民；我们则愿意帮助我们的朋友，包括阿登纳在内，并且愿意广为宣布：我们将要讨论俄国的任何认真的提案，但决不辜负德国人民对我们欧洲政策的坚定性所寄予的信任。

作为战斗武器的议程

会议一开始，每一方都提出了自己拟定的议程，准备干一场。我们的议程是中立的，没有什么色彩；他们的议程就有强烈的倾向性了。

盟国拟定的议程

1. 检查目前欧洲国际紧张局势的原因，谋求真正和永久的改善关系的方法。

2. 完成对奥地利的和约。

3．讨论有关重建德国的统一和准备和约的一切问题。

苏联拟定的议程

1．履行波茨坦协定关于解除德国武装和禁止它重新武装的条款。

2．加速缔结对德和约和撤退占领军。

3．改进欧洲局势，并立即转入裁减四国武装部队。

于是，反复争论的几个枯燥乏味的星期开始了，消息已经向新闻界泄漏了不少。葛罗米柯另外提出下述一个项目，咄咄逼人地加强他的议程的倾向性："有关大西洋公约和美国在英国、挪威、冰岛以及欧洲其他国家和近东建立军事基地的问题"。帕罗迪和戴维斯已变得越来越软弱，准备接受葛罗米柯提出的某些项目或者这些项目的某些部分来换取妥协，他们似乎热切希望不惜任何代价召开外长会议。杰塞普也开始感到无法坚守这条战线了。3月底，他从一个意想不到的方面获得了援助。赫伯特·莫里森在3月里来到巴黎，邀请戴维·布鲁斯、奇普·波伦和杰塞普到英国大使馆同他和他的助手鲍勃·狄克逊和戴维斯会晤，以便回顾一下形势。波伦和杰塞普雄辩有力地提出了他们认为盟国应采取坚定立场和统一行动的主张；他们说，假如俄国人真正要求举行一次会议，那他们就得接受一个公平的不偏不倚的议程。戴维斯同意列进一个关于"解除德国武装"的项目。莫里森制止了他。

4月间，波伦和杰塞普想出了一个巧妙的方法，即后来以“三重进攻术”著称的方法，并结合了帕罗迪和戴维斯的一部分意见。这个月里，由于帕罗迪和戴维斯的坚决要求，我们已经连续修正了议程，并把一些接近于苏联所提出的项目也包括进去。可是，葛罗米柯立即全部加以拒绝。经过了八个星期一无结果的会谈后，“三重进攻术”终于在5月2日出笼。它让俄国人在三种议程中挑选一种。每一种都有五个项目，以某种形式将双方所要求的都包括在内。三种议程都不包括俄国提出的有关美国基地的项目。第一种议程向苏联作了重要让步，以换取补偿我们的让步。第二种把这两个相互的让步留给出席会议的外长去作出决定或者表示异议。第三种则仅仅列举几个大项目，不加任何说明或赋予任何色彩。葛罗米柯又全部拒绝了。

因为有些人总是认为，美国外交手腕就是在联合国夸夸其谈。我不揣冒昧地强调一下这种策略所取得的光辉成就。这种策略使葛罗米柯在全世界人的眼里成为一个蛮不讲理的乡下佬，他既提不出什么建议，又不要开会，只是企图阻止所有盟国的行动，等待克里姆林宫能够想出什么拖延欧洲防务的新办法来。为了证明这一点，外长的代表们建议举行一次没有议程的外长会议，还是遭到葛罗米柯的拒绝。6月17日法国举行选举后，杰塞普的法国和英国同事都想走了，而使玫瑰宫的会议无限期地休会下去。这次会议依然是笨拙的苏联外交的一种令人无法理解的实例。

三外长寻求解决办法

我们从1951年9月的第一个星期在旧金山取得巨大成就后回来，便于第二和第三个星期开始了外交事务日常的单调沉闷工作，其中既有失望，也有进展。在这两个星期中，我和莫里森、舒曼以及我们部长一级和职员一级的同事，首先在华盛顿然后在渥太华一起处理那些至今仍使我们的继任者感到苦恼的繁难的问题。在玫瑰宫的徒劳无功的几个星期，甚至使那些不愿相信的法国人也不得不相信，在对德问题上同苏联达成协议是不可能的。这就使我们重新面临那些无限困难的问题，即如何把德国拉进欧洲集团和解决它的防务，如何替欧洲防务的经济和财政负担找出一个公平而切实可行的分配方案。中东也提出了它自己的迫切问题。这些问题十分棘手，在我们的个人关系上也引起了摩擦，起着恶化作用的是所有我们三个国家那种长期压抑的心情——对英国人和法国人来说，这是因为他们屈辱地撤出了他们的控制地区；对我们来说，这是因为在远东进行了一次不求而来的战争，并试图把我们那些受到骚扰的盟国在欧洲集结起来作出一项超越他们的实力和意愿的努力而归于失败。现在回顾起来，我怀疑当时的挫败似乎并不大于实际上的挫败，这也许是因为有些事情，例如欧洲防务集团，在当时看来是有希望的，但在阴云密布的未来岁月中，这种希望却有可能破灭。

关于德国和防务问题

莫里森这个人性情一点也不开朗。他只会使我们会谈的气氛更加阴郁。他对我们说，只要处理得法，欧洲的一体化是没有问题的。然而，事实是否如此呢？英国对欧洲理事会的不负责态度很不耐烦，又不能接受舒曼计划。到目前为止，在政治上对苏联的遏制已经获得成功。这一点他是不想否认的。但是，这可能搞得过火，会引起一场世界大战。谈到德国，他看出有一种剥削盟国的倾向，迫使它们支付应该由德国人负担的占领费用。他对我们说，他曾直率地对德国和奥地利两国总理说，占领军为他们提供防务，受益者必须支付这笔费用。

这里还有舒曼可以同意的一些话。他还说，德国人总是要求待遇平等，应该使他们知道，在负担方面也应当平等。他继续说，德国和法国的国民收入大致相同，因此，德国人应当支付与法国人相等的防务费用，包括法国的海外费用在内。但是，不应当允许德国人在他计划的欧洲军里拥有一支较大的部队；应该将差额用来支付盟国在德国的占领费用。这种灵巧的理论会大大地破坏德国在防务方面作出适当贡献的前景。有时候舒曼很机敏，能想出解决问题的创见来，但是当他巧妙地规避这些问题时却显得更机敏。

我的同事们由于关心维护德国的民主政治，就着手进一步加速欧洲军的死亡。照他们看来，威胁不但来自东方，并且来自德国内部法西斯主义的复活。波恩的立宪秩序可能象在魏玛时期一样被推翻；所以，占领军要继

续保持权力，以便一旦立宪秩序或公共秩序发生危险时，就可以进行干预——换句话说，必须说服德国人，他们不但要支付盟国为保护他们不受俄国人和他们自己人的侵害而维持占领所需的费用，并且要支付维持一支德国部队(这支部队应同法国的一样大，但不得大于法国)的费用。

首席法官怀特经常说，对于这个建议要说到做到。我的同事们并不真正相信这句话。他们一半是在发牢骚，一半是认为我过分看重阿登纳，于是就反对我的看法。但是在设法使英国人更谅解和支持舒曼的欧洲军计划和进一步放宽占领以前，依理我至少须要对这种脱离现实的雄辩作出反应。尽管已经出现了不祥的开端，在取得英国人支持这一点，我们还是能够做到的。

1951年夏天，我已得出这样的结论，即为了使德国对防务计划作出适当的贡献，最好的办法是坚决支持法国所提出的欧洲防务集团的建议。在巴黎进行的关于这个问题的谈判变得十分复杂，只有两个美国人自称能够了解，他们是戴维·布鲁斯大使和另一位名叫汤姆林森的财政专员，后者已经放弃了研究外汇问题，成了一位共同体的热情拥护者和研究专家。他们两个人都无法使我们其余的人同样理解谈判的细节；的确，布鲁斯连试都不愿意试一下。他说：在我们看来，欧洲人喜欢的工作方法似乎是在搬弄浮夸的一般性道理。其实只要我们随它们去，自己去为别的事操心，结果总会不错。我接受了他的忠告的前半段，但不同意那后半段，因此，在一无所知的清醒状态中独自操心。两种想法有助于我作出结论来。

我回想到我国宪法之所以获得通过，是因为条文简单而产生了一种无害的错觉。在费城制订宪法的那些开国元勋说，国会应有权管理国际间、几个州间以及同印第安族之间的贸易。他们或者没有预见到，或者不愿意说清楚，这几句话里隐藏着多么复杂的内容，最高法院可以从这几句话里产生多么巨大的权力，象一个魔术师能从他的帽子里变出多少意想不到的东西。至于战争权力所包含的巨大权限更被谨慎地掩盖住了。如果各个州都能够预见到这一切，宪法就永远不会获得通过。无论出于有意或是无意，也许舒曼是用复杂代替简单的手段来掩盖侵犯主权，也许他会获得同样的成功。但是他究竟想干些什么呢？这种想法是不是明智的呢？我研究了艾森豪威尔将军那幅关于北约组织统一司令部的图表后，我窥出了他心中可能想到的事情，更加确信他的想法可能是明智的。

在艾森豪威尔将军的最高权力之下，将设置一个北欧总司令部、一个南欧总司令部和一个由朱安将军担任总司令的中欧总司令部。属于最后这个总司令部的有比、荷、卢、法、英等国的部队以及大部分美国军队，他们将负责对付从东欧平原侵入德国的任何军事进攻。这里是由欧洲人担任总司令的欧洲陆军核心，欧洲军队不论在战时或平时都可以合并起来进行作战或训练，并且可以象现在这样附有美国军队。再加上一个专管后勤和财务以及在德国进行合作招兵任务的文官机构，这样就有了一支包括德国师、但是不设立德国国防部和参谋本部的欧洲军。那些文官的政治经济附属机构不许发展得太复杂

或分得太繁细，以免担心害怕它们会侵犯主权；它们只能根据需要和经验而加以扩充。重点应当放在有问题的军事方面。

我把这些想法都写进了一份备忘录，建议只有按照这些方针采取及时而有力的行动，才能在许多互相联系的问题上——包括把德国纳入欧洲防务，结束德国的占领状态，以进入西欧一体化的建设性阶段等——取得进展，而所有这些问题现在都处于停滞状态中。在国务院内部讨论以后，我的备忘录就在7月16日成为五角大楼的一次会议的议程，参加这次会议的有马歇尔将军、鲍勃·洛维特、布雷德利将军、弗兰克·纳什以及他们的德国问题专家毕比上校，陪同我一起去参加会议的有杰塞普和马修斯博士。大家在会上取得了一致的意见，由洛维特和我签署的一份国务院与国防部联合文件于该月底送去白宫，得到总统极为重要的批示："同意。哈里·杜鲁门，1951年7月30日。"

从许多方面看来，这是划时代的一系列决定，把许多讨论中的重要事情付诸实行，使政府可以用明确的指令去执行政策。在以后若干年内，"保持选择自由"这条主要原则，打断了这种杜鲁门执政年代中颇有典型性的果断行动的连续性。我的备忘录以及部际之间以它为根据写成的备忘录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建立有效的欧洲防务，结束德国的占领状态，西欧的一体化。这些都是互相联系的，一切有待于取得一项能为法德两国所接受的、解决盟国军事问题的办法。现在只能看到的一个解决办法似乎就是建立欧洲军。因此，我们建议，象我推论所得，

美国应当竭尽全力去完成这件事，并且，为了不引起什么麻烦，应先要求巴黎予以澄清。

由于总统正在作出决定，我们进入华盛顿会谈时就一致极力敦促进行建立欧洲军和开始一个规模更大的计划，即后来称为对德国的“条约关系”的计划。既然俄国人阻止同德国签订一项类似我们刚刚同日本签订的和约，我们就计划同西德订立一份“条约”，以结束占领状态，并且，鉴于东德的情况，我们将在保证安全的条件下，尽可能多地赋予那个政府以主权的性质。应当让德国人得到自己进行治理的全部权力。我们在那里的使命将不再是占领战败的敌国领土，而是作为一个盟国根据协定参加共同防务。我们应当只在这四个方面保持权力，即保护我们的军队、柏林、德国统一以及将来的和平解决和领土问题。

制订这一协定将是一件艰巨的工作，因为，在德国，美国政府不象在日本那样拥有最后决定权。在占领期间，已经有了许多既得利益不受我们的控制而发展起来。幸而我们的高级专员约翰·麦克洛伊具有完成这种任务所需要的坚韧不拔的精神、善于说服人的才干以及很大的魄力。他找到了阿登纳这个有力的助手。

华盛顿会议似乎证明了这种分析和战略的准确性。一经确信美国大力支持欧洲军后，舒曼就在“条约计划”问题上变得更灵活和更愿意合作了。于是我们就一起把英国推向前进，即使没有使它达到十分热情的程度，至少已使它对欧洲一体化运动，例如对舒曼计划和欧洲防务集团采取了友好合作的态度。所有这一切都表现在9月

24 日我们发表的公报和声明中。

关于经济问题和重整军备问题

1951 年里有一段时期，我们开始觉察到，我们正在试图把我们盟国和自己以超过经济现实许可的速度更快地推向为防务而重整军备的目标。但是，不论以单独一个国家来说，或者以集团来说，目标与行动之间的差距日益明显，也日益使人感到痛苦。在英国，许多人中间偏偏是丘吉尔先生批评了艾德礼先生过于重视军备计划；4 月里，安奈林·贝文辞去了工党内阁的卫生大臣职务，抗议削减他计划中的经费移充重整军备的费用。在法国，新闻界和 6 月 17 日的选举反映了同样的情绪。在华盛顿，6 月 21 日为讨论一份文件举行了一次重要会议，据文件透露，截至 1952 年 6 月 30 日，欧洲防务计划费用的缺额，包括所有盟国和德国的在内，约达二百五十亿美元。早在几个月前，我国马歇尔将军和布雷德利将军就指望丘吉尔先生会主张放慢我们原来希望于 1952 年 6 月底完成的计划的进度，改于 1954 年 6 月底完成。在这次讨论中，最不好斗的军人马歇尔将军指出，欧洲人比我们更多地作出了个人的牺牲。他说，按照欧洲人的生活水平，百分之五的削减意味着要在餐桌上把白面包改成黑面包；在同样的美国人家里，这样的削减仅仅意味着要放弃一架收音机或是电视机而已。

财政部长斯奈德希望，我们在国会通过征税法以前不要去同国会讨论欧洲拖欠防务费用的问题。但是这势将产生另一种危险，因此我反对他的建议。国会正在采

取的方针，比之在提高税额方面的倍加犹豫更能给我们造成危害。这就得削除我们对任何一个盟国的援助经费，如果这个盟国在限制对共产党国家出口方面不及我们严格的话。国会仍然把这个问题看做是黑白分明的道义问题；但是，事情并不是这样简单，就象战时欧洲一些中立国家同德国进行贸易那样，虽然那是不可取的，但也并不是象 1942 年到 1943 年间美国国防部所设想的那样简单的问题。对我们的工商界和政府来说，我们对共产党国家的出口是无足重轻的，但在欧洲情况就不是这样，可以引证最最极端的例子——如英国通过香港和葡萄牙通过澳门的贸易——来加以说明。除战略物资应另作别论，如果要中断这种贸易，那就可能产生政治的、军事的和经济的严重后果。而且何种原料算是战略物资，对此也有不同看法。最后，正象过去要减少中立国家对德贸易时一样，当时国务院认为，用进行说服和讨价还价的办法要比用鲁莽的高压手段更能取得效果和带来较少的损害。

当迫切需要增加对我们盟国的支援，而必须设法使国会避免同盟国作琐碎的争论时，我们不应该避而不提存在的分歧，而是应该充分解释这种分歧。自从朝鲜战争开始以来，欧洲的军事预算已增加了一倍（虽然我们的已增加了两倍）；他们的工业生产包括军火生产在内已经增加了百分之二十，这就必然使成本高昂的进口货数量、物价和生活费用急剧上升。他们的贸易赤字增加了，货币储备下降了。我认为，国会应当接受教育，而不应该象一个性情暴躁的老妇人那样，只是满足于根据她侄儿女中有的符合她的品德标准、有的失去她的宠爱而不断地修

改她的遗嘱。"凯姆修正案"已在酝酿中，而且正在增加力量，这法案旨在用停止援助的办法来惩罚不听话的盟国——这就推迟了防务的建立。我们的立法者对外国人(他们的弱点同我们的立法者的弱点很相似)那种愤激情绪，对他们对外政策的看法具有强烈的影响。

由于我们在国内进行工作和商谈的结果，所以，当休·盖茨克尔和勒内·梅耶在9月中旬带了他们的一片苦衷来到我国时，我们已经有了准备，并且对他们深表同情。我们自己的财政部长，在几个星期前还忿怒地怪我们只愿意对欧洲理应承担的义务规定限度，但从来没有同样宽大地对待自己的国家，现在甚至连他的态度也软化了一点。财政大臣盖茨克尔告诉我们，预计英国国际收支将达十亿美元的赤字，其中半数是由于我们为重整军备而大量收购，引起原料涨价所致。其余大部分是由于把出口商品的生产改为军火生产所造成的。英国人的1951年计划的进度已经落后；艾森豪威尔将军提出的更多的要求是绝对办不到的。他们非但不能满足更多的要求，甚至不能长期保持目前这种重整军备的速度。

财政部长梅耶用法国的经验来证实这一点。那里的工厂每周开工四十五小时，有的甚至开工五十二小时；已经出现电力和焦炭供应不足的情况。这个国家面临六亿美元的国际收支赤字和日趋严重的通货膨胀。他把舒曼的牢骚加以扩大说：防务需要的数字正由军人决定，而这些人对经济和财政的实际情况又一无所知。在渥太华会议上，法国将坚决要求对北约组织国家的经济能力进行全面检查。如果在保卫它们的名义下毁灭它们，那是说

不通的；一定要想出些新办法来。

我完全被他们所说服，于是拉了哈里曼、尼采以及五角大楼的代表同我们的盟国一起讨论办法，再同总统会谈，请求他授权贯彻法国的建议。对此他欣然同意了。因此，一个星期的会谈结束时，我们在经济和重整军备领域中寻求行动的总方针方面取得了出人意外的一致意见。

舒曼对摩洛哥的态度

但是，我们在另一件事情上并没有取得什么进展，而这件事将在我们以后的任期中继续烦扰我们，那就是，法国人抱怨我们，认为我们在法国对北非的政策上采取了不合作的态度。舒曼说，在这一年的早些时候，当我们向法国政府表示，如果在联合国大会提出了摩洛哥问题，我们不能支持法国的主张，同法国一起反对把它列入议程时，法国内阁曾对此表示严重关切。他们觉得，这种态度是无法理解的。当时法国同意我们在摩洛哥设立重要的空军基地。法国试图通过朱安将军的改革计划，在摩洛哥建立一个现代化的民主国家，但改革计划遭到了反动的素丹以及思想陈旧的柏柏尔人的反对。他恳求我们支持他们不让阿拉伯国家利用联合国大会作为宣传讲台，挑起摩洛哥的不满情绪和混乱，并且敦促我们一起商量出一项共同的政策。法国承认它有责任引导摩洛哥在法兰西联邦中走向独立，正象它在印度支那所做的那样，而舒曼认为，最近一些伙伴国家在旧金山表示的态度已经证明了法国在印度支那所取得的成就。

一切是这样合乎情理，而又是这样毫无希望。国务院的意见一致认为，继续需要法国在摩洛哥和邻近的突尼斯施加影响和进行领导，但是，现在的法国政策却未能取得这样的成果。至于强迫法国政府根据形势需要采取极端措施，是否可行和是否明智，对此欧洲司和近东司则抱有不同的看法。欧洲司认为，——也许是正确的——这个政府会把这样的决定看做是宣布自己的死刑；近东司则认为，——这种说法比较不容易证明——如果不这样干，那就意味着法国在摩洛哥影响的结束。我却作出了一个可以理解的，但也可能是最坏的决定——即用力推动得舒曼足以使他感到恼火，但又不足以使他获得成功。对于我们在那里的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未说，看来成功和失败之间并没有多大的差别。

三十　埃及和中东司令部

我们在华盛顿三国会谈中推动的另一件事是成立中东总司令部。

1951 年 1 月底，我在给马歇尔将军的一封信里，要求国防部同我们合作，共同对从东地中海到印度的整个地区的美国利益和政策进行一次检查。在过去四年间，美国的影响在一种无计划、不经心和偶然的情况下已在世界这一地区大部分取代了法国和英国的势力。当我们的影响增长而它们的影响衰落时，我们在那里却日益不受人欢迎了。并没有一种力量可以替代它们维持和平和秩序，而在阿拉伯人同以色列人之间，在埃及和伊朗的民族运动同英国利益和英国政府之间，在巴基斯坦同印度之间，重大的冲突正在急速加剧。随着形势的发展，俄国有了日益增多的机会，去进行它那传统的南进运动，以谋取不冻港、攫夺石油和从事挑拨离间活动。

我在信中向这位将军保证，我们并不打算使美国卷进一个中东安全条约，或者派遣作战部队去这个地区。我们的意见是：英国和英联邦主要负责提供武装部队防卫这个地区，我们则大量援助个别的国家，这一切如果是能在这一地区的整个防务计划之下协调起来的话，那就能取得更大的效果。我们希望五角大楼予以协助的总计

划是：在我们向所有有关国家阐明我们的目的之后，它能为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提供小型的军事训练代表团，在美国的军事学校里为各国的军官保留更多的名额，并给予各国少量供训练用的武器弹药。过了将近二十年以后，看来可能会使人感到奇怪，我们在1950年至1951年期间居然还那么天真，竟会对这种计划抱着希望。

此外，信里还建议同英国政府讨论成立美英联合军事办事处，以促进和协调这一地区的所有国家以及联合王国和美国对整个地区防务方面的努力，并在阿拉伯各国和以色列创造可靠的稳定局面，使得希腊、土耳其和伊朗能够有效地运用我们在那里形成的战斗力量。我信里提到"防卫整个地区反对侵略"，意思是指，而且不言而喻地是指苏联的军事侵略，包括直接的以及间接通过卫星国或"志愿军"的军事侵略。但是我们很快就会注意到，对于中东各国来说，这一地区内部的种种争端远比来自北方的威胁更为突出和危险。苏联外交部意识到了这一点，于是竭力保持这种印象。

马歇尔将军和各军种参谋长同意这一意见，不过附有一个条件，——我们接受了这个条件——即协调希腊和土耳其的军事努力必须是通过这两个国家吵着要求参加的北约组织。总统同意用这样的方式进行探索，因此，当莫里森在1951年9月向我们提出他称之为解决中东问题的"新做法"时，他所谈到的意见一年前他的前任就已提出了，而且我们几乎在一年前就开始对其进行研究了。虽然如此，他确实迫切需要一种"新做法"。

我们已经看到，英国在伊朗的地位，以及它在埃及的

地位，都于1951年严重地恶化了。华夫脱党政府发誓要把英国人赶出苏伊士，英埃共管的苏丹又进行了改选。英国在1951年4月11日提出的修改1936年对埃条约和建立联合防御协定的建议，都遭到埃及首相纳哈斯帕夏拒绝了。经过两国政府进一步交换意见后，他在1951年8月6日声称，莫里森先生已对进一步谈判“关上大门”，埃及政府将在秋季前废除这个英国条约。就在此时，莫里森给了他一封引人注目的信。莫里森在信中说，他即将离任作短期休假，在休假中将对防务问题作进一步的考虑。他深信，“阁下在此期间不会希望……在这关键时刻能够做出任何会妨碍可能达成协议的事情”。莫里森先生找错了信任的对象，而且看错了他认为是可以利用的时机。

地中海和中东的防务安排变得有点复杂了。英国人反对委派美国人担任北约组织的地中海总司令。另一方面，参谋长联席会议认为，——我们以为这种看法是正确的——罗伯特·卡尼海军上将的第六舰队是美国在南方的六个师的主要支柱，而当时这六个师是欧洲防务的核心。希腊和土耳其坚持要直接通过北约组织，而不是间接通过某种区域性组织参加共同防务。而且，土耳其在获准加入北约组织得到保证之前，不愿同一个中东组织进行合作。最后，如果英国人要有一位与艾森豪威尔将军同级的司令，那法国人由于在地中海拥有的海军力量也要求有同样一位司令。丘吉尔先生对于英美临时决定委任美国威廉·费克特勒海军上将任大西洋盟国最高司令一事十分生气，而把一切都弄得更加复杂了。由于这

位“前海军人员”的威望和英国可能即将举行的大选，这个决定只得暂时搁一搁了。

9月8日，我们在旧金山签订对日和约的那一天，乔治·麦吉在华盛顿促使英国的工作组和五角大楼就中东总司令部问题达成了协议。这个司令部将由一位中东盟国最高司令和他的总部组成，总部包括若干埃及军官，将设在开罗，受中东参谋长联合委员会的指挥。英国在埃及的军事基地将移交给埃及，由埃及将其置于最高司令之下，与埃及人共同使用。那些没有调归最高司令管辖的英国军队，应立即撤出埃及；留下的军队，其人数将由最高司令与埃及政府协商决定。五角大楼之所以同意这个计划，是因为它需要英国继续负责防卫苏伊士运河和中东地区，虽然也注意到它履行这一任务的能力已在下降；我们国务院之所以同意这个计划，是因为除此以外看来别无其它可行的办法，因此我们劝告总统采取同样看法；莫里森之所以同意这个计划，是因为他天真地认为，这样就可以使英国军队留在埃及，而不致引起对英国“占领”的任何指责。我自己的看法则是：在这个建议中，凡是五角大楼和莫里森可以看作是有利的东西，埃及人就可能而且必将看作是不利的东西；以军事训练和武器的形式所起的缓和作用，是不能克服这个矛盾的。

在华盛顿会谈中，我们只暂时批准成立总司令部，此外就无法取得其他进展，因为土耳其一定要等到邀请它参加北约组织后才肯进行合作；法国则在它的地中海舰队的地位得到满意的调整之前不肯对此作出最后批准。后来，在渥太华会议上，北约组织决定接纳土耳其而

解决了它的问题，土耳其同意和澳大利亚与新西兰一起支持中东总司令部向埃及进行新的试探。法国的海军情报活动，由于我们的海军顾问杰罗尔德·赖特海军上将想出了一项计划而得到了解决。根据这项计划，法国的地中海舰队将直接向艾森豪威尔将军汇报，并负责维持法国与北非之间西地中海交通的自由航行与安全。现在我们已经准备由四国向埃及进行新的接触。

在9月余下的日子和10月的第一周，工党政府一直在浪费时间，也许是在同英联邦国家和反对党进行磋商。布雷德利将军和英法两国的参谋总长已经去安卡拉进行商谈，还要去开罗。10月6日，莫里森通知埃及政府，他希望在几天之内提出新的防务建议。埃及第二天就作出了反应，先向法鲁克国王，第三天再向国会提出了废除1936年英埃条约和1899年英埃共管苏丹协定的法案。尽管如此，关于中东总司令部的建议还是在1951年10月13日提出了。纳哈斯帕夏首相对这个建议看也不看就一口拒绝了。两天后，埃及议会废除了这两项条约。

如果说有什么政治上的死胎的话，这就是一个事例。但是，英国外交部还不肯相信这回事。11月，四国政府公布了它们提出建立中东总司令部建议的指导原则。这件事中东方面并没有作出任何反应，苏联方面却作出了强烈的反应。克里姆林宫宣称，西方的建议“旨在保证外国武装部队驻扎在上述国家……〔以及〕继续干涉近东和中东国家的内政并剥夺它们的民族独立的可能性”。苏联不能“对这些新侵略计划置之不理……这个地区同”它的边界相距并不远。当我们四国对这个关于中东总司令部的

"全部误解"进行答复时，我不知道埃及和伊朗是否也认为事实并非如此。

"黑色星期六"的新危机

作者现在先叙述几个月以后的事情，谈一谈 1952 年 1 月下旬的危机，这次危机使中东司令部不可避免地消失了。英国 10 月大选后，工党以微弱的少数遭到失败，外交部由安东尼·艾登接替了赫伯特·莫里森；我后面将要提到，1 月间首相和外交大臣访问了华盛顿。国务院送给我的初步备忘录，反映了麻烦即将到来的预感，并提出警告说，英国人与我国驻埃代表团对当地可能的事态发展和它的危险性有着不同的估计。我们的估计是，埃及对要求英国军队撤退一事并没有缓和，听任事态自己发展是危险的，迫切需要开始英埃会谈，对此，我们和法国，也许还有土耳其，如果被邀请的话，是可以参加的。但是，英国首相认为不必如此急切，他决心毫不示弱，而最不聪明的是他在议会演说中建议，应有一支"象征性的"美国军队去和英国军队共同驻守运河区，而在他私下向我们提出这个建议时，我们已经作出了冷淡的反应。

这样一来，埃及大使就慌慌张张地赶来会见我，要求我们对此事给予澄清。我说，这项声明是丘吉尔先生发表的，并不是我们发表的。我们政府对英埃问题的态度早已表示得非常清楚了。两国都受条约的约束，任何一国都无权单方面宣告废止。四国曾经提出一项建议，它

已被埃及轻蔑地拒绝了。这并不是解决困难问题的办法，这些问题需要所有利益攸关的国家进行政治家风度的讨论。我向大使恳切地指出了这一点。

事情发展得很快。丘吉尔先生的演说是在1月17日发表的。我同大使的会谈是在1月21日举行的。不出一两天，乔治·厄斯金将军的军队同埃及军队的战斗就在伊斯梅利亚附近爆发了。25日，艾登通知我，厄斯金的行动是为了保护运河区英国军队的安全而不得不采取的，同时他也有可能被迫在三角洲地区采取行动，以保护包括美国人在内的平民的生命安全。他要求我们予以全力支持。我答复说，如有必要我们也只能参加保护和撤退美国侨民的工作，至于在亚历山大港采取海军行动，甚至需要实行有限度的军事占领和管制，那是不符合我们的政策的。正当这些电讯往来时，暴徒在黑色星期六那天横行于开罗许多大街上，焚烧了“牧羊人饭店”，并在全城到处杀人抢劫。1月27日，法鲁克国王解除了纳哈斯帕夏的职务，解散了他的政府。英国人扩大了他们的军事行动。

我们立即竭力去扑灭这些大火，因为它们有将北非卷入流血冲突的危险。杰斐逊·卡弗里大使在开罗通过收发两用无线电与法鲁克国王保持个人接触，他们讨论了如何设法把已在从事恢复秩序的英国军队与埃及军队隔离开来，使其彼此间不再发生战斗。我通过在伦敦的沃尔特·吉福德大使和在华盛顿的奥利弗·弗兰克斯爵士，迫使艾登发表和解的声明以换取埃及的克制。每个人都协力一致，要使双方悬崖勒马。艾登对英国大使拉

尔夫·史蒂文森爵士发出了一项非常有益的指令，概述了与埃及人恢复谈判的提纲，并把指令的副本送给了我。我们对此表示热烈赞赏并给予支援，说我们已经侥幸脱离险境，但是现在的机会也许不可能持久。新任埃及首相马赫尔也许是我们的最后机会，而艾登的主动精神格外使我们高兴。我们指示卡弗里支持史蒂文森贯彻艾登的这一主动行动。他应当指出，四国建议并无意于对埃及"合伙搞阴谋"，而是诚心要在中东安全问题上协调埃及和自由世界的利益。

2月5日，艾登在下院发表了一篇值得钦佩的、心平气和的声明。我在一封私人信件中说，他的语调恰到好处，可以帮助我们实现我们的共同目标。我告诉大使，我急想知道艾登对苏丹的想法，因为法鲁克国王兼苏丹国王称号这个棘手问题，过去已经使同埃及取得广泛的建设性解决的希望归于破灭，而这次可能又会重蹈覆辙，其后果将是不堪设想的。

这个月的下旬，我在伦敦，国务院经常向我提供许多意见，以使我向艾登提出，同时他们还寄给我许多发给在埃及的卡弗里的信件，以便综合这些材料制订一项建设性的政策，全面解决我们在那个地区关心的四个主要问题。这四个问题是：埃及的愿望，苏伊士运河的安全，英国在中东的地位，以及如何需要建立稳定的局面，因为那里的旧秩序已经瓦解，而莫斯科煽动的新的仇外骚动却与日俱增。尽管我们在扑灭1月危机中确实作出了帮助；但在改善英埃的长期关系方面，我们的努力却没有取得什么成果。到了1952年3月，这些努力已下降到一个新

低点。

趋向僵持局面

为了研究如何利用法鲁克国王一心想要兼苏丹国王称号这件事，作为看来是我们唯一可以采取的手段，华盛顿和伦敦之间进行了长期而无效的讨论，这场讨论直到1952年6月22日至23日埃及发生了政变而告结束。政变废黜了法鲁克，安排纳吉布将军出面，而幕后则是以纳赛尔为首的校官们。这一变化我们认为，有点象1917年俄国的二月革命那样给威尔逊总统带来了微弱的希望；但是，我们很快就发现，一方面是军人集团的极端无知和缺乏经验，一方面是英国外交部那种根深蒂固的怀疑态度，要同纳吉布取得任何进展，就象过去同马赫尔和法鲁克打交道一样困难。纳吉布将军的一位代表终于在9月间同我国大使馆进行秘密接触，建议与美国合作，并表示愿意承担某些保证，包括参加中东总司令部，以换取军事和经济援助。我们答应对这个建议进行考虑，要求纳吉布将军更明确地说明这一下他究竟打算要求什么样的援助，他准备在多大程度上同美国和联合王国一起计划这个地区的防务，并在保证该地区的战略性设施得到有效维持的条件下如何解决运河区的问题。我们同时向伦敦征求意见，特别是要求他们制订一项基本的解决方案，不但在战略上应当是健全的，而且实际上也必须是埃及所能接受的。

11月里，初步答复来了，虽然对我们的种种努力表

示欢迎，但是，英国在制订一项切实可行的基本解决方案方面显然出现了很可以理解的麻烦，而埃及也并不象我们所希望的那样乐于合作。我们自己也有一些众所周知的国内问题。国防部通知我们说，在没有批准这一地区的战略计划和兵力配备之前，他们无法制订一项援助埃及的具体计划。这种态度真使人想使劲摇一摇参谋长联席会议的那些人，直到他们的勋章都落下来。但是，我却给洛维特写了一封很有礼貌的信，请求参谋长联席会议为一项切实可行的基本解决方案、战略计划、兵力配备以及援助计划准备他们的意见。而他们在这方面也是需要取得进展的。

到了1月里，也就是我们在任的最后几个星期里，哪一方都没有准备好开始进行秘密会谈。哈里曼和我去会见总统，建议我们立即开始向埃及提供经济援助，让大门敞开，而把军援问题留给下届政府。(事实上我们也必须这样做)。总统表示同意。在打开英埃僵局的问题上，1952年并不比1951年取得更多的进展，保守党并不比工党更好一些。我们的继任者看来也不见得会比我们更有成效。

回　顾

这里我不想再谈关于1956年埃及-苏伊士危机中每个有关的人所犯的大错了，因为我已经在别的地方讲到这些问题。即使现在也很难看出，美国在早几年里能更好地改善英埃关系。纳赛尔企图扮演一个男性的克利奥

帕特拉[1]的角色，要利用两个超级大国的矛盾从中渔利，英国则顽固地死抱住大英帝国的残骸不放，这就必然要带来一场冲突，而且是一场严重的冲突，虽然它没有严重到象我们所曾遭受到的那样，失去了每一个人的信任。然而，据我看来，在最近十年的后半期比较机警的美国和英国政府原该把科学和技术列为它们的援助项目，以缓和埃及向它们提出的一些问题，如苏伊士运河问题，以及西欧依赖中东石油的问题等。如果我们把宇宙空间计划投资的一小部分用在这里，并在欧洲与欧洲人合作下，发展实用电动汽车和核电站，那么我们就可以做很多事情，来解决我们的空气污染问题，使欧洲不再依赖中东，并消除苏联企图渗透中东的大部分动机。这样还可以使纳赛尔不能用关闭苏伊士运河来进行讹诈。据我看来，不论是对欧洲和美国本身的福利和安全，或者是对世界和平，这种投资仍然是有利的。

① 克利奥帕特拉(公元前69一前30)，埃及的女王。——译者

三十一　北约组织理事会渥太华会议

一次劳而无功的理事会会议

从9月15日(星期六)直到9月20日(星期四)，在渥太华举行的北约组织理事会会议，据我回忆起来，也许是我们参加过的会议中最为使人厌倦的一次会议。经过紧张和疲惫的两周后，我又碰上了这六天冗长的会议、发言和讨厌的正式社交集会。我们在幕后做了不少工作，以清除前进路上的障碍，但是，在走向我们的目标方面，几乎没有取得什么进展。莫里森那种令人遗憾的举止经常弄得我们失去耐心。这是他的最后一次露面，因为10月大选以后，保守党就上台了。

邀请希腊和土耳其

在渥太华会议上，北约组织理事会设置了一个理事会临时委员会，使目的(防务)和手段(资源)密切配合起来，并向希腊和土耳其发出参加联盟的邀请。在进行这两方面的努力时，我们都遭到一些小伙伴的愤怒的抵抗；因为他们认为，三个大盟国太霸道了，认为美国国会企图控制他们同共产党集团的贸易，认为他们在经济上的种种困难都是美国迫使他们重整军备所造成的结果。北约

组织繁荣的日子已经过去了；由于东柏林在举行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联欢节时，阵阵乐声向西方飘来，一年前的恐惧心理也消失了。所有这一切不免使西欧的政治家和作家对来自东方的危险和美国不断强调重整军备的必要性产生了疑问。

5月里，新闻界透露了英、法、美正在一起商谈邀请希腊和土耳其的消息，惊动了也惹怒了其他一些盟国。“北大西洋”组织在1949年已发展到把意大利也包括在内，现在我们又企图把东地中海这个充满麻烦的蛇窟也拉进来。北欧的政治家们怎么能够使本国人民相信进攻地中海东部诸国就是进攻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或者进攻荷兰和比利时呢？在主持关于邀请的辩论时，我指出，除此以外，别无其他可行的办法。一年前，北约组织理事会认识到希腊和土耳其作为欧洲防御的东翼的重要性，曾决定通过一个防务计划机构把这两个国家结合进来，但没有成功。他们要求作为正式成员国参加，这在我们看来，对共同承担责任是有好处的。假如不是所有北约组织的盟国而是几个盟国(有些国家如此主张)同希腊和土耳其另订一个地中海防务条约，那实际上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因为如果我们中有几个国家发生战争的话，其他北约组织国家也逃避不了被卷入的危险，而在最初作出决定时，它们却没有发言权，这势必使他们处于很不利的地位。最后，如果希腊和土耳其成为盟国并遭到攻击时，也并不是需要每个盟国都出兵到东地中海去作战。在那里的军事行动必将会纳入整个欧洲防务的战略计划中去。所有这些决定都会影响到他们的安全，因而需要他们参加。

陆军部长弗兰克·佩斯根据军事上的理由支持我。经过多次的私下劝告，渥太华会议的最后一天，北约组织理事会终于一致通过发出邀请。

理事会临时委员会

组织一个小型委员会（"三贤人"）使重整军备更能与各国的实际力量相一致，这是法国人想出来的方法，由舒曼和勒内·梅耶在华盛顿透露的。莫里森和我在表示同意的同时，听由他们去筹划。这样决定是明智的，因为我们的法国朋友对英、法、美之间的"有领导的民主"已表示强烈的不满。我们的盟国虽然同意这个目的，但决心要扩大这个手段。他们希望由全体成员国都参加这个委员会来作通盘考虑。在讨论经济问题时，最引人注目的是德克·斯蒂克的发言。这位荷兰外长说："任何进一步降低欧洲目前的生活水平的做法，而在最近的将来没有什么提高的可能的话，必将危及我们国内的防务努力所不可缺少的社会安定。"其他国家都急忙抓着这个题目不放。

财政部长斯奈德自信已经看出讨论可能会有什么结局，他直率而不够机智地插上一手，对我们的盟国说，别指望美国会为他们的防务"付账"。他在这一周中，主要关心的是渥太华决议对悬而未决的财政部偿还计划可能起的影响。最后，这批不受管束的羊群终于进了羊栏，成立了一个由十二人组成的理事会临时委员会，受权组织一个三人工作小组，责成在12月1日提出报告，以便在那个月里将在罗马举行的会议上再次进行讨论。这样"三

贤人”的想法仍旧保存下去，并且体现在艾夫里尔·哈里曼、让·莫内和埃德温·普洛登爵士三个人身上；他们都是才能出众和常识丰富的人物。

由于加拿大一直坚决要求把条约第二条关于社会、经济和文化领域的条文所规定的行动付诸实施（这一条本来是加拿大建议的），我们成立了一个部长级委员会，负责提出可能采取的措施。为了公平合理，由加拿大的莱斯特·皮尔逊担任主席，再加上比利时、荷兰、挪威和意大利的部长为委员会的成员。他们的工作虽很庞大，却一无所获。

正当我们的正式任务即将完成时，从欧洲传来了两个声明，使我们这个小鸽窝顿时骚动起来：9月19日，大家获悉英国政府将于10月25日举行大选；9月20日，艾森豪威尔将军在罗康库尔要求欧洲的军火生产要在1952年增加百分之三十三。我们只能说，幸亏这两件事都没有早点发生。

那天晚上我们回到华盛顿时，杜鲁门总统来机场迎接我们；他说我做了一件“伟大的工作”，这是过分的夸奖；我同他告别后，就回乡间去了。

加斯贝利的来访

9月24日，星期一，当时的意大利总理兼外交部长阿尔契德·加斯贝利来到华盛顿。我们在渥太华时，曾经在一起相处过，而且我早在1947年1月就认识他，那时他到我国来为意大利谋求并取得一笔巨额贷款。他是我

对之怀有敬意和好感的外交界同事之一。他为人诚实、坦率，对意大利忠心耿耿；不但如此，他对欧洲也抱有一种豁达而厚道的见解。他是一位勇敢而豪爽的君子，和罗贝尔·舒曼同样具有自由主义思想的一个开明政治家。他也同舒曼一样是一个出身于边疆的人——是意大利和奥地利一直有着争议的特兰提诺人——所以他也以比民族主义更为豁达的看法来寻求欧洲的和平。在墨索里尼执政期间，他在梵蒂岗避难，当图书馆职员。

我在担任国务卿以前，很少同意大利事务发生关系。贝尔纳斯先生亲自掌握这方面的事务，因为这些事务都集中在意大利和约上，使他在 1946 年为此而花了许多心血。在我重新过着平民生活以后，意大利于 1948 年举行大选，加斯贝利的天主教民主党在大选后牢牢地掌握了政权。1949 年，我重新负责主持意大利加入北约组织的谈判工作。我很快就知道意大利人坚信他们的罪行已得到宽恕。他们认为他们已抛弃了墨索里尼，抛弃了他的和他们的纳粹盟国，因而可以不负战争失败所造成的一切后果的罪责，而且确实使他们可以首先要求帮助。不过，在他们眼里，帮助已经变为单纯的理所当然的事情，假如拒绝他们的话，就会伤害意大利那种要把它们的利益同北约组织的盟国的利益打成一片的决心。只是由于加斯贝利那种明显的诚实态度，这种种声明才没有含有讹诈的味道。

我去车站欢迎这位总理，接着总统在午餐会上接见他；其后我们就埋首在三天的会谈中，中间只有一个晚上由我的妻子和我在安德森大厦举行招待会，和阿尔贝托

·塔香尼大使和他的妻子举行过一次晚宴。到了周末，我在旧金山和渥太华所得的旧病复发了，只得暂时停止工作，再去我农庄休养十天。

排在加斯贝利请求单上最前列的有：意大利对的里雅斯特提出所有权，修订意大利和约，意大利参加联合国，经济和军事援助，为意大利不断增加的人口寻找出路的问题。在这些项目中，意大利所坚决要求而又为南斯拉夫所坚决拒绝的，是意大利对的里雅斯特提出所有权的问题。1946年缔结意大利和约的会议上就为了的里雅斯特问题几乎使会议破裂，并有重开战端的可能。结果是搞了一个息事宁人的暂时妥协方案，使这个城市和它的四郊成为自由区并分成两区；主要由意大利人居住的城市称为"甲区"，由美英两国共同管理，一般市政则交给一个本地机构负责；大部分由南斯拉夫人居住的四郊，称为"乙区"，由南斯拉夫人管理。在苏联和南斯拉夫决裂以前，西方国家同铁托的关系处于紧张状态，意大利在1948年进入关键性的选举的时候，法、英、美三国于1948年3月20日发表了一个声明，赞成把整个自由区都移交给意大利。由于这个声明而引起了加斯贝利提出收回的希望，再也没有比这个声明更能弥合共产党阵容的裂缝了。

加斯贝利只要能找到听众，他就提出他的主张，他向我们国务院，向总统，向国会都提出过。我对他说，因为南斯拉夫激烈反对这个声明，假如铁托被迫而向斯大林讲和，那只会给西方利益带来严重的危害，对意大利尤其如此，所以不能以1948年3月20日声明作为解决问题

的基础。他回答说，他宁愿辞职也要坚持那个声明。而且他说，如果当总理意味着要放弃那个声明的话，他怀疑未必会有任何意大利政界人物来接替他的职位。他对总统说，假如的里雅斯特问题不能获得满意的解决，意大利任何一个民主政府都不可能在参加联合防务上得到议会的支持。如果意大利人竟然认为他们的盟国不能为意大利收回的里雅斯特的话，其结果就会有趋向于中立主义的危险。左右两派将夺去他的联合政府的选票。事情很清楚，我们之间在这一点上已不可能取得一致的看法。虽然在第二年我们又几次重新讨论过这个问题，但是，直到我们两人都去职之后，这才取得一致看法。我在同加斯贝利进行会谈时，南斯拉夫大使来拜访我，坚持相反的观点。为了对双方都显得公平和坦白起见，我对每一方都说了同样的话——即 1948 年 3 月 20 日声明早已为许多事件所否定，现在应当以种族的原则作为解决问题的基础；如有必要，可以通过交换棘手地区的人口帮助解决问题。

我对加斯贝利提出的另一个问题也不表同情——他认为意大利的人口过剩是个一般性的问题，可以由我们通过放宽移民法来帮助解决。总统和我对这个问题抱有完全同样的看法，虽则我对他何以得出同样的结论，从来没有探问过。我觉得，假如意大利想根据当时梵蒂冈的政策，以中世纪的眼光来对待节制生育，那只能怪它自己。要别人来减轻自己的愚昧所造成的痛苦，在我看来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因此，在 1952 年 1 月份讨论节制生育的国际会议举行以前，我们拒绝作出任何许诺。

在其他一些项目上，我们都能够取得一致的意见并发表了有益的声明，虽则这些声明就同几星期前与英、法所达成的那样，不过是经济问题性质的协议，也可说是只对将来提出一些希望而已。这次会见的重要收获是对意大利人的士气和自尊心起了作用。意大利人受到了同其他国家同等的尊重和热诚招待，他们正是非常迫切希望能同这些国家取得平等地位的。

甚至在我去休养时，这两个新问题还在我的耳朵里响个不停。

准备去巴黎

10月里，我从乡间回来以后，于10月25日乘“美国号”轮船去勒阿弗尔途中又过了几天安静的日子，在这段时期里，除了上述那些不大正常的惊吓以外，我的主要工作就是为在巴黎举行的联合国大会第六届常会作准备。这次大会被称为“裁军会议”，将于1951年11月6日开幕。1951年这一年，在几个大国之间不断地展开了激烈的宣传战，在各种不同的场合上出现了多次战斗：玫瑰宫里的旷日持久的战斗；我们在联合国攻击共产党中国为侵略者，共产党也在联合国进行反击，在福摩萨问题上同样指责我们为侵略者。7月里，总统向苏联主席尼古拉·什维尔尼克传递了麦克马洪—里比科夫决议，包括一个“美国人民向全世界人民包括苏联人民在内的友好宣言”，同时对造成苏联人民不能了解我们友好愿望的“人为障碍”进行了攻击。苏联在答复时，建议签订五大国和平条约，禁

止使用核武器，并建议在东柏林举行世界青年联欢节。伏罗希洛夫元帅攻击美国，9月17日，杜鲁门总统答复说，苏联的协定其价值还抵不上他们写上协定的那张纸。克里姆林宫为了同联合国唱对台戏，在维也纳举行了一次世界和平理事会会议。

经过整个夏天的意见交换，效果减少了，谩骂却增加了；助理国务卿约翰·希克森建议，如有可能，我们在即将到来的联合国大会上，可与英法两国一起提出一个关于限制和控制军备的严肃而可行的计划。他认识到俄国人接受这样一个计划的可能性是不大的，因为他们的行为清楚地暴露了他们要到处争取一些打如意算盘的人，而不愿意制订一个可以减少我们大家所面临的巨大危险的实际计划。不过，在他和我们所有的人看来，与其口头上宣称自己的计划真心诚意，还不如提出一个计划，以计划的条款来恢复人们对美国的意图和领导地位的信任。万一苏联愿意探索这种计划的可能性，我们就可以转过舵来从事一次稳当的国际冒险，从而使美国国内的各种意见都一致起来。

国务院得到总统和马歇尔将军及时的同意和鼓励以后，就着手制订了一个计划。我们在伦敦和巴黎一直讨论这个问题已达一年多，但没有取得多大的进展。杰塞普、帕罗迪和戴维斯曾一起在玫瑰宫里讨论过这个问题。从9月中旬开始，我们认真地工作起来，还告诉我们的盟国我们正在这样做，并且对他们说，迄今我们还没有什么明确的想法，也还作不出什么提案来。我们除了同驻华盛顿的英国大使馆人员交换了一些意见，从法国部长顾

问让-亨利·达里当那里听到一些照例的抱怨，说没有经常让法国了解到情况，此外，我们从这两个盟国都一点也没有得到什么。

直到10月23日，我们才把计划大纲送呈总统。得到他同意后，第二天就送给莫里森和舒曼。在我去欧洲之前，莫里森在大选前夕派人告诉我，说他不能表达英国政府的意见，并埋怨时间太局促，来不及进行研究，三方未能进行磋商后联合草拟一个提案交给即将召开的联合国大会。我答复说，“权衡下来，把这种性质的计划送交联合国大会还是利多于弊的。”等到这个口信捎到伦敦时，莫里森先生已经不当外交大臣了。继任他的艾登先生和丘吉尔首相都赞成全速进行下去。

三十二 “裁 军 大 会”

由于联合国第六届大会将在巴黎举行，我们不能依靠在纽约的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团的庞大班子。因此，包括代表、副代表、顾问、国会专职顾问人员、助理人员和新闻官员一行八十一人，浩浩荡荡地开到了巴黎。为了提供办公场所，我们包下了可以俯瞰凯旋门的古老的阿斯托里亚旅馆。这个名单，现在看来，似乎颇为惊人，但是，当时我曾对它仔细审阅过，并把它压缩到为大会工作和联系其他五十九个代表团所必需的最低限度。好客的布鲁斯夫妇把我的妻子、卢克·巴特尔和我安顿在处于伊埃那大街尽头的大使馆官邸，穿过一座小公园，就是大会将在那里举行的夏乐宫。

在这次大会中，安东尼·艾登和我成了密友。我们彼此相识和仰慕已逾十五年之久，但是，从来没有密切共事过。现在我们同舒曼和加拿大的莱斯特·皮尔逊一起，为大会的许多重大事件而共同工作了。除此以外，我的妻子和我还见到了他新结婚的夫人克拉丽莎·丘吉尔小姐。她是首相的侄女，同时是一位极其妩媚和聪明的夫人，她到巴黎来小住几天。此后她还在严重的困难面前并不出乎意外地表现得同样极其坚定和勇敢。他们的友谊使我们感到是一件乐事几达二十年之久。艾登和我合

作得非常顺利，在许多基本问题上都看法一致，而在这种场合，他真是一个多谋善断而又热心的伙伴。但是，在有些问题上，比如在伊朗和对待欧洲统一的问题上，他比我更为慎重，不敢逾传统政策一步。不难理解，因为他在制订这些政策上比我牵涉得更深的关系。

摩洛哥问题

在11月6日会议开幕之前的一些日子里，我们经常聚会，以协调法国、英国和美国在若干重要问题上的立场。在这方面，虽然开始碰到一些困难，我们却进行得相当顺利。最初在我们和法国之间发生的一些问题上，艾登对此显得是一个值得称赞的调停者。我们都同意支持法国在摩洛哥问题上的"是非曲直"，那就是反对联合国采取批评法国对摩洛哥政策的任何行动。但是，舒曼要求我们更进一步，要我们投票反对将这一项目列入议程。这样做就要违反范登堡时期的"世界市民集会"的原则，而这个原则是我们代表团内许多从联合国创始时起就参加过这些会议的成员所一致赞成的。这位参议员认为任何问题都不应当排除在议程和讨论之外，但是，行动必须严格限制于宪章所规定的权限之内。

为了解决这个难题，我竭力主张不是反对将这一项目列入议程，那将形成一种限制讨论的气氛，我们建议将这个问题搁置一下，等到总务委员会可以考虑并决定管辖权时再说，届时我们可以在这个问题上支持法国。如果决定下来对法国有利，这就可以了结此案。艾登热烈

地支持这个意见，他有力地论证说，这样比直接投票表决应否列入议程(对此，美国将弃权)，将更能赢得较多的票数，事实也确实如此。舒曼同意这一做法。幸而由于做了很多艰苦工作和某些巧合，这个计划奏效了。在总务委员会上投票结果是，六票赞成(美国，联合王国，加拿大，多米尼加共和国，挪威，法国)，四票反对(苏联，伊拉克，波兰，南斯拉夫)，和四票弃权(泰国，智利，中国，墨西哥)。

通过持续的努力和互相谅解，我们在为数可观的要点上取得了一致的意见：建议并支持把中国代表权问题推迟到会议结束时进行表决；支持墨西哥的帕迪利亚·内尔沃担任大会主席；在11月10日发表关于建立中东总司令部的原则声明；在前往罗马之前，集体同阿登纳举行首次会晤；开完11月24日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罗马会议，尽管对这次会议是否能起作用存有怀疑。我强烈要求坚持半年召开一次理事会的固定会期，而不要借口便利而任意变动。

军备的裁减和控制

最重要的是，我们就限制军备提案的文本以及提出的日期和方式取得了一致看法。将于11月7日，星期一巴黎时间十点钟在三个首都发布一项新闻简报。当天晚上，杜鲁门总统将在一次“炉边谈话”中讲到这一计划的目的和性质。我将在第二天上午向大会进一步阐述这个计划，随后由艾登和舒曼作支持性的发言。最后，在一般

在这个时候，它的国际行为是如此低下，需要作出很大改善才能把它提高到一般的未开化水平”。维辛斯基显然是意识到必须对军备控制采取某种建设性姿态以挽回一点苏联那个濒于破灭的和平形象，所以他在11月16日一般辩论接近结束时，作出了一个姿态。

他带着一只拴住的鸽子来到大会——这是后来赫鲁晓夫可以若无其事地干的一种拙劣的手法，但是，维辛斯基做起来却显得象他自己清楚地感觉到的那样愚蠢——他提出了一个用过去宣传中的若干片段所匆忙拼凑起来的裁军大杂烩。无条件禁止原子武器（没有监督）；五大国在一年内裁减军备和军队三分之一；所有国家提出军备和军队的“全部官方资料”；在安全理事会（即苏联拥有否决权）组织内建立一个国际管制机构。我发表了一个得到大会明显满意的简短声明，大意是对这些并不陌生的苏联建议的分析最好留待委员会去考虑，至于随着那些建议而发出的滔滔雄辩最好是不予理睬。

第二天，由各国代表团的成员组成的第一委员会（政治与安全）通过了它的议程，将三国计划列为第一项议程，而将苏联提案列在最后。

三国计划

我围绕着委员会的大桌子，以非正式的姿态，作了一个长达八十分钟的发言，其目的不仅是要说明这个提案，而且是要使代表们，并通过报纸和电视使公众弄清这个提案所涉及的许多复杂和形形色色的问题。苏联的宣传和建议是企图使不熟悉这些问题的人落入它的圈套，并

使他们轻信这些具有理想目标的声明提供了达到这些目标的方法。

我说，我们的建议是为有关控制和裁减各国一切大规模武器的四个主要问题提供一项国际解决的途径，而不是解决这些问题的万灵药。这些问题是：第一，提供各国所有军备的充分、准确、公开和不断更新的情报，这可以通过揭露和核实来做到，从而消除它们目前严格保密的状态；第二，限制和裁减军备；第三，废止原子武器；第四，建立保障措施。

我指出，很明显，一个拥有六十多个国家的会议不可能就这一问题起草出一项国际协定来。因此，我们建议建立一个与原子能委员会和常规军备委员会具有同样成员的裁军委员会以取代这两个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应当根据三国提出的决议案的一般指导原则负责起草必要的一个或几个条约。为了执行条约和进行必要的各种监督，应该建立一种具有连续性的国际组织（可能不止一个，或者一个而有几个不同部门），按照规定的权限检查工作执行情况和提出必要的修正建议。

提案国认为能够也应该立即开始制订条约的工作。这些条约要到朝鲜战争结束后才能生效，但也不能因此而真正的拖延下去。这是我们唯一的条件。任何一个有常识的人都可以看到，在国际事务和成功地执行前面所提出的这种计划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关系。在国际紧张和冲突正在增长期间，各国不可能会在一种限制和裁减军备的制度上取得一致看法。但是，如果我们就这个提案认真进行协商，它本身就有助于减少紧张形势，增加解决

紧张形势的可能性。

我最后说，摆在我们面前有着一个伟大的机会，可以从黑暗而可恶的宣传胡同转而走向一条充满希望与和平的康庄大道。我的国家和我们法国和美国的同僚们准备抓住这个机会；我相信将有许多代表随时准备同我们合作。在我们中间是不是所有的人，或者有足够多的人随时准备这样做呢？这是等到开始辩论的时候就可以揭晓的。

爱丽舍宫的宴会

那天晚上，奥里奥尔总统和夫人为代表们和他们的夫人们举行了一次盛大而豪华的宴会。法国人安排得十分雅致和卓有成效。宴会后，特赖格维·赖伊秘书长敦促我去同维辛斯基交谈，他正同一群俄国人和东欧人站在近边。当我由我们的译员陪同着这样做时，全场都瞩目我们了。我向那群人招呼后，就对维辛斯基说，我希望他已注意到我同他的习惯做法相反，我在发言中总是避免说出触犯他或他的政府的任何言论。我希望他在同我讨论任何问题时能够随便一些，而不必拼命进行使人困窘的滔滔雄辩。雅各布·马立克插嘴说，我曾经指责过苏联有奴隶劳动营。我转向维辛斯基说，我是在同他说话，不想同马立克辩论。维辛斯基很明白，我一点也没有讲过这种话或其他任何无礼的话，我也不打算这样做。

我接着说，我们都是律师，对于针锋相对的不愉快的争论是无所谓的。在私下里，我们可以轻松一些，也可以

彼此开开玩笑。但是，在公开场合和在非常严肃的问题上，我对笨拙而乏味的幽默是不感兴趣的，而且实际上我是深为反感的。马立克再一次打岔说我不诚恳，或者说缺乏建设性。我对此不加理睬。在结束这场讨论时，我说，我已经尽我所能地以一种有益的方式进行过一番辩论，现在得看他了。说实在话，如果他愿意停止玩弄鸽子而愿意自己飞上一根树枝的话，我是愿意飞上他旁边的树枝，并设法搞出一点东西来的。他咕噜了几个字，译员没有听清。于是我道了晚安后，离开了他。

这次会晤我所能看到的唯一结果是把他辩论的风格提高到差强人意的程度。

提案几经周折而告终

我们在几天后飞往罗马参加北约组织理事会会议时，由杰塞普大使负责在联合国大会处理裁军提案和其他政治事务。11月24日，即在我们离开巴黎的翌日，维辛斯基对三国建议进行了攻击。11月30日，政治委员会指定由四大国的代表和大会主席内尔沃组成一个小组委员会，在12月10日前拟出一个裁军方案。就此开始在大会中进行并不罕见的谋求妥协的活动，结果是内容消失，仅存形式。

小组委员会的英国代表，国务大臣和后来的外交大臣塞尔温·劳埃德有一个在一年后又显露出来的弱点，他以取消分歧来弥合分歧，就是放弃自己立场的主要之点而采取对方的立场。他多次建议把原子武器分开，放

弃限制和裁减军备，放弃以适合于防务的军备水平来作为限制的标准，等等。我们的政府和代表团巧妙地拒绝了所有这些建议，不愿意把围绕着裁军的一些实质问题和我们同苏联的一些实际分歧掩盖起来。

小组委员会在规定的日期，就我们三国的和苏联的有分歧而尚未弥合的建议提出了报告。杰塞普大使有力而透彻地评论了苏联持不同意见的理由，这些理由集中在对所有国家的安全有重要关系的一些规定上，也就是所有国家都应该了解每个国家履行它的义务的情况。一个月后，苏联试图掩盖分歧，提出了一套新的，同样是骗人的建议。我在1952年1月16日的记者招待会上曾就此作过剖析。

我们的1951年的联合提案，就它的主要目的——减轻军备竞赛的危险性和负担来说，虽然失败了，但是，就另一目的来说却成功了。对谁赞成哪一方和赞成什么，再也不存在什么怀疑了。

我们会见了阿登纳

在向大会提出了裁军提案之后，康拉德·阿登纳总理应三国的邀请，前来巴黎同舒曼、艾登和我会晤。在他来访的第一天，11月21日，他分别拜访了我们。第二天，他同我们一起聚会。由于这是他在战后第一次访问巴黎，也是四国外交部长的第一次联合会议，这是德国和同盟国关系中的一个里程碑。从三个同盟国的高级专员的一份报告中，我们已经了解到，根据我们9月在华盛

顿会议上的授权，他们同总理的谈判已经取得了令人满意的进展。谈判涉及给予联邦共和国作为一个分裂的德国和我们在柏林所承担的责任可以准许的主权，以及促进共和国同欧洲防务连结起来。可以想象得到，有些问题依然存在。这是因为美国愿意走得更远和更快，而法国不愿这样做，英国则是介乎我们两者之间。我们竭力使这些分歧限制在我们三人中间讨论，而不把这些分歧暴露在德国人面前。

在我看来，经过两年多的时间，阿登纳已增强了自信心，成为给人以深刻印象的人物了。他和我在大使馆午餐时进行了第一次会谈，参加的有布鲁斯大使、麦克洛伊高级专员，和乔治·珀金斯助理国务卿。陪同总理的是国务秘书沃尔特·哈尔斯坦，他是以阿登纳本人为首的外交部的执行官员。午餐后，我们在起居室内会谈时，总理直言不讳地说出了显然是他主要关心的事情。他问道，占领国会不会利用德国作为一只卒子，以试图同俄国人获得一项解决办法？他对我们的英国和法国伙伴怀有十分严重的戒心。从这些国家的报刊和议会所显示出来的公众和政府的舆论，都对德国抱着强烈的猜疑和敌视态度，虽然这是可以理解的。他能够指望美国采取什么态度呢？不单是指望杜鲁门总统采取什么态度（他已经将他和他的政府的立场说得很明白），而且是指望今后全国将采取什么态度呢？他说，也知道我们将在一年内举行大选，也知道我们的报纸所登载的关于大选的推测情况。

这似乎是一个公正而坦白的问题，应该得到直率和坦白的答复。我说，由于我们立场不同，经历不同，美国

人并不象法国和英国那样对德国抱有猜疑和敌视态度。但是，这种态度，在我们对苏联和共产党中国来说，那远比英法两国中的任何一国要来得严重。他可以相信，无论是现在的美国政府或者是从任何一党产生的任何一个目前可以预见的继任者，在要求西欧和德国同我们一起参加共同防务措施以反对苏联侵略时，决不会为了试图安抚共产党大国而赞同牺牲我们的一个盟国。这既是徒劳的又是不道德的一种做法。我指出，麦克洛伊和珀金斯都是共和党的成员，我要求他们谈谈他们自己的看法。他们对此也表示了同样的意见。我们都分析了冬季在"欧洲驻军"问题上的辩论情况，指出当时美国那种孤立主义主张的缺点。

我们继续论证了，不仅是占领国而且是整个西欧对德国的态度将视德国的行为而定。如果德国，象它已经在做的那样，决心继续做一个欧洲的好邻居，同时在合作防务负担中分担它的义务，它就能够并将会受到作为一个平等的伙伴的待遇，在制订政策和作出决定中享有平等的发言权。经过了过去二十五年的经验后，在西方重新建立相互信任的过程中，双方不免仍会彼此相互猜疑，但是，阿登纳应该记住，英国人和法国人远比德国人具有更为充分的猜疑的理由。我们建议要光明磊落地待人，同时要求别人也这样做。如果那样一种关系一旦破裂了，主要受害者将是整个欧洲。

后来麦克洛伊对我们说，阿登纳对这次会谈的坦率态度感受很深。麦克洛伊说，他对在第二天会晤中所观察到的艾登、舒曼和我的关系——即存在于我们之间那

种无拘无束,友好亲密和相互了解,也有同样的感受。麦克洛伊又说,重要国家的代表们能够彼此相处得象我们那样互相谅解,又可说是确实热情亲切,对阿登纳来说,是一个全新的概念,因为他在国际事务的经验过去是非常有限的。他感觉到他是在同这样一些人打交道的,即在这些人中间一切都是坦白的,友好的,并且是可以摊到桌面上来的。从此以后,阿登纳和各高级专员之间的讨论就进行得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好了。

在我们于11月22日下午在法国外交部同总理会谈之前,我们三人先同各高级专员磋商了一会,就打算向总理提出的若干问题取得一致的看法。各高级专员已经进展到可以同他一起拟订条约的关系,包括一项总协定和四项(或更多)辅助协定。这些协定将取代具有干涉德国事务权力的占领法规,盟国高级委员会以及各种土地委员会。还有一些要留待总理同我们讨论的问题。一般说来,这些问题都或者是属于理论性的,未得俄国人的同意是无法解决的,或者是解决的时机还没有成熟的。这些问题都要以不同的方式加以处理。

在第一类中,例如,阿登纳担心一旦德国遭到外来侵略或内部骚乱的危险时,同盟国在德国恢复权力的保留权会被不适当地延长。他希望有提出申诉的某种安排。我指出,这是完全不现实的,因为外来侵略的危险是不可能事先预见的,也不可能通过司法程序处理的;而国内骚乱的危险,或者能够完全加以扑灭,或者不能。在某种情况下,我们倒是巴不得马上交还权力;而在另一种情况下,我们就不能了。但是,为了解除对我们诚意的任何疑

虑，我建议在提出申请的情况下，可由北约组织理事会对之进行一次审查，这是大家都愿意接受的。

属于同类性质的是，舒曼希望在这些协定中，要有一份禁止德国生产何种武器的清单。在这个问题上，我认为，我们必须先决定一下，我们究竟是把德国当作一个盟友，还是当作一个敌人；采取一种互相矛盾的态度将是非常不祥的。在总统的支持下，我向艾登和舒曼建议，我们或者把分配成员国的武器制造问题交给欧洲防务集团去处理，或者同阿登纳拟出一个关于德国将不生产哪些武器的单边声明。几个月后，在伦敦的第二次四国会议上才就这些方面采取了重大的措施。

在第二类中，是总理要求对德国的东部边界作出某种声明。在这里，找到的解决办法不是采取划定或规定边界的不明智做法，而是一致认为"他们(四国)政府的共同政策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德国同它从前的敌人进行不受约束的谈判，达成一项对整个德国的和平解决办法，它将为持久和平奠定基础。他们还一致认为最后解决德国边界的问题有待于这种解决办法的达成。"这刚好是上面提到的、阿登纳的主要担心之一，即担心我们三国会同俄国人一起以凡尔赛条约为蓝本制订出一个强制性的和约，并以此强加于他。

关于德国对防务的承担问题，包括维持驻在德国的盟国军队和德国的军事结构，这在目前阶段，对德国人和对法国人都同样是困难的。就法国来说，象我们在1950年做过的那样，我们再次经历了调查他们预算状况的痛苦，来弄清楚他们向我们要求的六亿美元是为了弥补外

汇逆差，还是为了弥补预算赤字，或是两者兼而有之。如果属于前者，我们不能在法国人为安置我们的地面和空中部队提供土地和设备之前，就把美元化在法国，但是，他们为了国内政治上的原因，在这方面，进行速度之缓慢简直令人苦恼。我们也有我们自己的麻烦。我们的经费全都是通过三个人——合作署的哈里曼、国防部的洛维特和财政部的斯奈德支付的。这三个人虽然都是好朋友，又都是玩扑克的好手，彼此都不急于要承担别人的正当义务。此外，还得加上美国人那种对每个决定都要反复审查到失却作用为止的令人恼火的习惯做法。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把一项承诺看作是最后决定，而不再受到某些并不熟悉情况的人们的审查。但是，最后我们还是对法国人作了保证，虽然并不令人满意，而且将来可能产生误解，但是，毕竟使他们得以加强自己的武装力量。

关于德国对防务的承担问题，由于以法国人和英国人为一方和以德国人为另一方，在对待这一问题上有分歧而变得复杂了，目前德国为了维持占领军面付出的款项显然太高，不能继续支持盟国的驻防军。但是，目前还确定不出一个合理的数目来。同样，当时也还无法确定那支还没有取得一致意见的德国武装力量的开支。法国人和英国人建议同意将总数定为一百三十亿德国马克，这就德国的防务开支说来是一个合理的总数，然后再由此倒推算出适当的分项开支数字。联邦议会，象任何议会一样，对其明细用途知之不详，在批准如此庞大一笔款项时将发生极大困难。我们的讨论再三再四地提出

了这些困难，就是提不出任何解决办法来。这将在1952年再次在里斯本举行一次三国会议和在波恩举行一次四国会议后，才能提供出相当精确的数字，使得能够制订出协定来。

同阿登纳会谈的气氛很快就变得随便而友好了。这种现象的一个有趣的标准就表现在翻译工作上。起初，一切用法语或英语讲的东西都要为阿登纳译成德语，而把他所讲的话译成法语和英语。不久，大部分讨论都变成阿登纳和舒曼两人的交谈，舒曼是先会讲德语，后会讲法语的。不久，他开始用德语回答阿登纳，而不等待任何翻译了。这对艾登或对我来说，都并不觉得有什么不便之处，因为我们迟早总可以了解他们讲些什么，但是，这却使舒曼那些外交部的助手大大感到不快。他们都是一些绝对主张使用法语的人。他们拉拉他的上衣后摆，要他等到把他已经完全了解的东西用法语和英语复述一遍之后再作答复。

我在打给总统的一份电报中综述了我的印象：我们的会晤是在良好的气氛中进行的。我认为，我们已经达成的一些具体协议比起我们在平等基础上进行会谈的这一事实来，是次要的。对阿登纳的主要疑虑，即盟国可能以牺牲德国为代价，同苏联人达成一项统一德国的交易，我们已经圆满地使他感到安心。关于他对东部边界的关注，他已得到保证：贝尔纳斯先生的立场仍然有效。然而，我又说，涉及到德国的防务承担问题，我们还没有能够进展到超出仅仅一些原则的程度，并已授权各高级专员就从1952年4月1日开始的财政年度的一百三十

亿德国马克的总数，着手进行谈判。同时，我们重申了1950年9月的关于德国安全的宣言，这将使我们在德国能正式同北大西洋公约联结起来之前，可以顺利应付过去。

三十三 北约组织在罗马集会

国务院的变动

布鲁斯夫妇陪同我们去罗马，因为我在前面已经提到，大使是我们在欧洲防务集团谈判中不可或缺的唯一专家。从另一个理由来看，这也是幸运的。我在罗马时得到詹姆斯·韦布副国务卿的通知，说由于他患的严重周期性偏头痛症病情加重，要求立即辞职，以便进行诊断和治疗。由于韦布的告退而受到极大的影响的三个人中，有两人在罗马。戴维·布鲁斯将去华盛顿担任副国务卿，詹姆斯·邓恩将调往巴黎大使馆。第三个，就是将调来罗马的埃尔斯沃思·邦克，他现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我在向总统提出这些建议之前，曾作过长时间的考虑，并同来自华盛顿的卡莱尔·休梅尔辛进行了好几个小时的商讨。他是荷兰裔的宾夕法尼亚人，是我们可靠的负责行政事务的副国务卿帮办。大部分的考虑是认为这些人不宜调动，因为他们都正在关键和艰巨的岗位上做着卓越的工作。本届总统任期只有一年多了，此后的未来是无法预见的。总统还没有表示过他有谋求再任一届的意图。杜鲁门夫人对总统有很大的影响，她坦率地担心他是否能再经受象以往那样的四年紧张生活。而在1952年

的新任命定局之前，1953年年初总统的更迭很可能会带来大使们的变动。

一个有力的论据使我们转向另一面去。布鲁斯将给国务院并给我和总统带来巨大的帮助和力量。他很受到国会的重视（部分是由于他多年远处欧洲的那种魅力），同时也很受到全国有势力人物的重视。一个重要的障碍是，他自己极其厌恶副国务卿的某些日常工作，主要是发表公开讲演和出席国会的各种委员会。为了使他可以考虑这一任命，我指出，迪安·腊斯克和我已经在做大部分的国会作证和讲演工作，我们可以继续再做下去。我们在国务院内，能干的人有的是呢，我只消举出腊斯克、保罗·尼采和弗里曼·马修斯这三个杰出人物就够了。他们都能很好地接过这项职务，但是，在国务院内部调动他们，并不会增加国务院的力量。

权衡下来，我们认为将布鲁斯调到华盛顿前线，而将邦克派往欧洲前线，对全局将最有帮助。得出了这个结论后，邓恩调往巴黎就似乎是不容置辩的了。他起初任国务院欧洲司的司长，又在罗马这个有利的地点待了五年，他从一开始就熟悉欧洲的战后局势。1952年欧洲的关键地点将是波恩和巴黎。邓恩可以比其他任何人更快地掌握巴黎的情况，同时我们将竭力拖住麦克洛伊留在波恩，直到条约制订出来和占领状态大体上结束为止，而他的私人事务始终要他离开政府。

另一次理事会会议遭到挫折

北约组织理事会的罗马会议，象渥太华会议一样，继续遭到挫折。这是由于在北约组织之外的关于欧洲防务的两个根本障碍上没有取得进展的缘故。这两个根本障碍是：为争取德国对欧洲防务承担巨额经费的安排，以及防务的军事需要同欧洲经济和政治结构的能力的协调。关于德国负担的安排，阿登纳同高级专员公署在波恩的谈判比舒曼关于欧洲防务集团的谈判有了较大的进展，后者因埃尔韦·阿尔方主持的部长以下一级会议在技术上的争吵而停滞不前。理事会临时委员会的三贤人在第二个问题即协调需要和能力上，工作很努力，但是报告还没准备好，而且在两三个月内也不见得会准备好。因此，这些会议注定要受到挫折。我就个人对这个会议的估价打电报给总统说，"重大问题依然未能得到解决，如果我们要解决这些问题，尚须在今后的六十天内作出最大的努力。在国际领域内我们正在经历着生产人员所说的'损耗阶段'。"我接着说，艾登和我认为，同时使舒曼感到，他必须争取在年底前使他的种种努力获得一些结论。否则，我们就有长期陷于僵局的危险，并势将放弃北约防务集团。艾登是个最坚决的盟友，尽管丘吉尔在伦敦表示出自相矛盾的态度。

由于比利时、荷兰、卢森堡三国部长们的背叛，以及由于我患了经一位罗马医生诊断为肋膜炎而不时卧床休养，会议本身的消沉状态加甚了。艾森豪威尔将军的参谋

长格仑瑟将军在致开会词时描绘了一幅令人毛骨悚然的情景，说是如果俄国人倾注全力，对西欧发动一场攻击，结果将是怎样一场浩劫。不管格仑瑟所引用的数字的正确性是否为其后的情报所证实，这种阐释只能挫伤而不是激励欧洲防务的努力，因为不坦率说明美国核武器威慑力量的因素，就会使防务工作看来成为不可能。正当部长们在消化这个阴暗的报告时，艾森豪威尔将军发表了一篇鼓舞人心的演说，说明欧洲迫切需要在政治上联合起来。听了这篇演说后，理事会休会喝咖啡。在此期间，美国代表团与其他一些代表团混在一起，想搜集人们听到这个演说后所引起的反应。大家几乎一致对军事指挥方面明显地试图施加压力以达到一个政治效果，即欧洲一体化所造成的影响很有意见。艾森豪威尔将军并不知道，听他这篇政治演说的人们在这问题上早就存在着激烈的分歧。

我的聪明、机灵、幽默的朋友，卢森堡外交大臣约瑟夫·贝赫加上了另一种评论。他说："我认为不久，我们将失去我们的最高司令官。"我感到不解。他继续说，"是的，这些迹象是不会错的。我们的司令官将很快离开我们去竞选你们国家的总统了。"不到四个月后，他确实就这样做了。

在巴黎讨论防务集团时，以比利时的保罗·范·齐兰为首的比、荷、卢三国同法国，意大利，及德国在谋求集团内统一的程度和范围上发生了相当大的裂痕。这个问题是这样形成的：比、荷、卢三国都不愿意把它们所有的军事力量不论在和平和战争时期都置于超国家的指挥之

下，并且在宪法上也存在着困难。但是问题还要更深一层。它们认为在经济领域里，比、荷、卢集团的一体化，在一个情况大致相同的、秩序井然的小国地区内，正进行得相当顺利。如果把它们吸收到法国、意大利和德国那些比较大的、更加混乱的和性质不同的经济事务中去，它们势将处于被淹没而无权的地位。再则，它们之所以被吸引到这些问题上来，主要不是由于经济原因，而是由于军事问题，在这个方面它们的份量必然是微小的。

这些反对都是很有道理的；这些反对意见暂时由于规定在非军事领域达成一体化可以分期完成而暂时被搁置了起来。此后，等到防务集团的设想在1954年遭到失败，继之对欧洲经济共同体（共同市场）进行墨西拿谈判时，还得对这一些问题进行大量耐心的讨论和调整。但是，此刻这些问题还是处于引起争吵的阶段。

比、荷、卢集团对于艾森豪威尔演说的某种不满竟波及到我了，因为他们怀疑是我鼓励他这样说的。这虽然完全不是事实，然而却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根据欧洲的惯例，一个军人除非受命这样做，是不会讨论到政治问题的。在加斯贝利在马达马别墅为他的北约组织客人举行正式宴会后，德克·斯蒂克和我在花园里散步，碰到了一群比、荷、卢的同僚，他们开始把他们的困难归咎于我。在他们的批评尖锐化的时候，斯蒂克来打圆场了。

他说："喏，喏，我们必须同我们这位美国同僚订立一个马达马别墅条约。无论他们怎样称呼你，迪安，决不会说你是个不受欢迎的人。请记住这个暗号，'N.A.L.'——决不是个不受欢迎的人！"从此以后，在他给我的私

人电报或信件上他总是这样签名,"决不是个不受欢迎的人,斯蒂克"。这使国务院的人感到不解，他们还以为这是一个密码;在某种意义上说,它确是一个密码。

马达马别墅,是文艺复兴早期建筑中最精致,最优美的典范之一,它是由拉斐尔设计和装饰的,他的壁画仍然使我们在那里就餐的T型大厅增添光彩。这个别墅是由一个梅迪奇教皇为一个贵妇所建筑的，它因此而得名。就餐时坐在我旁边的是意大利的公共工程部部长。为了避开意大利对的里雅斯特的要求这个不可避免的问题,我请他考虑三个问题,并请他经过仔细思考后给我答复。这三个问题是：他是否愿意当负责建筑这个马达马别墅的红衣主教？他可希望这所别墅没有建造过？他可认为拉斐尔会欣赏这个宴会？

他在思考的时间给了我们享受一道好菜的机会。接着他对我提出的三个问题全都作了否定的答复。尽管马达马别墅是这么美丽，它却是巧取豪夺和强迫劳动的产物，他为没有负责造过这所别墅而高兴。另一方面，他却没有希望这所别墅从来没有建造过。这所别墅的华丽仍不减当年并继续给人以快感，而古人的伤心事是容易忍受的。我们对这些伤心事感到遗憾,但不会为之流泪。最后,他不能想象拉斐尔会欣赏我们的宴会。第一,没有贵妇们参加固然大煞风景，而没有各种艺术家参加也一样无趣。他置身于这群人中准会茫然不知所措,或许会觉得厌烦、因为这群人是如此一心一意地在想到战争和政治问题。我对我伙伴的答复给予高度的评价，并对这番愉快的谈话表示感谢。

年终总结

在欧洲度过了精疲力竭的一个月之后，纵然是一次在十二月横渡大西洋的海上航行，也带来了令人愉快的休息。在这一个月中，我同三十五位到四十位外交部长进行了个别会谈，同其中一些人会谈了多次，还积极参加了许多大型而且常常是公开的会议。在会后的几个星期内也不能指望担子会有任何减轻。12月份照例要对新闻界和公众作一番年终回顾。对此，我在12月19日举行一次时间较长的记者招待会，并对纽约犹太退役军人会作了一次演说。我现在回过头来重读我过去这些讲话时，在回顾从现在看来似乎是令人沮丧的一年的那种轻快情绪时使我印象十分深刻。譬如说，在谈到欧洲时，我以关于冬天的感触开始："在春天来临前的几个星期中，土地都在强烈的活动。每种形体的生命都冲破了束缚它的外壳，并正在从半冻的土地中往上冲。一些坚强的形体已经破土而出。一场晚霜威胁着一切。我认为这里也是这样。"

我继续说，一年前，欧洲的防务大体上还处于希望的领域，这种希望是由于艾森豪威尔将军被任命为最高司令以及采纳了联合防务计划而产生的。现在最高司令部已经成为现实。美国军队已增援欧洲，同时欧洲本身正在三条战线上前进。哈里曼先生的理事会临时委员会工作得很努力，把热情和实际结合起来，正在产生具体的结果。我们同阿登纳总理的会谈有希望使德国真正恢

复主权，并争取它参加到集体安全的工作中来。舒曼先生的促成一个欧洲防务集团的种种努力正在向前推进而且前途很有希望，加上煤钢计划已在法国议会中得到绝大多数的通过，表明已向欧洲的统一和力量跨出了两大步。

我说，我们同西半球外长们的春季会议为我们应付当时拉丁美洲所经受的经济困难作了准备。但是，在中东，我们失利了。希腊和土耳其这两个灿烂的地区，在它们加入北约组织时正在建立经济、社会、政治、和军事的力量，却由于威胁着伊朗和埃及的困难而显得黯然失色。在远东，在朝鲜和菲律宾，在走向稳定和和平方面有了很大的进展，东南亚的情况也似乎颇为良好，在这一地区迈进的一大步是同日本的大胆面成功的和平谈判以及随之而来的安全条约。

在这年年终之际，我们和我们的英、法盟国又重新想起了一个希望和目标，那就是从人类的心灵中和肩膀上解除对战争的恐惧和军备的负担，这一希望和目标由于近来莫斯科的强烈反对，正在日趋暗淡。维辛斯基先生曾嘲笑我们，但是，当世界上其他国家使他认识到这不是开玩笑的事情时，他转而更为狡猾地反对我们了。其他一些批评家认为我们的提案平淡无奇，因为它并没有跳越种种困难以取得轻易的结论。但是这些困难却关系到世界全人类安全的大问题。联合国大会是这样想的，并指定了一个委员会进行工作使建议变成协定。不管有无信念，我们将尽我们所能地去做，希望它总有一天会成为可能。

我以林肯的箴言同我的听众告别："坚持正义，因为上帝使我们看到正义，让我们继续努力，完成我们正在从事的工作。"

三十四　四国部长在伦敦开会

1952年2月16日（星期六），部长们开始了从1950年9月我们第一次提出将德国引进伟大的防务联盟以来的最重要的讨论。这次讨论由艾登和我的“二重唱”揭幕。第二天，舒曼参加国民议会辩论后回来，上升为“三重唱”。星期一上午阿登纳的到来，凑齐了“四重唱”，一直持续到星期二下午我们三人前往里斯本为止。这些却是在外交部举行的正式会议，有为数众多的顾问人员和忙碌的记录人员参加。非正式的、随意交换意见的饭后谈话一去不复返了。

在伦敦会议期间，我对阿登纳的钦佩继续增长。他在杂乱无章的翻译中对问题领会得很快，判断高明，而又果断。我发现自己往往同意他的意见，而和其他两人的意见相反。当工作组送来建议的草稿时，他能够立刻表示接受，拒绝，或提出具体的修改。同时，在我的印象中，他作出的判断是以对目的和后果的长远考虑为依据的，而不是目前政治上的权宜之计。舒曼透露出他意识到在内阁和国民议会中的威信下降了（这在三个月以后变得更加清楚），因而不大愿意越出自己的职权范围。艾登，在那时、尤其在里斯本，以及后来在波恩，可以指望他始终坚持正确观点，和我自己的看法趋于一致。如有时需

要一点时间才能使他达到这一点，那是很值得加以等待的。

会议从两人开始

由于舒曼滞留在巴黎，艾登和我利用这段时间就若干麻烦问题寻求我们的共同立场。我们必须竭力促使舒曼不再神经质地执迷于取得防止德国将来可能退出欧洲防务集团的保证。这是一个不切实际的想法；我们两人谁也不主张成为集团成员；我也不愿要求国会进一步扩大我们对欧洲业已承诺的庞大义务。艾登愿意再次向舒曼保证，如果一旦欧洲局势出现这样一种剧烈变动时，英国将给予坚决的支持。同时我们一致同意必须同时对舒曼和阿登纳施加强大压力，制止他们在萨尔问题上互相扯皮，同时排除在目前激烈争论这一问题。法国希望同萨尔经济上联合，而担心它同德国合并。德国希望给予萨尔以政治上的自由，让它决定自己的命运，而担心它同法国的经济上联合是阻止德国实现希望的一种手段。舒曼和阿登纳，通过由我们保证的庄严协定，目前必须推迟对萨尔问题作出决定，同时应当停止一切不利于这个问题的行动。艾登愿意再次充当积极的角色。

在作出条约安排以达到结束占领之前，另一个需要决定的问题是检查占领当局对他们占领区内战犯的判刑情况。这是应由德国当局执行的。为此我们商定，建议由三个盟国成员和三个德国成员组成一个检查委员会——外加一个中立国成员，倘若阿登纳想要一个的话。全体

一致通过的决议，应对所有成员国具有约束力；不是全体通过的，只向德国当局提出建议。关于在德国生产民用飞机的麻烦问题，艾登有一个国内的政治问题，而我们对此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我们想出了一个好主意，就是将这一问题提给阿登纳，他可能作出这样的决定：由于禁止生产军用飞机，购买可能比制造民用飞机经济得多。

最后，我们决定促进欧洲防务集团和北约组织之间的联系，这在两天之前我们曾同舒曼讨论过，就是：在双方同意下或在任何一方的任何成员认为对它的安全存在威胁而提出要求时，双方理事会将随时召开联席会议。

舒曼加入我们

当舒曼加入我们时，我们的第一项任务就是把关于德国承担维持盟国为了共同防务而驻在德国的军队这一复杂而纠缠不清的问题，弄得简单而有条理，以便同阿登纳进行讨论。下列三项决定非常有助于做到这一点：第一，只考虑从四月起的以后两个德国财政年度，在第一个年度我们假定防务集团还没有生效，而在第二个年度它将生效；第二，任命一个置于高级专员之下的工作组，审查战胜国军队加于被占领德国的费用和实施情况，并将它削减到作为一个东道盟国对为了联合防务而前去支援的客军可能合理负担的程度；第三，假定德国防务预算的总数（包括它自己军队的供给和对盟国军队的维持）应以理事会临时委员会报告所建议的一百亿德国马克，作为讨论的依据。就第一年来说，有待最后决定的问题将是

确定一个为维持盟国军队费用的总数目，它将较德国目前支付的为少，并远低于预算的数字，因为德国的武装力量还没有组织起来。在第二年，问题一方面是较前简单了，但另一方面却是更为困难了。防务集团中的法国军队将由集团的预算负担，正如其他成员国的军队一样，而对预算的分担将按照它本身的程序拟订出来。关于德国维持英国和美国军队的负担问题，则应由联合王国、美国、德国和防务集团通过谈判来决定。这些问题中的某些问题是困难的，但是现在是可以理解的。

转到对德国生产某些军用物资的安全管制，法国人现在采纳了英国的意见，即他们所说的一项关于不生产某些项目的具有约束力的单边声明。我们宁愿采取较少歧视的办法，由防务集团建立若干"前沿地带"，在这些地带，任何人都不生产这些项目。但是，对我们来说，更加重要的是将"炮筒"和"发射药"(即炸药)排除在清单之外。在欧洲盟国向我们要求的军事援助中，百分之二十是用于弹药的，相当大的一部分是用于大炮的。如果德国两者都不生产，那么负担将继续加在我们身上，这是完全没有必要的。舒曼的关于不准重建克虏伯的要求是不能令人信服的，假如德国为了共同防务而重新武装的话。

关于阿登纳必须停止对非卡特尔化规划的拖延并应于春季完成这一点，我们容易地取得了一致意见。位于解散清单前列的是鲁尔煤和焦炭的经销机构德国煤炭销售公司。舒曼答应在这次访问期间，他将同阿登纳拟订出一项把萨尔问题排除在争论范围以外的计划。

阿登纳凑足了四个

当2月18日(星期一)阿登纳加入我们时,会议的进度加快了，规模扩大了。和我一起的有吉福德和布鲁斯两位大使;高级专员麦克洛伊以及他的工作人员雷伯、劳卡夫和莱因斯坦：负责欧洲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珀金斯和德国科的拜罗德上校；政策设计办公室的保罗·尼采;助理国防部长纳什。其他部长拥有相应的阵容。对于我们三人提出的审查战犯处刑问题，迅速达成了协议。关于德国维持盟国军队的负担问题的讨论被搁置了一天，以便使阿登纳可以就前一天才收到的理事会临时委员会的修正报告和财政部长弗里茨·谢菲尔商量。在午餐时间，我的妻子来和我一起走过大街到十号[①]同首相和丘吉尔夫人一起进餐。

回到外交部后，阿登纳毫不犹豫地接受了关于北约组织和欧洲防务集团理事会举行联席会议以及由他发布一项有关德国不生产某些战争物资的声明的建议，如果我们能对清单同意的话。他还进一步表示他愿意接受一项防务集团关于在前沿地带不生产这些物资的决定，包括德国和所有或一部分其他国家。舒曼开始作了一个杂乱无章的发言,讲到重建德国军事工厂的有害心理影响。看来这是无的放矢，除非是针对那些新从法国外交部前来参加讨论的人的。为了避免在我们中间引起麻烦，我建议指派一个小组综合这些意见，作成一项备忘录供部

① 即唐宁街十号英国首相官邸。——译者

长们第二天上午考虑。

那天晚上，我们一大批人员在卡尔登花园同艾登先生共进晚餐。我坐在舒曼和法国高级专员弗朗索瓦-庞赛之间，而阿登纳坐在桌子对面艾登旁边。谈话转到写回忆录的问题。阿登纳对弗朗索瓦-庞赛说，"假如在你的回忆录中对我客气的话，我在我的回忆录内也将对你客气。"弗朗索瓦-庞赛同意了。舒曼悄悄地对我说，"阿登纳会上当；他将先死。"餐后，艾登将阿登纳和舒曼两人留在一间屋子里，让他们商定一项办法，使萨尔问题冷却下来，并把这一问题排除在讨论之外，以便我们就一些更为紧迫的问题取得进展。当他们谈话时，艾登和我对安全管制工作组作了一些指示，然后要他们去着手起草。不久，两个会谈者从他们的屋子里出来，显得很疲乏，但面带笑容，告诉我们说他们已取得了一致意见。

一个忙碌的夜晚

在将近午夜回到太子门时，我发现除了那个多才多艺的仆役长埃普斯之外，屋子里的人全都睡着了。埃普斯在等着将唐宁街十号送来的一个特大信封交给我。应当牺牲睡眠打开它，还是把它留到明天神清气爽的早餐时候？责任感占了上风。信封里装着丘吉尔先生的一张便条和一篇演说稿，打算在议会发表，如果我在上午不通知他我对演说内容有任何不同意的话。我们将在下午离开伦敦。我对演说稿粗粗看了一遍，发现了所以半夜送信的原因。这是对一项工党动议的答辩。动议批评了丘

吉尔先生支持美国在朝鲜的立场。除了其中一点之外，无论从哪一方面看都是一篇极好的演说。为了着重说明局势可能发展到多么严重，丘吉尔先生提到了发给李奇微将军的应付意外事变的绝密命令。由于有一个英国旅在朝鲜服役，所以此事虽曾通知英国首脑们，公开提到这些命令是不允许的。

我在疲惫中叫醒了卢克·巴特尔，他的房间在我们的同一层楼。他告诉埃普斯今夜将大忙特忙，因有来访的客人和需要咖啡。他打电话给我的秘书巴巴拉·埃文斯和设计办公室的保罗·尼采，要他们立刻到官邸来，同时通知在大使馆的海军陆战队警卫队，他们两人在一两小时内就要回到那里。不久，巴巴拉打好一封给丘吉尔先生的信，告诉他我不能同意他提及给李奇微将军的命令。只有杜鲁门总统能够这样做，而我深信他不会这样做。如果首相愿意见我，我将听从他的吩咐。我指示卢克把这封信在九点钟送到十号，并坐在那里一直等到把信交到首相自己手里为止。此后，尼采和我用笔划去演说稿中不妥当的那部分，同时在隔行中间用红铅笔以勉强够得上丘吉尔文风的笔调另外写上一段，说明可能即将到来的严重时刻，以及战斗中的盟国有必要保持团结一致来迎接这样的时刻。这一斧削演说稿的行动，此时不打算对首相公开，而是暂守缄默。保罗将演说稿用影印机印了下来。没有几个小时就到我们在伦敦的最后一个忙碌日子的早餐时间了。

一个同样忙碌的上午

在提前进了早餐后，尼采·巴特尔和我又最后看了一遍丘吉尔的稿子。我在信上签了字，并把它送往十号；我把演说稿放进了我的口袋。在此以后，我们的大批工作人员向我简要汇报了一次三方会议的准备工作，接着还要召开一次四方会议。我们已经同阿登纳进行过一系列会谈，这一次三方会议是试图进行最后一次讨论，以重新取得一致的意见，这个企图，虽然没有完全成功，但是部分地成功了。我们的会议刚刚开始，丘吉尔先生来了一个紧急通知，要求我立即到他那里去。不幸，那是不可能的，我不得不要求他让我们的会议结束以后再去。在他的答复到达时，会议又为女王来的一个通知所打断。她要来访的部长们下午二时半前往觐见，这就需要我们留在会议桌旁直到那个时候。同丘吉尔先生的会晤只好再一次推迟。在休息进咖啡时，艾登对几个通知带来的慌乱感到奇怪，他对我说，保守党员多少含有恶意地让首相为工党的动议所困扰。这个动议主要是针对他的，而这个动议是并不难击败的。

重开四方会议

艾登宣读了关于安全管制的一个新草案。为了处理这个问题，将在欧洲防务集团条约中增加一项条款，授权这个组织决定在不同的地区可以生产些什么。阿登纳将缮具两封信件：一封给防务集团国家，内容是如果德国军

队的装备和其他所有集团国家一样，对不分配给前沿地带生产武器(如在条约的一项附件所开列的)的决定，德国将不认为是一种歧视；另一封信给美国和英国，内容是防务集团条约将成为德国的国内法。

当讨论到清单的内容时，我再一次强烈反对将炮筒和发射药包括在内。舒曼却为此辩护。经过枯燥的反复辩论，艾登建议这些项目暂不列入清单，让专家们重新进行审查，在春季向部长们提出报告。大家同意这个意见。

其次谈到民用飞机问题。同我们的希望一致，阿登纳排除了这一问题，说德国无意生产飞机。这样做太不经济，他宁愿购买它们。舒曼说这个决定可以随意撤销，对此，阿登纳温和地劝他总该有点相信阿登纳的继任者不会全部都是疯子。舒曼需要同他的政府商量，但是对我们来说，很明显，这一问题实际上已经解决了。

转到我们所有问题的最关键的问题，关于财务问题，阿登纳说波恩同意公布理事会临时委员会的报告，同时认为在部长们结束里斯本会议之前就德国总的承担费用达成协议不成问题。他认为我们的谈判计划是极好的。在这个令人愉快的调子中，我们宣告散会，然后分头前往克拉伦斯大厦参加觐见。

觐见女王

当皇室侍卫官阿伦·拉塞尔斯爵士把我引进克拉伦斯大厦的一间小会客室时，他告诉我女王陛下将分别接见每一个外交部长，她将亲自指示觐见何时终止。陪同女王陛下的是菲利普亲王和艾登先生。在热诚问候后，

女王示意我坐在她的旁边一个座位上，并为伦敦向来恶劣的二月天气向我们表示歉意。由于这是无可否认的，我们就转到当前的会议上，她希望会议已经取得良好的结果。想到丘吉尔先生关于应当让女王了解一切的那些意见，我决定照此行事。

我回答说，会议只能说进行得还算不错，因为没有达到完全一致的意见。对此我不能责备德国人，因为对这些不一致的意见，我发现自己是站在德国人一边的。她要求我举例说明，我举了一些例子。结果，我超出了我原来的意图，对会议过程作了生动的阐述。亲王明显地认为已起了个话题，他大声地叫我继续讲下去。艾登先生显得很尴尬。侍卫官不断提醒我们说，舒曼先生正在等着。最后女王站起来，使我得以拜访丘吉尔先生。当晚，艾登先生将在我国驻里斯本大使麦克维的官邸和我们共进晚餐，我知道我的不负责任行径会在那里给我带来一顿痛骂。幸而在美酒佳肴的良好影响下，一个悔悟的罪人获得了赦免。

面对老狮子

当我终于被引进十号的内阁会议室时，我发现丘吉尔先生处于一个精心布置的和戏剧性的环境中。他一个人蜷缩在铺着绿色柏毯的大桌子旁，简单地和我打了一个招呼，却喃喃自语，“我在众敌包围之中手无寸铁”和“宝剑从我的手中被打掉。”当我在这种感伤的气氛中保持着欢乐情绪并问他我如何能为他效劳时，他回敬了我一个问题。不同意他的演说的核心（一种夸张），我有没有

代替它的东西？我说，如果提出一个代替，这将是修改一份丘吉尔演说稿的重大失礼。他排除了这一点，当我读尼采改写的一段时，他听得很仔细，并要求我将它再读一遍。他的整个情绪转为轻快。他说，“我可以以此取胜”，然后拿过演说稿，并自己读了一遍。当他建议给我一份修正稿的副本时，我谢绝了。他接受这个改正就够了。

当我走向大门的时候，他带几分好玩的口气问我，我在接到他的便条后，怎么能有时间搞那么多工作。我回答说，我采取了他晚上工作白天睡觉的习惯，我现在打算在飞往里斯本途中去睡觉了。

虽然总统对我们在伦敦的会谈逐日获得消息，由于情况时刻变化，在会议结束之前，不可能作出个人的评价。这个，我在里斯本时供给了他。我在电报中写道，开始时，连舒曼能不能同阿登纳会晤都是在未定之数，因为他的政府随时可能垮台。但当阿登纳在伦敦参加英国国王葬礼时，我们作出了会晤的安排。另一个危险在于我们不得不讨论联邦议院刚刚进行过辩论和表决的问题，而法国国民议会正在对这些问题进行辩论，并在我们会谈时进行表决。阿登纳感到他已经保留了灵活运用的充分余地，而舒曼虽然疲惫而焦虑，勇敢地甘冒风险，为妥协作出的让步超出我的意料。这一微妙的局势足以说明为什么我们的公报措词是那么克制。某些重要的，实在是关键性的问题，诸如德国对驻德盟国军队的维持费用，以及禁止德国军备生产的清单，必须等待本周在里斯本作出决定。但是比起前一个星期来，我们是在一种远为良好的状态下来取得更大的进展。很多已经作出决

定；很多已接近作出决定；若干与正题无关的障碍，如萨尔和战犯处刑问题，已从舞台上排除。

三十五　里　斯　本

两年后回顾里斯本会议，我对它的看法是：“那次活动的中心是解决法国的财政和德国的武器生产问题，它们都是由于法国的困难而产生的。如果这能解决，其它问题都可迎刃而解。”

在里斯本，我们住在老城的大使馆官邸。在1775年一次灾难性的地震和火灾中，全市有二万人死亡，但老城得以幸免。我们的大使麦克维和他的一个弟弟从学校时代起就是我的朋友。在罗斯福总统的要求下，麦克维在战前从出版界转到外交界去冰岛谈判我们的基地安排。战争将结束时，他被派驻希腊，在挽救希腊不受内部颠覆和外部攻击方面作出了非常宝贵的贡献。后来到葡萄牙，他谈判了葡萄牙加入北大西洋公约和亚速尔基地。我们已经安排他去马德里谈判西班牙的基地。他是我的亲密朋友和聪明的顾问。

在我参加的所有理事会会议中，里斯本的会议是最忙碌和最有成果的。可是真正工作不是在正式会议上，而是在几乎不断的私下谈判中，讨论德法问题以及一些阻碍协议的次要但是严重的问题。在葡萄牙国民议会大厅的开幕仪式上，葡萄牙外交部长保罗·A·V·达库尼亚致词欢迎我们，并提出西班牙加入联盟这个不受欢迎的

建议。他随后把会议交给我来作“基调演说”。我的调子是一个带有危机的调子。从1949年以来的短短时期中，我们已经走过一段漫长的道路，但是“最艰难的部分还在前面。我们已经做到的将没有多少价值，除非我们完成了这个任务。我们必须作出不是容易作出的决定，我们必须采取将使我们大家都感到极度紧张的行动。……我们将取得成功因为我们必须成功。”

在这次开幕仪式以后，会议地点迁至高等工业学院。理事会听取了三个正式报告，一个是军事委员会关于罗马会议以来所取得的进展，另一个是格仑瑟将军关于地面建筑规划——即交通线、供应站和飞机场——需要的经费，第三个是哈里曼先生提出的临时委员会的长篇和详尽的报告。会议后，舒曼先生同我回到大使馆，轻松和友好地一起喝茶。在那里，我们听到来自波恩的令人鼓舞的消息，总理已经在执行伦敦协议中有关他的部分。他已经宣布德国将不从事生产原子能、导弹或重型军舰。政府将要求制定法律来贯彻反托拉斯计划。这个消息立刻对会议带来了良好气氛。

差不多在里斯本的一个星期开始时，我们自己代表团内哈里曼和布雷德利将军之间的激烈争论，说明了我们要渡过的冰层是多么脆薄。哈里曼坚持要将军赞同这样一个看法：临时委员会报告建议的合乎欧洲国家经济能力的军事力量将为欧洲提供足够的防御。布雷德利拒绝这样做。我倾听这个讨论一直到看来难于控制，我随即中止代表团会议，请两个争论者同我单独会谈。我指出布雷德利将军是被要求把他的伟大名望来支持一个人

们可以看出至少是值得怀疑的建议，我问他是否认为这个建议中的部队比我们原有的好，是不是我们可能得到的最好部队，以及同我们的核力量合在一起会不会对任何想考验我们的力量是否足够的野心具有强大的遏制作用。将军说，他肯定认为是这样。我敦促哈里曼应该能够找到布雷德利可以接受和传达正确意思的语言。这点做到了。

法国和德国的军事财政问题

我们立刻开始向我们最难解决也是我们的中心问题进行战斗，就是法国和德国的军事财政和它们的相互关系问题。我们在整个会议期间和休会后的那天晚上连续为此战斗。有一个时候，幸而为时极短，法国国防部长皮杜尔前来参与会议。他是我曾经一道工作过的最愚蠢的人物之一。一场很快就发展到十分严重的感冒促使他返回巴黎，没有人为之惋惜。新首相埃德加·富尔(我以为他是见闻更为广博和胜任的)接过这项工作，很快就为会议带来有秩序的讨论。他提出一个将法国军费提高到法国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十到十二的军事预算，这是欧洲最高的比率。但是由于印度支那的战争，法国在欧洲防务集团的部队将从十四个师减到十二个师，它提供的空军力量也将减少。他提出的费用既高于临时委员会的建议，也高于现行的预算。法国将需要美国的援助。他的计划的报道(计划很快被泄露出来)，引起巴黎报纸预测富尔将要垮台，以及戴高乐将军将指斥法国领导者实

行“卖光”和“破产和堕落”的政策。

在会议规定的最后一天（1952年2月25日，星期一），部长们和负责专门问题的技术专家们的连续会议使我们接近于解决。富尔的拥有为北约组织—欧洲防务集团服务的十二个师和二十七个空军中队的预算，可由大约六亿美元的美国援助以及正在波恩高级专员们讨论中的德国对盟军的维持费用来筹付。我们准备提供援助，如果其他问题能够解决的话。

但是在波恩的讨论，由于两个问题而停滞不前：第一，如阿登纳声称的，是否已列入西德预算内的边境警察、退役军人的福利和柏林的防御等费用应该包括在他2月21日同意的一百一十亿马克的军事预算之内；第二，维持盟军的具体数字是否能在四国政府同意应该负担那些项目之前加以解决。阿登纳准备每月支付五亿马克直到达成可以随之计算各项费用的协议。我以为这是切合实际的。我也以为很有可能——事实证明是这样——现行开支的扣除可在同意的防务预算中分配一个合理的整数来结清。

由于这些未决问题无疑将向里斯本的三位部长提出，我们最好在此以前就其他一切问题取得协议。

其他问题迎刃而解

同法国代表团日复一日地商谈，里斯本同波恩之间的电报往返不绝，与此同时，我们努力处理我们难题中的其他部份。在2月21日开始的比、荷、卢部长和占领国

部长之间的会议上，我们报告了伦敦会议的巨大进展，欧洲防务集团和北大西洋公约之间的关系正在解决，以及美国继续关心欧洲朝着一体化方向发展。这使斯蒂克高兴起来。我会晤了挪威的哈尔瓦德·M·朗格和丹麦的O·B·克拉夫特，减轻他们由于我们空军在他们国内的北约组织修建的机场驻扎兵力而带来的压力。这个公布的要求曾经引起苏联政府的对等要求。我们用空军访问和遇到警报时即能迅速占领机场的方式取得一个解决办法。

但是最重要的是22日理事会通过了一个决议，同意建立欧洲军——这是我们在罗马未能取得的——接着是北约组织理事会主席皮尔逊主持而得到艾登、舒曼和我支持的一次轻松的记者招待会，指出了北约组织三年来所做的事情。

同一天，通过了临时委员会关于北约组织和它的会员国在今后三年内的经济和军事目标的报告，同时建立了每年一次检查成就和失败的程序。经验证明，军事目标没有达到，虽然据我看来是可以达到的。原因是政治意志的低落，这在1952年即已看出，在1953年舒曼下台和孟戴斯-弗朗斯取得领导权后，随着法国遗弃欧洲防务集团而变得更明显了。

会议同意艾登关于结束占领与德国所作安排的进展的报告。地面建筑筹款的难题，在洛维特耐心而能干的指导下，也得到各方面的同意，使美国分担的费用从百分之四十八减到百分之四十二，最后，经过多次的私下讨论，北约组织理事会总部地址和秘书长人选的麻烦问题

都获得解决。在2月24日（星期日）在我国大使馆的晚宴以后，艾登告诉我，如果多数同意巴黎作为理事会的总部所在地，他将不反对。我同意他的意见：奥利弗·弗兰克斯爵士是一个理想的秘书长。我们两人都知道迈克·皮尔逊是一个未曾宣布的候选人，这就可能引起另一个问题。艾登答应去探听奥利弗爵士的意见。

到第二天上午为止，他显然没有这样做，因为当时会议表决把总部设在巴黎，并授权皮尔逊邀请奥利弗爵士担任秘书长。奥利弗爵士需要时间考虑，并同他的政府商量。我们休会后，他谢绝这个任命，伊斯梅勋爵被选上了。

全面胜利

北约组织理事会第九次会议在2月25日（星期一）下午七时休会，但是已经辛苦一整天的三位部长和他们的助手们仍然有一个长夜的工作要做，因为就在那天上午，高级专员们送来的阿登纳关于两个未决问题的申诉备忘录和高级专员公署的一个小组到达了里斯本。我们当晚十时在英国大使馆官邸会见。高级专员公署小组在如何协调阿登纳的数字、富尔的预算和我们建议的援助方面作了冗长的报告。由于大家都已疲倦和神经紧张，毫无意义的争论发生了。这把精疲力尽的舒曼搞糊涂了，正在伤风的艾登感到厌烦。我是在依靠午夜的疲劳来解决这些问题。这个做法取得了效果。于是一个工作组带着我们三人的指示退到餐厅起草最后的建议，舒曼去睡

觉。

正当艾登和我在等候文件时，小组回到我们这边，由于法国人在一件事情上对指示的理解和他们的同僚们不同，使会议陷于僵局。我们不能推动他们；他们不愿叫醒舒曼，因而建议停止晚上的会议。艾登大发雷霆，他作了一次洋洋大观和令人满意而夸大炫耀的讲话，并批评了法国民族的缺点。他有一句话给人深刻的印象，他说，一个危机刚刚发生，总有些该死的法国人上床睡觉去了。如果工作人员不把这件事搞好，他自己就要到大使馆去把它搞好。这一下发生了效果，一个手足无措的舒曼肯定了我们的理解，并且告诉他的人员如果再有疑问时，就接受我们的说法。没有多久，当艾登自己要去睡觉时，我提醒他自己关于危机中的法国人的评论，并且要求凭着不去睡觉取得最高权力，我得到了这种权力。幸而没有必要考验这种权力。到四点钟，文件已经完成，并且送了出去，同时附了我给阿登纳的一封私人信件，力劝他接受比较次要的调整，以完成我们在伦敦和里斯本的非常成功的工作。

第二天上午回音来了，他已经照办了。我送给总统一份关于这次会议的欢欣鼓舞的最后报告，结尾说"我们取得了非常接近全面胜利的成绩。"四位部长立刻发布一个声明，确认了我们的协议。我在当天下午的记者招待会上补充说"这次解决了问题"。我们似乎突破了一长列的障碍和开始顺利地走向一个更加团结和更加强大的欧洲以及一个完整的大西洋防御体系。摆在我们面前的世界闪耀着希望的光芒。过去一月的势头将继续到仲夏，

然后松懈下来，那时，有些人厌倦这种速度而落后了，在法国和美国出现了更换政府的阴影。

但是，那些都是以后的事情。我们在里斯本的最后一天化在忙碌的会议上，进行告别和为将来作准备。属于第一类的是一次对里斯本全体工作人员的演说，感谢他们不辞劳苦地响应理事会会议对他们的份外要求；属于第二类的是两次长时间的三方会议，审查我们将于5月间在波恩举行会议的准备工作。我们也同比、荷、卢三国部长们审阅了过去两天同德国的协议以及春天要完成的计划。随后是同加斯贝利和他的小组讨论意大利问题。在我们主人（他十分亲切好客）的一次愉快的告别晚宴后，已经到了离开他的好客之家和我们依依不舍的城市的时刻。

里斯本休会后四天，一场冷风从巴黎吹过大西洋。富尔政府已经垮台。但是里斯本的决议仍然有效。

萨拉查博士

我们在里斯本的时间并不是全部花在工作上，我们受到殷勤的招待，并且有机会参观这个城市和近郊。我觉得这个国家和人民对我们都抱好感；那年下半年，我到葡萄牙的前殖民地巴西访问时也感到同样的热情。萨拉查博士款待来访的部长们和夫人们以及许多葡萄牙的夫人们和先生们的宴会是最愉快不过的。单是环境就保证了这点——位于里斯本郊区的十八世纪的克卢兹王宫（它的意思是“多么光明”），在月光下闪耀着银红色。接近

这个小型凡尔赛宫(里面所有的喷水池都开放了)的车道两旁由穿着十八世纪军服的士兵手举火炬，照得四周通明。王宫内灯火辉煌，一片花团锦簇。由于有夫人们在座，宴会上得以避免谈论我们的本行工作，——在我，是令人愉快的葡萄牙夫人们——使我们完全忘记了整天困扰我们的问题。

第二天，萨拉查博士欣然请大使和我去看他。我们带了一位真正杰出的译员，我们大使馆的特德·赞萨基。特德的翻译离开主人说话只有几个字，所以他的翻译是同时进行的。看起来毫不费力，他的翻译抓住了主人的感情——幽默、讽刺、庄严，全部表达出来。萨拉查的简朴的办公室在政府大楼里，有专用入口处，只有一个穿制服的老年看门人守卫着。一个副官把我们从一个安静的四壁镶板的电梯带上一楼。接待室有两只书桌，有一个青年人，没有办公室应有的各种装饰品。没有等也没有通知，我们的向导把我们带进了萨拉查的书房，一个中等大小的房间，放着一张没有许多东西在上面的书桌，没有电话，有舒适的皮椅子，书架上面挂着油画。

一个高而瘦的人在门口迎接我们。他的头发灰白，面形椭圆，长长的鼻子和嘴长得都很端正，他的一对乌黑的大眼睛带有几分忧郁感，弯弯的双眉上下移动，有些好奇样子。特德·赞萨基指给我看一个同这个面孔非常相似的画像。它是一幅贡努尼奥·萨尔维斯在1465年左右为圣云仙会修道院所画的祭坛后的油画复制品。在“画板上的渔夫”就是萨拉查——这个画像无疑是他的祖先之一，他们是渔人。他的态度随便和轻松，没有丝毫以当

权者自居或自高自大的派头。当我们坐下时，他背靠椅子，两肘放在椅子的扶手上，十指交叉着放在胸前。他讲话时做着手势。他的双手同面孔一样敏感，给人以美的感觉。第一次会面我就被他所吸引，这是很少有的。

当我谈到他的安静的办公室同忙乱的白宫西翼相比时，他指出他并不处理事务，仅仅是指挥。一只船的船长看起来往往是船上最不忙碌的人。总统府执行他的命令正如一个大副在船上所做的那样。这个隐喻合手他的心意。一个船长所需要的是如何沿着他的航线前进和应付海上种种意外的才能。当他离开欧洲、朝着里约热内卢航行时，他的罗盘、六分仪和航海技术使得他能够向他的目标驶去，应付风雨和海流的冲击，直到有一天在他面前出现了里约热内卢的伟大海港。我回想起一句常常使我得到安慰的古老警语，未来将在某一天一下子到来。这使得他非常高兴，他要求葡萄牙人有到达他们的未来一天的权利。

在大使的引导下，萨拉查博士谈到他的政策的经济和政治理论。他用轻松的客观态度开始谈论，象所有的好教师一样，他用实例和幽默未增加他谈话的趣味。因为他曾经一度担任科英布拉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卡摩纳将军把他从课堂内引诱出来去管理一个国家，这个国家已有二十年陷于经济混乱和政治的无政府状态中，包括暗杀一个君主和他的继承人，废除君主制度，货币的崩溃和军队发动的一次政变。萨拉查自已并不是斯大林那样本身掌握大权的独裁者，而是为军队——不在他控制下——所雇用和支持的一个独裁经理人，为中产阶级利益

而管理国家。绝大多数军官和军士是从这个阶级出身的。不容置辩，在现代的英国和美国观念上，葡萄牙是不存在政治自由的；从过去的经验判断，政治自由可能同萨拉查博士四十多年来创造的经济稳定和增长也是不相容的。萨拉查的政权为多数人接受，而不是象俄国的斯大林那样依靠对个人自由的严酷镇压。一个信服自由主义的人——特别是一个外国人——不赞成萨拉查是可以理解的。但我不相信柏拉图会这样做。

三十六　再挑重担

在里斯本和波恩会议之间的三个月，是联盟日益软弱和我们作出较大努力的时期。我们自己振作精神并激励我们的盟国在欧洲政治退潮和美国的意志还没有衰落得太甚之前，为完成欧洲防务集团和结束对德国的占领作出最大努力。在德国，阿登纳同反对党发生了纷争，舒马赫恨恨地宣称，任何在这个协定上签字的人就不是一个德国人。在法国，埃德加·富尔以后的不稳定的安托万·比内政府，摇摇晃晃地应付着日益增长的印度支那、北非、联合国和法郎价值等麻烦问题——所有这些都增加了法国对美国的憎恨。奇怪的是由于我们主张支持法国的政策，阿拉伯人和亚洲人对我们的仇视也增加了。艾登的态度始终是镇静的和有帮助的。

我们刚从里斯本回来，左面来的一声霹雳警告我们，莫斯科已为在伦敦和里斯本取得的成就感到不安，并且决心阻止德国进一步同西方和一个统一的西欧相结合。当维辛斯基在3月10日向英国、法国和美国的大使递交同样的照会时，北京和莫斯科早已完全不顾事实，轻率地发出我们在朝鲜使用化学武器和生物武器的谴责了。

左面来的霹雳

这些照会要求召开四国会议为同一个新的全德政府订立和平条约采取步骤，这次它提出的方针和西方国家过去提出的不同，也确实和苏联政府早些时候的立场不同。这个提议在政治方面要求建立一个统一的德国，在条约生效后一年内撤退和取消德国领土上的所有外国军队和外国基地，保证“民主权利”和禁止“敌视民主”的组织，对以前的一切德国军人和纳粹分子给予同等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以及德国不得参加旨在反对任何一个曾以自己的军队参加对德作战的国家的联盟或军事联盟。德国领土的疆界就是“如波茨坦所同意的”。对和平的生产不得加以任何经济限制，但国家军队应根据和平条约的规定建立，军需物资和装备的生产在“数量和种类”上应以满足条约所规定的军队的需要为限。

对外交部长们来说，这是大家熟悉的俄国的手法。我们——我和贝文而不是和艾登——正好在三年前遇见过同样的策略，当时斯大林封锁柏林失败后，曾经企图用它来阻挠成立西德政府，但没有成功。1951 年夏天在玫瑰宫的几个星期无结果辩论中贯穿了同样的把戏，以期阻止德国加入欧洲防御体系，主张东西德在一个全德政府中有同等的代表，主张成立一个人民民主政权，包括共产党和共产党阵线的政党和排除“敌视民主”的组织，主张一个中立的德国，有一支小而效率低的德国军队，以及现有的东部边界。这是又一次破坏活动，目的在制止和

驱散经过三年巨大努力所带来的解决西方问题的势头。

虽然这是一种老的和明显的手法，它对胆怯和痴心妄想的人——法国的那些害怕一个统一和强大的德国和希望有一个“成熟”和“知足”的苏联的人；在德国，那些想攫取一个不管多么渺茫的重新统一的机会并且希望在不冒同西欧和美国结盟的麻烦和风险而取得安全的人——却有强烈的吸引力。同样的希望和恐惧在欧洲其他地方得到宣传并在西半球引起了共鸣。

当我们收到这个照会时，总统正在佛罗里达州的基韦斯特医治支气管感染。我写信给他说，我们还没有时间详细研究这个照会，但是初步看一看，虽然照会狡猾地伪装起来迎合德国人和各方面的敏感舆论，它里面却包藏着惯常的圈套。我们早已料到会有这类行动，作为阻止德国按照里斯本制订的方针同西方结合起来的最后努力。立即加以拒绝是不适当的。在这个问题上总统以后将从我们得到更多的消息。

舒曼也看到这个照会是针对德国人的。它为德国各方面都提供了一些东西——为社会党人提供统一；为工业家提供市场；为军人提供军队；以及为纳粹分子提供复旧。这等于是对阿登纳和他的政策的一次攻击。第二个目标是破坏西欧的团结。他认为法国公众已从军事条款中看出危险性，这些条款甚至使法国共产党人都感到为难。舒曼希望同英国人和我们早日会晤来协调我们的答复。

阿登纳对苏联政府的照会采取两种态度。为了缓和法国国内的反对派，他赞成四国会谈；为了使他的盟国安

心和为了他自己的权益，他排除了许多预计到的俄国的要求。

艾登对分析情况和决定政策作出了最大贡献。他同样认为苏联政府的照会是对我们在伦敦和里斯本会议的反击，并且相信如果我们处理得当，它可能转而对我们有利。这个问题的中心，在于苏联政府准备对它过去提出的建立一个全德政府的立场改变到什么程度。如果它不准备有所改变，我们甚至无须对一个德国和约的实质性问题作意见分歧的讨论。宣传战可以象以前那样在初步提出的问题上展开。但是，如果苏联政府为了阻止德国同西方联合，准备为一个真正的非共产党全德政府付出代价，我们就必须谨慎从事，因为我们可能达到象在奥地利一样的僵局，虽然整个国家只有一个政府，但对走向一个和平条约，或者结束占领，或者为欧洲带来任何一种稳定，却没有取得进展。

因此他建议为了弄清情况，把我们的答复集中在建立一个全德政府的含糊建议上，强调盟国和联邦共和国早已为这个问题在联合国和其他地方提出具体建议。根据这些意见在伦敦起草的答复成为我们今后共同磋商的基础。我们作出了很快就进行三方面会商和随后同阿登纳会商的安排。为了避免苏联政府可能利用任何即使是无意造成的分歧，我建议提出同样的照会。3月21日，我把巴黎同意的照会草案送给仍在佛罗里达的总统。我提醒他注意不同于以前草案的若干论点，并请他迅速批准。我们在3月26日把同样的照会递交维辛斯基，就在他的照会递交给我们的驻外使节两星期多一点以后。在

高级专员麦克洛伊的支持下，邓恩大使精明干练地代表着我们行事。

这些照会包含几个锋利的论点。首先，它们指出，正如苏联政府自己所声称的，全德政府是和约的前提，自由选举是全德政府的前提，而德国人民的自由条件又是自由选举的前提。为了确定这些条件是否存在，联合国已经任命一个委员会负责在联邦共和国、柏林和苏联占领区同时进行调查。联邦共和国和西柏林已保证给予必要的便利。苏联占领区和东柏林会给予同样的保证吗？第二，苏联政府的照会没有讲明全德政府的国际地位。盟国认为无论在和约缔结以前或以后，全德政府都应该有自由加入符合联合国宪章的联盟。第三，在一个能够参加讨论和约的全德政府组成以前，似乎不可能讨论对德和约。第四，苏联政府的照会声称德国的疆界已为波茨坦会议规定。但是那个会议规定，德国的疆界必须待缔结和约时来作最后决定。最后，照会说，苏联政府建议德国建立国家的陆、海、空部队是倒退一步，并且和使德国能够参加一个旨在防止侵略和杜绝军国主义复活的纯粹防御性的欧洲共同体是不一致的。(阿登纳对这节声明的含意感到担心，如果欧洲防务集团不成功的话。)

虽然艾登所称的"照会的战斗"继续了两个月——的确，正当我们于5月末在波恩开会时，最后一个苏联照会在我们中间爆发了争论——从第一次回答中就可以明显地看出莫斯科不准备为制止里斯本计划而下大的赌注。照会引起了若干紧张和忧虑，但没有阻碍我们前进。在一次向美国报纸主编协会的演讲中，我描绘这个时期的

苏联行动是"金苹果"的离间战术。[①] 铁幕后面曾经抛来几个金苹果以期在盟国中间制造不和，但是这个战术失败了。

总统退出政治舞台

总统从基韦斯特回来时晒得黑而健康，他对国内和国际形势投了一个使人完全仓皇失措的炸弹。它在3月29日民主党在华盛顿军械库为纪念杰斐逊—杰克逊日所举行的宴会上爆发。在我们赴宴的途中，我的妻子问我总统会不会在他宴会后的演讲中透露他的政治前途。她后来同我讲，我当时用一种使人不快的傲慢态度说："完全不会。"宣布再次竞选总统的意图太早了，而在这个大型党派集会上宣布相反的意图又将使人非常失望。那天晚上，她坐在总统的旁边。当演讲的时间接近时，他打开了装他演讲稿的夹子，给她看他亲笔写的最后一页。他用简洁的文字写上了这个命运攸关的通告，他将不再谋求总统职位。他说："贝斯，你和我是这里唯一知道这件事的人。"

虽然我在当时感到非常遗憾，现在回顾起来我深信总统的决定是明智的。如果宪法日程规定的选举比那个特殊危急的时期推迟一年的话，对各方而将更好一些。若是当时政府的寿命较长，它就可以帮助舒曼在法国国民议会通过欧洲防务集团，并使中国人和北朝鲜人同意

---

① 希腊神话传说各女神为了争夺金苹果……致发生特洛伊战争。——译者

结束朝鲜战争。国家元首的位置实际上虚悬一年以上的代价是昂贵的。另方面，从个人和国家的角度来看，这是更换的时候了。我们在1953年1月离任的时候，比我年长九岁的总统同我一样感到精疲力尽。如果他再一次获胜，我们两人都不可能以同样的精力和热忱继续下去。也许我们的判断力将反映我们的衰老。离开一个有重大责任和权力的职位，等于丧失了一小部分生命，但时候到了就必须面对这个事实。

再从国家的观点来看，民主党已经执政二十年，使反对党蒙受很大损害。一个在政治上表现愚昧和任意破坏公众对政府信任的政党，要靠重新执政来恢复责任感，似乎是既不合逻辑而又危险的。但是，这对民主制度的运行似乎是必要的，温斯顿·丘吉尔爵士曾经说过：除了轮换执政这点外，民主制度是最坏的政体。中游换马的过程现在开始，带来了随之而来的私人的痛苦和对公众的惩罚。

分心的事情纷至沓来

当我们赶紧为完成波恩会议的准备工作而奋斗时，麻烦的事情在我们周围不断发生。

的里雅斯特

加斯贝利在伦敦的演说把的里雅斯特事件在春天重新提了出来，他采纳1950年的英、美、法三国声明作为意大利的要求，这个声明是贝尔格莱德完全不能接受的。自由区的一次市的选举助长了骚动。南斯拉夫外交部长

卡德尔抗议意大利通过"公开论战"的不负责任的方式来谈判，提出在划分的里雅斯特或维持的里雅斯特自由区的基础上同意大利人谈判。他不准备继续提出建议，因为罗马对于建议往往不加讨论即予拒绝。我对他的观点有许多同意之处。但盟国在5月9日的伦敦谈判中又给予意大利在这个地区的新的权力，而且这个月下半月的地方选举产生了有利于亲意大利候选人的结果。

突尼斯

4月间，突尼斯成为一个尖锐的国际争论问题，使我们的可怜朋友舒曼的处境越来越困难。1月，北非阿拉伯领袖中最温和的哈比卜·布尔吉巴博士宣布同法国人的谈判破裂，突尼斯将向联合国安理会呼吁。他和其他领袖立刻被捕，随之爆发了骚乱。我看到我们又面临去年秋天在联合国大会上发生的象摩洛哥的同样问题。法国的政策又一次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只是打算阻止在安理会上加以讨论。由于安理会的议程必须得到七个理事国的赞成票决定，我们可以成功地把这个项目排除在议程之外。但是在辩论应否列入议程时，这个问题的是非还是会加以讨论的。

法国处境的真正困难在于除了镇压和拖延以外，在北非没有一个政策，这从同前总理雷诺的谈话中可以非常明显地看出来。因此，它的盟国为它辩护时感到十分吃力。我在1952年3月19日召见法国大使庞内，企图防患未然，但是他完全无动于中。他只是一再说突尼斯问题纯粹是法国的内政问题。在他身上，法国的逻辑是

顽强地坚持从错误的前提得出的错误的结论。我请求法国政府释放被捕的领袖们，并且不论他们是否这样做，要宣布继续谈判的政策和设计一个可以谈判的政策。然后，他们的盟国可以给予有效的帮助。仅仅团结起来否定安理会讨论一个终究要讨论的问题的权利，似乎是全然没有效果的政策。德克·斯蒂克在4月初访问华盛顿时，我获悉他也赞同这个看法，并且曾经企图推动舒曼采取更为积极的政策，但就是未获成功。

同时，富兰克林·罗斯福夫人从我们在联合国的代表团敦促我不要附和法国将这个项目从议程中排除出去的企图。在排除摩洛哥的问题上，她在巴黎曾忠诚地支持我们站在法国的立场上，但是认为鉴于法国并没有作出努力对两个问题中的任何一个提出解决办法，对突尼斯采取同样的做法将会损害我们同阿拉伯和亚洲国家的关系并增加那个地区的不稳定。

在巴黎，法国政府立定脚跟，坚决反对。4月间，安理会对突尼斯问题的各个方面讨论将近两星期之后，对这个项目列入议程进行表决。我们弃权，只有五票赞成，这个动议未获通过。在4月16日的记者招待会上，我指出，任何人在任何时候仅仅提出一个随便什么问题的决议案，不能要求美国考虑和投赞成票。当我们在这里认为这样做会妨碍通过继续进行双边会谈取得一个较好的解决办法时，这尤其显得正确。我们在这个问题的处理上没有赢得法国人、阿拉伯人和我们国内评论家的赞赏，他们似乎相信总是需要一场斗争，并且总有对的一面，而他们这一面是对的。

柏林

5月也给我们带来柏林的麻烦，这是对德国人的一个警告。苏联当局拒绝盟国的武装巡逻队进入赫尔姆施泰特一柏林高速公路，同时东德人关闭了到东德的许多通道，并且中断了电信往来。东德总理乌布利希采取了一个更加好战的立场，号召西德举行总罢工来中止重新武装的计划，并且威胁在德国进行一场自相残杀的内战，如果西德人被盟国引导参加侵略战争的话。所有这一切，导致俄国人想作最后的尝试来恫吓我们，我们刚到达波恩他们就送来了一个照会。

圣劳伦斯内陆航路

我们春季面临的麻烦之一是我们自己制造的。自从威尔逊总统以来，每届美国政府都赞成同加拿大联合开发圣劳伦斯内陆航路和电力，但是由于铁路、东部沿海港口、煤、东部粮食仓库等业联合起来的阻挠，美国议会一直没有同意。加拿大最后对拖延感到不快，想由加拿大来建设它们境内的内陆航路。我们对这个意见不是不同情的，它可以作为消除我们自己的一些障碍的方法。外交部长皮尔逊从渥太华来讨论这个问题，最后同总统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会议，总统说他很欣赏加拿大人的耐心和克制。他要求再宽限一个月，以便外交委员会和参议院对提交委员会的议案能起作用。我自己同立法机关的关系可以追溯到我担任助理国务卿和副国务卿时期，那时我们的主要代言人是密执安州的参议员范登堡。他

的去世可悲地削弱了我们的力量。

我们谈判的结果，是同意将内陆航路和电力开发工程作为一项加拿大和美国的联合事业。两国将向国际联合委员会申请准予开发电力，同时加拿大人将在他们境内的河流立即进行内陆航路的工程。参议院仍然保持执拗态度。委员会没有报告参议院就发表了这个议案，参议院6月中旬将它重行提出讨论，终以微弱的多数获得通过。两国政府立即向国际联合委员会申请，要求在该河的国际急流地段开发电力，内陆航路则由加拿大独自建设。申请在10月得到批准。反对内陆航路的人使他们自已和他们的同胞陷于完全无法立足的处境，以致后来在我们离职之后，他们不得不从那个困境摆脱出来。我们中间有些人非常无情地感到幸灾乐祸。

波恩在春天解冻了

1952年春天，我们思想上和工作上的中心问题，是高级专员们和阿登纳在波恩的谈判能使同德国的条约安排取得成就和在巴黎的六人小组讨论能最终建立欧洲防务集团。所有其余事情都是次要的。我们在伦敦会议和波恩会议之间的三个月做了大量工作，对问题进行了辩论，并且达成了协议。这是一个不仅解决分歧而且增进谅解的时期。高级专员麦克洛伊的最后报告这样说："最后的协定同开始时所提出的很少相似，这些差别主要由于盟国对德国谈判代表的让步和盟国认识到联邦共和国有理由在新关系中要求完全平等。"麦克洛伊用很大的精

力推进波恩的讨论。他同年老的总理是精力无穷的，常常在来因河上露出曙光的时候才把好辩的同僚和工作人员磨蹭到终于达成协议。邓恩大使随时注意巴黎的关于欧洲防务集团的讨论，让我们了解情况并提出我们为突破僵局所作的建议。

在里斯本之后存在的主要问题有两种总的类型——那些高度政策性的问题和那些涉及到政策同时也涉及到大量复杂的细节的问题。属于第一类型的，就条约安排而论，是盟国保留宣布紧急状态和恢复德国职权的权力范围，以及将来的全德政府应当或可能受现在政府约束的范围。属于第二类型的，是在德国防务预算中如何划分德国自身的军费和维持盟国军队的费用，以及如何检查那些本来应由德国负担的维持盟国驻军费用的项目。虽然次要但仍然麻烦的问题，是有关对战犯的大赦政策和盟国在德国的工商业在税收上享受特惠待遇的期限。

在欧洲防务集团的讨论中，法国坚持要求对防止德国的退出作出保证，仍然是部长们的主要问题。这代表了法国政府积累起来的全部神经质——对通货膨胀、德国的经济恢复和在欧洲防务集团中称霸、印度支那和北非的结局、左面的法国共产党和右面的戴高乐、以及引起左右两派兴趣的莫斯科“金苹果”政策的担忧。所有这些担忧产生了踌躇、怀疑、再三考虑和几乎不可避免地对美国感到恼怒。在他们看来，我们是他们所有困难或大部分困难背后的主要力量。这些困难是：推进欧洲防务和德国的解放，对北非和印度支那固执保守立场的不耐烦，他们正在开始重新审查他们自己的欧洲一体化和超民族

主义的意见，等等。

两个问题特别引起法国的烦恼。大家记得，富尔是在他的内阁拒绝增加税收以便为他的雄心勃勃的军事预算筹款时辞职的。比内继任后保留了这个预算，但没有保留那个税收方案。在寻求军事需要的经费时，他发现增加美援是个诱人的解决办法，因此建议在1950年的六亿美元之外，以后三年中再增加五亿美元。由于这笔钱之外，我们还承担了法国在印度支那战争的大约四分之一的费用，我们只能应付这个新要求的三分之一。法国人争辩说，他们已经承担的比哈里曼在理事会临时委员会所建议的还多，认为不愿给他们所要的全部帮助无异是“一种粗暴的态度”。他们还直率地说，我们“在突尼斯的干涉”(已在前面谈到)，是没有益处的。尽管如此，欧洲防务集团条约在5月中草签，虽然法国内阁在5月23日的决议中要求对防止德国退出集团作出保证，作为法国同德国签署条约的先决条件。

在这次谈判中，如在巴黎的对等谈判一样，进展虽然很大，但不是顺利的。阿登纳有意挑起麻烦，但又置之不顾。他在4月底把谈判情况通知联合政府的各党派，欢迎为德国取得平等待遇的进展，建议结束讨论和在文件上签字，以便美国参议院在预定于7月最后休会前及时讨论。这引起联邦议院的激烈抗议，它声称议员们是被要求“在十二点还差五分”的时候批准复杂和有深远意义的措施。总理的两个主要支持者，即后来的外交部长海因里希·勃伦塔诺博士和弗朗茨·布吕歇尔博士公布了一封信，要求推迟签字，以便联邦议院进行仔细的复审。

这将使美国国会的讨论留给新的一届国会和新的政府。此外，联邦议院还否决了德国分担防务费用的原则。

可是，总理一味加紧推动签字，巧妙地利用联邦议院的反对来向高级专员们索取稍多一点的让步。在一个星期的连续夜间会议后，高级专员们在5月中旬开始重新起草。他们的工作从分担盟军防务费用这个烦恼问题开始。这个问题由于在清理已往帐目中发现3月份的占领费特别高而变得更加严重。华盛顿派了一个有权采取行动的三人小组去，并且准备把问题提交部长们决定。最后社会民主党上演一场冗长辩论的企图被挫败了，联邦议院中的反对浪潮退潮时同它来潮时一样快。

被困难弄得不能动弹的梦魇似的几个星期，随着时光的流逝而终于结束了。当5月22日下午总统为我们乘“独立号”往科隆和波恩(那时需要在加拿大停留加油)前来送行时，我们代表团中大部分人员早已动身。我的妻子、菲利普·C·杰塞普大使夫妇、助理国务卿乔治·珀金斯以及我的助手卢克·巴特尔和巴巴拉·埃文斯与我同行。作为在伦敦和巴黎努力的顶点的这个使命，是我任期内最关键性的使命。

三十七 波恩和巴黎

波恩的胜利

1952年5月23日，星期五下午，三国外长在波恩郊外巴特戈德斯贝格开会。舒曼和艾登都是在斯特拉斯堡举行了欧洲理事会会议之后直接赶来的。那天晚上，我听取了麦克洛伊工作班子的扼要汇报之后，了解了在各项协定得到一致同意和签字之前尚有待于各国外长解决的争执点。会议将在最适宜的盟国场所美国大使馆会议厅里举行，并将由我担任主席。这种安排使我得以利用麦克洛伊的工作班子，他们对于有待讨论的材料的组织和理解都是最出色的。

第二天早晨，外长们立即举行了有高级专员参加的三方会议，连同共进午餐和晚餐以及下午的四国会议的间歇在内，会议一直开到星期日凌晨。会议的气氛在5月26日致总统电中极清楚地表达出来：

自从星期四我向他告别之后，我们的经历比任何惊险小说所讲的都更为令人激动。这次惊险经历的异乎寻常之处就是反派角色一变其本来面目。在我离开华盛顿之前，麻烦主要是由于荷兰人而引起的。正如总统所了解的，荷兰人是讲究实际的，并且在传统上是面向海洋和世

界而不是面对背后的欧洲大陆的。他们始终害怕加入欧洲防务集团会减少可望从我国获得的援助。他们的踌躇没完没了，而其中最后的一个踌躇不决之点，就是他们的这样一项要求：如果北大西洋公约在欧洲防务集团五十年有效期届满之前解散，他们能退出这个集团。虽然这项要求听起来不无理由，却反映出一个基本分歧，因为法国人、德国人和意大利人都是怀着欧洲防务集团是持久的这样一个信念而准备参加这项事业的，并且认为，对于持久性的任何怀疑都会有碍于达成持久性的条约条款。

两天以前，欧洲防务集团国家的外长们在斯特拉斯堡就下述一点达成了协议(虽不完善，却是全体一致同意的)：如果在这个集团的五十年有效期届满以前北约解散，或者英国或美国退出北约，那么共同体各国将磋商善后办法。我相信，这一切大部分是理论性的，因为今后十七年，不是欧洲防务集团更加强大和更加生气勃勃以致没有一个国家愿意退出，就是到不了那个时候早就寿终正寝了。

当我到达波恩时，我报告总统说，法国问题已经取代了荷兰问题。法国不能太相信德国的前景已经有了根本改变，比内的现政府肯定比前几届政府更具有传统的想法。

我继续说，在我动身的前夕，我们已经风闻，如果法国在许多问题上得不到满足，它将不会签字。这些问题中的大多数可以归结为他们担心被毗邻的德国远远抛在后面和对于诸如印度支那的负担或维持他们在北非的地位这类事情的担心。这些担心具体表现为：美国和英国

将以何种措施向法国保证，防止德国退出欧洲防务集团？只是因为前天晚上总统亲自对我们的反建议的批准，这类的担心才得以消除。

在结尾时，我着重指出，艾登一直和衷共济，在解决舒曼的困难和法国的困难方面，他都出力不小。阿登纳虽然是一个爱国的谈判好手，但是，他再一次显示了他自己作为一个欧洲的政治家懂得在什么时候应该作出让步，使一个可能实现的伟大前景不致受到当前枝节方面困难的威胁面得以保全。

从舒曼变化无常的态度中可以看出法国显而易见的不安心情。在伦敦和里斯本，他显然未能有把握地左右法国外交政策。在波恩，看来他甚至不能控制他的外交部了，他显然是疲惫不堪，神经过敏，而又心情沮丧。星期日，阿登纳对我说："难道你不能给我们那可怜的朋友一点信心吗？"阿登纳自己是不需要这类帮助的。

最后协议的主要先决条件

在关于结束对德占领并接纳德国参加欧洲防务的大量复杂文件中，有很多问题需要各国外长作出最后决定。各国的大多数幕僚(在某种程度上还有高级专员)，已经在不同地位上取得那样的既得利益和足以自豪的事物，以致要他们作出让步是很困难的。这里所需要的是当机立断。外长们听取了对于争执的陈述和辩论的要点。我作为主席，将提出一项决议案；其他外长可以予以修改或同意，也许有时还要收回各自幕僚们的反对意见。我们就这样解决了很多问题。但是，有四个问题需要国家首

脑谈判。是否其中至少有两个问题——有关英美两国对欧洲防务集团保证的问题——可以顺利达成协议，那决不是预先作出的结论。第三是关于德国防务预算的划分问题。最后是各项协定对于未来的全德政府的约束力问题。

星期六夜间，开始谈到保证问题，这个问题一直讨论到星期日凌晨。我们早已和德国人拟订了一项办法，在北大西洋公约和欧洲防务条约各签字国之间（这两个条约的签字国都是一样的，只不过后者有德国参加）互换条约协定，凭以互相承担北大西洋公约第五条的义务（即将对一国的进攻看作是对全体的进攻）。这样就把德国约束到共同防务所规定的义务之内了。但是，正如上文所述，法国所要求的还不止于此，他们还要求英、美两国为防止德国退出而作出保证。艾登准备就这个问题同法国谈判一项条约，但是，我们在动身去欧洲之前同总统讨论时，已经作出下述结论：这种谈判对于他那即将卸任的政府来说是不可能的，如果试行谈判也只是把长期的辛劳付诸东流，因为1953年的新政府到时候还要另起炉灶。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决定不能超出现行立法所许可的范围。

菲利普·杰塞普提出了一个摆脱困境的建议，并得到了总统的批准。北大西洋公约第四条规定，如果一个或一个以上的国家认为本国安全受到威胁，各签字国必须共同磋商，找到消除该项威胁的办法。杰塞普的建议主张由英、法、美发表一项三国宣言，重申三国政府“对于（欧洲防务集团）条约的效力以及该集团的力量和完整具有始终不渝的利害关系”的理由。接下去就是有实际效

力的词句:“因此，不论来自哪一方面的任何行动威胁到集团的完整和统一，两国政府都将把它看作是对本国安全的威胁。他们将根据北大西洋公约的第四条采取行动。”结尾则提到我国根据北大西洋公约所承担的义务以及同防务集团的利害关系，具有在欧洲包括在德国驻扎适合于该地区防务的军队的业已明确表示的决心。

我们知道不管提出什么方案，法国都会要求加码，所以我们就以这个提案留作后备。我刚刚提出这个建议，艾登马上就热情洋溢地接受了，并且告知舒曼他已经取得了多么重大的胜利。如果他不再吹毛求疵而充分加以利用，那么他本人的地位和法国的士气都会大为提高。于是用电报把这个提案通知巴黎。我们一边等待回音，一边讨论其他的问题。长夜慢慢地过去了。巴黎终于有了回电，希望不要提到公约第四条，要求磋商，并且只说一旦集团的完整和统一受到威胁，两国政府将根据条约采取行动。我指出，这项更动将会（正如原来打算的那样）造成这样一种印象，他们将把任何对集团完整的威胁看成是对他们本国的进攻，从而当参议院批准这两个条约组织之间的互相担保时，招致无穷后患。辩论继续进行，以埃尔韦·阿尔方领导法国一方，罗贝尔·舒曼则继续睡觉。同巴黎函电往来不绝。最后，经过不大的修改，他们的提案被接受，最大的障碍排除了。

我们同冯·勃伦塔诺及其联邦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同事们在第二天早晨的会议中找到了一个办法，借以摆脱使他们头痛的理论问题。他们认为，要约束一个未来的和至今还不存在的全德政府，是既不可能而又不恰

当的。我建议当前的联邦共和国政府同意不参加建立并把它的权力移交给任何不愿承担和遵守联邦共和国国际义务的新政府，来打开这个问题的僵局。这才幸而解决了另一个困难的根源。

在这个问题上，苏联因其在当时比现在更容易犯的笨拙的毛病而使德国的舆论大大地帮了我们的忙。在西德，特别是在社会民主党内，由舒马赫感情冲动地表达出来的对条约的反对，是因为盟国由于德国的分治、苏联对东部的占领以及柏林朝不保夕的地位所保留的权力而产生的。5月25日，莫斯科向波恩递交了一份虚张声势的照会，旨在恫吓德国不敢完成谈判中的任何一项协定，但是，它的效果适得其反。就在我们的眼前，我们看到德国舆论团结一致地支持阿登纳了，保留盟军权力的正确性得到了充分的证明，协定受到了欢呼。我们有这个对手倒真是幸运的。

四外长的最后的一次会议原定于星期日晨举行，但是，三外长因通宵会议而精疲力尽，以致在达成协议之前就休会了。我们与阿登纳的会议先推迟到午餐后，继而又一直延缓到四点钟。转眼时间就到了。当我们举行会议时，阿登纳已经使最后的协议有了可能。他不让他的顾问们再多开口，而亲自参加讨论，并且没有进一步磋商就作出了决定。他同意了德国对防务的负担款项和德国的分治，我和他共同解决了未来的全德政府的义务问题，并为其他各方所接受。对于其他十几个棘手但无关重要的问题没有进一步的辩论就当场作出了决定。苏联照会的刺激正在产生最有益的效果。我们的会议准时休会，

以便换上礼服，去参加总理在绍姆堡宫举行的盛大庆祝宴会。

5月26日星期一早晨，是预定签署组成契约性协定的大量文件的时刻。联邦议院的社会民主党人本来计划抵制这个签约仪式，但是俄国的照会一夜之间把德国舆论一变而为强烈地赞成同西方更加紧密联系起来的新步骤了，因而很多社会民主党人都出席了。我们吃不准巴黎方面会不会在最后一分钟出现什么障碍。结果，当我们看到舒曼满面笑容和心情轻松的样子，真是如释重负。签字是在联邦议院，即德国参议院开会的房间里举行的。窗外的看台上挤满了观众。部长们依次在一张铺有灰色天鹅绒的小桌前就坐，并且当下属们送上煌煌巨著的文件时，便一一签署。

签字完毕后，我们每一个人都发表了简短的讲话。我说，由于我们的行动，联邦共和国获得了"适合于一个自由国家的外交方面的独立和内政方面的权限。"现在，其他自由国家接纳了"一个新伙伴，来为建立世界和平和安全作出共同的巨大努力……我代表美国总统和美国人民，欢迎联邦共和国返回国际大家庭。"然后，我向总统发了一件前已提及的电报，向他报告德国和三个盟国之间的协定已经签字。仿佛在昨天这个协定看上去还是不可能的。我认为我们理应高兴，因为现在我们政策的另一阶段已经胜利完成。这个政策就是同过去的敌人合作，以遏制新的威胁。虽然欧洲防务集团的协定迄今尚未签字，但是这只是形式罢了。

在同总理共进午餐之后，我们就全体启程前往巴黎

去完成那个正式手续。

巴黎的忧虑

现在，随同欧洲防务集团的谈判产生的所有问题都一一解决了。不幸的是，最后阻碍法国批准条约的那些问题却不曾解决，虽然当时我们没有看清楚。目前，所剩下的就是签署条约以及为数共十九件的附件了。签字仪式在法国外交部的钟室举行。艾登和我分别坐在一张长桌子的两端，其他北约国家代表在桌子的一侧，一大群摄影记者和新闻电影摄影师站在另一侧绳子的后面。签署完毕，我满怀希望，得意洋洋地说："……我深信，今天我们所亲眼目睹的一切，将证明是我们这一代最重要和最具有深远意义的大事……。我们已经看到了西欧自由人民的统一这个古老美梦实现的开端。"

何等的豪言壮语啊！但是只讲对了一部分，因为这一席话没有估计到法国方面的退潮，也没有估计到孟戴斯-弗朗斯先生和夏尔·戴高乐将军日后的作用。刚刚签好条约，巴黎的忧虑就露出端倪了。第二天上午，这种忧虑在同艾登和舒曼研究上次的俄国照会和法国在印度支那的形势的冗长会议上首先表现出来。法国总理安托万·比内和三位前总理亨利·克耶、勒内·普利文、罗贝尔·舒曼，海外部部长让·勒图尔诺以及外交部的很多重要人物都出席了会议。第一个题目没有花费多少力气就解决了，我们通过不久就成为大使的高级专员们，商讨我们同阿登纳相互协调的复文。接着，法国对印度支那

的困难作了一番冗长的令人沮丧的说明，言下之意是他们的努力不为人所重视。我和艾登都着重表示，我们认为他们在印度支那是完全和英国在苏伊士或马来亚以及我国在朝鲜一样地为了全局的利益。我补充说，我们对于越南国民军的建立已经给了大量援助，并且愿意在勒图尔诺作预定的华盛顿之行时讨论如何增加这项援助。

我问道，我们是否应该为未雨绸缪之计，共同商讨万一共产党中国在印度支那扮演一个更积极的角色时我们所应采取的方针？如果可能的话，与其坐待抵抗于事后，不如防止于事前。同样，我们每个国家都应该清楚了解每个国家无论在政治上或军事上将采取何种行动。譬如说，美国将不向印度支那战争提供地面部队，但是，如果认为必须切断中国和印度支那间的交通，那么我们将会与盟国共同考虑以海、空军参加作战。运筹帷幄的先决条件，是法国必须有一个使盟国能够帮它走向胜利的政治和军事的政策。但是从来都没有过这类政策。

下午，我们应法国的要求再度开会，听取他们对美国政府、国会和报刊关于法国在北非的政策和行动所采取的态度的抱怨。比内激动而又清晰地宣读了这个诉状。简言之，我们没有能象一个坚定不移地站在法国一边的政府那样谴责联合国讨论法国的内部事务，这就是鼓励它继续讨论，而在报刊上和国会辩论中对阿拉伯人的怨言所表示的同情态度（尽管法国想方设法在北非给美国以空军基地），则无异是火上加油。在答复以前，为了使问题彻底揭开，我鼓励所有的法国朋友畅所欲言，无所保留。他们欣然从命，并且倾吐了——同时也减轻了——

满腔的郁愤。

虽然要在这个最最感情用事的问题上彻底恢复理智的可能性不大，但我还是下定决心试一试。首先，我说我们应该开诚布公地提出并解决一项没有讲出来的疑虑，这项疑虑是不须多加分析就可以看出来的，即怀疑美国非但无意加强，而恰恰相反，意欲取代法国在非洲的影响。这完全是莫须有的事。我要把这点谈得清清楚楚。我们认为，法国对北非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并且还要作出更多的贡献。虽然许多美国人批评法国的政策，但是没有一个人希望在非洲取代法国，或者清除法国的影响。我大力地、坦率地坚持了这一点，不管在座的人是否心悦诚服，他们却都承认这一点说明。

我继续说，甚至象在座诸位这样聪明的法国人，似乎也认为美国人民和美国国会的舆论对法国北非政策所作的批评，是受到美国政府鼓励甚至指导的。这说明了对我国社会的全然不了解。即使政府拼命想指导舆论，正如在马歇尔计划和北大西洋公约时那样，也非作出巨大努力并大力组织私人参加其事不可。但是，在一个问题上，美国的私人舆论是无须指导的，而且这种舆论是始终如一、非常活跃的，这个问题就是同情自称本身受到外来压迫的人民的传统。这是我们反对殖民主义的实质，至于自称受压迫的人事实上是否受压迫却没有多大关系。如果他们与被指控者的种族和肤色不同，那么这就构成为一个表面上证据确凿的事例了。

我的外国朋友提出了异议，认为这是不负责任的舆论，我同意这种说法，但要补充一点：大部分舆论都是

不负责任和愚昧无知的，虽然总的来说，美国公众靠了他们的报刊和电台比大多数国家的公众都见闻广博。例如，我问道，在座的有几位法国部长知道，我们在波多黎各存在有从殖民地关系转向另一种关系的问题，以及我们将朝哪一个方向转变？没有一个人知道。

涉及我们所讨论的问题的美国人的另一种态度是，他们认为没有任何事情应该看作是不可讨论的。他们认为无事不可对人言，并且怀疑那些有不可对人言的人是在隐瞒某种经不起考查的事情。这也包括许多从事公务活动的人的私生活在内。因此，法国在联合国的主要辩解之词——法属北非问题是内政问题，因此不容辩论——在大多数美国人看来无异是一纸认罪书。他们认为，谈论并不是干涉；在国内外人人都谈论我们的问题：离婚、如潮水一般的犯罪案件、种族关系，等等。

我总结说，象上面所描述的那种美国人，似乎正是法国人所厌恶的那种从旁插嘴、好管闲事的人。但是，在下这个结论之前，我们不妨看一看另一个特点——且把我们多次给朋友雪中送炭的作用撇开不谈——这个特点也许会让我们给人以好的印象。和我们对被压迫者的同情差不多同样根深蒂固的，是我们对任何问题都赞成建设性的解决办法，而反对破坏性的方法。具有"建设性"，是我们评定的最高标准。我敦请在座诸位思索一下这种态度的内在含义。法国在北非问题上保持缄默政策，象逮捕突尼斯领袖们的那种消极的政策，决不能在美国得到同情的反应。但是，如果法国方面提出一些解决办法而对方却充当遇事反对、吹毛求疵和拉后腿的消极角色，那

么法国就会争取到建设性的地位并博得热烈的同情了。

比内马上抓住我的话。他说，我们发表一个联合公报，宣布美国支持法国在北非所起的作用以及一个解决当地悬而未决问题的计划，此项计划法国政府甚至当时也还在拟订之中。我以看到计划之后再表示赞成将更加明智作为借口，避免了发表正式声明。但是，这种想法的内容立刻就透露给一贯如饥如渴的法国新闻界了。我的意图是善良的，但是要法国官方对美国想法能够理解，其遥远程度正如要看到制订出一个切实可行的法国北非政策一样。只有勒内·普利文似乎稍受感动。当我们休会进茶点的时候，他说他如果一旦触犯法律被控有罪，他就要聘请我作他的辩护律师。

我应奥里奥尔总统之邀访问爱丽舍宫时也有痛苦和紧张的味道。我多次访问巴黎期间，总统和夫人总是对我和我的妻子非常恳切友好。这一次他在书房里单独地接见我，只有他的私人翻译在座，我发现他感情激动、焦躁不安。他悲哀地问我曾干了些什么，以致看错了欧洲的真正危险，让舒曼犯了重新武装德国的可怕的错误？他用了一小时的工夫，回顾依然如故的德国威胁。我一时却被辩倒了。后来我表示除化过去的敌国为盟友这一尝试外，别无任何有补益的抉择，而他却对我说，恢复三国协约并有美国参加那就可以了，此后我才疲乏不堪地回到大使馆住宅，与邓斯共进晚餐。

当时真是精疲力尽了，我们启程返回华盛顿。在华盛顿，我们得意了没有多久。我把在欧洲签署的各项文件送请参议院批准。虽然决定总统候选人的政治会议迫

在眉睫，但是听证会和辩论会却都一帆风顺。参议院胜利地通过了，6 月 1 日以七十七票对五票批准了波恩协定，以七十二票对五票批准了北大西洋公约草案。过去六个月曾是我们胜利的六个月，非常幸运地补足了去年秋天对日和约的胜利。

我们仍然在朝鲜继续作战。

三十八　朝鲜：挫败、骚动和叛乱

当我们在华盛顿全神贯注北大西洋公约内部的危机时，另一个头等危机已在朝鲜酿成，并且突然出现在李奇微将军面前，当时李奇微将军恰好已奉命将远东指挥权移交马克·克拉克将军，而去接掌艾森豪威尔将军在欧洲的指挥权。正如上文所述，在1951年的最后一个季度，朝鲜的战事已渐趋沉寂，伤亡也已逐步减少。李奇微将军乘此间歇，肃清共产党撤退时在第八集团军后方所丢下的包袱。到1952年1月，一万九千名散兵游勇和游击队或遭消灭或被围捕，问题大致解决。

1952年初，李奇微将军坚守在大部分位于三八线以北的堪萨斯线上，而面前的敌人也处于同样稳固的阵地上。在1951年11月27日关于战线的协议达成之后，停战谈判一直拖延。后来，一项有关向后撤退的安排开始生效，它规定停战的那一天的战线作为军事分界线，而不管当时的情况怎样，也不管在哪一天。李奇微将军奉准引证克拉克将军关于军事形势的概要说："'我们始终没有足够的兵力〔把中国人清除出朝鲜〕，而敌方却不但有充分的兵力堵截我们的攻势，而且有充分的兵力取得和巩固他们自己小小的进展。要把我们的攻势推进到顺利结束，就必须有更多训练精良的部队和更多海、空军的支

持，同时也会遇到惨重的伤亡，并且必须解除我们加在自己头上的不得进攻鸭绿江以北敌人庇护所的禁令。'”

在这段陈述之外，李奇微将军还补充说，“解除那项禁令就会置日本于易受攻击的地位，而万一发生这种情况，那就会立即大大扩展战争的范围。当时，美国没有一个负责的领导人会把这样一种办法推荐给美国公众。”或者我不妨补充说，会想要这样做。而且，近年来报纸上所说战区司令官们(曾经提到过范佛里特)力主大举进攻而竟为华盛顿批驳云云，全属讹传。战区司令部和国内司令部在政治和军事政策方面是意见一致的。

一直有这样一种指责，认为李奇微将军和克拉克将军以积极的战术行动来维持强有力的防御阵地所实行的战略，延长了战争，并大大地增加了前一段攻势时期的伤亡。所谓延长了战争，纯粹是一种得不到当时任何负责的军事专家支持的强争好辩的说法，任何高明的代替办法是没有的。至于伤亡，则所指责的错误是确凿有据的。朝鲜战争打了三年一个月零两天。停战商谈开始于第一年——猛烈战斗为时最久的一年——年尾，并且断断续续持续了两年。美国伤亡的数字——唯一正确的数字——如下：

	1950年6月至1951年6月	1951年7月至1953年7月
死	21,300	12,300
伤	53,100	50,200
失踪或被俘	4,400	700
总　　计	78,800	63,200

这样，后两年的总数比第一年的总数还要少。四分之一以上的伤亡出现于战争的最后两个月，在这两个月共产党发动了两次大规模进攻，试图从艾森豪威尔总统取得比杜鲁门总统所会给予的更好的条件。他们自己在这两个月的损失，据估计为十万八千四百五十八人。结果，条件是一模一样的。

战俘的志愿遣返

我们的部队在朝鲜所俘获的战俘造成了两个我们所知道的问题，以及一个使我们猝不及防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在一个找不到一处远离战线的地方的国家里把这样多战俘——有一个时期达十七万之多——安置在哪里。第二个问题是确定这些战俘的成份。战俘之中有多少是中国人和哪一类的中国人——有多少是共产党人或被俘的和强迫服役的国民党人？有多少是北朝鲜人和同他们合作的南朝鲜人，或有多少是被俘和强迫服役的南部人？又有多少是兵士和平民？第三个问题是敌方早经准备的一个阴谋，打算在他们认为可以牺牲掉的那批人当中煽动叛乱，以造成不利于美国的宣传。

关于第一个问题，我们认为把战俘安置在那个完全不适宜的小小的巨济岛上的战俘营中就算解决了，而战俘在那里不久就变得拥挤不堪，而为指派担任这项马虎不得而又难以应付的任务的为数不多且大部分力不胜任的人员所不能控制了。敌方则象十四世纪条顿骑士团的骑士集体改变信仰那样以所谓“前线释放”，以及将战俘

重新编入北朝鲜部队的方法，把他们的战俘名单从六万五千减少到一万一千五百五十九人，从而解决了他们的问题。分类工作在表面上的风平浪静之中开始。有三万七千名被发现是南朝鲜人，随后予以释放。在甄别的过程中，双方都注意到了一些比较显著的问题。在我们这一方面，我们看到我们自己重又面临1945年在欧洲遇到的令人战栗的情况，当时很多逃到德国方面而被盟军重新俘获的苏联平民和士兵，在强迫遣返时自杀。共产党人在他们那一方面则下定决心不为志愿遣返所造成的开小差和逃亡大开方便之门。

这个问题不但是促成为敌我之间，而且是促成为国务院和国防部之间的一个重大争执点。很可理解，军方所主要关心的是在战斗结束时能让他们自己的人（为数少得多）返回。他们一直理所当然地关心如何把在战争的混乱中关进去的我们朝鲜盟军的人从战俘营中分离出来。但是为了保证敌方所收容的战俘的返回，五角大楼却赞成将北朝鲜和中国的战俘和被拘留的平民一并遣返而不管他们的意愿。虽然在我们政府内部迟迟没有作出决定性的主张达几个月之久，但是在1952年1月2日鲁思文·利比海军上将奉命在板门店提出一项建议，依照该项建议，全部战俘应根据象国际红十字会那样一个公正机构为自愿遣返所规定的公平条件一律释放。被俘的南朝鲜士兵和平民，不问是否已编入北朝鲜军队，也应一律释放，并准许还乡。

建议立刻遭到拒绝，并且发动了一场猛烈的宣传战，更以美国对北朝鲜和中国使用细菌战这种共产党的耸人

听闻的指控来增加宣传战的力量。在华盛顿进行的争论是经过几个阶段的。我的同僚和我所以这样做，是出于人道主义的原因，也是因为大有生命危险的战俘的强迫遣返对我们本国和亚洲人民有所影响。我们也知道共产党士兵一落到我们手里就可以逃亡，这点对共产党是有威慑作用的。

当我们的军方同僚辩称共产党决不会同意志愿遣返，从而妨碍了我们双方都认为有利的停战时，我们建议依照我们敌人的范例办理。这就是说找出哪些战俘会强行拒绝遣返，先在适当的时刻把他们释放，然后再提议交换其余。甚至这样也还会有一个严重的问题——对拒绝遣返的非朝鲜人怎么办？同时，我们的建议又对战俘的区分和分类的迫切需要增加了另一个论据。印第安纳州参议员詹纳，一直要对这个复杂问题考虑一项参议院决议案，这时靠了国防部长洛维特和一些参议员的非常可贵的劝阻，才没有给李奇微将军的谈判带来无可补救的损害。

在2月底，同总统的一系列会议得出了他的这样一项决定：美国不会，也不能同意强迫遣返，而在这一系列会议中国防部的文职领导官员并不反对国务院的主张。这样我们就有了我们的基本立场，而且此后从来没有动摇过。决定的执行并没有按照计划推进。意想不到的令人为难的情形突然横亘其间。

在板门店谈判的这个阶段中，我们希望在缔结停战协定方面只会遭到三个主要障碍。战斗已渐沉寂；业经商定停火线应该约略划在停战协定签字时双方部队所据

守的那条线上；许多其他的安排也拟定出来了。战俘问题，我们坚持不得在北朝鲜修理飞机场或建造新机场的问题，以及停火监督委员会的组成问题，都悬而未决。我们在4月中旬拟订出来的计划就是要甄别战俘和解决前两个争执问题——他们接受志愿遣返和我们接受飞机场的修理。双方在理论上同意了一个公正的委员会，但所谓公正，他们的意思是指非交战国——他们尤其希望苏联是成员之一——而我们则是指中立国。对于这个问题的一项解决办法就是成立一个真正中立的委员会，或者，如果他们愿意的话，成立一个真正双边委员会，包括美、苏两国和象瑞士那样的某一真正中立国。李奇微将军担心我国的被俘人员遭到报复，宁愿继续为双方协定的甄别战俘而努力。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谈判人员作了一个不幸猜测，并且通知了对方，说联合国司令部所拘留的十三万多名战俘之中有十一万六千名将会得到遣返。4月初，共产党人同意了由双方进行甄别。我们似乎是在取得进展。

在4月中旬，从李奇微将军那里送来了一件令人不安的报告。在运送到巨济岛时，原籍南朝鲜的战俘同北朝鲜人是分开来的。这就造成了以强烈地反共和亲共为主(但并非全体一致)的一些战俘营。在2月间，南朝鲜警卫和一座平民集中营里的拘留犯之间在甄别问题上发生纠纷，结果造成了七十七名战俘毙命。在3月间又有十二名战俘遭杀害。李奇微将军这时报告说，在十七个集中营之中的七个营里面的三万七千名战俘，非使用武力无法进行甄别。共产党报告说有一万二千名战俘——

七千九百名朝鲜人和四千一百名非朝鲜人——愿意返回。这是一个约略的估计数，当时联合国司令部所开列的是：有七万名不用武力可以遣返的——中国人五千一百名，朝鲜人六万四千九百名。其余则不用武力无法遣返。

战俘营中的叛乱

当我们将数字报告给共产党人时，他们报之以大发雷霆，痛斥背信弃义，拒绝进行中立的甄别和加剧战俘营中的骚乱。已成为显而易见的是，这次骚动正是由板门店通过为传达命令而向我们部队投降的通信员，并通过在战俘医院召开会议所安排的配合行动以及其他手段而直接控制的。5月7日，在公开正式会议在板门店复会以讨论当时所剩下来的那个突出的战俘问题的前一天，弗朗西斯·多德少将在没有适当的护从下，亲往第一号战俘营，去同战俘谈判，结果本人被俘，扣留作为人质，以满足他们的要求相要挟。在早先的几次骚乱和5月5日的再度骚乱之后，李奇微将军命令恢复战俘营中的纪律，但毫无结果。他应于一个星期之内启程前往他的北约司令部，我将在三个星期之内在那里和他会面。

面临着这次新叛变，李奇微命令立即开进战俘营，恢复纪律。部队虽然集合，但是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在11日多德将军的后任查尔斯·科尔森少将接受了多德所商定的屈辱条件之后，多德将军被释放。马克·克拉克将军马上否认了这项协议，将多德和科尔森免职并建议把

他们降级并重申了李奇微将军的命令。6月10日我们的部队开进战俘营，经过一场战俘死三十一人、美国士兵死一人的激战之后，开始恢复了控制。战俘重新划分，将亲共和反共的分隔开来，并将很多战俘送往他处的新战俘营而结束了拥挤的状态。除去12月间某一战俘营有一次死八十五人、伤一百人的图谋未遂的越狱事件外，战俘营中的纠纷告一结束。

这次笨拙的军事行动，象麦克阿瑟将军向鸭绿江发动灾害性的军事进攻一样，动摇了我们的盟国对我们司令部的精明判断和能力的信心，怀疑我们是否具有为托付我们的大事而提供领袖人才的能力。在5月间我到达欧洲时，我感觉到了这种怀疑。我们还没有恢复战俘营中的秩序，我们自己大大助长其势的、针对我们的猛烈的宣传攻势依然没有减轻。当秋季战俘归还问题将成为联合国大会上的主要问题时，我又将感到这点。

军事委员会主席乔治亚洲的参议员拉塞尔建议总统，为使外国舆论对于我们对待战俘的行为安心起见，要求一个由中立国——他提到印度、印度尼西亚和巴基斯坦——组成的军事调查团来观察我们对战俘的待遇。总统表示赞成，另外增加了瑞典和瑞士，并责成洛维特邀请调查。这是总统在外交政策问题上没有同我磋商的很少事例之一。我从无线电广播中听到这件事，立刻警告他说，邀请会被谢绝的。印度和印度尼西亚不赞成这种想法，一、两个星期之后就听其湮没无闻了。

在5月底我去欧洲之前，我的国务院同事在同他们的英国伙伴磋商中，已开始认为印度政府也许可以通过

驻北京的潘尼迦大使对中国关于战俘问题的意图进行有益的探讨。我认为这种活动反而会由于误传和不准确的概念而造成混乱，但是我同意和艾登谈一下。艾登赞成，于是我们就通力合作进行其事。后来既然毫无结果，那么除注意到印度方面所推论出来的一种想法外，遵循这条迂回曲折的道路也就毫无意义了，而印度的想法却在后来1952年秋季联合国大会上的活动和磋商时给我们造成很多困难。那种想法就是在交换所有不会强行拒绝遣返的战俘这个基础上缔结停战协定，而拘留其余以待进一步的谈判。国防部和国务院都拒绝这种不解决问题的办法。我们认为，这会加给原已脆弱的停战协定以很大的负担，并加给拘留在监狱里的战俘以极大的压力。

当夏末对战俘问题的公开和私下的讨论已经使它混淆不清的时候，联合国司令部重申它的建议，以攻破舞文弄墨和宣传的伎俩而揭露其真相。它提出了三个可供选择的建议。根据第一个建议，停战协定一旦生效，双方的所有战俘都将享有释放和遣返的权利。为使这项权利发生实效，将把他们有秩序地并在可控制的条件下带到非军事区的一个交换地点，并在那里验明身份，按照名单加以核对。凡不拒绝遣返的迅即交换。其他则带出非军事区而予以释放。根据第二项建议，凡是已经向联合国司令部表明将强行拒绝遣返的，从双方的军事控制下完全解放出来，并由没有参加朝鲜军事行动的国家的代表予以接见，然后释放，任便到当时他们所表示愿去的一方。根据第三个建议，非遣返人员将在非军事区释放，得任便到他们所愿意去的地方。

这就是当我们参加联合国大会于1952年10月中旬开始的会议时所采取的立场。

三十九 印 度 支 那

我们对印度支那所作的决定和行动业已在本书中分别述及，但是鉴于越南在二十年后的美国生活中占据的重要性，所以我将在本章中综述一下我在制订这一地区的政策上的关系。这一问题只在我担任国务卿后才变得重要起来，而且约略可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时期，1950 年中期朝鲜战争爆发之前；第二时期，直至 1951 年年底为止，包括最初一年半的朝鲜战争和欧洲重行武装的开始；第三时期是在 1952 年，也是进一步卷入和受挫折的一年。

朝鲜战争以前阶段

1949 年初，法国人仍企图在柬埔寨、老挝和越南（三国合称为印度支那）重建势力。罗斯福总统并不同情他们这种企图，而且在第二次大战期间，美国政府对当地的领导人，特别是胡志明，提供了援助，希望他们能给日本人造成困难。到了 1949 年，胡志明的越盟政权已经占据那个国家的大部分地区并且反抗法国。另一个领袖保大亲王却准备与法国合作，建立所谓"法兰西联邦内的自治政府"；这个自治政府后来逐渐显示出和越南人以及法国

人所理解的是两回事。保大有能力，而且根据法统有资格担任国王，这在越南可能成为一种重要的有利条件。他的短处是长期住在法国的里维埃拉，使人怀疑他是一个被俘虏了的国王。

经过一番精心策划后，法国总统奥里奥尔和保大于1949年3月在爱丽舍宫交换了关于越南前途的信件。这个完全一般性的爱丽舍协议答应越南可以拥有它自己的军队来维持国内的治安，成为法兰西联邦的一员，参与外交和国防事务以及成立一个可发行货币的银行。其他的细节在随后的会议中再行议定。总的说来，这些协议是依照美国在亚洲的意图做的，但是国务院怀疑它们究竟符合到什么程度，或者能多快地实现。

在我们看来，我们在东南亚的任务是帮助解决殖民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的冲突，既要满足民族主义者的目的，又要尽量减少对我们西欧盟国的压力。这意味着支持法国作为一个促使三国成为法兰西联邦（至少在目前）内真正独立国家的向导和援助者而"留"在这个区域。这不是一件容易办到或受人欢迎的任务。法国人迅速采取他们所能采取的行动来阻碍移交处理内政的权力；那种顽固劲儿后来我是深有体会的。越南人则力图控制他们所最不善于运用的领域，即对外关系的处理上。国务院东南亚司很怀疑爱丽舍协议是否能照所写下的那样进行。西欧司则怀疑施加压力会使法国领导人作出进一步的行动；他们认为这样只会引起他们僵持和抗拒。最后决定和英国合作并取得印度和菲律宾的帮助，来推动法国人和越南人采取更为现实的步骤。

1949年6月保大成为越南的国家元首，后来成为政府的首脑。可是，在法国进一步作出什么行动之前，1949年就告终了。会议开过多次：舒曼与我的会议以及还有贝文参加的三国会议。法国代表舒曼和高级专员雷奥·比农"从个人来说"倾向于采取进一步的紧急措施，但是又说巴黎的国内政治局势却是个阻碍。我和贝文在1949年4月和9月争论说：法国国民议会应批准爱丽舍协议，签订补充协议移交行政职权，将印度支那三国政府与法兰西共和国的关系从海外事务部转移到外交部，并发表一项官方声明，说明爱丽舍协议只不过是第一步，以后还要签订条约以成立一个正式选举出来的越南政府；在这些没有做到之前，法国的盟国不能给它帮助。

最后在1949年12月30日，法国宣布将内政权力交与越南共和国，并由保大亲王接受了这项权力；一个月后，法国国民议会批准爱丽舍协议，承认越南、柬埔寨和老挝为法兰西联邦内的独立国家。我们和英国试图使一些亚洲国家能带头承认这三个新国家，但是当它们踌躇不决时，苏联却承认了越南胡志明的越盟政权。2月7日华盛顿和伦敦因此承认这三个国家，因为我们强调的是，"我们的基本政策是支持未独立的民族能和平和民主地向着自治和独立的道路演进。"

在1950年的春天，经过一番踌躇，我们国务院的人建议支援法国和"联邦成员国"去攻击中国人和俄国人支持的胡志明叛军。援助限于经济和武器方面，就差我们自己出兵干涉了。如果中国或苏联军队直接进行干预，局势将重予考虑。我们所以这样迟疑，是因为我们有些

同事相信，即使有了我们的物质和财政援助，法国一保大政权仍将被苏联和中国支持的“越盟”政权在战场上击败。我们全都承认这种结果有极大的可能性；除非法国迅速把权力移交给“联邦成员国”，并利用我们的援助来组织、训练和装备大量的当地部队，把战争的主要担子接过去。

到了5月里，总统批准给予印度支那经济援助和军用物资。这个政策是经过与舒曼、贝文以及国会内有关的小组和委员会讨论之后同意的。法国反对我们直接与三国打交道的意图似乎有些减弱，因此成立一个“技术与经济特别代表团”派往越南和法国人共同进行经济（有别于军事）援助，但是在1950年很少取得什么协议和采取什么行动。军事援助则要通过巴黎来安排。

在这一时期以及在这时期之后，我们的行动被批评为乱糟糟的一团，既不能促使法国人放弃他们重建殖民地的努力——这是他们办不到的——也没有大力帮助他们实现重建目的，或者最好是能击败胡志明，然后漂亮地撤退。这样描述是很确切的。然而这个批评却没有认识到一个国家强迫自己盟国的成功程度是有限的。取消援助和说服盟国或说服它的反对者，只有在盟国没有援助便无计可施的情况下才能生效，印度尼西亚的情况就是如此。再者，取消对法国的援助最多只是取消殖民势力，其结果并不能使局势有利于印度支那或东南亚，或者在欧洲的稳定和防御这件更加重要的任务上有所裨益。所以尽管我们当时可能想混过去，而且肯定说没有成功，但不论在当时或者以后我都不可能想出更好的办法来。也

许有人要说，那就什么都不做好了。这说不定有其优点，但是作为一个伟大联盟的领袖对一个重要盟国在危急关头所作的必要努力采取这样的态度，也有其缺点。

朝鲜战争的影响

在南朝鲜受到攻击之后，杜鲁门总统宣布的第一批决定之一是加强对菲律宾和印度支那的军事援助。国会所作的反应是增加四十亿美元作为军事援助的资金，其中三亿零三百万美元是给与朝鲜、菲律宾和“中国一般地域”。到9月中旬，当外长们在纽约会见时，法国政府和我国政府都认定在印度支那建立当地人的军队是挽回那里的局势和维持法国驻欧洲军队的唯一办法。舒曼和国防部长莫奇坚持说，要征募这些军队，法国必须获得我国在财政和军事配备方面的援助。同时西贡的唐纳德·希思大使也重申有此必要，但是又补充说，只有“联邦成员国”在这项安排中担任真正的角色，才能获得所企求的政治上和心理上的效果。

整个秋天，行动从头到尾都是拖拖拉拉的，可是越南的军事形势愈来愈恶化了。法国人实际上等于被围困在他们的基地上。法国的部长们——这次包括财长莫里斯·比许——再次来到华盛顿讨论来年法定年度法国的整个军事预算时，向我们要求更多的援助。法国的部长们建议法国驻欧军队增加十个师，把越南军队从十二个营增加到三十个营。研究法国军事问题的利文斯顿·麦钱特通过迪安·腊斯克给我一份紧急备忘录，强调越南

军事情况极端严重；军事援助应给予最优先的考虑；应使保大亲王拥有最大的领导权；虽然印度支那是法国负责的地区，但由于法国的无能，如果它不能拿出足够的力量来守住，最好让它退出；我们应当在泰国、马来亚、老挝、柬埔寨、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加强第二道防线；军事问题主要是人力和军备的问题。我们可以提供军备，人力必须由越南的国家部队担任。

我们答应大量增加军事援助。虽然法国人抱怨我们的援助不够，但是这已经超过印度支那所能吸收的了。法国人还抱怨他们的盟国并不重视他们在印度支那所作的努力，还抱怨越南人不合作。保大回答说，巴黎在帮助他建立一个独立国家的必要条件上抱着迟疑和吝啬态度。当这种争论在进行时，麦克阿瑟将军开始了他的倒霉的向鸭绿江进军，并在11月初开始俘获了第一批中国俘虏。到感恩节时，大祸临头了。这以后一直到李奇微将军稳定了朝鲜战局之后，我们对印度支那的关心都不得不退居第二位。但是，即使在大祸来临之前，国务院一位得力的同事约翰·奥利就发出过聪明的警告，极力主张由于中国人在朝鲜的出现，我们就有必要重新考虑我们在印度支那的做法将导致怎样的后果。我们所作的努力可能达不到当前的目标，从而糟蹋掉宝贵的资源；现在不但存在着这种真正的危险，而且我们在印度支那还将陷于这样一种处境，即“我们的责任将是代替而不是补充法国人的责任”。他又说我们会成为法国人的替罪羊，并卷进直接干涉的漩涡中去。他最后说，“这种局面会象雪球一样愈滚愈大。”他所指出的这些危险要经过十多年的

时间方才完全实现，但是的确实现了。

然而，我的决定是，既然已经插手，那就绝不回头。还有，当时的局面好象有所好转。11 月法国国民议会表决了加强法国部队并在"联邦成员国"中建立国家部队。当地的内政决定于 1951 年初移交，虽则移交的日期一直被拖延着。法国最优秀的军人之一，德拉特尔·德·塔西尼将军被任命为印度支那的高级专员兼总司令——不幸的是他不久就死于癌症。会议和声明继续不断。

1951 年我们的军事援助增加到五亿多美元。德拉特尔将军两次来华盛顿要求更多的援助和更迅速的交付，还力劝我们宣称失掉印度支那将是对自由世界的一个灾难性的打击；然而人们问到他的军事计划以及他关于将权力移交给三个国家的意向时，他却很不高兴。印度支那在发展兵力，加强当地政府的责任以及取得人民普遍的支持等方面，看上去并无多大的进展。1951 年越南的部队增加到四个师，但是在所需要的两千军官中，越南军官只有七百人，而他们在达拉特的军官学校每年只有两百人毕业。我们在朝鲜的军事代表团为朝鲜的十二个师大量培养军官，我们建议从这个代表团抽调些教官来，却被法国人拒绝了。

时间一天天消逝，印度支那的局势并无多大进展，而我们却陷入板门店谈判的泥淖中。我们越来越感觉受到挫折。在我出国参加 1951 年秋天的一系列会议之前，我们于 8 月下旬对印度支那局势作了一番回顾，我们的参谋长联席会议这时向我们提出警告，反对发表任何有关派遣美国军队到印度支那的声明，或者在法国人看来将

来发生突然事变时有可能派遣军队的声明。在这项政策上，我们从没有动摇过。

增援与挫折

1952年1月在华盛顿举行了一次英、法、美三国参谋长的会议；会上法国人重又提出，如果中国直接干预印度支那应当采取什么对策的问题。可是我们的参谋长们只同意如果要干预的话，这应当是联合国的事情。两星期后，我们派往参加当时在巴黎召开的联合国大会的代表，根据我们的指示，发表了同样的声明，就象英国和法国的代表一样。这仍旧等于没有作出决定：如果中国真正干预的话，我们之中任何一个国家或者所有的国家，如果要有所作为的话，应当采取什么做法，虽则在那一年的春天，人们普遍担心着这种干预。

2月里在里斯本开会时，我们答应给法国增加军事援助，包括在印度支那所征募的军队在内。我于5月动身去波恩，签订结束对德国占领的协定和建立欧洲防务集团俾使德国加入共同防务协定；在这以前，我于1952年5月19日被召回白宫，与国防部长洛维特和布雷德利将军共同讨论印度支那问题。会议的结果是指示我向艾登和舒曼商讨四件事：进一步发展印度支那当地部队和我们愿意为此增加援助；能不能由三国对北京提出反对"侵略"印度支那的警告，包括外交和军事方面的预备性讨论；北京反应的预测；以及如果北京不睬的话，三国可以采取和愿意采取的行动步骤。除了发展部队外，我应

避免提到增援的具体数额和印度支那的内部变动。当时认为这样的议程可使法国人只注意当前的实际重要问题，而避免在次要和枝节问题上刺激他们。

巴黎的谈判是在一个更广泛的场合进行的。会谈的结果决定将这个问题等待法国驻联邦成员国专员让·勒图尔诺从印度支那侦察归来之后，再作进一步研究。这时从巴黎和西贡发来的电报表明我们正陷于困境。巴黎告诉我们，法国人将印度支那和突尼斯—摩洛哥问题联系在一起，并且对他们认为的"美国的干涉"感到愤慨。巴黎和西贡都一致认为印度支那应当"重新给与活力"，否则的话，由于法国资源的大量消耗，说不定法国会为减少损失而作出撤退的决定。保大不是一个能使越南团结的人物，然而正当德拉特尔去世使法国的领导受到损失的时候，法国人必须进一步加速"联邦成员国"的发展。西贡，虽则认识到法国人的敏感性，但认为在法国人要求给与援助时，我们应坚持获得情报和采取行动。这当然就是我们两年来一直所做的。

勒图尔诺接替德拉特尔继任高级专员。在6月中旬当他要求更多的援助时，我按照自己的责任和同事们的建议坚称现在我们在越南的军费上担负了三分之一以上，我们应当获得情报以便对我们的人民解释为什么这样做以及取得了何种进展；这样指望似乎还是合理的。还有，一个这样积极支持他们的盟国，对于处理事件提出友好的建议，似乎不能算作多管闲事。勒图尔诺虽则没有表示不同意，但没有取得多大成果。然而没有一个人认真地提出忠告，说目前波恩协定正在等待西德参议院

和法国国民议会批准，而印度支那局势仍处于危急状态；有鉴于这种情况，除非美国的军事与政治改革计划得到实现，结束或者扬言要结束对印度支那的援助，应是上策。但是与上述办法相反，我们在一项公报中，反而承认印度支那的斗争是全世界抵抗“共产党的征服和颠覆企图”的活动的一部分，法国“在印度支那负有重大的任务”，就象我们在朝鲜所承担的一样，并说在国会所授与的权力范围内，我们将增加援助以建立印度支那的国家军队。勒图尔诺回国后，发表了印度支那军事和政治方面进展的乐观声明，并预言在往后六个月内美国的援助将增加到法国在印度支那的总支出的百分之四十。

当舒曼、艾登和我于6月底在伦敦会面时，我们讨论了应否警告北京不要在越南直接进行军事干预。我一边指出，发出警告而对方不予理睬时也不采取行动，那将是不堪设想的事，一边主张关于我们每一个国家对干预可能和行将采取的步骤，首先应得出一些结论。在一开始讨论时还应当理解到，由于我们在朝鲜和欧洲的义务，我们在印度支那的进一步努力只能限于让海空军参加。在过去，当有人建议用这种行动对付中国时，我们从许多方面都遭到反对。这种警告的想法就没有再谈下去。

在12月中旬，国务院注意到法国对印度支那的局势日益感到不安，而且我们政府所得到的关于那里的局势和关于法国军事计划等情报有很大的缺陷；国务院而且认识到法国的早先打算，即在减少法国在印度支那的部队之前先削弱敌人力量，俾使当地部队能控制局势，已经

不再行得通了。我们的观察家心中有数，单靠越南人的部队连现在的僵局都保持不了。在北大西洋公约会议上，舒曼央求解脱法国在印度支那的“孤军作战”和由志愿军分掉一些负担。他没有要求派遣军队但要求财政援助(我们业已负担百分之四十的费用)，同时要求承认在印度支那和在朝鲜的斗争具有同等的重要性。勒图尔诺在会议上也发了言，会议的回答是通过一项决定支持在印度支那进行的反共斗争，但没有保证给予财政援助。

12月18日北约会议休会后，舒曼约艾登和我于当晚七时去法国外交部，离开我预定回华盛顿的时间只有三小时。勒图尔诺用了一小时的时间讲敌人在老挝和越南即将进攻，因此有必要增加兵力和援助；接着他开始讲他的大致规划。我这时又倦又饿又恼火，实在忍不住了。我要求舒曼让我作一简短的声明，好乘我的飞机回去。我们将乐于在圣诞节后派遣一个工作组到巴黎来，从法国人这边获得关于印度支那局势各方面的全部和详细的情报。我们对过去送给我们的情报根本不满意。这一点必须纠正。如果我们要进一步采取措施，或者由于我们要进一步采取措施，或者当我们打算进一步采取措施时，我们都必须确实知道当前的局势和我们在做什么。

勒图尔诺和舒曼同意了并且建议工作组去西贡，因为那里是情报的所在地。我说应当去勒图尔诺所在的地方；如果他愿意与工作组一同在西贡工作，那是满意的；但是我们不愿意再在那些绝对不象有权送出情报的下级军官身上费气力去企图获得情报了。他要援助；我们要情报。第二步怎么办是他的事情。

我就是怀着这些别离心情离开，不多时就飞回华盛顿。一个月以后，我已是一个平民，不再担任什么官职了。我关于印度支那事情的叙述，理应在这里结束。不过这样割断，将使读者放不下来，所以还是来一个简短的结束语好些。

1953年初夏在奥丹尼尔中将率领下的一个军事代表团，的确去了印度支那。它建议除了拨给印度支那四亿美元的援助外，还应在1954年年底之前拨给三亿八千五百万美元。1953年9月30日美国保证给予这项援助，法国则答应做到(但并未做到)我们过去两年多来一直要求它做到的一切。在1953年的第四季度，印度支那局势更加恶化，法国人更加急于要脱身，英国人则比较倾向于劝苏联帮助促成这件事。1954年2月19日，英、法、苏、美四国外长在柏林达成协议，同意召开和平解决朝鲜和印度支那问题的会议。一个月之后，艾森豪威尔总统宣布东南亚对于美国是"异常重要"；1954年4月他又考虑与英、法一起在那里采取三国联合军事行动。奠边府于1954年5月7日陷落，7月20日日内瓦决议结束了敌对行动和法属印度支那，并把越南分裂为两个。

美国没有在日内瓦的最后协议上签字。另一个代表团建议继续援助南越，于是在马尼拉签订东南亚条约；根据这个条约南越有权要求签字国给予保护。摆在我们面前的就是约翰·奥利当初警告我们不要走的那条路，即代替法国人应负的责任。正如他早就预见到的那样，"这种局面会象雪球愈滚愈大"。

四十 在伊朗的第二次尝试

一项努力的失败

正如前面所述，我于1951年11月与艾登先生谈话之后，我们解决英国—伊朗石油争端的第一次一系列努力失败了。争端遂重陷于僵持的阵地战，其间只发生了几次惊人的袭击，但没有牵涉到我们。1952年1月，我们对伊朗停止了军事援助，只保持那微乎其微的经济援助。另一方面，我们通过世界银行的副行长约翰·加纳，并通过摩萨台的顾问、比利时前经济大臣和国际货币基金会前主席卡弥尔·格特，鼓励世界银行和摩萨台设法谋取一项解决办法。他们也象我们一样完全失败了。

接着英国政府的另一着棋也遭到非常难堪的失败。它向国际法院提出的起诉，由于法院无管辖权，于1952年6月不予受理，其理由是所控告的协议——1933年与英伊石油公司签订的租借合同——并不是一项条约或协定。这使英国政府的处境比以前更加恶劣。在同一个月内，伊朗所进行的一项交易被英国破坏了。一艘名叫"露丝·玛丽"的油船被英国皇家空军的飞机"追逼"进亚丁港。这艘油船属于一家巴拿马公司，挂的是洪都拉斯国旗，租给一家瑞士公司，船长是意大利人，在班达玛许尔

由伊朗国营石油公司装上石油，运交在意大利的一家意大利公司。亚丁的英伊石油公司控诉这条船并对船上装的货物提出所有权。即使采用其它名义，“露丝·玛丽”的这件冒失行为使得支持英伊石油公司要求的英国法庭也感到棘手。

就在这时，摩萨台在海牙胜利归来，与伊朗国王在德黑兰发生激烈争辩，于7月16日辞职。廓万统治了五天，天天都发生暴动，结果国王答应了摩萨台所有的要求并让他复职。乍看起来，这次动乱似乎表示阵地战的结束和新时期的开始，也许是采取决定性行动的时期。我们迅即行动起来，敦促英国准备一个切实可行的解决计划，以便继摩萨台后的新政府抓住它作为立即取得资金的来源。我们也敦促我们的新任大使洛伊·亨德森和他们的代办乔治·米德尔顿马上一同来考察，在这个动荡局势下，可能出现哪一些替代摩萨台的政府，以及有什么办法使这类政府取得权力或者促其加快实现。

摩萨台的态度也捉摸不定，使人迷糊。今天好象建议仲裁或赔偿，明天好象又撤回。我认为当时的局势要求作一些简单的、临时的和易于理解的建议，使石油流到英国、资金流到伊朗，而不损害任何一方的谈判地位，把比较带永久性的安排留待双方关系比较缓和之后，从实际工作中产生。在这一点上，艾登对局势的一般看法却与我相反。他认为局势不致发生极大危险，也不需要匆忙。他当时说的，以及以后写信告诉我的，都肯定伊朗的经济太原始、太有伸缩性了，不容易崩溃，而摩萨台倒台后也不一定非是共产党的统治不可。关于第一点，他的

我们第二天的答复既友好，又非常讲理，但没有产生效果。英国方面来信的整个语调使人感到这是出于英伊石油公司的手笔。的确，英国照会的实际内容就是要公司的职员与伊朗官员会见研究是否存在一个正式协商的基础，以解决英国的要求和伊朗的反要求。过去的历史充分地表明，这家公司不宜担任外交人员的角色。

新角色参加进来

正当此时，这一幕戏又出场了两个新角色，一个在伦敦，一个在德黑兰。正如丘吉尔先生所说的，“艾登不在时”，他本人代替外交部来处理伊朗问题。他向杜鲁门总统建议，他们两个人对摩萨台提出一项联合建议。这项建议于8月间拟好，于月底送出。摩萨台不但拒绝了并且声言在开始讨论解决财务问题之前，英伊石油公司必须先付伊朗所要求的四千九百万美元的欠税和油田使用费。我们的计划大体上是根据我一个月以前向艾登提出的那一个建议写的，因此很能说明我的解决办法并不比艾登的办法更有效些。

另一个上台的新角色把事情搞得十分复杂。纽约市石油供应公司——销售公司，并非生产者——总经理W·奥尔顿·琼斯在德黑兰出现，并和摩萨台开始谈判，让他的公司在国外也分配和销售一部分国有化的伊朗石油。虽然国务院反复申言琼斯先生是以私人身份追求他的公司的私人利益，他在德黑兰的出现以及尽人皆知的他与艾森豪威尔将军的友谊，却使英伊公司职员感到不

安，并引起英国人的猜疑。这也鼓励了摩萨台在整个争议中的主要意图，甚至他那些固执想法：取消英国公司、它的雇员以及它在伊朗的影响。琼斯先生和他的谈判并未取得成果，但是的确使摩萨台的态度更顽固了。到10月里，他断绝了和英国的外交关系。

又一个不安的静寂与停顿时期在这僵持的局面下开始了，只有双方的宣传依然如故。就在秋天这个时候，从伦敦传来一种看法，就是不但只要摩萨台掌权就不可能取得解决办法，而且他只是貌似强大。他同廓万、伊朗国民议会议长凯夏尼以及国王的斗争，是由于德黑兰暴民与伊朗共产党的协助而获得胜利。然而一些还没有怎样组织好的集团却受到他的威胁，到时候说不定取他而代之。我们的回答是我们没有时间，因此伊朗问题必须留待即将继任我们的人就职之后讨论。

最后的尝试

我们还有一项重大的事情要做。这是杜鲁门总统敦促下发生的；他在10月间对戴维·布鲁斯明确表示希望英伊公司争端能在他任期结束之前解决，而且以他的那种和善的令人心折的口吻补充说，他对于我们处理这一事件的方式并无意见，也无建议。我重又想到丘吉尔先生插手之前我曾经有过的一些想法。甚至在极优惠条件下摩萨台也不愿与英伊公司签订一个新的租让合同；英国人则坚持结束旧合同应予“赔偿”。对于这些要求和反要求进行仲裁最感困难之处是，双方对于应考虑哪些价

值项目——例如将来的利润——不可能取得一致意见；不论包括进去还是不包括进去，都不可能不引起国内政治纷乱。提出一笔总数目解决的巨大价值就在于此。这并不需要说明内容，而且如果能写成在很多年内给予英伊公司若干桶石油的话，那么它的货币总额和这样做的理由都可以讲得相当含糊，使双方各自都能向国内交代得了。这以后我们就可以设法生产石油并在市场出售不归英伊公司所有的那一部分，估计大约有一半光景。

在我们的政府中，国务院以及财政部和国防部内我自己的同事终于得出一个结论，即英国人非常碍事，他们决心在伊朗采取不能统治宁可毁灭的政策。因此，我们必须拿出一项独立自主的政策，否则的话，就一定要遭到严重危险：伊朗消失在铁幕后面，并使中东整个军事与政治局势变得不利于我们。他们的愤激与惊慌心情是易于理解的。但是美国不顾英国的反对，采取独立的解决办法，也是说来容易做来难。除了在我们两国之间引起有损两国利益的恶感之外，还需要美国主要石油公司的合作，因为除了英伊公司之外，只有它们有油船运载所需要的大量石油。还有，这些油船都是做自己的生意的。需要协调管理的程度是可观的。这些石油公司是否愿意参加这项工作呢？即使它们愿意，司法部是否允许这样做呢？因为司法部已经控诉它们在中东进行据称是违犯反托拉斯法的活动。

这方面必须加以研讨，因为即使一个完全独立的政策大概都是不适宜的，而某种程度的独立行动能力在伦敦却可能大有说服力。所以我们从司法部开始，与司法

部长詹姆斯·麦格雷纳里以及他的反托拉斯司的助手们，会同国防部长洛维特和奥马尔·布雷德利将军，以及我们自己中东司的人员，开了两次时间很长的会议。麦格雷纳里既有礼貌又有耐心地倾听着，对于可能作出些什么决定保留自己的态度。反托拉斯司的那些"警犬"却不是这样；他们不愿与不义之财打任何交道；对于什么是法律所允许的，他们比最高法院直到那时为止所表示的还要有把握得多；他们毫不犹豫地在外交政策目的上不同意我的意见，在伊朗被吸收进苏联体系所带来的军事风险和后果上不同意洛维特和布雷德利的意见。当他们离开去商议时，我很难指望从这方面获得什么帮助了。虽说司法部长有决定之权，他的助手们却有权把情报透露出去，给人以暗示；尽管他本人没有胃口这样干。

大约在这个时候，我们有机会把不利因素化为有利因素。在石油争端发生之后，我们曾在暗中劝阻美国公司私自在伊朗购买石油。这种购买在解决问题上起不了多大作用，除非如我在前面指出的，主要石油公司从事购买石油以及不可避免的诉讼可以引起刺激。这种态度如果不引起公众的注意，是不能持续下去的，所以为什么不发表一项声明来促成它，这样做的效果说不定会使英国外交部软下来。所以我于11月4日写了一封短函给艾登，指出企图购买石油的人越来越多，和我们必须一接到通知就发表一项声明。附在信内的声明草稿讲清楚是为了尽量减少我们之间的不协调，强调我们要继续共同努力，所以在草稿中重温了我们过去为了寻求解决所作的努力，并说私人是否应当在伊朗购买石油必须让他们自

己判断并估计到法律上所冒的危险。这项声明于12月6日发表。

总统同意换一个办法

11月7日我向总统提出一个棘手的问题：如果证明有必要拯救伊朗——而且最后计划必须经他批准——他是否愿意根据国防物资采购条例使用他的权力预付伊朗一亿美元，以换取今后交付的石油，并且根据这个条例批准一项自愿的计划，让一个或更多的美国公司（包括几个主要的石油公司）单独地或与英伊公司联合起来购买和销售伊朗石油？在同一天他答复了我的问题："同意，哈里·S·杜鲁门"。

当我们通过吉福德和弗兰克斯告诉英国外交部我们如何想法时，我们得到的反应似乎显示了一点变化，虽则是微小的变化。第一阶段仍然是同意对赔偿问题进行仲裁。在同意仲裁之后，第二阶段就开始了。伊朗这时就可以自由出售石油给任何人；但是英伊公司在获得仲裁的赔偿之前，不会参加其他谈判。保罗·尼采在伦敦做了些推动工作，但并未取得多大进展。11月20日艾登和我在纽约晤面商谈了这个没完没了的问题，在那里我们两人都在联合国大会上为朝鲜停战问题而斗争。我重又强调了这一点，伊朗正处在爆炸的边缘，这一来，摩萨台将与美国断交；断交以后便无法使这个国家不落入伊朗共产党手中和消失在铁幕后面。大批的文职人员和军事人员已正在被清洗了。

我说尼采曾研究过英国计划中的第二阶段，其中包括旨在使第一阶段——同意对赔偿问题进行仲裁——可以被接受的政治利诱。这是完全不够的，因为它只打算每年从阿巴丹开出七百万至一千万吨石油。考虑到应付英国的赔偿以及偿还美国的垫款所需的数量，至少两千万吨才能留下足够的款项使伊朗的经济得以周转。我也强调了一次付清赔偿的意见以及我们战时紧急法律所采用的某些办法。我们认为在洛伊·亨德森于两三个星期后回德黑兰时，应采取某些新的行动，最好由英国人单独或者由我们两国共同进行。可是如果做不到的话，我们可不能袖手旁观而让中东局势越来越混乱。如果英伊公司自己不能运送足够数量的石油，我们却有办法，而且得到最高当局方面的赞同，由美国政府和美国公司根据这些办法暂时帮助一下。尼采先生应立即回伦敦讨论这些办法。我们当竭尽全力和英国人共同行动；但是时间很局促，不久我们说不定会找不到挽救伊朗的最好办法。这在伦敦引起轩然大波。

议程的第二个项目是和美国的主要石油公司进行协商，这并不容易办。面对着司法部对石油公司的控告，以及司法部明确表示它们甚至不能和我会面，我只好去找我们的共同上司。总统和往常一样在困难的时刻总是给我支持。11月26日他根据1950年的国防生产条例，给予我一封信，提到准许美国公司与英伊公司共同应付石油争端的建议，授权我“与美国石油公司和英伊石油公司商讨，以决定我采用哪一种行动方式才会产生所要求的结果……在必要时可与联合王国以及其他方面商量。

并通知司法部长”。

这封信的副本被分发给请来和我会晤的那些公司；信的用意是保护它们不致受到反托拉斯司的攻击并鼓舞它们于12月4日和9日与我一起在国务院开会。时间的确剩下来不多了。第一次会议就象与最胆怯的野生动物接触一样。捱了好一些时候才使他们发言。后来他们开始把顾虑讲出来了。他们相信伊朗的经济和政治甚至社会和军事等情况，都已陷进严重的危机；他们同艾登一样，不相信在摩萨台统治下有什么改革办法；他们意识到如果摩萨台靠他的寸步不让的态度取得比与他们所协商的更优厚的条件，他们自己在别的国家的安排，将会立即受到影响；他们甚至不喜欢显得象盘旋在英伊公司尸体上的饥鹰那样。会议的主要情调是：“只是由于上帝的保佑——和稍微多一点的常识——我才到那里去。”会议加强了我的信念，即与英国人联合行动的巨大重要性——即使很勉强并有些强制性也在所不顾。会议并未达成协定，但是“会议的感觉”是尼采应去伦敦，而且如果英伊公司愿按照所建议的路线进行，他们要在我们的保护手臂下设法进行帮助。

我相信这种态度将会透露给英伊公司。我们的地位并不象我们希望的那般坚强，但是比过去要好些。当艾登和我在一星期后重又谈起时，他仍旧不赞成一次付清的解决办法。因此，我同意亨德森在他开始和摩萨台谈判时不提这个办法；在经我审查同意之前也不要提这个办法。我将牢记着艾登想再一次试图劝阻我提出这个办法，但是有一个保留，如果发生危机非要提出不可时，我

就有权不经过讨论自顾自去做。

亨德森在圣诞节那天见到摩萨台，谈话很不着边际，着重说明总统和国务卿费了很大苦心寻求解决办法。谈话进行了好几小时。摩萨台似乎同意对赔偿进行仲裁，也没有加上先决条件，甚至显得愿意考虑将来利润的损失。亨德森说，一旦同意进行仲裁，美国可以立即付出巨款，以换取将来交付的石油；英伊公司可以采二千万吨左右的石油，必要时可由美国公司协助；国防部准备提供用于波斯湾的哨艇，进出口银行将恢复二千五百万美元借款的协定。所有各点都灵活变通办理。亨德森很抱有希望，但是在12月31日的另一次商谈后，他的希望下降了。我们试图在用书面提出建议之前加上一些甜头，就象1月15所提出的那样。这些建议如亨德森说的："不含有任何背离以前计划的不愉快之处"。然而艾登拒绝进行。后来他写道，他"认为我们还是把心思放在寻找一个代替摩萨台的人物更好些，而不要试图收买他"。

可是在华盛顿，我们的任期到周末就结束。1月20日（星期二）新政府接替了。

艾登的辩解

虽然故事终局不在本书范围之内，然而把故事的惊险结局保留着不说，那是对不起读者的。

1月29日摩萨台反悔了关于对英伊石油公司赔偿的仲裁可以考虑未来利润的通知，他坚持应予估价的唯一项目是公司在德黑兰的不动产。2月里他展开一个攻

击伊朗国王的宣传，并要求国王离开德黑兰。保王党所领导的暴民在夜间攻击摩萨台的住宅，他穿着睡衣爬出花园围墙由宪兵队解救了他。3月里他全盘拒绝了联合提案，4月里他免去了凯夏尼国民议会议长的职位并解散了参议院。

从这时起伊朗迅速地走向内战的道路。7月，摩萨台要求就他和敌对的国民议会之间的取舍举行全民投票，结果他获胜，他就动手解散国民议会。保王党举行军事政变的企图出了岔子，国王先逃往巴格达，随后逃到瑞士。摩萨台解散了国民议会。现在他受到共产党来自左面的压迫，不得不求助于警察。军队起初拒绝协助，后来却把他们举足轻重的实力投在仍未平息的保王党政变的一边。摩萨台下狱，国王从流浪中回来，主持一个由军队控制的政府。

英国人所物色的代替摩萨台的人已经找到了。但是正如惠灵顿公爵提到滑铁卢战役时所说的，“这真是间不容发”。结果通过美国和欧洲石油公司所组成的财团与伊朗政府拟定了一个新的开采权让予协定，其中英伊石油公司只拥有不到一半的利益，与1950年从拉思马拉所可能取得的结果——如果当时迅速采取行动的话——比起来，条件差得多。这个协定也是根据1952年我们的建议制定的。人们又一次想起奥林森斯廷[1]提的问题：“孩子，你难道不知道世界的统治是多么不明智吗？”

---

[1] 奥林森斯廷(1583—1654)，瑞典政治家。——译者

四十一　一个公开的协议受到公开反对

1952年秋天，联合国大会第一次在它的纽约新总部举行；会议开了两个月，寻求一个解决朝鲜战俘问题的办法。它的会员国非常错误地认为妨碍朝鲜停战的是这个问题。停战一直到八个月之后方才来到，那是在我们的大选以后，也是在朝鲜的苦战和惨重伤亡使共产党人认识到无法得到比以前向他们提出的更好的条件之后。从10月中到12月初，我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埋头于大会的政治和外交事务之中；在龟湾的这座新的现代派宫殿里，我比过去在霞光牧场的重新粉刷过的万国博览会大厦或者在那个虚有其表的夏乐宫花了更多的时间，并扮演了一个更为重要的角色。

我们的政府对进行这场战争负有主要责任，相信有一种停战条件能结束战斗并在战后以最大希望保持和平和稳定状态。我自己的目的就是要支持这种停战条件。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抓住英国人同我们站在一起，使拉丁美洲国家和欧洲国家继续支持我们，这个集团能够击败任何有害的建议，而且是任何良好的决议所不可缺少的支持者。最后还要留心两个圆滑的掮客的提案，他们是阿拉伯—亚洲国家集团的头头、印度的克里希纳·梅农和大会主席、加拿大的莱斯特·皮尔逊。这些人会表面

上赞成我们的目的，但实质上并不；他们就以这样的方式在"不结盟"国家的代表中得到支持。

在离开华盛顿去纽约之前，我们尽了最大的努力来平息由我们的驻苏大使乔治·凯南所引起的争吵。凯南赴苏前，中途去柏林参加一次大使级会议。记者问他关于在莫斯科的生活的问题，凯南把它和他在战时被希特勒拘留时的生活相比。一个老练的外交官讲的这种不寻常的话，引起了苏联政府的抗议，宣称他是不受欢迎的人，并要求把他调回；这一切在报纸上引起了一些骚动，并使加利福尼亚州的急性子参议员威廉·诺兰向我提出同苏联绝交并把苏联大使遣送回去的反要求。我向他指出，他建议的这个步骤关系很重大，需要根据国家利益作出明智的和冷静的判断，以及我们打算从各方面考虑这个问题，包括他的建议在内。接着我派查尔斯·E·波伦陪同凯南大使去瑞士，要他在那里尽可能地忍耐和沉默，以等待凯南夫人和他们的孩子的到达。我们认为最好的防御是猛烈的进攻，所以我们通知苏联政府说，我们的大使以准确和温和的语言描绘了外交人员在俄国的处境。"这种被苏联政府一贯推行了好多年的外交官待遇，粗暴地破坏了经过多少代发展起来的国际交往的传统和习惯。"在这以后的两个月中，无论是维辛斯基或是我都没有提起这件事。

中心问题和它的气氛

第七届大会的中心议题是如何在朝鲜实现停战；在

大会期间，停战问题已集中在战俘遣返问题上。关于板门店谈判，前面叙述到我们试图把注意力集中在现实问题的解决上；也就是修正关于遣返战俘权的条款，不得强制俘获者或俘虏去强迫一个不愿遣返的俘虏屈从遣返。这些建议以新的形式于9月28日提交对方，并被他们断然拒绝。威廉·哈里森中将，我们的主要谈判代表，暂时停止会议，等待对方有什么新的建议时再开。我在10月8日的记者招待会上支持这一立场，强调我们愿意恢复讨论老的或新的建议，但是不会在我们宣布过的人道原则上让步。在遭到断然拒绝时继续提出建议，很快就会变得无异于跟自己谈判。

大会每年会议开始时的"一般性辩论"，通常使人厌烦和浪费时间。可是在1952年10月里浪费掉的时间却花得很值得，因为虽然开幕日期推迟了一个月，但是离开美国的大选仍然还有三个星期。一般性的发言相当无害地用掉了这段时间的一半。我自己的发言，冷静然而温和，是不值得回忆的。但是到了10月份的最后一个星期，连龟湾的最感情奔放的演说家也变得无话可谈了，因此不能把小组讨论再往后推。朝鲜停战问题是第一委员会议程上的第一项，而我是第一发言人。辩论于10月24日开始。当时，我把我对大会的基本印象报告了总统。我写道："到目前为止，大会的突出情况是被阿拉伯—亚洲集团控制着。"

但是我们并没有浪费开头的两个星期。为了突出辩论的问题，我们准备了一个要求中国人和北朝鲜人"同意停战，承认所有战俘的不受限制的被遣返的权利，并避免

在他们的遣返中使用武力"的决议；有二十个国家同我们联合发起。我作了长篇发言带头支持这个决议。我不慌不忙地讲了从1943年12月1日开罗宣言以来朝鲜问题的整个历史——宣言规定朝鲜必须自由和独立，这个立场后来苏联也接受了。对我来说，这似乎是回答共产党宣传的全部谎言的最好办法。我的发言花了四个钟点，其中仔细地加进许多文件，而且为了引人注意，不是照本宣读而是根据提纲发言的。事后，巴基斯坦外交部长、后来担任国际法庭法官的穆罕默德·查弗鲁拉·汗爵士对我说，"我没有想到，我们的提案是这样有力。"

我们希望对二十一国决议案采取迅速行动，但是事与愿违。当时离开美国大选只有十一天；我作为美国发言人的真实性正在减退，因为艾森豪威尔将军在声明中说，如果他当选，他就要去朝鲜，这说明他不想表态。我在演说发表后第二天给总统的报告，显出我是过分乐观了。

梅农的阴谋

10月28日，代替艾登担任英国国务大臣的塞尔温·劳埃德告诉我，克里希纳·梅农正在酝酿一个计划。劳埃德原来的意思似乎认为它有问题，可是我很快就发现他也卷在里面。这个办法（梅农什么都不肯形诸笔墨）是把俘虏移交给一个委员会，糊里糊涂地从事遣返工作。据称，梅农争辩说，这个办法将导致停战，而执行时如有任何争论将是共产党人和"保护国"——即委员会——之

间的事，而不是共产党人同联合国军司令部之间的事。我强烈反对这种不明不白的办法，它有种种的缺点。停战的最重要部份就是释放俘虏，如果第八集团军在这一部分条款的执行上没有任何控制权的话，它就不得不控制着俘虏，并且甘冒停战谈判决裂的一切危险。10月31日，我同迈克·皮尔逊的一席谈话发觉他也参预了这个阴谋。我告诉他，如我在笔记中所记的，"他对这些建议的兴趣使我很烦神，并要求他和我保持密切接触。"我关照我的助手，"这是一个危险的局面，我们必须密切注意。"

我回马里兰州去投票，有机会同总统作了一次谈话，并向他报告说，鉴于艾森豪威尔将军即将有朝鲜之行，大会是否会支持我们的二十一国决议案很难说。看来在艾森豪威尔将军决心和我们建立什么联系——如果有的话——之前，是无法了解他的观点的。总统告诉我他为了建立联系所作的努力。我们的结论是，就目前来说，我应当在纽约打一场阻塞性的防御战。总统还力劝我接受路易斯·斯蒂芬·圣劳伦特总理的邀请，在月底去渥太华进行一次正式访问。

一星期后，舒曼和艾登都到了纽约，水壶第一次烧开了。我们驻联合国的代理大使欧内斯特·格罗斯，同我刺探到的梅农、劳埃德和皮尔逊的情况是这样的：梅农利用他那模糊的表达方式和不愿意提供书面根据作为欺骗的手段，已经把其他两个人兜在一个向后转的提案里。我给总统写道，这就"如同人家解决罢工时说的行话一样，〔给〕我们保证，而让对方决定。"虽然三个人一个都不肯坦率，他们的提案的实质好象是，那些同意遣返的俘虏

将被遣返，而那些不同意的将仍被作为俘虏扣留，直到他们确实同意遣返时为止。这样，遣返和反对强迫的原则好象都做到了。可是，墨西哥早先提出的一个方案规定每一个联合国会员国都接受一些不愿遣返的俘虏，作为客籍的临时工，这将在解决困难方面更多地承担些责任。

艾登加入讨论只会使情况更加混乱。他不象我那样曾经从梅农、劳埃德和皮尔逊的诡辩中受过教育。他一方面同意我俘虏不应强迫遣返，另一方面又被劳埃德说服，认为梅农的意见和这并不矛盾。我才解释清楚，劳埃德立刻把问题搞糊涂，要多快有多快。我在上述给总统的信中说，虽则当时我要的只是同情，可能不久就需要他发出坚定的指示，因为一次彻底的破裂说不定就在眼前。梅农是按照实用主义的准则行事，打败不了人家就同人家联合，我则是准备遵照格兰特将军[①]的办法，坚守阵地，斗争到底。维辛斯基在11月10日的演说给我们的帮助，就象被大熊追赶的牧师所祈求的帮助一样：虽然没有帮助我们，也没有帮助了熊。他说，苏联政府在俘虏的问题上"决不动摇。"加拿大人觉得维辛斯基的演说不如想象的那样坏；澳大利亚人认为中国人愿意停战而苏联人不愿意；大部分的拉丁美洲人、缅甸人、泰国人和菲律宾人认为这是关门。我补充说，它"关上了门"，但是对消除幻想也有帮助。然而，梅农、加拿大人和英国人的那些幻想是消除不了的。

紧接着是我同这三个人以及同二十一国集团的成员

① 格兰特(1822—1885)，美国南北战争时北方军总司令。——译者

们举行了一系列白费气力的会议——在二十一国集团的会议上,我们要求采取行动,英国人主张拖延,而梅农却在胡扯。我向总统请示的结果得到了下列指示:"……通知秘书长,美国政府将强烈反对任何不明确肯定和支持非强迫性遣返原则的决议。"我们现在几乎准备摊牌了,首先向那些阴谋家摊牌,然后是在大会上摊牌。

我对当时局势的看法是停战条件在板门店几乎已经谈妥。只有交换俘虏、飞机场和停战监督委员会等条款仍未取得一致。我完全相信,共产党人不会同我们这个即将下台的政府达成最后协议,特别是因为艾森豪威尔将军正打算去朝鲜亲自看了之后再提出自己的见解,而他是对我们处理战争的办法非常不满意的。二十一国的决议案是企图为9月28日在板门店提出并被拒绝的条件取得大会的支持,这样当我们的继任者在1953年1月20日就职时,我们的立场就会拥有强有力的国际支持。梅农是企图把停战条款的成文从板门店和联合国军司令部转到纽约和联合国大会上来,在印度和阿拉伯—亚洲集团领导之下并得到英国人和加拿大人的支持。我们决心阻止这一企图。

我对说服工作还没有绝望,所以对英国人和皮尔逊又作了一次努力。在我的要求下,洛维特部长和布雷德利将军于11月16日来纽约和我们开了一个会。我的目的是,避免去讨论怎样才会影响中国共产党人走向停战,而让第八集团军的负责人讲清楚梅农对付战俘的浮而不实的计划将在战场上招来的危险。我的同事们尽了最大的努力,但是会议太大了;讨论集中不起来,没有收到预

期的效果。

第二天，11 月 17 日，梅农散发了他的决议案，提案的那些缺点我已经提到过了。在一次二十一国代表的会议上，我作了反对梅农决议案的发言，但答应修改我们的决议案，使它增加一个遣返委员会，但是委员会要有一个中立国担任主席，并具有作出有效行动的行政权力。艾登和皮尔逊争辩说，要把梅农的决议案作为基础，并得到了多数的支持。可是一小部分人被推选出来起草一个关于梅农建议的修正案。美国也是里面的一个，并要求准备一个工作草案。长期的经验使我懂得，准备这份供讨论用的文件是占便宜的：这样，修改的责任就落到反对者的身上。

为了保护托付给我的利益，看来有采取其他行动的必要。我会见了美国记者并同他们讨论——并不是为了我要居功——梅农建议中我们完全不能接受的那些部份。所有这些很快见了报，并且占了相当篇幅。当我应总统的召唤回到华盛顿同他和艾森豪威尔将军见面，讨论在 1 月 20 日以前需要采取的行动时，我的一个希望是将军或许会在朝鲜问题上作些有益的声明。11 月 18 日这次会议的全部经过后面还要讲到；现在只要提一下其中有关联合国大会的那次争论就行了。

我在内阁室的会议上说，纽约快要出现一个严重的局面。到现在为止，大会的辩论已经使人们普遍同意在停战生效时不能使用武力遣返战俘。然而，以印度为首并得到英国、加拿大、法国和其他一些国家支持的某些中立国，却想来一个偷天换日，并错误地相信这样做将会实

现停战。他们建议，把俘虏移交给一个委员会，由委员会遣返那些愿意回国的俘虏并拘留其他的俘虏。要逃避拘留只有遣返的一法。这一来将会产生某些后果：我们将被公正地认为放弃了自己的原则；我们将被逼得使用武力把俘虏移交给这个委员会，或者拘留着他们让委员会来处理；还有，我们将获得一个不稳定的停战，使我们不能在敌人战线后面进行观察，不能破坏敌军的集中和供应线，并在我们军队的后方经常带来暴动的威胁。

纽约的局面要求我方采取坚决行动。摊牌的时候就要到来；明天将开始辩论，本星期末或下星期初就进行表决。总统和他的政府顾问们是坚定的。我曾经向我们的欧洲朋友解释说，我们在这个重要问题上的分歧将在美国导致对集体安全的严重的幻想破灭，而集体安全的问题并不限于朝鲜，也包括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其他同样性质的安排在内。在这次危机中，艾森豪威尔将军发表一项声明支持政府的观点，将是我们所能获得的最大助力。我已准备好一份供考虑的建议，把它交给参议员洛奇。将军没有什么表示，但是第二天参议员亚历山大·威利，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一个老资格共和党人也是我们在纽约的代表团的一个成员，宣布将军支持不强迫遣返的原则。

摊牌迫在眉睫

11月19日回到纽约后，我和艾登会见了三次，两次有劳埃德在一起，后来一次——在我要求下——单独会

见。在最后一次会见中，我建议他代表我们两人负责修改工作，只要他肯接受下列两个最低条件就行，条件再低我们就不干：第一，一个拥有执行权力的中立国主席（我们拒绝把不愿遣返的俘虏移交给一个由于需要一致同意而瘫痪的委员会）；第二，对不愿遣返的人，应有一个不同于无限期监禁的解决办法。他们的拘留应有个结束，虽则他们愿意去哪里的问题显然要留在以后解决，或许由联合国的某些机构解决。艾登拒绝承担。我指出，这样只能意味着他为了向梅农让步，早已决定或者想要决定破坏这些条件。他坚持说，事情不是这样；如果他同我达成协议，他必须告诉梅农，这样就会损害他对梅农的影响。对我来说，这等于表明我们不在一起行动，但是彼此相距不远。

在二十一国集团内部和外面，同英国人与加拿大人的斗争都在继续着。斗争采取辩论的形式，不仅辩论应该修改多少，而且辩论应否优先讨论梅农的决议案，和讨论应在修改以前还是修改以后进行。艾登和皮尔逊担心梅农的决议案如果受到严厉对待，他也许会把议案撤回——它已成为可接受的行动方案。在这一点上，我对任何人都不信任；我发现珀西·斯彭德爵士也持这种态度，他被推为二十一国小组委员会的主席。珀西爵士在理查德·凯西回国时被留下来担任澳大利亚代表团团长，但指示他要支持梅农的决议案，而斯彭德并不同意这个决议案。他决定从广义上理解这项指示，同意我设法使梅农先修改他的决议案，然后再支持他——这不妨说是一个"现款交易，运费自理"的建议。修正条款搞出来

了；英国人希望同梅农商谈；斯彭德则打算把修正之处提交11月21日星期五召开的小组委员会讨论。

这正是我一清早就飞往渥太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一天。皮尔逊原该陪我去的，但是在最后一刻通知我说，他担任大会主席事情很多，没法子陪我去。两个人分开以后，各自把自己的后方暴露给了敌方，但是我留下了一个精力充沛和能干的副手欧内斯特·格罗斯大使在纽约负责，而皮尔逊和他的副手都在纽约，听任渥太华无人照管。这是一个错误。小组委员会上的斗争打成平手；没有采取行动。

加拿大的插曲和结局

圣劳伦特总理，一位风趣的和彬彬有礼的先生，在渥太华热烈欢迎我们并使我们有一次愉快的访问。在加拿大总会——这也是一种威士忌酒的牌名，同我的母亲家过去制造的一种威士忌酒在竞争——举行的午宴上，我把这一愉快的集会比作这两种加拿大产的名酒的搀合，引起了全场欢呼。我拜会了曾任加拿大首任驻华盛顿大使的文森特·梅西总督后，接着参加总理的宴会并发表另一篇演说。

总理作了一篇优美的介绍词。其他成员也同样表示欢迎。我谈到新的集团外交在通过会议和公开辩论进行国际讨论时所碰到的问题。正如我刚在纽约看到的，这种模式——民主国家的立法手续——很不适应国际会议这类完全不同的现实。一个给人印象最深的基本不正常

现象是：少数人有责任和有能力采取任何必须采取的行动，多数人则不仅愿意而且急于规定应该采取什么行动和怎样采取行动，这两类人之间存在着很大距离。我举了在纽约讨论的战俘问题为例，并说我们的军事人员认为一个不伴随对俘虏作出迅速和全部处理的停战是危险的，因为这一来将有几万俘虏同遣返或者不定期的监禁进行斗争。

这时候，我的好朋友国防部长布鲁克·克赖顿插话说，他和许多人都认为我们的将军们在这一点上是错的。我回答说，他的报告正说明了我的论点。我们的将军们是亲历其境的并且指挥着——在联合国的请求下——六个美国师和十二个由我们装备、训练和支援的朝鲜师；他们是在别人好意的但是象征性的援助下进行着这场战争。在我看来，只有那些负责指挥作战的人的军事意见应当听。总理表示同意；他说，就他来说，这个意见是驳不倒的。问题的关键既然讲清楚，看来也不必多谈了。我们的访问以总督在政府大厅举行午宴和美国大使斯坦利·伍德沃德为总理举行晚宴而告结束。星期日早晨，我们怀着愉快的回忆回到纽约。

纽约正处在高度的骚动中。我在渥太华时，格罗斯曾向我报告，他同艾登和皮尔逊谈判，以及艾登和皮尔逊同梅农谈判都没有结果。我们一致认为他们的主张不能接受；格罗斯必须告诉他们，我们打算在第一委员会内反对这个决议案并拿出我们自己的修正案。格罗斯这样做了，而且还把他的战斗精神带了不少到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来，因此 11 月 23 日的《纽约时报》登载一则关于英国

人和我们之间有重要分歧的消息。格罗斯对此很难受，英国人也是一样，但是我觉得，现在正好把阴谋揭露一下。谁都会认为格罗斯是故意泄漏的，因此我们不妨装得就是这样。皮尔逊在同我通电话以及后来见到我时，他似乎合作得多了。

在二十一国集团那天晚上开会之前，梅农已经散发了接受我们的某些但非全部反对意见的修正案。会上，我主张我们停止同梅农谈判，采纳必要的进一步修正，并公布修正后的决议案。需要的是明确规定停战协议签字后在一定时间内完成遣返程序和对那些不愿遣返的俘虏的另行处理办法。劳埃德要求再给一个机会去说服梅农，我们也答应了。但是第二天24日，发生了两件解决危机的事情：总统授权我不管英国人怎样，径自提出我们自己的建议，而维辛斯基公开和严厉地拒绝了梅农的动议。这是俄国人在我们自己彻底分裂后又使我们团结起来的另一个例子。它完全破坏了梅农辛辛苦苦地树立起来的印象，就是他同共产党方面接近而且共产党人同情他的努力。

在第一委员会的会议上，我在维辛斯基之后发言，对他在停战协议上抱分裂态度表示遗憾，并赞扬艾登和梅农的政治家风度。一些次要的修正就会使决议案符合他们在演说中提出的可贵目的。我主张就进行这些修改。下面的一个星期事情比较乱，艾登回国去了，我也打算离开。梅农在获悉中国人支持维辛斯基的观点时，想要撤回他的决议案，但是被劝阻了。决议案的最后形式开始形成。拉丁美洲国家同我们站在一起。我打电报给总统，“在

过去二十四小时内，这里的事情发展得很快，而且具有老式闹剧的种种特色。”12月1日，第一委员会修正了决议案，规定设立一个工作委员会并保证遣返将在停战协议签字三个月后结束。如果还有俘虏留下来，这些人将由一个政治会议或由联合国本身来决定处理办法。12月3日的大会以五十四票对五票通过了这一决议，皮尔逊先生把决议案送给北京，并寄上一个言词迁就的附言。

十天以后，中国人断然拒绝了它，北朝鲜人也跟着拒绝。同时，在我们的峰岩岛营地中的共产党俘虏拒绝服从要他们停止军事操练的命令，并对企图强迫执行命令的军队扔石头。一场战斗的结果是，八十五个俘虏被打死。葛罗米柯在大会上提出一个决议案，谴责对战俘的“集体谋杀”。它以四十五票对五票，十票弃权被否决。我已于12月2日回到华盛顿，准备十天后赴巴黎参加我的最后一次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理事会会议，把大会的其它议题都留给我们代表团的同事去管了。

四十二　换　　防

态度勉强的胜利者

1952年夏天，杜鲁门总统以他的有条理和苦心的方式动了许多脑筋，想使我们的继任者能在就任以前就熟悉他们即将处理的那些事情。他自己曾因罗斯福总统没有使他适当了解情况而吃过很大苦头。国家有权要求接替工作尽可能顺利地进行，这就是说要移交给熟悉国家事务的人。总统将同当选总统制订顺利接替的方式，这样我们将各自同自己的继任者一起执行。我们每人都应当认为，不管选举结果怎样，我们是一定会更换的。要知道，总统和他的部长们将负责至1月20日中午为止；不应当要求新政府分担责任，但应当使他们充分了解情况。这个计划只有在接任的政府愿意了解情况时才能行得通。可是新政府在很大程度上都避免插手任何事情；1933年初当选的罗斯福总统就是那样做的。

计划制订了，文件写好了，但是，我们在11月18日同艾森豪威尔将军和他两个助手的会议，使我深信跟他们是谈不出什么来的。将军的同伴，马萨诸塞州参议员亨利·卡伯特·洛奇和底特律的约瑟夫·道奇都是好人；他们过去在我们同日本签订和约以后的经济关系问题上

给我们提过建议。艾森豪威尔将军的态度使我迷惑不解。他那良好的性情和倾向于健谈的安详态度消失了。他同我们在一起似乎感到尴尬和勉强——小心不露锋芒和沉默到无礼的程度。他坐在内阁室桌子面对着总统座位的一张椅子上，嘴里咬着眼镜架的脚，有时要求提供一份备忘录，以便了解一件引起了他注意的事情。他的态度好象反映了他于1952年8月16日给杜鲁门总统的复信的态度；在那封信中他拒绝了总统在竞选期间邀请他同总统以及其内阁成员会见并听取公务情况的报告。总统用的一句话，"冷冰冰的恶意"，形容得维妙维肖。

我除了报告前面提到的朝鲜局势外，还谈到解决英国—伊朗石油争端的讨论又恢复了；这个争端在新政府接替时说不定会形成一场危机。由于法国人在欧洲防务和东南亚战争中的软弱地位所产生的问题，很有可能在同一时间达到同样状况。最后我提到，西方联盟的整个经济基础对安全来说太脆弱了，它使我们非常担心。所有这些讨论，都在杜鲁门总统关于这次会议的叙述中很好地谈到了。

这次会议的结果使我深深感觉到，总统所希望的一次有条不紊的、高效率的换防必然要失败。在会议上，我竭力主张，接任的政府必须派更多的人到政府的各部门去，俾能在1月20日后负起责任来。但是艾森豪威尔将军说，他同卸职政府的联络只委托给两个人：道奇先生将在预算局编制1953年7月1日—1954年6月30日财政年度的预算时同预算署保持接触，这一预算将由杜鲁门总统在新总统就职前不久提交国会；而参议员洛奇将负

责所有的其他联络；我听到这话时非常迷惑不解。他对问题理解得这样古怪，简直到了可笑的地步。事实上，就国务院而论，除了杜勒斯先生曾两次来访外，我们并没有同任何人有进一步的接触。12月3日，他随便跑来，谈了三十分钟，对我说，他打算几乎把全部力量放在政策问题上，而不象我那样在人事和行政上浪费那么多的时间。我想，这是好事情，只要他能够做得到。12月24日，他在我要求下又来了一次，了解了一些他应当知道的事。

同北约告别

在我从联合国大会回来并把我研究的问题从朝鲜停战转到欧洲防务上来之后十天，我又乘"独立号"去巴黎参加我的最后一次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理事会会议。我们发现，会议上的气氛同十个月前在里斯本的大不相同。我们到达后不久，舒曼煤钢计划和欧洲防务集团的杰出的发起人让·莫内就来拜访我。他说，阿登纳在摆脱自己国内困难之后，将推动防务集团的批准工作。但是，在他看来，影响欧洲政治联合的主要困难好象来自比利时和英国，而一些次要困难则来自法国社会党人。他继续说，英国人必须觉悟到应当支持大陆的统一，而不能去阻碍它。我向他指出，美国在马歇尔计划、欧洲经济合作组织、北大西洋公约及其所属的统一司令部、美国在海外驻军、恢复德国主权以及通过欧洲防务集团参加欧洲防务等活动中所走过的惊人的路程，时常是和欧洲的那些既卓越又新奇的倡议配合起来做的。现在欧洲的势头正在

消失，而后退却达到了预示灾难的地步。如果要美国继续按照过去六年的规模保持对欧洲的兴趣和努力，那就需要让欧洲的那些旨在建立一个政治上团结和经济上与军事上坚强的集团的政策继续下去。我们能够而且愿意把支持这样一个集团作为我们的外交政策的中心。

然而，如果欧洲人的努力失败了，那么我们对他们的支持力量的整个基础也就会垮掉。如果我们的努力能帮助欧洲人建立一个新的和强大的欧洲，它将是值得的和必要的。如果欧洲人放弃斗争，那么继续支持他们就是愚蠢的行为。如果欧洲防务集团垮台的话，我预期我们的新政府将遇到巨大的困难。我难以理解的是，德国人和法国人眼见我们大力响应他们那些有政治眼光的努力，居然会象他们现在那样纠缠在一些不足道的争吵上，而把自己的防务和前途置之度外。反正我个人的责任很快就要结束了。莫内找布伦塔诺和舒曼谈话去了。

法国和德国当前的困难，来自双方如何对待波恩条约以及萨尔问题。在德国，阿登纳在联邦议院中推动批准波恩条约；在法国，舒曼却在国民议会中推迟讨论这项条约。双方的战术证明都是错的。阿登纳认为联邦议院以简单的多数批准该条约是符合宪法的规定的，但这个观点遭到了联邦参议院的反对。联邦参议院代表德国各州，自称它拥有法律上的批准权。其他人则认为这项条约更动了宪法，因此需要来一次新的选举，或者在联邦议院中以三分之二的多数通过。休斯总统要求联邦宪法法院提供谘询意见。当联邦议院在讨论的最后阶段仅以二百一十八票对一百六十四票的过半数但少于三分之二的

多数批准该条约时，阿登纳害怕法院会作出不利的决定，就劝告休斯总统撤销他的要求，并推迟最后表决，以等待法国事态的发展。

在法国，事态的发展非常没有把握。10月，国民议会主席爱德华·赫里欧——他是一个最受尊敬的法国领袖，也是三年前领导成立欧洲理事会并倡导欧洲统一运动的——对议会中他的党团发表了一篇煽动性的演说，谴责欧洲防务集团条约同法国宪法相抵触并且危害到法国利益。其他法国领导人也附和他。甚至比内总理也变得不热心了。与此同时，11月30日在萨尔的选举中一次亲法国的胜利，使得欧洲爆发了一个新的萨尔危机。波恩和巴黎之间都在互相指责。

我们就是在这样一种气氛中在巴黎举行会议的。与会的人都象温和而热情地想念垂死者那样对待我们，但是既不要求帮助，又不要求忠告，也不要求对我们不能与之共享的未来作出什么许诺。在这方面，他们要等我们的继任人来表示。还有，自从里斯本会议之后，伊斯梅爵士和他的国际工作人员主持的理事会秘书处的新班子已经上任，所以我们的常驻代表在会议的安排上比过去可以少负些责任了。但是我们——即财政部长约翰·斯奈德、国防部长罗伯特·洛维特以及自从1951年起就担任共同安全署署长的艾夫里尔·哈里曼——却由总统批准主持大会议程。

在一个方面，我们失败了。李奇微将军为了在1953和1954年建造飞机场、燃料仓库和分配设备要求提供四亿美元，尽管我们答应支付这数目的百分之四十，但是其

他国家却把这数目削减了将近一半。鉴于俄国人正在波兰和东德进行准备，将军当然感到不好受。在1953年5月的下一次理事会会议上，我们的继任人终于能够使理事会对所要求的全部款项得到批准。对我们来说，从里斯本会议那次重新振作起精神和希望的高潮以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内显然正在酝酿着一种反作用。1952年部队的指标完成得相当不错，——即使不是在战斗力上，至少在人数上是如此——但是1953和1954年的计划指标明明是完成不了的。印度支那战争的影响以及对我们的援助数量的失望，——由于国会削减了十亿美元的经费并拖延了拨款——已经使法国政府删去了原来计划在欧洲增加的法国师的数目。

其他因素也对我们的欧洲同事们的愿望起了泼冷水的作用。他们越来越相信军事计划正在超出执行这些计划的经济手段，不但如此，他们还被西方和东方事态的发展闹得没有心思去搞防务。美国的竞选运动和选举使他们相信西方正在吹来一阵新风，他们最好还是等着观望这阵风所预示的变化有多大。这阵风也许意味着——而且的确如此——不止是掌权的人的调换；它还能预示——而且的确如此——一种方向和决心大小的重大变化。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这一变化导致西面来的压力的停止。

再者，就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理事会在巴黎举行它的相当没有收获的会议的同时，维也纳出现了一件和它竞争的举世瞩目的大事。八十五个国家代表参加的世界人民和平大会在维也纳开会了；会上共产党人照例要求

订立五大国和平公约、裁军条约、撤走外国军队和基地以及宣布原子、生物和化学战争、种族歧视和殖民主义为非法等等。这难道是东方对西方的新政府作出争取长期寻求的彼此之间“缓和紧张局势”的一次新的努力吗？西欧许多人的希望，使他们相信事情可能是这样。所以这是等着瞧的另一原因。

在对理事会的告别演说中，我尽力向部长们保证，美国政府的更换并不会使美国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态度有所改变，但是我强调需要相互都能保证。在未来的几个月中，欧洲的一些议会将审议欧洲防务集团条约，今后几个月中对我向他们略述过的欧洲团结问题是否迈开重要的一步无疑将有明确的决定。他们在大西洋彼岸的盟国对这个决定是极端重视的。欧洲的团结和力量的继续发展将是一股向心力，将使海峡那边的英国和大西洋那边的加拿大和美国加强它们同欧洲的联系。如果欧洲变得不团结和软弱，而不是团结在一个中心，那么，它就不可避免地要在整个大西洋集团中散布不团结。二十世纪是以大战后我们一起做的工作，还是以大战前的灾难闻名后世，这说不定要看欧洲的这项重大决策而定。

在理事会下一次开会时，其他人将代表美国。他们是我们都熟悉的。我们保证，他们将继续效忠和致力于我们国家当初那样自发地和举国一致地参加的这个伟大组织，并请求我们的同事对他们表示信任和友好。我们讲了这番话之后，他们就和我们热情地告别。

在理事会采取的少数行动中，有两件是原提议人感到满意的，但是仅此而已。一件是宣称北大西洋公约组

织对法国在印度支那的斗争深表关切；另一件是赞同与丘吉尔首相在地中海司令部问题上取得妥协。地中海将有两个司令部。设在那不勒斯由卡尼海军上将指挥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南欧司令部，管辖意大利、希腊和土耳其的陆军和空军，并保留对美国第六舰队的指挥。在马耳他的海军上将蒙巴顿爵士被指定为地中海总司令，将在战时负责海上交通。他所指挥的系统和部队的模糊性，可以从他在理论上对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负责以及下列条款上看出来。那条条款规定，他的英国、法国和意大利海军分舰队仍在本国指挥下执行本国的任务。这两个指挥部怎样配合——如果配合得了的话——始终不明确。丘吉尔首相在他向下议院的声明中，设想它们将“互相帮助”。这使人想起年初关于大西洋司令部的斗争来。这位“昔日的海军界大人物”仍旧活在不列颠尼亚女神统治海洋时那个光荣回忆的时代里。在十年多一点的时间内，英国在地中海的三个堡垒（苏伊士、塞浦路斯和马耳他）都将独立，而大西洋入口直布罗陀海峡的保卫者，往后的日子是不好过的。

一份最后的备忘录

到了12月，总统终于相信，他那关于新旧政府的一次示范交替的希望和计划是不会有什么结果了；于是他指示洛维特、哈里曼和我参照对国家危险的最近估价，重新审查我们当前的国家安全计划。我们搭成了一个能干的班子，动员各部门从事这项工作，包括国务院的保罗·

尼采、国防部的弗兰克·纳什和共同安全署的理查德·比斯尔。他们在1月7日向我们提出了他们的备忘录，经我们同意并附上意见后，于16日交给总统。总统批准了这份备忘录。

我们告诉总统，这份备忘录不是一般性重述，我们在世界上的地位以及与此有关的安全需要，而是根据上次基本考察以后的两个多月来的发展，陈述我们进一步的需要。我们特别感到的是：朝鲜停战的希望在减少，如同上一次联合国大会所显示的那样；早日批准欧洲防务集团的希望也在减少；发展热核装置上有了进展；以及从最近的共产党大会看到的苏联加强冷战攻势的意图。简单说来，我们的结论是，从这些事情上看出需要(这点是详细说明)加强大陆防务，包括民防和其他方面的防务，以及通过一种更加可靠的打击力量来加强威慑力量防御。朝鲜战争的继续，也许需要增加对自由世界的军事援助和军备生产。由于我们的继任人将削减军事预算而不是增加军事预算，所以这份备忘录也不需要多加讨论了。